

内部研讨
请勿外传

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 论文汇编

主办单位

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福建省商务厅

福建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福建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福建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

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福建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福建社会科学院

泉州市人民政府

2014年11月26-29日

中国·泉州

Yinye 尹焯

2014. 11. 26

2014. 11. 26—29

泉州 (华侨大厦)

26 全天报到

26 晚参加国际艺术节 → 泉州体育中心

27 全天研讨会 (下午有“讲”)

28 上午游“九日山”

28 下午研讨会 ~~结束~~

目 录

- (1) 福建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路径选择及其相关建议
福建省外事办公室、福建社会科学院课题组 • 1 •
- (2) 福建融入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历史渊源和政策建议 陆芸 • 8 •
- (3) 福建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意义、路径与对策研究
林必越 曾建民 • 13 •
- (4) 福建推进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大意义研究 王日根 • 20 •
- (5) “一带一路”建设与福建新一轮对外开放战略研究 黄继炜 魏澄荣 • 24 •
- (6) 筑路海上，筑梦天下：论福建航海历史与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
谢必震 • 30 •
- (7) 推进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福建省的挑战与对策 何军明 • 37 •
- (8) 发挥福建优势，为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发力 陈天宇 • 46 •
- (9) 海上丝绸之路战略视角下福建省与新加坡合作发展旅游文化创意产业对策研究
吴江秋 • 54 •
- (10) 海上丝绸之路与建设福建省海洋经济强省研究 杨诗源 • 60 •
- (11) 海上丝绸之路与福建海洋经济互补性发展研究 易小丽 • 65 •
- (12) 福建的海洋文化资源与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苏文菁 • 73 •
- (13) 区域经济集团化新趋势下福建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研究 魏国江 • 77 •
- (14) 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分析福建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李可爱 • 82 •
- (15) 闽籍海外华商助推福建融入“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价值与途径研究
马占杰 • 88 •
- (16) 福建推进“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的研究 刘珊 • 93 •

- (17) 海上丝绸之路框架下闽台经贸合作的共同利益 王琮 • 100 •
- (18) 海上丝绸之路框架下深化闽台金融合作 徐宝林 赵均 • 103 •
- (19) “一带一路”框架下深化闽台电子商务合作研究 陈柏良 侯贞杰 • 112 •
- (20) 福建加快融入“海上丝绸之路” 战略新兴产业深度对接合作创新研究
王婷 • 120 •
- (21) “一带一路”福建优势：华侨华人 杨辉 • 125 •
- (22) 华侨华人与福建融入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文化视角的思考 杨宏云 • 128 •
- (23) 论海外华侨华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与制约因素
——以东南亚华侨华人为例 王焕芝 • 132 •
- (24) 华侨华人在海丝之路中的历史作用及其运行机制研究 张赛群 • 139 •
- (25) 福建推进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互联网平台的构想 池毓江 • 148 •
- (26) 打造海上丝路引导基金 推动福建一带一路建设 徐宝林 王睿 • 151 •
- (27) 福建融入“一带一路”投资合作研究 徐宝林 王畅 • 161 •
- (28) 丝绸、白银与帆船贸易：1570-1760 年的马里拉福建商人 钱江 • 171 •
- (29) “海上丝绸之路”与明清之际的福建对外文化交流
——以中西交流为考察视角 吴巍巍 林金水 • 203 •
- (30) 福建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渊源及重要贡献 徐文彬 • 216 •
- (31) 我国相关省市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做法及其启示
福建社科院课题组 • 223 •
- (32)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与建设方略 全毅 汪洁 刘婉婷 • 227 •
- (33)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空间范围、时代特征与战略愿景
黄茂兴 贾学凯 • 249 •
- (34)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及其当前推进 周兴泰 • 259 •
- (35)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及其建设路径 贾益民 许培源 • 276 •

- (36) 加强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服务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余兴光 许江 胡毅 张汉女 · 286 ·
- (37) 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兴衰的政治影响因素
尹烨 · 293 ·
- (38) 论海丝文化中的契约精神——由侨批金融业引发的思考
林芳惠 吴凤娇 · 298 ·
- (39) 基于包容性合作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港口物流大通道建设
刘松先 · 306 ·
- (40) 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的开发策略研究
王玉国 · 313 ·
- (41) 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与广告产业合作研究初探
张璠 · 320 ·
- (42) 海上丝绸之路文献资源保障体系研究
陈彬强 · 325 ·
- (43) 从税收沿革思考“海上丝绸之路”发展
福建省税务学会课题组 · 332 ·
- (44) 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宝石贸易: 以明代墓葬的考古发现为例
姜波 · 345 ·
- (45) 设计激活传统——建设与弘扬“海丝”文化
卢新燕 · 349 ·
- (46) 妈祖信仰与海上丝绸之路
连心豪 · 353 ·
- (47) 弘扬妈祖文化正能量, 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文化枢纽
黄瑞国 · 357 ·
- (48) 泉州重启“海上丝路”的战略思考
林华东 · 364 ·
- (49) 作为文化线路的“海上丝绸之路: 泉州史迹”遗产保护研究
骆文伟 · 371 ·
- (50) 泉州古代陶瓷与海上茶瓷之路
陈建中 · 378 ·
- (51) 莆田市融入“一带一路”战略的主要优势及其对策
蔡天新 · 386 ·
- (52) 漳州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思路与对策
谢艺麟 · 394 ·
- (53) 挖掘月港文化资源, 积极参与海丝建设
江智猛 · 403 ·
- (54) 海舟行茶道 闽茶香四海——建茶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地位与历史影响研究
蔡清毅 · 416 ·
- (55) 海上丝绸之路与福州的陶瓷贸易
张振玉 · 427 ·

- (56) 海丝寻梦：全球本土化中的闽南地方戏曲
——“海上丝路”与闽南戏曲“走出去”战略研究系列论文之一 王伟 • 438 •
- (57) 德化陶瓷贸易在新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趋势分析 李变花 • 445 •
- (58) 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结构及地理空间分布研究
李蕊蕊 赵伟 陈静 • 456 •

福建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 路径选择及其相关建议

福建省外事办公室、福建社会科学院课题组

“一带一路”建设是国家推进新一轮改革开放，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重大战略决策。历史上，福建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和发祥地，要积极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争取更大作为，为全国大局做出新的贡献。

一、福建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势及其潜力

福建在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地位特殊，优势突出，发展空间大。

（一）历史渊源深厚

福建不仅在海上丝绸之路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而且作过积极的贡献。其中，泉州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之一，唐代中期为全国四大通商口岸，宋元时期泉州港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与近百个国家和地区有密切往来。明代前期，福州港取代泉州港的官方港口地位，也是郑和七次下西洋的重要驻泊地和开航地点，在我国对外经贸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漳州月港是明代中后期我国重要的港口城市，由其开辟的经菲律宾马尼拉至拉美、转运欧洲市场的大帆船贸易航线，与东南亚、印支半岛和日本、朝鲜、琉球等 47 个国家和地区有直接的贸易往来，形成了联系东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

（二）侨力资源丰富

福建是全国著名侨乡，旅居海外侨胞众多、分布广泛、实力雄厚、影响力大。据统计，闽籍侨胞已超过 1500 万人，分布在世界上 17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国家约占 80%。在“世界华商 500 强”中，闽籍侨商占 1 / 10 多。据“2013 闽商百强榜”、“2013 福布斯华人富豪榜”和“2013 胡润全球富豪榜”数据统计，福建在东盟国家的重点侨商有 45 家，财富总额 1518 亿美元，主要华人企业集团有：马来西亚的嘉里集团、IOI 集团、云顶集团、国浩集团、杨忠礼机构，印尼的金光集团、盐仓集团、金鹰国际集团，菲律宾的鞋庄控股、陈永裁财团、环球罗宾娜、巅峰控股，新加坡的远东机构、华侨银行集团、大华银行集团等，侨力资源已成为福建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依托。

（三）对外人文交流密切

福建“海丝”文化底蕴深厚，地域特色鲜明的闽南文化、妈祖文化和船政文化，在我国海洋文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在海外得到广泛传播，被吸纳成为当地“土著”文化的重要元素，成为我国对外人文交流的重要载体。在宋、元鼎盛时期，泉州与近 100 个国家和地区有过友好往来，

成为当时典型的“国际化”城市，在此经商、居住的穆斯林有 10 万人，促进古波斯、阿拉伯、印度和东南亚的宗教与文化融合发展，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为全球首个世界多元文化展示中心，2013 年当选为首届“东亚文化之都”。福州、漳州等地均有丰富的“海丝”文化遗存。福建“海丝”文化源远流长，与对外经贸往来、侨力资源优势紧密结合，形成持续不断“活的海丝”，成为“海丝”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的历史记忆，民心相通的情感纽带，有利于把“海丝”人文优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四）互通互联日益完善

福建围绕发展“大港口、大通道、大物流”，着力构建“三纵六横”铁路网主框架、“三纵八横”高速公路网，加快建设海西港口群，完善以福州、厦门国际机场为主干支结合的空港布局，已基本形成设施更加衔接配套、技术装备更加先进实用、运输服务更加安全高效的综合交通网络体系。到 2015 年，全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 5000 公里，普通公路网通车里程突破 10 万公里，铁路通车里程达到 3300 公里，其中快速铁路突破 1500 公里；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突破 5 亿吨，集装箱吞吐量达到 1500 万标箱；民航旅客吞吐量力争突破 3800 万人次。随着基础设施日益完善，进一步畅通与“海丝”国家和地区的通道连接关系，为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福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进展情况

福建在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已取得初步成效。

（一）强化经贸合作

福建加快对接中国——东盟自贸区，与“海丝”国家经贸关系密切、互补性强。2013 年，福建与东盟、中东国家贸易额分别为 243 亿、151.4 亿美元，较 2010 年增加 0.84 倍、2.38 倍。截至 2013 年底，福建实际利用东盟外资 84.7 亿美元，在东盟、中东国家设立境外企业和分支机构达 156 家、78 家，核准对外投资额分别为 4.5 亿美元和 3.06 亿美元，东盟已成为福建第二大贸易伙伴、第四大外资来源地和境外投资重要地区。目前，泉州市与“海丝”国家贸易额占到进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福州市在印尼、缅甸、毛里塔尼亚等国建立 6 个远洋渔业基地，远洋渔业产量居全国前列；福州海峡水产品交易中心年交易量约 200 万吨，全年交易额超过 300 亿元，交易规模居全国第一。漳州市与东南亚国家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量迅速增加，为福建发展开放型经济提供了广阔空间。

（二）推进项目落地

福建已确定一批“一带一路”建设重大项目，包括争取国家支持项目 23 个、承接国家任务项目 3 个、省内实施项目 25 个，范围涵盖互联互通、产业合作、贸易合作、海洋合作、双向投资、社会事业、平台机制和人员往来。其中，福州市政府与国开行福建分行、中非发展基金共同设立 100 亿元海上丝绸之路基金，首期基金规模 20 亿元；菲律宾首都银行已在泉州设立分行。厦门东南亚国际航运中心、厦门新机场、福州长乐机场二期，罗源湾、湄洲湾大宗散货储运中转基地，湄洲湾、漳州古雷油品储备中转基地，新加坡金鹰国际集团林浆一体化、赛得利差别化纤维项目，泰国正大集团系列项目、湄洲湾第二发电厂新建项目、柬埔寨寨中国（福建）工业园区、“中国——是沙特阿拉伯”石化产业合作泉州园区等一批重大投资项目，正在加快落地。

（三）重视拓展人文交流

福建积极拓展对外人文交流。其中，厦门大学在马来西亚设分校，福建师大正式成立“中国—东盟教育培训中心”，厦门“9.8”投洽会设立东盟馆，举办“中国（福建）——东盟中小企业合作论坛”。加快“申遗”工作，积极规划保护海上丝绸之路历史资源，有22处（泉州13处、福州6处、漳州3处）入选国家文物局《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大型舞剧《丝海箫音》参加上海亚信峰会开幕式文艺演出，“丝路帆远——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精品联展”均获得广泛好评。福州市积极推动建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城市交流合作机制，举办“海上丝绸之路市长（高峰）论坛”、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扩大与海上丝绸之路国家友好往来。泉州市已确定承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品牌博览会、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多边商务理事会。漳州市强化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址规划保护，加快修缮岳口街牌坊、天一总局、林氏义庄等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共同编印《清宫漳州密档》，为海上丝绸之路“申遗”提供重要史实。

（四）积极争取政策支持

福建重视发挥中央部门作用。中央外办、外交部、国务院侨办、海关总署、中国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单位，相继到福建开展专题调研、举办座谈会，支持福建加快融入“一带一路”建设。2013年9月，福建申报的“印尼金马安渔业基地更新改造”、“中国-东盟渔业产业合作及渔产品交易平台”、“中国-东盟海洋学院”3个项目，首批入选“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东盟海产品交易所已上报外交部列入“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支持项目；“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拟设立泉州海上丝绸之路专项基金。

（五）制定出台“实施意见”

福建已制定《福建省融入国家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实施意见》（简称“实施意见”），坚持服务国家开放战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明确了目标地位、重点布局，通过深化重点领域合作，创新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加快打造“一带一路”建设重要战略支点，成为互通互联建设的重要枢纽、经贸合作的前沿平台、人文交流的重要纽带。福州市已出台《福州市建设国家“一带一路”重要枢纽城市行动方案》，加快推进重要交通枢纽、经贸合作枢纽、人文交流枢纽建设，把福州打造成为国家“一带一路”建设重要枢纽城市。泉州市出台《泉州市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建设总体方案》，将扩大多元化文化交流，加快基础设施互通互联，搭建海上丝绸之路沟通协作平台，把泉州建设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排头兵”和“试验田”。漳州市重点推进通道建设、经贸服务、项目对接、人文交流、机制创新，加快建设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节点城市和先行示范区。

三、福建融入“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主要挑战

“一带一路”建设既是经贸合作通道，也是人文交流的重要渠道。福建融入“一带一路”建设面临问题主要有：

（一）分工协作问题

主要是各地市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功能定位、目标任务、重点领域和拓展空间不够明确，缺乏站位全局、统筹规划和“一盘棋”发展思想，主动融入、积极对接、协力推进，发挥优势意愿

不强，有可能带来盲目竞争，不利于优化资源配置。

（二）平台作用问题

福建基础设施互通互联有待完善，对外通道不够通畅，对外人文交流合作载体不多，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平台作用发挥不够，各种优惠政策利用还不充分，海洋产业合作平台相对缺乏，优化港口布局、开辟新航线等面临一系列的技术难题。

（三）资金瓶颈问题

福建挖掘保护海上丝绸之路遗迹力度不够，加强港口、物流园区、集散基地和配送中心建设，打通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海上合作走廊，开辟新的空中运输航线，打造海上丝绸之路节点城市，加快建设跨境商务合作平台、跨境产业合作园区和大宗商品交易市场仍存在大量的资金缺口。

（四）文化融合问题

福建拓展对外经贸合作关系，推进重大项目合作，鼓励企业“走出去”发展，提升区域文化品牌影响力，较少了解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参与意愿，与海外侨胞沟通不够深入，打造命运共同体，兼顾当地民众收益和“走出去”企业利益不多，尚未实现开放包容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体制机制。

（五）政府角色问题

“一带一路”建设属于跨区域、跨部门、跨领域的合作，涵盖互联互通、海上通道安全、海洋资源开发，建立争端解决机制等机制，需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配合沟通，形成一致的开放合作理念，共同制定区域开发政策，重点推进能源资源、沿线通道和优势产业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和共同发展。

此外，产业基础相对薄弱、出海通道不够便捷、区域性物流中心建设滞后、物流成本居高不下等，也制约“一带一路”发展。

四、福建加快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政策建议

福建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要找准目标定位，明确总体要求，强化分工协作，以开放包容为理念，以经济合作为主轴，人文交流为支撑，全面统筹陆域、海域和海外资源，加快打造“一带一路”建设重要战略支点。

（一）强化顶层设计

1. 成立领导小组。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意义重大，必须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分工，完善工作措施。建议由省政府领导牵头，省发改委、商务厅、省外办、海洋与渔业厅以及厦门市、福州市、泉州市、漳州市等部门为成员单位，成立福建省“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统筹规划建设，突出区域特色，积极争取国家政策、项目和资金支持。

2. 做好规划衔接。强化共识，充分调动各地积极性，科学定位“角色”和“职责”，形成发展合力。按照省政府“实施意见”要求，各相关部门和地市要认真做好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配套政策和跟进策略，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相关省市政策衔接与互动发展。

3. 突出合作重点。按照“开放包容、双向互动、互利共赢、官民结合”原则，积极拓展境外市

场，加快构建海外能源和重要原料资源基地，不断扩大经济互补性，提升对外经济开放度。建议以东盟、中东国家为重点，以互通互联、经贸合作、人文交流为核心，深化重点合作领域，全面提升对外经济合作空间，加快打造“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战略支点。

（二）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

1. 强化整合资源。发挥地缘优势，完善海上通道、空中通道、陆路通道和信息通道，促进基础设施互通互联。整合福州、厦门海关特殊监管区和平潭综合实验区，加快设立福建自由贸易园（港区）。推进厦漳泉同城化、福莆宁一体化，提升南三龙城市群功能，加快福州新区、泉州“金改区”和台商投资区建设，形成“以点带面、从线到面、沿线串联”的区域合作新格局。

2. 实现错位发展。瞄准目标市场，采取不同策略，强化区域分工合作，促进优势互补。重点推进厦门与新加坡、泉州与马来西亚、福州与印度尼西亚区域合作，加快建设海洋强省，打造闽台琼、闽粤浙海上丝绸之路区域合作平台。以产业链路线图，着力推进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能源矿产业、旅游业、金融业合作，构筑“海丝”沿线国家产业“生态群落”。

3. 促进联动发展。建立部际协调机制和区域发展协调机制，内外结合，坚持“点面”结合、联线发展。加快把厦门、平潭打造成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示范区，把福州、泉州、漳州建设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城市、现代“东方麦加”城市和主要节点城市，把宁德、莆田打造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旅游基地和港口城市，不断提高南平、龙岩、三明区域开放合作水平。

（三）完善对外开放总体布局

1. 推进经贸合作。坚持经贸“唱戏”，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鼓励企业“走出去”发展。重点拓展粮食、食用菌等民生工程合作，积极推进石油化工、机械设备、建材等产业对接合作，深化能源矿产资源合作，推进“海丝”沿线国家（城市）旅游合作，加强与境外金融机构合作，拓展海洋经济合作空间，加快打造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贸合作的重要枢纽。

2. 拓展利益空间。积极开拓新兴出口市场，强化重点商品出口基地建设，扩大高附加值产品出口，优化产品贸易结构，扩大外贸进出口规模。创新招商引资模式，放宽投资准入，发展绿色总部经济，重点吸引世界 500 强企业和全球龙头企业投资。扩大双向投资，引导和支持企业在境外建设经贸合作区，加快打造商贸物流、原材料生产及加工基地，拓展地缘经济利益空间。

3. 打造经济转型升级版。坚持产业互补、互惠互利，以东盟国家为重点，深化与东南亚、南亚、西亚、中东、东北非等国家（地区）经贸合作。畅通资本、商品、项目、人员、文化等输出通道，加快打造海上经济合作走廊。集中力量组织实施一批重大合作项目，推动福建产业与台湾自由经济示范区对接，进一步提升海上丝绸之路品牌影响力，全力打造经济转型升级版。

（四）构建对外经贸关系通道

1. 打通经贸合作绿色通道。加快构建临海产业带、海洋经济合作试验区，推进江阴港区中印（尼）经贸合作专属园区、境外投资建设原料加工基地、紫金矿业塔吉克斯坦矿山项目建设，大力发展海外能源及大宗商品贸易。依托环海峡旅游圈，构建环南海及东亚文化旅游圈，发展邮轮旅游，加快打通海上丝绸之路国家经贸合作绿色通道。

2. 完善对外开放重要通道。积极推进铁路、高速公路、客运专线、干支线机场等交通枢纽建设。

加快整合港口资源，以港湾大型深水航道为重点，集中力量建设厦门港、福州港、罗源湾、湄洲湾、漳州古雷半岛“两集两散两液”核心港区。推进港口转型升级，实现港口与产业、城市互动发展，加快打造服务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通道。

3. 构建经略海洋蓝色通道。深化海洋合作，大力发展海洋新兴产业、现代海洋服务业和现代海洋渔业。积极发展远洋捕捞，加快建设东盟远洋渔船检测中心、“中国——东盟海洋合作中心”、福建境外远洋渔业综合基地、中非渔业合作（琅岐）基地和福州东盟海洋产业园，做大做强福州海峡水产品交易市场、东盟海产品交易所，加快构建经略海洋的蓝色通道。

（五）重视发挥海外华侨华人作用

“侨”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参与者、见证者和贡献者，是推进福建改革开放，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依托力量。

1. 发挥侨力资源优势。进一步挖掘侨资侨智，充分利用“两新”（新生代、新华侨华人）、“两重”（重点社团、重点人物）资源优势，以侨为“桥”，强化乡情、亲情、友情联络，加快推进“海外福建”、“海上福建”建设，扩大跨境合作效益，不断拓展经济发展潜力。

2. 有效涵养侨务资源。搭建侨商发展平台，密切与海外闽籍社团联系，做好“留根工程”，维护好海外侨胞合法侨益。积极发挥华侨华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释疑解惑作用，在经贸合作关系中的桥梁纽带作用，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穿线搭桥作用，在人文交流合作中的融合发展作用。

3. 构建华侨产业园区。合理引导侨资投向，支持侨资企业转型升级和做大做强。借鉴广西“两国双园”（中马钦州产业园、关丹产业园）的经验做法，探索设立中国（福建）华侨产业园，加快培育若干侨商总部，争取建设一批侨资产业集聚园区，成为福建与海上丝绸之路国家开展产业合作的重要载体。

（六）创新对外人文交流合作

借鉴相关省市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成功做法，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突出民间主体地位，深化睦邻友好关系，提升福建海上丝绸之路品牌的影响力。

1. 坚持文化“搭台”。加快建设中国——东盟海洋学院、华侨大学泰国分校，推进申报“海丝”世界文化遗产。通过举办海上丝绸之路品牌博览会、海上丝绸之路国际研讨会、厦门国际海洋周、厦门市南洋文化节，组织“福建省东盟政府官员培训班”，启动“中国东盟友好之船”、赴东盟举办“海上丝绸之路文物展”等系列活动，加快构建国际性对外文化交流合作平台。

2. 推进载体建设。加快构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城市联盟、海上丝绸之路国际文化交流基地、海上丝绸之路多边商务理事会。争取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总部、中国——（亚洲）东盟海洋合作中心。举办中国阿拉伯城市论坛，拓展国际友城合作。推进跨境商务发展，发挥华闽集团跨境融资、对外窗口作用，支持中国武夷实业、闽信集团、闽港控股等境外公司做大做强。

3. 强化智库支持。借鉴中国南海研究院、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做法，依托福建社科院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心，成立福建省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智力支持。设立海上丝绸之路专项基金，建立“一带一路”人才培训基地，拓展海外华文教育，加快打造“一

带一路”人文交流的前沿平台、文化遗产的保护平台，扩大互利共赢合作基础。

（七）建立区域合作体制机制

重视发掘和拓宽“一带一路”文化内涵，秉持开放包容的“海丝”精神，完善多层协商体系，加强政府沟通，加快建立多维度、常态化的区域交流合作机制。

1. 创新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借鉴海南博鳌亚洲论坛、万宁中非交流基地、海口侨务交流示范区、岛屿观光政策论坛等做法，加快“一带一路”载体平台建设，促进政策沟通、民心相通，推动“海丝”沿线国家口岸联检查验结果互认，开展城市互动结对，完善区域合作模式，拓展互通互联、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空间。

2. 出台财税金融优惠政策。创新利用投资管理方式和对外投资服务促进机制，加大政策支持、项目融资与资金倾斜力度。对跨境产业园区、跨境经济走廊、海洋产业国际集聚区、华侨产业园给予用地保障，以及企业所得税、自用土地的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自用房产的房产税、个人所得税优惠。

3. 构建对外新型合作关系。坚持互惠互利，寻找共同利益结合点，增进民心相通，形成紧密型对外合作关系。密切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国家智库、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联系，积极拓展民俗、宗教等民间往来，促进多边商务合作，构建多方利益共同体，在更高层次、更宽领域推动福建对外开放和繁荣发展。

执笔：李鸿阶

作者简介：

李鸿阶，福建社科院副院长、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福建融入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 历史渊源和政策建议

陆 芸

内容摘要：福建位于中国东南沿海，有着漫长的海岸线，历史上在中国的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曾先后涌现了福州、泉州、漳州月港、厦门等重要港口。福建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闽人持续地出洋谋生，在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史上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方面，福建要发挥自己的优势，首先要积极参与海运走廊建设，推出海上丝绸之路旅游项目；其次要巩固与发展与各相关国家的经贸合作关系，加强人文交流合作。

关键词：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福州 泉州 文化交流 侨乡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的海上通道，它不仅仅是一条贸易通道，还是文化交流的桥梁，也是一条移民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把世界文明古国，如中国、希腊、罗马、埃及、波斯和印度连接起来，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互相影响、传播，给许多国家、地区的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研究海上丝绸之路，可以给我们带来更深层次的思考，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对外开放交往之路，是经济发展之路。

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史上，中国人、希腊人、罗马人、埃及人、印度人、波斯人、阿拉伯人等在经营海上交通和东西方贸易上都产生过重要的作用。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中国的，它更是世界的。随着 15 世纪末 16 世纪初新航路的开辟，以及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殖民者陆续来到亚洲，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延伸到了美洲。围绕海上丝绸之路产生的贸易曾经极大地丰富了世界各国人们的物质生活，人们互通有无，加强了彼此间的沟通和了解。相互间频繁的科技交流、文化交流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 2014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我认为这是中国新一代的领导人面对世界新形势、新格局提出的新战略构想，中国要向西拓展，与中亚国家加强经济、政治联系；也要向海洋发展，首先要抓紧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升级版，进一步提升区内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希望与东盟在经历了“黄金十年”之后再创“钻石十年”。其次，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包括了印度、斯里兰卡、马尔代夫等南亚国家，以及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等西亚国家，所以我认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涉及的国家在不断扩大中。

自从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四川、云南、重庆等省市积极行动起来，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广西、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则积极融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福建位于中国东南沿海，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和主要发祥地，有着3000多公里的海岸线，曾在中国的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历史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先后涌现了福州、泉州、漳州月港、厦门等重要港口。

福州据《后汉书·郑弘传》记载：“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讯海而至。”东冶就是今天的福州，交趾七郡包括粤、桂、滇及越南等地。海运业促进了福州造船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唐宋时期，福州已成为“百货随潮船入市，万家沽酒户垂帘”的繁华国际贸易港口。明代，福州对外贸易进入鼎盛时期，著名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大都在福州太平港（马尾、长乐一带）增加给养后扬帆出海。清代自康熙之后开禁设关，福州的对外贸易又趋繁荣，当时“使西南洋诸口咸来互市”。

泉州在南北朝时期已成为对外交通的港口，唐代是我国四大外贸港口之一，“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反映了当时泉州有众多的外国商人、使者。在宋元时期，泉州与埃及亚历山大港齐名，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著名的外国旅行家马可·波罗和伊本·白图泰都赞誉过泉州。明代洪武七年（1374年）九月罢泉州市舶司，标志着泉州失去了世界大港的地位，以后，泉州每况愈下，再不复见往日繁荣景象。

漳州月港原先只是一个民间贸易港口，明代中叶以后，由于实行海禁政策，官方的海外交通贸易活动渐趋停滞，而私人对外海上贸易活动却渐趋活跃，出现了漳州月港、浙江定海双屿岛、广东潮州南澳岛等新的港口。1567年明朝统治者同意在福建漳州月港部分开放海禁，月港成为我国东南沿海的外贸中心。清初实行禁海、迁界政策后，漳州月港迅速衰落。到康熙中叶，开放海禁，海外交通贸易逐渐恢复，当时在上海、宁波、厦门、广州等地设立海关，以管理海外贸易，厦门港正式取代了漳州月港。当清廷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决定由多口通商改为一口通商，只保留了广州一个对外通商口岸后，中国其他港口迅速衰落，福建的港口也不例外。

福建港口的发展史与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密切相关。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曾涌现了徐闻、合浦、广州、泉州、明州（宁波）、扬州、登州（蓬莱）等著名港口，福建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闽人持续地出洋谋生，在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史上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与其他省市相比，我认为福建在“海上丝绸之路”的特点体现在以下几点：

1. 福建在文化交流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泉州现在保存了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摩尼教等文化遗存，被誉为“世界宗教博物馆”。草庵的摩尼雕像是世界上保留下来的唯一摩尼雕像。福建不仅引进了外来文化，福建文化也随着航海贸易、移民传播到了中国其他地区，乃至世界，典型的例子就是妈祖文化。妈祖本是福建湄洲岛上的一民女，经过宋、元、明、清历代帝王的加封，她成为海上航行的保护神。在中国沿海的港口，几乎处处可以见到妈祖庙，在日本、朝鲜、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菲律宾等国家也有妈祖庙宇或祀奉场所。

2. 历史上，福建与东南亚、南亚、西亚的国家或地区交往频繁。泉州有艾苏哈卜清真寺、“灵山圣墓”和众多的穆斯林墓碑石，福州有南门兜清真寺和圣人墓，这些都说明了中世纪福建与伊斯兰国家往来密切；泉州保留下来的印度教石刻证实了元代泉州与南印度的频繁交流，明代郑和下西

洋更加深了福建与东南亚、南亚、西亚的联系，锡兰王裔墓在泉州的出土证实了福建与斯里兰卡的关系渊源流长。如此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是十分罕见的。

3. 福建是中国著名的侨乡之一。旅居世界各地的闽籍华人有 1264 万人，其中，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这三地的闽籍华人华侨最多。“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也是福建与东南亚各国关系不断发展、深化的过程，福建和东南亚早期只有交通贸易联系，没有文化联系；后来发展到贸易、政治、文化、宗教的多重联系；最后大量福建移民涌入东南亚，成为东南亚华侨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福建与东南亚的关系渊源流长，体现了血缘、商缘、文缘的独特优势。

我认为，福建在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方面，可以发挥自身优势，先行先试。鉴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近年来航空、海运的蓬勃生机，交通运输方式已突破传统的空间限制，福建在融入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方面，不应局限于福州、泉州、漳州、厦门等港口城市，要将福建整体融入，甚至可以考虑福建的周边地区，将台湾、江西等纳入。目前可以在以下先展开行动：

构建海运走廊，推出海上丝绸之路游，首先要加快福建港口的软、硬件设施建设，增强其竞争能力，大力加强港口物流发展，使港口的功能从单一功能向综合性多功能扩展。积极向国家申请设立福建自由贸易区，即使无法设立，也要向国家要政策，借鉴上海自贸区在国际船舶登记制度、国际航运税收政策、航运金融政策等方面的规定，进一步扩大开放。其次，积极参与国家海运走廊建设，与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的一些港口城市建立友好关系，鼓励福建企业走出去，参加当地港口建设，搭建面向上述国家的跨境电子商务及物流信息平台。

港口左牵物流右牵旅游，福建可以将旅游业发展成为参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产业，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UNWTO）已着手致力于将“海上丝绸之路”打造成旅游路线。我们应抓住机遇，积极参与。福建在这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元代汪大渊在 1230 年到 1239 年，先后两次从泉州乘船出海，他把出海见闻写成了《岛夷志略》，书中记载了亚洲、非洲国家和地区的风土人情、物产、贸易。汪大渊是中世纪中国最著名的航海家，与马可·波罗和伊本·白图泰齐名。福建可以仿照汪大渊的航行线路，推出海上丝绸之路精品游路线。海上丝绸之路精品游路线可以选择从福州、泉州、厦门出发，依据旅游时间的长短而有不同的组合。海上丝绸之路游可以和福建的“生态文明示范区”结合起来，吸引外地、外国游客到福建来旅游，感受福建山美、水美的环境，提升福建在国际上的知名度。

我们可以以泉州出土的宋代古船为蓝本，建造一艘以“汪大渊”命名的木帆船，依据汪大渊的航行线路，推出环球航行，进一步增强泉州、乃至福建在世界上的知名度。2005——2007 年瑞典举行了“哥德堡号 3 号重返中国之旅”，此船曾经在瑞典、西班牙、巴西、南非、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中国等国停留，不仅向这些国家的人民展现了瑞典人对古代航海文化的热衷和敬仰，同时也促进了瑞典国际市场的开拓，进而推动了国际文化交流。“哥德堡号 1 号”是一艘建造于 1738 年的木质远洋大帆船，“哥德堡号 3 号”为了完全仿照“哥德堡号 1 号”，花费了 3.5 亿瑞典克郎，在当时的造船市场上，这一价格完全可以建造一艘豪华客轮了。“哥德堡号 3 号”采用了传统的造船工艺，它的龙骨用了 3 根 200 岁左右树龄的橡木制成；船体结构的核心部件是铁制品，完全是手工打造的。“哥德堡号 3 号”的重建当时吸引了瑞典全社会的关注和参与，人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你可以

花费 25 美元捐赠一枚铁钉，也可以将自己家院子中的大像树捐献出来，全民参与使“哥德堡号 3 号”的重建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瑞典人民通过它更好地了解了瑞典的航海历史，他们为自己国家曾经的辉煌感到荣耀，瑞典“海洋立国”的传统和观念得到了传承。瑞典重建“哥德堡号”的实践值得我们效仿，让中国人民更直观地认识自己的航海文化，更深地感悟民族精神。坚韧、顽强、执着、拼搏促使一批又一批的中国人远涉重洋，今天的中国民众正延续着历史的航程，在更辽阔的海洋上破浪前进。另一方面，这是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古代航海技术和航海文化，展示中国古代先进造船技术的绝好机会，古代中国的航海文化不逞多让，曾风骚一时。

巩固与积极发展与各相关国家的经贸合作关系。东南亚国家是我们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中之重，这不仅是因为东南亚各国是历史上中国首先开展海上交通贸易的地区，而且还由于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是我们重要的邻国，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存在着领土争端。我们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和争端，通过合作开发达到互利共赢，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价值在于向大众展示人类创造文明、共同发展的智慧。今天，我们重新关注它、重视它，希望它为中国与东盟的和平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福建与东南亚的交往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利用与东南亚的密切联系加强、扩展双方的经贸、人文交流合作。福建在东南亚有着众多的侨胞、华人，他们了解所在国的法律，可以帮助促进所在国与福建的合作，在推进产业梯度转移与转型升级、参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以及促进人民币区域化、深化海洋经济开发合作等方面展开合作。2013 年第 17 届“9·8 投洽会”上设立了“东盟馆”，吸引了一些东盟国家参展商前来办展；在第 17 届“9·8 投洽会”上，还首次举办了“中国（福建）——东盟中小企业合作论坛”。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希望今后福建和东盟的产业合作，产业深度融合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2014 年“9·8 投洽会”致力于构建“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交汇平台，具体措施之一就是举办“新丝绸之路发展交流会”，实现“海丝”（本届投洽会主宾国—马来西亚）与“陆丝”（主宾省（区）—新疆）在投洽会上的交汇，并重点邀请“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客商参会交流对接。

其次，西亚、非洲国家也是我们应该重视的地区。2014 年 1 月 17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见来华出席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第三轮战略对话的海合会代表团时，表示“中方愿同海方共同努力，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简称海合会）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其成员国是中国石油、天然气的主要供给方。近年来，双方在贸易、投资、工程承包等方面发展迅速，目前，中国与海合会的自贸区谈判正在进行。中国与海合会成员国优势互补，中国的服装、鞋帽、小家电等轻工业产品在这些国家很受欢迎。由于海合会成员国中不少国家缺水，所以在海水淡化方面它们走在了世界前列，例如沙特阿拉伯的海水淡化厂占了全球海水淡化能力的 24%。今后福建可以在现代农业、海水淡化、海洋高端装备制造与工程产业等方面与海合会国家展开合作。2014 年 5 月李克强总理进行了他上任后的首次非洲访问，通过高铁外交铺设中非发展之轨，引领中非合作升级。李克强总理提出到 2020 年中非贸易额在目前的基础上翻番甚至更多，投资额从 250 亿存量提高到 1000 亿，贸易额和投资额成倍增长一定需要拳头项目和重点合作领域，福建企业要积极参与非洲国家的航空、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还要在推进与非洲的产业合作、生态环保合作、人文交流合作等方面有所作为。

此外，我认为福建企业可以以中医作为进入阿拉伯国家的突破口。中医使用中药、针灸、推拿、按摩、拔罐等多种治疗手段，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中药里有些药方源自波斯医学，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就录有波斯医方。公元 3—8 世纪波斯是中东的医学中心，阿拉伯人如果对传统医学有兴趣，就比较容易接受中医的治疗，因为两者有许多相似处。例如在卡塔尔民间医学传统中，有 4 种治疗方式，分别为放血术、烧灼术、拔罐术和夹板疗法。放血术就是从静脉中清除体内不必要的血液，常用来治疗头痛、结膜炎、痛风等疾病。烧灼术是使用热金属器皿灼烧身体部分器官，常用于治疗疼痛、溃疡和肿胀等。拔罐术通常用牛角、木头、铜和玻璃制成的杯子，通过火烧在杯子中形成真空，然后直接贴到皮肤上（干拔）；或者用湿毛巾贴在皮肤表面再拔火罐（湿拔）。夹板疗法根据受伤的类型，可以热敷或者按摩肿胀部位。中国某些中药目前已经在一些阿拉伯国家拥有了一定的口碑，例如乌鸡白凤丸、人参蜂王浆等就受到阿曼人民的好评。

作者简介：

陆芸，1968 年生，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现在福建社会科学院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心工作，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海上丝绸之路沿岸国家的宗教、文化交流，尤其是伊斯兰文化的相互影响和交流。

福建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意义、路径与对策研究

林必越 曾建民

内容摘要：通过对福建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历史的回顾，揭示了福建当前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进而从港口航线基础设施建设、对外经贸往来与产业合作、海洋经济合作和对外人文交流合作四个方面详细阐述了福建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途径，并从组织机构保障、经营环境建设和政策宣传与人才扶持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海上“丝绸之路” 建设意义 建设路径 对策 福建

引言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是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提出的重大战略构想，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对此提出“五通”的工作部署：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根据当前全球形势深刻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对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构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推进小康社会建设，营造良好的国内外和平发展环境，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一、福建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历史价值和意义

（一）福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历史

我国对外商贸和友好往来有着悠久的历史，从2100多年前的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陆上丝绸之路，到600多年前的明代郑和下西洋开辟的海上丝绸之路，把中国的丝绸、茶叶和瓷器的物产输往陆海沿路各国，不仅与所到各国进行商贸合作，还带去了中华文明和先进的文化技术，在世界发展史上结下了友谊的篇章。

由于历史的原因，海上丝绸之路比陆路丝绸之路持续的时间更长，达到的国家和地区更广，故在世界贸易史上的影响力也更大。福建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之一，也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海上丝绸之路鼎盛发展的宋元时期，我国科技文化文明也发展到了封建时代的顶峰，同时也是福建社会经济和科技文化快速全面发展的重要时期，当时的泉州港发展成为东方第一大港口，与之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遍布亚非欧近百个国家和地区。泉州港的关税收入占全国的一半以上，成为对外贸易吞吐量最大的港口，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总枢纽。因为商贸港口的辉煌发展，

来泉州进行贸易的各国商人也带来了各自国家的宗教、文化和科技，泉州成为当时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中心，由此带来福建的造船业和航海业也居全国领先地位。1973年在泉州后渚港发掘的一艘宋代古船，从制造技术和规模都堪称当时之最。“泉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便是福建当时海上贸易繁荣景象的真实写照。

明代起，福州长乐太平港、漳州月港和厦门港也开始发展起来，成为海上对外贸易和往来的重要基地。特别是厦门港，由于郑成功在厦门建立南明政权，为了解决军费来源，非常重视发展海上贸易，拥有3000艘左右的船只，称雄东亚和东南亚海上贸易数十年，主要贸易对象为朝鲜、日本、吕宋（菲律宾）、马来西亚、暹罗（泰国）、交趾（越南）和柬埔寨等国，主要出口商品为生丝和陶瓷制品，年获利白银达到250万两以上。清初由于实行海禁，到康熙中期，台湾收复后，复开放海禁，福州和厦门港对外贸易得到迅速发展，及至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福州和厦门作为最早的五口通商口岸，是我对外开放最早的港口城市，随后成立的马尾船政学校和马尾造船厂，成为近现代我国航海事业和海军发展的摇篮。

（二）福建海上“丝绸之路”人文历史基础

从唐朝中叶开始，福建泉州已经与广州、交州和扬州并称全国四大通商口岸，由于其辉煌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历史，泉州成为我国唯一被联合国认定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城市，在我国六省九市联合提出的联合国申遗计划中，我省的福州、泉州和漳州均名列其中。由于长期的对外商贸往来，福建省也是我国主要的华侨故乡，在东南亚国家2000多万的华侨华人中有近一半祖籍地在福建，同时，在我省也有大量的东南亚和中东国家的人民在此经商生活，留下了大量的祖籍国的宗教、文化和科技遗产。特别是在泉州，迄今仍有5万多人拥有中亚阿拉伯人的血统，古波斯、阿拉伯、印度和东南亚国家各种宗教和文化在那里落地生根，广泛传播，形成泉州多种宗教、多种民族和多元文化相互融合、和平共存的局面，也因此泉州早在1991年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全球首个世界多元文化展示中心。同时，发端自莆田湄洲岛的“海神”妈祖信仰，也在东南亚、港澳台等地的华侨华人中广泛传播，成为海外华侨华人与祖国联系的精神纽带。

厦门作为“海上丝绸之路”港口的后起之秀，在明末清初得到快速发展，及至近现代已成为我国主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城市。明清两代起，厦门成为我省华侨华人出入祖国的主要港口，特别是东南亚国家的华侨，大多数闽籍华侨华人特别是厦漳泉华侨华人的祖先是来自厦门出发，正因为此，在东南亚很多国家的华侨华人即使不会讲普通话国语，但却会讲闽南话，语言作为文化的传承载体，历经历史长河的洗涤，依旧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认同感。同时厦门也是东南亚华侨华人反哺、回馈祖国和人民的中转地，纵观厦门的发展历史，华侨华人的贡献遍及各个领域，这在厦门华侨博物院里有详细的收录和展示。特别是“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陈嘉庚先生，更是爱国华侨华人的杰出代表，他出发自“海丝”起点地之一的厦门，事业成就于“海丝”的枢纽和中转地新加坡，事业遍及经济、文化和社会各个方面，与东南亚和西方各国均有商贸往来，更是倾家荡产捐资办学，才有今天的厦门大学、集美学村和集美大学。他开办了水产航海学校，师范学校，中小学，近百年来，为我国和东南亚各国培养了大量的人才，这在福建乃至全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卓越成就，树立“海丝之路”的发展和交流的典范，更是我们当下学习和发扬的重要精神，也是我们

继承先辈们创下的“海丝之路”遗产并继续推进福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榜样和文化精神源泉。

（三）福建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意义

福建拥有 13.63 万平方公里的海域面积，海岸线总长超过 3300 多公里，拥有众多的天然良港，加上近年来“三纵四横”公铁交通运输动脉的开通，对内陆的辐射能力大大增强，作为海西经济区的重要地带，也是和台湾省、东南亚各国合作的重要桥头堡。作为沿海开放开发比较早的省份，对外商贸往来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福建与东盟国家的年贸易额近 250 亿美元，东盟已成为福建第二大贸易伙伴、第四大外资来源地和第二大对外投资目的地。同时福建对外交流密切，特别是和东南亚国家的人员往来、文化科技教育方面的交流十分频繁和密切，为福建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福建拥有厦门经济特区、泉州发达的民营经济、平潭综合实验区等先发优势，部署了福莆宁和厦漳泉两个同城化战略合作区域，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对外开放水平，都需要进一步进行发展和提升。近年来福建在加快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等都具备一定的基础，在贯彻落实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构筑新一轮对外开放的“一体两翼”，特别是提升向东开放水平战略，福建作为沿海省份应抓住历史机遇，加快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充分统筹利用福建陆海域和海外资源，进一步加强与传统的东南亚和中亚等国家的经贸合作，遵循“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与沿线各国在区域一体化、贸易与投资、交通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合作提升到更高水平，为实现国家“一带一路”重大发展战略作出应有的贡献。

二、福建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路径

福建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战略，必须在海上“丝绸之路”历史发展的基础上，继续发挥福建在“丝绸之路”战略中的重要位置和作用，加快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主要路径有：港口航线基础设施建设、对外经贸往来和产业合作、海洋经济合作、人文交流合作等，实现福建经济社会在 21 世纪的跨越式发展。

（一）港口航线基础设施建设

1. 港口基础设施建设。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和基础是海上港口和通道，到现代建设海上“丝绸之路”必须对港航枢纽设施进行全方位的布局建设，包括陆海空通道、港口、码头泊位的规划和建设。整合福建已有动车线路、高速公路、国道和省道，厦门、福州、泉州、漳州和莆田的海港，厦门、福州、泉州和武夷山的国际机场，以及内地正在规划建设的机场和水陆港口；积极引进国内国际有实力的港航企业作为战略投资合作伙伴，拓展空港与海港建设，打通海陆空内联外引通道，推进港口的腹地建设，增强港口的辐射能力，打造海陆空铁联运，立足于海西经济区，打造良好的基础设施，成为内地对外开放和经贸往来的海陆空出海通道。

2. 航线布局建设。积极统筹和布局福建的海陆空国内国际运营航线，福建已有的国际航线主要集中在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但是航线的分布也不是很合理和均衡，需要推动福建到东盟、南亚和中东主要港口的航线与合作网络，根据经贸发展需求合理布局和加密客货运航线，构建“一带一路”客运与货运的“穿梭巴士”，加强与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需要增开洲际航线，拓展福建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动空间和影响半径。以厦门、福州、泉州等为中心加快建设东南国际航运中心、游轮母

港，推进大物流综合平台建设，推动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物流、航运、货代和港口基地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将福建打造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对外经贸往来的起点，对内中转的枢纽地位。

（二）对外经贸往来和产业合作

在港口航线设施建设为载体的基础上，对外经贸往来则是福建推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核心内容。

1. 构筑经贸合作平台。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福建经济社会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对外经贸往来更是一枝独秀，对外贸易依存度也从上世纪 80 年代初的个位数增长到当前的 50%左右，经济开放度也超过 50%，这些都为福建进一步推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福建应进一步依托厦门中国投资贸易洽谈会、福州海峡两岸交易会等大型展会，积极主办和参与国内外相关的经贸博览会和洽商会，深化对外经贸合作。充分利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优惠政策，关注洽商中的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自由贸易区，努力推动福建自由贸易园区建设，为福建对外经贸合作打造更多更大的平台。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出口的支持力度，结合参展和专项推介、设立贸易中心等，帮助企业建立和拓展沿线出口市场营销渠道，帮助企业了解国外市场的信息、行业特性、企业资信等；同时构建进口平台建设，设立沿线进口商品保税展示交易平台和进口货物集散中心，充分利用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优惠关税约定，积极探索台湾产品经由福建沿海保税区转口到沿线国家市场的模式。

2. 拓展双向投资渠道。继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根据福建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可以适当扩大服务领域的开放，放宽对外商投资的资质、股比和市场准入等限制；特别是在东南亚国家以侨商为依托，做好对侨资企业的投资促进与服务工作，跟踪重点侨资项目在福建落地；引导外资投向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产业、高新技术产业、节能环保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在引进国外资金的同时，更要引进他们先进的经营管理模式和技术。投资是双向的，在引资的同时也要拓宽对外投资的渠道，鼓励我省有实力的企业依托资金、技术和管理等优势，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投资生产，直接利用当地劳动力、资源、资金和市场，进行合作开发，特别是对一些有贸易壁垒限制的产品，可以到当地市场直接设厂，既可以绕开市场准入限制，也可以扩大双方的经贸合作领域。

3. 构建产业合作平台。福建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除了加强经贸往来之外，还需要开展与沿线国家的产业合作，特别是推进先进制造业、能源产业、现代农业、文化旅游业等的合作。为构建与沿线国家的产业合作，必须规划建设产业合作园区和跨境经济合作区域，构建产业合作的产供销一体化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提升产业合作的价值链水平，在产业园区推动合作双方和多方的优势产业，形成进出两头齐头并进建设的格局；可以利用国家设立的“丝路基金”、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与沿路沿线国家特别是东盟国家推进产业园区合作共建，在引进外资的同时，鼓励和引导福建企业扩大对外投资，建设“丝绸之路”产业园区，构建双向产业合作平台。

（三）海洋经济合作

海洋经济是 21 世纪发展的趋势，福建推进建设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战略，必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特别是推动海洋新兴产业、现代海洋渔业和海洋服务业，在海洋科研方面加强与沿线国家和

地区的深入合作，特别海洋渔业养殖和捕捞、海洋科技创新、海洋科技教育培训、海洋环境保护、海上执法和救助等方面开展全方位的合作；大力支持厦门国际海洋周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海洋合作平台，举办“中国—东盟海洋合作论坛”，围绕海洋经济开展各种相关合作交流。支持厦门、平潭国际邮轮母港的建设和国际市场开拓，加强与沿线国家合作，吸取他们先进的邮轮母港建设经验和做法，使海洋经济往更高层次发展。

（四）人文交流合作

国家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建设，是站在全球战略的高度提出的，关系到我国对外经济、外交、文化科技以及国家安全等一系列重大课题，作为新兴的经济大国，追求经济合作是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重点，但是更重要的国家软实力是依靠文化科技等人文领域的交流为基础的。

1. 加强政府间的科技文化交流合作。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开展政府间的科技文化交流，通过政府间的协议建立常态化的文化科技交流平台与机制。充分利用福建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东南亚国家业已存在的政府间合作机制，推动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的政策和学术研究机构，推动与沿线国家在科教文卫体领域的全面深入的交流合作；加大对厦门大学在马来西亚建设分校的支持力度，把分校建设成为我国与东南亚国家文化科技合作的典范，扩大福建在东南亚国家的影响力，进一步推动福建文化与南洋文化的融合与发展。

2. 加大南洋文化交流与融合。鼓励民间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人员交流，特别是东南亚国家的交流，举办各种民间交流合作，南洋文化本质上是中华文化在南洋地区的交流融合演化而来的，所以必须加大南洋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力度，比如举办南洋文化节、南洋论坛、嘉庚论坛、国际龙舟文化节、华侨华人体育大赛等，扩大对所在国华侨华人的影响力和向心力，以文化作为纽带连接福建与沿线国家的各项交流与合作。

3. 发挥华侨华人的人文交流媒介作用。“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有上千万华侨华人，他们是我们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重要参与者和合作者，要充分发挥闽籍侨胞、侨社团体的资源优势，争取缔结更多的友城，支持侨胞积极宣传福建文化传统，以此为纽带来连接与所在国人民的关系；支持闽侨在福建进行经贸和投资事业，推动和支持闽侨在福建设立相关办事机构，培养闽侨在所在国的力量，维护他们合法的权益；邀请在侨界有影响力的华侨华人领袖人物、侨眷代表参加福建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研讨，听取他们的意见；深入挖掘和宣传嘉庚先生精神，团结海内外闽籍华侨华人，以亲情和乡情来强化与闽籍侨胞的关系，帮助福建开展与沿线国家的人文交流与合作。

三、福建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对策

（一）建立专门机构推动“丝路”建设

为推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必须在组织机构上给予领导保障，福建应成立专门机构来推动落实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由省政府主要领导亲自挂帅，各相关职能部门、各地市政府参加的福建省融入“一带一路”工作领导小组，制定战略执行方案，对工作方案的目标、措施和任务进行分工，结合各单位的职能，加强配合，推进福建全面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定期进行战略执行的汇报与协调，解决重大问题和事项，有计划有节奏有保障来贯彻执行“一带一路”的伟大战略。

（二）优化“丝路”建设的营商环境

为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必须优化战略推进的经营环境。首先从政策环境入手，清理和优化现有港航管理制度、对外经贸相关政策和规则、人员出入境管理制度，与丝路沿线的国家协调制定双边合作的管理制度。推动简政放权、深化业务改革、优化通关环境、转变政府由管理到服务的职能，减少审批环节和事项，降低收费标准；在口岸通关和检验检疫上采取更加便利的措施，推动与沿线国家的通关与检验检疫合作，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推动金融体制改革，推进人民币在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跨境结算，扩大贸易项下人民币跨境结算的份额，帮助外贸企业规避外汇风险；支持跨境电子商务出口经营主体开展货物和服务贸易、收益与经常项目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运用跨境电子商务的新型贸易方式，支持福建本地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在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建设电子商务平台、设立境外仓储中心和保税仓库、推行第三方支付等，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三）加大对“丝路”建设的扶持力度

对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领域所涉及的扶持政策，要在专门领导机构的协调下加强沟通，制定政策和规则的实施细则，加强对市场主体的扶持力度，从立项、用地、财税、奖励等方面加快推动“丝绸之路”相关项目的实施；安排专项资金，支持“丝绸之路”项目的建设；加大对“一带一路”政策、文化、投资环境和旅游资源等宣传推介，集中福建本地力量、吸引内地和周边地区参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重视对海上“丝绸之路”项目相关的人才培养，在国际商务规则、自由贸易区规则、经贸业务、金融业务、文化科技等方面进行培训培养专业的人才，以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提供必备的人才资源。

结 论

“一带一路”战略合作对我国无论是经济外交，还是国家发展安全和对外人文交流等方面都有重要意义，这一战略构想的规划实施必将对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团结稳定、对外科技人文交流产生重大而积极的影响。福建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有着悠久的海上“丝绸之路”发展与合作历史，在国家发展“一带一路”的大战略下，福建更应积极主动融入，抓住历史机遇，抓紧落实与“丝绸之路”战略相关的各项建设，与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互通互联，实现福建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和持续性发展。

参考文献

- [1] 陈炎.东海丝绸之路和中外文化交流[J].史学月刊.1991(1):100-106.
- [2] 陈振明 耿旭综合配套改革与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关于厦门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总体战略、执行路径与策略的探讨[J].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2(5):14-18.
- [3] 洪卜仁.回顾厦门的“海上丝路”历程.2014(9)
- [4] 李庆新.海洋考古与南中国海区域经济文化史研究[J].学术研究.2008(8):107-113.
- [5] 蓝勇.南方陆上丝绸之路研究现状的思考[J].中华文化论坛.2008(12):44-45.

- [6] 刘伟民.文化主义与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研究[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12):125-126.
- [7] 林必越.经济开放度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福建省1981—2010年数据的计量检验[J].华东经济管理.2012(5):45-49.
- [8] 林镇凯.厦门海洋产业及海洋相关产业间的相关性研究[J].山东农业科学.2013(6):138-141.
- [9] 李绍明.近30年来的南方丝绸之路研究[J].中华文化论坛.2009(1)
- [10] 厦门地方志办.海上丝绸之路与厦门.2014(8)
- [11] 厦门市商务局.陈嘉庚与海上丝绸之路.2014(7)
- [12] 左玉辉,林桂兰.海岸带资源环境调控[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150-162.

作者简介:

林必越(1970.4—),男,福建仙游人,博士,副教授,高级国际商务师,硕士生导师,营销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战略管理、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

曾建民(1970.3—),男,江西崇仁人,会计师。

福建推进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建设的重大意义研究

王日根

2013 年 10 月 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印尼国会发表演讲，指出：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自古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愿通过扩大同东盟国家领域务实合作，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同东盟国家共享机遇，共迎挑战，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往外输出的商品主要有丝绸、瓷器、茶叶和铜铁器之类，往国内运回的商品主要有香料、花草及一些供宫廷赏玩的奇珍异宝，于是海上丝绸之路又有海上香药之路、海上陶瓷之路之称。明初郑和下西洋时，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到巅峰。在西方海上势力东来之前，海上丝绸之路是国际海洋贸易的基本形态，贸易的商品从奢侈品到一般民用商品。参加贸易的商人有阿拉伯商人、波斯商人、南洋各国商人和中国商人，其中以闽商为最杰出。海洋贸易的基本范围在印度洋海域，因此学界称“印度洋海域的海洋贸易时代”，随着近代机器航海业的兴起，大西洋各国的海洋势力进入包括印度洋在内的世界各地，开辟了航海事业的大西洋时代。可以说：印度洋时代的海洋贸易贯彻了平等、经济的贸易路线，和平的色彩浓厚；大西洋时代的海洋贸易则往往夹带着军事强力，时常表现为殖民掠夺和血腥屠杀。

当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我们理应在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方面有所作为，重振中国泱泱大国形象，将和平开发利用海洋的主旋律高高唱响。

一、福建推进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五大优势

我们觉得在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时，福建具有较其他沿海省份更加明显的五大优势：

（一）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活跃人群是闽商。东南亚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枢纽，是数代闽商筚路蓝缕、辛勤耕耘的结晶。无论是官方组织的大规模航海行为，还是零星的民间航海行动，处处活跃着闽商、闽人的身影。郑和七下西洋，船队中的主要人物是福建人，如漳平人王景弘是郑和的得力助手，在郑和航海活动偃息之后，许多福建商人整家整族汇聚航海力量，开展着有声有色的海上贸易活动。

东南亚、中亚这一线海上丝绸之路上，官民结合的闽商特色得到了显著的彰显。尽管传统王朝不断有海禁政策，但福建的地方官往往从民生立场出发，寓宽纵于严禁之中，福建的民众往往抱定搏击大海的大无畏精神，持续不断地推展着他们的海洋贸易活动，形成了延续至今、从未断

绝的海洋文化传统。

(二) 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主要商品是茶、瓷器和香药，这些商品在福建都形成了若干生产基地，形成了大规模的经营，福建的山海经济都随着海洋形成了外向型的特征。改革开放以后，福建最早借助于侨资兴建了若干工业企业，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与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非洲、欧洲乃至美洲均建立起了优良的经济联系，如今闽商已成为海外华商中实力最强的一支。

(三) 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港口众多，单福建就有福州、泉州、漳州等官方认可的合法港口，另外，福建海岸线漫长，超过了 3200 海里，若干港澳形成为私人贸易港口，如月港、安海、梅岭等等港口都吞吐着大宗的进出口商品。近代以来，厦门港的地位迅速提升，港口吞吐量迅速飙升，如今已成为世界性大港。

(四) 海上丝绸之路是多元文化的交融舞台，宋元兴盛的泉州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这里汇聚了阿拉伯文化、印度文化、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清代兴起的厦门更是成为中西文化的大熔炉。

(五) 海上丝绸之路是由包括台湾人在内的两岸人民共同开辟的，在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中，两岸有更多的共同利益，也具备共同建设的传统优势资源，两岸的中华儿女相互携手，进而与侨居海外的中华儿女一起，重振中华文化的辉煌。

基于以上几点，我们呼吁将福建作为发展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点区域，制定相关优惠政策，积极加以扶持，推动闽商与侨居国、祖国的相互联络，与更多的东南亚国家建立“友好城市”、开展国际性青年文化交流、开展文化年活动，进一步彰显中华和谐文化、和平精神，促进人类社会健康发展。

二、福建推进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大意义

(一) 建设海上丝绸之路是推动民营经济加快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建国以后的福建长期处于海防的前沿，经济建设尤其是国营大型企业建设得少，改革开放之后，海外侨资、台资、港资为福建经济注入了巨大的活力，一大批民营企业茁壮成长。其特征是两头朝外，每当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和谐发展时期，福建的这些外资企业就能获得健康的发展，既有利于中国沿海经济的发展，也带动了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贸易往来，提升了彼此的经济水平和各国的人民生活水平。

(二) 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是加强福建与海外华侨华人联系的重要途径。福建有约 5000 万的华侨分布在世界各地，其中东南亚是福建籍华侨华人的主要落籍地，他们在逐渐当地化之后，有的进入政坛，有的成为商业巨子，有的则在多元文化的交融和互摄方面做出了显著的贡献。充分调动起海外华侨华人的爱祖国情绪，势必将为我们经济转型和质量提升产生积极的影响。

(三) 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是加快两岸交流、加速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重要步骤。华侨华人资源是两岸所共有的，中华文化也是两岸共同的文化之根。从两岸移民进入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对故土充满着浓烈的乡情。在两岸交流互动还存在一些障碍的时候，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往往可以为两岸人士的互动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这本身就对两岸的和平发展与尽早同意创造了条件。

(四) 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是我国外交战略中的重要手段。如今东南亚地区是世界上几个

大国竞相争夺的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由于中国与该地区有着长久的交流史，人员之间的融合程度也是较高的，我们可以由侨居海外的福建人架起与当地国之间的外交联系，提升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水平。

（五）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是我国建设海洋强国、福建省建设海洋强省的重要抓手。海洋强国战略被正式写入十八大的报告之中，这是我们党面对国际社会变化的新形势而作出的果断决策，它势必要求沿海各省均为这项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但是毋庸讳言，福建在这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三、推进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几点建议

我们认为：推进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福建处于相对较为有利的地位，福建理应主动借助这股东风，奋发有为，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迎头赶上经济先进省份，超短与海峡对岸的台湾在经济上、文化上直至政治上存在的诸多差距。为此，我们建议：

（一）尽快促成包含厦门、福州、泉州、平潭在内的自贸区的建设，争取获得政策所能提供的最大红利。上海自贸区的建设实践已经表明：谁建设了自贸区，谁就能够在国际经济贸易中掌握主动权和经济的命脉，能够更加有利地发展自己的经济。

（二）尽快实现若干海洋产业、海洋旅游业的开发与赢利。此前国家政策的主导因素是虚海实陆，海洋国土的防卫、海洋资源的开发以及海洋产业的发展等都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在我们已将海洋发展作为国家战略的时代背景下，我们转变观念，主动作为的条件已经成熟，已经到了再不作为将被淘汰的程度，福建理应有这种紧迫感和责任感。

（三）尽快将平潭海洋大学以及若干海洋专科学校的建设落实下来，储备大量的海洋发展的专门人才，在这些方面，我们可以与台湾各海洋大学、专科学校建立相互合作交流关系，吸收借鉴他们海洋观光、海洋实业等方面的经验，避免重蹈他们的某些覆辙。

（四）尽快培养全体人民的海洋国土意识，加强我们的军队建设和高新军事技术的开发，力求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形成我们的核心优势，既为海洋经济开发创造一个良好的和平环境，也可为抵制大国强加给我们的若干不应承担的义务，真正树立起全民的海权观。

（五）尽快培养国际法专业人才，为我们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主动创造有利的条件。如今的《国际海洋法公约》是主要西方大国更多地从本国利益考虑制定出来的，对于为参与制定该公约的国家的利益往往过多地忽视。在西方国家一直维持着其大国地位的时候，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往往自认吃亏。但是世界格局不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各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话语权也势必要发生变化。如今，中国的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国人强烈期望我们的政府能够在国际舞台上争取到更多的话语权，维护我们应该拥有的利益。

（六）尽快成立福建省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发展研究机构，使之真正能为海上丝绸之路决策提供智力支持。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牵涉到多个行业领域，需要多学科的研究工作者投入其中。既要加强海洋人文知识的普及与提升，又要不断地向海洋深处进行探索，因此海洋科技人才的招揽与培养是当务之急。

此前南海局势有诸多让中国利益受损的事件，个别西方大国企图强奸中国人的民意，与周边

小国的反华势力沆瀣一气，不断蚕食中国的海洋利益，我们理应在这些方面发出更强硬些的声音，以遏制住反华、掠华的嚣张气焰。

为此，我们建议建立培养海军的军事学校，构建起我们的海上防卫体系，增强我国的国防实力。

作者简介：

王日根，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一带一路”建设与福建新一轮

对外开放战略研究

黄继炜 魏澄荣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在中亚和东南亚之行中分别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战略新构想。2014年6月5日，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阿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福建应发挥优势，积极融入国家的“一带一路”建设。

一、“一带一路”建设与我国对外战略

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我国提出“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保持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具备更多有利条件。”因此“中国将坚持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重要判断。“一带一路”建设，为我国在新形势下，通过更加积极主动的方式，在对外战略上做出重要的调整提供了明确的方向。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将撼动全世界对国际力量对比和美国霸权地位的认识。在原有的国际关系中，美国作为全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为全球（特别是东亚地区）提供了在美国主导下的安全体系。所有国家都要顾及美国的利益，但也因为美国提供了公共利益，而获得相当的安全保障，从而减少了在安全上的支出。而对于我国来说，由于发展水平较低，绝大部分国家利益体现在领土（特别是陆上领土），与美国的冲突较少，同时也尽量避免冲突。而在经济方面，我国积极嵌入以西方国家为核心的国际分工体系，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虽然也有矛盾，但能够较好地化解。

而在现在及不久的将来，由于我国经济体量过大，已无法依附于美国为中心的生产网络，必将逐步通过扩大内需政策，形成以我为中心的生产网络，提供一个完整的生产-销售市场。这样的生产体系，将吸引周边甚至全世界的目光，从而改变原有的国际经济关系。在安全领域，我国的国家安全范畴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扩大，从陆上领土扩展到海上领土，甚至海外利益；从传统军事安全和经济安全扩展到金融安全、生态安全、信息安全、恐怖主义、跨国跨国犯罪等非传统领域。这些新的领域原先都由美国领导，其不可能轻易退出其原有的位置，但另一方面，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和伊拉克局势的影响，美国继续向全球提供安全保障的意愿和能力都在下降。总之无论从我国自身发展现状还是我国的外部环境（特别是美国）来看，旧的所谓后冷战的国际关系已难

以为继，我国可以应该主动采取措施，对统揽政治、外交、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对外关系作出的新的战略部署和调整。

基于以上认识，党中央统揽全局、顺应大势作出“一带一路”构想的重大战略决策。构想内涵深刻丰富、意义重大深远，为亚太和亚欧区域合作注入新的活力。“一带一路”发端于中国，贯通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部分区域，东牵亚太经济圈，西系欧洲经济圈，覆盖约44亿人口，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占全球的63%和29%。

“一带一路”构想是瓦解美日战略遏制的反制措施。美国判断其他国家是否会威胁美国，首先是基于其能力而不是动机。因此对经济实力迅速增长，并将很快超过自己的中国，无论我们如何宣示“和平崛起”，美国都不会彻底放心。在反复地斟酌和犹豫后，美国推出了“重返亚太”战略，针对中国的意图路人皆知。而安倍政府上台后，日本一改二战后坚定地和平外交政策，近期更是解禁“集体自卫权”。这并不意味着日本一定会对外侵略，但很明显这是其在亚洲主导权旁落后的“最后一搏”。而“一带一路”建设通过构建西向、南向的战略通道，规避美日的东向围堵，积极扩展新的战略空间，以保障国家的战略安全。

“一带一路”构想是构建新的国际关系的战略尝试。十八大报告指出：“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二战后的国际关系类似于散状布局，虽然各次区域的合作不断加强，但是在区域和区域之间的联系较少，更多的是与美国这个核心之间建立联系。而“一带一路”建设通过建设中欧铁路为代表的陆上通道，和以港口建设为代表的海上通道，加强我国与中亚、东欧、东南亚、南亚、西亚和非洲的交通联系，从而建立网状的区域间关系，进而推动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形成。

“一带一路”构想是实现区域共赢的重要纽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要素禀赋各异，发展水平不一，比较优势差异明显，互补性较强。建设“一带一路”有利于我国与沿线国家进一步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创造新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促进区域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把经济互补性转化为发展推动力，产生“1+1>2”的叠加效应，做大共同利益的蛋糕，形成互补互利互惠的良好局面。

“一带一路”构想是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必要手段。非传统安全的传播没有国界，蔓延快，危害大而且不易消除，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单独完成这个任务。为此世界各国必须积极合作、综合施策，协调推进地区安全治理，避免非传统安全斗争中的以邻为壑。而“一带一路”建设以经济合作带动安全合作，有利于从根本上铲除“三股势力”、贩毒、跨国有组织犯罪的生存土壤，不断改善地区安全环境，为应对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创造条件。同时也有利于保护以马六甲海峡为代表的海上大通道，保障我国国际贸易安全。

“一带一路”构想是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的积极行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开放不断向纵深发展，对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对外开放格局中，总体呈现东快西慢、海强陆弱格局，而且“请进来”的多，“走出去”的少。而“一带一路”建设通过调动我国各地，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和内陆地区积极走出去，建设基础设施、扩大经贸合作、加强文化交流、建立广泛人脉，形成海陆统筹、东西互济、面向全球的对外开放格局。

二、福建融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优势和特色

福建地处祖国东南部、东海之滨，北邻浙江，南接广东，东与台湾省隔海相望，是中国重要的出海口，也是中国与世界交往的重要窗口和基地。福建融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

1. 历史优势

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史上，福建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五代王审知治闽时，下令开凿福州黄岐港，招徕海外商贾。唐代地处江海之交、拥有优良港湾的泉州成为与扬州、广州、交州并列的南方四大贸易港之一。到了宋朝，海上丝绸之路达到空前繁盛，而泉州作为海上丝路的起点之一，成为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与其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达到70余个，海外交通畅达东、西二洋，东至日本，南通南海诸国，西达波斯、阿拉伯和东非等地。进口商品主要是香料和药物，出口商品则以丝绸、瓷器为大宗。元代，泉州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增至近百个，《马可波罗游记》里认为其可以与亚利山大港齐名。明朝政府在倭寇基本平定的前提下，在漳州海澄月港部分开放海禁，大量进行与菲律宾之间的贸易，主要进口菲律宾的白银，而出口纺织品和瓷器。

据史料记载，中国第一条“海上丝绸之路”始于秦汉时期。西汉武帝时期，番禺（今广州）、冶县（今福州）、温州、宁波为全国四大对外贸易口岸。东汉时期，东冶（今福州）与交趾（今越南北部）常有商船往来，并在海上贸易中产生流寓现象，中国最早的东南亚华侨由此诞生。唐宋元明诸代，由福建出发的“海上丝绸之路”越来越长，越来越丰富多彩；特别是“郑和七下西洋”，每一次都以福州长乐为扬帆出海地、归帆地和驻泊地，使福建成为世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出发地与目的地。海上女神福建“妈祖”信仰，也是经由“海上丝绸之路”成为海内外众多不同国籍、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百姓的共同信仰。

2. 文化优势

福建具有浓厚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底蕴。鼎盛时期的泉州，古波斯、阿拉伯、印度和东南亚诸种文化和宗教在这里广泛传播，成为一个多种宗教、多种民族和多元文化融合并存的城市，目前泉州的阿拉伯后裔有5万人，阿拉伯国家对泉州有一种亲缘感般的认同。福州、漳州等地也都有丰富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存。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经过20多年来的挖掘弘扬，不仅成为福建重要的文化品牌，同时也成为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的历史记忆。

妈祖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守护神，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使者。宋代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最为兴旺的时期，自宋以降，妈祖信仰随着先人征服海洋的步伐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落地，并与当地文化融合。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数十个国家，尤其是在东南亚各国，无不留下妈祖神迹，这些都是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生动写照。从这个意义上说，妈祖文化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起点。

3. 经济合作优势

福建海洋资源丰富，海域面积达13.63万平方公里，海岸线总长3324公里，拥有众多优良港湾，是拓展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合作的重要区域。东盟各国历来都是福建传统的贸易伙

伴，作为中国最早开放的几个沿海省份之一，福建与东盟的双边贸易近年来呈现持续快速增长的势头，2013年福建与东盟双边贸易额达242.9亿美元，东盟已成为福建第二大贸易伙伴、第四大外资来源地和第二大对外投资目的地，未来合作空间更加广阔。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年来，福建对外交通得到巨大改善，现有厦门、福州等5个民用机场，114个万吨级以上深水泊位，7条出省铁路、9条出省高速公路，初步形成了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产业发展长足进步，电子信息、机械装备、石油化工三大主导产业规模不断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一批大型龙头企业和产业集群辐射带动力日益增强。

4. 华侨华商优势

现聚居于东南亚的2000多万华侨华人中，祖籍福建的就有800多万人。而福建在外华侨超过1000万人，其中85%分布在东盟各国，如晋江、石狮人在菲律宾，福州、福清人在印尼，安溪、永春人在马来西亚等。闽籍侨商在东盟国家有着巨大的经济实力和基础，在东盟全球500强华人企业中，福建籍就占了近200家。这些侨商凭借与中国的血脉关系成为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桥梁和纽带。福建引进的第一批外资企业，多半是当年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侨居东南亚的华侨后人的企业；依托“海丝”资源，福建诞生了中国大陆第一批侨资工业区，如国家级融侨经济技术开发区、福建元洪工业集中区等；同样是依托华侨华人与台湾工商界的深厚人脉，福建引进了第一批台湾工业企业，如今已稳居世界显示器首位的“冠捷电子”，就是东南亚著名华商林文镜与台湾工商界朋友合作的结晶，而林文镜家族连续多代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之路下南洋，为开发和建设印尼爪哇岛做出重大贡献。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华侨华人在闽捐建的桥樑、道路、学校、医院、公园和各种基础设施，为福建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力支撑。

三、福建融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对策建议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的提出，为福建发掘区位优势潜力、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带来了新的契机。福建要抢抓机遇，发挥优势，以东南亚为重点，坚持“走出去”与“引进来”结合、经济合作与人文融合并重，谱写“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新篇章。

1. 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以科学发展为指导，以加快转变、跨越发展为主线，以竞争力提升为核心，加快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型经济新格局。要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出口产业和企业。以我省主导产业和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为重点，鼓励企业加强自主创新和自主品牌建设，挑选具有潜在国际竞争优势的行业和企业，实施重点扶持，引导企业不断转型升级，形成核心竞争力。要努力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努力营造高效、规范的政务环境，诚信有序的市场环境，富有活力的体制机制环境，优美和谐的人居环境，以及完善高效的产业配套环境，使福建继续成为全国领先的宜居宜业的投资热土。要完善开放型经济发展促进体系，增强内外经济政策的协调性，加强外贸、外资、对外投资政策与产业政策的相互配合，增强政策的战略性、导向性和稳定性，推进商务、金融、财政、海关、质检、税务等多部门纵向联动、横向合作、高效协调的工作合力，健全对外开放的风险防范机制。进一步加强与东盟国家在港口、码头建设管理等方面的合作，使港口合作在中国-东盟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进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2.加强经济贸易合作

深化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合作，推进产业发展高端化、集群化、国际化。推进石油化工、机械装备、建筑建材等先进制造业项目对接合作，推动能源、矿产等领域勘探开发与建设合作；加强海洋开发合作，推动设立“中国—东盟海洋合作中心”，加强海洋科技创新、环境保护、联合执法、安全救助等领域国际合作；推进海峡蓝色经济试验区建设，加快规划建设产业合作园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和跨境经济走廊，探索福建与东南亚国家互设“南洋产业园”或“海丝产业园”等“两国双园”模式，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鼓励省内有实力的工程企业，有计划、有步骤地走出去，到东盟国家参与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在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不断攀升的背景下，福建企业走出去，充分利用当地的人力、土地等要素，开展全球化分工已成为世界发展的重要趋势。广泛联络福建旅居东盟各国的侨亲和福建同乡会，发挥他们的人脉关系，为福建企业与东盟各国企业的合作提供帮助。积极主动地与东盟华人华侨组织、机构和社团等建立密切的联络渠道，特别是加强与福建华侨华人社团的联络，探讨建立更为密切的合作关系和合作机制。

3.扩大能源和粮食合作

福建省是少煤、无油、无天然气，常规能源短缺的省份，煤炭储量仅可供开采 20 至 30 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高强度的开发，可开发的资源大大萎缩。当前能源自给率已下降到 30%以下，预计 2015 年能源自给率降到 20%左右，迫切需要输入更多的一次能源资源，以确保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福建人多地少，粮食供需矛盾历来突出，而且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持续增长，粮经争地矛盾日趋尖锐，粮食产需缺口不断扩大。据统计福建粮食自给率从八十年代的 80%左右，下降到 2010 年的 40%，而到 2015 年和 2020 年，粮食自给率将进一步下降到 36%和 31%。因此保障能源安全和粮食安全将是福建长期需要关注的问题。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特别是中东国家，拥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等资源；而泰国和越南分别是当今世界名列第一、第二的大米出口国，缅甸、老挝、柬埔寨粮食生产潜力巨大。福建要加强与东盟国家的粮食安全合作，扩大从东盟国家进口粮食，或采用承包土地等方式，到境外种植粮食，建立示范农场或农业中心，通过培育水稻良种、推广现代农业技术，提高稻谷单位面积产量。鼓励企业直接到国外建立能源生产基地，或利用本省优越的港口资源条件，争取国家布局建设能源储备和中转基地，多渠道采取措施保障能源安全。

4.推动人文深度融合

福建省要秉持“项目带动、文教先行、搭建平台”的原则，通过文化交流使海上丝绸之路成为各国人民友好交往的纽带。积极举办“南洋文化节”、“福建发现之旅”等活动，让省内民众和东盟友人感受到福建与东盟深厚的历史渊源与联系。每年在“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相关国家举办两至三次“福建周”活动，每次覆盖两个国家，开展省情与相关市情的推介、项目对接、文化交流、旅游促销、侨亲企业恳谈等活动，推动我省与“海丝”沿线国家全方位务实合作。加大福建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地的研究和宣传力度，开发“海上丝绸之路”旅游热线，推动妈祖文化旅游胜地、妈祖信众朝圣岛建设，联合打造海上丝绸之路旅游经济走廊和环南海旅游经济圈。

精心组织海上丝绸之路、福建历史文化、华侨相关的文艺节目赴东盟国家演出、巡展，推进青年、智库、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媒体等的友好交流，增进相互了解，巩固深化友谊。支持省内重点主流媒体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与东盟国家新闻媒体合办栏目或节目。进一步拓展教育合作领域，采取与东盟国家联合办学、互派留学人员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在职、职业培训等多种渠道，培养从技工、大专到本科、硕士、博士等多层次人才，特别是重点培养精通英语和东盟国家小语种的翻译和涉外人员，培养熟悉东盟市场、掌握国际惯例的领导人才、高级管理人员和市场营销人员。扩大资助额度，支持东南亚的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来闽开展学术研究和学术访问。

作者简介：

黄继炜，福建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魏澄荣，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筑路海上，筑梦天下：论福建航海历史 与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

谢必震

福建的先民很早就利用海上交通和海上资源发展经济。从中国古代的文献资料来看，汉代中国不仅开通了连系中亚、西亚的丝绸之路，同时也开辟了中国往印度的海上通道。很快在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不断实践和勇于探索之下，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海上交通航线逐步形成。唐代中国以广州港为中心与东南亚诸国开展经济与贸易活动，宋元时期，福建泉州港的兴盛，渐渐取代了广州港的地位，而成为世界第一大港。尤其是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的游记，更使得中国泉州在世人的心目中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圣地，许多探险家、航海家闻风出动，他们赞叹中国的富庶，而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人类的航海交通事业。其中最伟大的十五世纪的航海家应该是中国的郑和。

郑和七下西洋，创造了人类航海史上的奇迹。他使得中国和世界紧紧的连系在一起。他为十五世纪中国在世界的大国地位建立了丰厚的基石。事实上，郑和七下西洋与福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换言之，郑和下西洋在很大的程度上反映了那一个时期福建的对外交通。

继郑和之后，福州港的中琉航海交通与贸易，在中外交往的历史上显赫一时。中琉贸易的兴盛弥补了郑和轰轰烈烈壮举结束后的失落和沉寂，成为那一时期中外航海交通贸易的中心。

中世纪的风云变幻，漳州月港走私贸易的巨大旋风，一夜之间刮走了福州港的中心地位，取而代之的是月港，因为它与马尼拉的大帆船紧紧相连，使月港从此走向了世界。

清代以降，郑成功时代的台湾海上交通与贸易，是那一时期的重头戏。君不曾听过，台海之上，不得郑氏号令，不能行船走海。中国东南沿海的迁界与禁海，给了郑氏政权任意驰骋的机遇，在中国海上交通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康熙统一台湾后，开四海关，海上交往盛极一时。但终因清王朝的禁令，出海之船不得超过二桅，中国的造船技术受到限制，中国航海交通的力量受到极大的削弱。当西方海盗和日本倭寇在海上游弋时，昔日航海之强国中国，只能退避三舍，拱手让出了海上大国的地位。

星移斗转，几个世纪的辉煌和几个世纪的沦落，中国人终于站起来了，中国的航海交通又走到了世界的前列。中国海洋文化的兴盛又让世人重新来看待中国。海上交通不仅使福建地区迸发出勃勃生机，也使得福建在海洋文化的发展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今天，我们要建设 21 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我们应该从福建伟大的航海历史中，汲取健康的养分，探寻成功的秘笈，把握绝妙的玄机，领略历史的启迪，重振海上雄风，开创胜利的未来。

一、历史上福建航海名言的深刻内涵

在福建的航海历史上，留有许多经典的名言，解读这些名言，能使我们悟出许多深刻的道理，对今天的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大有裨益。

1. “闽在海中”

“闽在海中”出自《山海经·海内南经》，原文是：“瓠居海中，闽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闽中，山在海中”。这一经典文字告诉我们，福建与海的不解之缘。

福建海岸线曲折，北起福鼎沙埕南至诏安宫江，长达 3224 千米，仅次于广东而居全国第二。大小岛屿有 1400 多个，岛屿岸线长达 1779 千米。主要岛屿有海坛岛、厦门岛、东山岛、平潭岛、金门岛以及台山列岛、福瑶列岛、四礮列岛、浮鹰岛、马祖列岛、南日群岛、江阴岛、湄州岛等。福建多有基岸海岸，海岸陡峭，加之入海河流含沙量少，故天然良港众多。著名的如沙埕港、三沙湾、罗源湾、兴化湾、湄州湾、泉州港、厦门港、东山湾等。

福建的西北部都是海拔千米以上的高山峻岭，阻绝了福建通往内陆的交通。福建背山面海，自然地理环境使其只能发展海上交通，因此铸就了福建发达的海外交通。福建的山高林密又为其航海造船提供了丰富的材料，福建海洋的优势，非常集中地体现在“闽在海中”这几个字上。

今天，“闽在海中”自然环境依旧，福建特殊的地理位置赋予福建人神圣的使命。面对东海，面对台湾海峡，面对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建设，福建人责任重大，福建人当借势而起，充分发挥地理环境的优势，积极融入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之中，为中国的海洋发展战略冲锋陷阵。

2. “海舟以福建为上”

“海舟以福建为上”这在宋代早有评说。这一经典来自宋人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这是中国历史学界研究中国造船航海历史常常引用的。这段经典文字告诉世人，宋元福建航海贸易的能够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其中福建人拥有世界一流的造船技术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性能优越的福船，吃水深，航行稳、坚固无比、配置精良，非常适合远洋航行。毋庸置疑，福船是那个年代标志性的高科技产品。

今天，我们重新提到“海舟以福建为上”的说法，让我们深刻地理解到，中国要构建 21 世纪新的海上丝绸之路，中国要成为海洋大国、海洋强国，必须有超一流的科学技术做支撑。当我们今天还能说，“海舟以福建为上”，我们能拥有一流的标志性的科学技术，我们福建人才能不辱使命，建成新的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3. “海者，闽人之田也”

“海者，闽人之田也”。这句名言出自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炎武精辟地概括了福建人与海的关系。海为福建经济的发展，海为福建沿海居民的生计带来了无限的生机。事实上，也有一些人对这句话有不同的看法，认为中国人经营海洋，把海当作陆地，当作耕田来对待，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这是农耕国家、以陆地为主的国家必然形成的观念，顾炎武的这句话，正是以农业为主的大陆国家看待海洋最具代表性的表现。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今天，我们诠释“海者，闽人之田也”这句名言，我们清楚地看到古人对海的理解。实际上，顾炎武的这句名言明明白白地要告诉我们，海洋经济有多么的重要。海，能够像肥沃的良田，给人们带来丰收，带来收获，带来希望。今天，我们建设 21 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

就是要辛勤地耕耘，默默地播种，高度重视海洋经济的发展。还是那句老话：有一份耕耘，就有一份收获。

福建航海历史上有诸多的名言，富有哲理，给人以无限的遐想。在此我们仅略举一、二，目的在于以史为鉴，福建伟大的航海历史，必将对今天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提供不可忽视的殷鉴。

二、“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叙事

明初为了加强海防，政府大力发展造船业，扩充水师力量。强大的航海力量，造就了郑和七下西洋的旷世壮举。郑和船队出访西洋，发展与加强了海外诸国的友好关系，从而达到了明朝“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贡献臣服”的宗主国地位。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郑和率领庞大的舰队七次下西洋，“维艚挂席，际天而行”，先后出访了东南亚、南亚、西亚及东非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郑和船队出发时，“鲸舟吼浪泛沧溟，远涉洪涛渺无极”。郑和船队返航时，“时值南风指归路，舟行巨浪若游龙，”场面极其壮观。

福建先进的造船技术为郑和下西洋提供了性能优良的福船。福船耐风涛，且御火。底尖上阔、首昂尾高，舵楼三重，帆桅二，傍护以板，上设女墙及炮床。中为四层，最下实土石；次寢息所；次左右六门，中置水柜，杨帆炊爨在是，最上如露台，穴梯而登，傍设翼板，可凭以战。矢石火器皆俯发，可顺风行。海上若遇盗贼，倭人，下侧如刃，破浪航行，曰之犁冲。

《西山杂志·三宝太监下西洋》载：永乐三年，成祖命郑和、王景弘、张文等造大船百艘，率军二万七千余。王景弘、闽南人，雇泉州舟，从苏州刘家港入海，至泉州寄泊。

《重纂福建通志》亦记有“大监郑和自福建航海通西夷，造巨舰于长乐。史载，郑和下西洋所遗留下的造船起重装置——鹰架，均为上好的木材所组成，中央政府曾令福建官府将“鹰架”的木料运至南京修宫殿，后担心在崎岖山路的运载过程中损坏。故留在福建作修建仓库货栈的用料。从中央政府调用鹰架木料的这件事说明，木材的量相当大，否则不会考虑运到南京修建宫殿。因此，数量众多的鹰架，反映了郑和下西洋在福建的造船规模是巨大的。

福建也为郑和下西洋提供了大量的人员。除了一般的航海人员外，福建都司和福建行都司所辖的十六个卫，绝大部分都选派了官兵参与郑和下西洋活动。据徐恭生《明初福建卫所与郑和下西洋》一文所述，明代所存的《卫所武职选簿》（仅有福建十六个卫，十二个守御千户所的四个卫），记载了跟随郑和下西洋而以功升任的各路军士。诸如《福州右卫选簿》载，韩瑜世袭百户，因其先祖韩大随郑和下西洋于白沙岸与苏干刺对敌厮杀有功，遂准其后袭授世袭百户。又有李炫，因先祖李隆戌永乐三年西洋公干，四年旧港外洋厮杀获功，升小旗。五年西洋公干，七年升总旗。九年西洋公干，十三年试百户，其后人遂世袭该职。类似这样的记载举不胜举，在一些族谱中也有反映。如《长乐六里志》所引《黄李族谱》中言，有长乐人黄参，明永乐七年参予郑和下西洋有功，授忠武尉，署迁游击定远将军及总管府中军。何乔远所著《闽书》中，亦有许多人在永乐年间下西洋的活动中升迁的记载，由此可见，郑和下西洋时曾有许多福建人参加了这项活动。洪熙元年（1425年）十一月行在工部尚书吴中奏：“南京处理殿宇未完，请于直隶、镇江等卫拨军士二万人助役。上曰：南京闲旷军士亦多，不须别取，其再计议。于是中与尚书张本等议，原下西洋官军一万余人久闲，可令协助，从之。”

通常郑和下西洋人数均在二万余人，上奏折中只言南京闲旷军士一万余人，可见余者皆福建人也。

郑和七下西洋及在福建集结的时间表

航次	人数	到闽时间	出国时间	归国时间
1	27800人 大舶62艘	永乐3年冬(1405年)	永乐3年冬(1405年)	永乐5年9月(1407年)
2	未详	永乐5年冬(1407年)	永乐5年冬(1407年)	永乐7年夏末(1409年)
3	27000余人 海舶48艘	永乐7年10月(1409年)	永乐7年12月(1409年)	永乐9年6月(1411年)
4	27670人 宝舡63号	永乐10年11月(1412年)	永乐11年秋冬(1413年)	永乐13年7月(1415年)
5	未详	永乐14年12月(1416年)	永乐15年冬(1417年)	永乐17年7月(1419年)
6	未详	永乐19年正月(1421年)	永乐19年冬(1421年)	永乐20年8月(1422年)
7	27550人	宣德6年2月(1431年)	宣德6年12月(1431年)	宣德8年7月(1433年)

郑和下西洋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它促进了中国与海外诸国的友好往来。增强了中国人民与海外各国人民的友谊。郑和下西洋同时也促进了中国与海外诸国的贸易关系。郑和船队不仅带回了海外诸国的奇珍异宝各种香料，同时也带回了各国的文化，有利于丰富人民的生活。郑和下西洋为中国人了解世界、开阔视野，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跟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费信、巩珍先后撰写了《瀛涯胜览》、《星槎胜览》和《西洋番国志》，对郑和船队所到过的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沿革、山川地理、民间习俗，物产气候和宗教文化都作了详尽的介绍，并对中国往东南亚诸国的航路也作了准确的描述，这都为后人的航海，对外交通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客观地说，郑和船队下西洋，在福建造船，在福建招募航海人员，调派卫所的军士，在福建集结船队，补充给养，购置海外贸易的货物。显而易见，郑和下西洋实际上就是福建的航海历史。郑和下西洋的这段历史给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历史启迪。

举世无双的郑和下西洋的壮举，显示了明朝中国在国际舞台的影响力。这种气势磅礴的影响了依靠了三种实力：雄厚的经济实力、强盛的军事实力和绝对的文化实力。

就今天的世界格局而言，超级大国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也是世界各国有目共睹的。美国凭借什么让世人信服，凭的是五角大楼的军事、华尔街的经济和好莱坞的文化。原来美国人用的这一套竟然是“郑和下西洋”的翻版。这不禁使我们想到，祖先们早已使用的策略，我们为何不加以弘扬光大。因此，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过程中，我们应该要提升综合国力，要发展对各国具有吸引力的价值观体系，塑造真正的软实力，树立我国的国际形象和威信，形成中国在世界上的强大影响力。

郑和下西洋真的能给我们许多的启迪，这使我们想到先贤船政大臣沈葆楨曾说过的话。沈葆楨说：“不战屈人，海上上之策。但我必有可以屈人之具，而后人不得不为我屈”。沈葆楨在这里所指

的“屈人之具”，就是海上力量。中国要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海洋权益、国家领土主权、海上通道的安全都需要海上力量，都需要有屈人之具。

郑和下西洋，曾在海外建立了众多的贸易基地，广泛联络海外的华人华商，这一史实又给我们清楚的提醒：我们必须重视海外华人华侨的力量，尤其是福建，在海外拥有千百万的福建侨胞，我们与他们建立密切的、广泛的联系，只有重视海外侨胞的力量，共筑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才能越走越宽阔。

三、使者与舟师的对话

明洪武五年（1372 年），琉球国接受了明朝的招谕，正式与中国建立邦交关系。明清两代，每位琉球“国王嗣立，皆请命册封”，中国政府大都应其所请，派出册封使出使琉球。当时规定福建市舶司专门负责通琉球，因此册封琉球必须在福建组织造船、备船，招募航海人员，配备军士。嘉靖年间使琉球的陈侃在其《使琉球录》中谈到中琉航海用人，他说：“漳人以海为生，童而习之，至老不休，风涛之惊见惯浑闲事耳，其次如福清、如长乐、如镇东、如定海、如梅花所者，亦皆可用人”。万历七（1579）年任册封琉球副使谢杰的《使琉球撮要补遗》中亦载：“大都海为危道，向导各有其人。看针、把舵过洋，须用漳人。由闽以北熟其道者，梅花、定海人，由闽以南熟其道者，镇东、南安人。……船中择漳人，须试其谙于过洋者。择梅花、定海者，须试其谙于闽、浙海道者。择万安人须试其谙于闽、广海道者，又不可徒徇其名而浪收也”。万历三十四年（1606 年）夏子阳出使琉球时就向漳州的海防馆派要航海人员，其曰：“篙工、舵师，旧录皆用漳人。盖其涉险多而风涛惯，其主事者能严、能慎，其趋事者能劳、能苦，若臂指相使然者。但精能者，往往为海商私匿。余因檄漳州海防馆，令其俟洋船回日，从海商查报，籍名送至。”康熙年间出使琉球的使臣徐葆光也提到册封琉球使团人员都是由福建海防厅派送的，渡海官兵都是从福建沿海的海坛镇、闽安镇、烽火营选派。这些记述都告诉我们，册封琉球的航海活动起用的都是沿海的福建人。当时册封使询问这些人的航海经历时，他们回答：“海外之国所到者不下数十。操舟之法，亦颇谙之。海舶在吾掌中、针路在吾目中。”正是因为这些福建人主宰着中琉航海的活动，丰富的航海经验使他们发现了钓鱼岛、命名了钓鱼岛。在钓鱼岛的历史归属问题上最具有发言权。如今在使琉球航海的文献中，留有诸多关于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国的记载。譬如 1534 年成书的陈侃《使琉球录》中记载“古米山（即久米岛），乃属琉球者。”嘉靖四十年（1561 年）使琉球的郭汝霖所撰《重编使琉球录》载：“赤屿者，界琉球地方山边也。”康熙年间出使琉球的徐葆光在其《中山传信录》亦有“姑米山乃琉球西南方界上镇山”的记述。乾隆年间出使琉球的周煌在《琉球国志略》中亦记道：琉球“环岛皆海也，海面西距黑水沟与闽海界。”凡此种种，都是明清使琉球的官员们对福建舟师们长期航海而形成的海疆认知的客观记述。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使琉球的册封使者汪楫在其著述《使琉球杂录》中记载其过赤尾屿时对“郊”的表述：“薄暮过郊（沟）……问“郊”之义何取，曰：中外之界也”。福建方言，“郊”与“沟”同音。当时的福建船工明白无误地回答了汪楫的疑问，琉球海沟乃中外之界。使者与舟师的这一问一答，有力地证明，册封琉球使者笔下关于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国的历史证据，来自福建人的航海实践活动。

我们的先民，从海洋的叙事，到海岛主权的确立，到海洋意识的提升，为今日的海上丝绸之路

的建设，提供了有力的历史证据和法理依据。可以想见，在 21 世纪新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中，不可能一马平川，一帆风顺，我们在东海、在南海与一些国家必然有磕磕碰碰，有博弈，有冲突，我们应该充分利用福建先民留下的宝贵财富，去化解前进途中的危机，去跨越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险滩与暗礁。

我们赞叹历史上的使者与舟师的对话，是他们的智慧凝练了主权属于中国的历史证据，正是他们的航海实践，为我们今天创建新的海上丝绸之路铺平了道路。

四、海洋文化的凝练

有人说，海洋文化有两个最基本的要素：一个是“人”，一个是“海”。人海互动，产生了海洋文化。海洋文化是人的力量在海洋活动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人们关于海的生活、生产、价值观念、性格、习俗的文化表象。事实上，我们将其具体化，就有造船技术、航海技术、航海叙事、海洋文献、航海制度、海神信仰、航海习俗、海洋神话传说等。

海洋文化就是关于“人”与“海”互动留下来的物质或非物资的产物。保护好海洋文化资源，开发、利用这些资源，对于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有着重要的意义。

据考，福建自从有了人类活动就与海洋结下了不解之缘。航海行船，福建海上交通的发展，促进了福建沿海居民海神信仰的活动。在航海过程中，人们供奉的海神以天妃为主。天妃又称天后、天母、天上圣母，福建和台湾俗称妈祖。天妃姓林，名默娘，福建莆田湄洲人，生于北宋建隆年间，终身未嫁。初以巫祝为事，受乡人崇敬。由于湄洲岛人多从事航海造船业，海上航行，危险重重，因此人们常常乞求神灵保佑。林默娘死后，便被当地的人民供奉起来，当做航海的保护神。由于封建统治者对海上贸易的重视，赐以封号，故天妃的名号便传扬开来。福建一地航海供奉天妃之事在历史上有诸多的记载，例如，“飞航万里，风涛叵测；玺书郑重，一行数百人之生，厥系匪轻。爰顺舆情，用闽人故事，祷于天妃之神；且官舫上方为祠事之。舟中人朝夕拜礼必虔，真若悬命于神者。”就是明代嘉靖年间从福州渡海使琉球的陈侃对航海时供奉天妃的描述。福建历史上关于天妃信仰的描述，举不胜数，仅举以上文字，以概其余。但就古代福建海神信仰而言，除了人们共同信仰的天妃娘娘外，还信奉诸多的海神信仰，譬如：龙王、临水夫人、拿公、苏臣、陈尚书等。这些神明各有故事，都是福建沿海居民所信奉的海神。由于航海人员来自福建沿海各地，因此在航海过程中自然就冒出如此众多的海神。事实上，我们翻阅相关的古籍文献得知，我们福建先民开洋下针，需要供奉的神明还有许多，这些神明各司其职，凡操舟弄桨者得一一祭拜。所拜的各路神仙如下：

东西南北中，五方执事直符使者——掌管方向的神明；

奉直四位功曹——掌管年、月、日、时的神明；

黄帝轩辕氏、周公——都是建造指南车的神明；

九天玄女——中国古代法力无边的女神；

茅竹水仙五位尊神——水仙即水神；

还有青鸦、白鹤二位仙师；杨救贫、王子乔、马头陀、张仲坚、李定、陈搏、柳仙、郭璞列位先生；罗经二十四位尊神；掌针大将、下针力士、定针童子、转针郎官；叶石大神、守护罗经坐向诸神；

历代过洋、知山、知水、知屿、知礁、知湾、知澳、知浅、知深、牵星望斗、看云探风、擎波喝浪的仙灵；鲁班仙师暨部将、神兵；木船、木龙、杠棋诸神；海上虚空过往神明；经过岛屿山神、土地神等等。

通过上述罗列，我们了解到在遥远的古代，航海技术和造船技术还不发达的情况下，人们将航海的安全保障全部寄托在上天的庇佑上，因此所供奉的神明真是太多了。

透过福建人航海供奉海神信仰的表象，我们清楚地看到，千百年来福建先民的航海实践，创造出来的海神信仰，实质上是凝练了人与大自然搏击的勇敢精神。正是这种与大自然搏击的精神，使得福建先民在与海洋的斗争中开辟了一条又一条新的航路，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航海的奇迹。这种冒险的精神、这种开拓的精神、这种勇于探索的精神，将激励着我们在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上勇往直前。

五、余论

筑路海上，筑梦天下。福建航海的历史给今天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人们太多的启迪。

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上的福建船政学堂，它向世人昭示人才培养的重要。中国近代史上曾流行“无闽不成军”的说法，福建海洋人才济济，影响了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从中我们领悟到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需要人才，需要社会最杰出的人才。

我们不能忘记九日山的祈风石刻，它向世人述说，福建航海辉煌的历史，离不开历朝统治者的重视和顺应潮流的政策。不同政策的实施，造成不同的结局，这种不同是天壤之别的不同。

我们知道，古代福建的官员，祈盼好年景，好收成。祈盼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他们不辞劳苦到九日山祈风，为远航的贸易船祈求顺风。这充分体现了宋元泉州港的繁荣与兴盛，得利于官民一心好政策。由于政策实施的时代不同，地区不同。航海的福建人，有时是海商，有时就成了海盗。由于政策的缘故，明清时期，从事福建与琉球贸易的闽人三十六姓，许多人就成了权倾朝野的达官显贵，一言九鼎的王公大臣，这种不同国度，不同的结局是很奇妙的。

我们没有忘记留存至今的许多针路簿、航海图、罗经、牵星板和历经沧桑的历史遗址，它们都展示了福建先民的聪明才智。联合国人口统计曾揭示，世界上人口寿命男女都居第一位的是日本冲绳地区的老百姓，据说他们长寿的秘诀是饮食，他们的传统饮食又是受到闽菜的影响。这种影响人寿命的饮食文化的传播是航海的福建人的功劳。历史上福建人航海的生活经验，包括饮食文化迄今还深深地影响着世界各地的居民生活，这是很了不起的事。不断地创造、勇敢地探索、无私地传播、永远地影响。福建航海的历史，造就了、丰富了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

我们应该深刻地认识到：“海”，并不是天堑，不是屏障。“海”是纽带，是桥梁，是中国与世界各国交往的通道。在充满生机而又变幻无穷的 21 世纪，我们需要开辟新的通道，我们需要建设新的丝绸之路，通过海，去连接世界。我们只要以史为鉴，扬帆远航，就一定能够到达胜利的彼岸。

作者简介：

谢必震，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推进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福建省的挑战与对策

何军明

内容摘要：福建省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应理解中央提出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意图与要点，借鉴其他省市相关经验，尽早尽快出台福建省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整体战略规划，将经贸合作的内容作为战略规划的基础，将对外经贸战略提升为发展模式转型战略。

关键词：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福建省 对策

2013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出访期间提出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合作，共同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李克强总理随后也提出续写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辉煌。随后中央做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战略部署，这对于福建而言是难得的历史机遇。

福建省委书记尤权提出，福建在加快推进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要以东南亚为重点，努力打造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互联互通的重要枢纽、经贸合作的前沿平台、人文交流的重要纽带。本文拟对福建省推进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经验借鉴、面临挑战等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一、中央提出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意图与要点

1.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提出的背景

2009 年以来，美国提出并逐步实施其重返亚太的战略。2012 年 6 月，美国国防部长又进一步提出了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亚太再平衡战略”进一步明确和充实了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总的来看，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意图：一个是战略意图。主要是通过力量部署调整来应对中国崛起，尤其是中国崛起对美国当前的优势地位带来的挑战。二是经济意图。亚洲地区已经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引擎，美国急需提升其在亚洲贸易体系中的战略地位，并继续谋求在全球贸易规则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美国近年来力推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¹正是其“亚太再平衡战略”在经济方面最重要的体现。美国通过 TPP 重新拉拢亚洲国家，力图将其纳入自己主导的经济贸易体系中，维护美国自身的霸主地位，同时在亚太地区孤立和排挤中国，迫使中国遵从其主导的贸易规则，遏

¹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是一项由美国主导的自由贸易协定。当前 TPP 的成员国包括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智利、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秘鲁、新加坡、美国、越南和韩国。这些国家对全球 GDP 的贡献约为 40%，占全球贸易三分之一左右，是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之一。台湾和泰国正在考虑加入 TPP 谈判。

制中国崛起的国际经济空间。由此，中国的和平崛起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周边环境。

2. 中央提出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意图与要点

2013 年 9 月，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提出，中国把中亚地区当作外交的优先方向，希望通过创新的合作模式，与欧亚各国共同建设起涵盖近 30 亿人口的“丝绸之路经济带”。2013 年 10 月初，习近平在访问印尼时提出，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共同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之后中央进一步提出了“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战略，着重强调了周边在中国发展大局和外交全局中的重要作用。

我们认为，中央提出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意图主要包括：（1）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力推 TPP，干扰了原来的东亚一体化进程，使中国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和世界新的经济贸易规则形成过程中处于被动地位。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正是党中央开拓新境界，冲破美国遏制、变被动为主动，为中国崛起塑造良好周边环境的有力举措。（2）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需要更广阔的国际经济空间与更友好的周边外交环境，通过推进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将为中国的发展寻求新的突破和新的机遇。（3）中国通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拥有较为强大的经济实力，进一步的发展需要一个稳定、友好的周边环境，需要加强与周边国家的联系。通过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贯彻“周边是首要”的外交方针，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创造有利的国际经济与政治环境。

目前中央尚未明确出台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具体内容，但是从商务部、外交部等方面显示的信息来看，主要应包括以下要点：（1）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争取 2020 年实现双边贸易额 1 万亿美元。（2）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对海上丝绸之路国家进行投资合作，积极探索设立境外经贸合作区、产业园区等。（3）推进区域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港口、桥梁、公路等。完善中国—东盟互联互通合作委员会等机制，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4）加强区域金融合作和风险防范。如进一步扩大跨境贸易本币结算试点和双边本币互换的规模和范围。（5）推进海上合作。切实加强在海洋经济、海上互联互通、环境保护、科学研究以及海洋渔业合作。（6）推进与印度等南亚国家的合作。（7）加强次区域合作。（8）加强区域人文、科技、环保等交流。

二、其他省市参与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经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中央规划正在调研和征求地方意见，尚未完成。2013 年 12 月，国家发改委和外交部举行了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座谈会，参加者包括广西、云南、浙江、江苏、福建、广东、海南等省份。天津、青岛等其他城市和地方也在积极争取加入海上丝绸之路规划。2014 年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抓紧规划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推进孟中印缅、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推出一批重大支撑项目，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新空间。”

1. 广西主要力推“一轴两翼”战略¹，强调“泛北部湾合作”。广西一直努力推动“泛北部湾

¹ 一轴是指从南宁到新加坡经济走廊，它以铁路、高速公路和高等级的公路为载体，把 6 个国家、9 个城市串联在了一起。两翼中的一翼，是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区，以澜沧江、湄公河为载体，涵盖中国、越南、老挝、泰国、柬埔寨和缅甸六个国家。两翼的另外一翼，是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以海洋为载体，包括中国、越南、马来西亚、新加

合作”。2006年，中国、东盟和亚洲开发银行共同启动了“泛北部湾经济合作”。泛北合作论坛至今已经成功举办历7届，促进了中国与东盟在港口与海上旅游等领域的合作。目前《中国—东盟泛北部湾经济合作路线图》已经通过，路线图以港口和物流为重点的海上合作作为首要内容。

近年来，广西建设了不少交流平台。包括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论坛等。其中中国—东盟博览会影响力最大，已经成为中国与东盟交流的最高层次和最重要的平台，此外，广西还建设了不少经贸合作区，包括中国—马来西亚钦州产业园、关丹产业园、中国—印尼经贸合作区、中国—越南跨境经济合作区等。

目前，广西将互联互通、商贸物流等作为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战略重点。一是计划建设一批物流和商品交易中心。包括中国—东盟商品交易中心和中国—东盟商贸物流集散中心等。二是推进互联互通建设。从航空、铁路、公路、港口、输电线路、通信线路、各类管道等全面构建互联互通体系，拓展国际航空航线、海运航线等。

但是“一轴两翼”战略、中国—东盟博览会合作平台等更多是政府层面的推动，缺乏真正的企业层面的经济合作，因此新加坡、缅甸、马来西亚等国并不积极。广西又提出“泛北部湾合作”，希望将四个港口合并为“北部湾港口集团”在青州建保税港区，但是广西的国际航线与货运量有限，除了越南方面较为主动外，其他东盟各国并不积极。广西与东盟国家经济合作的成效一般，2013年与东盟贸易总额为159亿美元，位列我国各省区（市）对东盟贸易的第八位，约为福建省（242.8亿美元）的65%，且广西与东盟贸易过度集中在越南，对越南一国的贸易额占与东盟贸易总额的80%。

2. 云南主要是提倡和积极推进“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并建立了中国南亚博览会、昆交会、孟中印缅区域合作论坛等合作平台。在产业合作区方面建立了滇中产业新区、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瑞丽开发开放试验区等。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已经列入2014年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

云南目前的战略重点主要在与东盟、南亚国家的互联互通，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上。2013年云南省铁路投资达270亿元，已经初步形成“八出省四出境”的铁路格局¹，出境出省公路全部实现高等级化，水路交通运输体系建设也在积极推进。另外云南也积极投资进行与越南、缅甸等国家的交通、电力、燃气、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

但是总体来看，云南的经济总量有限，与东盟国家合作的经济规模仍然较小，合作层次较低，主要面向缅甸和越南。2013年云南与东盟贸易总额为109亿美元，其中约38%来自缅甸。

3. 广东省在2008年9月与东盟签署了《广东省与东盟秘书处合作备忘录》，合作重点包括农产品、信息通讯技术、能源与环境、贸易和投资、旅游业、物流基础设施、教育、科技、文化等领域。广东与新加坡和越南的合作开展得较早，形成广东—新加坡企业家理事会、广东—越南企业论坛等交流机制。2010年5月，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启动后，广东省政府发布了《关于深化广东省与东盟战略合作的指导意见》，对提升广东与东盟合作水平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指导与规划。

坡、印尼、文莱和菲律宾。

¹ “八出省四出境”铁路格局是指贵昆铁路、成昆铁路、滇藏铁路、云桂铁路、沪昆客专、南昆铁路、内昆铁路、渝昆铁路八条出省铁路和中越通道、中缅通道、中老泰通道、中缅孟印通道四条出境铁路。

目前广东的战略重点主要在深化经贸投资、境内外经济区建设等。广东建立了中国—越南（深圳—海防）等境外经贸合作区、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等境内经济区等。广东省强调与东盟经贸合作的“错位竞争”和互补性，积极推进与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国在知识密集型、信息、现代服务业、资源能源等方面的投资合作，带动本省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推进中新“知识城”项目建设。

之前广东对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重视程度不足，但近年来随着东盟经贸地位的上升，广东越来越重视与东盟的合作。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胡春华等都非常积极与东盟国家政府高层进行了交流互访。2013年广东省对东盟的贸易总额为1022.1亿美元，同比增长10.7%，东盟超越了欧盟成为广东第三大贸易伙伴。但广东在实施海上丝绸之路战略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近年来与东盟、南亚国家的经贸合作在全国的比重呈下降趋势，缺乏侧重点，缺乏有影响力的合作平台和长效机制等。

三、福建省与东盟、南亚国家经贸合作的现状

1. 福建省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

(1) 货物贸易

福建与东盟的贸易总额2013年达到了242.8亿元，自2009年以来实现了高速增长，年均增长达24.2%。目前东盟已成为福建第二大贸易伙伴。

福建省与东盟国家贸易具有以下一些特点：一、从国家地区来看，福建与东盟贸易集中在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三国。2013年福建省对新马印三国贸易额分别为51.5亿美元、50.9亿美元和47亿美元，合计占福建省对东盟贸易总额的61.5%。此外与泰国的贸易也居于重要地位。二、从贸易产品来看，机电产品是福建对东盟最主要的贸易商品，机电产品在进口方面和出口方面均占据首位。2013年，福建向东盟出口机电产品48.7亿美元，占当年进口总额的29.8%；从东盟进口机电产品19.5亿美元，占当年进口总额的24.5%。此外，高新技术产品贸易近年来增长迅速，进出口贸易额均列第二位。三、从贸易主体来看，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是福建对东盟贸易的主体，2013年二者合计占福建对东盟贸易的约95%，尤其是福建民营企业对东盟贸易增速明显，为推动双边贸易发展的起到了关键作用。2013年，福建省民营企业对东盟贸易额达134.6亿美元，同比增长21.8%，占同期福建对东盟贸易总额的55.4%。¹

表1 福建省与东盟贸易情况（2008-2013）

亿美元

年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出口	52.2	60.1	83.1	116.2	142.1	163.2
进口	32.0	33.4	48.9	67.0	73.3	79.6
进出口总量	84.2	93.5	132.0	183.2	215.4	242.8
同比增长	—	11%	41.1%	38.8%	17.6%	12.7%
福建占中国对东盟贸易总额的比重	3.64%	4.39%	4.5%	5.0%	5.38%	5.47%

¹ 数据来源于福建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福建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数据计算得出。

（2）投资

东盟是福建省第四大外资来源地。2013年福建实际利用东盟外资为3.47亿美元。同时，东盟也是福建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地区，截至2013年底，福建省对东盟投资达4.5亿美元，在东盟设立了156家境外企业和分支机构。2014年1-8月，福建省在东盟地区设立的境外企业和分支机构达到19家，对外投资1.78亿美元。¹

福建省与东盟国家投资具有以下特点：一、双边投资额近年来快速增长，尤其是福建赴东盟投资成倍增长。如2011年福建赴东盟投资设立的境外企业和分支机构为25家，中方协议投资额达1.03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达1.77倍和9.11倍。二、双边投资地区均较为集中。如2011年福建赴东盟投资主要集中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三国，对新加坡投资1800多万美元，对马来西亚投资4500多万美元，对印尼投资1100多万美元，合计约占福建同期对东盟投资总额的70%以上。福建吸引东盟国家投资，也主要来自东盟老成员国（新加坡、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其中，新加坡是福建省的主要外资来源地，近年来新加坡对福建投资占东盟对福建投资总额的40%以上。²

2.福建省与南亚四国（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的经贸合作

（1）福建与南亚四国经贸合作发展迅速。如2011年福建省对印度贸易总额比上年增长22.8%，达25.3亿美元。其中，自印度进口8.4亿美元，增长16.4%，对印度出口16.9亿美元，增长26.2%。福建民营企业为进出口贸易主体，近年来约占福建省对南亚贸易总额的50%；外资企业对南亚贸易额为8.8亿美元，增长约22.7%，占34.7%；国有企业对南亚贸易额为5.4亿美元，增长约13.6%，占21.3%。贸易中出口产品主要为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和纺织品，进口产品主要为铁矿砂、农产品、水产品等。³

（2）福建对南亚四国贸易顺差逐步增加。近年来，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福建省在机电设备、高新技术产品、化工产品方面的竞争力大大提升，南亚四国国内市场需求旺盛，从中国进口产品增长迅速。印度出口到福建省的产品主要以铁矿石、棉纱、水产品等低附加值工业原材料为主，而从福建进口的商品则主要是机电设备等高附加值商品。

（3）目前福建和南亚四国的投资规模较小，福建对南亚的投资刚刚起步，主要投资集中在印度，以外资企业和民营中小企业为主，国有企业的投资主要在印度和巴基斯坦。

四、福建省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挑战

1.福建省的比较优势与不足

福建省的优势主要包括：（1）福建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贸易基础比较好、与东盟的贸易总额、投资规模等在全国处于上游水平。（2）区位优势明显。福建的海洋资源丰富，拥有福州、厦门等众多重要港口，海洋经济发展基础好，现有114个万吨级以上深水泊位、5个民用机场、7条出省铁路、9条出省高速公路，初步形成了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3）具有一定的产业优势。海洋渔

¹ 数据来源于福建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

² 数据来源于福建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

³ 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福州海关网站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123/tab63612/info352979.htm>) .

业产业与东盟国家的合作走在全国前列。福建省在电子信息、机械装备、石油化工产业方面已经形成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拥有一批龙头企业和产业集群。（4）具有明显的人文优势。福建是我国著名的侨乡，现在福建籍的华人华侨在世界各地有1200多万，其中80%在东南亚国家。东盟国家的华侨华人中祖籍福建的有近一半。¹

福建省的不足主要包括：（1）与广西、云南相比，福建参与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力度不足。福建较为重视与台湾、欧美的合作，对与东盟的合作积极性不足，参与东盟相关次区域合作机制较少，关于东盟的研究较为缺乏，对东盟的信息宣传不充分。（2）近年来福建与东盟贸易额占全国比重呈上升趋势，但是仍不到6%，与广东、江苏等省份相比，差距仍然比较大。如2013年广东与东盟进出口总额达1022.1亿美元，占全国与东盟贸易总额的23%，约是福建省的4倍。²（3）福建缺乏对东盟、南亚的合作总体规划，未能形成相应的区域合作机制，缺乏有影响力的与海上丝绸之路国家的合作平台。相比来看，广西、云南等作为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不断推出相关规划、推进与东盟的区域合作，使得这两省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获得大幅提升。（5）福建与东盟的产业合作还不够深入，福建与东盟的产业合作仍然缺乏较为深入的产业链联系和长效的合作机制，双方的相关政策沟通、信息交流、行业交流仍然不够充分，福建在东盟的投资企业往往缺乏与当地企业的前向与后向联系，行业对接目前还非常缺乏。

2.政策实施中可能存在的困难与挑战

（1）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看：一是日本的有力竞争。鉴于当前中日关系处于冷冻期，日本更加积极地拉拢东盟等国家，日本在东亚、非洲等地都在和中国进行有意识地竞争，日本的资金、技术实力、企业经营管理都具有一定的优势。二是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打断了原来亚洲一体化的进程，美国也极力拉拢亚洲国家，试图将其纳入美国所主导的经济贸易体系中遏制中国。

（2）从东盟和南亚国家方面看：一是南海争端将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客观存在，双方政治互信不足。东盟和南亚等国家对中国崛起还是有防范心理，“中国威胁论”在近期内很难彻底消除。一些国家内部仍存在一些排华反华势力，甚至可能出现暴力排华行为。二是东盟和南亚等国家隐性的贸易保护壁垒仍然较多，贸易保护主义又有抬头趋势，加上近年来东盟国家对中国贸易的开始出现逆差，将不可避免地引发一些摩擦与矛盾。2013年印尼、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国家均对中国钢铁产品发起了反倾销调查，马来西亚贸工部中国的镀锡板产品征收为期5年的反倾销税，泰国商业部中国的冷轧不锈钢征收最高33.32%的反倾销税等。³一些东盟国家认为中国企业产业合作与投资进行得不够，只注重资源开发乃至资源掠夺，漠视东道国的就业、环保等民生利益。三是东盟和南亚等国家国内的劳资关系问题、宗教问题、社会问题等较为复杂，对企业投资不利。

（3）从福建本身来看：一是本土生产成本不断上升，传统产业竞争优势弱化。房地产价格、水电价格不断高涨，人民币持续升值，导致企业生产成本增加。福建省原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力下降，出口压力增加。二是福建省高新技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仍然较弱。福建省在东盟的高附加值

¹ 尤权. 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枢纽[J]求是杂志, 2014.17(27).

² 见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zyzd/local/20140716/c_1111631350.htm).

³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 (<http://topic.ec.com.cn/topic/GMTZ/GMTZ-2014-19.shtml?COLLCC=3505956108&>)

产品市场拓展依然不足，与东盟产业的竞争性仍然较强，互补性不足。三是福建与东盟南亚等国家相互投资和规模较小、产业合作不够深入，制约了双方进一步的贸易发展。

(4) 从企业方面看：一是目前对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投资的更多还是民营企业，其海外经营能力较弱，国内企业往往忽视劳工权益和环境保护，影响企业形象乃至国家形象。二是很多福建民营企业对中国-东盟自贸区优惠政策了解不够、利用率不高。尤其是在中国-东盟自贸区投资和服务贸易政策方面，很多企业都知之甚少。三是福建企业在开拓东盟市场的营销方式上相对落后，主要通过贸易批发商品，而日本、韩国的跨国公司实施了较好的本地化策略，培养和使用当地人才、建立本地的专门经销商和成熟的销售渠道。四是福建企业在东盟南亚等国家开拓市场的压力仍然很大。福建企业开拓市场需要面对强大的竞争对手，一些日、韩、欧美公司在东盟已经经营多年，具有丰富的经验和成熟的市场渠道，。

五、福建省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应注意的主要问题与对策建议

1. 福建省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应注意的主要问题

(1) 注重产业合作和投资，相对淡化对外出口，同时避免用军事化的概念来描述相关对外经贸策略

一些东盟国家仍然对中国缺乏信任，对中国和平崛起存在疑虑和恐惧，不少东盟国家的利益集团和非官方部门对与中国的经济合作持怀疑或谨慎态度，害怕与中国的经贸往来会损害其自身利益，如在2010年1月7日和28日，印尼爆发了两次大规模的游行和集会，抗议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全面运行，印尼工会认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会造成印尼大量工人失业。对此，中国首先应注意在经贸合作中避免过分强调出口，多注重产业合作与对外投资，注重经贸合作中利益合理分配，避免给人以经济侵略的印象。其次必须强调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和平性质。在一些政府文件乃至媒体宣传中往往用一些军事化的概念来描述中国的对外经贸策略，包括“战略大通道”、“桥头堡”、“排头兵”等等。这些概念把贸易投资等经济方面的东西军事化，容易产生负面影响。¹

(2) 将地方经济发展战略融入国家宏观战略

中国与东盟乃至南亚的一体化进程是国家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加强经贸联系、推进经济一体化来保障中国周边稳定的政治与安全环境，创造有利的国际政治经济空间，实现中国的和平发展。同时，发展与东盟和南亚的经济合作，又是深圳经济发展战略的必要内容，从而将国家宏观发展战略和地区经济发展战略融合起来，获取叠加效应。地方经济发展策略应服务于国家的战略目标。紧密关注商务部等宏观政策导向，积极争取国家资源。同时注意积极争取地方的自主权。

(3) 尽早尽快出台福建省参与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整体战略规划

目前福建省已经实施了一些比较务实有效的策略，但是尚未出台整体性规划，福建目前仍然急需政府宏观层面的参与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战略规划。首先，广西、云南等地方政府的经验表明，没有一个较为明确的、“叫得响”的整体战略规划，就难以得到中央层面的认同。如广西主要力推“一轴两翼”战略，并明确地将其作为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战略，得到了中央的相

¹郑永年. 中国重返丝绸之路的几个重大问题[EB/OL]联合早报网
(<http://www.zaobao.com/forum/expert/zheng-yong-nian/story20140617-355672/page/0/1>)

关政策支持。广西、云南尽管经济较为落后，但是不断推出和宣传其相关战略规划、推进与东盟的合作，使其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获得空前的提升。其次，缺乏整体战略规划导致在推进与海上丝绸之路国家合作的工作上方向不够明确，影响推进效率。

(4) 应当避免侧重地理位置的抽象规划，抓住经济合作的本质和合作方的核心诉求，将经贸合作的关键内容作为战略规划的基础。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性动力是市场机制，政府的宏观战略规划应符合市场机制的要求，相关规划应尊重企业的意见。

(5) 将对外经贸战略提升为发展模式转型战略。摆脱“为贸易而贸易”的思维，通过制定合理的参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相关战略，以此为契机和途径，通过对外开放、市场资源配置全球化促进福建省本身的发展模式转型和提高竞争力，切实推进科学发展。

2. 主要对策建议

(1) 注重学术界、媒体等对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规划战略的研究和宣传。这一点上广西、云南做得比较好，通过大力度的支持学术界对相关战略的研究、媒体的宣传，增强本省相关战略在全社会的影响力，最大限度地争取中央和全社会的关注。

(2) 集中力量先重点推进一些优势领域，不面面俱到。如在与东盟的产业合作方面，优先重点支持推动福建具有优势的海洋渔业、造船、港口物流等行业的发展及其与东盟的合作与对接。如福建在远洋渔业等方面有技术和资金优势，与东盟的渔业合作全国领先，可以将其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优先扶持产业重点推进，形成宣传和示范效应。

(3) 积极发挥福建的对台优势，参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如很多台湾企业在东盟国家成功投资，可鼓励福建企业在东盟与台湾企业联合投资，或者积极介入东盟台资企业的上下游产业链进行投资等。

(4) 与东盟合作应注意区分东盟不同国家的特点，有所侧重。东盟 10 个国家经济产业结构差距很大，福建可以先侧重于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优势互补、政治风险相对较小的国家开展合作。

(5) 注重加强同南亚国家的合作。中国同印度等南亚国家的合作前景广阔，福建省应从长远出发抢占先机，尽快建立一个全国性的中国-南亚经贸交流平台。

(6) 加强与海上丝绸之路国家的政府高层交流互访。可以借鉴广东的经验，广东省领导非常重视与东盟国家的政府高层交流互访。2008 年 9 月，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率广东省经贸代表团出访东盟四国；2014 年 5 月，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带团出访东盟三国，政府高层交流互访对推进双方经贸和人文交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7) 加强与海上丝绸之路国家的产业合作，积极构建多层次的交流合作机制。集中力量重点发展海洋渔业、造船、港口物流等优势产业与东盟合作。福建与海上丝绸之路国家双方政府之间、产业企业、行业商协会之间、华侨华人社团之间都应逐步建立起常态化的沟通协调机制，建立长效平台。尤其是有市场基础的行业间的合作交流机制非常重要，由于政府间产业政策沟通协调难度大，行业协会对接则比较灵活，应积极推进双方行业协会的对接合作。

(8) 争取打造新的福建、台湾同东盟五国三方的交流平台。云南、广西地域上相对接近东盟几

个落后国家，而福建华侨关系主要面向东盟五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泰国），福建省应利用对台优势，争取打造一个新的高层次、有影响力的三方交流平台。

（9）加快港口合作网络的建设，积极引进国际港口和航运企业投资。进一步加强港口集散和疏运体系建设，增加国际货运航线，同时鼓励福建企业走出去到东盟投资参股航运港口相关项目。

（10）发挥福州、厦门、泉州等地方的主动性，推进与海上丝绸之路国家的城市合作，建立友好城市和城市间经济关系，在一些城市设立产业园区、经济试验区等。

（11）推进与东盟的金融合作和服务贸易自由化，创新外经贸体制机制，整合、提升各类海关特殊监管区。

（12）加强文化交流，推进媒体、文化产业、学术界、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之间的友好交流。将厦门海峡两岸文化博览会进一步拓展为福建、台湾、东盟和南亚四方参与的高层次文化交流博览盛会。

作者简介：

何军明，厦门理工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

发挥福建优势，为建设 21 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发力

陈天宇

内容摘要：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成为世界上最活络、最有价值的物流通道；将整合相关国家的港口城市，形成一条通过海路联系在一起珍珠串丝绸之路经济带；将彰显全球经济大背景下国与国之间和平相处的新理念。福建在构建海上丝绸之路中具有特殊地位：历史上，福建是海上丝绸之路保护神妈祖的故乡，福建提供了泉州港等一批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港口，福建人成为当年海上丝绸之路上勇敢的弄潮儿，福建还是当年海上丝绸之路船舶和商品的重要生产基地。福建为了尽快融入海上丝绸之路，必须加强设施建设，提高集散能力，为融入新海上丝绸之路奠定基础；必须发展优势产业，提升产品质量，为福建商品走向世界创造条件；必须激活海外资源，发挥乡亲作用，争取先发优势；必须培养各种人才，突出实用技能，为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人才储备。

关键词：福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建设

一、构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意义深远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自秦汉时期开通以来，一直是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往做出巨大贡献。

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 2013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访问东盟国家时提出来的。这是我国站在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十周年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上，为进一步深化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构建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双方乃至本地区人民的福祉而提出的战略构想。

2013 年 10 月 3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重要演讲时指出，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¹ 李克强总理在 2014 年 3 月 5 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我国“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²至此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和实施开始引起中外的高度重视。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它将传承古代海上丝绸之

¹习近平《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共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2013 年 10 月 03 日 12:40:51 来源：新华网

²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www.gov.cn 2014-03-14 17:02 来源：新华社

路的优良传统，成为连接亚洲与欧洲、非洲之间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友谊纽带，再现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但是，它绝不是古代丝绸之路的简单复制和再现，它是现代条件下沿途各国人民经济文化及其它领域沟通交往、互惠双赢的和平友好的桥梁。

(一)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成为未来世界上最活络、最有价值的物流通道。国际货物运输有多种方式，如海洋运输、铁路运输、航空运输、公路运输、运河运输、邮政运输、管道运输等。其中，海洋运输历史最悠久，占国际货物运输比重最大，所起的作用也最大。美国《航运杂志》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各种运输方式在国际运输中的比重大约是：海洋运输占 75%—80%，相邻国家之间陆上运输占 15%—20%，航空运输占 3%—4%，海洋运输是国际贸易中主要的运输方式，在国际贸易货物运输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所有的运输货物中，石油是远洋运输中最大的一宗，原油及油品占世界出口货运总量的 60%；其次是铁矿石、煤炭、谷物、铝土和磷灰石；再次是其他各类矿产品、各种日用工业品、机械产品和原料、燃料等。¹而这些正是这条海路上运输的主要货物。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头连着亚洲许多新兴市场国家，一头连着欧洲老牌的发达国家、非洲那片亟待开发的发展中国家，无疑将成为未来世界上极具潜力和活力的一条黄金水道。

(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整合相关国家的港口城市，形成一条通过海路联系在一起的珍珠串丝绸之路经济带。笔者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不应该只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事，也应该是海上丝绸之路题内应有之义。打造新“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珍珠串经济带有着坚实的经济基础。作为亚洲新兴市场国家，中国和东盟是地区乃至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的希望所在。中国同东盟携手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不仅将为双方发展提供广阔空间和不竭商机，也将为世界繁荣稳定作出更大贡献。当前，中国已成为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2012 年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额达 4000 多亿美元，是 10 年前的 6 倍；双向投资超过 1000 亿美元，是 10 年前的 4 倍。²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和发展将极大地促进中国和东盟之间双边贸易的快速发展。欧洲、非洲许多国家在新海上丝绸之路构建中也将发挥他们的巨大作用。位于新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各个国家的港口城市，都将随着新海上丝绸之路的活跃而被激活，也将在新海上丝绸之路的复兴中受益。漫长的新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那些不同国家的港口城市都将可能成为这条项链上闪闪发光的珍珠。

(三)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彰显全球经济大背景下世界国与国之间和平相处的新理念。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第八届泛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开幕大会主旨演讲中指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共同发展之路。“中国早期的改革开放主要是把自己的国家开放给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方面继续欢迎其他国家走进中国，更重要的是让中国走向世界。”郑永年认为，中国的资本走向世界，既不会走以前老殖民地主义的做法，到其他国家掠夺其他国家的资源，在其他国家开拓本国市场的商品，为本国开拓商品市场。他还认为“中国资本也不会走现在西方国家的路子，因为现在西方国家本身已经发展了，现在西方国家到发

¹ 《论海上战略通道的地位与作用》战略网《战略观察》战略观察文章
2012-5-14<http://observe.chinaiiss.com/html/20125/14/a4d5f4.html>

² 《李克强赴东亚系列峰会 专家析周边外交新局》中国新闻网 2013 年 10 月 09 日 11:01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3/10-09/5354170.shtml>

展中国家去投资有很多的人权、民主和政治条件。”¹郑永年教授的这种看法是符合我国和平发展战略实际的。习近平今年3月应德国科尔伯基金会邀请在柏林发表演讲时强调：“中国早就向世界郑重宣示：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中国对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发展走向的回应，更是中国人民对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自信和自觉。”“中国的发展绝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中国绝不作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²8月22日在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发表题为《守望相助，共创中蒙关系发展新时代》的重要演讲时，论及亚洲国家相处之道，强调互尊互信、聚同化异、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强调：“我们将继续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的政策，秉持亲、诚、惠、容的理念。”³我国的和平发展战略，就是希望走出一条大家共同发展的道路，不仅中国应该发展，其他国家也要发展，希望其他国家能分享我国发展所带来的好处。我国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所涉及的国家大部分还是发展中国家，有些甚至还是目前比较落后的国家。我国希望我们的发展能够带动这些国家的共同发展，争取得到一个双赢或者多赢的良好效果。走共同发展道路，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负责任的表现。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彰显了中国和平发展以及与其他国家之间和平相处的理念。这种理念一旦为相关国家及这些国家的人民所接受，将为世界未来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将造福于相关国家和人民。

二、福建在构建海上丝绸之路中的特殊地位

（一）福建是海上丝绸之路保护神妈祖的故乡

妈祖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发展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在妈祖信仰产生并逐步广泛传播后，海神妈祖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一种标志性力量。

1. 从妈祖信仰产生后，妈祖就成为古代往还于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航海者们的保护神。在科技相对比较落后的古代，远海航行历经千难万险，遭受种种磨难。因此，航海者祈求航海的安全，渴望得到神明的保护，是一种非常正常的心态。

妈祖信仰的出现，成为中华民族海神崇拜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中华民族的海神从虚幻的动物精灵或图腾转而由人担当；从男性转为女性。北宋以后，妈祖信仰自中国东南海岸一隅的福建莆田开始迅速传播，成为中国信众最多、影响最广的海洋女神，并远涉重洋——在五大洲落户，成为世界华人以及各地部分原住民共同信奉的海洋女神。

妈祖诞生地福建莆田湄洲湾本身就是一个临海港口，莆田与海上丝绸之路结缘较早。早在隋唐之际，就有莆田人远涉重洋的记载。莆田紧邻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出海口——泉州。频繁的海上活动和随时可能发生的海难，使得航海者渴望有一尊拔溺救难的海上保护神。在这种情况下，热心救助海难并最终在救助海难中献身的林默成为广大航海者及民众共同膜拜的海神。妈祖信仰产生后，随着闽籍船员的足迹遍布世界。正是中国海洋开拓事业的客观需要催生了海神妈祖，海神妈祖也因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而成为更多航海者的保护神，妈祖信仰也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拓展和

¹ 《携手推进泛北部湾合作，共建海上丝绸之路》新华网广西频道 www.gx.chinanews.com/s... 2014-05-15

² 《习近平在德国发表演讲 强调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2014年03月29日 05:46 中国新闻网

³ 《习近平在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发表演讲》人民网 2014.8.22. www.people.com.cn.

延伸而广泛传播。

2. 妈祖是中华海洋文明的象征。中国是一个具有和谐文化优良传统、和平发展法律基础和建设“和谐世界”发展战略的国家，一贯主张和平利用海洋，合作开发和保护海洋，公平解决海洋争端。中华海洋文明中，妈祖文化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妈祖信仰经过千年岁月的发展，特别经过历代皇帝对妈祖的褒封和推崇，影响力越来越大。明代郑和七下西洋，所到之处建了许多妈祖宫庙，更是在世界上弘扬了以妈祖文化为基础的中华海洋文明。妈祖精神体现了中华海洋文化的“和平”“和谐”“包容”精神。郑和七下西洋的28年间，始终奉行“共享太平之福”，推行亲仁善邻的对外政策，所到之处大力宣扬妈祖“仁、义、和、勇”的精神，树立了中国的和平友好形象，巩固和发展了中国与亚非三十多个国家的友好关系。¹妈祖文化代表的东方海洋文明，充分体现了平等自由、互惠双赢的和平特征，这与西方传说中的海神所具有的歧视、尚武、垄断、征服的特征相比较更能获得广泛的认同和接受。以妈祖文化为基础的中华海洋文明，证明了一种非掠夺、占领乃至杀戮的和谐共赢的海洋观存在的可能性。海上丝绸之路是亚欧非各国人民贸易与经济、文化与艺术、思想与观念以及生活习俗交流的重要通道，是东西方文明之间的物种传播之路，商贸流通之路，文化、艺术、宗教和科技交流之路，更是沿线诸国各族不断增进了解和友谊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见证了东亚、南亚、地中海地区、东非地区文明的兴衰变化，显著促进了东西方人类文明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3. 妈祖信仰是海内外华人文化认同的重要标志物之一。妈祖信仰已经成了海外华人“民族认同”的一种精神力量，通过妈祖信仰，海外华侨华人表现出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特有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时至今日，五大洲华人集聚的地方都有妈祖庙。据统计，全世界有妈祖宫庙数以万计，分布在33个国家和地区，信众超过2亿人，尤其是与我国毗邻的越南、菲律宾、日本、马来西亚、印尼、泰国等东南亚国家都建有妈祖宫庙。²2007年由中国侨联等主办的第三届湄洲妈祖·海峡论坛在莆田举行，来自13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名侨领及专家学者就论坛主题“妈祖文化与华侨华人”的讨论尤为引人注目。在讨论会上来自菲律宾中华总商会的卢祖荫指出：“海外的华人社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妈祖宫庙和同乡会馆或商会是一体的，妈祖庙不仅是当地华人社区的政治中心及社区中心，也是其精神支柱。”³妈祖信仰崇尚善与爱的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海外华侨华人将之扩展为“和平、和睦、和谐”。旅居海外的华人，身处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下，体认着中华文化的文化氛围，正是妈祖信仰促进了华人内部的团结和谐。妈祖精神成为凝聚海内外华人共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一条重要精神纽带。

4. 妈祖文化将成为联系、整合21世界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城市以及沿途各港口城市的精神纽带。随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启动，我国广州、汕头、湛江、北海、泉州、宁波、扬州、蓬莱、漳州等多个沿海城市表达了联合申报“海上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的意愿，这些城市都强调了妈祖宫庙在这些城市海洋事业发展中的作用，都在打妈祖牌。就以汕头来说，2014年4月15日，以“弘扬妈祖海洋文化精神，复兴汕头海上丝路传统”为主题的汕头市第二届妈祖文化节在红头船发祥地

¹ 《妈祖学概论》310页黄瑞国主编 人民出版社 ISBN 978-7-01-012294-6 2013NI年8月第一版

² 《妈祖学概论》144页黄瑞国主编 人民出版社 ISBN 978-7-01-012294-6 2013NI年8月第一版

³ 《千年妈祖对海外华人的重要意义》中国台湾网 2008-09-28 14:03 和平论坛

澄海樟林古港隆重举行，来自福建、台湾和汕头的妈祖组织在开幕式上缔结联谊。潮汕地区的妈祖是从福建湄洲湾传播来的，妈祖宫遍布潮汕的每个区县村落。潮汕至今的很多民俗都与妈祖信仰息息相关。¹由此可见妈祖文化在这些城市的影响力。

郑和七下西洋大大促进了妈祖文化的传播，在二十八年的时间内，郑和船队七次下西洋，每到一处码头，必先祭拜妈祖，如果碰到有些码头未建妈祖庙，便组织建造。²因此，妈祖文化也成为那些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和途经港口城市所共同拥有的文化遗产。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已经破题，在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建过程中，从福建传播出去的妈祖文化不会缺席，她必将成为一笔蕴藏丰富的优秀历史文化遗产，成为助推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巨大正能量。

（二）福建与海上丝绸之路其他方面的深厚渊源

历史上，福建除了为海上丝绸之路贡献了海上保护神妈祖之外，还基于自己的滨海优势，为海上丝绸之路做出了许多重要贡献。

1. 提供了泉州港等一批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港口

今天的福州、莆田、泉州、厦门、漳州等地，都以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而成为世界著名的“海丝之城”。宋初，随着以“福船”为标志的中国造船业发达与指南针等远航技术的完善，泉州凭借其优越的自然条件成为当时“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国际港口之一，成为当时中外经济、科技、文化交流的枢纽，号称东方第一大港。历史上，泉州的后诸港、福州的甘棠港、长乐的太平港、漳州的月港等，都曾在中国不同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上扮演重要角色。连江的定海古城、福州马尾的闽安古镇等一批古城古镇，至今还保留着当年“海上丝绸之路”出发地的历史风貌。

2. 福建人成为当年海上丝绸之路上勇敢的弄潮儿，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拓展与延伸做出杰出贡献

由于环境的影响，福建人自古就与大海结下了不解之缘。当年许多福建人或者成为商家，或者成为船家，或者成为水手，或者成为移民，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远涉重洋，闯荡世界，展现了福建人“爱拼才会赢”的精神风貌。他们中的不少人定居海外，还成为最早侨居海外的华侨华人。据不完全统计，现聚居于东南亚的 2000 多万华侨华人中，祖籍福建的就有 800 多万人，他们大多是不同历史时期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出去的福建人及其后裔。这些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播撒出去的种子，不少已长成大树，东盟全球 500 强华人企业中，福建籍的佔了近 200 家。³

改革开放以来，福建所拥有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这种特殊资源成为福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促进因素。福建引进的第一批外资企业，多半是当年从“海上丝绸之路”出去侨居东南亚的华侨后人的企业。依托“海上丝绸之路”的丰厚资源，福建诞生了中国大陆第一批侨资工业区。福建籍华侨华人凭借他们的爱国爱乡之情，不仅积极投资，而且大量捐资修建桥樑、道路、学校、医院、公园和其它各种基础设施，为福建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力支撑。

¹ 《汕头市成功举办第二届妈祖文化节》中国民族宗教网 | 发布日期：2014-04-30

² 《郑和下西洋与妈祖文化》海洋财富网 发布时间：2010 年 10 月 27 日

³ 《福建欲打造新海上丝绸之路 闽籍侨商开始双向投资》大公网 时间：2013-12-25 13:24:35

3. 福建还是当年海上丝绸之路之路上船舶和商品的重要生产基地，为中国商品走向世界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福建很早就有造船的历史记载。到唐代时，福州和泉州是南方的主要造船基地，造船技术有了明显的进步，《旧唐书》记载当时来往于福建与广东沿海之间的商船，最大的载重可达千石，即 50 至 60 吨。宋代“福船”更是抢净风头。历任北、南两朝的宋代全国漕运总管吕颐浩（1071—1139 年）在《论舟楫之利》中下过这样的结论：“南方木性与水相宜，故海舟以福建为上，广东、西船次之，温、明州船又次之。”¹

当年，福建的丝绸、瓷器、茶叶、漆器等物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运往各国，福建成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商品供应基地。当年武夷山的红茶成为英国皇室的最爱。福建的瓷器也蜚声海外，这已经为近年来海上考古所证明。比如，“南海一号”的打捞：1987 年，广州救捞局与英国海洋探测公司合作在广东台山与阳江交界的海域内寻找一条东印度公司的沉船行动中，意外在一条宋代商船中打捞出 200 多件绿釉小瓷盘、锡壶、青白釉瓷器盖等。经鉴定，这些瓷器主要是福建、浙江、江西等地出品的珍贵文物。2002 年 3 月至 5 月间，水下考古队再度下水，打捞出文物 4000 多件。其中以瓷器为主，都是从福建、江西等地著名窑口出产的高质量精品古瓷器，其中包括福建德化窑、磁灶窑、景德镇窑系及龙泉窑系的产品。²又如，中新网 2005 年 9 月 20 日报道，福建平潭“碗礁一号”考古发掘传出让人激动的消息：水下考古人员发掘出水了 55 件绘有欧洲风格纹饰的青花瓷盘，这再次证明：船上所运的是远销欧洲或中东等地区的外销瓷。福建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栗建安介绍，福建制瓷始于 1300 多年前的南朝，此后一直延续下去，技术不断更新。福建的瓷器品种齐全，青瓷、白瓷、青白瓷、青花、五彩等都很丰富，发展脉络清晰，在全国都属少见，而且大量是外销瓷。福建瓷器发展促进造船和航海技术进步。

三、福建在建设 21 世界海上丝绸之路中应当有新作为、大作为

（一）加强设施建设，提高集散能力，为融入海上丝绸之路奠定基础

福建省港口资源十分丰富，有着众多的优良深水港湾，可建设 10 级以上泊位的深水港湾 7 处，深水岸线 246.3 公里，可建设 20 至 50 万吨的超大型深水码头岸线约为 47 公里，大型深水港口岸线资源居全国首位。目前，福建省已拥有福州、厦门、泉州、漳州、莆田和宁德 6 个沿海港口，已建成多个国家一类开放海港口岸。³福建省沿海已经建成一批规模化、专业化和信息化程度较高的码头。目前应该进一步有机整合港口资源，合理调整港口结构，提高集约化水平，改善集疏运条件，发展临港产业，把福建港口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与此同时，应该加强路上交通硬件和软件建设，切实提升铁路、高速公路、公路运营水平，相信随着向莆铁路等陆路运输的畅通和成熟，福建与内陆腹地的交通还将更加便捷，福建沿海港口的货物集散能力还将不断加强。只要能紧紧抓住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大战略启动的良好机遇，我省的许多港口都将顺势而上，真正做大、做活、做强。

¹ 《闽南交通》2014 中华文本库 Chinadmd.Com

² 《交通部上半年开始在南海打捞北宋沉船 1 号》中国网 china.com.cn 时间：2007-01-16

³ 《福建省港口物流发展现状与对策》陆文杰 张正雄《物流技术》（国内统一刊号：42-1307/TB）2012 年 01 期

（二）发展优势产业，提升产品质量，为福建商品走向世界创造条件

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福建的商品生产和制造能力获得较快的发展。有些产品已经在国内拥有一定的份额。比如，福建是我国鞋产品生产和出口大省，居全国第二位，仅次于广东。福建省也是纺织服装出口大省。2012年出口纺织服装188.09亿美元，出口额居全国同类商品出口第5位。¹福建的一些并不为人注意的产品也异军突起。比如福建游艇出口约占全国三分之一，成为机电产品出口小亮点。²福建的电子产业也有一定的基础。福建还有许多传统出口商品在海外有一定的影响。新海上丝绸之路一旦打开国内外商品流通的通道，将会有更多的“中国制造”销售到东盟、西亚、欧洲、非洲各国。我省应当尽早规划，在发展优势产业的同时敏锐把握国际市场需求信息，谋求新兴产业的发展，争取成为更多的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外销商品的生产基地。

（三）激活海外资源，发挥乡亲作用，争取先发优势

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上各个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地区的福建籍华侨华人很多，这些华侨华人中有许多实力很强的企业家。目前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是，老一辈的华侨华人有一些已经谢世；还有一些年事已高，他们虽然对祖国对家乡感情很深，但已力有不逮。而年轻一代的华裔由于生于斯长于斯，尽管当年老一辈华人华侨希望他们的子孙了解祖国、熟悉故土，也曾带领他们回国寻根，但是这些年轻华裔对祖国的了解毕竟不多不深。新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将为我们提供一个与海外年轻一代华裔沟通、交流和经济互惠往来的机遇和平台。只要我们做好工作，今后，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过程中，这些华裔凭借他们在东盟各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基础，凭藉他们与祖国的血脉关系，将成为福建经济进一步提升的一种实力强劲推动力。可以相信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和繁荣，这些当年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出去的华侨华人的后裔将获得一次新的发展机遇。福建省也将由于这些海外乡亲的参与而在新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抢得先机。

（四）培养多种人才，突出实用技能，为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人才储备

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一旦得到各国响应并付诸实施，将需要并且会吸纳大量各种各样的人才。而这些人才有的本来就是我国比较稀缺的，有的可能因为还没得到足够重视尚未纳入培养计划。在这种情况下，谁把握先机，谁就将掌握拥有人才的主动权。目前国内外都已有识之士意识到这一点。今年9月15日，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共同主办的“汇商聚智 携手圆梦——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知名企业·专业人才交流会在南宁举行，在当天的交流会上，多个新加坡高校、企业与广西相关院校、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或备忘录，内容涉及中国—东盟金融与财税人才培养、特色中药研发推广、教育培训和高层次人才引进、旅游文化综合体项目、林木业产业园区建设等。新加坡南阳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刘宏就在会上大力争取人才培养和输送的机会，他说：“包括说冷产业的建设，包括说物流，包括经济园区，包括说这种新的管理方式，可持续发展等等这些领域，我们新加坡都有很多的优势。”³笔者认为，福建如果想尽快融入海上丝绸之路，并获得有利的地位，就必须在人才培养和储备方面未雨绸缪，

¹ 《福建省纺织服装出口基地发展现状调研报告》2013-09-04 10:20:13 福建省纺织服装出口基地商会秘书处

² 《福建游艇出口现状、市场前景与发展思考》<http://zhongguochuanbo.blog.china.com/index.html>) 中国船舶在线 2013-07-10 00:00:00

³ 《新加坡与中国加强人才合作 共建海上丝绸之路》2014-09-18 08:50:00 来源：新华网

当机立断，争取主动。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宏伟蓝图已经铺开，这对于我国沿海各省来说，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福建应当很好地发挥自己的优势，抓住这个机遇，千万不能坐失良机。

作者简介：

陈天宇，莆田学院妈祖文化研究院研究员，《妈祖学刊》常务副主编。

海上丝绸之路战略视角下福建省与新加坡合作 发展旅游文化创意产业对策研究

吴江秋

内容摘要：“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建已上升为国家战略，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正式组建，中国与东盟的国家的合作将迎来大发展。大力发展旅游文化创意产业，已成为当前实施产业升级换代的重要选择。福建与新加坡同处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本研究开创性地就双方合作发展旅游文化创意产业的可行性与必要性展开研究，将有助于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对促进福建省产业升级与经济增长、融入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海上丝绸之路 旅游文化创意产业 合作 对策

在全球化背景之下，转变观念并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社会各界思索之重点。传统的招商引资办法和经济发展思路很难继续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取得成功。与此同时，人们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与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之间出现了不小的落差，因此旅游产业与文化创意产业之融合将成为新时期新的经济增长点，前景广阔。旅游文化创意产业能够满足经济产业转型的战略要求，对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增加就业、改善生态环境等方面都有积极影响。其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日益突出，必将对优化旅游产业结构、提升旅游产业能级、促进旅游产业转型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因此，大力发展旅游文化创意产业，已成为当代实施产业升级换代的重要选择。

在不久前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提出了要打造“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正式组建，中国与东盟的国家的合作将迎来大发展。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福建，如何延续历史脉络、发挥沿海港口与华人华侨的优势、把握时机融入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促进福建与东盟国家产业合作，深入推进海峡蓝色经济试验区建设，是摆在福建省面前的一个重大战略课题。福建与新加坡同处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千百年来联系密切，文化相似，旅游资源丰富，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大背景下，双方合作发展文化旅游创意产业不仅有助于中国与东盟旅游业的合作与发展，而且对促进福建省的产业升级与经济增长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研究背景

(一) 福建省与海上丝绸之路

古代东西方交通有陆路和海路两途，1877 年普鲁士学者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echthofen)

将陆路通道称为“丝绸之路”(Silk Route),得到国际学术界广泛认同,后来海路则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¹。大量史实表明,人类从远古就开始对海洋充满着探求的热情,千百年来无数先辈冒着生命危险漂洋过海,通过海上的交通路线从事商贸、文化交流,并最终形成了举世闻名的海上丝绸之路。一般认为,海上丝绸之路分为两条路线:一条是从广西、广东、福建及浙江一带的港口出发面向东南亚、南亚乃至西亚;另一条是由渤海湾及东部沿海港口出发至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²。自古以来,福建的发展便与海上丝绸之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³,曾先后形成了福州、泉州、漳州、厦门四个著名的港口⁴,泉州更是被联合国认定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苏文菁指出:福建地处台湾海峡西岸,有规律的季风、太平洋西岸星罗棋布的岛屿以及洋流的作用,在以木质帆船为主的古代,都给闽人的航海带来很大的便利。远古时期,闽人是以无数生命的代价来换取对台湾海峡季风规律的掌握⁵。到了元大德8年(1304年),《大德南海志》开始记载从福建出海的一些航路,郑和七下西洋正是利用了这条闽船千百年来建立起来的航路网路。自199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考察以来,国内外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兴趣一直不减,福建也曾出版了《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论文集。众多专家学者从文化(詹艳⁶,2005)、旅游(黄华娟⁷,2006)、经贸(陈彤⁸,2007)、货币往来(蒋九如⁹,2012)等不同角度对福建与海丝绸之路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

(二)福建省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经贸历史十分悠久,早在秦汉时期就开辟了通往南海诸国(今东南亚各国)的海上贸易航线。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下同)正式组建,这是由中国和东盟10国共同组成的全球第三大自由贸易区,拥有19亿消费人口、近6万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和415万亿美元的贸易总额,是世界人口最多,由发展中国家/南南合作组成的最大自由贸易区¹⁰。福建与东盟已形成广泛而密切的贸易、投资、旅游、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关系。CAFTA启动对福建拓展经济空间,深化与东盟经贸关系,发挥侨的优势,推动实施海西战略有重要的意义。福建是我国著名侨乡,目前旅居东南亚的福建籍华人华侨逾800万人。由于经贸往来历史悠久,加之经济上互补性,福建一向把利用东盟资源列为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重点¹⁰。在中国与东盟国家深化合作的大背景下,不少学者对福建与东盟国家的产业合作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如王春丽¹¹(2012)认为福建作为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较发达省份,已经形成了有一定竞争力的制造业和初步发达的第三产业,而东盟十国的经济和产业发展水准各异,这使得福建与东盟国家之间具备可实现多方面产业

¹李庆新. 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几个问题[A]. 登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08:13.

²刘林智. 海上丝绸之路及其特色旅游资源开发[J].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04, 02:139-140.

³张明俊. 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在福建[J]. 海洋开发与管理, 1997, 04:73-75.

⁴陆芸. “海上丝绸之路”与福建建设海洋经济大省的研究[J]. 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 1997, 12:44.

⁵苏文菁. 论福建海洋文化的独特性[J]. 东南学术, 2008, 03:121-131.

⁶詹艳. 略论泉州“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J]. 黔东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5, 05:48-49.

⁷黄华娟. 发展独具特色的福建文化旅游产业[J]. 发展研究, 2006, 07:62-63.

⁸陈彤. 闽籍华商以及福建——东盟的农业经贸交流[J]. 亚太经济, 2007, 01:36-40.

⁹蒋九如. 福建海上丝绸之路的货币交往[J]. 福建金融, 2012, 07:48-51.

¹⁰福建社科院课题组, 李鸿阶, 林珊. 福建与东盟贸易现状与发展趋势研究[J]. 亚太经济, 2010, 06:154-158.

¹¹王春丽. CAFTA框架下深化福建与东盟产业合作问题研究[J]. 发展研究, 2012, 03:39-42.

互动的有利条件；促进福建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东盟国家实现产业合作，对加快福建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大有裨益。福建省社科院也组织专题课题组对福建与东盟国家的合作问题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得出了东盟的贸易地位和作用不断提升、福建对东盟的贸易集中度不断提高、双边贸易结构不断优化等结论；对于福建与东盟的旅游合作，课题组认为由于地缘、亲缘等关系，东盟一直是福建省的传统旅游市场和出境旅游的首选地，CAFTA 启动后，东盟将继续成为福建省重要的旅游市场。

（三）福建省与新加坡的经贸往来

在东盟十国中，新加坡无疑与福建关系最为密切，目前新加坡众人口中 76% 为华人，其中 60% 又为福建籍，涉足经济、教育、慈善等领域，新加坡历史上的名人陈嘉庚、李光前都是福建人。新加坡驻厦门总领事馆总领事郑美乐总结指出福建与新加坡的地缘近、血缘亲、文缘深、商缘广、神缘同。早在 17 世纪开始福建商人与劳工就通过海路前往新加坡，有力地支援了当时新加坡的建设，掀起了中国与新加坡商贸的序幕。改革开放后，大量闽籍企业家纷纷回家乡投资建设，为我省的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而当前已有超过 20 家福建籍企业选择在新加坡上市，可以说，福建省与新加坡的经贸旅游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与扎实的基础¹。但现有文献中仅有少量有关福建与新加坡的经贸问题（如唐帆、陶红军，2009）²散见于福建与东盟国家的合作研讨性文章中，双方产业合作的研究成果较为欠缺。

二、福建省发展旅游文化创意产业的必要性

（一）旅游文化创意产业

旅游文化创意产业是文化创意产业和旅游业的新型结合，文化创意产业赋予旅游文化差异性、提升了旅游业的文化内涵；旅游业的发展又为文化创意产业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和消费空间。文化创意产业与旅游业实行有效、系统、深度的融合发展，可以顾客为中心进行价值创新，并充分发挥旅游产业的关联带动效应，延伸和拓展价值链，实现价值体系的整体增值，助力区域经济的发展。当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当代经济发展的主流观念，旅游产业与文化创意产业之融合将成为新时期新的经济增长点³。旅游文化创意产业能够满足经济产业转型的战略要求，对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增加就业、改善生态环境等方面都有积极影响（邵永平⁵，2012；李霞⁶，2013 等）。当前学界对于旅游文化创意产业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已达到共识，但研究主要集中于某个具体地区的产业发展^{7、8、9}，还未就区域间的产业合作进入深入研讨，区域间的旅游文化创意产业合作尤其是跨国之间的合作缺乏理论成果与成功案例，本研究将有助于填补这一空白。

¹ 时报记者 张伟伟，叶媛媛。“努力开创新加坡福建经贸往来新纪元”[N]. 福建工商时报，2009-04-15001.

² 唐帆，陶红军。CAFTA 条件下福建对东盟贸易竞争力分析——以东盟四国（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为例[J]. 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2:55-59.

³ 杨娇。旅游产业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的研究[D]. 浙江工商大学，2008.

⁴ 李洋洋。我国文化创意产业与旅游业融合模式研究[D].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2010.

⁵ 邵永平。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民俗旅游文化创意产业培育探析[J]. 中共伊犁州委党校学报，2012，01:50-52.

⁶ 李霞。文化创意产业与乡村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研究[D]. 河南大学，2013.

⁷ 赵立禄，段文军，牛洪霞。桂林旅游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研究[J]. 市场论坛，2010，07:76-78.

⁸ 王丽，王芳，丁红娟。南京市旅游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瓶颈与对策[J]. 科技创新导报，2011，33:178-180.

⁹ 李萌。基于文化创意视角的上海文化旅游研究[D]. 复旦大学，2011.

（二）发展旅游文化创意产业是福建省经济发展的机遇

当今世界，文化创意不再只是一个理念，而是一个崭新的产业发展模式。旅游产业因其文化性、体验性和参与性的特征，能够与文化创意产业完美融合。福建省的旅游业经历了近年来的快速发展，已经具备了与文化创意产业有机融合的基本条件。创意产业的思维方式和发展模式对重塑旅游业的产业体系将会产生革命性的影响。创意产业所具有的创新性、渗透性、高增值力、强辐射力和高科技含量的特征，将为旅游业注入持续发展的生机和动力。可以预见，旅游产业与创意产业的融合发展将是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必将对优化旅游产业结构、提升旅游产业能级、促进旅游产业转型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福建省应当根据市场需求和产业发展状况，充分发挥福建省的文化、科技和人才优势，研究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的经验，突出本省地域特点，整合文化资源，加快产业发展，促进福建省文化创意产业的大发展，实现福建省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提升福建省的文化竞争力，落实科技兴闽、人才强省计画。

三、福建省与新加坡合作发展旅游文化创意产业的可行性

（一）福建省产业发展基础

福建发展旅游业具有良好的资源条件。福建人文荟萃、山川秀丽、生态良好，旅游资源富集、资源禀赋高；且地处东南沿海，地理区位和交通优势明显，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发展旅游业具有坚实的基础。文化创意产业是由文化、智力、科技及全球化等因素相互渗透、深度交融而成的高端产业集群，目前正在中国蓬勃兴起，它是传统文化产业在当今时代发展的新形态，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动力。作为文化资源大省和科教人才大省，福建的文化创意产业取得了长足发展，为后期的资源整合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具备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独特优势。但福建省也存在旅游景点深度开发不足，缺乏创意性开发的实际情况。

（二）新加坡发展旅游文化创意产业的优势

长期以来，新加坡在旅游综合开发、文化创意、艺术设计以及新媒体等产业方面高速发展。新加坡在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方面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拥有易于移植的先进经验和科学模式；新加坡又是文化创意产业人才聚集中心，具有促成构建创意经济系统的丰富人才资源、庞大的企业网路、成熟的“创意生活圈”培育机制；新加坡还是“文艺复兴城市”+“全球文化和设计业中心”+“全球媒体中心”，建立了完整的文化创意产业延伸链。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旅游文化创意产业成为新加坡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新引擎，目前新加坡更已成为亚洲创意枢纽，并极大地提升了国家和城市的创新能力。

（三）闽新合作的预期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福建省与新加坡的深度合作能够带来的效益主要有四大点：第一，率先在全国与境外开展大规模的旅游文化创意产业合作开发，产业的选择和发展不仅十分切合两型社会建设的需要，而且还有利于探索精神文明建设 with 新兴产业协调发展的新路子；第二，集团式的引进国外资本，并且引进的资本与国内资本的结合可以形成福建省经济发展的引擎，保守估计将会为福建省带来至少 2000 亿人民币以上的外来投资，提供至少 50 万个工作机会。此外，闽新合作的新闻效应与品牌价值也都不可估量；第三，藉由这种国际合作项目所带来的国际商务平台，可以大大提高福建省的经济外向度与

商业知名度，真正实现在全球范围内的定向招商，从而使得资源与产业在福建省可以更好地形成集聚；第四，这一国际合作专案也可以引入新加坡或境外先进的园区设计、开发与管理经验，使得福建省极大地改善投资的软环境与硬环境。

综上，福建省融入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及其与东盟国家特别是与新加坡的合作方面已有良好的基础，福建省与新加坡旅游投资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合作极具可行性与必要性。闽新合作开发旅游文化创意产业是福建省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福建省可借鉴新加坡方面的经验，不断完善文化创意产业的产业链，各产业间相互支撑，互为供给，构成基础环境成熟、运作机制适宜、产业结构完整的产业链，使福建文化创意产业发挥集群效应。双方的合作将可以打造福建省的“大旅游产业”，最终达到提升福建省旅游产业发展层次与扩大经济规模的目的，成为以旅游为主的文化战略产业的全国标杆。此项目还将助力福建省的精神文明建设和谐社会的建构，提升福建省的文化竞争力和深入贯彻落实科教兴省和人才强省战略。有鉴于此，我们建议福建省政府通过与新加坡展开深度合作，积极探索并快速启动福建省的经济和社会发轫转型之路，形成对全国经济和社会发轫转型具有借鉴意义的福建发展模式。

四、福建与新加坡合作发展旅游文化创意产业的思路

经过前期的研究，笔者认为福建省政府应尽快与新加坡政府签订一个产业合作的框架性协定。在此协定下，双方合作的内容主要包括两项：一方面，福建省与新加坡合作建立一个类似于苏州工业园的高科技园区的旅游文化创意产业园。该园区重点发展旅游和文化创意产业，通过引入新加坡专业的综合旅游开发和文化创意企业，对福建省的旅游和文化资源进行战略性开发与全面系统的整合，做大做强福建省的旅游和文化创意产业。这将为开辟中新两国在其它经济领域合作奠定基础。另一方面是要认真学习新加坡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管理方面的经验，通过各种方式培养和吸引福建省所需要的各类人才。

（一）与新加坡政府签订合作框架协议

目前新加坡在中国东南部地区尚没有形成具规模的经济布局，客观上来说许多新加坡企业在东南部地区也有投资的需要和兴趣，因此福建省应该尽快行动起来，防止其它省份抢占先机。要借助和动员新加坡政府的中国事务智库以及新加坡中国商会旗下企业的力量，去游说新加坡政府及其国有企业支援与福建省签订合作框架协议。

（二）启动旅游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战略

在签订合作框架协议之后，福建省和新加坡方将展开具体的可行性研究与双边磋商。双方合作重点应考虑以下两大产业发展方向：旅游综合开发、文化创意产业。根据新加坡的产业优势与福建省现有的资源和产业条件，我们建议依托福建省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重点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增强旅游综合开发和文化创意产业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在福建省全省形成以旅游综合开发为主导、文化创意产业为支撑的产业结构。

（三）以旅游文化创意产业为契机，深化闽新其它产业合作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与新加坡在旅游文化创意产业方面的合作只是一个手段，并非目的。我们的目的是藉由闽新国际合作项目所带来的国际商务平台，增强资源整合与资源集聚的效应，实现福

建省在全球范围内的定向招商，提升福建省的经济发展水准。为此，除了在闽新合作中学习新加坡先进的园区建设和管理经验之外，我们要在此商务平台基础上，深化闽新其它产业合作。大力引入和发展专业的孵化器与加速器，并在投融资等方面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好的发展软环境，这一方面是为了更好的鼓励企业创新，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培育本地的龙头企业，多管齐下方能实现真正的发展壮大与资源整合。

**The Research on the Cooperation Strategy of Tourism and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y
between Fujian Province and Singapore in the View of Maritime Silk Road Strategy**

Jiangqiu WU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Jimei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Maritime Silk Road in 21 Century" has risen as a national strategy, with the "Chinese - ASEAN Free Trade Area (CAFTA)" was formally established, Chinese-ASEAN countries' cooperation will get great development. To develop the tourism and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hoice of industrial upgrading. Fujian and Singapore are both in the Maritim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this research creatively focuses on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ourism and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ies in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will help China cooperate with ASEAN countries in economic and trade area, and it has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Fujian Province to promote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economic growth, integrate into the Maritime Silk Road economy belt.

Key words: Maritime Silk Road; Tourism and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y; Cooperation; Strategy

作者简介:

吴江秋，集美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海上丝绸之路与建设福建省

海洋经济强省研究

杨诗源

内容摘要：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尤其是在我国改革开放总体方针的指导下，沿海城市成为对外开放的主力军。为了有效地助推经济的发展，我国加大了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力度，充分肯定了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地位。对此，作为沿海省份的福建，应以海上丝绸之路为新的发展征程，充分利用各种有利的海洋资源优势，向海洋经济强省目标发展。在此背景下，文章进行了海上丝绸之路与建设福建省海洋经济强省研究，认为海上丝绸之路有利于福建省海上对外贸易和海上渔业经济的发展、开放型海洋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和本土企业的跨国发展，并提出从政策扶持、人才培养、对外合作、专业化组织引导等方面的针对性策略，促进福建省更好地抓住海上丝绸之路的优先发展机遇，推动海洋经济的发展，建设福建省海峡蓝色经济试验区，提升福建省海洋经济整体竞争力，从而更好地带动福建省整体经济的发展以及繁荣与稳定，为中国梦的实现贡献力量。

关键词：海上丝绸之路 海洋经济 策略 福建省

一、问题的提出

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尤其是在我国改革开放总方针的指导下，沿海城市成为对外开放的主力军。海上丝绸之路是指通过海洋运输来实现贸易往来的交易路线，该路线是对陆路贸易的一种有效的延伸。海上丝绸之路最早源于我国秦汉时期，在三国时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在明朝最为繁盛，尤其是郑和下西洋，有力地推动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为我国与世界各国贸易往来发挥出了重要的作用。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力度的不断加大以及为了有效地助推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加大了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力度，充分肯定了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地位。在 2013 年 11 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该决定指出加快延边开放步伐，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从这些政策中，可以反映出我国对加快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关注力度，体现出了海上丝绸之路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具有的重要地位。对此，作为沿海省份的福建，应抢抓机遇，利用海上丝绸之路的优势发展海洋经济，力争成为海洋经济强省。

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对福建省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福建省海峡蓝色经济试验区发展规划和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总体方案指出,力争到 2015 年全省海洋生产总值达到 7300 亿元,近岸海域清洁、较清洁水面达 65%以上,提高海洋开发、控制、综合管理能力,着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积极探索海洋经济发展的新思路、新模式、新方法,推动海洋经济发展试点取得明显成效,努力把福建海峡蓝色经济试验区建设成为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海洋经济科学发展示范区,从而实现海洋经济强省的目标。¹从中,可以反映出福建省对加快海洋经济发展的坚定决心。而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为我国打通另一条对外贸易的海上通道,也为福建省建设海洋经济强省带来了新的契机,还为加强对外贸易注入了强劲的发展动力。²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对福建省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表现如下:

(一) 促进福建省海上对外贸易的发展

海上丝绸之路,为福建省对外贸易往来开辟了另一条海上国际运输通道,构建“海丝之路”对外贸易平台,促进货物自由贸易和要素自由流动,加快福建省与东北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东非沿海各国的合作与交流,与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建立海洋贸易合作伙伴关系,学习借鉴国外更多的先进管理经验、引进先进技术等,有效地提升对外商品、服务和技术贸易的额度与效率,拓展海上对外贸易的深度和广度,提升福建省海洋经济发展的整体速度。

(二) 助力福建省海洋渔业经济的发展

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带动下,福建省可以充分地利用海洋资源,加大对海洋渔业经济的发展,联合国外的力量共同开发海洋渔业资源,大力发展远洋渔业,组建跨区域的现代化远洋捕捞船队,建成一批境外远洋渔业生产基地、冷藏加工基地和服务保障平台,推动福建省海洋渔业经济的发展。相比陆地渔业经济而言,海洋有着丰富的渔业资源,对于福建省海洋渔业经济的发展而言,将会带来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³。

(三) 提升开放型海洋经济发展水平

借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加强福建省海洋国际合作与区域,拓展对外对内开放的广度与深度。一是积极引导和鼓励境外的资金、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投向海洋资源深度开发、海洋新兴产业和现代海洋服务业等领域,规划建设一批海洋新兴产业国际合作园区,营造福建海洋经济对外合作的良好环境;二是积极推动区域联合开发海洋矿产资源或参与境外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将福建省建成国家进口能源资源储备基地;三是大力开拓利用海外市场,建设一批出口渔业产品质量安全示范项目和园区,扩大航运、养殖、修造船等劳务技术输出;四是加快建立现代航运服务体系,利用海上丝绸之路开辟新的国际航线,推进厦门港、福州港、泉州港的国际航运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

(四) 助推福建省内企业向跨国企业发展壮大

随着国内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国外市场为福建省内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福建省应充分发挥海上丝绸之路优势,鼓励沿海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建立境外生产、营销和服务网络,

¹ 福建发力海洋经济,奏响“蓝色畅想曲”.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2-06/07/c_112145781.htm

² 何秀玲. 推动福建省海洋经济科学发展研究[J]. 亚太经济, 2013 (11).

³ 胡守贤. 浅析福建海洋强省发展战略[J]. 科技信息, 2011 (6).

促进互补资源的跨区流动，畅通渠道，将企业的业务延伸到国外，推动省内企业向跨国企业方向发展壮大。此外，在推动省内企业向跨国企业方向发展过程中，还可以有效地吸收一些国外的优秀经验，为福建省带来更为充足的国外资源，拓宽国外市场，为福建省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为福建省海洋经济建设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三、福建省利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的策略

（一）制定适合海洋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

扶持政策的出台可以为海洋经济建设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进而推动海洋经济建设快速发展。在利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海洋经济强省方面，可以通过制定符合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海洋经济的扶持政策，从政策引导角度为海洋经济建设提供发展动力。

一是制定相应的海洋经济发展税收优惠政策。在海上丝绸之路海洋经济强省建设方面，福建省政府可以制定相应的海洋经济发展税收优惠政策，对来福建投资的国内外企业给予相应的税收优惠，降低这些企业在开发海洋产业方面的经营成本，从而帮助这些企业将更多的资金运用到产业发展当中，共同助推福建海洋经济的发展¹。

二是制定促进海洋经济发展的资源支持政策。经过多年的发展，福建省在海洋经济发展方面有了一定的基础，无论是在人力、物力等资源方面都有着一定的优势。在推动海洋经济发展方面，福建省可以为来本地投资海洋产业的企业提供相应的资源政策，借助福建本地的各种资源以及政府力量，为这些企业开展海洋业务提供相应的人力、物力，从而推动福建省在海洋产业领域的发展。

三是制定海洋经济发展互助政策。在福建省海洋经济建设方面，不同的企业，由于发展规模与资金实力不同，使得企业在海洋产业方面的发展往往存在着一定的困难，使得海洋经济建设受到相应的影响。针对这些问题，福建省可以出台相应的海洋经济发展互助政策，将大型企业与小型企业进行合理组合，协同发展，形成互助发展的局面。并制定相应的奖励政策，对在互助中取得明显成效的企业，给予相应的奖励，并将其中的优秀经验进行推广，从整体上提高福建省海洋经济建设实力。

（二）加大对海洋经济发展领域人才的培养力度

尽管在海洋经济发展领域，我国有了多年的探索，但是相比陆地经济发展而言，海洋经济发展领域仍然较为薄弱，尤其是在人才建设方面，还存在着非常大的提升空间。由此，在利用海洋丝绸之路建设海洋经济强省方面，福建省可以通过加大对海洋经济发展领域人才的培养力度，进而为海洋经济的发展奠定人才基础。福建省可以采取如下措施：

一是成立海洋人才培养基地，为海洋经济发展提供人才保障。福建省可以利用政府和当地高等院校的力量，共同成立海洋人才培养基地，从全国各大高校招收有志于从事海洋经济发展研究的学生，并采用免费培养的方式，通过技能培训与理论知识培训的形式，培养更多的海洋专业性人才，为福建省海洋经济产业的发展输送源源不断的人才，进而推动海洋经济发展¹。

二是成立海洋专业性的社会培训机构。在福建省政府的主导下，利用福建省内海洋领域的企业

¹张开城.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广东响应[J]. 南方论刊, 2014(7).

¹林泓. 经济转型升级背景下福建省海洋文化产业发展研究[J]. 台湾农业探索, 2014(4).

与高等院校的力量，成立海洋专业性的社会培训机构。由这一类型的社会培训机构为有志于海洋产业建设的青年提供相应的培训，包括海洋领域的相关知识、对外交往技能等，同时还可以为一些规模较小的涉及海洋业务的企业员工提供相应的培训，以提高海洋领域企业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促进福建省海洋经济发展的竞争实力的提升，带动海洋经济发展²。

三是定期选派海洋建设的骨干人才到国外进修学习。福建省每年在全省范围内选出一定数量的海洋建设工作人员，分别安排到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进行学习深造，从而学习国外在海洋经济建设方面的优秀经验，将这些优秀经验运用到福建省海洋经济建设方面，为福建省海洋经济建设提供充足的人才资源³。

（三）构建省内与海洋周边国家之间的合作平台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大环境中，福建省应抓住海上丝绸之路的机遇深化与海洋周边国家深化交流合作为发展契机，进而寻求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的发展路径。由此，福建省应着力构建省内与海洋周边国家间的合作平台，促进海洋经济发展的对外交流与合作。

一是成立涉外海洋合作组织，通过组织的方式推动省内与海洋周边国家之间的合作。福建省可以利用民间力量，在众多的海洋类企业中选出具有代表性的企业，成立涉外海洋合作组织。由涉外海洋合作组织负责内外联络事宜，包括与海洋周边国家的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并将相关的需求信息及时反馈给省内海洋类企业，为省内海洋类企业开展涉外业务提供相应的帮助与指导⁴。与此同时，涉外组织在强化与周边国家相关企业进行合作与交流时，将省内的海洋类企业推荐给这些国家的相关企业，进而促进省内企业与海洋周边国家的相关企业之间的合作，进而为二者的合作搭建良好的合作平台。

二是构建网络合作平台，并在海洋周边国家成立分部，促进省内与海洋周边国家之间的合作。为了有效地节省省内与海洋周边国家加强交流与合作的成本，提高合作的实效性，福建省可以通过构建网络合作平台的方式，利用现代网络技术，为省内与海洋周边国家提供合作平台。在这一方面，福建省可以构建国际电子商务网络合作平台，专门以海洋经济发展为重点，发布省内与海洋周边国家的相关信息，包括企业信息、招商引资信息、供需信息等，并在海洋周边国家成立分部，通过网络合作平台加快省内与海洋周边国家之间的合作。

（四）提升福建省海洋经济建设的影响力

随着世界各国对海洋领域的关注，海洋经济发展方面的竞争也会随之不断加大。针对这种竞争局面，福建省在海洋经济发展方面，可以通过扩大宣传范围的方式，提高海洋经济建设的影响力，赢得海洋经济的发展。针对这一点，福建省可以采取如下措施：

一是构建海上丝绸之路公共资源宣传平台，扩大宣传范围。福建省可以利用各种有效的资源，构建海上丝绸之路公共资源宣传平台，如福建省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网站、福建省海上丝绸之路经济

² 苏文著，薛历美. 福建省海洋经济发展现状与若干模式研究—兼论海洋文化在建设海洋经济中的重要作用[J]. 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3（4）.

³ 王开明. 福建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的战略思考[J]. 福建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2）.

⁴ 王人尚. 福建海洋文化资源开发研究[D]. 福建农林大学，2013.

建设展示窗等。通过这些公共资源宣传平台，重点宣传福建省在利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海洋经济强省方面的精神风貌，展现福建海洋经济的发展特色等，以此来更好地吸引国内外的投资者，参与福建省海洋经济建设。

二是开展种类多样的海上丝绸之路活动，提高福建省海洋经济建设的影响力。在扩大宣传范围方面，福建省可以通过开展种类多样的海上丝绸之路活动来实现宣传的目的，如大型文艺汇演、海上丝绸之路寻梦联谊活动、海上丝绸之路征文活动、海上丝绸之路微电影大赛等。通过这些种类多样的海上丝绸之路活动，更好地展现出福建省海洋经济建设强省的特色，吸引国内国外更多企业家、投资者等群体的关注，进而更好地提高福建省海洋经济建设的影响力，充分地利用这些群体的力量为建设福建海洋经济强省添砖加瓦。

（五）增强福建省海洋经济发展机构的专业化

海洋经济建设，并不是短时间就能够得到实现的，需要建立在长远的战略规划基础上，步步为营，进而实现最终的发展。在利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海洋经济强省方面，福建省可以通过成立海洋经济发展组织的方式，为海洋经济发展提供专业化指导，推动福建省海洋经济建设的长远发展。福建省应由政府牵头联合高等院校和大中型企业成立专业的海洋经济发展组织机构，由这一组织机构专门负责从战略规划的角度开展海洋经济发展的研究，并针对福建省各个时期在海洋经济方面的建设情况，推出针对性的发展项目，为海洋经济发展提供专业化的指导以及可以执行的发展项目，从而推动福建省海洋经济发展向战略化发展转变。在海洋经济发展组织机构的日常运营中，福建省政府持续加大投资力度，从多个方面进行引导，发挥出海洋经济发展组织机构的作用，使之不仅能够有效地执行政府在海洋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措施，还能够充分地集合各种社会力量，共同为福建省海洋经济建设建言献策，共同打造福建海洋经济强省。

四、结语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为深化我国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新形势下，福建省应以海上丝绸之路为新的发展征程，充分利用各种有利的海洋资源优势，向海洋经济强省目标发展。由此，文章探讨了以海上丝绸之路与建设福建省海洋经济强省，认为海上丝绸之路有利于福建省海上对外贸易的发展、海上渔业经济的发展、开放型海洋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和本土企业的跨国发展，提出福建省可以从政策扶持、人才培养、对外合作、专业化组织引导等方面采取针对性的策略，更好地抓住海上丝绸之路中的机遇，推动海洋经济的发展，从而更好地带动福建省整体经济的发展以及繁荣与稳定，从而为中国梦的实现贡献力量。

作者简介：

杨诗源（1983—），男，汉，福建泉州人，泉州师范学院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海洋经济发展研究。

海上丝绸之路与福建海洋经济

互补性发展研究

易小丽

内容摘要: 本文通过对福建省海洋经济发展现状的研究,对海洋经济同构化状况进行系统评估,揭示福建海洋产业发展趋同、产业结构单一等问题状况,并提出借助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重构海洋经济利益格局、解决福建海洋产业结构趋同化问题的互补性发展格局,为提高福建海洋资源的配置效率和海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提供决策参考。

关键字: 海上丝绸之路 同构化问题 互补性发展

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增长,陆域资源、能源和空间的压力与日俱增,人类已将社会经济发展的视野逐渐转向资源丰富、地域广袤的海洋世界。福建是海洋大省,无论从区位还是资源,福建发展海洋经济都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事实上,海洋经济近年来所取得的显著成就,也对福建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对于提高国民经济综合竞争力,增强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2013 年 10 月,“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提出,将海洋经济的发展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建设海洋强国已成为国家的发展战略。福建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发祥地,应充分发挥其优势,抓住机遇,为实施国家海洋发展战略做出积极贡献。

一、福建海洋经济的发展现状

(一) 福建省海洋经济的总体发展状况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在福建省委、省政府一系列重大决策的推动下,福建海洋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海洋综合经济实力迅速提升,海洋经济在国民经济的作用日益凸显。从海洋生产总值看,2011 年海洋生产总值达 4284.0 亿元,海洋经济总规模居全国第五位,仅次于广东、山东、上海和浙江。与 2008 年相比,海洋生产总值增长了 59.36%,海洋经济已成为拉动福建国民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从海洋生产总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看,2008-2011 年海洋生产总值占福建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维持为 25%左右,海洋经济生产总值已占据福建地区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是福建地区生产总值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福建省海洋产业结构的发展状况

在海洋产业多元化、国际化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推动作用下,福建海洋产业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

化，即第一产业比重有所下降，第二产业迅速发展，第三产业发展稳定，海洋产业结构呈现出不断优化升级的趋势。2008年，福建海洋三次产业结构为9.4:40.8:49.8，到2011年，三次产业结构为8.4:43.6:48.0，呈现出三二一的产业分布格局（详见表1）。产业结构数据表明，福建海洋经济已形成了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产业门类在不断增多，海洋经济正在从资源开发型向服务型转变。

与其他沿海省市相比，福建海洋产业结构发展方向趋于合理化，从表2可以看出，除了天津、河北、江苏和山东，其他沿海省市海洋产业结构均呈现出三二一的发展格局，基本符合产业结构发展的规律。然而，产业结构变化的趋同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导致大量的重复建设。自2010年国务院批准同意山东、浙江、广东为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试点省份后，2012年、2013年先后批准福建、天津为海洋经济发展试点省份，获批省市制定了一系列海洋经济发展规划，各省市都把发展壮大第三产业作为发展海洋经济的重点，盲目追求“大而全”的发展模式，最终导致结构性产能过剩凸显。可见，海洋产业同构化问题日益成为制约福建海洋产业升级优化和海洋经济合作发展的因素之一。

表1 2008-2011年福建海洋产业结构（单位：亿元）

年份	海洋生产总值	占GDP比重	海洋第一产业		海洋第二产业		海洋第三产业	
			总值	比重	总值	比重	总值	比重
2008	2688.2	24.8%	252.0	9.4%	1097.7	40.8%	1338.5	49.8%
2009	3202.9	26.2%	272.1	8.5%	1408.9	44.0%	1521.9	47.5%
2010	3682.9	25.0%	317.7	8.6%	1602.5	43.5%	1762.7	47.9%
2011	4284.0	24.4%	361.4	8.4%	1866.0	43.6%	2056.6	48.0%

（数据来源：《中国海洋统计年鉴》2009-2012年。）

表2 2011年福建和其他沿海省市海洋三次产业结构比较（单位：%）

	福建	天津	河北	辽宁	上海	江苏	浙江	山东	广东	广西	海南
海洋第一产业	8.4	0.2	4.2	13.1	0.1	3.2	7.7	6.7	2.5	20.7	20.2
海洋第二产业	43.6	68.5	56.1	43.2	39.1	54.0	44.6	49.3	46.9	37.6	19.9
海洋第三产业	48.0	31.3	39.7	43.7	60.8	42.8	47.7	43.9	50.6	41.8	59.9

（数据来源：《中国海洋统计年鉴》2012年。）

二、福建海洋经济同构化问题分析

海洋产业发展的现状表明，海洋经济发展存在严重的产业同质与同构化，即各地区海洋产业结构变动呈现出不断增强的区域间结构的高度相似趋势。目前，比较常用的产业同构测度方法主要有结构相似系数、结构差异度指数、结构重合度指数、区位商指数、简单相关系数。其中，最为广泛使用的是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提出的结构相似系数。接下来本文将利用相似系数和产业结构熵数来判断福建海洋经济同构化的程度。

(一) 基于相似系数的福建海洋经济同构化问题分析

1. 福建海洋经济同构化的静态特征

产业结构相似系数是研究区域产业“同构化”问题的基本方法，该系数从总体上反映了地区间产业结构的相似或差异程度。产业结构相似系数计算公式为：

$$S_{ij} = \frac{\sum_{k=1}^n x_{ik} \cdot x_{jk}}{\sqrt{\sum_{k=1}^n x_{ik}^2 \cdot \sum_{k=1}^n x_{jk}^2}} \quad (1)$$

其中 i 和 j 表示两个区域， x_{ik} 、 x_{jk} 分别表示部门 k 在区域 i 和区域 j 的产业结构中所占比重， S_{ij} 的值介于 0 和 1 之间。当 $S_{ij}=1$ 时，说明两个区域的海洋产业结构完全相同；当 $S_{ij}=0$ 时，说明两个区域的海洋产业结构完全不同。如果两个地区的海洋产业结构相似系数高，则说明两个地区的海洋产业结构趋同，存在重复建设、重复生产的问题。从动态来看，如果相似系数趋于上升，则两地区的产业结构趋于相同；如果相似系数趋于下降，则两地区的产业结构趋异。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采用 2011 年福建和其他沿海省市的海洋经济数据，以此计算产业的相似系数。经计算，2011 年福建与其他沿海省市的海洋产业相似程度的结果为表 3。产业结构趋同是产业整体布局不合理的表现之一。通过海洋产业相似系数的分析，可以归纳出福建海洋经济同构化的特征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福建与其他沿海省市海洋经济三次产业结构相似系数超过 0.9，海洋经济“同构化”非常明显。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认为，在一国各地区之间经济结构相似程度进行比较时，可以将 0.90 作为界限，当两个地区之间的相似系数超过 0.90 时，表明这两个地区产业结构趋于相同。从表 3 可以看出，福建与其他沿海省市的海洋经济三次产业结构相似系数都在 0.9 以上。其中，福建和浙江之间的相似系数达到了 0.999。也就是说，与其他沿海省市相比，福建海洋经济趋同程度非常高。第二，福建海洋产业重叠明显。以海洋主要产业和相关产业所占比重计算的相关系数显示，福建与其他沿海省市的海洋主要产业和相关产业相似系数都在 0.9 以上，这意味着在福建海洋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不仅存在海洋经济三次产业结构相似或趋同的问题，而且还面临海洋及相关产业高度重叠的问题。

表 3 2011 年福建与其他沿海省市海洋产业相似系数

地区	天津	河北	辽宁	上海	江苏	浙江	山东	广东	广西	海南
三次产业结构	0.912	0.974	0.996	0.978	0.983	0.999	0.994	0.996	0.975	0.903
海洋及相关产业	0.962	0.983	0.976	0.992	0.997	0.998	0.995	0.976	0.963	0.932

(数据来源：经作者计算得到。)

2. 福建海洋经济同构化的动态特征

为了进一步刻画福建海洋产业所存在的同构化问题，接下来本文将计算 2008-2011 年期间的福建与其他沿海省市的三次产业结构相似系数的变化，深入分析区域海洋经济同构化的动态特征。从图 1 可以看出，2008-2011 年间，福建与其他沿海省市海洋三次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均在 0.9 以上，

其中福建与浙江、山东、广东的相似系数最大且较为稳定，说明福建与这几个省份的产业结构趋同度更高，相似性也更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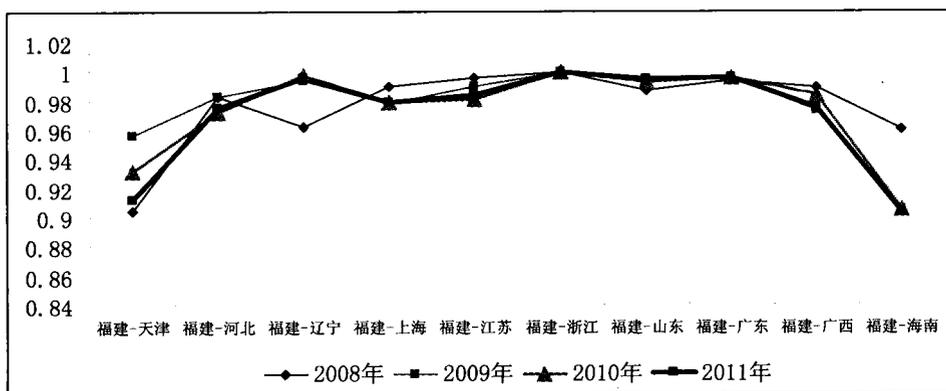


图1 福建与其他沿海省市三次产业结构相似系数的变化

(二) 基于产业结构熵数的福建海洋经济同构化分析

产业结构熵数是一个反映产业结构内部均衡程度的指标，主要用于描述产业结构的质变关系。产业结构熵数源自信息理论中干扰度的概念，即将结构比重变化视为产业结构的干扰因素以综合反映产业结构变化的程度，其计算公式为：

$$e_t = \sum_{i=1}^n \left[W_{it} \ln \left(\frac{1}{W_{it}} \right) \right] \quad (2)$$

其中， e_t 表示t期产业结构熵数值， W_{it} 表示t期第i产业产值所占海洋产业总产值的比重，n为产业部门个数。由于 $\sum_{i=1}^n W_{it} = 1$ ，当 W_{it} 相等时， e_t 有最大值。 e_t 越大，说明海洋产业结构发展形态趋于多元化，各主要海洋产业部门发展较为均衡；反之， e_t 越小，说明海洋产业结构发展形态趋于单一化。

囿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计算了2011年福建省和其他沿海省市海洋经济产业结构熵数（详见图2）。从图2可以看出，大多数沿海省份海洋经济产业结构熵数都较小。除了广西外，其他沿海省市的产业结构熵数都小于1。2011年福建海洋产业结构熵数为0.922，在所有沿海省市中处于上游位置，但 e_t 依旧偏小，这也说明了福建省海洋产业结构发展存在单一化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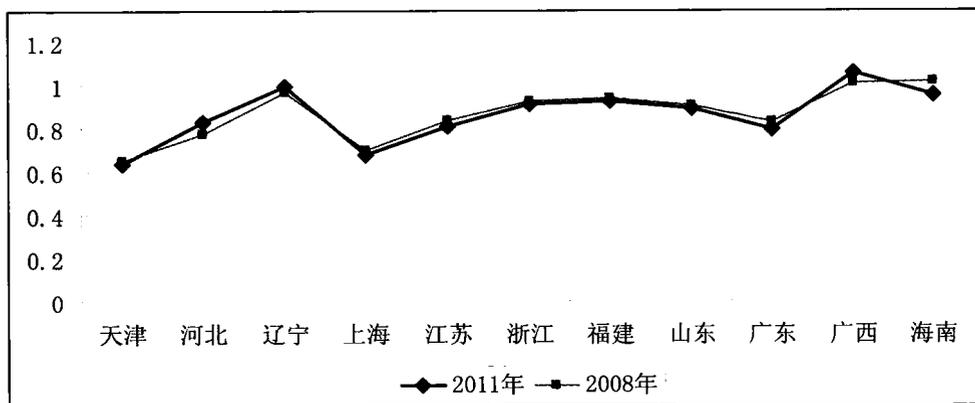


图2 福建与其他沿海省市海洋产业结构熵数

（三）沿海各省市海洋政策导向的相似性

海洋经济同构化问题的产生既有产业发展规律使然的一面，也有产业政策导向的一面。海洋产业政策是一国（或地区）为了促进海洋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增强海洋产业竞争力，实现海洋产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目标所制定与实施的与海洋产业相关的一切政策（包括经济政策、法律法规和行政条例等）的总和。通过比较福建省与其他沿海省市的“十一五”海洋经济规划的差异程度，可以解释福建海洋经济同构化的形成原因。表4为“十一五”期间福建和其他沿海省市的海洋经济发展规划中有关海洋重点发展产业的情况。

从表4可以看出，大部分沿海省市的海洋产业集中在海洋渔业、海洋油气业、海洋生物医药业、海洋船舶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滨海旅游业等。另有一些沿海省市发展滩涂农林牧业、海洋盐业、林产加工业、滨海矿产业、海洋能源业、临港冶金业、海洋工程、海产品贸易业等产业。通过比较福建与其他沿海省市“十一五”海洋产业政策可以发现：（1）各省市都以追求门类比较齐全的海洋产业体系为目标。近十几年来，沿海省市政府先后提出建设海洋经济强省（市）的战略目标，打造区域性海洋政策优势，海洋经济产业政策雷同现象比较突出，海洋产业以传统粗放型海洋产业为主。（2）各省市重点发展产业相似性较高。海洋产业发展重点主要集中在渔业、临港工业、旅游业等，即比较重视第一和第二部门的海洋产业。在第三产业的海洋旅游业，主要扶持旅游项目和旅游品牌推广等。在海洋交通运输业方面，主要扶持港口项目以及争夺货源。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出之后，各沿海省市又纷纷提出发展海洋生物制药，新兴产业发展的具体方向重合度也较高。各地的海洋产业政策在产业结构上有较为明显的趋同特征。（3）沿海地区海洋产业政策导致海洋经济“小而全”、“大而全”发展格局。如此的政策导向造成了各地区产业布局相似，产业扎堆现象严重。《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报告（2013）》也指出，我国沿海省市的海洋产业结构雷同、重近岸开发，轻深远海利用、重资源开发，轻海洋环境生态效益等，它将不利于我国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表4 “十一五”期间福建与其他沿海省市海洋重点发展产业

地区 产业	辽宁	天津	山东	江苏	上海	浙江	福建	广东
海洋渔业	√	√	√	√	√	√	√	√
滩涂农林牧业				√				
海洋油气业	√	√	√	√	√	√	√	√
海洋盐业	√			√				
林产加工业				√			√	
海洋化工业	√	√	√	√				√
滨海矿产业							√	
海洋生物医药业	√	√	√	√	√	√	√	√
海洋能源业					√	√	√	
海水利用业		√				√	√	√

临港冶金业						√	√	√
海洋船舶业	√	√	√	√	√	√	√	√
海洋工程		√	√	√	√			
海洋交通运输业	√	√	√	√	√	√	√	√
滨海旅游业	√	√				√	√	√
海产品贸易业				√				
信息服务业		√		√	√		√	

（资料来源：《辽宁省海洋经济发展“十一五”规划》、《天津市海洋经济发展“十一五”规划》、《山东省海洋经济“十一五”发展规划》、《江苏省海洋经济“十一五”发展规划》、《上海市海洋经济“十一五”发展规划》、《浙江海洋经济强省建设规划纲要》、《广东省海洋经济“十一五”发展规划》、《福建省海洋经济“十一五”发展规划》。）

三、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与福建海洋经济的互补性发展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对沿海各省市调整产业布局、优化产业结构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福建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发祥地，是连接台湾海峡的重要通道，是太平洋西岸航线的必经之地，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由前文分析可知，海洋产业结构发展的趋同性以及产业政策的相似性，导致福建海洋经济发展受阻，海洋资源配置效率不高。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多个国家和地区连接起来，旨在建立一个多元、开放的合作机制，这对于缓解当前福建海洋产业结构同构化问题、建设海洋经济大省具有重要的战略指导意义。当前，福建各相关部门明确表示，要借助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努力把福建打造成为“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建设的重要枢纽，实现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与福建海洋经济的互补性发展。

（一）积极开展与东盟国家海上合作项目

福建作为中国面向亚太地区的主要窗口之一，与东南亚国家的经贸往来密切，且与东盟资源、产业方面存在较强的互补性。近年来，福建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产业体系，资金和技术实力较强，尤其在建材、纺织服装等领域，在国内外市场都享有一定的声誉，而东盟各国是福建各种资源和原料的重要来源，是福建出口产品的主要去处。2013年，福建与东盟进出口贸易总额达242.81亿美元，同比增长12.7%，占福建进出口贸易总额的14.33%，其中出口163.17亿美元，同比增长14.8%，进口79.64亿美元，同比增长8.6%。东盟各国是福建省重要的贸易对象，以东盟四国为例，2008-2013年间，福建与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的贸易往来活动均表现出增长趋势（详见表5）。其中，马来西亚和菲律宾是福建对东盟的主要贸易伙伴¹。可见，在过去的六年间，福建与东盟之间的贸易往来非常密切，福建在融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应主动发挥区位和资源优势，积极开展与东盟国家的各项海上合作项目，加强与东盟国家在港口码头、物

¹ 印度尼西亚也是福建对东盟的主要贸易对象。2013年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进出口总额占福建对东盟贸易总额的61.5%。

流园区、集散基地和配送中心等建设管理方面的合作，积极开拓南亚、西亚、非洲东海岸等新兴市场，开辟新的合作领域，促进海洋经济的发展。

表 5 2008-2013 年福建与东盟各国进出口贸易状况（单位：亿美元）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东盟	52.18	32.06	60.09	33.43	83.07	48.91	116.21	67.02	142.11	73.31	163.17	79.64
菲律宾	7.95	3.99	11.74	2.25	16.77	3.88	23.18	5.63	35.0	8.19	41.27	9.68
泰国	6.06	7.89	6.76	8.65	9.33	12.27	12.48	13.63	15.44	14.25	16.88	15.47
马来西亚	14.09	10.72	16.45	9.65	19.42	12.12	24.41	12.94	30.42	12.37	36.87	14.64
新加坡	10.04	3.69	9.70	3.94	11.24	5.12	16.52	5.55	18.82	6.66	17.71	7.71

（数据来源：《福建统计年鉴》2010 年、2013 年和 2014 年，福建统计公报。）

（二）加快构建海上互联互通

互联互通是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首要目标。互联互通要求不断完善港口、码头等主要通道建设，完善海上物流和信息流的有效衔接，保障海上通道安全。互联互通首先体现在海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在参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互补性发展过程中，要支持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港口和码头建设，完善海上公共服务设施；其次是确保海上交通运输的安全，充分发挥国际相关组织的指导和调节功能，加强海上执法能力建设，确保海上重要通道的安全；再次是加强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间的旅游的互联互通，增加邮轮、航班航线等，促进福建与这些国家在海洋旅游、海上交通运输、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合作。

海上互联互通也是我国与东盟合作的重要内容。因此，福建在加强与东盟各国海上合作的同时，还要积极推进海上互联互通，要着力开拓港口、海运物流和临港产业等领域的合作，加强互联互通网络的建立，充分发挥厦门、泉州等重要港口城市的作用。

（三）努力实现陆海统筹创新

福建海洋经济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互补性发展不仅体现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海上合作项目中，还与陆域经济有很大的关联性。在融入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福建省还需进一步加强陆海统筹合作，联动发展，实现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陆域产业与海洋产业存在很强的对应联系。一方面，海洋资源开发的广度和深度需要强大的陆域经济作支撑，海洋发展中的制约因素只有在与陆域经济的互助、互补中才能逐步消除，陆域经济

利用其资金技术优势在海岸带建立海洋开发基地，进行海洋资源开发和海洋资源加工，实现陆域经济向海洋的延伸。尽管海洋产业的资源来源于海洋，但其活动基地基本上在陆上，特别是在海岸带和沿海地区。海洋开发不仅需要陆域配套设施和相关产业的发展，而且海洋资源开发后的利用也必须以沿海陆域为落脚点。如海洋捕捞、海洋运输、海洋油气开采、海洋矿产开发和海水养殖等，需要在海域完成一些生产环节，并在沿海陆地完成其他生产环节的产业活动。海盐业和海水利用等则完全是在陆地上完成所有的生产环节。

另一方面，海洋产业特别是资源优势为陆域产业发展、提升及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提供了空间与资源。海洋资源优势弥补了陆上自然资源的不足。陆域资源和海域资源优势互补，共同促进沿海地区的发展。特别在我国陆域产业的发展面临能源、矿产资源、水资源不足的约束下，因海洋中的海底矿物、能源储量和食物蕴藏量远比陆地丰富，已成为陆地产业和人类发展的前景基地。总之，陆域产业与海洋产业密不可分，它们共同形成海陆经济生产和再生产的综合经济系统。

参考文献：

- [1]刘赐贵，“发展海洋合作伙伴关系，推进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若干思考”，国际问题研究，2014 年第 4 期。
- [2]张耀光，魏东岚，王国力，肇博，宋欣茹，王圣云，“中国海洋经济省际空间差异与海洋经济强省建设”，地理研究，2005 年第 1 期。
- [3]胡鞍钢，马伟，鄢一龙，“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内涵、定位和实现路径”，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2 期。
- [4]范斐，孙才志，“辽宁省海洋经济与陆域经济协同发展研究”，地域研究与开发，2011 年第 2 期。
- [5]郭爱君，毛锦凰，“丝绸之路经济带：优势产业空间差异与产业空间布局战略研究”，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1 期。

作者简介：

易小丽，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福建的海洋文化资源与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苏文菁

福建是中国最具海洋个性的区域，在建设海洋强国的新一轮资源配置中，特别是“一带一路”的规划建设上，应该充分发扬区域的文化优势与资源禀赋，在提供海洋文化理论、以及历史遗产资源上起引领推进作用。这是历史再一次赋予福建的使命与机遇。不仅如此，我们认为，以武夷茶的世界贸易为中心，福建是历史上“一带一路”的重要枢纽：武夷茶向海带起了海上丝绸之路，向西北开启了经蒙古通向俄罗斯的陆上万里茶路。

我们从四个方面总结建设“一带一路”的目的、意义与福建独特的资源禀赋。

首先，我们认为：“一带一路”建设表达的是一个重返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国重建亚太世界秩序、重获中华话语权的努力。

“海上丝绸之路”、又称“陶瓷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贸易交通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海上丝绸之路发端于秦汉时期，繁荣于唐宋元明时期，转变于清代，是已知的最为古老、且延续时间最长的世界海洋贸易与交通通道；是前工业文明时代、博大的中华文化传播世界、影响文明的进程之路；是丰沛的中国物产福泽四海、全球共享之路；更是世界多元文化交流、对话与融合之路。建设海洋强国、中华民族走向全面复兴是目的；而“一带一路”的建设则是实现这一目的的重要手段与路径。

其次，梳理、复原中国固有的“海上丝绸之路”的遗产无疑是中国实现重建亚太秩序的现实话语与本土文化资源。历史上，在中国面向西太平洋开发的海岸线上，有诸多的城市都曾是陶瓷之路的重要港口。2012年，中国国家文物局遴选了九个较有影响力的城市组团“申遗”，在组团的（广州、泉州、宁波、扬州、蓬莱、北海、漳州、福州、南京）九个城市中，福建省独占三席：福州、泉州与漳州。这意味着：福建省在海洋文化遗产方面、在新世纪“重走海上丝绸之路”方面具有独到的历史资源与现实意义。

第三，就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所经地区的悠久历史来看，有两个黄金时段：1）、8—13世纪，由阿拉伯人与中国为主要力量推动的“海洋亚洲”时代，亚洲内部各种不同的文化、主要有伊斯兰教、佛教、以及带有浓重福建口音的中国本土信仰在这个区域聚集、冲突与融合。并由此形成了亚洲文化、东方精神。2）、16—19世纪，欧洲各国或以东印度公司为代表、进入亚洲传统的文化圈，其时，东盟、东亚区域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对抗、冲突与合作的重要空间。

第四，在这两个时期，福建都是中国海洋文明的重要代表。由于福建的大港口在人类历史上的独特作用，我们甚至可以说：福建对陶瓷之路文化遗产的整理与挖掘不仅代表了传统中国在世界海洋文化中的崇高地位，更是今天重返世界中心的中国所具有的本土文化资源与话语权；以此为基础，构思出“新

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这是建设海洋强国时代、福建对中华文化与历史发展应有的贡献。

我们认为：重走海上丝绸之路、重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繁荣带，福建具有着历史的、人文的、现实的三大独特优势。

历史以来，作为中国最具海洋个性的区域，福建人民成为从海路联接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桥梁与中介。由于台湾海峡的独特地理优势，福建各港口出发的船只可以上北洋（朝鲜半岛、日本群岛）、下西洋（中南半岛、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走南洋（菲律宾群岛、部分印尼群岛）、过台湾；这是广东、浙江的地理位置所没有的。福建各港口成为福建以北下西洋、走南洋与南边人民上北洋的重要枢纽。

借助季风、洋流的作用、由福建各港口出发的商船持久地、大规模地进入东盟地区；因而使得该区域的文化深深打上了带着福建口音的中华文明的影响。从历史上看，广东区域是明末清代才崛起的对外贸易主要区域。前期，广东主要是一个吸纳海外贸易商的区域；一直到清代中后期，清政府才允许人民从广东出洋。浙江沿海的航线主要是北洋区域，且在明清以来的海禁中执行得特别彻底；在对东盟区域的文化影响力较弱。而福建从唐宋以来，一直是中国从海上对外交往的主要区域。唐宋元时代，有福州港、泉州港；宋元年间，泉州港从东方第一大港发展到世界第一大港。明代，在严苛的海禁时代，中国官方唯一开放的口岸是福建漳州月港，而月港开放的特征就是：允许人民出洋贸易，不需外国人进入。在唐宋元明的漫长历史过程中，东盟区域的文化特征基本形成：伊斯兰教、佛教、天主教等多元文化的融合。福建在 8-15 世纪与东盟区域伊斯兰教的互动关系；福建佛教与东盟区域佛教的互动关系；以妈祖为代表的中国（福建）神祇在东盟的流变与发展等都是福建人民历史以来所独有的文化遗产；同时也构成东盟各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宋元以来福建人大规模的海洋贸易而形成的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历史城市马六甲和槟城于 2008 年 7 月 7 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这与 2000 年 12 月 20 日包括明清时期奉旨“使琉球”的世代福建人居住的久米村在内的琉球王国的五处遗址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一样，表达的是以福建为代表的中国海洋文明在东亚、乃至世界的影响力。今天，该区域不仅是华人华侨最为聚集的地方，且他们的祖居地主要就是福建！这种独特的文化优势使得福建与传统的海上丝绸之路所经区域之间具有天然的优势：文化搭台、历史牵线、经济唱戏。

福建在建设海洋强国的新一轮资源配置中，应该充分发扬区域的文化优势与资源禀赋，在更高的层面上谋划对中华民族全面复兴、建设海洋强国的理论智慧与技术支撑。

一、福建的海洋资源与海上丝绸之路

1. 海岸线与港口群

福建拥有全国最曲折的海岸线，众多的天然海湾。福、泉、漳、厦四大港口，接力赛般地成为中国的海上门户；同时，福建的港口都以港口群的方式存在。福州港周边的有：甘棠、马尾、吴航、江阴、三都澳等；泉州港周边有：后渚、安平、蚶江等 3 湾 12 港；漳州月港则有双屿、浯屿、梅岭的相峙。这些都是赫赫有名的国际商业集散地。

2. 季风、洋流

由于台湾海峡的独特地理优势，福建各港口出发的船只可以上北洋（朝鲜半岛、日本群岛）、下西洋（中南半岛、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走南洋（菲律宾群岛、部分印尼群岛）、过台湾；福建各港口成为福建以北下西洋、走南洋与南边人民上北洋的重要枢纽。

3. 沿海水下考古的有力佐证

福建沿海水下文物普查说明：福建沿海海域有着从唐朝末年到近代持续不断的水下沉船遗址，这是中国大陆其他沿海省份所不具备的。

二、福建物产与海上丝绸之路

1. 福船

“南方木性与水相宜，故海舟以福建为上，广东、西船次之，温、明州船又次之”（宋·吕颐浩）。以“福建”命名的“福船”是木质帆船时代的世界典范。

2. 茶叶

中国是世界茶叶原产地，茶文化是闽人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由海路与中国产生关联的许多国家对“茶”的发音，多由闽方言“Tay”逐渐演变成而来。英语“Tea”，法语是Thé，德语是Tee，西班牙语Té，意大利语是Tè，荷兰语是Thee。

3. 丝绸

唐代，泉州是绢的八大产区之一。今天的开元寺就是686年、黄守恭捐桑田七里所建的“莲花道场”。

据考证，“刺桐缎”蜚声海内外，以致英语、法语和德语中的“缎子”（Satin）一词，都由阿拉伯语Zaytuni（刺桐）一词转音而来。可见刺桐缎在海外的影响力。

4. 瓷器

瓷器在中国对外的海洋贸易中一直是与船舶合为一体的商品。由于其在人类文明史上发挥的巨大作用，中国就是CHINA。

福建沿海古窑口烧制的瓷器，在东亚、东南亚、印度洋沿岸、红海沿岸、东非海岸等地区屡有发现，表明这些瓷窑是专门为外销而创设的。

5. 漆器

“漆国”“Japan”是日本国号，究其原因却是明代以欧阳云台为代表的福建漆器匠师，将漆器工艺中关键的朱砂制作方法传授给日本人，促进了日本漆器的代表作品剔红漆器的发展。

6. 书籍

宋代以来，福建就是中国重要的图书印刷中心。建阳书坊、闽西四堡、福州、莆田等地都是古代世界图书的印刷中心。这些书籍都是海外各国学习中华文化的重要途径，通过海洋贸易，“闽版”中国典籍源源不断送达世界各地，至今仍是世界各大图书馆的中国古代经典的重要内容。

三、历代闽人开辟的航线与海上丝绸之路

1. 闽人三十六姓使琉球

闽人能够承担国家这一使命，皆源于“（闽人）多谙水道，操舟善斗，皆漳、泉、福宁人，漳之诏安有梅岭，龙溪海沧、月港，泉之晋江有安海，福宁有铜山……船主、刺哈、火头、艄公皆出焉”。

《闽人三十六姓针本》是汉语文献中现存最早的对闽人经略包括钓鱼台在内的琉球海域的有力证据。

2. 闽商开辟的航线成就了郑和下西洋

《诸番志》、《岛夷志略》记录了由福建口岸出发、以闽商为主体的中国海商的航海路线。它们是郑和下西洋必备的知识体系。郑和的随从马欢在《瀛涯胜览》中承认：“（1413年）太宗文皇帝敕命正使太监统领宝船往西洋诸番开读赏赐，余以通译番书，亦被使末。……历涉诸邦，其天时气候地理人物，目击而身履之。然后知《岛夷志略》所著不诬，……”。

1405年至1433年，郑和七下西洋；郑和去世（1432）后，王景弘带领船队完成了第八次下西洋（1434）。他们每一次都要到福州长乐太平港，“累驻于斯，伺风开洋”。

3. 白银航线—大帆船贸易

据不完全统计，16—18世纪，西属美洲的白银产量约占全球的80%，日本约占世界银产量的15%，这些白银，绝大部份借助与闽商的商业往来输入中国。

弗兰克（德）的著作《白银资本》认为，中国需求白银，欧洲需求中国商品，这二者的结合导致了全世界的商业扩张。在他的分析中，中国在工业革命前的经济史中占据着极其突出的地位；而发生这一历史事件的现场就是福建漳州。

四、独特的海洋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

4. 带有福建口音的中华文化在海外的“飞地”

2000年，琉球古遗址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2008年，地处马六甲海峡的马六甲城、槟城乔治市共同被列为的世界文化遗产。

两处文化飞地表达的是以福建为代表的中国海洋文明在亚洲、乃至世界的影响力。今天，该区域不仅是华人华侨最为聚集的地方，且他们的祖居地主要就是福建！这种独特的文化优势使得福建与传统的海上丝绸之路所经区域之间具有天然的优势：文化搭台、历史牵线、经济唱戏。

5. 侨批

2013年6月，侨批档案入选世界记忆名录。侨批，是世界海洋文明交汇的产物，记录了中国海洋族群向亚洲、美洲、大洋洲等地区迁移的历程，反映了外来文化在中国东南、华南沿海乡村碰撞与融合的过程，同时映射了华侨侨居国历史文化发展变化的进程。

6. 遍布全球的妈祖庙

据考证，全球有妈祖庙5000座，其中，中国大陆区域1500多座。妈祖本名林默。1156年，妈祖被封为“灵惠夫人”。妈祖从福建湄洲一个区域“仙”升格到国家的海洋“神”，与闽人航海时的文化寄托、国家经济战略的转移有着密切关系，以妈祖为代表的海神信仰标志着闽文化作为区域文化对主流文化的反哺。

作者简介：

苏文菁，福州大学教授、福建省海洋文化中心主任、全国海洋意识教育基地主任；北京大学特约研究员，福建省政协委员。

区域经济集团化新趋势下

福建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研究

魏国江

内容摘要：现代随着全球贸易向非实体商品的转变，欧美发达国家加强区域内投资与服务自由化并设立的标准，使发展中国家处于相对不利的境地。而“一带一路”作为国家战略为福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增长点。福建需根据自身的发展战略准确定位，在基础设施建设、海洋经济建设、加快“走出去”步伐、对台合作方面融入“一带一路”。

关键词：集团化 “一带一路” 融入

一、区域经济集团化新趋势

“冷战”后全球化加速，英美所倡导的自由贸易全球盛行，但世贸组织贸易体制本身的局限性及不平衡性导致多哈谈判停滞，加之美国国际贸易竞争优势削弱，发达国家更多地通过区域经济集团化策略有选择地确定对外经济合作对象致区域经济集团化趋势不断加强，成为影响全球经济的新动向。区域经济集团化最先以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亚太经合组织为典型，目前则以美国发起的 TPP 和 TTIP 谈判而方兴未艾，其发展势头迅猛，WTO 地位不断下降，自由贸易有走回头路的可能。区域经济集团化中部分国家与地区被孤立与边缘化，所以对我国来说必须利用集团化过程中的机会与矛盾通过多元化对外经济方式灵活加入区域集团力争参与区域经济集团治理机制，提高中国话语权。

（一）区域经济集团化诱因

1. 美国在新兴市场的贸易份额及竞争力下降，欲通过新平台获得最佳贸易待遇

1947 年美国发起并拟订了关贸总协定以作为推行其主导的贸易自由化契约，随后发展为 WTO。美国具有贸易优势的有形产品与服务遭遇中印等国正面竞争，而非洲及中东国家则无力消费美国的高端产品，美国正面临贸易赤字。目前美国的产业结构不断向服务业等无形产品转移，页岩气技术使美国的能源对外依赖度下降，美国的发展空间主要是服务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但随着美国国际贸易份额及对贸易规则影响力的下降，美国希望重建新的贸易组织及规则保证美国的投资便利化与服务自由化。未来的国际贸易中非贸易商品的比例日渐提高，美国在 WTO 框架下所获取的利益相对压缩，发达国家对相互投资的准入要求提高，所以美国开始转向 TPP 和 TTIP 等区域性投资贸易协定。区域化的经济组织更具针对性与选择性，更便于美国的全球战略，尤其适应美国“重返亚太”战略，

强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

2. 世界各国经贸矛盾加深，而 WTO 影响力及调解力有限

2008 年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复苏乏力，各种贸易保护主义由于发达国家贸易竞争力下降而日渐抬头，虽多冠以自由贸易的幌子但实质都是企业为自身利益而发起的保护主义，欧美针对我国光伏产品“双反”调查就是典型。美国作为自由贸易的最大受益者也借助 WTO 规则行贸易保护之实，日前，世贸组织裁决美国 2006-2012 年间对华的 25 起“双反调查”违反世贸规则，同样，中国三一重工也因“威胁美国国家安全”而禁止关联公司的投资而蒙受巨大损失。欧美之间也矛盾重重，在文化产业、医疗服务质量、食品进入方面存在分歧。

但 WTO 成员国发展水平悬殊，深入谈判面临诸多矛盾，WTO 调解国际贸易争端的能力有限。乌拉圭回合谈判后南北差距扩大削弱了发展中国家的谈判积极性，2001 年的多哈回合谈判启动后，由于对农业补贴问题的意见不统一，最终没能达成最终协议，影响了全球农业、服务业的自由贸易。而且美国及欧盟是 WTO 的主导力量及规则制定者，在全球借 WTO 规则的优势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任意制裁引进发展中国家的强力反对，其中针对中国的制裁就多项违反 WTO 规则，而 WTO 不能很好地平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以致影响力下降。

3. 地缘政治阻碍了全球化进程，催生了区域经济集团

全球化迅速发展得益于“冷战”的结束，但美国为了战略资源强化对中东地区的控制，而其中东失策导致阿拉伯国家与美国的抵对加剧，加之美国基于页岩所技术的能源自给率提高，中东地区战略地位下降；金融危机后美国为遏制中国发展空间在“重返亚太”中拉拢日越引进亚太地区局势紧张；北约东扩过程中与俄罗斯的冲突增加，乌克兰问题更直接导致欧亚大陆分裂及新的贸易战，欧美的制裁及俄罗斯的反制裁给全球化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各主权国家为寻求发展机会通过区域经济集团强化联系与合作。

(二) 福建对外经济概况及存在的问题

福建作为沿海开放省份，经济总体上相对弱于其他沿海各省，出口产品中工业制品比例较高，机电产品与高新技术产品的比重相对较低。表明福建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相对低，产品附加值不高。（见表 1）福建的这种出口格局很难持续且在国际贸易中容易受到经济波动的影响。由于产品的技术含量低，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强度高，贸易条件差，而且处于产品过剩的状况。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对福建外贸产生较大影响，2009 年进出口总额下降近 10%。所以对福建省来说一方面要使进出口多元化，既要产品的多元化，也要对象的多元化。另外，产品升级也是必然的选择。但在短期内拓展欧美市场之外普通商品销售是当务之急。

表 1 福建进出口主要分类情况

单位：万美元					
项目	2000	2005	2010	2012	2013
初级产品	136769	215205	529791	807977	858009

工业制品	1154106	3268990	6619522	8973735	9789433
机电产品出口总额		1572365	2939330	3541709	3760065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		782175	1317431	1401029	1552188
进口商品总额	831504	1956935	3728715	5810536	6284731
初级产品	102179	333239	1024135	2586192	2651304
工业制品	729315	1623696	2704521	3220049	3633427
机电产品进口总额		1030337	1764554	1912555	1982469
高新技术产品进口总额		497434	1243151	1326760	1476876

(资料来源: 2014 年福建省统计年鉴)

另外, 福建出口产品的对象也相对集中, 主要集中于中国香港、台湾及欧美, 中东地区和非洲地区的比例相对较低。台湾和香港的进出口主要是由于两地在大陆的投资所带动的中间产品贸易, 欧美的进出口主要集中在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和西班牙。(见表 2) 但东盟、中东地区、东欧国家的市场增长较快, 在传统上与我国有着紧密的经贸往来。所以加强与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经贸关系可以使福建省在全球经济合作中更具灵活性并寻找到新的增长点。

表 2 福建对外经贸往来主要伙伴

国别(地区)	出口总额	进口总额	利用外资金额	国别(地区)	出口总额	进口总额	利用外资金额
亚洲	4941542	3831615		欧洲	2182689	784117	
*中国香港	1056024	47560	472234	德国	398142	145077	907
中国澳门	4059	14	19905	法国	137102	38054	-28
中国台湾	322105	962694	117022	意大利	136389	43915	
日本	646627	316192	2533	芬兰	32368	15421	
菲律宾	412674	96756	-985	英国	289020	53257	539
印度尼西亚			2908	丹麦	30965	7738	
泰国	168757	154670	1998	瑞典	37833	9868	
马来西亚	368724	146395	-546	瑞士	14761	254690	
新加坡	177129	77077	53789	西班牙	130675	26343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241835	13060					
北美洲	1992954	750040		大洋洲	197474	270469	
*加拿大	148784	147684	2222	*澳大利亚	164310	207472	3822
美国	1844113	602189	5609	拉丁美洲及非洲	1332782	648257	

(资料来源: 2014 年福建省统计年鉴)

三、区域经济集团趋势增强下福建融入“一带一路”的重要意义

区域经济集团化趋势增强导致全球经济格局出现新变化。首先，由于新的区域经济集团强调投资与服务的自由化，商品贸易的提升速度会相对较慢，而各成员国的资本自由流动将对集团经济产生重大促进作用，将成为世界经济合作的新亮点。但非成员国可能被排除于合作框架之外。我国在欧美的投资数量已经大幅上升，但总体结构并不乐观，投资多元化是应然选择。所以融入“一带一路”能为福建经济找到新的动力与增长点。

“一带一路”是我国应对国际经济形势变化及提高我国对外合作水平而提出来的国家战略。“一带一路”战略把福建作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延续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在建设海洋大国的背景下，福建拥有了更好的发展平台与机遇。“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经济水平相对较低，对我国的产品需求程度较高，尤其对福建省的轻工产品有较强需求意愿。另外，“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资源丰富，对于我国人均资源拥有量较低的国家更可以实现经济互补。中东的石油、中北亚的天然气、非洲的矿产资源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经贸往来可以把我国的商品销往其市场，也可以把需要的资源购回来。而福建省作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可以加强与内陆省份的互动，打造成“互联互通”的中间节点，顺利实现由传统制造向现代制造及服务业的顺利转型升级。

四、福建融入“一带一路”的战略思路

福建需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一带一路”建设是长期过程，福建省需立足福建的经济与地理优势寻找自身的切入点，按照中央“搞好互联互通，深化与沿线国家交流合作，强化国内支撑，努力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的要求，先期主要是与国内各省做好互通建设，重点以铁路、公路、管道等基础设施的新建和扩建为主。在“十三五”规划中要重点提高福建省与内陆各省及台湾联通水平，争取国家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规划项目，弱化东南偏隅边缘化劣势。对外重点加强港口建设，有计划统筹兼顾地设计各港口的定位与发展方向，不能一轰而上重复建设。

福建的战略重点应当是走向深蓝，重点发展现代临海经济。建设海洋大国与海洋强国是现时代我国的战略选择，福建省应当立足海洋资源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发展海洋经济与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沿线各国有很多的共同利益诉求，可以拓展更多的合作空间。福建省可以与沿线各国在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渔业资源保护、航道安全管理方面展开合作，提高与沿线各国的经济融入度。

福建经济新的增长点重点是“走出去”。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基础差，引进外资及其管理经验是起步的基本要求，福建省是我国引进外资的排头兵，在全国处于前列。但是目前我国经济已具备了“走出去”的条件与必要性，福建需以“走出去”作为发展重点。一是要加强商品的外销化解轻工业产品过剩的不利影响，二是通过向外投资强化与沿线各国的合作，尤其是资源共享合作是当务之急。

福建省需加强与内地、台湾的经济合作，使福建成为中国的重要出海口。目前，福建与内地的经济融合度不高，虽处长三角与珠三角中间，但产业链较独立，与内地的交通条件与经济合作水平不高。福建需依托与台湾的联系加强与内地企业的产业链融合，通过深化分工提高生产效率，发挥港口优势使福建成为东南沿海的商品集散地。

福建需深挖掘古代丝绸之路遗产，重点发展文化、旅游业。福建的文化多样性高，旅游资源丰富，泉州仍然保留大量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的交往痕迹。可以通过文化交流提高与各国的互信与合作水平，大力发展旅游业，通过旅游业带动实体经济向外推广。

作者简介：

魏国江，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分析福建省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李可爱

内容摘要：本文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分析了福建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具体来说，文章分别从民营企业大力发展培育了大量劳动力资源优势、华侨华人优势带来独特的发展机遇以及福建省引进人才战略带来人才积累三个层面，分析了福建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所面临的机遇；从本土企业面临熟练劳动资源竞争、对外开放加大劳动力市场需求弹性以及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与稳定性的协调等三个层面，分析了福建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所面临的挑战，文章在详细阐述了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情况之后，结合福建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分别从充分利用华侨华人的独特劳动资源优势、加强企业跨国经营人才的建设、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合理提升劳动者地位等角度，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福建 “一带一路” 劳动力市场 机遇 挑战

一、引言

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201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时又提出，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是借陆地“丝绸之路”代指海上运输通道，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是党中央战争历史高度、着眼世界大局、面向中国东盟合作长远发展提出的重要战略构想，对于深化区域合作、促进亚太繁荣、实现我国和相关国家合作共赢、推动全球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一个基于中国沿海始发、途径东南亚、南亚、波斯湾、红海湾及印度洋西安各国的航线，是通过沿线港口及其城市合作机制建立起来的经贸合作网络，是中国开放型经济的组成部分和构建多元平衡开放体系的重要方式。其建设思路和发展方向是：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通道建设为基础，以经贸合作制度建设为支撑，全面提升“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通道功能、贸易水平、投资及经济合作水平；积极构建中国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互利共赢的格局。

中国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分为陆路和海陆两部分，其中海陆比陆路持续时间更长，到达的地区更广，在历史上的影响也更大。福建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地处我国东南沿海，东

临台湾海峡，三面环山，境内山岭耸峙，曾有“东南山国”之称。福建省利用海岸线长、海湾良港多的地理优势，开展对外贸易。福建海上对外贸易交往历史悠久，先后出现福州、泉州、月港（漳州）和厦门对外港口，所形成的“海上丝绸之路”享誉全球。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曾为繁荣亚洲、非洲、欧洲国家经济以及推动东西方沟通交流做出过重要贡献。为了响应当中央共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福建省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应该充分发挥自身的独特优势，主动作为、勇于担当，为实现中国与“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新繁荣贡献力量。

二、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看福建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所面临的机遇

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看，福建省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面临着诸多方面的机遇，如福建省民营企业的发展培育了大量劳动力资源，华侨华人优势资源带来独特的发展契机，长期以来引进人才战略的实施带来人才积累的优势等，所以，福建省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要牢牢抓住省内劳动力市场的发展机遇。

（一）民营企业大力发展培育了大量劳动力资源优势

福建省作为全国最早实行改革开放的经济地区之一，民营经济起步较早，民营经济在福建经济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民营经济的飞速发展繁荣城乡经济、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拉动社会就业、改善民生和扩大对外开放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福建省民营企业出口持续快速增长，规模日益扩大，在对外贸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同省内的国营企业、集体企业相比，只有民营企业进出口商品贸易额显现出逐年稳步增加的态势。

伴随着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大量工作在一线的劳动力资源也随之得到培育。竞争意识、品牌意识以及战略意识的增强，使得民营企业也在不断提升自己的雇佣结构，不仅劳动力数量大幅度提高，而且劳动力技能结构也在不断优化。福建省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进程中，可以充分发挥民营企业的优势，进一步扩大民营企业的进出口商品贸易，充分利用由民营企业大力发展所培育的劳动力资源优势，进一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同时可以优化自己的出口结构，保持并进一步增强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份额，在国际竞争中发挥自己的优势。

（二）华侨华人优势带来独特的发展机遇

随着以泉州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贯通，开启了中国与东盟等贸易伙伴国之间的文化与经贸交流。福建省素有侨乡之称，而分布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华侨华人，因其在商业领域的卓越表现，可以为福建省推进“一带一路”发展战略起到了桥梁纽带的作用。许多成功的华侨又回到福建投资建厂，许多福建当地的企业因华侨优势而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贸易伙伴国企业界有更加密切的联系。

“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华商利用熟悉中国与沿线国家双方政治、经济、文化等投资环境的优势，向内地推荐沿线国家的投资兴业机会，且可以在对沿线国家进行投资过程中，协助投资者组织团队、进行早期规划、构建营销网络、进行投资经营等。基于华侨华人对沿线国家市场有更深入的认识，包括对当地的投资项目、投资管理部门的了解远比福建省内企业经营者熟悉，加上长期的商业和生活积累，可以弥补福建当地人脉和资讯的不足，以利于选择经济效益高、投资风险小的项目，所以当地华商是福建民营企业进入目标市场最直接也是最佳的合作伙伴。

（三）福建省引进人才战略带来人才积累

福建省具有重视培养人才的优良传统，改革开放以来，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中央关于“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方针，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吸引了一大批海内外人才到福建工作或以其他方式为福建服务，有力地缓解了福建人才匮乏的局面。长期以来福建省在引进人才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人才为福建省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福建的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得到长足发展，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人才战略是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的必要条件，也是积极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

长期以来，福建省引进人才战略为福建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奠定了一定的人才积累基础。高素质的从业人员队伍是适应市场竞争的基石，也是我国加强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友好往来的现实和长远需要。结合福建省民营企业的发展现状，大力开发人力资源、吸收优秀的技术人才、管理人才是民营企业壮大自身规模、开拓沿线国家市场的紧迫任务。福建省在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长期以来引进人才战略的人才积累优势和人才战略机遇。

三、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看福建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所面临的挑战

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看，福建省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方面的挑战，如福建省本土企业面临熟练劳动资源竞争，对外开放会进一步加大劳动力市场需求弹性，以及当地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与稳定性的不协调等，所以，福建省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不能低估省内劳动力市场所面临的挑战。

（一）本土企业面临熟练劳动资源竞争

福建省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首批省份之一，随着对外开放的发展进程，通过对外贸易和招商引资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对外开放意味着更多的外来竞争，随着福建省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开放程度的提高，利用外资的规模持续上升，国内劳动力、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与外资不断整合。整体上看，我国是一个熟练劳动资源供给相对短缺的国家，福建省的情况也不容乐观，跟本土企业相比，外资企业往往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和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对熟练劳动力需求比较大，会凭借雄厚的资金实力与本土企业产生熟练劳动资源的竞争，进而加重本土企业的熟练劳动资源短缺的状况。

而伴随着东南沿海出现“用工荒”，福建省从2006年开始首次出现“用工荒”，而“用工荒”又主要表现为“技工荒”，这也再一次验证了本土企业所面临的熟练劳动资源竞争问题。福建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必然伴随着更大程度的对外开放，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经贸往来将更频繁，随之而来的是更加激烈的外部竞争和更多的招商引资机会和更多的外资进入，如何应对外来竞争的加剧和外资企业与本土企业的熟练劳动资源争夺，协调好经济社会发展、就业结构优化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

（二）对外开放加大劳动力市场需求弹性

结合前期我们的相关研究认为对外开放会通过替代效应和产出效应两个渠道加大我国劳动力市场需求弹性，即一方面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使本国的厂商获取进口中间投入品的种类增加、成本降低，从而对生产要素产生更强的替代性，生产要素替代弹性上升将导致行业劳动需求弹性上升；另

福建省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民营企业的优势，而民营企业在拓展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中，要注重与沿线国家华侨华人社团建立密切的联络渠道，特别是加强与福建华侨华人社团的联络，推动省内各级各类商业协会与境外商业协会结盟，充分发挥侨乡在华侨华人独特劳动资源方面的优势，具体可以通过组织工商团体组互访及联合举办双向研讨会、专题招商会和展览会等方式，实现资金、人才、信息、人脉、项目、消费等方面的合作，共同提高开拓沿线国家市场的成效。

（二）加强企业跨国经营人才队伍建设

高素质的从业人员队伍是适应市场竞争的基石，也是福建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现实和长远需要。首先，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全面分析福建省在人力资源方面的优势和劣势，从制度上建立起完善的人才体系，继续推进引进人才战略，有针对性地招揽人才。其次，建立完善的培训体系，针对“技工荒”、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短缺的现实，采取有针对性的培训项目。同时，可以适度开展海外进修项目，熟悉“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和民俗等。再次，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双管齐下，积极创造条件留住高素质人才，缩小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整体福利待遇差距，减少人才流失。此外，还可从福建地区外贸、外语和管理方面有较高水平的高等院校及有关培训部门吸收高素质人才。

（三）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为了保证福建省“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推进，面对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与稳定性的非良性互动现实，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失业保障体系的建设。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应建立保障一定水平就业机能的就业保护制度，在此基础上，通过社会保护程度的提高来逐步降低就业保护水平，实现社会保护对就业保护制度的替代。以最小的代价降低就业保护对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影响，在维系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平等的前提下，发挥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效率优势，从而建立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安全性和灵活性并存的劳动力市场。

（四）合理提升劳动者地位

随着福建省“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会进一步增强，我们前期的相关研究也表明，开放导致了劳动需求弹性上升，这意味着劳动供给方的地位相对削弱，劳动需求冲击将带来更大的工资和就业波动。因此，福建省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有必要注重提升劳动者的地位。特别是针对福建省民营企业占比重较高，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吸纳大量就业的现实，在制定政策时更是应当考虑到这一点。当然，提升劳动者的地位也要适度，要兼顾企业的生存与发展。

参考文献：

- [1]陈万灵，何传添.海上丝绸之路的各方博弈及其经贸定位.区域经济.2014年第3期.
- [2]陈武.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关于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东南亚纵横.2014年第1期.
- [3]刘京华，林丽英.福建民营企业开拓东盟市场的现状、问题及对策.亚太经济.2009年第5期.

一方面，更为自由的国际贸易将会增大国内各行业最终产品的需求弹性，这将进一步提高行业劳动的需求弹性。

根据经济学相关理论，劳动需求弹性增加，会产生三个重要影响，第一，在外生冲击导致劳动需求曲线发生某一幅度的垂直移动时，较高的劳动需求弹性将带来较大的工资和就业波动。第二，劳动需求弹性提高将导致非工资成本由雇主向劳方转移，劳动者将承担更大份额的非工资劳动成本。第三，在具有超额利润的行业和厂商中，较高的劳动需求弹性意味着劳动者在分享垄断租金的谈判中地位下降。即使对外开放因素导致的国内劳动价格变化很小，它仍可能通过改变该国劳动需求弹性造成其劳动力市场的压力。

福建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势必会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的程度，而对外开放程度的加大意味着即使对外开放对福建省当地的工资和就业的直接影响不明显，其仍很有可能会通过提高劳动力市场需求弹性的方式给当地劳动力市场带来更大压力，劳动力需求弹性上升意味着劳动力供给方的地位相对削弱，同时，劳动需求冲击将带来更大的工资和就业波动。

（三）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与稳定性的不协调

随着东南沿海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1989年我国第一次“民工潮”出现，而且十几年来，农村的廉价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支撑了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但是从2003年开始，我国第一次出现“民工荒”现象。2004年起，这种被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称之为“缺工”的现象开始蔓延。2006年，首次在福建省出现，且近几年表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缺工”问题是劳动力市场外部数量灵活性、失业保障机制、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不能有效配合的市场表现，从本质上反映了劳动力市场的稳定性与灵活性非良性互动。

福建省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必须要面对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与稳定性非良性互动这个事实，不能沿袭以往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以牺牲劳动者就业稳定性为代价，虽然保证了企业用工的灵活性，使得劳动力市场能够更快地达到均衡，但是失业保障机制的不完善使得劳动者的收入稳定性难以得到保障，同时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未得到有效的实施，许多工人失业后难以受到职业培训，再就业补贴、创业补贴没有起到有效的激励作用，劳动者再就业渠道受阻，而是要探寻一条劳动力市场稳定性与灵活性良性互动的机制。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福建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紧密结合福建改革发展的实际，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既面临着机遇也面临着挑战。本文主要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展开分析，分别从民营企业大力发展培育了大量劳动力资源优势、华侨华人优势带来独特的发展机遇以及福建省引进人才战略带来人才积累三个层面，分析了福建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所面临的机遇；从本土企业面临熟练劳动资源竞争、对外开放加大劳动力市场需求弹性以及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与稳定性的协调等三个层面，分析了福建省推进所面临的挑战。我们认为福建省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可以从充分利用华侨华人的独特劳动资源优势、加强企业跨国经营人才队伍建设、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合理提升劳动者地位等方面做出改进，以实现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经济社会的共同繁荣。

（一）充分利用华侨华人的独特劳动资源优势

- [4]郑海麟.构建“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经验与战略思考.太平洋学报.2014年1月.第22卷第1期.
- [5]周申.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工业劳动需求弹性影响的经验研究.世界经济.2006年第2期.
- [6]周申,李可爱,易苗.国际贸易、FDI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南开大学出版社.2013年6月.
- [7]邹立刚.中国—东盟共建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思考.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7月第32卷第4期.

作者简介:

李可爱, 华侨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讲师。

闽籍海外华商助推福建融入“海上丝绸之路”

经济带的价值与途径研究

马占杰

内容摘要：为了充分利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给福建带来的难得历史机遇，需要充分利用闽籍海外华商的力量的力量。本文在分析了闽籍海外华商和社团在海外的重要影响力的基础上，指出了闽籍海外华商助推福建融入“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价值在于“他们自己走进来”与“促进福建企业走出去”两种方式，最后提出如何促进闽籍海外华商助推福建融入“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提出了对策建议。

关键词：作为新一届国家领导层对外政策的一个亮点，“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一经提出，便引发海内外高度关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对于福建而言，是难得的历史机遇（郑晓松，2014）。历史上，福建与“海上丝绸之路”有着悠久的渊源。今天，如何通过重启“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实现福建的跨越式发展，对于实现福建省委九届十一次会议提出的战略目标具有重要价值。在未来福建与“海上丝绸之路”沿途国家、地区共同谋求共赢的过程中，该区域一个特殊的群体——海外华商将扮演着重要角色（何亚非，2014）。闽籍海外华商广泛分布于“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他们通过“以侨引台”、“以侨引外”，在促进所在国与中国开展经济合作、科技交流和帮助中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等方面能够发挥重要的桥梁作用。

一、闽籍海外华商在“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具有重要影响力

1. 闽籍海外华商分布广泛且实力雄厚

福建拥有海外华侨华人 1512 万人，分布在世界 176 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地区占 78%，有 1200 万；海外闽籍社团 1900 多个，分布在 47 个国家和地区，影响力越来越大，成为国际舞台上一股重要的力量。闽籍华侨华人经过长期艰苦创业，许多人不仅融入当地社会，更成为居住国经济发展的有生力量和知名企业家、社会活动家，他们职业分布广泛，从事商业贸易、餐饮服务、制造等华人赖以生存的传统行业为主，约占海外华商总数的 19%。在华尔街工作从事金融业务、IT 支持、法律服务等六七千华人中，闽籍华人约占 4¹。在英国，福建籍华人至少有 10 万人，是仅次于香港、广东籍的最大华人群体。

从 19 世纪末至今，闽籍华商几乎遍及全球，这 100 多年间，闽籍华商走向世界 170 多个国家

¹ 吴绵国，帮助海外闽籍华商在金融危机中求生存，海峡通讯，2009 年第 08 期

和地区，闽籍华商的资本也逐渐向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转化，形成了众多知名闽籍海外华商，在所在国政治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比较突出的代表除了被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陈嘉庚外，还有“锡矿大王”胡国廉，“木材大王”李清泉，“糖业大王”黄仲涵，“砂捞越王”黄庆昌，“万金油大王”和“报业巨子”胡文虎，“汽车大王”谢建隆，“地皮大王”黄廷芳，“橡胶与黄梨大王”李光前，“食用油大王”和“纸业大王”黄奕聪，集“面粉大王”、“丁香大王”和“金融大王”于一身的林绍良，集“银行大王”、“烟草大王”、“啤酒大王”和“航空大王”于一身的陈永栽，云顶集团的林梧桐等。

在今天，海外闽籍华商的影响力已是引人瞩目，他们秉承闽商勤奋踏实的优良传统，历经艰辛，涉猎多元化的产业，最终在海内外开辟出各自的一方天地，尤其在东南亚国家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根据2005年《亚洲周刊》“国际华商500强”统计显示，仅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菲律宾等东南亚四国，闽籍华商大企业就有85家，其中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华商前十名中，有6家都是闽籍华商。2012年福布斯富豪榜显示，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华商富豪人数中闽籍华商占绝对优势，新加坡前10名富豪中的8位、马来西亚前9名富豪中的6位、印度尼西亚前7名富豪的6位都是闽籍华商，著名闽籍海外华商施至成则连续6年蝉联菲律宾首富，而“糖王”郭鹤年多年以来一直是马来西亚的首富¹。福建省政府新闻办也证实，截至2010年5月，闽籍华商资产存量已超过3000亿美元，成为国际商界的一支劲旅；另据《2013闽商百强榜（全球榜）》²的数据显示，仅百强闽商在2013年的累计财富值高达16280.66亿元人民币，较2012年榜单增长了约2826.73亿，人均财富值高达162.82亿元人民币。

近十年来，闽籍海外华人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重要人士和新生代优秀人才不仅数量增多，而且层次明显提高，既有身家过亿的商界巨子，也有卓有建树的科技专家，还有步入所在国政界的才俊。如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青年团名誉总团长翁隆秋、印尼商务部长冯慧兰、泰国下议院第一副议长蔡百山、美国科学院院士陈天健等均为海外闽籍华人的杰出代表，他们对所在国有着较大的影响。

2. 闽籍海外社团在当地的影响力

海外社团是华侨华人联络乡情和互助发展的平台，目前全球华侨华人社团已经达到20多万个，海外华侨华人社团当地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强，社团功能也逐渐发生变化，正在由团结互助、传承中华文化向为当地主流社会提供服务方面倾斜。

在海外，1000多万闽籍乡亲旅居世界各地，闽籍华侨华人社团的历史可追溯至上百年前。多年来，秉承祖籍地的文化传统，这些海外乡亲成立了相当数量的社团和群体，世界性闽籍华侨华人社团蓬勃发展。迄今为止，分布在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闽籍华侨华人社团数以千计，仅与福建省侨办有联系的社团即达400多个，其中世界性闽籍华侨华人社团有12个，包括世界南安同乡联谊会、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和世界福建同乡恳亲大会等。

海外闽籍社团在维护侨益、拓展乡谊、融入住在国社会、积极推动住在国和家乡经济科技文化

¹ 罗钦文，以侨带路推动“海丝”建设《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年06月02日第08版

² 2013年闽商百强榜完全名单，http://mn.sina.com.cn/news/finance/msfy/2013-09-23/09502749_2.html

交流合作、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支持祖国和平统一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产生了巨大影响。福建省侨办提供的一份报告表明，近年，这些海外闽籍华侨华人社团在开展传统会务的同时，更加重视大范围的各种活动，在推动闽籍海外华商回国内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近几年，闽籍社团组织海外乡亲参加福建的经贸活动尤为频繁，富有成效。“9·8”洽谈会、海交会、鞋博会、海博会、花博会等等，海外闽籍社团都积极组团参加。每三年一届的世界闽商大会迄今已举办了四届，在全球各闽商社团和商会的推动下，来自全世界五大洲的50个国家和港澳台地区、以及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各地闽商积极参会，其中2004年5月举办的第一届大会就有1100多名海外代表参加，2013年6月举办的第四届大会则有1800多名海内外代表参会。

二、闽籍海外华商助推福建融入“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价值

为了使福建在融入“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过程中实现跨越式发展，需要吸引更多的外商来闽投资，还要鼓励本土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实现企业的国际化发展，通过“引进来”与“走出去”两种方式对福建经济增长做出贡献。

近年来，相对于沿海其他地区，福建对外资的利用能力也迅速下降（李鸿阶，2011；余雪峰，2010）。外商直接投资（FDI）占福建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逐年下降，从2001年的24.14%下降到2010年的12.95%（徐青，2011）；甚至出现了撤资的现象（徐晓岚，2009）。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可以重新掀起闽籍华商回乡发展的热潮。闽籍海外华商历来有较浓的爱国爱乡情怀，如果再借助这次良好的发展契机，必然会对福建的当地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另外，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稳步实施，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的福建企业“走出去”，面对国际化经验不足的问题，他们必然迫切需要闽籍海外华商的支持和指导，福建企业“走出去”，也需要借助于海外华商的智慧与资源。国务院侨办主任李海峰认为，“‘走出去’战略，不仅为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也为海外华商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合作空间，海外华商企业在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具有独特的优势和作用”¹。另外，由于华商管理源于中国文化，成长于世界各地，具有“中西合璧”的特色，它对目前我国寻求走向国际化的企业颇具借鉴价值，“海外的华商理所当然可以成为中国企业的引路人，他们的成功经验也可以为中国企业学习借鉴”²

具体来讲，闽籍海外华商在帮助企业“走出去”参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过程中具有独特价值：（1）借助闽籍海外华商企业的雄厚实力，走强强联合发展的道路可以帮助福建企业节约成本；（2）借助闽籍海外华商熟悉驻在国国情和市场运作规则，可以帮助福建企业把握投资方向，避免盲目投资。（3）借助闽籍海外华商成熟的商业网络，可以帮助福建企业更加顺利地进入当地市场，迅速打开营销渠道；（4）借助闽籍海外华商了解驻在国民风民俗，与当地政界、商界有密切往来的优势，可以帮助中国企业消除文化差异，减少投资摩擦；（5）借助闽籍海外华商具有国际经营管理经验等优势，可以帮助中国企业提高管理水平，尽快与国际接轨”³。

¹ 国务院侨办主人李海峰在2012年8月22日在第二届中国海外投资年会上的讲话

²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任启亮在2011年11月15日-16日在首届“中国海外投资年会”上的讲话

³ 参考原国务院侨办主任李海峰2012年8月在22日在第二届中国海外投资年会上的演讲

还有，近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面临的风险问题日益突出，如所罗门群岛、巴西圣保罗等地洗劫华人商铺、企业，越南针对我国企业和公民的暴力事件，阿拉伯地区的政治风险等。长期以来，开拓进取、自强不息、敢拼爱赢、兼容并蓄的闽南文化精神，促使闽籍公民和企业在海外取得了长足发展和辉煌成就，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应对国际风险的能力，他们的成功经验对于“走出去”福建企业的海外生存也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三、闽籍海外华商助推福建融入“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实现途径

为了充分发挥闽籍海外华商在推动福建融入“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作用，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入开展工作：

第一，通过各种形式向广大闽籍海外华商宣传国家“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对国家和福建的价值和意义，以及这个国家战略的成功实施给他们带来的发展机遇和政策利好，引导广大闽籍华商关注国家的发展战略，强化他们的责任意识 and 家乡情节包括定期召开会议，在形式上可以采用指定某一部门负责，举办各种形式的座谈、推介会、联谊活动等。

第二，充分利用闽籍海外社团的作用，密切包括政府在内的各界组织机构与闽籍海外华商的密切关系。促进福建“走出去”企业积极加入并充分利用闽籍海外华商的社会网络，在制造业、海洋经济、旅游、物流等合作，加快构筑互联互通网络，促进双向投资与贸易，组织各种形式的招商会，赴外地参观考察等，积极为海内外闽籍华商搭建交流合作的平台。

第三，充分借助闽籍海外华商及社团，搭建福建企业海外发展的风险预警及沟通平台。该平台可由我驻外机构主导，广大闽籍海外华商及团体广泛参与，集闽籍海外华商与福建“走出去”企业的沟通交流和预警信息发布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平台。一方面，在风险问题较小时期，该平台是政府和企业沟通交流的沟通纽带；另一方面，在风险问题较为突出时期，该平台利用信息获取渠道较多、信息发布覆盖面较广的优势，实时发布预警信息，指导闽籍华商如何应对相关风险，成为风险规避经验交流与预警的平台。

参考文献

[1] 李鸿阶，林心淦，海外闽商资本研究及其政策建议——以“国际华商500”为例进行分析[J]. 亚太经济，2005（3）：85-88

[2] 龙登高 赵亮 丁骞，海外华商投资中国大陆：阶段性特征与发展趋势[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8年6月第2期：10-17

[3] 薛承，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华商在中国大陆的投资及其作用[J]. 党史研究与教学，2006年第6期，32-39页

[4] 龙大为，谭天星，中国大陆侨资与外资发展比较研究——基于2005—2008数据分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4）：84-90

[5] 丘进主编，《华侨华人研究报告（2011）》，社会文献出版社，2011年5月

[6] 林心淦，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海外华商作用研究[J]. 亚太经济，2007（5）：14-17

[7]张学惠:海外华商作用在CAFTA 建设中形成机理研究.亚太经济, 2005年第5期

[8]陆芸:“海上丝绸之路”与福建建设海洋经济大省的研究.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 1997年第12期

作者简介:

马占杰, 华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讲师。

福建推进“一带一路”互联互通 基础设施建设的研究

刘 珊

内容摘要：在实现中国和周边国家互利共赢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中，基础设施建设成为优先发展的领域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福建在推进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建设过程中，应把握互利共赢、科学可靠、系统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四项原则，充分发挥自身文化、血缘、产业等优势，做到“两个利用”，即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利用政府和民间两类资本；做到“两个实现”，即实现传统交通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目标和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目标，实现为经济贸易服务的目标和为科技文化交流的服务目标。

关键词：一带一路 基础设施 互联互通 互利共赢

一、推进“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时代背景

“一带一路”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它将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来源于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重要演讲中提出的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倡议；2014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大会上，李克强总理全面阐述了推进“一带一路”的建设的亚洲合作政策，并特别强调要“一带一路”秉持开放包容精神，不会搞封闭、固定、排外的机制，继承古丝绸之路开放传统，吸纳东亚国家开放的区域主义。

“一带一路”不是从零开始，而是现有合作的延续和升级。有关各方可以将现有的、计划中的合作项目串接起来，形成一揽子合作，争取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整合效应。未来“一带一路”进程中的很多项目，涉及的国家和实体可能更多，开放性也更强。由于“一带一路”交流合作范畴要大得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成各国政府和人民关注的为优先领域和希望较大的早期收获项目。

基础设施是指为社会生产和居民生活提供公共服务的物质工程设施，是用于保证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活动正常进行的公共服务系统，它是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一般物质条件。基础设施又分为硬件基础设施和软件基础设施两个层面，硬件层面包括公路、铁路、港口、机场、后勤、服务及自贸区等领域，相对容易实现；而软件层面的基础设施，也就是价值观基础设施，则包括立法、政策、措施等，相对较难实现，需要双方不断加强沟通。

优先选择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为起点和重点，原因可从必然性和必要性两个方面来理解：

必然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选择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是尊重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

基础设施建设具有先行性和基础性的特点，在现代社会中，经济越发展对基础设施的要求越高；完善的基础设施对加速社会经济活动，促进其空间分布形态演变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而建设滞后则可能成为制约发展的瓶颈；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所谓“乘数效应”，即能带来几倍于投资额的社会总需求和国民收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基础设施是否完善，是其经济是否可以长期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世界各国普遍重视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2012年，非洲联盟通过《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规划》，确定了跨国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的总体规划，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2013年，欧盟就“连接欧洲设施”计划达成一致，将加强欧盟国家在交通、能源和电信等领域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对重大项目给予资金支持。

（二）选择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是充分利用历史经验，解决现实问题的必然

丝绸之路，概括地讲，是自古以来，从东亚开始，经中亚，西亚进而联结欧洲及北非的这条东西方交通线路的总称。丝绸之路曾是历史上亚欧大陆的交通动脉，中国、印度、希腊三种主要文化交汇的桥梁，解决了各国地理复杂，气候多变，经济文化制度多样等问题，促进了经济贸易文化等多方面交流，在世界史上有重大的意义，对后世影响深远。

（三）选择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是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实现互惠合作的必然

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有较为广泛的技术和经验积累，中国基础设施的设计建造水平已跃居世界前列，中国政府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开展基础设施领域的互利合作，并在融资这一关键环节，通过设立专项优惠贷款、成立专项基金、倡议设立亚投行等方式给予支持。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遍及180多个国家和地区，涉及道路、桥梁、电站、港口、通讯、石化、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各个领域。中国企业在承建基础设施项目的同时，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认真履行社会责任，实现了与东道国的合作共赢、共同发展。阿拉伯国家部分地区经历多年动荡，需要恢复各项经济发展，中国能为其提供基础设施建设等多方面的援助。双方在工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合作也具备巨大潜力。

必要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选择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是保障海上和路上生命线的必要

西行海上通道成为支撑国家利益快速拓展的重要平台和媒介，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南中国海的油轮是经过苏伊士运河的3倍、巴拿马运河的5倍，经过南中国海运输的天然气相当于全球贸易总量的三分之二。这条能源供应线对中国尤为重要，可以说是“海上生命线”，而这一通道所面临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格局已经形成，国家的安全威胁也日益突出。相对于中东、非洲能源产地而言，中国处于这一海上战略通道的下游，更容易受到上游国家的控制，具有更多的安全问题。因此，着眼亚太地缘大格局来维护西行海上战略通道安全显得尤为重要。

（二）选择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化解中国产能过剩问题必要

中国进入新的经济景气周期，许多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亦日渐突出，仅以钢铁、多晶硅等为代表的中上游工业制造业产能过剩现象明显，以部分机械制造行业为代表的中、下游工业制造业也出现了产能过剩。更值得关注的是，以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一方面快速增长满足城镇化的需求，但一

方面短期内供给大量涌现和供给过快超前势必引车流量小、利用率低及资源配置效率较低等问题。

（三）选择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国产业发展和升级的必要

“一带一路”打破原有点状、块状的区域发展模式。无论是早期的经济特区、还是去年成立的自贸区，都是以单一区域为发展突破口。“一带一路”彻底改变之前点状、块状的发展格局，横向看，贯穿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纵向看，连接主要沿海港口城市，并且不断向中亚、东盟延伸。这将改变中国区域发展版图，更多强调省区之间的互联互通，产业承接与转移，有利于我国加快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中国传统的出口国较为单一和狭窄，美国、欧洲和日本占据出口的核心国位置，占比很高，但这些传统的出口市场已经开拓得较为充分，增量空间已经不大，国内的过剩产能很难通过他们进行消化，在国内消费加速启动难以推进的情况下，通过“一带一路”来开辟新的出口市场是很好的抓手。

（四）选择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是形成亚洲各国命运共同体的必要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以加强传统陆海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实现经济共荣、贸易互补、民心相通。中国希望以“一带一路”为双翼，同南亚国家一道实现腾飞。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作为区域互联互通的重要部分，是目前世界各区域经贸合作中的先决条件。各国普遍认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使资源配置更为有效，推动区域内各国经济发展；有利于消除贫困和不平等，改善区域内人民的人居环境。正因为亚洲各国普遍关心基础设施建设问题，2012年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问东南亚时先后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由此成为亚洲及全球瞩目的焦点。对中国经济而言，“走出去”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周边国家基础设施不完善，给贸易、资源、人才自由流动设置了不小的障碍。基础设施建设已成为中国推进亚太区域一体化，密切区域经济联系的重要依托。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及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合作拓展了新的合作机遇和空间。“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具体体现为一个个铁路、公路、航运等基础设施项目，”国际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市场前景乐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保持了旺盛的需求，国际投资和金融机构积极参与，这为中国相关企业走出去开拓国际工程市场创造了机遇，至今中国已与20多个国家签署了关于加强基础设施合作的政府间协议，对于促进双边基础设施合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二、推进“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思路和原则

“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对福建扩大开放，加强同东盟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与文化是难得发展机遇。福建省融入一带一路的工作思路为：福建要紧紧抓住机遇，进一步巩固港澳台，深耕东盟、扩展中亚、中东，将历史优势、人文优势、经贸转化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工作优势，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战略的具体举措，统筹经贸与人文、官方与民间、走出去与引进来，梳理生成、推动实施一批经贸与人文交流项目，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¹

推进一路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总体思路总体思路可以概括为“两个利用，两个实现”

“两个利用”一是资源来源角度，即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一是从资本类型角度，指利用政府和民间两类资本。

¹ 福建发改委：福建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势、成效、思路[EB/OL] 人民网：people.com.cn /2014

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合理配置国际资源和国内资源引进来，走出去。“引进来”，不仅要扩大能源原材料特别是国内短缺原材料进口，更要吸收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这有利于我区积极利用和参与国际分工，通过国际交换，扩大对外贸易，缩小发展差距。“走出去”，意味着要支持有条件的企业有序到境外投资兴业。

利用政府和民间两类资本指应采取多种形式结合利用国家资本和民间资本，快投融资体制改革，推进投资主体多元化，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进入法律、法规没有禁止进入的基础设施领域，建立和完善政府推动与市场推动相结合的多元化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体系¹；

“两个实现”一是从建设领域角度，指实体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目标和为网络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目标。应以中国具有建设高速铁路和能源为代表，发展和支持丝绸之路相关国家等互联互通实体基础设施建设，二是从信息化角度，以中国已处于世界领先设备的通讯技术为基础，实现丝绸之路沿途的信息化基础建设。

一是从服务对象角度，是指互联基础设施建设经济贸易服务和科技文化交流服务目标。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一要为一带一路有关国家经济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服务，要为一带一路有关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提供平台。

“两个利用、两个实现”的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思路在实现过程中应把握互利共赢、科学可靠、系统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四项原则。

互利共赢即要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要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把既符合我国利益、又能促进共同发展，作为处理与各国经贸关系的基本准则。积极有效利用外资，着力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加强对外资的产业和区域投向引导；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到境外投资。要进一步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促进生产要素跨境流动和优化配置的体制和政策。

科学可靠原则即应合理规划，讲究投融资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重点应关注优先加强供水、供气、供热、电力、通信、公共交通、物流配送、防灾避险等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老旧基础设施改造。

系统协调性原则是指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基础设施除了交通、能源、饮水、通讯等的供给外，已经扩展到环境保护、生命支持、信息网络等新的领域。协调包括基础设施与城市规模、功能和空间的均衡，与城市发展阶段和城市外部环境的均衡，城市基础设施系统本身以及各个子系统的完整性和有效性，各子系统之间的协调等等。

可持续性原则是指在强调均衡的基础上，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必须适度超前，避免建设滞后和盲目性。所以科学合理的城市基础设施发展规划是重要前提坚持先规划、后建设，切实加强规划的科学性、权威性和严肃性。发挥规划的控制和引领作用。

三、福建在推进“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中的优势与定位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强调，“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

¹ 吴颖，民间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影响因素与相关对策[D]华北电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开放新格局”。福建省“两会”对于福建融入一带一路做出准确定位，提出“福建将抓住国家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机遇，鼓励有条件企业加快“走出去”，培育一批本土跨国企业。”福建应起到一带一路战略枢纽和新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作用。

在推进一带一路及其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福建定位“来自于各方面可利用的“福建优势”：

（一）福建与东南亚、中亚和西亚各个国家渊源久远，友谊深厚，经贸文化关系稳固。福建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和发源地。在世界经济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泉州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之一。是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被当时誉为东方第一大港，被当代誉为东亚文化之都。福州长乐太平港是郑和下西洋的重要基地，漳州月港是明朝后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

（二）东盟国家2000多万华侨华人有近1000万祖籍福建，福建与东盟之间地缘相近，习俗相似，文化趋同，民间交流量大面广。无论是对外招商，还是对外投资，都有天然的优势和氛围。台港澳地区也是福建与东盟关系发展的重要桥梁纽带。台湾80%祖籍福建。闽台之间有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承、商缘相连、法缘相循的五缘优势。闽籍港澳同胞有120多万。

（三）福建是中国海洋文化的重要发源地，拥有四五千年的海洋文化历史，具有开放包容，拼搏冒险等显著海洋特色的福建精神。地域鲜明的妈祖文化、船政文化，在中国乃至世界海洋文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在东南亚、台港澳地区得到广泛认同。

（四）福建产业基础完备，资金和技术力量相对较强，产品性价比高，尤其是建材、纺织、服装等在国际市场广受欢迎。东盟不仅仅是福建资源型产品的重要原材料来源地，也是拥有近6亿人口的消费市场；中亚和西亚是福建能源矿产资源的重要来源地。

四、福建推进“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的的具体措施

一、“两个利用”具体措施

（一）广泛吸纳国内国外两个资源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呈现了多渠道、多层次、多方面、多形式，交流日趋机制化的新局面和新特点。政府、地方和民间并举，大大推动了东南亚国家间和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在当代网络信息时代下，东南亚文化飞速发展。现代化的交流手段，电脑和互联网的应用，大众文化传播媒介的广泛兴起，为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机。东南亚国家之间和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文化之间的交流必将日益加速，传播将更加宽广。东亚地区合作的发展，尤其是当代东盟的建立与扩大、东盟10+3和10+1协商机制的形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东亚峰会的召开和东亚区域合作的逐步向前迈步，将使东亚东南亚国家之间的联合日趋密切，并走向协商的机制化。

（二）有效结合政府和民间两类资本

在政府在宏观上给予民间资本正确的方向引导基础上，真正破除各种有形和无形的壁垒，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社会事业、金融服务等领域，推动民营企业加强自主创新和转型升级，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重组联合和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加强对民间投资的服务、指导和规范管理。

二、“两个实现”的具体措施

(一) 福建实现实体经济和网络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目标

在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应在发展海洋经济基础上，重点整合和支持福建和相关国家的港口发展；支持福建企业对相关国家建设境外渔业综合基地和水产养殖基地。打造海洋经济的资源市场配置平台、产业合作交易平台和人力资源培育平台。

港口发展首先和重点加快福建省内厦门、福州和三大港口建设。将厦门港建成以集装箱运输为主、临港产业和对台贸易散杂货为辅，客货并举的国际航运枢纽港和国际集装箱中转中心；将福州港发展成为拥有平潭综合实验区港口物流园区和对台滚装码头集装箱在内的大宗散杂货运国际航运枢纽港；将湄洲湾港建设成为以大宗散货运输为主兼顾内贸集装箱运输的主枢纽港。

组织福建有实力的水产养殖企业赴东盟国家，联合开展海洋渔业养殖合作。并积极协助有关部门、地方政府和企业加快境外远洋渔业综合基地建设，推动在东盟和非洲有关国家建设新渔场。支持在印尼、缅甸、毛塔等国投资兴建7个集渔船停泊、维修、制冰、加工等设施较为齐全的境外远洋渔业基地；远洋渔业作业区域不断拓展，分布在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等公海海域和印尼、印度、缅甸、毛里塔尼亚、几内亚比绍等国家经济专属区海域。在印尼、缅甸、毛塔等国投资兴建7个集渔船停泊、维修、制冰、加工等设施较为齐全的境外远洋渔业基地；

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应实施民间资本进入移动通信转售业务、接入网业务试点，推动网络信息安全技术管控平台建设；加快实施“数字福建·宽带工程”建设，提前谋划4G网络建设。同时，出台支持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信息通信发展的政策举措，缩小省内各地区“数字鸿沟”。在同东南亚国家经贸文化交往中搭建“网络版”中国—东盟海产品产业合作暨交易平台。

(二) 结合基础设施建设为经济贸易和科技文化交流服务

结合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抓好经济项目，全力推动福建3个“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项目顺利实施。启动申报项目前期工作，推动“中国—东盟海洋合作中心”在福建设立，争取更多项目列入“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继续组织福建有实力的水产养殖企业赴东盟国家，联合开展海洋渔业养殖合作。并积极协助有关部门、地方政府和企业加快境外远洋渔业综合基地建设，推动在东盟和非洲有关国家建设新渔场。同时，扩大福建菌草及早稻技术走向东盟国家并在斐济及周边岛国普及推广等。同时应有效利用相关国家的比较优势。例如相比福建，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拥有高科技电子产品开发和制造的比较优势，而印尼、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则保持着资源型、原料型产品的比较优势。结构互补性为进一步扩大双方贸易提供了直接的驱动力。福建应围绕纺织、电机、钢铁、石材加工等行业，以境外加工贸易的形式投资越南等生产成本较低的国家，有效规避贸易壁垒，推动转型升级。对印尼、菲律宾、柬埔寨的渔业、矿业投资。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设立旨在开拓东盟市场的境外营销网络，维护和开辟国际市场。

结合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为科技文化服务，内容包括推动人文先行，着力打造妈祖文化和船政文化等海洋文化品牌，办好“第四届南洋文化节”、“友好之船”、“福建省东盟政府官员培训班”等活动，同时支持福州、漳州、泉州参与联合申报“海上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不断提高福建文化软实力和发展的整体水平，继续抓好公共文化网络体系建设，推进城乡文化一体化协

调发展；加强文化创新，提升福建文化艺术水平。大力实施文化艺术精品工程。加强区域间文化产业的整合和扩张，发展壮大特色文化产业集群。加强对外对台文化交流，实现闽台文化交流的新飞跃。在政策扶植、信息服务、平台搭建、渠道疏通等领域推动、鼓励文艺团体赴国(境)外开展商业演出，鼓励对外文化更多以民间和商业的方式“走出去”开拓海外市场。

作者简介：

刘珊，华侨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讲师。

海上丝绸之路框架下 闽台经贸合作的共同利益

王 琼

内容摘要：海上丝绸之路是两岸人民共同携手开创的，福建与台湾都位于“海上丝绸之路”黄金航线上，两地与海上丝绸之路航线上各国的经贸合作由来已久。福建与台湾具有“五缘”独特关系，而且闽台经贸合作起步早、覆盖范围广、涉及领域多、融合程度深。福建省引进台资项目、利用台资金额和实有台资企业数均居大陆各省市第三位。中央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是进一步加快闽台经贸合作发展的重大机遇，为深化闽台经济交流合作拓展了新的广阔空间。同时，闽台两地有很多的共同利益，同时也具备共建海上丝绸之路的优势资源。

关键词：闽台 经贸合作 海上丝绸之路

一、闽台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渊源深厚

海上丝绸之路是两岸人民共同携手开创的，从历史上看，福建与台湾都位于“海上丝绸之路”黄金航线上。货船从福建沿海的福州港、泉州港、漳州港出发，往南驶入东南亚各国，进而延伸到中亚、中东各国。福建现旅居世界各地的闽籍华侨华人有 1200 多万人，其中 80%集中在东南亚；现聚居于东盟国家 2000 多万华侨华人中，有近 1000 万人祖籍福建，2012 年福布斯亿万富豪榜中，东南亚华商有 30 位，24 位是闽籍。这些丰富的侨胞人脉资源，成为福建与东盟经贸合作、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中国大陆第一批由闽籍华侨率先倡导和投资的工业区在福建设立，如今国家级融侨经济技术开发区、福建元洪工业集中区等都已成为对外经济合作的重要窗口。随着 2010 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福建与东盟经贸合作不断拓展，2013 年福建与东盟双边贸易额达 242.9 亿美元，实际利用东盟外资 3.47 亿美元，东盟已成为福建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四大资金来源地第二大对外投资目的地。截止 2013 年底，福建在东盟设立的境外企业和分支机构共 156 家，对外投资额 4.5 亿美元，东盟已成为闽企对外经贸合作的重要地区。

台湾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也颇具渊源，早在三国时期，孙吴具有出海远航的主客观条件，多次在从江浙沿海出发，借助风帆和海流移动的力量，以及天文、地文导航，在顺风顺水相送下，航渡出海近则台湾，远则日本等地，形成了早起海上丝绸之路。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旺发展，台湾与东盟的经贸来往日益频繁。在 20 世纪 60 年代双边贸易就开始迅猛发展，投资方面，上世纪 60 年代初台湾通过多项奖励投资条例措施来吸引外资，以东南亚华人华侨投资为主体的东盟对台湾投资迅速

增长。台商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布局东南亚各国，台商在泰国、马来西亚、印尼以及越南开始陆续投资办厂。为强彼此经济合作，台湾与东盟不断尝试建立较紧密的经贸合作机制，扩大双倍贸易与投资规模。双方都设立了驻对方的经济代表机构，同时台湾与东盟多国定期或不定期举办“部长级”官方经济交流会议与民间经贸会议。目前，东盟是台湾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二大出口市场。2011 年台湾对东盟出口比重占 16.5%，同比增长 22.7%。

二、闽台经贸交往成熟，为共建海上丝绸之路提供合作基础

闽台经济合作由来已久，改革开放之初，福建就是祖国大陆对台贸易、吸引台资的重点省份。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闽台经济合作开始迅猛发展，20 世纪 90 年代逐渐进入了稳定发展阶段，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闽台经贸合作平台不断拓宽，两地经济合作涉及到更多领域，经济往来日趋活跃。在双边贸易方面，截至 2013 年底，闽台贸易进出口总额 1145.14 亿美元，居大陆各省市第五位。2013 年闽台进出口总额 128.5 亿美元，同比增 7.4%，台湾成为福建第四大贸易伙伴。在双向投资方面，截至 2013 年底，福建省累计引进台资项目 13524 个，实际利用台资 220.79 亿美元(含第三地)，实有台资企业 3908 户，均居大陆各省市第三位目前福建有 6 个国际级台商投资区，建立了大陆最大的海峡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创建了漳浦等 6 个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先后吸引 500 多家台资农业企业入驻。2013 年，福建省新批外商投资项目 840 项，实际利用外资 66.8 亿美元，同比增长 5.4%。其中，福建实际利用台资 10.73 亿美元(含第三地转投)，同比增 38.2%，拉动全省实际利用外资增长 4.68 个百分点。2013 年商务部共核准闽企在台设立 12 家企业和分支机构，核准对台投资额 1.02 亿美元，同比增长 22.8%。截至 2013 年底，闽企在台湾设立 46 家企业和分支机构，核准对台投资额 2.59 亿美元。在产业分工合作方面，闽台产业合成呈现多领域、多层次、多形式的对接格局，尤其在电子信息产业、石化产业、装备制造、农业、金融业、物流业等产业的两地合作表现突出，闽台合作产业集群正不断壮大。

中央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是进一步加快闽台经贸合作发展的重大机遇，为深化闽台经济交流合作拓展了新的广阔空间。同时，闽台两地有很多的共同利益，同时也具备共建海上丝绸之路的优势资源，闽台两地携手合作，将更好地促进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共建和两岸共同繁荣富强。

三、闽台共建海上丝绸之路，有利于福建打造“海丝”先行区

对福建而言，同台湾共建海上丝绸之路有着充足的合作动力。中央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后，海上丝绸之路区域内不同城市竞相布局，争当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排头兵。这些地区之间拥有许多相似的区位条件、趋同的资源，福建如何脱颖而出，打造“海丝”先行区是首先要考虑的。闽台在发展阶段、产业结构、资源禀赋上有相当的互补性，台湾许多行业的发展水平都高于福建。福建凭借对台先试先行的优惠政策，全面深化与台湾在各个行业的交流合作，通过学习台湾的先进经验，提高海峡西岸经济区综合经济实力，努力打造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经贸合作的前沿平台。

东盟各国历来都是福建传统的贸易伙伴，从贸易结构上来看，机电产品、服装和农产品三大类产品是福建与东盟之间的主要贸易产品。福建与东盟的机电产品、农产品贸易中，台资起到很大的

促进作用。以农产品为例，闽台农业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巨大。福建凭借台湾农民创业园建设和海峡两岸农业、林业、渔业合作示范区，促进闽台农业产业的深度、全面的对接，包括了良种设备、农业技术、经营管理、农业人才的交流与合作。截至 2012 年底，全省累计批准农业台资项目 2426 个，合同利用台资 32.5 亿美元，实际利用台资 18.4 亿美元；引进良种 2500 多个，其中 150 多个已规模推广应用；引进农业设备 5000 多台（套）。福建农业发展水平得到很大的提升，农产品出口竞争力提高。东盟成福建农产品最大出口市场，2013 年前 1-11 月，福建对东盟出口农产品 20.7 亿美元，同比增长 17.6%，占同期福建省农产品出口总值的 27.9%。

四、闽台共建海上丝绸之路，有利于台湾参与区域经济整合

对台湾而言，同福建共建海上丝绸之路有利于参与区域经济整合，开拓东盟市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中，加强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是重要内容。东盟是东南亚囊括人口众多的国际组织，也是海上丝绸之路航线上的重要经济体。21 世纪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东盟与中日韩“10+3”区域经济合作进程稳步推进，2002 年起东盟与中国、日本、韩国领导人相继签署了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2003 年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签署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中央政府与澳门特区政府签署的《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台湾经济面临巨大压力，经济边缘化恐惧袭遍全岛。2010 年 ECFA 的启动虽然有利于缓冲台湾商业在大陆竞争的劣势，但是台湾对东盟的经贸合作空间扩展仍然存在许多阻力。台湾仅在 2013 年与新加坡一国签订了相当于自由贸易协议的“经济伙伴协定”。目前筹建中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都排除台湾。

按照目前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形势，目前台湾出口到东盟国家的商品，面临较高关税以及原产地、当地国自制率及其他非关税障碍的多重制约，未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达成后，台湾商品进入其许多重要贸易伙伴的市场也将遭遇出口困难，竞争力下降。通过与大陆展开更加深入的经贸合作，寻求突破将是台湾参与区域经济整合最好的选择。近年台商与东盟的经贸合作中，大陆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台商把台湾的技术、原材料在福建生产、加工，实现产品增值后销往东盟。目前在福建从事加工贸易的台资企业，销往东盟地区的产品占很大比重。闽台共同融入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无疑为台湾进一步打开海上丝绸之路航线上各国，尤其是东盟等海外市场打开了一条出路，成为台湾迈向全球联接的重要契机。

作者简介：

王琼，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

海上丝绸之路框架下深化闽台金融合作

徐宝林 赵均

内容摘要：去年以来，我国在国内国际各种场合多次提出要同周边国家一道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与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福建省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加上其得天独厚的区位条件，以及多年发展奠定的较好经济基础，自然应当把握住这一次难得发展机遇，并充分利用其优势条件融入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并争做海上丝绸之路的排头兵与桥头堡。当今社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福建要想融入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并发挥重要重用，很重要的一方面，必然要求其加快在在贸易、运输、物流、港口等方面的建设与发展，这一切的发展都离不开金融这一重要支持力量，由于福建自身金融发展水平有限，而与其毗邻的台湾则有着较为发达的金融服务体系，并且两岸有着长久的金融合作基础，通过深化两岸金融合作，推动福建更好地融入海上丝绸之路便具有很强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本文主要从福建融入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角度出发，探讨如何通过深化闽台金融合作推动福建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桥头堡！

关键词：海上丝绸之路 福建 闽台金融合作

一、绪论

（一）研究背景

2013 年 9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参加上海合作组织元首理事会第十三次会议期间，在哈萨克斯坦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了题为《弘扬人民友谊，共创美好未来》的重要演讲中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一战略构想，他说：这是一项造福沿途各国人民的大事。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先做起来，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上合组织六个成员国和五个观察员国都位于古丝绸之路沿线，上合组织正在协商交通便利化协定。倡导通过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促进欧亚各国加强合作与联系，实现各国互利共赢。同年十月，习近平主席在印尼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再印尼国会发表演讲时又再次提出了要同东盟各国共同建设“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一构想。“一丝一带”这两个战略构想的提出，将为亚欧大陆以及东南亚等环太平洋相关国家和地区带来难得的发展机遇，这也引起了国际国内的广泛响应。

“一丝一带”战略构想提出以来，多个省市都将其看作自身发展的一次良好机会，并表示出了对参与其中的强烈兴趣。湖北省政府研究了抢抓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机遇、推进湖北向西开放，与新疆博州产业共赢发展的意见措施。山东、河南表述分别是，“积极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推动河南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同时，包括陕西、甘肃、新疆、广东、广西、福建等 16 省市都在抓紧起草相关文件，争抢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机遇。

福建省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自然不应该错过这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加之福建位于东南沿海，与台湾岛隔海相望，毗邻东南亚，又具有良好的海洋经济基础，显然福建应该将其重心放在融入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上，而且应该利用其良好的区位优势争做新海上丝绸之路的桥头堡。“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进行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新时期建设海上丝绸之路也，其重心自然也离不开与沿线各国的经贸往来与人文交流。同样，福建要想融入海上丝绸之路并且在其中发挥桥头堡的作用，必须要推动其在对外贸易与合作、交通运输、港口建设等方面的大力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加强与海上丝路各国的科技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合作。但在当今社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也一样，作为一项系统性的工程，自然需要强有力的金融支撑，福建紧邻台湾，并且与台湾有着长期良好的金融合作基础，通过闽台金融合作的研究，找到新时期深化闽台金融合作的政策措施，对于把福建打造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桥头堡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福建要想融入海上丝绸之路，并且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桥头堡，离不开全面而完善的金融支持，而现阶段单靠福建省的金融发展水平，还难以支撑起这样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但福建毗邻台湾，台湾有着较为全面的金融服务体系以及完善的金融制度规范，并且闽台之间有着将较为长期的合作经验，通过最闽台金融合作的研究，发现闽台金融合作多年来的经验以及面临的挑战和阻碍，并结合海上丝绸的大框架，提出促进闽台金融合作的政策建议，对于将福建打造成为海上丝绸的桥头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深化闽台金融合作对福建融入海上丝绸之路的必要性

（一）闽台金融合作对推动福建对外贸易发展的巨大作用

福建要想融入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势必要求其加强同相关国家的经济贸易往来，同时也要求福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提升其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并增强其对相关国家的吸引力。纵观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无不需要金融的发展作为支撑，如今，金融已经成为了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一个国家或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高低，金融体系是否完善，金融制度知否健全，对经济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而对于福建融入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海上丝绸之路桥头堡来说，金融也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首先，可以为福建发展外向型经济，增强同各国的经贸往来提供融资支持。金融企业作为市场上专门进行资金融通的重要机构，能够以较高的效率汇集众多的资金，并为外贸等相关企业提供资金支持，而在金融市场比较发达的情况下，企业也能以较低的融资成本和较高的融资效率获得资金，从而提高其在发展中的优势。比如发达的银行体系可以为外贸企业的发展提供充足的贷款支持，而风险投资以及私募股权基金又可以促进创新性企业的发展，发达的证券市场可以为中小企业提供上市的机会……深化闽台金融合作，能为福建进一步开展对外贸易，发展外向型经济提供高效的资金支持，使其更好地融入海上丝绸之路之建设。

其次，可以为福建发展外向型经济提供风险规避手段。对外贸易，较之于其他经济形式，他面临的时间和空间不确定性更大，可以说从发展对外贸易的基础设施建设到贸易完成的各环节都会面

面临着巨大的风险。而外贸企业自身力量有限，很难防范和分散这些风险，这时，就需要发挥金融机构在防范和分散风险方面的作用，比如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都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来为外贸企业抵御和应对风险提供服务，进而能够促进福建省更好地开展对外贸易，加强同各国尤其是东南亚各国的经贸往来，从而更好地融入海上丝绸之路。

最后，健全的金融制度有利于外贸和经济的良性发展。经济贸易的发展不仅需要外贸企业自身的努力，以及政府和金融机构资金的支持，更需要建立完善的配套制度，包括金融、法律、会计、产权、信用等，这些制度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一个地区经济的发展产生影响。闽台合作，在这一地区建立完善的金融服务制度，不仅有利于本地区经济贸易的发展，使其更好地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更能增强本地区的吸引力，吸引更多的资金前来投资，推动福建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桥头堡。

（二）两岸金融发展水平的差距

福建省要想融入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需要加强金融方面的发展，但福建作为一个地处长三角和珠三角之间的省份，其金融发展水平还很有限，以其自身力量尚不足以支撑福建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这一庞大工程。而作为与福建仅隔海相望的台湾，其具有较为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以及健全的金融制度，金融市场较为发达，经济金融化程度较高，台湾地区虽然只有 2000 多万人口，但截止 2014 年 3 月底，共有金融机构总行 426 家，分行 6257 家，而福建拥有人口 3500 多万、经济总量 2000 多亿，经济金融化程度远低于台湾地区¹。

表 1 台湾地区主要金融机构数（2013 年）

机构类型	总部	分支
一、货币机构	367	4605
中央银行	1	0
本国银行	39	3442
外国银行	28	36
大陆银行	3	3
信用合作社	24	257
农会信用部	278	823
渔业信用部	25	44
二、其他金融机构	60	1649
中华邮政公司储汇处	1	1322
证券金融公司	2	4
产物保险公司	20	170
人寿保险公司	28	123
票券金融公司	8	30

¹ 陈小梅. 闽台金融合作的现状与发展. 江西金融职工大学学报, 2010 (2)

存款保险公司	1	0
总计	427	6254

(数据来源:台湾中央银行金融统计资料)

表 1 为截止 2013 年的台湾地区金融机构数,从表中可以看出,截止到去年底,总部设在台湾的金融机构共有 427 家,另外还有 6200 多家金融机构分支机构,其中货币类金融机构共有 367 家总部位于台湾,其他金融机构也有 60 家。而相较于台湾地区,福建的金融发展水平则相对落后。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数据显示,截止 2013 年,福建共有银行类金融机构 105 家,而总部位于福建的证券公司仅有 3 家,总部位于福建的基金公司也只有 3 家,总部位于福建的保险公司只有两家,在福建设立分支机构的保险公司也只有 51 家,可见,但从金融机构的数量上来说,福建的金融发展水平与台湾地区相比,仍然有很大的差距。同时,从表 1 可以看出,台湾地区的金融机构种类齐全,并且针对不同的行业都有专门的金融服务机构,说明其发展层次较高,这一发展水平上的差距客观上要求福建省深化与台湾的金融合作。

三、深化闽台金融合作的基础

福建与台湾之所以能够进行更加深入的金融合作,是因为两岸的合作有着较为坚实的基础,包括政策、经济环境、地缘优势以及已有的经验等,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良好的政策环境

无论从大陆还是台湾方面来看,都有着开展金融合作的较为宽松的政策环境。自 2009 年 11 月两岸金融主管机关完成两岸银行、证券期货及保险三项《两岸金融监管合作备忘录》(MOU)的签署以来,包括《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海峡两岸货币清算合作备忘录》(MOU)、《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等多项协议也已陆续签订,早在 2010 年,国务院就将福建确立为“两岸人民交流合作先行先试区域”的定位,这个先行先试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加强两岸金融合作,这些都为两岸开展深入的金融合作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二)两岸已经开展了较为长久的经济金融合作

福建与台湾,利用其天然的地理位置优势,加上政策的鼓励,已经开展了较为广泛的经济金融合作。福建中行早在 1988 年就开始试点新台币兑换业务,迄今为止,台湾“金管会”已核准 13 家银行到大陆设立分行,大陆已核准其中 11 家开业,5 家银行设有代表人办事处。台湾已有 11 家证券商在大陆设立 24 个办事处,也有 14 家获大陆证券监管机构核准资格,其中 11 家取得投资额度合计 15.2 亿美元。同时包括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也陆续开展合作,目前,两岸已经在银行、证券、保险、货币兑换等各个领域开展了广泛的合作。这些已有的金融合作都将为新时期深化福建与台湾的金融合作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三)闽台之间天然的“五缘”优势

福建与台湾一衣带水,台湾同胞多数祖籍位于福建,两地地缘近、血缘亲、文缘深、商缘广、法缘久,而且两地也有着悠久的经贸往来历史,这些都为深化闽台金融合作奠定了坚实的社会与文化基础。

四、闽台金融合作面临的挑战

尽管闽台之间已经开展了长久的金融经济合作，但制约两地金融合作的因素依然存在，深化两岸金融合作仍然面临着一些挑战，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福建省对台资的吸引力不够强

最初福建能够吸引台湾大量资金前来投资，主要是源于两岸地缘、血缘上的联系，但随着近年来珠三角、长三角的地区经济的突飞猛进以及政策的倾斜，福建对台资的吸引力逐渐减弱，近年来吸引台资的份额也有所下降，这不利于深化两地金融的合作。2012年末，福建省的GDP为1.97万亿元人民币，增长11.4%，高于全国水平3.6个百分点，但只相当于沿海地区广东省的34%、浙江省的57%、江苏省的36%、山东省的39%¹。表1是台湾目前在大陆设立分支机构的银行分布情况，从中可以看出，台湾在大陆设立分支机构的银行主要集中于北京、长三角以及珠三角地区，而仅有一家银行在福建厦门设立办事处，这反映出相较于长三角、珠三角以及北京等地，福建对台资的吸引力较弱。

表1 台湾银行在大陆设立的分支机构

名称	设立地点	办事处设立时间	设立分行
土地银行	上海	2003.04.09	台湾地区核准
合作金库银行	北京	2002.11.07	台湾地区核准
国泰世华银行	上海	2002.05.15	台湾地区未核准
第一银行	上海	2003.03.07	台湾地区核准
华南银行	深圳	2002.11.26	台湾地区未核准
彰化银行	昆山	2002.04.08	台湾地区核准
中国信托商业银行	北京	2003.01.20	
美国首都银行（台资）	厦门，重庆	2006.12，2007	
远东国民银行（永丰银行美国子行）	北京	1993.6.8	
台湾银行	上海	2010.02.02	
玉山银行	东莞	2010.05.28	
兆丰银行	苏州	2009.11.18	
台湾中小企银	上海	台湾核准	
台湾工业银行	天津	计划申请	

（资料来源：罗晓军.后 ECFA 时期两岸银行业往来.《上海金融》创刊 30 周年征文）

（二）现阶段两岸金融合作层次较低，范围较窄

虽然近年来，在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推动下，两岸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开展金融合作，但总的来说，两岸目前的金融合作层次仍然比较低，范围仍然不够宽。目前两岸在银行，保险，证券等方面均有合作，在银行方面，福建首开台资企业入股农村合作金融的先河，2006年末就有8家台资企业入股泉州市城区、将乐县等7家农村信用合作联社，2008年具有台资背景在香港富邦银行入股厦门商业银行，

¹ 人民银行党校干部进修班调研组.两岸金融合作机制——以福建为例,区域金融,2014(4)

也为闽台银行机构合作提供了新的路径。但总的说来,闽台银行合作发展程度仍然较低,目前,台湾7家银行在大陆的办事处均主要集中于北京、上海等台商投资密集区,而毗邻台湾的福建却无一家。而且由于台湾政策的限制,使得大陆银行难以进入台湾,闽台银行合作的单向性较为明显¹。

在两岸保险合作方面,随着我国保险市场的逐步开放以及与台湾的一系列协议的签订,两岸的保险业合作有了一定的发展,包括互设分支机构、人才培养、保险营销等方面的合作,目前,台湾国泰人寿已经在福建设立分公司,同时厦门建发与台湾人寿合资成立的君龙人寿保险公司也已经落户厦门。但总的说来两岸的保险合作层次仍然较低,这要体现在台湾目前对于大陆保险公司的进入尚没有具体的细则,并设置了较高的门槛,比如“50亿美元的最低总资产要求、30年以上的设立时间、两年的代表处设立经验”等要求,这些都对台湾保险业的准入设置了较高的门槛使得闽台之间的保险合作难以进入较高层次。

在证券合作方面,从政策上看,一直以来福建都积极支持两岸证券业的合作,支持符合条件的台湾证券机构在闽设立代表处,鼓励成立闽台合资证券公司,鼓励台湾投资基金来闽开展创业投资业务,并且也取得一些进步,比如台湾统一证券获准在厦门设立代表处。但是我们不得不认识到目前闽台在证券合作还处于起步阶段,两岸目前缺乏支持证券合作的相关法律依据,同时,两岸在一些制度上的差异也为两岸证券合作带来了很大的阻碍。

五、海上丝绸之路框架下如何深化闽台金融合作

闽台金融合作经过多年的发展,双方已经在银行、证券、保险等多个领域开展了越来越多的合作。但是两岸的合作层次仍然比较低,涉及面也还不够广,要想更好地为福建融入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服务,必须要进一步深化闽台金融合作。针对闽台金融合作现阶段存在的问题,本文给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 进一步完善货币清算机制,促使更多台资进入股权投资市场

两岸在货币清算方面的合作尚处于起步阶段,仅仅建立了两岸货币清算机制的基本框架,加强两岸合作,建立完善的货币清算机制,这不仅是深化两岸金融合作的需要,还是与优化这一地区对外贸易与投资环境,提升这一地区投资吸引力的需要,更是把福建打造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桥头堡必不可少的措施。

两岸自签署《海峡两岸货币清算合作备忘录》以来,已经基本上建立货币清算合作的基本框架,但这还不够,福建省尤其是厦门市,应该充分利用其有利的政策条件,开辟两岸金融合作新领域,吸引更多台资证券、保险机构来闽开展业务、设立分支机构。同时,应该以两岸建立货币清算机制为切入点,吸引更多台资进入股权投资市场,鼓励台湾风险投资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来闽开展业务。

(二) 两岸应共同出资设立相关金融机构支持福建建设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现阶段,闽台两地的金融合作层次较低,很多领域的合作还仅仅限于互设分支机构,互开营业网点这样的形式,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合作”。由于其自身金融发展水平的局限性,福建要想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发挥桥头堡的作用,必须要充分利用其区位优势加强同台湾的金融合作。由于

¹陈小梅. 闽台金融合作的现状与发展. 江西金融职工大学学报, 2010(1)

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必然要求福建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同相关国家开展更加大规模的外贸往来，这又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并且承担较大的风险。所以，两岸可以考虑共同出资设立金融企业为福建融入海上丝绸之路提供金融支持。两岸可以考虑共同出资建立开发银行支持福建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相关项目提供信贷支持，包括港口、道路等基础设施以及船舶等，这些项目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两岸还可以考虑共同出资设立创业投资基金，支持新兴的中小企业的发展，并吸引更多的外资、侨资前来创业投资，将福建打造成为海上丝绸之路最活跃的地区；两岸也可以考虑共同出资设立保险机构，为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航运、贸易等提供全面的保险服务，帮助企业防范分散外贸风险，使更多的企业更加大胆的开展对外贸易，提升福建的对外贸易水平。

（三）大力支持民营金融机构的发展

福建要想融入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并发挥桥头堡的作用，不能单靠政府以及国营金融企业的支持，尤其是在对中小企的支持上，应该大力发展民营金融机构的作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促进福建省经济贸易的发展。

民营金融机构虽然相对来说规模较小，网点较少，但对于中小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中小企业面临着大型国有银行“惜贷”的尴尬局面，民营金融机构的发展有利于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融资支持。2012年5月份，银监会发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实施意见》降低了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门槛，为民间金融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局面。目前，国家已经批准了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温州在支持民营金融业的发展方面已经有所作为，其出台的政策已经就民营金融的机构的市场准入、经营模式等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在新的阶段，闽台之间可以合作共同推进两地民营金融业的发展，首先，鼓励两地的民间资本共同建立数量众多的民营金融机构，以支持两地中小企业发展对外贸易；其次两地共同制定合理的制度规范民营金融的发展，如在民营金融结构的地位、准入条件、经营模式、退出机制等方面都应该有明确的规定。最后，要做好对民营金融机构的监管，尤其是对民营金融机构面临的风险的监管，金融行业存在着巨大的风险，民营金融机构由于其规模小、资本薄弱，风险承受能力较差，所以，应该更加注重对民营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

（四）加强两岸在金融信息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长久以来，两岸的金融合作更多是在金融业务层面的合作，很少涉及到金融信息共享方面的合作，我们知道，金融信息尤其是信用、资产等信息是一个金融机构有效地开展业务以及识别与防范风险的重要途径，两岸在金融信息方面缺乏合作已经阻碍了两岸金融合作的进一步发展，更是在一定程度阻碍了两岸在经济贸易方面的合作。两岸应该合作建立一个完善的金融信息交流平台，实现信用档案、资产评估等相关信息的共享管理，实现闽台金融征信资源的共享。这必将增进两地金融机构对两地市场的互相了解，从而更加合理有序的开展金融合作，同时，也必将使得两地的企业享受更加快捷高效的金融服务。这一措施将提供高本地区金融市场一体化的程度，增强本地区的投资吸引力，使得福建更好地开展对外经济贸易与合作交流，提升其在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地位。

（五）推进建立两岸一体化区域金融市场，更好地服务于福建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两岸应充分利用国家的有利政策以及 ECFA 协议签订之后的利好形式，加强在金融领域的合作，将这一地区打造成为新的区域金融中心，增强本地区的金融服务能力，拓宽金融服务形式，使福建

吸引更多的周边国家前来投资贸易，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桥头堡。两岸可以考虑进一步放宽金融机构的准入标准，并重点支持、优先发展在证券、基金等紧缺型金融项目上的合作，是本地区金融服务多样化，同时两岸还可以在金融创新方面加强合作，以应对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对金融服务所提出的新的要求。同时，还要加强在金融制度方面的建设，制定完善的金融制度，以满足区域金融中心的建设的需要。

（六）积极争取深化闽台金融合作的政策支持，优化福建投资环境

近年来，福建对台资的吸引力有所下降，这一方面是由于福建自身所处的地理位置的原因，以及珠三角、长三角等地的迅猛发展吸引台资前往，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国家对支持福建省发展的政策不如改革开放初期那么强烈。所以，在新的形势下，福建要想在 21 世纪海上丝绸路建设中发挥桥头堡的作用，就必须争取深化闽台金融合作的政策支持，比如降低台湾金融机构进入门槛、拓宽两岸货币清算业务试点，从而提升两岸金融合作层次与水平。

同时，福建还应该积极为在闽台资企业提供具有吸引力的税收等优惠条件，优化福建投资创业的软环境，以提升福建对台资的吸引力，促进两岸金融合作的进一步深化，为把福建打造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桥头堡提供金融支持。

福建要想更好地融入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不能只靠其自身的力量，应该充分利用其区位优势加强同台湾的金融合作，为福建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提供强大的支持与动力。两岸具有多年金融合作的基础，但是闽台金融合作还是存在一些问题与阻碍，在两岸政策的支持以及有力的经济形势下啊，两岸采取积极的政策，深化在金融领域的合作，把这一地区打造从成为区域金融中心，必将使得福建吸引更多的资金，提升福建对外贸易以及人文科技交流的水平与层次，成为海上丝绸路的桥头堡。

参考文献：

- [1] 翁建国. 两岸关系新格局下的闽台金融合作. 福建金融,2009, (2).
- [2] 陈小梅. 闽台金融合作的现状与发展. 江西金融职工大学学报,2010,(2).
- [3] 谢八妹. 后 ECFA 时期闽台金融合作的机遇、挑战与路径. 长春大学学报,2010, (5).
- [4] 人民银行党校干部进修班调研组. 两岸金融合作机制—以福建为例, 区域金融 2014,(4).
- [5] 李宪建. 新时期深化闽台产业对接的若干问题探析. 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1).
- [6] 刘松竹,吴尔江.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背景下广西与东盟经济合作深化问题研究. 广西财经学院院报,2014,(1).
- [7] 刘新生. 携手打造新“海上丝绸之路”. 东南亚纵横,2014,(2).
- [8] 黄建钢,骆小平. 论“现代海上丝绸之路”——以“浙江舟山群岛新区”为出发点的思考. 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2014,(2).
- [9] 邓丽娟. 现阶段如何加快两岸金融合作的可能途径. 台湾研究·两岸经贸,2010,(1).
- [10] 黄梅波,李菲瑜. 两岸金融合作:现状与前景. 福建论坛, 2009, (1).

[11] 张文棋,郑境辉. 深化海峡两岸金融合作的基本思路, 福建金融, 2008, (8).

[12] 石正方. 闽台经贸交流回顾与展望——基于区位优势变迁视角的分析. 闽台交往研究 2008, (10).

[13] 张玉华,刘晓东. 广西与东盟文化交流合作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前沿,2012, (18).

[14] 罗晓军.后 ECFA 时期两岸银行业往来. 《上海金融》创刊 30 周年征文.

作者简介:

徐宝林, 男, 经济学博士,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助理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风险资本投资、公司金融与资本市场;

赵均, 男, 厦门大学金融系硕士研究生。

“一带一路”框架下深化闽台电子商务合作研究

陈柏良 侯贞杰

内容摘要：近年来，在推动海峡两岸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电子商务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日益成为两岸经贸交流合作的重要内容和主要形式。后 ECFA 时代，在《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已经签署但尚未生效实施的背景下，闽台电子商务合作先行先试的政策新优势日益凸显，快速发展的比较优势逐渐显现，但是也面临着省域间对台合作的激烈竞争和福建省电子商务影响力及发展指数偏低的挑战。与 ECFA 框架并行不悖、互不冲突，在中国同周边国家和地区互联互通合作发展“一带一路”总体新框架下，积极推进闽台电子商务合作，有利于进一步带动闽台产业对接合作，有利于为深化拓展海峡两岸和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空间开辟更高层次平台。在新形势下，立足闽台经贸合作的新起点，主动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以电子商务作为深化闽台经贸交流合作的新平台和新路径，需要持续深化闽台电子商务产业制度合作、推进闽台电子商务行业人才培育和突破闽台电子商务商业模式创新。

关键词：“一带一路” 闽台电子商务 制度合作 人才培养 模式创新

近年来，在推动海峡两岸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电子商务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日益成为两岸经贸交流合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形式。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流通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电子商务是推进闽台经贸文化交流合作、促进闽台经济社会共同繁荣的重要选项和关键载体。但是，“十二五”时期海峡西岸经济区面临新的优势、挑战¹。当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入巩固深化新阶段，闽台经贸交流与合作也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²。后 ECFA 时代，在《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已经签署但尚未生效实施的背景下，闽台电子商务合作机遇和挑战并存⁴。当前，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理性认识和评价闽台电子商务合作的战略意义、新的优势、困境挑战，探讨闽台电子商务合作的重点思路方向和对策建议，对进一步深化和拓展闽台区域电子商务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一、“一带一路”框架下闽台区域电子商务合作的战略意义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形象概括和精炼整合⁵，是

基金项目：福建省教育厅社科 A 类项目（JA12406S）；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科研项目（SZ201201B）。

¹黄茂兴.“十二五”时期海峡西岸经济区面临的新优势、挑战与趋势探析 [A]. 杨强、徐斌. 闽台区域研究丛刊（第七-八辑合刊）[C]. 北京：海洋出版社，2012：31-43.

²王知桂、张雪玲. 闽台经贸合作的契机、挑战及其应对 [A]. 杨强、徐斌. 闽台区域研究丛刊（第七-八辑合刊）[C]. 北京：海洋出版社，2012：143-149.

³尤 权. 深化闽台经贸合作 促进两岸共同繁荣 [J]. 求是，2013（10）：16-18.

⁴林 侃. 闽台电商合作 有机遇也有挑战 [N]. 福建日报，2013-12-23.

⁵翟崑.“一带一路”开启全球互联互通史的新篇章 [EB/OL]. (2014-10-09)

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对跨区域合作大格局的宏伟构想和战略决策。“一带”是从中国至西亚并通往欧洲向西部腹地延展，“一路”是从中国至东南亚经太平洋向印度洋、阿拉伯海和海湾地区延伸，“一带”和“一路”对接，贯穿欧亚大陆，东连亚太经济圈，西入欧洲经济圈，是世界上跨度最长的经济大走廊，也是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合作带。“一带一路”倡议秉承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丝路精神，顺应区域合作的时代潮流，承载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梦”，借助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和区域合作平台，涵盖“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五大领域，契合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利益和发展需求，在世界政经版图上开创一个共商共建共享共荣的国际合作新时代，对闽台电子商务合作乃至两岸经济共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闽台区域是贯通（连通）“一带一路”的重要链接节点

福建省（简称“闽”）地处我国东南沿海，是连通海峡两岸的重要桥梁和通道，是对台交流合作的前沿平台和重要窗口。闽台区位独特、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是闽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天然条件。新时期大陆提出“一带一路”构想有着极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和时代背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福建的泉州港、福州港和漳州月港都对“海丝”发挥了重要作用，福建既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和发祥地，也是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占据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而台湾海峡也是“海丝”必经路段，作为中华民族经济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理应是大陆“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出海口与桥头堡¹。两岸之间便捷的海空通道，为闽台电子商务合作提供了特殊优越地理条件，有利于闽台两地人才流、物流等的快速流通，有助于实现流通效率和流通成本的最佳组合。

（二）跨境电子商务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一种创新思路

互联互通是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时代的根本特征，也是互联网时代的主要特征。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一带一路”的构建和推进不能沿袭古代商贸思路，而要有新的思路和手段²。“电子商务是综合性、战略性、基础性产业，对扩消费、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增就业、惠民生具有重要作用，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³，区域电子商务合作具有很高的产业关联度、感应度和带动性，涵盖信息流、资金流、物流、商流、人员流、信用流、技术流等要素合作以及法律法规、政策规章和协议规则等“制度流”的制度合作两大范畴⁴。从而有必要运用互联网思维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市场、用户、产品、营销、价值链、供应链和生态链等进行重新审视和思考。在推进“一带一路”进程中，借助电子商务这一重要抓手优化传统产业结构、支撑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增强综合竞争力等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对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具有更加深远的影响。

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14-10/09/c_1112737223.htm.

¹王敏. 台湾应积极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EB/OL]. (2014-08-25). http://chbcnet.com/pl/content/2014-08/25/content_933477.htm.

²杨达卿:“一带一路”构筑中国物流战略通道

[EB/OL]. (2013-12-27). <http://city.ifeng.com/special/chinacity57/>.

³汪洋:着力提升电子商务发展水平 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增添强劲动力

[EB/OL]. (2013-12-27).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3-12/27/c_118744355.htm.

⁴陈柏良. 后 ECFA 时代两岸电子商务合作: 视角、核心和维度 [J]. 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1 (6): 66-72.

（三）“一带一路”是衔接两岸与亚太区域合作机制的可行方略

当前，“一带一路”战略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两岸关系的发展¹。与 ECFA 框架并行不悖、互不冲突，“一带一路”是中国同周边国家和地区互联互通合作发展的新框架，辐射范围涵盖亚太地区大多数国家和地区²，而福建、台湾、东盟和东南亚等地区人缘深、文缘近、渊源长³。作为亚太地区的重要经济体，台湾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可以共享合作商机和叠加效应，同时也可以借道大陆与东盟、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建立良性商贸互动关系，为深化两岸和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创造条件，避免台湾经济日益边缘化危机，其发展前景也被台湾政商所看好。在互联网时代，台湾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是台湾融入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良好契机和可行路径，应把握契机、适当回应，甚至有效对接、主动融入、顺势作为，深化闽台电子商务合作，以打造两岸、亚太乃至全球华文电子商务共同市场⁴。

二、后 ECFA 时代推进闽台电子商务合作的新优势

（一）先行先试的政策新优势日益凸显

2013年6月21日，《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在上海签署，协议允许台湾企业在福建省（唯一试点省份）设立电子商务合资公司、注册 ICP 牌照且出资持股比例可达 55%，这一先行先试政策将有力推动台商在福建投资设点建立电子商务平台，为进一步深化闽台电子商务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13年11月19日，福建省政府转发 12 个厅局部门的《福建省跨境贸易电子商务工作实施方案》明确了跨境贸易电子商务鼓励和扶持政策，旨在解决目前跨境电子商务存在的通关、报检、收结汇、退税、统计等问题，以促进福建省跨境贸易电子商务健康快速发展，为深化闽台电子商务合作提出了方向性实施方案；2014年4月，福建省政府出台《关于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的九条措施》第一条就提出“支持发展跨境电子商务，对简化跨境电子商务通关、物流、支付、税务等流程的项目给予鼓励，支持跨境电商企业在境外设立仓储基地、自建或利用第三方跨境电商平台等。”2014年5月28日，福建省人民政府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快电子商务发展的若干意见》（闽政文〔2014〕157），明确了福建省电子商务发展在落户奖励、税收奖励、税费免征、半征（或返还）以及水电气等方面的扶持政策，并提出推动闽台电子商务合作，加强两岸电子商务跨区域、跨部门、跨业务合作交流，支持在我省台商投资区、台湾农民创业园等对台合作区域拓展电子商务业务。

特别地，2014年1月，海关总署批准平潭综合实验区开展跨境贸易电子商务试点工作，作为大陆面积最大、政策最优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平潭“实施比经济特区更加特殊的优惠政策”，对台湾粮油食品、土产畜产、纺织服装、工艺品、轻工业品、医药品类等六大类商品实行每人每天 6000

¹张蜀诚，“一带一路”战略对两岸关系的影响 [EB/OL]. (2014-11-06)

<http://crntt.com/doc/1034/5/7/2/103457214.html?coluid=1&kindid=0&docid=103457214&mdate=1106005431>.

²新京报曾如此描述“一带一路”的辐射范围：向北可与俄罗斯的交通线及管道连接，向东连接东亚另外两个主要经济体日本和韩国，向西通过中亚连接西欧，向南通过印度洋连接到北非，其辐射范围涵盖东盟、南亚、西亚、中亚、北非和欧洲。

³据统计，东盟国家 2000 多万华侨华人中，有近 1000 万人祖籍福建；东南亚的 2000 多万华侨华人当中，祖籍福建的有 1000 多万，福建在外华侨华人超过 80% 分布在东盟各国。

⁴自 2009 年以来两岸电子商务交流与合作“搭桥项目”会议和 2010 年通过的台湾“华文电子商务发展行动计划”旨在落实台当局“开启两岸经贸协商新时代”和“深耕台湾、全球连结”的施政理念，以让台湾成为全球华文电子商务营运中心；2014 年 7 月，台湾“经济部”的《电子商务发展纲领（草案）》以“打造台湾成为“亚太电子商务”创新及集资的基地”和“以电子商务产业作为台湾进军国际市场的动力”为整体愿景。

元免税额度等先行先试的优惠政策，有力地促进平潭建成两岸电商物流中转枢纽和跨境交易中心平台，有利于推动闽台电子商务网上交易互联互通；2014年2月，海关总署同意厦门试点开展对台湾海运快件业务，厦门成为大陆首个获准经营两岸海运快件业务的城市。可见，福建作为两岸电子商务合作的搭桥平台和通道功能新优势显著提升，一系列先行先试的政策新优势日益凸显，在这些特殊倾斜政策的直接推动下，闽台电子商务合作发展迎来新时代¹。

（二）快速发展的比较优势逐渐显现

近年来，两岸之间的网络购物已经开展的如火如荼。据统计，2013年在天猫首次开启的“双11”网购海外专场上，港澳台及海外的总交易金额约2.2亿元人民币，国际转运平台处理5.4万笔订单。其中，台湾地区的成交金额较2012年同比上升189%²。而作为电子商务大省，福建省网民网络购物的使用率为44.8%，网民上网支付使用率为41.7%，均比大陆平均水平高出2至4个百分点³，具有广阔而活跃的电子商务市场发展潜力。

2011-2014年，福州、厦门、莆田、泉州等4个城市先后被国家发改委等8部委联合授予“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2012年福州市海峡电子商务产业基地被商务部批准授予“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2013年全国各省城市电子商务发展指数排名福建位居第6，福建9个设区市全部入选“2013年中国电子商务发展百佳城市”⁴；在全国县域电子商务六个梯队中，福建位于第二梯队，其县域电子商务发展指数、县域网商指数、县域网购指数排名均位列第4位；福建有13个县入围2013年全国“电子商务百佳县”，紧随浙江和江苏后面，数量位居全国第3位⁵。同时，福建省食品加工、珠宝加工、纺织化纤、体育用品、家具、五金等生产制造基地为闽台电子商务合作发展提供坚实的产业支撑。

三、当前闽台电子商务合作面临的困境与挑战

当前，鉴于两岸特殊的关系，两岸电子商务交流与合作过程中面临市场性、制度性等问题与困境，诸如：由于大陆网民需要翻墙才能访问台湾网站所导致信息不对称问题、两岸对对方电子商务市场消费需求不了解问题、台湾企业缺乏大陆电子商务经营管理技术和售后管理机制问题、两岸电子商务人才匮乏问题，ICP执照申请准入门槛问题，行政流程窗口、通关仓储与关税便利性问题，商品检验和认证标准不一问题，知识产权、消费者保护法等法律对接问题等，这些都是两岸电子商务合作过程中面临的共同挑战，而就闽台电子商务合作后ECFA时代面临新的挑战。

（一）大陆对台合作的省域间竞争日益激烈

近年来，台商对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投资明显放缓，先行发展的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区和新发展的环渤海经济区、泛北部湾经济区，都是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强力竞争对手⁶。两岸经济合作区域从南

¹闽台电子商务迎来新时代 [N]. 厦门日报, 2014-8-1.

²陶海青. 电商鏖战“双11”市场格局初定 [N]. 中国贸易报, 2013-11-14.

³林侃. 闽台电商合作 有机遇也有挑战 [N]. 福建日报, 2013-12-23.

⁴阿里研究院. 2013年中国城市电子商务发展指数报告

[EB/OL]. (2014-06-04). <http://www.aliresearch.com/?m-cms-q-view-id-76472.html>.

⁵阿里研究中心. 2013年中国县域电子商务发展指数报告

[EB/OL]. (2014-01-21). <http://www.aliresearch.com/?m-cms-q-view-id-75912.html>.

⁶黄茂兴. “十二五”时期海峡西岸经济区面临的新优势、挑战与趋势探析 [A]. 杨强、徐斌. 闽台区域研究丛刊（第七-八辑合刊）[C]. 北京：海洋出版社，2012：31-43.

向北推进、由东向西扩展，台商投资区位的选择对象范围较大，投资重心从珠三角地区转向以上海为中心、苏南浙北为两翼的长三角地区，并进一步向环渤海湾经济圈扩展¹²，投资重点开始转向资金、技术密集的电子、机械、石化及基础设施领域产业³。

而福建腹地狭小、市场容量有限，主打产业为服装、鞋帽、塑料等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工业，台商投资环境吸引力不高，对外辐射能力不够强。特别地，由于互联网络随时随地随缘的跨区域、跨领域、跨产业特性，传统的区域环境等自然条件限制会发生变迁、淡化甚至散失，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闽台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优势，从而降低了台商在福建投资电子商务的吸引力。

(二) 福建省电子商务影响力及发展指数偏低

《中国城市电子商务影响力报告(2012)》⁴显示，在2011年首批21个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中，福建省的厦门和福州两个电子商务示范城市的综合影响力⁵均落后于杭州、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南京、成都、宁波、武汉、苏州、天津和重庆等城市，分别排名第13和第14，如表1所示。

表1 福建省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综合影响力(排名)和电子商务发展指数(排名)

示范城市	综合得分(排名)	吸引力(排名)	管理力(排名)	辐射力(排名)	电子商务发展指数(排名)
厦门	0.589(13)	0.175(15)	0.150(13)	0.264(12)	24.96(8)
福州	0.575(14)	0.172(17)	0.147(15)	0.256(13)	18.07(21)
泉州	——	——	——	——	16.26(35)
莆田	——	——	——	——	19.34(18)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城市电子商务影响力报告(2012)》和《2013年中国城市电子商务发展指数报告》数据整理。)

根据“阿里巴巴电子商务发展指数”(aEDI)指标体系⁶，2013年福建省电子商务发展指数为15.72，排名第6，落后于北京、上海、浙江、广东和海南；而厦门、福州、泉州、莆田这四个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的电子商务发展指数及排名也不高(如表1所示)，从入围四个细分排行榜的城市次数看，福建亦大大落后于浙江、广东和江苏，如表2所示。

表2 入围电子商务发展指数四个细分排行榜的城市次数

省份	外贸网商密度	内贸网商密度	零售网商密度	网购消费者密度	总计
浙江	8	8	8	4	28

¹李非. 两岸经贸关系发展形势与前景展望[J]. 两岸关系, 2006(3): 38-40.

²曹楠、胡仁霞. “大三通”后两岸经贸合作趋势分析与预测[J]. 经济研究导刊, 2010(8): 152-153.

³赵秦莲. 论闽台经贸交流与合作的机遇与挑战[J]. 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 2005(24): 90-92.

⁴荆林波. 中国城市电子商务影响力报告(2012)[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027-034.

⁵《中国城市电子商务影响力报告(2012)》从吸引力、管理力和辐射力三个层次(3个一级指标、10个二级指标、37个三级指标)衡量城市电子商务的影响力。

⁶阿里研究院. 2013年中国城市电子商务发展指数报告

[EB/OL]. (2014-06-04). <http://www.aliresearch.com/?m-cms-q-view-id-76472.html>.

广东	9	7	6	6	28
江苏	3	6	3	2	14
福建	2	2	4	2	10

（资料来源：《2013年中国城市电子商务发展指数报告》）

此外，《中国电子商务产业园区发展研究报告（2012）》¹显示，福建省的2个电子商务产业园区均处于第三梯队，其中：福州海峡电子商务产业基地综合得分70.5，排名第24；泉州电子商务产业基地综合得分62.8，排名第39²。

实际上，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本来就是中国大陆的电子商务基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杭州等一线城市区域的电子商务产业投资政策优惠、市场腹地广阔、高级人才资源充足，并通过争夺政策资源主动权进一步形成完善的促进电子商务发展软硬件支撑环境、提供优惠的财政税收等配套政策。例如，根据工信部与上海市政府联合发布的《关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进一步对外开放增值电信业务的意见》，上海自贸区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经营类电子商务）外资股比不超过55%，这对福建吸引台湾电子商务企业形成竞争和挑战。

四、“一带一路”框架下深化闽台电子商务合作的对策建议

当前，“一带一路”倡议已从理念设计、总体框架到完成战略规划，开始进入务实合作阶段。在新形势下，立足闽台经贸合作的新起点，以电子商务作为深化闽台经贸交流合作的新平台、新路径，根据商品管理、产品摄影、美工设计、客户服务、文案策划、营销推广、物流仓储、电商运营以及业务培训等电子商务业务链，从水平和垂直角度聚集闽台传统企业、网商企业和电子商务服务企业，加快构建全球领先的海峡两岸电子商务产业链和良性发展的闽台电子商务生态圈，积极推进闽台电子商务产业的资源整合、空间集聚和布局优化，分阶段逐步实现闽台电子商务的信息流、资金流、物流、商流、人才流、信用流、技术流的自由流动和制度流的对接合作，以进一步开创“海峡两岸（闽台）华文电子商务共同市场”，促进闽台商贸与电子商务融合增效。

（一）深化闽台电子商务产业制度合作

闽台电子商务要素合作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必然要求制度合作，并推进又进一步促进要素合作的不断巩固和拓展，制度合作是深化和拓展闽台电子商务合作的核心³。建立制度化、常态化闽台电子商务合作的沟通协商机制，推进两岸非官方的商务交流对话，协调、动员两岸青年、电子商务学术机构、学者智库、NGO组织、社会团体和媒体等各种民间力量友好交流，以两岸中华文化交流合作带动闽台电子商务合作。在贯彻落实ECFA等框架协议精神的同时，充分利用《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生效前的“空档期”，通过认真研究两岸（特别是闽台）电子商务的法律、规章或规则等制度安排的差别，明确闽台区域制度合作是闽台电子商务合作的战略突破点、融合创新点和提升着力点，

¹ 《中国电子商务产业园区发展研究报告（2012）》采用产业园区电子商务发展指数模型，分别从政府电商支持力、企业电商竞争力、电商对产业链增值贡献力和电商支撑体系保障力四个层面，对产业园区电子商务发展能力建设工作的进程与成效进行评价。

² aFocus发布中国电子商务产业园发展报告

[EB/OL]. (2012-12-11). <http://it.21cn.com/ec/a/2012/1211/09/20101434.shtml>.

³ 陈柏良. 后ECFA时代两岸电子商务合作：视角、核心和维度[J]. 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1(6): 66-72.

并以此作为进一步推动闽台关系更加紧密发展的战略切入点，推动闽台双方认可与统一电子商务规则达成制度合作并细化落实，出台更加优惠的政策条件，培育闽台电子商务合作独特竞争优势，以进一步深化闽台电子商务信息、资本、物流、人才、信用和技术等要素合作。

尽快建立公立、合法、互认的两岸电子商务信用指标体系，在保护知识产权、保护个人隐私及商业秘密、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等方面构建双方认可并具可操作性的监管规范；在制定闽台电子商务合作的政策规范、技术标准中最大化地满足两岸电子商务业者和民众需求；在审批、办照、用地、退税、通关、融资以及治安等方面简化办事程序、兑现优惠政策，营销高效优质的电子商务服务环境。特别地，作为贸易便利化的前提和基础，通关便利化是推进闽台电子商务合作的关键环节。推动平潭跨境贸易电子商务试点工作，亟需协同推进商务、海关、出入境检验检疫、边检、口岸办、国税、外汇管理局等跨部门协商交流、资源整合和法规调适，通过制度协调与创新放宽限制、简化程序、提高通关效率，高效解决电子商务流通过程中涉及到报关通关、报检商检、外汇结算、课税退税、仓储配送等环节领域的政策障碍。

（二）推进闽台电子商务行业人才培养

人才资源是电子商务发展的第一战略资源，人力资本是深化闽台电子商务合作的智力支撑。构筑海峡两岸电子商务人才战略高地，抢占并赢得未来闽台电子商务人才竞争先机，需要加快构建和实施闽台电子商务人才建设战略体系与工作保障机制，最大限度地吸引具有全球战略眼光、拥有本土实战经验和富有创新思想的电子商务、移动商务、跨境电商、互联网金融、云计算、大数据、标准法规和战略研究等领域的领军人才、创新团队和知名专家，充分激发人才创造活力、发挥闽台电子商务合作的人才价值；以《福建省引进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暂行办法》、《海西产业人才高地建设实施办法》、《海西创业英才培养实施办法》等现有人才政策为依据，贯彻落实《闽台人才职业培训交流工作联席会议工作制度》、《关于海峡两岸电子商务人才培养与交流的协议》，并进一步细化闽台电子商务人才交流与合作的配套政策体系，建立常态化的闽台电子商务人才交流与组织机制；通过设立闽台高层次电子商务人才专项基金，加快引进和培育运营管理经验丰富的闽台电子商务急需的高级管理人才（团队）、高端营运人才（团队）、核心技术人才（团队），加大闽台电子商务创新育成、融资贷款、人才住房等政策扶持力度。

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以高校为依托，构建政（政府）、产（产业基地、园区、企业）、学（高校）、研（研究机构）、用（用人单位）、协（协会、商会）、介（社会化中介服务机构）多为一体的闽台电子商务人才协同培育战略联盟和联动机制，特别是充分发挥闽台电子商务协会（商会）、海峡电子商务产业基地、厦门跨境电商园区、泉州网商创业园区、海西石狮电子商务园区和福州电商产业园等的桥梁联系机制和人才培养资源及功能，鼓励纵腾、塞维都、新时颖等跨境电子商务企业，联合中国邮政、阿里巴巴等企业面向东盟、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加强跨境电子商务专业人才的培养培训，并通过校企人才供需见面会、恳谈会、对接会等推进人企有效结合。继续推进和深化闽台高校联合培养电子商务人才项目（闽台合作项目），促进闽台高校电子商务专业相互交换学生学习交流；通过举办闽台电子商务竞赛活动推动人才选拔与交流合作；推动建立闽台电子商务人才孵化中心和人才评价机构，大力支持福建省高等职业院校、电子商务行业协会、专业电子商务服务机构

等联合台湾方面的高校、协会等机构开展电子商务职业技能鉴定、职业资格认证和人才培训等，建立闽台电子商务人才证照互认机制。

（三）推动闽台电子商务商业模式创新

立足华文电子商务市场实际，依托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福州、厦门、莆田、泉州）、跨境贸易电子商务试点（平潭综合实验区）、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海峡电子商务产业基地）、电子商务产业园区等载体平台，围绕最终消费者、用户的需求，务实推动闽台电子商务产业、技术、管理、产品和服务等方面进行不断整合与创新，驱动闽台传统产业合作的转型升级，提升闽台新兴产业合作层次水平，构建适合业务发展的闽台电子商务创新模式。当前，闽台电子商务合作的可能创新模式有：闽台两地网络零售商通过直接销售商品的方式向对岸消费者提供电子商务服务；闽台电子商务平台商之间通过搭桥销售或委托代理营运的合作方式，统一招商后以 B2B 的形式打包销售；闽台小型供应商或个人采用 C2B2C 模式直接在对岸网络平台开店；闽台大型供应商或平台企业采 B2B2C 模式在对岸网络平台开店；闽台电子商务从业者直接在对岸自主开设网络平台销售商品等模式。

积极引导闽台传统产业充分整合自身行业优势资源，探索线上线下协同运作模式，推动闽台移动电商、跨境电商、互联网金融、O2O 虚实结合模式、社会化媒体、云计算、物联网和大数据等新领域进行融合应用与跨界发展。面向闽台大宗商品、农产品、休闲食品、日用消费品、旅游和技术交易等行业领域，大力扶持和培育具有区域竞争力、服务于闽台产业合作的电子商务支撑服务、外包服务、增值服务等新型的第三方电子商务专业服务机构，为闽台企业或行业提供高效的供应采购销售、支付结算汇总、物流仓储配送、信用认证评估和投融资等电子商务配套服务，积极营造助推闽台产业合作的优质电子商务服务环境。重点支持闽台电商企业联合在东南亚建立电商产品配送中心和售后维修中心，鼓励推动“跨境电商+海外仓”的商业模式创新，推动闽台电子商务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交通枢纽和节点建立仓储物流基地和分拨中心，通过整合线上线下资源，完善闽台区域营销网络，共创互联网时代的网络丝绸之路。

作者简介：

陈柏良（1981—），男，福建莆田人，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经济贸易系讲师、硕士；

侯贞杰（1979—），男，福建福州人，福建省国际电子商务中心副主任。

福建加快融入“海上丝绸之路”战略

新兴产业深度对接合作创新研究

王 婷

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为泛亚区域合作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发祥地和我国最早对外开放的福建提供了难得发展机遇。

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辐射带动能力强、经济和社会效益好等优势，正在成为福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新引擎。立足福建省现有战略性新兴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和科研条件，拓展和深化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深度合作，既是进一步加快福建科学发展跨越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也是拓展福建区域发展空间、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 economic 转型升级，培育经济增长新动的有力支撑。

一. 深度对接合作基础优势

福建融入“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新兴产业深度对接合作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和基础优势。

1. 资源禀赋优势。从资源禀赋来看，福建省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具有较明显的优势。福建海洋资源丰富，海域面积达 13.63 万平方公里，海岸线总长 3324 公里，海洋资源种类繁多，海洋总产值居于全国前茅；新能源方面，福建省拥有丰富的太阳能、生物质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资源，拥有优质的硅矿资源，在一些领域有较好的产业基础，并具备比较优势和发展潜力。2. 产业基础优势。来自省统计局数字表明，福建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新兴产业产值年均增长 25%，产业产值和实现增加值增幅均高于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幅。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继续占据主导地位，生物新医药、新材料产业、海洋高新等新兴产业发展势头强劲。除了较快的增长率以外，福建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也初步显现，目前拥有福州、厦门、泉州 3 个国家级高新区，已有 12 个 LED 和光伏产业专业园区，还建设了一批国家和省级研发中心，LED 已基本形成从外延、芯片到封装、应用产品的较为完整的产业链，产业化及技术水平居全国前列，LED 芯片占国内产量六成以上，无极灯生产规模居全国第一，并逐步形成了一批在云计算硬件设备、应用软件服务等领域国内领先、产值超亿元的云计算企业。相关规划提出，到 2015 年，福建力争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达 3000 亿元以上，占地区生产总值的 12%；培育 14 个销售收入过百亿元、100 个销售收入过 20 亿元的重点龙头企业，一批大型龙头企业和产业集群辐射带动力将日益增强。3. 科技优势。技术研发水平不断提高，科技投入日渐增加，企业创新意识日益增强。“十二五”期间，福建省组织实施重大科技开发专项，建立并完善重大科技开发项目协调机制，重点突破一批制约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瓶颈的关键技术；积极争取在新型显示、led、稀土新材料、太阳能光伏等产业建立国家级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在电子信息、

生物医药、新材料、海洋高新等领域大力支持一批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关键技术为目标的省级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建立了一批面向社会开展技术扩散、成果推广的科技企业孵化基地、中试基地、生产力促进中心等科技服务机构。4. 政策优势。福建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并从规划、政策等方面予以推进，相继出台了《福建省“十二五”战略性新兴产业暨高技术产业发展专项规划》和《福建省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实施方案》，规划和方案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新能源、生物与新医药、海洋高新等新兴产业，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同时，决定成立5个涉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省级行业技术开发基地，帮助相关企业开展创新活动。省级财政统筹安排不低于5亿元的专项资金，设立战略性新兴产业引导资金，重点用于重大项目的跟进投资、重大科技开发专项、科技创新服务平台、产业化培植计划项目和应用示范项目资金补助等，同时，设立不低于10亿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基金（其中省级财政出资3.5亿元），重点培育发展一批处于初创期和成长期的创新型新兴产业企业，有利的推动了福建省战略性新兴产业跨越发展。

二. 深度对接合作模式创新

（一）以项目合作为核心的战略新兴产业跨境经济合作区模式

“跨境经济合作区”概念的提出，为世界性的区域产业合作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正在为许多国家积极的尝试与实践。建立以项目合作为核心的福建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战略新兴产业跨国经济合作区，采用“一区两国（或一区多国）、境内关外、自由贸易、封关运作”的方式进行管理，有利于双方（多方）企业整合利用跨国生产要素，发挥各自产业的比较优势，优化产业分工和布局，拓展延伸产业链，开拓对方国家市场乃至国际市场，助推产业转型升级。

（二）战略新兴产业跨境电子商务资源对接模式

跨境电子商务作为推动经济一体化、贸易全球化的技术基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跨境电子商务不仅冲破了国家间的障碍，使国际贸易走向无国界贸易，同时它也正在引起世界各国经济合作的巨大变革。构建开放、多维、立体的福建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战略新兴产业跨境电子商务资源对接模式，对企业而言，极大地拓宽了进入国际市场的路径，大大促进了多边资源的优化配置与企业间的互利共赢，有利于提升双边合作实效，宣传推广企业品牌；对于消费者而言，使他们非常容易地获取其他国家的战略新兴产业信息并买到物美价廉的战略新兴产业商品。

（三）战略新兴产业跨国优势特色产业园区共建模式

跨国、跨境优势特色战略新兴产业园区共建为各方产业深度对接合作搭建载体和平台，具有较强的融合度、开放度，能吸引更多强势优势产业聚集，推动双边、多边合作取得更大成效。借助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优惠政策，福建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共建跨国、跨境优势特色战略新兴产业园区，促使各国产业园区之间实现更加良好的对接，为双方在投资环境、产业导向、政策法规等方面提供了沟通和了解的机会，并通过信息和经验的分享和宣传为各方提供投融资信息发布的良好载体，促进福建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战略新兴产业园区合作的共同繁荣和共同发展。

（四）战略新兴产业跨境经济走廊共建模式

建设以边境口岸城市和跨境交通大通道为依托的跨境经济走廊,已成为国家推动跨境经济合作、加快沿边、沿海开放发展的重要举措。共建福建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跨境经济走廊是福建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战略新兴产业深度合作、优势互补的最好载体。福建战略新兴产业龙头企业已经具备一定研发能力和建立了较成熟的销售渠道,且正处于产业重组和转型升级关键时期,亟须突破资源、能源、环境等瓶颈制约,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劳动者素质不断提高,但研发能力有待提升,福建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战略新兴产业合作有着互补优势。通过福建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战略新兴产业跨境经济走廊的推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有望成为全球的战略新兴产业发展中心。

三. 深度对接合作机制创新

(一) 制度层面的创新协调机制

良好的协调机制是产业深度对接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其核心是一方面要使对接双方的整体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也要使参加对接的各方均能分享到合作的整体成果,且使各自的比较利益得到较好发挥。福建与“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新兴产业深度对接合作各方由于社会制度、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水平、资源条件、经济利益等不同,为使深度对接有效实现,必须在成员间搭建一个沟通协商、统筹规划的平台,实现利益共享框架下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相统一的协调机制,其基本功能在于制定统一规划、统一决策、统一实施重大措施以实现对接双方整体利益的目标时,确保双方利益共享、使双方的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得到兼顾,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得到协调。协调机制有制度性和非制度性之分,非制度性协调机制的最大弊端是缺乏约束力,往往导致合作的不稳定性和风险性,一旦涉及到对接各方实质性利益,往往使合作机制架空,使合作难以实施和深入。因此,构建制度层面的福建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战略新兴产业深度对接合作协调机制,以确保对接的稳定性和长期性。具体包括:一是共同制定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统一规划和实施细则。内容包括:产业统一规划的重点、行业统一的标准、共同开发市场、人才相互交流、技术共同研究、市场营销网络共建等,实现制度性的融合。二是制定双方自愿遵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具体内容指对于福建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战略新兴产业深度对接合作的重点领域,在设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规定违约的处理措施等基础上,将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书”转化成具有一定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形成双方政府、民间(行会和企业)自愿遵守的有效激励和约束机制。三是构建双方信息共享机制。主要指福建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战略新兴产业发展法规、政策扶持等存在差异,为了避免各方法规、政策的冲突和矛盾,各方可以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构建政府合作信息平台,通过信息公开、平等协商等途径,消除法规 and 政策的冲突。

(二) 区域间联动合作创新机制

通过福建与融入“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新兴产业深度对接合作各方区域间联动合作机制的构建,共同制定区域间战略新兴产业共同行动或行为的准则和标准,消除区域间行政壁垒,在共享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将区域间自成体系的战略新兴产业融为一体,变各自为政为联动发展,发挥整合优势,提高区域战略新兴产业整体竞争力。联动方式有政府层面的联动和民间层面的联动。政府层面的联动合作机制:一是共同制定有利于各方战略新兴产业深度对接和联动的产业政策、投资政策、财政

政策等“软环境参量”。二是建立及时、高效的问题磋商机制，协商解决重大区域性产业关联问题。三是建立具有相应约束力的监督机制。“海上丝绸之路”各国政府应共同组建松散型的战略新兴产业管理机构，从各方合作意愿和整体利益出发，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制定统一的监督与评估标准，加大执行监督的力度。民间层面的联动合作机制：一是形成跨区域优势产业集群，产生产业联动效应。当合作互动的一方在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背景下，某重点领域得到良好发展（如福建的LED产业）并形成优势产业时，就会吸引相关企业加入到该区域寻求最大商业利益（如吸引东盟各国LED产业加入），从而促进整个优势产业的跨区域延伸发展和合作，形成跨区域的优势产业集群，促进LED产业对接的深化。二是建立跨区域行业协会组织，推动产业联动合作。建立跨区域的产业行业协会组织，由于其非政府性质，可以有利于突破制度限制，避开政治敏感性问题，跨越行政地域界限，有效引导企业在确保其市场主体地位、提供相应市场公平竞争环境下，通过分工与协作实现联合互动，最终形成规范经营和深度对接。三是建立跨区域产业集团。

（三）完善的市场创新调节机制

市场创新调节机制的最大优点在于可以弱化行政界限、地域界限、制度界限对资源要素配置的阻隔，借助市场机制和资本运作机制促进战略新兴产业生产要素和资源的跨区域自由流动，实现要素和资源的有效整合，节约经济主体的交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以获得经济发展优势。具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建立跨区域的战略新兴产业资源整合与互补的协调机制。对接各方在各自拥有的优势要素或优势产业的基础上，以市场机制为纽带，在时间维度上通过产业链延伸，增加对接产业的附加值，在空间维度加强合作以拓展产业对接的范围，实现优势资源与要素的整合与互补，打造拥有核心竞争力的战略新兴产业品牌；同时在借助市场机制促进资源与要素实现无障碍自由流动的基础上，促进战略新兴产业市场的相互渗透、相互融合，逐渐形成覆盖“海上丝绸之路”的统一大市场。二是建立有效的战略新兴产业资本运作协调机制。跨区域的产业联或重组能否实现，重要的基础是能否建立有效的跨区域的资本运作协调机制。“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总体的经济实力不同，决定了对战略新兴产业资本投入的绝对量和相对量不同，为有效整合与互补“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战略新兴产业资金，加大研发的投入和自主创新能力的培育，可以借助跨区域的资本运作协调机制平台，通过资本运作或经营，按“股权配置、参股经营、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原则，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四）利益平衡与补偿创新机制

利益平衡与补偿机制是跨区域合作各方实现“双赢”的深层次制度保障。“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战略新兴产业主体由于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等不同，意味着双方利益诉求不同、意味着合作利益分配和成本分摊的不平衡，如果缺乏合理有效的利益平衡与补偿机制，就不可避免的导致双方合作兴趣和动力的丧失，严重影响合作的深入。一是建立多方利益诉求的表达机制。由各国战略新兴产业领域的专家、学者、行业协会和企业负责人共同组成区域合作委员会（或类似结构），对产业对接或重大问题提出合理建议，对重大项目进行科学决策和风险利益评估，对接各方提供利益诉求和沟通交流平台，化解矛盾。二是建立合理利益平衡与补偿机制。首先，为确保产业对接各方通过对接收到成效，并成为利益共同体，必须从财政、税收、金融等方面入手，建立一

套完整、科学、合理、具可操作性的、有利于共同发展的利益平衡机制；其次，在利益平衡机制上建立完善的利益补偿机制，对部分对接企业在利益和机会上的损失予以补偿，以减少对接深度发展所能带来的阻力，其核心是建立一套完善的转移支付制度，进行事前利益补偿和事后利益补偿。

作者简介：

王婷，女，1964年9月出生，教授，硕士生导师。长期从事经济学、管理学教学与科研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和管理学。

“一带一路”福建优势：华侨华人

杨 辉

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领导集体实施的新一轮扩大开放的战略之举，翻开了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新篇章，为我国加强区域合作提供了新平台，也为福建发展带来了新机遇。福建是侨务大省，东盟十国的闽籍侨胞超过 1000 万人，侨是福建的一大特点和独特优势。在贯彻国家“一带一路”部署中，福建省要发挥侨务优势，用好用足华侨华人资源，拓展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东盟十国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合作，推动互联互通，助力福建科学发展跨越发展。

一、优势：人脉、资本与文化

福建既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在对外经贸文化交流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福建华侨华人是我国与东南亚各国联系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见证者，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作用突出、优势明显。

历史优势。福建泉州是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被称为“东方第一大港”；郑和下西洋使海上丝绸之路得到进一步拓展，福建福州的长乐太平港是郑和七下西洋的重要基地和起锚地，福建漳州月港是明朝中后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福建早期迁移到海外尤其是东盟十国的华侨华人，都是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前往的。福建与海上丝绸之路深厚的历史渊源，成为海外闽籍侨胞助推“海丝”建设的原动力和发自内心的强烈意愿。

政治优势。东南亚华侨华人移居历史悠久，已深度融入当地社会，参政意识强，许多闽籍华人成为执政者和政要，如印尼前总统瓦希德、缅甸前总统吴奈温、新加坡国务资政吴作栋和现总统陈庆炎、泰国前总理川·立派等。随着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不少闽籍侨胞与居住国上层人物的交情深厚，关系密切，在涉及中国与住在国之间重大合作项目方面，他们有能力、有实力、有意愿推动与促成。

经济优势。东南亚闽籍侨胞实力雄厚、人才辈出，部分国家的华人掌握着当地的经济命脉。历年来列入世界华商 500 强的闽籍侨商超过 100 人，大都来自东南亚，马来西亚郭氏兄弟集团、嘉里集团、首富郭鹤年，香港信和集团、新加坡远东机构的黄志祥、黄志达家族，印尼金光集团的黄奕聪，菲律宾陈永栽、施至成家族都名列前茅。福布斯富豪榜显示，新加坡华人富豪前 10 名中，闽籍华人占 8 名，马来西亚华人富豪前 9 名中，闽籍华人占 6 名，印尼华人富豪前 7 名中，闽籍华人占 6 名。闽商施至成连续 6 年被评为菲律宾首富，被誉为“糖王”的郭鹤年多年蝉联马来西亚首富。

科技优势。闽籍侨胞中蕴藏着丰富的科技人才资源，特别是在东南亚国家，闽籍侨胞在科技领域的地位与作用举足轻重。如近年来新加坡政府在科技方面为了赶超欧美发达国家，不断在政策和改善人才创业环境上下大功夫，从欧美引进了大量的杰出人才，其中华人科学家约占 75%，许多国

家重点实验室和重大科技课题的首席科学家都是华人担任，他们掌握新加坡国家科技的重要资源和当今全球的领先科技，部分领域完全可以与欧美媲美，是华侨华人科技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招才引智的重要资源。

文化优势。闽南文化、客家文化、妈祖文化等八闽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悠久，独具特色，许多闽籍重点侨商不仅极其热爱，而且热心宣扬。如菲律宾闽籍侨领陈永栽自2001年以来，每年出资组织一批当地华侨华人子女到福建厦门、泉州等相关学校学习中文、书法、歌舞和武术，参观民俗名胜等，培养华裔新生代对中华文化兴趣和爱好，至今已组织一万余名学生来闽学习。许多闽籍华侨华人在东南亚各国对外友好协会担任要职，如泰中友好协会、马中友好协会、菲中友好协会等，他们积极推动住在国与中国、福建的人文交流。在侨胞和协会的推动下，八闽文化在东南亚地区得到了很好地传承和发展，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影响力。

二、构想：以侨为桥，联通内外

闽籍侨商有实力、有能力、有热情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发挥积极作用。福建省要进一步挖掘和利用侨务资源，着力把侨务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在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中彰显福建的作为与特色。

加大对侨务资源的挖掘和利用。挖掘侨商在促进中国与所在国国际关系中的民间外交作用，在推动国与国之间经济联系和经贸合作方面的中枢纽带作用，发挥海外侨胞熟悉我国和住在国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律的特点，以侨为桥，引导更多侨商参与福建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往来。

划设专门吸引侨商投资的产业区。如“海丝产业集聚区”、“自贸区”、“投资区”等，并赋予相应的配套优惠措施，以吸引侨商入驻，推动我省招商项目对接和特色优势产品的出口。

引导侨商开辟“区域性经贸合作中心”。为提升我省与特定国家或区域经贸合作的规模和水平，整合中小侨商闲散资金，发挥新侨群体抱团发展的集聚效应，积极引导侨商投建“福建—***（某一国家或区域）经贸合作中心”项目，目前已有南非中华福建同乡总会、英国福建工商联合会、澳洲福建总商会等组织提出相关构想，拟在省内建立引导中小侨商、贸易商回归的侨商总部或类似机构。

支持侨商投建各类“专业化贸易中心”。如澳大利亚闽籍侨商在福州马尾投资建设的中国—东盟海产品产业合作暨交易平台，德国闽籍侨商在长乐投资建设以葡萄酒集散、交易和展销为主的德国莱法州商业中心，马来西亚闽籍侨商拟联合相关机构发起成立中国平潭台湾农产品交易所，以及以陶瓷等地方工艺品为主的圣诞礼品交易中心等。

加大服务省内企业“走出去”工作力度。发挥侨商遍布世界各地和熟悉国内外两个市场的优势，引导和支持我省企业与海外侨商合作开发海外能源、矿产等紧缺资源类项目，提高我省企业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能力，合理规避投资壁垒，开辟更加便捷可靠、安全有效的国际合作通道，服务我省产业转移调整升级，形成新的项目生成点和经济增长点。

三、措施：“五个拓展”扬帆起航

福建省侨办作为政府负责侨务工作的职能部门，将围绕“以侨胞为桥梁、以经贸为主线、以联谊为纽带、以文化为载体”的总体思路，坚持“五个拓展”，充分调动华侨华人资源，助推“一带一路”建设。

拓展与侨团联系交往。利用闽籍华侨在东南亚各国数量庞大、经济实力雄厚以及社团众多优势，筛选百个海丝沿线国家的重点侨团，分批邀请侨团负责人来闽考察访问，加强与家乡的联系，引导其参与我省海丝建设。依托海外社团，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在海外的宣传推介。发挥福建省海外交流协会、世界福建青年联合会和福建侨商投资企业协会三大协会平台作用，面向东盟国家，引导侨商到漳州诏安、福州江镜、武夷新区等3个福建省海外青年产业园投资兴业。

拓展侨务引资。定期分片按区邀请侨商来闽考察投资。借助闽籍知名侨商广泛的人脉和经贸网络，吸引带动“世界500强”企业来闽投资。筛选一批重点侨商，加大我省产业龙头项目的招商力度。发挥新侨抱团发展的集群效应，引导侨商在闽建立企业总部。

拓展侨务侨智。以建立“福建省侨办海外科技专家顾问团”长效机制为抓手，积极为我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建言献策；组织邀请海外华侨华人高层次人才来我省开展常年性项目、科技、人才、产业对接；组织海外“院士团”、“博士团”来我省考察对接项目。做好“6.18”常年性项目成果对接活动，推动海外高层次人才和知名科研院所入驻“6.18”虚拟研究院。扩大与海外华侨华人科技社团的联系交往，继续完善华侨华人人才与项目资源库，为我省引智工作提供资源支撑。

拓展文化交流。弘扬中华文化，服务公共外交。一是大力开展海外华文教育。把海外华裔青少年夏（冬）令营、海外华文教师培训、选派省内优秀教师赴外任教等工作的重心向东南亚各国转移。二是培养东南亚国家人才。与福建富闽教育基金会、集美大学联合开展培养东南亚国家人才四年制本科学历项目。三是加强福建华侨文化建设。编纂《福建华侨史》，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史实借鉴；推动福建优秀文化赴东南亚展演，邀请海外文化社团来福建参观交流。四是打造侨务外宣精品。邀请东南亚海外华文媒体来我省访问，“借船出海”传递福建声音，讲述中国故事；加大《天涯海角福建人》电视系列片在海丝沿线国家的采拍力度；在《福建侨报》开辟专栏，面向侨胞大力宣传“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不断增强影响力和吸引力。

拓展“走出去”战略。联合省国资委、商务厅、工商联、贸促会等我省经济部门，组织我省企业赴境外考察投资项目与贸易促进，与海外侨商项目进行合作，寻求低成本扩张，形成新的项目生成点与经济增长点。以侨为桥，推动福建商品开拓境外新兴贸易市场，积极引导企业走出去，并购海外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组织省内企业赴非洲，与旅非华侨华人矿产资源项目开展投资合作。

作者简介：

杨辉，福建省侨务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华侨华人与福建融入 21 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文化视角的思考

杨宏云

2013 年 10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尼国会发表演讲时指出：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同年 11 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2014 年工作会议重点即是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共同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迅速转化为国家推进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重大方针政策。

历史上，福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门户，在与东南亚国家的经贸交流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着主导作用。经贸发展的同时，福建文化亦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与持续运转极具正面性。这是与大量生活或者频繁往返于东南亚的闽籍华侨华人息息相关的。福建在海外移民甚多，据估计 1200 多万，其中 80%集中在东南亚。一直以来，东南亚闽籍华侨华人与福建互联互通，保持着紧密的跨国经济联系。因而，东盟已成为福建贸易发展、引进外资以及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和优选地区，是我省第二大贸易伙伴和企业对外投资重要地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源自中国与东盟的既已形成的紧密经济联系，是中国未来与东盟国家全方位合作的新机遇。故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既是一条经贸之路，在某种程度上应该也是文化之旅。因而，福建除在经贸的纵深方向积极巩固与融入东盟国家发展外，基于文化与经济的伴生性，从文化的横向层面积极推进福建融入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有着历史渊源和依托力量。

一、面向东盟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建设中，福建籍华侨华人贡献良多

海上丝绸之路历史上是链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最重要的海上通道，是一条沟通中国与周边世界商品流转的贸易之路，也是一条文化对话与思想交流之路。其中，福建文化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迁播，影响甚深。

物质文化上：福建的商品和器物改变了古代东南亚的生活习性。中国的瓷器通过往返于华侨华人贸易销往东南亚各地，改变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改善了东南亚人民的饮食健康。同时，通过大量福建籍华侨华人的贸易，中国瓷器经由东南亚源源不断地销往世界各地，英文“china（瓷器）”由此成为中国英文名字的代名词。而且，福建华侨跟随郑和下西洋，把中国饮茶的习惯和种茶、制茶的技术带到东南亚各国，尤其是福建人爱泡“功夫茶”，习惯喝早晚茶，善于“茶道”，把源自福建的“茶文化”传播到东南亚，至今影响着海外的茶风。

除茶和瓷器带来的物质文化影响外，大量福建华侨华人生活在东南亚，也将福建的制陶工艺、制糖技术、制盐工艺、印刷术、农耕技艺、渔猎技术等移植当地，影响了东南亚各民族的生产与生活风貌。

精神上：随着福建人到南洋谋生，其民间信仰也传播到海外。其中，东南亚各地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当推妈祖。自 1821 年，泉州石狮祥芝的船员们将妈祖信仰带去东南亚之后，妈祖信仰逐渐在马来半岛，菲律宾群岛和印尼群岛传播开来，并于 1954 年，在菲律宾举行全世界天主教徒祈祷大会上，被教皇特封为天主教七圣母之一。其它福建地方神灵，如吴真人信仰、大伯公、城隍、广泽尊王、纪府王爷信仰等，因应福建移民的生活需要，也在东南亚各地形成一定的受众群体。笔者曾在印尼、菲律宾华人社会考察，遍地可见福建地方神灵的庙堂。这种以民间信仰为主的文化互动是福建文化融入东南亚地区的主要表征，体现了福建文化在东南亚各地的普及程度和深远影响。

在文学方面，中国古代四大奇书《西游记》《水浒传》《封神演义》《聊斋志异》等一大批明清小说被翻译为马来文、爪哇文和柬埔寨文，广泛流传于东南亚一带。而这主要来自福建籍华侨后裔的翻译工作。相应地，带有福建文化的成份也植入翻译小说中，影响着东南亚的文学风格。据研究华侨文化的专家介绍，以前马来西亚等地没有小说及文学等，当地人看到福建商人带过去的小说，开始模仿学习，渐渐形成了当地的小说和文学。

在艺术方面，早在宋元时代，闽南侨民就已经将本乡本土的南音在南洋各地传唱。今天，南音不但作为我国古老的音乐在东南亚华侨中广泛传唱。在菲律宾、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以及缅甸等地福建华侨华人密集的城镇，都有南音社的组织和活动，成为当地文化多样性的一部分。同时，它也作为东方古典音乐代表进入世界一些国家的高等音乐学府。除此外，福建的莆仙戏、芗剧、高甲戏、木偶戏等福建地方曲艺在东盟各地有着广泛的传播和受众。

语言文化上：福建闽南话成为许多东南亚话语的借音，涉及到人们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在菲律宾，他加禄语中许多蔬菜的名称是闽南话的拼音。如闽南话“白菜”，他加禄语为 petsay；菜豆，sitaw；筒篙菜，tangoehay；芹菜，kintsay；韭菜，kutsay 等等，均如此。他加禄语中的食品词汇也有不少闽南话，如 bihen(米粉)；miswa(面线)；miki(面干)；tanghen(冬粉)；tauhu(豆腐)；tauye(酱油或豆油)；taugi(豆芽)；saypo(萝卜干或菜脯)。还有闽南话称稀饭汤为“奄”，他加禄语叫 am。同样，闽南语在印尼语和马来语也大量存在。有人从八本印尼语和马来语词典中，查出汉语词汇 511 个。初步发现，其中闽南方言词汇至少有 456 个，占全部汉语词汇的 89.2%。与此同时，闽南话也有经由东南亚的华侨华人传播，成为英语的重要词汇。如英语的茶 (tea) 皆因福建商人携带的语言文化沿丝绸之路影响着区域和世界。

闽南方言在东南亚乃至世界的传播和使用，是闽籍华侨华人在当地长期耕耘并与土著人民和谐相处的自然结晶，也是福建文化与东南亚文化和平交流的历史见证。这构成福建在东南亚的文化软实力。

二、依托福建籍华侨华人，利用好福建文化在东盟国家优势，从文化层面推进福建融入新时期海上丝绸之路

面对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伟大复兴之际，福建应充分依托东盟闽籍华侨华人的传统优势，

全力推动福建面向东盟，以文化促经贸的新时代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1. 选派文化使者，推广福建方言，延续与东盟闽籍华侨华人的乡土情结

方言是一个地方的文化载体，它能让异国他乡的人更有凝聚力。东南亚一带的闽籍华侨华人，平时聚会惯用福建话聊天，既有联络感情，也有推动福建人之间经济合作的作用，更有着与福建文化割舍不断的情怀。然而，福建方言在东南亚却面临着断层的问题。这不仅使福建文化在东南亚的影响日渐削弱，也影响着福建与东南亚的经济联系。因而，福建应考虑选派文化推广者到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地推广福建方言，让更多的福建华侨华人了解自己的“乡音”，让乡土的情结在海外移民中更好地传承下去。这可使福建对接新时代海上丝绸之路提供更多便利。

2. 以“信仰福建”为纽带，构筑福建与东盟的文化共同体

信仰文化的纽带作用，也是推动福建融入东盟发展的重要途径。东南亚闽籍华侨华人的神灵信仰，多源自祖籍地。这种底层文化具有受众广泛、持久性的特点。故可通过“信仰福建”的宣传打造，以神缘拉近福建与东南亚华侨华人群体，穆斯林群体的心理距离，寻找福建与东南亚民众共同的文化记忆。这可为加强福建与东盟的文化联系，构筑福建与东盟的文化共同体，从而以文化促动福建与东盟的经贸合作，拓展福建企业市场。因而，福建可挖掘面向东盟的信仰文化资源，以点带面，提升福建面向东盟海上丝绸之路的软实力。

3. 通过华文教育，密切福建与东盟的人文交流合作

福建可利用厦门大学、华侨大学的与东南亚华侨华人的历史渊源，推动二者在东南亚开设分校和建设孔子学堂，积极推介福建的教育与文化特色。同时，组织实施面向东盟地区的官员、老师等的培训。实施东盟十国学生来闽的奖学金资助，互派留学生等教育合作。在条件许可下，也可积极引进东盟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组织东盟等海外高层次人才来闽工作等，从而扩大福建在东盟国家的知名度。

在密切与东盟的教育联系同时，挖掘福建与东盟人文艺术的渊源，藉由东盟闽籍华侨华人的平台，在东盟国家中积极推广和普及福建的文化艺术。譬如南音、木偶、地方戏剧、杂技等文艺团体，以及具有鲜明福建特色的文化艺术项目和现代歌舞可积极赴东盟国家演出交流；开展福建文化、艺术的旅游节庆；举办福建书画展，工艺品展以及文学研讨会等。这不仅可重塑福建人文艺术在东盟的影响力，勾连起福建与东盟国家的美好记忆，亦能增强福建在东盟国家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使福建构筑面向东盟的海上丝绸之路增加持久力和生命力。

4. 推动东南亚居民对福建文化消费

中国和东南亚之间具有悠久的文化交流和联系的历史。相比较而言，福建的文化元素更多地植入东南亚，成为地区多样性文化的源头之一，形成大量的对福建文化的消费群体。这成为其他省份所不可多得的优势。

20世纪之前，东南亚对中国文化的消费主要通过福建与广东两省文化交流的途径进行，创作和消费的主体面向都是移居东南亚的华侨华人群体。20世纪之后，中国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开始进入东南亚地区，创作的主体来自中国国内，消费主体除华侨华人以外，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其他族群的民众加入。因而，针对福建文化在东盟的大众化需求，应积极开拓面向东盟的文化消费市场。

反应新时期福建文化艺术成就的影视剧、动画片、歌舞剧、戏剧与曲艺等文化产品，以及传统福建工艺品等，依靠闽籍华侨华人的推介，扩展福建面向东盟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消费市场。

5.以文化旅游为重点推动福建与东盟的合作与互动

福建省每年接待大量来闽探亲访友、观光游览的东南亚游客。其中，新、马、印尼三国均为福建省外国人接待量前 10 名的客源国，已成为福建省重要的入境旅游客源市场。文化寻根游则是三地游客的主要诉求。

因而，福建应抓住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打造“海上丝绸之路”旅游线路的契机，充分挖掘自身有关海上丝绸之路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在注重保护的前提下进行可持续性的旅游开发。如“信仰福建游”、“南洋贸易航海游”“福建海洋文化游”、“南洋风情文化游”、“侨乡寻根文化游”等，并积极营销，以旅游促合作，打造福建面向东盟经贸以外的重要文化旅游市场。在获得旅游经济的同时，这亦能促进福建与东盟国家的文化交流，实现文化与经济的二重意涵。

三、结语

新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对经贸的关注已成为共识。面对激烈的竞争，福建从经贸融入必不可少。若伴以文化的深入推动，发挥文化与经济互相促进的双重优势，将更能使福建融洽与东南亚的往来，推动福建深度融入新时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潮流中。为发挥福建文化在新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能动优势，福建可依托东盟闽籍华侨华人的平台，利用福建文化历史上对东盟国家的深远影响，从语言、教育、旅游等文化层面积极推动福建融入面向东盟的新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这不仅能加深和巩固福建与东盟已有的文化联系，增进福建在东盟的文化软实力；亦可为福建开辟对东盟经贸之外的文化消费市场提供契机，从而实现福建面向东盟海上丝绸之路的经济、文化双赢。

作者简介：

杨宏云，福州大学闽商文化研究院副教授。

论海外华侨华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与 制约因素

——以东南亚华侨华人为例

王焕芝

内容摘要：海外华侨华人与中国（特别是侨乡）之间以及海外华侨华人内部之间形成的日益成熟的两种跨国网络为海外华侨华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作用打下了坚实基础。随着海外华人在住在国政治经济地位的不断提升及部分华人对中华文化的强烈认同感等主客观因素的共同作用，海外华侨华人在帮助中国改善国际舆论环境、建构良好的国际形象，推动中外友好等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积极引导海外华侨华人成为塑造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担当者，强化华侨华人在“政策沟通”中的桥梁作用，发挥海外华侨华人在“经济合作”中互通有无的跨国经纪人作用将成为充分发挥海外华侨华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路径。其中，周边地缘政治的挑战、华人社会对中国认知的差异及自身因素的羁绊等问题成为制约海外华侨华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主要因素。为了更好地发挥海外华侨华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必须要重视华侨华人意见领袖的人际影响扩散功能、整合华侨华人的经济、政治及组织资源、增强对“一带一路”建设的理性认知，避免盲从。

关键词：海外华侨华人 一带一路作用 制约因素

一、海外华侨华人与“一带一路”

海外华侨华人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与他们同祖籍国之间的互动息息相关。中国自身的转变导致了华人国际移民的出现，反之，海外华侨华人又影响了近现代中国的发展。一方面，海外华侨华人与祖籍国之间保持长期的联系并对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及和平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海外华侨华人在中国与其住在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等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长期的“水乳交融”促使该群体形成了海外华侨华人与中国（特别是侨乡）之间，以及海外华侨华人内部之间两种跨国网络类型，两者之间既相互独立又有所交叉与重叠。海洋亚洲责无旁贷地成为跨国互动有机联系的纽带。两种相对成熟的跨国网络为海外华侨华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作用打下了坚实基础。在思考华侨华人将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及其制约因素之前，非常有必要对华侨华人曾经在新中国的建设与发展历程中发挥了哪些作用及过程中的制约因素做一个全方位的回顾，只有以史为鉴，才能规避制约因素，进而更好地发挥华侨华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

回顾海外华侨华人与新中国外交的发展历程，客观而言，海外华侨华人曾在 20 世纪 50 年代作为中国外交关系的不利因素出现，这一时期新中国政府在制定侨务政策时也秉持着国家利益绝对高于侨民利益的原则。正如学者菲茨杰拉德在探讨中国对海外华人的政策时所认为的：冷战期间“华人问题”先是被看作一种外交障碍，“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又被当作一种重要资本。他认为，1956 年后的华人政策建立即“对东南亚土著的态度和感情具有高度敏感性，对东南亚地区的形势和华人问题的复杂性有深刻了解并且做出了很现实的估计”的基础上制定的华人政策。¹海外华侨华人的显性价值伴随着中国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的改革开放突显出来，一方面因为大部分海外华侨已经获得当地国籍，政治效忠问题在东南亚各国的民族同化政策进程中得以解决。另一方面，海外华侨华人拥有的资金与技术成为改革开放的中国最为迫切需要的外部支持，同时中国也为海外华侨华人在祖籍国的经济发展创设了良好的投资环境。总之，伴随着海外华人在住在国政治经济地位的不断提升及部分华人对中华文化的强烈认同感等主客观因素的共同作用，其开始逐渐在帮助中国改善国际舆论环境、建构良好的国际形象，推动中外友好等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改革开放近三十多年的互动经验表明华侨华人不仅是中国公共外交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他们也将“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带一路”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 2013 年国家领导人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期间分别提出的战略构想，这也是中国政府为推动改革向纵深发展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做出的重大顶层设计。目前中国国内关于海外华侨华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的阐释主要来自政界和学界。比如国务院侨办副主任何亚非、前外交部长李肇星分别撰文《新世纪丝绸之路建设的“五个紧密结合”》²、《海外华商在“一带一路”战略中有建设性作用》³，强调海外华侨华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巨大潜力及重要作用。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陈经纬也在《充分发挥港澳台和海外华侨华人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中的独特作用》⁴一文中阐述了华侨华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这些研究都高屋建瓴地阐释了“一带一路”及海外华侨华人的作用问题，但是作为针对中国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而做出的重大顶层设计战略构想的具体实施还需要学术界进一步的详实论证与释析。当前学术界对“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看法总体上有赞成、反对及实践三种观点：第一种认为构想适应了国内国外两个大局的需要，不仅能为中国的崛起赢得更大、更广阔的战略空间，也将为中国的不断崛起提供新动力、新支点；第二种认为构想既然已提出且推进，那么就要做好相应准备，为具体实施制定合理的规划；第三种认为构想的提出不合时宜，因为中国既没有推动战略的良好的内外环境，也缺少必需的能力；⁵本文比较认同第一、二种两种观点，认为针对“一带一路”究竟要做什么以及怎么做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论证，同时也需要进

¹刘宏. 跨界亚洲的理念与实践——中国模式·华人网络·国际关系[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 60 页。

²何亚非. 新世纪丝绸之路建设的“五个紧密结合”

[EB]http://finance.chinanews.com/cj/2014/02-23/5870935.shtml

³李肇星. 海外华商在“一带一路”战略中有建设性作用

[EB]http://finance.ifeng.com/a/20140607/12497770_0.shtml

⁴陈经纬. 充分发挥港澳台和海外华侨华人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中的独特作用

[EB]http://www.wocdf.cn/wcdf/news/2014-10-11/2629.html

⁵肖斌. 影响我国“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推进的基本因素[C] 华侨华人与中国周边公共外交”研讨会论文集，2014 年，第 73-76 页。

一步考虑如何发挥基于海外华侨华人形成的跨国网络的重要作用。

二、海外华侨华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

1. 积极引导海外华侨华人成为塑造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担当者

管文虎等认为：“国家形象是一个综合体，它是国家的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本身、国家行为、国家的各项活动及其成果所给予的总的评价和认定。国家形象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凝聚力，是一个国家整体实力的体现。”¹塑造国家形象包含了塑造国家形象和传播形象两个部分，也即内容和形式，只有两者相得益彰才能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伴随着中国在亚洲的和平崛起，一些东南亚国家中出现了“再华化”现象，部分华人不再隐藏自己的族群身份，而是公开参与一些族裔文化传承活动，并对保持华人民族性产生兴趣。这些对中华文化的拥趸者及华人新移民既是中国国际形象的塑造者也是中国形象的传播者。其中，人数超过 1000 万的新移民²已经成为海外华侨华人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一般在中国国内完成中等教育，对中国的政治和文化认同度比较高，他们愿意并且已经成为中国构建创新型国家人才库的中流砥柱。1993 年，中国政府将鼓励和吸引海外华侨华人参与国家建设的人才政策理念由“回国服务”改为“为国服务”，灵活的“跨国流动”概念取代了具有固定政治和地理界线的国家概念，这更进一步加强了新移民群体与祖籍国的互动。³新移民成为向世界说明中国发展与变化方向的重要力量。学者李正国认为在强化硬实力的同时，中国应该整合本国的软实力资源，通过良好的声誉释放善意和稳定的预期，减少中国国力迅速提升对现有国际权力结构产生的冲击及由此产生的猜忌心理，有效地向世界表达中国诉诸于和平崛起的战略意图和全球责任。⁴世界银行前副行长帕拉西奥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表示，古丝绸之路成为文明沟通桥梁的代名词，不冲突不对抗的独立外交政策是新丝绸之路的精华所在。⁵因此，鉴于海外华侨华人在住在国与祖籍国之间互动的天然优势，相关涉侨部门应积极引导海外华侨华人成为塑造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担当者，为“一带一路”建设铺设一条畅通之路。

2. 强化华侨华人在“政策沟通”中的桥梁作用

总体而言，关于新丝绸之路的实质问题，笔者比较同意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的观点，新丝绸之路就要回归丝绸之路的本色，通过新丝路把中国建设成为以经济贸易和投资为基础的当代商贸大国。”⁶“一带一路”要“做什么”必须与相关国家的“需要什么”相呼应，寻找和构建共同利益是规划的宗旨。反之，如果所作所为与相关国家的需求相背离，则意味着“一带一路”将成为中国自说自唱的“独角戏”。“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理念是什么？目标是什么？作为和平崛起、和平发展中的中国必须确立如自由贸易之英国，民主自由之美国这样的软实力。那么“一带一路”建设将成为中国软实力建设的重要平台会不会引起相关国家对与中国与新殖民主义者的联想？因此，中国必须首先掌握“一带一路”建设的话语权，通过桥梁与纽带向相关国家讲好中国故事，让其了解丝绸之路的根本，理解建设过程不是传统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中的霸权主义，而是以经济合作

¹管文虎. 国家形象论 [M]. 成都: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23 页。

²中国新闻社: 2008 年世界华商发展报告, [M]. 北京: 中国新闻社, 2009 年版, 第 100 页。

³庄国土、李瑞晴: 华侨华人分布状况和发展趋势, 国务院侨办政法司刊行, 2001 年。

⁴李正国. 国家形象构建 [M].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第 220 页。

⁵国内外专家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看法和建议综述 [EB] <http://www.cet.com.cn/wzsy/gysd/1287580.shtml>

⁶郑永年. 新丝绸之路: 做什么、怎么做? [EB] http://news.xinhuanet.com/finance/2014-07/04/c_1111449698.htm

为基础和主轴。总之，现实的相关国家的需要是新丝路规划的起点与前提。避免误解，达成谅解是合作建设的起点，作为海外华侨华人，特别是新移民，应该成为“政策沟通”的桥梁，做好“双向沟通”，既要向相关国家传递“开放包容”的合作理念，同时也要向中国传递相关国家的需求。国内专家普遍认为，无论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还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都蕴含着以经济合作为基础和主轴，以人文交流为重要支撑，开放包容的合作理念。特别是“一带一路”将中亚、南亚、东南亚、西亚等区域连接起来，有利于各区域间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建立和健全亚洲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使泛亚和亚欧区域合作迈上新台阶。中国在规划和执行新丝路过程中，不仅需要超越狭隘的地缘政治概念，更需要吸取二战后美国在推动欧洲复兴的“马歇尔计划”的宝贵经验，通过华侨华人向相关国家传递和平发展的理念及中国在未来发展中的大国担当。

3. 发挥海外华侨华人在“经济合作”中互通有无的跨国经纪人作用

丝绸之路的核心是经济贸易，海外华侨华人的经济力量将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依托。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FDI）的60%以上来自华侨华人。¹《华侨华人蓝皮书（2013）》也指出，华侨华人企业集团逐渐形成，新移民经济发展迅猛，一些华侨华人企业成功转型。海外华人企业凭借亲缘、地缘、业缘、神缘及物缘而形成的广泛人际关系将在“一带一路”的“经济合作”方面扮演跨国经纪人的角色。此外，华商已经逐步形成的开放性的跨国经贸网络将成为经贸活动的重要载体。

在经济合作方面，东南亚华商具有独特的优势。据估算全球华商企业总资产规模约为4万亿美元，其中东南亚华商经济总量为1.1万亿至1.2万亿美元。世界华商500强中约1/3在东盟国家，是国际经济界的一支重要力量。²“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是华侨华人的聚集区，超过4000多万华侨华人，也是华商力量最强的区域，特别是东南亚地区，日益增强的华商经济实力已经成为当地经济的重要支柱。在东南亚证券交易市场上市企业中，华人公司约占70%。“一带一路”建设与华商经济相结合将为海外华侨华人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拥有雄厚的经济科技实力、成熟的生产营销网络、广泛的政界商界人脉以及沟通中外的独特优势将使他们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中大显身手、大有作为。进言之，华商可以利用自身优势，通过产业转移与承接实现多赢，为地区经济转型和扩大就业带来积极成效；无论是在投入获益、推动人民币广泛使用、抑或是海洋经济开发与合作的深化以及亚洲地区能源贸易与合作的推动方面，³海外华侨华人都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华商将帮助中国企业走进东南亚实现本地化发展，同时帮助中国开展公共外交提升中国与东盟互信。

三、海外华侨华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存在制约因素

1. 周边地缘政治的挑战

就现实发展而言，尽管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中国要维持这样的地位并促使国内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不断向外拓展新的发展空间。这个发展空间可以从“一带”

¹冯建华李永杰. 华侨华人：提升中国软实力的重要资源——访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院长刘泽彭[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4年9月22日第649期[EB] http://sscp.cssn.cn/xkpd/zxtj/201409/t20140922_1336174.html

²冯建华李永杰. 华侨华人：提升中国软实力的重要资源——访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院长刘泽彭[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4年9月22日第649期[EB] http://sscp.cssn.cn/xkpd/zxtj/201409/t20140922_1336174.html

³李肇星. 海外华人在“一带一路”战略中有建设性作用[EB] http://finance.ifeng.com/a/20140607/12497770_0.shtml

（中亚和中东的广大地区）和“一路”（从东南亚到印度洋和非洲的广大地区）找到。但是中国同周边国家的领土争议问题呈明显化、激烈化的趋势，这些涉事国家也正在“邀请”美国作为他们的仰仗力量，这使得原本复杂的地缘政治冲突更加多元、多变。就陆地丝绸之路而言，中国首先需要把同俄罗斯存在的潜在地缘政治冲突转化为各自的地缘政治利益。此外，由于现代丝绸之路与传统丝绸之路所处的文化环境迥异，今天的陆地丝绸之路还不得不面临来自穆斯林世界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挑战。南海问题也将是海外丝绸之路需要面临的地缘政治挑战。中国的崛起更进一步加剧了与中国存在海上主权冲突的一些东南亚国家的疑惧心理，中国需要足够的智慧与耐心处理这个问题。另外，中国要通过东南亚，走向印度洋和非洲，印度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只有同印度解决好地缘政治利益的纠纷，才可能实现更大的发展与合作空间。这种地缘政治利益的冲突将导致相关国家的华侨华人，特别是华人避开矛盾焦点，降低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积极性。因此在建设过程中，中国需要通过确立丝绸之路的话语权来进一步阐释丝绸之路是一条物质与精神共存的双车道，是区域经济一体化新格局的构建。这条双车道不仅是贸易交往，更是文化上的交流与互动。

2. 华人社会对中国认知的差异及自身因素的羁绊

华侨华人问题研究专家王赓武教授曾以政治态度为依据，将东南亚华人划分为甲乙丙三个不同的政治群体。其中甲集团是经常与中国政治保持着直接或间接联系的一群人；乙集团是由精明而讲究实际的多数华人组成，他们关心的是贸易和社会团体的低姿态和间接政治；丙集团是一个小而不稳定的混合团体，他们在政治上依附于当地的统治阶级。¹如果以东南亚每个国家境内的小民族主义为框架，可以把甲、乙、丙三种反应看成华侨、华人和华裔三种不同的选择。同样，今天的华侨华人社会不仅包括上述认同的区别，还包括对中国大陆与台湾的不同认知。由于历史原因，东南亚华侨华人对“中国”的法统及其政权问题存在认知的差异。

此外，就华人身份而言，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华人”这个字眼已经转换成在不同国度又有不同的语言、文化、历史和政治经济政策下成长起来的更多类型的华人。上个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华人的商业活动集中在如何使本身被承认为入籍国发展的主要部分上。许多华人与著名的土著企业家一同经商，最终被承认为入籍国资金积累的主要部分。而这之后，华人本着爱国和慈善精神汇款回祖籍国的时代开始转变为着重投资取利的时代了。就华裔而言，特别是华裔新生代，他们接受本地文化，参与本地一切的社会、政治、经济集团的活动。在教育方面，今天的华裔新生代不仅具有较高的科技专业素养，同时也拥有国际性和全球性的发展意识。在与中国发展保持联系方面，同老一代华侨相比，他们的宗亲、乡土观念不浓，对祖籍国家乡的感知度不高。侨乡的亲缘关系优势、地区性优势正逐步被利益考量机制冲淡。

最后，华人社会内部的团结与否也将决定支持力量的强弱。比如马来西亚马华社团与政党之间的分歧始终存在，主要表现为以董教总为主的马华社团和以马华公会为代表的华人执政党之间在争取并维护华人权益等问题上的矛盾，其中华文地位和华文教育等问题是矛盾的焦点所在。马华政党之间的对立也使得马华社会一直是个分裂的社会。这些华人社会自身因素的羁绊将阻碍华人社会与祖籍国互动的资源整合，无益于华侨华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发挥。

¹王赓武. 王赓武自选集[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2年版, 第318页

四、几点思考

1. 重视华侨华人意见领袖的人际影响扩散功能

鉴于华侨华人对中国的认知态度差异，要发挥华侨华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一方面要通过亲近中国的华侨华人发挥积极正面作用，另一方面也要通过亲近倾向的华侨华人争取对中国不熟悉或不太友好的华侨华人以及当地其他族群，进而使他们也能发挥积极作用。纵观华侨华人历史，华侨华人中的意见领袖、重点社团历来在推动住在国政府改善对华政策，增进住在国与祖籍国的友好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功不可没。比如，被誉为“马来西亚辛格”的华人曾永森为促成中马建交立下了汗马功劳、马华公会前会长黄家定也在推动中马友好往来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新加坡华商唐裕在促进中国与印尼恢复外交关系、以及泰国华侨许敦茂在中国与泰国建交过程中也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¹此外，新加坡中华总商会、马来西亚董教总、泰国中华总商会、美国百人会等重点侨团在住在国与祖籍国之间架起了重要的沟通桥梁。

从传播学视角看，拉扎斯菲尔德的两级传播论认为信息从大众媒介到受众，经过了两个阶段，首先从大众传播到意见领袖，然后从意见领袖传播到社会公众。可见意见领袖的重要作用。因此，为了更好地开发和涵养侨务资源，侨务部分首先要整合历史资源，唤醒曾经的共同记忆。与此同时，建立有效的共同机制和长效的传播平台，相关侨务部分要做好调研、走访工作，了解华侨华人社会意见领袖的所思所想，做好沟通，进而使其发挥对华侨华人社会人际影响的扩散功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必须坚持华侨华人资源的“共赢性”原则，即实现华侨华人、住在国和中国之间的三赢，也只有如此，才能赢得侨心及住在国政府的支持。

2. 整合华侨华人的经济、政治及组织资源

华侨华人不仅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其还具有积极参政议政的意识，这一方面能够推动华侨华人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维护华社权益，改善华侨华人生存与发展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他们逐渐增长的对当地社会与政府的政治影响力也将成为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政治资源。海外华文教育、华人社团及华文媒体是“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组织资源。长期以来，作为以海外华侨华人为主导、面向海外华裔青少年开展的华语文和华族文化教育活动的海外华文教育是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体，涉侨部门要继续支持、服务海外华文教育，以便让更多人了解中国、熟悉甚至认同中华文化，增强中华文化的辐射力。以华文报纸、华文期刊、华文网络、华文电视为主体的海外华文传媒是传递中国声音、塑造中国形象的重要媒介。部分华人社团通过发挥非政府组织的公信力、影响力与话语权，对有关中国的歪曲报道进行了坚决的抵制与有利的批驳，他们俨然已经成为中国形象的重要维护者。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涉侨部门要进一步做好与华侨华人社会的沟通，充分整合相关国家华侨华人的政治、经济与组织资源。

3. 增强理性认知，避免盲从

作为国家的一项战略构想，其推进与作用还需要深入的论证，不能以主观意愿做出非客观的判断，比如夸大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在深化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的作用，认为经贸关系的密切与中亚地区的稳定有高度的正相关。经贸关系虽然有助于中国与中亚国家形成利益共同体，但是这并不能

¹曹云华等. 东南亚华人与政治参与[M].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4年版, 第198页.

直接转化成彼此的政治互信和安全互信。¹比如有些国家的学者并不赞同中国在新疆的宗教政策，有些国家依旧存在一定的反华情绪。这些都要求政策的推动者必须理性看待现状与问题，不能盲目的想当然。总而言之，“一带一路”究竟要做什么以及怎么做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论证，需要专家学者为具体实施制定合理的规划。

作者简介：

王焕芝，华侨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¹肖斌. 影响我国“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推进的基本因素[C]”华侨华人与中国周边公共外交”研讨会论文集, 2014年, 第73-76页。

华侨华人在海丝之路中的历史作用 及其运行机制研究

张赛群

内容摘要：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共建，需要华侨华人的广泛参与。这不仅因为丝路沿线的东南亚等地区是海外华侨华人最为集中且实力最为雄厚的地区，而且因为这些侨胞与中国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化相通，华侨华人完全可能成为积极推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纽带和桥梁。不仅如此，华侨华人历史上是海丝之路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见证者，他们曾扮演了海丝之路上的移民者、海丝之路沿途国家和地区的建设者、海丝之路上的中外贸易促进者、海丝之路上的友好使者以及海丝之路上的文化传播者等多种角色，为海丝之路的建设作出了贡献。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历史上华侨华人在海丝之路中的作为成就了今天华侨华人在海丝之路中的优势。若考究其背后的历史动因，则包括华侨华人个体因素、政治经济形势、政府政策、交通等多方面因素，且各种因素多交织在一起共同起作用。但在不同时期，各动因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至于华侨华人发挥作用的方式，有的纯属自发行为，并非刻意为之；有的则是自觉行为，有意甚至是特意为之，有时还受到外力的影响。从组织程度来看，有些是个体行为，有些则是团体行为。鉴于此，若想华侨华人在21世纪海丝之路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不仅需要华侨华人进一步认清使命和机遇，也需要中国方面尤其是中国各级政府有所作为，积极创造条件，充分调动华侨华人参与其中的积极性，并充分发挥侨团、侨校等组织的引领作用。

关键词：华侨华人 海丝之路 历史作用 运行机制

华侨华人历史上是海丝之路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见证者。¹在当今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的背景下，反思华侨华人在海丝之路中的历史作用及其运行机制，对于当今何以以及如何进一步发挥这一群体在当今海丝之路建设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华侨华人在海丝之路中的历史作用

历史上，海丝之路不仅仅是一条商贸之路，同时也是一条人员往来之路、文化交流之路及外交之路。也因此，华侨华人在其中扮演了多种角色。

（一）海丝之路上的移民者

作为一条交通要道，“海丝之路”同时也必然是一条人员往来之路。在海丝之路开辟之后，闽粤

¹罗钦文：《以侨带路推动“海丝”建设》，《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年6月2日。

等地沿海民众出于生计、安全、发展等需要积极投入到海丝之路中的移民流中，这也使广东、福建等地因此而成为著名的侨乡。

以福建省著名侨乡泉州市为例，早在唐天宝十二年（753年）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之时，随行弟子中有泉州超功寺僧昙静。而据资料记载，在唐代因华侨众多而被称为“小中国”的马来西亚桑多邦、文莱等地均发现有唐代泉州出产的瓷器，从而证明这些地方已有泉籍华侨。唐末五代初王潮、王审知兄弟及其后裔据闽期间，着力发展生产，大兴海舶。但到了“闽国”晚期，“弊政百出”，泉州地区人民成批逃往国外谋生。北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至元祐六年（1091年），据《高丽史》及中国史籍记载，前往高丽的泉州人有林仁福、陈文轨、庐遵等19批次，其中注明人数的有7批500多人。南宋时期造船业发达，为泉州人远航提供有利条件。此后，侨居国外者渐多。元朝致力于拓展海外贸易，泉州列居东方大港，泉州人出国较前兴盛。据《岛夷志略》载：元代泉州对外交往已达99个国家和地区。其时，泉州与爪哇之间有船舶通往，流离其地的泉州人颇众。据推算，明初整个东南亚地区华侨总数不少于10万人，其中泉籍华侨人数约有4-5万人。明清实行“海禁”，泉州港随之衰落，但大量依赖海上贸易维生的泉州人不得不冒险向外拓展，以至在国外垦荒辟地，作久留之计。至鸦片战争爆发前夕，居留海外的泉籍华侨估计已逾30万人。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南洋群岛各埠的开发和“契约华工”制度的发展，以及战乱、各种天灾人祸，使泉州人大量移居东南亚和世界各地。仅1947-1949年间，泉州地区出国人数达25万人左右。¹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泉州人移居海外也曾出现几次高峰。如今，泉州籍华侨华人总数达750多万人，90%以上分布在与“海丝”密切相关的东南亚国家。泉州华侨华人占福建省60%，而且泉籍华侨华人中的绝大多数侨居东南亚等海丝沿途国家，因此泉州华侨华人的移民之路与海丝之路的关联是比较大的。如今，旅居世界各地的闽籍华侨华人有1512万人，其中东南亚地区占78%，有1200万。²

另一个著名侨乡广东省，现有3000多万海外侨胞，占全国的三分之二。广东人移居海外，大体始于晚唐或宋初。早期移民多因通商贸易滞留当地，主要聚居在交通、贸易比较发达的东南亚各地港口。而大批移居海外则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如今，丝路沿线的东南亚等地区是海外粤籍乡亲最多最集中的地区，有2000多万粤籍侨胞。

应该说明的是，并非所有华侨华人都是沿着海丝之路走出去的，有相当一部分华人属于当地人口的再繁衍，也有一部分华侨华人是通过其它路径出国的。而且，中国沿海移民大批移居海外主要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而此时已是“海丝之路”的衰落时期。这似乎也表明，在“海丝之路”史上，移民流和贸易流是不同步的。

即便如此，正因为有海丝之路的开辟，一批批“敢拼会赢”的中国沿海居民才能循着“海丝”印记，漂泊海外艰苦奋斗，华侨华人社会得以形成。而且，尽管早期移民规模不大，但其引领作用却极为关键。

（二）海丝之路沿途国家和地区的建设者

¹庄秋贵：《泉州华侨史略》，<http://cn.netor.com/m/yuanqu/yq/2004/38202/sys/adlist.asp?journsid=41431>

²龙敏：《福建海外华侨华人达1512万人 呈五方面特点》，

<http://www.chinanews.com/zgqj/2014/05-28/6219672.shtml>

移居之后，华侨华人秉承爱拼敢赢的优良传统，为侨居地和祖籍国的建设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对于侨居地而言，早期中国的生产力水平较高，因此，他们通过给当地带去先进的技术、物种等影响了当地的生产力水平。如据考古资料，在唐代因华侨众多而被称为“小中国”的马来西亚桑多邦发现有唐代泉州出产的黑瓷与白瓷。在文莱，也发现过安溪的唐瓷，从而证明泉籍华侨把瓷器带到了文莱。南宋后期，暹罗素可泰王曾慕名招来中国工匠，仅晋江磁灶吴氏族人就有多人“泛海传艺”。¹另一方面，他们也与当地居民并肩劳作，拓荒垦殖，修桥造路，建立村镇，兴办文化教育事业等，为当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贡献了力量。他们甚至与侨居地民众荣辱与共，积极参与、支持当地人民反抗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为居住国的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当侨居地获得独立之后，他们绝大多数先后参加居住国国籍，成为居住国公民。

近年来，海外侨胞更加注重回馈当地社会。如今，菲律宾华社“三宝”已成为关爱并回馈当地社会的典范。而在日本发生灾情时，海外侨胞积极捐款捐物，反映出一个负责任的华人群体形象。一些华人因表现积极而受到主流社会的高度评价，如旅日华侨潘桂华因在环保、卫生、旅游方面的突出贡献，被日本政府授予“篮绶褒章”。

对于祖籍国，他们又以侨汇、捐赠、投资、参加革命等方式予以回报。如早期华侨出国多只身出国，赚了钱之后就以侨汇的方式寄回来赡养家眷。此后，侨汇就成为了侨眷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以及政府的重要外汇收入。一些富裕侨商还心系桑梓，不忘支援家乡建设。加之晚清之后，政府出于种种原因对华侨投资国内多有鼓励。因此，自晚清以来，华侨华人就开始在家乡投资办厂、兴学育人或捐资慈善公益事业，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如自民国初年到1949年，泉州开辟公路、组织汽车运输公司和电灯公司等与城市发展有关的公共事业几乎都是泉籍华侨投资倡办或独资创办的。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华侨华人恋祖爱乡的情结不减，不仅回祖（籍）国投资兴业，也慷慨解囊扶贫助学，兴办教育和各种慈善事业，以造福桑梓，回馈社会。此外，众所周知，自晚清时期开始，海外华侨就开始积极参与到中国国内的各项社会变革当中。在抗战时期表现尤其突出。

不仅如此，他们在海外也经常为政府外交提供便利，并开展了种种旨在争取政府地位、维护中国尊严和形象的活动。如他们经常为出洋考察的政府官员提供食宿方面的帮助，各地商会也经常开展一些迎来送往之事。在国庆之日，各地华侨纷纷举行升旗及各种游行庆祝活动。而当中国主权或尊严受到侵犯之时，华侨华人也以各种方式积极抗争。如对于一部份别有用心的人对2008年北京奥运圣火的干扰，各地华侨华人均自发地组织起来，通过各种方式予以抗议，为奥运火炬一路保驾护航。此外，华侨华人还积极配合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如新中国建立后，一些东南亚华文报纸也成为宣传新中国建设成就的重要平台。如今，华侨华人还通过在当地媒体撰文、举办摄影展与图片展、开展座谈交流等多种形式向华人社区甚至主流社会介绍中国的真实情况。

（三）海丝之路上的中外贸易促进者

侨居“海丝”沿线国家的华侨华人秉承重商务实、开放兼容的优良传统，长期从事着中国与海

¹庄秋贵：《泉州华侨史略》，<http://cn.netor.com/m/yuanqu/yq/2004/38202/sys/adlist.asp?journid=41431>

外各国的长途贸易。

海丝之路主要有东海航线和南海航线，东海航线主要是前往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早在北宋时期，就有华侨华人通商的记载。如据日本大宰府的公凭，泉州客商、纲首李充及同船计 67 人，于崇宁元年（1102 年）贩丝瓷往日本，滞留两年后回国，翌年再往。¹明朝海禁形成的月港时代（1450～1627），中国海商全盘代理了日本的海外贸易。其中海盜李旦于 16 世纪末本于菲律宾经商，后转至日本九州岛定居，借由日本海盜集团帮助，筹组武装船队专事中日走私贸易并成为当地华侨领袖，成为东亚海域重要的海上势力。

南海航线主要是往东南亚及印度洋地区。东南亚是华侨华人的主要移往地，他们惯用中国国货，因此，在中国与东南亚之间从事远洋贸易的华侨华人较多，并形成独特的华商网络。月港时代也是东南亚近现代华商网络形成的阶段。这一时期明朝实行海禁，民间海外贸易沦为走私贸易，沿海港口中的漳州月港成为东南沿海第一大私商大港。中国海商很快掌控了菲律宾与中国、日本间的大帆船贸易，大帆船不停往来于中国与菲律宾之间，贸易不断。西洋航线中的印支马来半岛的航运贸易也掌握在华商手里。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华商网络和华商社会开始形成。之后的郑芝龙时代，海外华商仍然可以与西方人在东南亚海域展开对等竞争。月港时代过后，华侨华人的海上垄断地位有所减弱，但华侨华人从事中外商贸的传统却一直得以延续。民国时期，南洋各海外华埠还以国货展销的方式来推动中国国货在东南亚的销售。

新中国成立后，在改革开放前，华侨华人促进中外经济合作的重要平台是每年春秋两季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简称“广交会”）。广交会初创于 1957 年，许多华商不离不弃，多年来坚持参加广交会，并在海外广为宣传，争取其他外商来中国做生意。改革开放以后，华侨华人也积极参与到祖籍地举办的各种招商引资活动中，与祖籍地工商界人士互通信息，团结协作，共促中外商贸业的发展。一些华侨华人团体还为中外经贸合作尽心尽力。如泰国中华总商会每年都会接待数以百计的中国商贸代表团去泰国考察合作，并协助中国各地政府及企业在泰国举行展览及推介活动。此外，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华商同样发挥了中介和桥梁作用。如印尼三林集团与中国银行合资设立福建亚洲银行，开展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中介业务，该集团还与中资华闽集团共同开发印尼石油。近年来，在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华商凭借着其雄厚的经济基础以及与中国的血脉关系，而成为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桥梁和纽带。

（四）海丝之路上的友好使者

在封建王朝较为开放的时期，政府曾一度借用华侨力量发展对外交往，或对华侨开展的中外交往给予礼遇。如洪武二十五年（1392 年），朝廷赐琉球国“闽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令往来朝贡”。²明永乐三年（1405 年），旅菲晋江侨领许柴佬（许老哥）奉明成祖朱棣圣旨，荣任菲古国吕宋总督，由明钦差大臣三保太监郑和奉诏书委任。许柴佬任吕宋总督长达 20 年（1405-1424 年）。而清雍正四年（1726 年），菲律宾苏禄国王任命晋江华侨龚廷彩为正使，偕副使石丹率领使团访问中国，受

¹庄秋贵：《泉州华侨史略》，<http://cn.netor.com/m/yuanqu/yq/2004/38202/sys/adlist.asp?journid=41431>

²庄秋贵：《泉州华侨史略》，<http://cn.netor.com/m/yuanqu/yq/2004/38202/sys/adlist.asp?journid=41431>

到清政府隆重接待。¹可见，华侨华人成为了当时中外交往的使者。至晚清时期，政府充分注意到了华侨华人的重要性，并开始借用华侨华人开展外交工作。其时不少华侨华人被政府聘任为领事、副领事，如胡璇泽被任命为驻新加坡领事，他是清朝第一位驻外领事；张振勋先后被任命为驻槟榔屿副领事、驻新加坡总领事；张煜南为中国驻槟榔屿副领事；刘汝兴为驻悉尼副领事；陈善谦任小吕宋首任代摄领事；王占元为驻布里斯班副领事；陈国芬为驻檀香山领事等。

至民国时期，政府视侨民外交为官方外交的有力补充，对此极为倡导。而抗战发生后，海外华侨也积极开展国民外交活动，努力争取侨居国各界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如欧洲华侨曾组织代表团向 1937 年召开的九国公约会议请愿，要求制裁侵略者；缅甸华侨联合缅甸人和旅缅印度人组成了一个“华、印、缅联合抵制日货委员会”，“实地劝导各民族，对日经济绝交，以制敌人死命”²。一些侨商组织还在中外交往中起了促进作用。如 1946 年，暹罗中华商会设宴款待暹罗新任国务院长銮贪隆氏及其全体阁僚，并请中国驻暹大使李铁铮等人作陪，促进中暹官方交流。1946 年 10 月，在暹方建议下，暹罗中华商会召集各侨团代表举行“中暹亲善座谈会”，出席者有中暹双方官员及各侨团代表 400 余人。³会议对消弥中暹纠纷，达成中暹两族亲善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新中国建立后，华侨华人也努力促进中外关系发展。如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前，日本华侨社团为促进和维护中日友好关系做出了许多贡献。此外，中国与一些国家建立或恢复外交关系与华侨华人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这些人包括促成泰中建交的泰国华裔许敦茂，促成中马建交的马来西亚华人李引桐、曾永森，为中国与印尼两国复交做出了不懈努力的印尼华人实业家唐裕，致力于韩中建交和经贸发展的韩国华人中医学家韩晟昊等。一些华侨华人也积极促进中外交流，维护中外良好关系。如泰国中华总商会长期致力于中泰之间的友好往来和经贸合作。改革开放后，越来越多的华侨华人当起了“红娘”，在他们的引荐下，越来越多的中外城市结成了友好城市。

（五）海丝之路上的文化传播者

海上丝绸之路，也是海丝各国文化交流之路。华侨华人通过这条重要的海上通道将中华文明传播四方，也使中华文明从异域文化中汲取营养，获得活力。如虽然华侨华人在侨居地落地生根，但依然在语言、服饰、建筑、生活习惯等方面还保留了故乡的传统文化，这些中国文化也随之大规模地传播到这些国家，对当地语言、社会习俗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相反，随着华侨华人的回国返乡，他们也会将异域的一些语言、习俗带回家乡，从而形成比较独特的侨乡文化。

近代以来，在政府的号召之下，华侨华人有意识地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之风比较兴盛。这首先体现海外侨胞出资出力在世界各地建立了众多中文学校和中华文化中心，为传播中华文化提供了平台。近年来，一些致力于发展海外华文教育的专门组织也得以成立，如 2005 年成立的英国华文教育基金会，该基金会曾于 2007、2010 年分别成功举办第一届欧洲华文教育研讨会和欧洲华文教育论坛。其次，华侨华人在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方面也功不可没。如在东南亚、日本等地，华侨华人艺术团在纪念“春节”和“中国文化年”等文化活动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一些侨团还邀请中国国

¹ 曾智良，陈仲初：《晋江人侨居菲律宾大事记》，<http://www.jjsqxx.com/Item/Show.asp?m=1&d=89541>

² 林金枝：《华侨华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96-197 页。

³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政治（五），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608 页。

内的专业艺术团体前去表演。此外，一些华文媒体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方面也表现突出。在华人传统节日期间，这些媒体会对节日的来历、风俗习惯等予以介绍，并积极报道华人社会的节日庆祝活动。一些华文媒体还想方设法调动华人学习中华文化的积极性，如《星洲日报》出资设立各类文学奖，激励华人踊跃从事中国文学创作。

总之，华侨华人在海丝之路中扮演了多种角色，除第一种角色外，其它角色同时也直接是他们对海丝之路的历史贡献。而移民者角色是导致其它各种角色的基础。

二、华侨华人历史作用的运作机制

本文所指的运行机制主要强调华侨华人在海丝之路发挥上述作用的动因所在，以及各种动因在不同时期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式。

应该说，华侨华人历史上在海丝之路中所扮演的角色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从来源看，可以分为华侨华人个体因素和外在因素。个体因素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生计需要、个人情感、个人实力、个人志趣等诸多因素，外在因素又包括政府政策、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交通等多种因素。华侨华人在海丝之路中所扮演的每一种角色当中，均包含了多种内外因素，其影响程度在不同时期各不相同。比如移民流，既可能是个人生计所迫或寻求个人更好发展，也可能是政治压迫或战争。前者在和平时期比较突出，后者在战争等特殊时期更为明显；沿岸各国的建设者，既可能是生计、融入社会或获利的需要，也可能受政策推动的影响，还可能与华侨华人的爱国恋乡情结有关；中外贸易促进者既可能是个人职业所需，目的是为了能够更好地生存、发展，也可能是情感寄托，或是受到双方政府政策引导使然；中外友好使者与政府动员、个人志趣也有很大的关系；而文化交流既可能与个人习惯、情感、志趣有关，也可能受到政府的动员。倘若具体到华侨华人的个体，更可能极不相同。况且，各种角色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交织在一起，如移民流的同时可能伴随着贸易流和文化传播流。因此，对影响因素进行具体分析不仅极为复杂，事实上也难以进行。本文仅从宏观上对其中的某些因素稍加强调。

一是个人因素。生计所迫和自我发展需要是华侨出国的重要原因，也是他们在侨居国努力奋斗的主要动因。他们可能在当地经商、务工、办企业，当实力具备，他们也可能从事中外商贸事业或更多地在中国投资；受个人志趣的影响，他们可能偏爱捐赠等社会事业，也可能充当中外文化交流使者及和平使者；由于个人情感的影响，他们可能对祖（籍）国和侨居国的事情更为关注，并实际投入到中国和侨居国的各项建设事业当中，并尽可能促进两国的友好关系。特殊时期，他们甚至不惜牺牲生命来捍卫祖（籍）国和侨居国的安全和尊严。

二是国际政治经济形势。这里的政治经济形势既包括小范围内的中国和侨居国的政治、经济形势，也包括大范围海丝之路各国的政治、经济形势。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对华侨华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如华侨华人之所以移民，就与国内政局动荡、政治压迫、战争、匪患、经济凋弊等因素有关。特殊时期，如中日全面战争也刺激了华侨华人从人力、物力等方面更多地支援中国。从好的方面来看，出洋早期，中国的整体发展水平较高，这不仅为华侨华人在侨居地的生存创造了较好的条件，而且也使他们有一定的优越感，从而具备了在当地传播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动力。而侨居国的政治、经济形势也影响到他们在当地的事业发展和人身安全。情况好时，他们扩充事业并广

播善果；情况不好时，他们可能配合当地政府积极应对，也可能回流中国或转战他域。

而大范围海丝之路沿途各国的整体政治经济形势也影响到华侨华人作用的发挥。倘若大的形势好，且中国和周边国家关系正常、经济联系密切，华侨华人就可以广泛从事中外贸易、中外文化交流或到中国投资；反过来，一旦中国和周边国家关系紧张，他们可能担任友好使者的角色，但在中外贸易方面的作为就大打折扣了。个别时期，中国还会对华侨华人有所提防，而周边国家也会限制侨汇甚至于排华。

三是政府政策。从祖籍国政策来看，华侨迁移海外虽然由来已久，但因为初期人数不多，影响不大，因此一直未引起朝廷的足够重视，因此也未有实质上的政策出台。但至晚清时期，出于寻求利源的需要，以及由于中外联系的加强，清政府对海外华侨的实力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此后，一系列动员侨界的政策就相继出台了。这些政策，在晚清时期主要是鼓励华侨回国投资、捐赠，聘请华人担任领事，以及整合侨团、促进华文教育发展等旨在促进侨社发展、凝聚侨心的政策；民国时期除上述政策外，还包括救济归难侨，要求华侨注重海外形象，直接策动海外华侨开展国货运动等政策，抗战时期并十分注重侨务督导和海外宣传工作，广泛动员华侨为国捐输出力，开展侨民外交；新中国建立初期，一度通过组织东南亚华侨华人回国观光或参政，通过他们向海外宣传新中国的实际情况，并加强对海外华侨的宣传工作，“双重国籍”解决方案出台后转为鼓励华侨华人融入当地，为当地多作贡献；“文革”时期对华侨华人有所提防，对其回国投资、捐赠有所限制；改革开放以来，侨务领域拨乱反正，政府重新关注起华侨华人的独特作用，并注重对华侨华人的广泛动员。这一时期，政府开始恢复和加强与海外侨界的联系，注重在华侨华人中招商引资引智，强调华文教育工作和对外文化传播，并力促海外侨社发展。与此同时，也呼吁海外侨胞以多种方式向住在国政府及主流社会介绍中国的基本国情、发展道路和内外政策，帮助他们客观看待和认识中国的发展进步，同时呼吁他们积极成为促进中国与住在国各领域合作交流的友好使者。上述各项政策对华侨华人的影响是不相同的。但整体而言，晚清以来，尤其是辛亥革命之后，华侨华人的民族意识上升，他们对祖国的前途和命运较为关注，对政府的政策和相关号召也多有配合，如他们就曾积极投入到回国投资、捐输、开展国货运动以及文化传播和交流等活动中去。

至于住在国政策，其对华侨华人在当地的生存和发展的影响不言而喻。此外，宽松的移民政策对华侨华人的流入也有一定的吸引力；而住在国的对华贸易政策和外交政策，对华侨华人从事中国与住在国的商贸活动和和平促进活动也有直接的影响。

四是交通因素。海丝之路首先是一条路，其形成意味着中外人员往来更加顺畅，意味着中外贸易和交流更加便利。但海丝之路形成之后也曾因海禁而在明清时期受阻，民国和新中国成立之后，也曾因为战时封锁和外交孤立而使海丝之路再度萧条下去。而明清之后恰好是华侨华人大规模形成时期，因此海丝之路的受阻不仅意味着中外贸易和交流的整体受损，也影响着华侨华人在海丝之路上中外沟通功能的发挥。当然，反过来这或许会促使他们在侨居地更好地生根和发展，因此其时他们对侨居国的建设功能应该会有所加强。近几十年来，其它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的广泛运用使世界各国联系更加便利，这也可能会使海丝之路的重要性下降。但无论如何，海丝之路不仅仅是一条交通要道，甚至不仅仅是一条中外贸易通道，它还凝聚了中外各国因数千年人员往来、文化交流、中

外贸易而积累下来的文化、情感、传统和网络。因此，它在中外交流史上仍然是无法取代的。

总之，影响华侨华人在海丝之路上作用发挥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各种因素多是交织在一起共同起作用的。至于各种因素的影响程度，在不同时期通常也是不一样的，难以一概而论。只能说，一般而言，个人因素和政治经济大背景自始至终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晚清以前中国政府的政策和动员对华侨华人影响不大，晚清之后其影响明显加大，但具体影响程度要受具体环境以及政策本身是否合理、华侨华人对政府是否认同及其程度的影响。比如在全面抗日时期，华侨华人更能配合南京政府的相关政策；住在国政府政策在和平时期可能会促进华侨华人功能的发挥，但在特殊时期也会阻碍华侨华人功能的发挥。如在排华时期其给华侨华人带来的伤痛是刻骨铭心的，这些时期华侨华人的生存甚至都是问题，更勿提其在海丝之路中功能的发挥；交通因素因海丝之路的开辟对于早期华侨华人的出国和从事中外贸易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明清之后海丝之路衰落下去，但因华侨华人整体规模的膨胀，其对中国和侨居国的影响明显加强。

至于华侨华人发挥作用的方式，从主观动机来看，有的纯属自发行为，并非刻意为之。如一些个人发展的行为最后促成了较为积极的后果，比方说谋生促成了移民行为，为了谋生，华侨华人在侨居地的奋斗也最终促进了侨居地建设事业的发展；有的则是自觉行为，有意甚至是特意为之。当然，自觉行为除个人志趣、个人觉悟等个体因素外，更可能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如更可能有政府动员在起作用。如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南京政府认为在侨务领域，“举凡鼓励侨胞捐献、策动侨胞救国组织，加强抗建宣传，指导侨胞回国服务，鼓励侨胞回国投资，推动国民外交等，均为当务之急，政府亦全力推进。”¹而实践中，政府的鼓动对于华侨捐献、回国服务和投资等均有明显的效果。

从组织程度来看，有些是个体行为，有些则是团体行为。前者勿须细说，后者侨校、侨报和侨团这侨社“三宝”起到了领导和组织的作用。如在文化传播方面，侨校、侨报作用显著。而在和平使者、对祖籍国的建设等方面，侨团的作用不容小觑。如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前，日本华侨社团为促进和维护中日友好关系做出了许多贡献。而在中外权利抗争之时，侨团的引导和组织作用明显。相比较而言，团体行为受外力的影响更大。这也与各方着力于对团体的争取有关。

三、结语

历史上华侨华人的作为成就了现实中华侨华人的优势，在重启和重建海丝之路的构想中，华侨华人在其中的优越性仍是不言而喻的。这不仅因为丝路沿线的东南亚等地区是海外华侨华人最为集中且实力最为雄厚的地区，而且因为这些侨胞与中国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化相通，华侨华人完全可能成为积极推动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纽带和桥梁。

但要使华侨华人真正在其中发挥更有效的作用，不仅需要华侨华人进一步认清使命和机遇，也需要中国方面尤其是中国各级政府有所作为，积极创造条件，充分调动华侨华人参与其中的积极性，并充分发挥侨团、侨校等组织的引领作用。今后，对内，中国各级政府除了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勤修内政、积极打造服务型政府，完善各项基础设施以及各项相关政策外，也应本着互惠双赢的理念，进一步做好有关华侨华人招商引资引智工作，为侨企侨才排忧解难。各地区政府不仅要把原有的侨务战略与海上新丝路的战略对接起来，还应不断解放思想，不再纠缠于海丝之路地位之争，而

¹ 华侨志编纂委员会编：《华侨志总志》，台湾海外出版社 1956 年，第 529 页。

应以大局为重，资源共享，合力拼搏。对外，既要进一步发挥华侨华人在东南亚各国数量庞大、经济实力雄厚、社团众多的优势，拓展与海外侨团的联系交往，要对华侨华人参与建设海丝之路多方宣传、鼓励和引导，并推动“海丝”建设在海外的推介；也应敦睦外交，积极发展与华侨华人所在国的良好关系，为华侨华人在海丝之路重建过程中建功立业扫清障碍。

作者简介：

张赛群，博士，华侨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华人华侨。

福建推进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互联网平台的构想

池毓江

内容摘要：构建“海上丝绸之路”互联网平台的三个视角：一是网上政务对话互通平台，加深国与国之间政治互信，达成经贸合作共识；二是跨境电子商务平台，加强信息的互联互通，促进网络电子贸易；三是人文交流互享平台，推动文化兼容并包、多元共荣，共筑心灵的桥梁和纽带。

关键词：海上丝绸之路 互联网 平台

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习近平总书记访问东盟国家时提出的伟大构想。2014 年 3 月 5 日李克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抓紧规划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福建省委书记尤权在《打造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枢纽》一文中指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统揽全局、顺应大势作出的战略决策，是承贯古今、连接中外、造福沿途各国人民的伟大事业，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积极支持。福建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发祥地和我国最早对外开放的省份，要抓住机遇、主动融入，发挥优势、积极作为，为建设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美好世界做出积极贡献。

如何理解“海上丝绸之路”？中国与东西方其它国家的贸易往来，凡是通过海路这条大通道，都可称为“海上丝绸之路”经济贸易。“海上丝绸之路”主要运送丝绸、瓷器、茶叶、香料、药材、糖等货物，其中，主要出口货物是茶叶和陶瓷。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庄国土曾经谈到：“如果要比较科学的分，海上丝绸之路是一个贸易，是从贸易发展起来的文化、人文、交流的大通道。什么叫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呢？就是中国人带着中国的丝，然后坐中国的船，再经过这条通道一直通到印度洋，通到中东地区，然后再把货物倒出去，到达欧洲，这样叫中国海上丝绸之路。”

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自秦始皇派使臣出海远航开始，逐渐形成了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交流沟通的重要桥梁。福建作为我国最早对外开放的省份，毫无疑问福建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历史上，福建在“海上丝绸之路”中扮演着领头羊的角色。泉州、福州、厦门、漳州都属于“海上丝绸之路”重要发祥地和中心枢纽，早期，其中又以被誉为侨乡的泉州为甚，泉州曾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其余港口城市并没有获得这样的荣誉，宋末至元代时，泉州港与亚历山大港并称为世界第一大港。福建为沿线国家和区域的互相繁荣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根据福建省商务厅公布的经济数据，可以统计出我省 2008-2010 年的对外贸易情况（见下图）：

福建省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表

年份/项目	进出口额	出口额	进口额
2010	8747938	5766307	2981631
2009	6406249	4289659	2116590
2008	1949882	1252577	697305

金额单位：万美元

不论是从出口总额，还是从进口总额的数据进行分析，“海上丝绸之路”经济总值表现为逐年增长。为了促进经贸合作发展，搭建信息高度共享的互联网平台显得日益迫切。货物实体运送还是要靠“海上丝绸之路”这条大通道，货物信息的交换、传递则可通过互联网平台。

一、构建网上政务对话互通平台

“海上丝绸之路”要走向更深层次、紧密合作交流就必须建立政治互信，政治互信的建立是其他方面的合作发展的基础和保障。政治互信非一日之功，政治互信是建立在一定的共识基础上的，要达成更广泛的共识，必须加强政府间互访互动，增进彼此的感情，加深双方的了解。在尊重彼此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基础上，通过建立网上政务对话互通平台，不断巩固政治互信。

通过政务对话互通平台，让更多各国政要推动经贸活动，让更多各国商人、企业家开展交流合作，引导广大商人、企业家及时把握各国产业发展方向，增进商人、企业家对各国经济发展模式、产业发展规划和改革方向的了解，促进各国企业间的交流合作，形成政商活跃互动的新机制，最终把国家顶层的合作意向真正落实推广到企业层面。

知识信息爆炸时代，搭建务实合作的各层次政务对话平台，可以让商人、企业家，最快速便捷的了解各国的经济发展政策。信息的及时获取就是商机。以政治对话加快经贸以及其它领域合作，以经贸互赢加速教育和文化交流，促进政治互信、商贸互惠、文化互流，全面开放合作的“海上丝绸之路”新模式。

二、构建跨境电子商务平台

网络打破了国与国之间的地理隔阂和障碍，各国对网络都有着共同的诉求和愿景：网络既要全面开放，也要相对规范；网络既要全面自由，也要订立规则；网络既要全面共享，也要确保安全；网络既要互通互联，也要尊重他人隐私。

中国要积极发展跨境电子商务，发展与东盟、欧盟的经贸电子商务合作，开拓西亚、南亚、非洲等沿岸地区新兴电子商务市场。必须与各国要加强网络互联互通，深化合作，共同打造“海丝”电子商务平台，使之成为建设 21 世纪“海丝”的电子商务贸易枢纽。“海丝”电子商务平台的构建，必将推动建立一个更加紧密、更加务实、更加高效的网络一体化，让网络互渗互透、信息互通互享更好地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合作发展。

推进跨境电子商务平台，要从几个方面着手：首先，加快基础设施合作共建，整合各方资源，加大投入，加快区域网络设施、通信设施、技术设备建设，建成海陆空全面互联互通，架设海陆空“信息高速公路”；其次，共同投入拔尖技术人才，在关键技术上要紧密合作，在关键技术研究开发中，要团结协作，共同参与共同分享，制定互通公认的核心技术标准，打造互相信赖的电子支付、

电子证书、电子签名等网络服务体系。再次，加强信息共享，在信息不断膨胀的今天，电子商机的把握离不开信息的及时获取。开启电子商务合作与发展的新时代，关键要实现互通互享。互通，即是网络的互通；互享，即是信息的互享。只有信息快速共享，才能即时沟通，才能务实合作，才能让跨境电子商务不断繁荣发展。最后，提高通关、物流服务水平，针对跨境电子商务贸易，建立专项口岸通关、物流机制，促进“海上丝绸之路”电子商务的货物通关和商人进出交流的便捷化。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在 21 世纪必将重新焕发生机。

三、构建人文交流互享平台

以往两国之间的人文交流主要依靠举办各类展演、民俗、研讨等活动，势必在活动空间和参与人数上是小范围、小规模。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人们对交际、交流有了新的需求，人们要求跨越空间的距离和时间的限制，建设人文交流互享平台是顺应时代的呼唤。由线下的有限互动变为线上的自由互联，由线下的单调活动变为线上的多元交流，由线下的劳心劳力的组织变为线上的低廉高效的管理。人文交流互享平台不仅希望各国能够推介中华博大精深文化，而且鼓励各国展示各自的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各国文化兼容并包、多元共荣，让人文平台成为连结心灵的桥梁和纽带。

福建在建设人文交流互享平台中，要发挥海外华人华侨的优势，推动社会人文深度融合。建立一批华侨华人民俗、宗教、宗亲等民间交流网站，华侨华人青年网站，华侨华人社会团体、华侨华人城市论坛、华侨华人联盟、华侨华人国际文化交流网站，进一步拓宽人文交流合作，充分展示“海上丝绸之路”悠久的历史文化。不断提升福建“海上丝绸之路”的国际影响力。

推进新闻媒体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加强新闻宣传报道，强化不同文化的互取互补，拓宽大众的视野，培养大众的文化判断力。学者专家应担负更大的历史使命，投入到“海上丝绸之路”学术研究和理论创新中去，提升“海上丝绸之路”的学术研究水平，提出可行、务实的建设性意见。促进国与国之间文化深度交融、社会和谐发展，努力构建“海上丝绸之路”文化新家园。

四、结语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机遇和挑战并存，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是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产业进行转型升级的一股强心剂，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另一个破冰点。携手重构这一通道，将对人才、技术、资金、政策等资源进行整合，重新焕发经济活力，带动各国的经济发展、繁荣富强，实现互惠互利共赢。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福建，不仅拥有众多与“海上丝绸之路”紧密相关的沿海港口，还拥有大量海外华侨华人。福建在推进“海上丝绸之路”上，有理由充当先锋角色，福建在加快推进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应承接好商贸、人文的辉煌成绩，发挥好独特的特色优势，坚持“走出去”与“引进来”结合、政务对话、经济合作与人文融合三个并重，努力打造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互联互通的政治政策互联网平台、经贸合作的前沿互联网平台、人文交流的便捷互联网平台。

作者简介：

池毓江，男，1987 年生。汉族，福建三明人。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硕士。研究方向：教育管理。

打造海上丝路引导基金 推动福建一带一路建设

徐宝林 王睿

内容摘要：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访问中亚和东盟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简称“一带一路”，给予古丝绸之路以新的时代精神，为亚太地区注入了新的活力，并得到中亚和东盟各国以及印度等国家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响应。

福建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正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海为田园，鱼为衣食”，是福建开发海洋悠久历史的真实写照。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对于当今的福建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牢牢抓住“一带一路”战略的机遇，福建就能重塑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就能在改革发展进程中走的更加顺利。

“海上丝路引导基金”作为一种创业投资政府引导基金，由福建省政府牵头主导首先启动，基金的发展将经历先国有资本，后民营资本的轨迹，致力于福建港口建设、海洋运输、物流和海洋高科技等产业的发展，它的出现能够调动民间资本朝着符合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行业产业中涌入，更好地发挥国有资本的引导作用，摆脱传统国有投资的模式，推动福建更好地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浪潮之中。

本文认为，“海上丝路引导基金”的建立应充分发挥福建省地域优势并与产业特征相结合，借鉴国内外“基金的基金”（FOF）方式，采用“两合”基金组织模式，通过制度设计充分地导入创业资本机制，弥补国有资本的固有缺陷，以更好地发挥引导基金的产业引导作用，推动福建发展海上丝绸之路从而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关键词：海上丝绸之路 福建省 创业投资引导基金

一、引言

（一）研究意义和目的

建设“一带一路”有利于进一步推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在提升东部开放水平的同时加快西部建设步伐。福建省处在祖国东南沿海，内与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带联系紧密，外与台湾隔海相望，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应发挥对外开放的桥头堡作用。作为我国新兴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创业投资（venture capital）等风头私募产业成为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调整的重要力量。然而在国家创业资本政策不明确情况下，民间资本往往处在观望阶段，同时，创业投资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和风险补偿制度的缺乏使得民间资本的介入更加难以实现。创业投资政府引导基金的出现，为民间资本的投资指明了方向，它对于创业资本的作用，不仅仅提供资金的支持，而且还提供信用的支撑。

为把福建省打造成为“一带一路”建设中海上丝绸之路的桥头堡，必须进一步发展对外贸易产

业及其相关产业，无论是港口的建设和维护，还是物流、水产和海洋高科技等中小企业的发展，都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海上丝路引导基金”若能成功实现，可以明确地体现国家意志，着重投资对外贸易及其相关产业，推动福建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一带一路”的建设是“海上丝绸之路引导基金”成立的契机，它不是借势炒作的结果，而是在对福建省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过程中的作用、地位和需求有了一个全面客观清醒的认识之后，将研究的结果运用到“海上丝路引导基金”的实践中来而产生的。在实际研究中，政府选用哪种参与方式更为合理，如何结合福建省的实际打造“海上丝路引导基金”的运作模式和管理团队，如何规范政府引导基金的设立程序，都是本文需要讨论研究的重点内容。本文的研究目的是通过对福建省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的优势和劣势分析，并借鉴国内外成功案例的经验，选择“海上丝路引导基金”的运作模式，建立一整套实际可行的基金运行方案。

（二）国内外政府引导基金发展现状

从国际上来看，引导基金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普遍采用的一种扶持国家确定的、新兴的和战略产业的政策。以色列 YOZMA 基金是以政府出资为基础并与国际知名创业投资机构合资发起的创业投资基金，是典型的参股支持模式，所有子基金均为有限合伙制基金，政府为有限合伙人，主要投资于成长初期的技术创新企业；美国 SBIC 计划采用政府监督，私人经营的模式，先后采取优惠贷款、债务担保的方式，引导民间资本流向小型企业；澳大利亚 IIF 基金由澳政府参股与民间资本共同设立，支持中小科技企业。¹还有许多比如英国政府创业投资基金等成功的政府引导资金案例为我国创业资本的形成提供了灵感。

在国内来看，北京市中关村管委会设立的“中关村创业投资引导资金”开创了我国政府引导基金的先河，随后上海、深圳、天津和江苏等地纷纷成立各地区或区域的政府引导基金。2008年10月18日，《关于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规范设立与运作的指导意见》正式生效，²明确了引导基金的基本原则，解决了引导基金实施的许多难题。截止2010年底，全国已有政府引导基金40多只，总额超过300亿元。

无论是放眼国外还是国内的政府引导基金发展，“海上丝路引导基金”的建立都势在必行，既是福建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当务之急，又是促进改革发展的长远之计。

二、“海上丝路引导基金”成立的契机

（一）“一带一路”建设预期的“蛋糕”有多大

习总书记指出，加强“一带一路”建设，可以从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几个方面着手，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加强区域合作。³据中国经济网数据了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为发展中国家，总人口约为44亿，经济总量为21万亿美元，分别占全球的63%和29%。2013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额超过1万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25%，

¹ 王燕 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国内外比较与建议[J]. 科技信息, 2010

²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规范设立与运作指导意见的通知[EB/OL] http://www.gov.cn/zwgc/2008-10/22/content_1127977.htm

³ 易诚 进一步加强与“一带一路”国家的金融合作[J] 甘肃金融, 2014年4月15日

未来五年，中国将进口 10 万亿美元的商品，对外投资将超过 5000 亿美元。¹由此可见“一带一路”建设给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和经济的腾飞带来了一块前所未有的巨大“蛋糕”。

如何从“一带一路”建设的“蛋糕”中切下更大的一块，是福建省促进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也是推动福建经济转型升级长远之计。目前，福建省已经在开拓“海上丝绸之路”市场的进程中取得一定进展。福建省根据自身特点筛选了 19 个展会作为重点展会，对企业参展给与资金支持；推进东盟国家重大外资项目，总投资额达 222.79 亿美元；政府鼓励纺织、服装、家电、机械、船舶和电子信息等国内技术成熟而国际需求量大的行业向海丝沿线国家转移。此外，福建省商务厅表示力争几年后福建省对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出口增长率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3-5 个百分点。

无论是“引进来”还是“走出去”，福建省都离不开海洋运输的基础。而港口建设、物流、船舶和海洋高科技等产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海上丝路引导基金”的创立就是为了缓解“一带一路”建设相关产业资金需求与供给的矛盾应运而生的。该基金将重点投资港口建设、物流、船舶、海洋高科技等产业，这些企业的发展和升级将成为福建对外经贸发展的助推器，进一步促进福建与东盟、中亚和中东地区的经贸往来，推动福建全面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无论从时代发展还是国家战略的角度来看，“海上丝路引导基金”的建立对福建省的发展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二）“海上丝路引导基金”的潜在效益

“海上丝路引导基金”首期规模约为 60 亿元人民币，预计撬动社会资本 200-400 亿元，这些资本将流向促进福建对外贸易发展的产业中去。2013 年福建与东盟双边贸易额达 242.9 亿美元，利用来自东盟的外资 3.47 亿元，对东盟投资额 4.5 亿美元，²“海上丝路引导基金”若能顺利建立并运作，带动的产值规模乐观估计可达 2000 亿元人民币以上，每年可为福建省 GDP 的增长贡献 1 个百分点，利税总额可达上百亿元，保守估计三年内福建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额可以翻一翻。此外，引导基金扶持的新兴企业可以为福建省增加至少上万个就业岗位，为福建广大新增毕业生和失业老百姓提供就业和再就业的机会。

“海上丝路引导基金”的建立将有效缓解福建省港口建设、船舶和海洋高科技等产业发展资金不足的问题。港口建设方面，基金的建立可以缓解当前面临的建港资金不足的问题，推动福建力争完成港航投资 500 亿元，实现 2015 年全省港口吞吐量 5.5 亿吨、集装箱吞吐量 1500 万标箱的任务；形成 3 个吞吐量亿吨大港，促使厦门港、湄洲湾港率先成为 2 亿吨大港³；同时，港口的建设与升级将拉动福建对外经贸发展，形成以福建为中心的经济辐射带，同时把内陆地区与东盟、中东等国家的贸易往来串联起来，全面提升“走出去”和“引进来”的贸易水平，带动以福建为首的东南沿海经济带的崛起；此外，“海上丝路引导基金”和其他民间资本的支持可以促使海洋生物医药产业迅速崛起，海水综合利用、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也会稳步发展，未来将取得一批水平全国领先、具有产业开发前景的技术成果，有利于福建海洋经济的转型升级。⁴

¹ 高虎城 深化经贸合作 共创新的辉煌——“一带一路”战略构建经贸合作新格局[J] 国际商务财会，2014 年第 6 期

² 福建省统计局官网 http://www.stats-fj.gov.cn/xxgk/tjgb/201402/t20140224_36808.htm

³ 中国新闻网 80 亿开局 福建加速“大港口”建设[EB/OL]
<http://www.chinanews.com/cj/2011/04-06/2955291.shtml>

⁴ 节能环保网 福建高科技节能环保海洋产业正加速发展[EB/OL]
<http://ecep.ofweek.com/2012-10/ART-93000-8100-28820431.html>

三、“海上丝路引导基金”方案探究

(一)“海上丝路引导基金”可行性分析

1. 福建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地缘优势

作为我国向亚太地区开放的东南窗口,福建省与东南亚、中亚等国有着密切的经济往来,经贸关系稳固,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具有历史交好悠久、经贸往来密切、人文关系友好、产业优势互补明显、海洋文化底蕴深厚的优势。福建与东盟地区地缘接近、文化认同,民间交流不仅限于经贸往来,也存在于人文交流,无论是“走出去”还是“请进来”,福建地区的优势显而易见。同时,台湾与福建隔海相望,血脉相连,已成为福建与东盟关系发展的重要桥梁纽带。因此,“海上丝路引导基金”在吸引台商资本和海外资本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2. “侨商”的巨大作用

东盟国家 2000 多万华侨华人中有近 1000 万人祖籍福建,另外闽籍台胞数目众多,台胞移民后成为海外华人,有助于促进“以侨引台”、“以台引外”,促进侨商台商和海外商人的交流合作,共同发展,这正是福建特有的外向型发展模式。¹“一带一路”战略对于侨商具有政策导向作用,使得海外资本敢于并乐于投向“海上丝路引导基金”,加大了基金的对于民间资本的吸引力。

3. 福建省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发展成果

2011 年 12 月 10 日,福建省政府发布了《福建省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提出了“省级财政将统筹安排不低于 5 亿元的专项资金,设立战略性新兴产业引导资金,重点用于重大项目的跟进投资、重大科技开发专项、科技创新服务平台、产业化培植计划项目和应用示范项目资金补助等。同时,设立不低于 10 亿元的战略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基金,重点培育发展一批处于初创期和成长期的创新型新兴产业企业”。²在政策的支持下,福建省大力发展创业资本引导基金,正不断缩小与引导基金发达地区如深圳、上海等地的差距。

综上所述,“海上丝路引导基金”是十分可行的,是福建省拓宽对外经贸往来,融入“一带一路”战略,推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极佳选择。应牢牢抓住“一带一路”战略的契机,把福建省打造成祖国东南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的桥头堡。

(二)“海上丝路引导基金”的宗旨、组织形式和运作原则

1. “海上丝路引导基金”的宗旨

“海上丝路引导基金”的设立应以资本积聚,为“一带一路”建设服务为导向。具体宗旨是:以为“一带一路”建设服务为核心,同时引导国内外资本聚集,促进福建省金融和专业服务业的发展,培养专业基金管理团队。

(1) 为“一带一路”建设服务。“海上丝路引导基金”的终极目标是为了促进“一带一路”建设,基金主要投资港口、船舶、物流、海洋高科技等产业,这些产业的升级将全面提升福建贸易“走出去”和“引进来”的水平,带动以福建为首的东南海洋经济带的崛起。

¹ 文云朝 论福建侨乡优势与地缘文化[J] 人文地理, 1997 年 12 月第 4 期第 12 卷

²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福建省关于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 [DB/OL] (2012-02-09) http://guoqing.china.com.cn/gbbg/2012-02/09/content_24597104.htm

(2) 促进福建省金融和专业服务业的发展。引导基金的设立在促进资本聚集的同时,也发挥带动效益,带动福建省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审计、税务法律、风险评估等专业服务业的发展,全面提升福建金融整体水平。

(3) 培养专业基金管理团队。通过引进国内外先进引导基金的团队运作经验,加深对政府引导基金的理解,提高基金运作能力,培养一批相对成熟的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团队,为福建省金融发展储备人才力量。

(4) 引导国内外资本聚集。通过政府引导,用少量的国有资本吸引大量的社会资本,发挥国有资本的杠杆作用,引导国内外资本在福建省积聚发展

2. 组织形式

在“海上丝路引导基金”的组织形式上,采用“基金中的基金”(FOF)方式运作,投资其他基金而不投具体项目,政府参股但不控股,充分发挥基金的放大作用。同时由于我国创业投资的特殊性和市场环境的不完善,基金的组织模式采取“两和基金”的治理模式¹,引导基金的母基金实行国有控股的公司制模式,子基金采取准有限合伙制即在公司制的基础上引入激励约束内核,以此来最大化“海上丝路引导基金”的制度引导与资本引入的双重效应。“两和模式”可以从多个方面体现其激励约束作用:一是母基金实行国有控股的模式,既能体现资本的国有属性,又能落实引导基金的政策意图,使基金的投资方向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服务;二是子基金采取准有限合伙制可以使管理团队享受与其运作业绩相匹配的报酬,激发工作热情,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加入“海上丝路引导基金”的发展中来;三是政府引导基金带动民间资本流向优秀的创业企业中去,促进创业企业的发展,推动福建对外贸易产业体系的发展完善,实现政府引导基金的最终目的。

3. 运作原则

(1) 多元化出资。改变以往国内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中富有个人投资、养老金投资和保险基金投资缺失的问题,扩大社会资本来源,并广泛吸收台商、侨商等海外资本投资,实现出资主体的多元化,提高抵抗风险的能力,扩大基金规模。

(2) 市场化运营。国有资本要充分发挥引导作用,改变其以前具有的主导地位,放手让专业的投资团队负责基金的运作和管理,分散国有体系管理人员的领导权,使“海上丝路引导基金”按市场化运作。

(3) 专业化管理。按照市场化原则选择一批具有专业背景、知名品牌、丰富经验的优秀管理团队,充分发挥其运作基金的优势和特长,并设立约束激励机制,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加入到“海上丝路引导基金”的管理运作当中。

(4) 明确投资方向。要确定引导基金的投资范围,使“海上丝路引导基金”的子基金主要投资港口、船舶、物流、水产、海洋高科技等产业,规定母基金在投资子基金的过程中,筛选投资方向为上述产业的子基金作为投资对象,同时对于以上述产业作为投资对象的子基金,可以许诺对其管理团队在企业 IPO 上市以后采取赠与股份等方式激励其投资上述产业,通过强制限定与有效激励相结合的方法,为“一带一路”建设服务。

¹ 张晓晴 中国创业资本引导基金治理模式研究[J] 财政与金融 《生产力研究》, No. 23. 2008

（三）“海上丝路引导基金”方案选择

1. 建立依据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规范设立与运作指导意见的通知》和《关于福建省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等有关规定，成立“海上丝路引导基金”。基金的运行以“政府指导，市场运作，科学决策，防范风险”为原则。

2. 出资主体

资本供给方面，在启动阶段可由福建省政府与国家开发银行共同出资并吸引国内优质资金组成，在基金运作的中后期可以吸引福建省内、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台湾地区和海外侨商的富有个人投资以及省内养老金和保险基金投资，共同组成“海上丝路引导基金”。

3. 组织机构

引导基金主要由决策委员会和两级资金管理人组成。决策委员会负责决定投资方向，落实政府政策意图，同时对资金管理团队进行筛选和管理，决策委员会委员由福建省政府代表、一级资金运作管理人和二级资金运作管理人代表组成。一级资金管理人实行国有独资制度，以确保资本的国有属性，属于有限合伙人（简称 LP），行使 LP 的权利；二级资金管理人从优秀的管理团队中选拔，采取有限合伙制，管理各个子基金，属于普通合伙人（简称 GP）。

4. 运作流程

（1）确定基金规模。“海上丝路引导基金”初期由福建省政府与国家开发银行按照 1:1 的比例共同出资 20 亿元，按照 1:2 的比例募集福建省内及国内其他省份优质资本，打造首期规模约为 60 亿元人民币的引导基金。

（2）选择管理队伍。选拔海内外有合作意向的优秀 GP 团队（优先考虑拥有本土经验的福建省内优秀 GP 队伍）并请他们提交基金运作方案，随后提请福建省政府组织专家（可以参考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师团队的意见）召开评议会，听取各个团队的方案介绍和规划，从中确定一只 GP 队伍为合作伙伴，由该团队负责“海上丝路引导基金”的具体运作。

（3）明确管理办法。组建决策委员会，由福建省政府代表、一级资金运作管理人（LP）和二级资金运作管理人（GP）代表组成。LP 实行国有独资制度，落实福建省政府的政策意图，与 GP 建立治理和沟通机制；GP 负责选择优质子基金，并由决策委员会决定是否出资，同时决策委员会中的福建省政府代表具有一票否决权，以控制引导基金的投向符合“一带一路”建设的大方向。

（4）基金的初步建立（基金的第一次放大）。福建省政府和国开行投资启动并吸引国内优质资本，初步建立规模为 60 亿元人民币的母基金。

（5）基金的第二次放大。“海上丝路引导基金”按母基金规模的 5% 向优秀的子基金出资，与子基金共同发起 20 只左右的子基金，子基金注册地均为福建省内。每只子基金规模约为 10-20 亿元人民币，预计可撬动社会资本共计 200-400 亿元人民币，放大系数在 20-40 倍之间。同时，引导基金子基金采取跟进投资的方法，在 VC 机构选定投资项目以后，子基金按照 VC 机构实际投资额的 5% 提供股权投资，¹使政府对产业的导向作用更加明显，体现“海上丝路引导基金”为“一带一路”建设

¹ 陆铭 尤建新 周文泳 引导基金投资模式的比较研究[A] 中国软科学增刊（下）2011（X）0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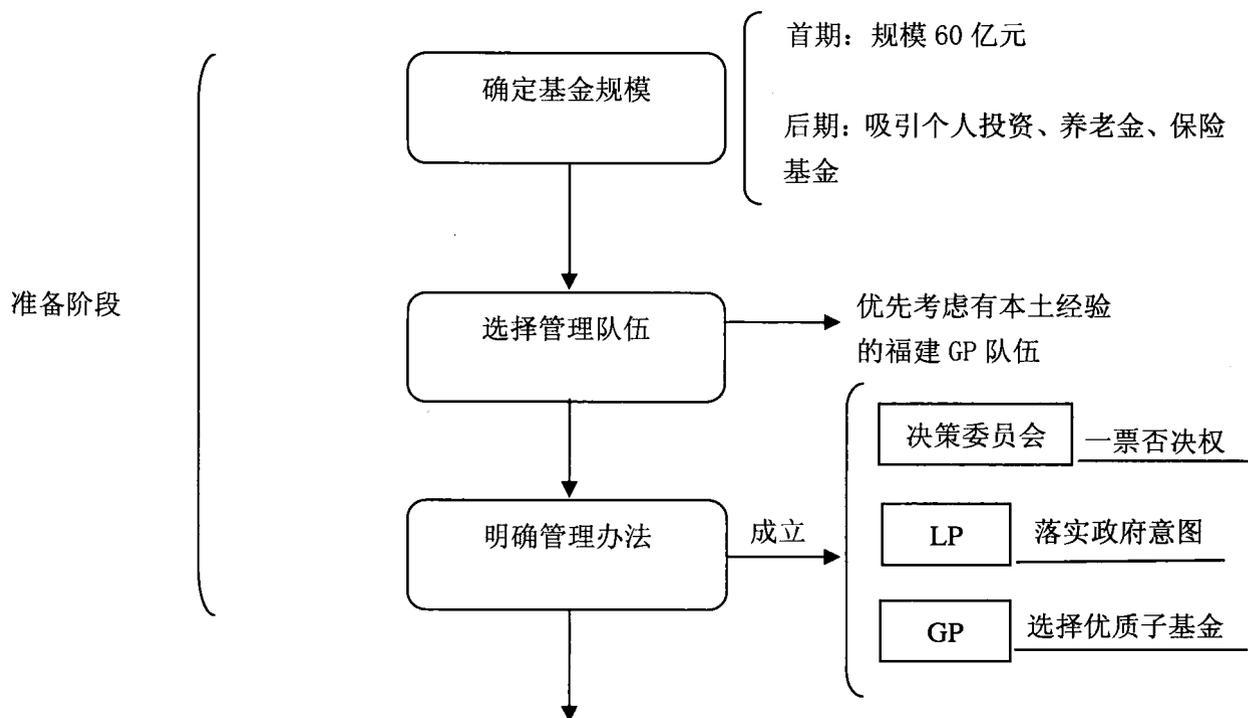
服务的宗旨，对本基金重点扶持的产业的发展更具有推动性。

(6) 风险防范工作。GP 团队对子基金中超出存续期的项目及时进行清算，增强资金流动性，保证资金效益的高利用率和安全性，将所投资子基金的资金流向和运作情况定期向 LP 等投资人汇报并提交数据报告，对基金运作中出现的重大失误要及时向上级反映。

(7) 国有资本退出。通过 IPO，股权转让和回购并购等方式实现“海上丝路引导基金”中国有资本的退出。对于运作成功的项目优先考虑企业 IPO 和股权转让，实现国有资本的保值甚至增值；对于运作效益不好的项目考虑企业的回购和并购，达到控制风险和减少损失的目的。

(8) 建立考评机制。从四个方面考察“海上丝路引导基金”的投资绩效。从政策产业导向看，以是否将政府资金的 80%以上投资到港口建设、物流、船舶和海洋高科技等产业为考核指标；从引导基金杠杆效应看，考察基金一次放大系数能否达到 2 倍，二次放大系数能否达到 10-20 倍，总放大系数能否达到 20-40 倍作为考核指标；从基金价值方面看，要保障引导基金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又要体现其政策性和非营利性，以引导基金现有价值和初始价值之比能否保持在-20%-20%之间为考核指标；从风险控制效果来看，把企业 IPO 或者股权转让盈利的项目算做成功，把项目清算或者股权转让亏损的投资项目算作失败，以把项目成功率控制在 40%以上作为考核指标。¹此外，建立责任追究机制和奖惩机制，明确责任划分，避免产生无法追究责任的情况发生，并通过对员工的奖惩考核激发其工作热情，不断促进“海上丝路引导基金”治理机制的完善。

“海上丝路引导基金”的运作模式如下图 4.1 所示。



¹ 李洪江 政府导向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 2010 年第 15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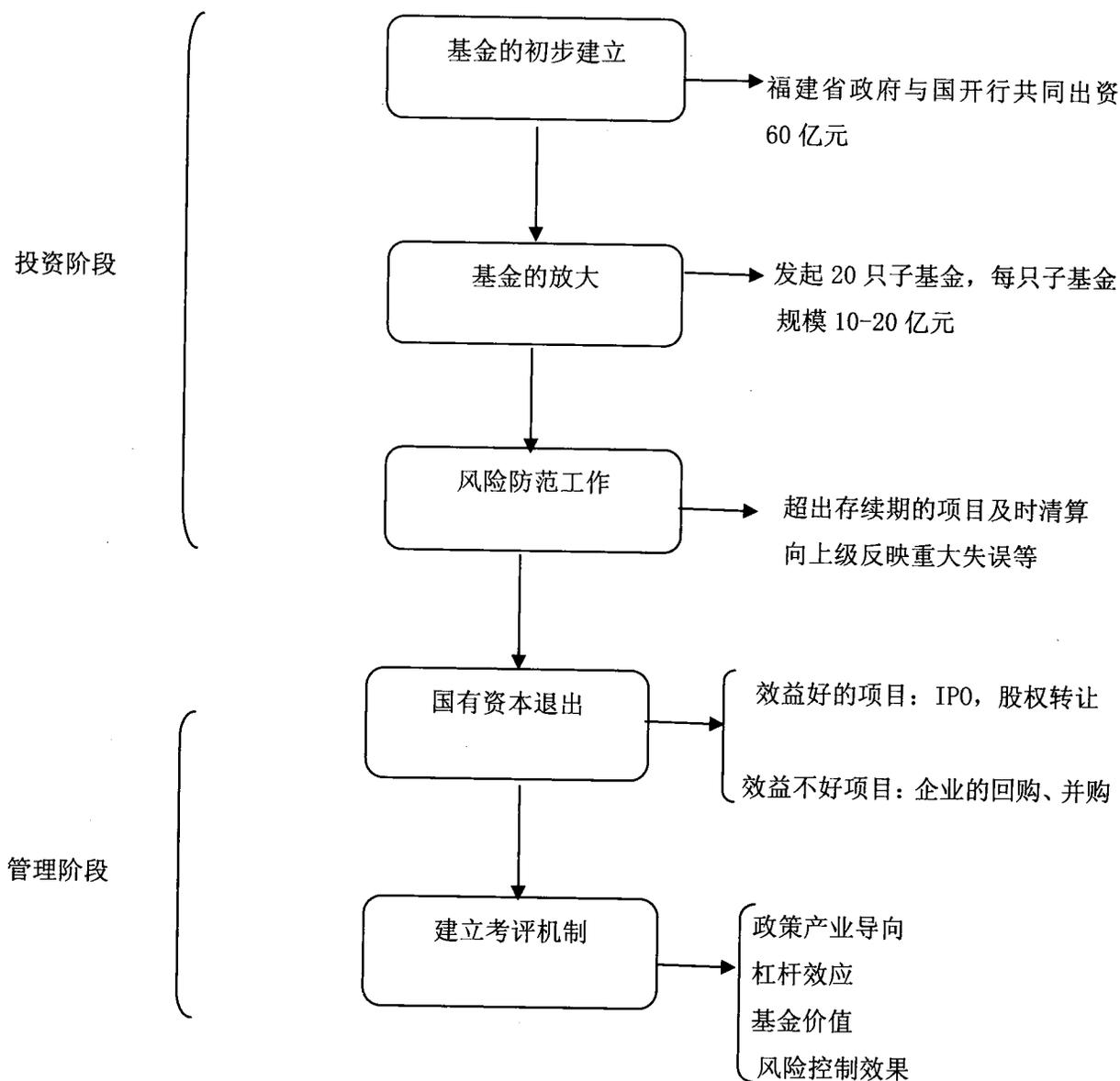


图 4.1 “海上丝路引导基金”运作模式流程图

四、“海上丝路引导基金”可能遇到的问题及相关对策

(一) 能否形成丰富的资金来源结构

前文中笔者提到，“海上丝路引导基金”在运行后期要吸引福建省内、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台湾地区和海外侨商的富有个人投资以及省内养老金和保险基金投资。然而在国内其他创业资本引导基金的实际运作中，富有个人投资、养老金保险金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究其原因，国有资本主导的创业资本往往具有害怕风险、行政干预、目光短浅等问题，因此富有个人的投资信心不足，大都不愿意将资金投入政府引导基金中去，此外部分投资人有进行创业投资的意向，但他们不具备抵抗创投风险的实力。此外，我国投资制度的不健全导致养老金和保险基金几乎没有参与到创业资本的运作中来，其收益能力非常低，而中国百姓的传统观念对于“养老金入市”更是感到胆怯，这与国外先进基金中养老金占重要地位的情况差距甚远。这些都是“海上丝路引导基金”能否广泛吸引社

会各方面资金形成丰富的资金来源结构的潜在问题。

对策：个人资金利用方面，为打消民间投资者的顾虑，可以考虑通过事先签订协议约定民间投资者享有引导基金的优先分配权和优先清偿权，保障投资者收益的最大化，提高风险减损的能力。保险金利用方面，福建省政府要与中国保监会加强沟通合作，为“养老金入市”打造绿色通道，逐步推出养老金参与风险投资的条例，使养老金得到超常规发展。此外，政府可与省内如平安人寿、中国人寿、太平洋保险等多家保险公司合作，以税收作为保证金，吸引保险公司将保险基金投入到“海上丝路引导基金”的运作中来。

（二）能否为创业资本的形成制定法律和制度依据

目前我国尚缺乏私募股权基金（PE）的系统化立法，《合伙企业法》和《公司法》的可操作性不高，PE 普遍存在规模小、理念和手段落后、监管主体不明确、监管机制不健全等问题。¹李万寿认为，中国现有的机制使得各种资本难以向创业投资方向转化，源于中国的法律体系没有为创业资本的形成创造相应的法律环境，从而造成大量民间资本只能以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形式游走在法律的灰色或空白地带。

对策：福建省应该推出相关的法律条例和制度依据，建立合理合法的私募基金制度条例或暂行办法，使私募基金有明确的监管主体和监管机制，做到先有法可依再有法必依，这样才能使“海上丝路引导基金”充分利用私募基金的功效，扩大基金规模。

（三）引导基金中国有资本的效率问题

国有资本在市场竞争中一般不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原因在于运作机制与资本体制的矛盾，使得国有资本的运作效率不高。另外国有资本所控制的企业往往缺乏人力资本配置的机制，导致人员管理混乱，部分不具备专业投资知识的国有体系人员占据基金的绝对领导权。

对策：为提高国有资本的运作效率，“海上丝路引导基金”中的国有资本要实现股权多元化，进而回避政府对企业的直接干预，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此外在人力资源上，改变以往国有资本体系管理人员占据绝对领导权的问题也是提高人力资本效率的关键所在。同时，避免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代替企业，而应成为多元化投资公司，通过专业化管理提高投资效率，投资的专业化也是提高国有资本效率的关键之一。

（四）国有资本的退出问题

国有创业资本交易必须按照国家相关法规进行，而我国在国有创业资本界定、国有资本股份上市和挂牌交易程序等方面没有建立区别于一般金融资本的管理规定，因此国有资本的退出问题已经成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老大难”问题，这使得国有资本进入优秀创业企业时受到抵制，也不能实现国有资本的增值。同时国有资本与国际创业资本相比，国际创业资本不但可以实现企业的海外上市从而直接退出，还可以灵活运用国际资本市场的优势，配合国际大企业进行联合收购。因此，“海上丝路引导基金”中国有资本的退出问题，既决定着国有资本增值能否实现，也决定着国有资本能否进入下一轮资本循环。

对策：福建省应建立多渠道退出机制，比如：引导基金应加强与国内各大保荐人的联系，建立

¹ 吕海宁 私募股权基金法律制度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大连海事大学, 2013年6月

在国内 IPO 上市的平台；鼓励“海上丝路引导基金”在台湾等地搭建境外基金退出平台，构建资本的海外退出渠道；子基金通过区域产权交易市场推出；鼓励企业进行自身回购或者其他企业进行并购；加强与各个地区产权交易所的合作，简化国有资产的交易程序，提高评估速度，从而缩短交易时间。最终形成退出机制多种多样、协调发展的退出机制，提高国有资本的循环效率。

作者简介：

徐宝林，男，经济学博士，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领域：风险资本投资、公司金融与资本市场；

王睿，男，厦门大学金融系硕士研究生。

福建融入“一带一路”投资合作研究

徐宝林、王畅

内容摘要：“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出的旨在发展与沿线各国的经济伙伴关系的合作发展倡议，促进新贸易格局形成的基本设想。本文从福建省出发，认为福建省在泛珠三角经济区和海峡西岸经济区有良好的投资基础，且在对外贸易、交通网络、运输配送、侨民资源等方面都给建设“一带一路”带来较高的可行性，但也存在来自国家层面和省际层面的问题，如政治紧张、产业政策、地方保护、融入切入点选择等问题；应对这些问题，一方面选择重庆市作为福建省融入“一带”切入点，通过消除市场保护，建立工业园区，设定通道优惠，完善投资法规及信息平台等促进福建省与重庆市投资合作；另一方面，选定东盟作为“一路”建设的切入点，认为在投资规模上把握各国优势和省内各区发展重点，扩大投资空间和贸易额；在投资产业上吸引优势产业进入，促进福建省产业升级，转移边际产业，加大高技术性产业发展；在投资方式上以跨国投资为主，依据产业特点结合新建投资和联合企业集团投资方式，为福建融入“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初期提供示范作用。

关键词：一带一路 泛珠三角经济区 海峡西岸经济区 投资合作基础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一带一路”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是涉及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互惠合作型跨国经济带，一旦建成，将对世界贸易格局产生深刻的影响和变革。

“一带一路”一经提出，不仅在国际上引起重视，国内各省市也摩拳擦掌，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在“一带”建设上，有西北部的甘肃、陕西、宁夏、青海、新疆5省和西南部的重庆、四川、云南、广西4省市；在“一路”建设上，有江苏、浙江、广东、福建、海南五省，其中部分省市已着手构建“一带一路”的实施目标和发展规划。福建省作为中国海洋经济强省，又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发祥地，在历史文化和经济实力上都足以成为“海上丝路”战略实施的先行者，并通过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点区市进行互通合作，践行的“一带一路”指导方针，做好示范和带头作用，完成“一带一路”的无缝衔接。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在新经济形势和战略布局下，为福建在国内外各领域投资合作继续深化提供可参考政策建议，加快融入“一带一路”，促进福建省经济进一步发展。

（二）“一带一路”实现对福建省投资合作的影响

1. “丝绸之路经济带”对福建省投资合作的影响

丝绸之路经济带主要集中在中国西部地区，由东向西依次是经济圈内，由西向东依次是经济圈内，由西向东依次是经济圈内，由西向东依次是经济圈内。

欧大陆的经济走廊。福建省与其在距离上有差异，但在贸易和交流上是息息相关的，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能加深省际间的合作，并在对外贸易上实现投资空间的延伸以及投资规模的扩大，打破区域性限制，结成一体化互惠投资政策体，培育福建省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2. “海上丝绸之路”对福建省投资合作的影响

“海上丝绸之路”形成后，沿线航运会享有更多互惠互利贸易条件，促进福建与“海丝”沿线国家在基建、航运、海洋以及经贸、投资、生态等领域的全面深化合作，实现企业“引进来”与“走出去”；通过建立良好的海洋伙伴关系，促使福建省对外发展水平达到更高层次，发展速度进一步扩大，使福建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支柱，经贸合作的前沿平台。

（三）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本文对福建省融入“一带一路”投资合作进行研究，首先，分析“一带一路”框架实现对福建省经济及投资合作的影响；用历史分析法研究福建省现有的投资合作基础和实现融入“一带一路”的可行性；再基于对外经济情况及统计数据分析法，探讨福建省融入过程中投资合作可能面临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建议，促使福建省成为路上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无缝衔接点。

二、福建省融入“一带一路”投资合作的现有基础

（一）福建省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现有投资合作基础

泛珠江三角洲地区概念于2003年7月正式提出，包括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9个省市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十年以来，福建省在泛珠区域引进项目4138项，引进资金8193.96亿元，累计投资18000亿元，与兄弟省区合作开通物流内支线和内贸线共86条¹，福建省在泛珠三角区域已经有良好的贸易支持和投资合作基础。

福建省在泛珠三角地区的投资合作基础还在与港澳合作的深化拓展，2013年，福建对香港进出口110.36亿美元，同比增长24.87%，对澳门进出口4073万美元，同比下降43.2%，福建省与香港贸易投资占较大比重。截止目前，香港在闽投资项目已超过2万个，总投资额突破400亿美元，有70多家有福建背景的企业在港上市；福建还引进如华润集团投资福建的重大产业合作项目；另外，在金融合作上，有香港恒生银行入股福建兴业银行、香港富邦银行入股厦门市商业银行，并借助香港作为自由港拥有的金融服务业优势，吸引了包括毕马威、普华永道等国际知名金融服务公司入驻福建，依托与香港的合作，福建有高效的投资环境和金融服务。在“一带”建设上，面对国内环境和国际需求，都有更高的吸引力和更好的实力。

表 1：福建对港澳进口商品贸易额

单位：万美元

地区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中国香港	10916	16226	36434	50134	47560
中国澳门	19	33	81	14	14

¹ “我省参加第十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暨经贸洽谈会取得成效”，福建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http://www.fujian.gov.cn/zwgk/zfgzdt/bmdt/201410/t20141020_885345.htm, 2014-10-20

表 2: 福建对港澳出口商品贸易额

单位: 万美元

地区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中国香港	350678	455702	618100	833593	1056024
中国澳门	1401	2998	3242	7154	4059

(数据来源: 福建省 2009-2013 年统计年鉴)

与此同时,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上西南部 4 省市—四川、云南、广西、重庆,除重庆市外均在泛珠区域与福建省有投资合作和贸易往来,通过这几个省连接“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西北部五省—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以“三点”带“一带”,融入“一带”具有较为高效的投资合作基础。

(二) 福建融入“海上丝绸之路”现有投资合作基础

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概念于 2004 年正式提出,是以福建为主体,面对台湾,邻近港澳,涵盖浙江南部、广东北部和江西部分地区的经济综合体,福建省作为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核心,与区内各省市拥有良好的投资合作基础;与此同时,在国内层面上,“一路”的建设以福建、江苏、浙江、广东为主,两个经济区域重叠于福建,并以福建为中心,为福建融入“一路”提供充分的现有投资合作基础。

另外,在对外贸易上,中国—东盟自贸区已建立并全面展开,福建与东盟的经贸合作迎来了新高峰;2009—2013 年,福建与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贸易额位居前列,2013 年对这四国出口达 1127284 亿美元,同比增长 13.1%,进口 474898 万美元,创双边历史新高。

表 3: 2009-2013 年按国别分出口贸易额

单位: 万美元

地区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菲律宾	117396	167682	231826	350049	412674
泰国	67591	93315	124803	154440	168757
马来西亚	164461	194220	244092	304194	368724
新加坡	97029	112406	165183	188189	177129

(数据来源: 福建省 2009-2013 年统计年鉴)

目前,福建省有远洋企业 28 家,远洋渔船 337 艘,并在印尼、缅甸等地修建了 9 个境外远洋渔业基地;福建对东盟的水海产品和蔬菜出口也在逐年增长,但随着食品安全问题的突出,各国在食品进口方面的准入条件和核查标准都在提高,使农产品出口成本提高,自贸区的建立部分减少了这方面的限制;福建省鼓励企业“走出去”,截止 2013 年底福建赴东盟设立境外企业已达 156 家,投资额 4.5 亿¹;福建省拥有厦门经济特区,可实行自由港某些政策,且对台投资上,有 3 个台商投资区,在对外贸易上已具备良好的投资基础。

¹ “一带一路”助力福建与东盟合作稳步拓展,

<http://www.fj.chinanews.com/news/2014/2014-10-13/292011.shtml>

在“一带一路”建设初期，依托福建和在珠三角区域的贸易基础，通过四川、云南、广西、重庆切入“丝绸之路经济”，借助已有的充分投资合作基础，融入“一带”具有很高的可行性；另一方面，借助福建在海峡西岸经济区与广东、浙江、江苏部分地区的投资合作基础，以及与东盟的良好合作关系加大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打造，为“一路”建设提供良好的示范效用；高效的投资环境和政府效能也给福建融入“一带一路”带来了高的可行性。

三、福建融入“一带一路”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一）国家层面上的问题与挑战

在国家层面上，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复杂多变的，首先政治紧张是最严峻的问题，如南海争端使中国与部分东南亚国家在政治关系上较为紧张，针对中国的不良舆论会影响民意，没有好的互信合作基础，将无法把“一带一路”互惠到双方人民根本利益上；且部分东南亚国家内部政局不稳定，政权斗争强烈，政党更迭较快，能否持续有效建立“一带一路”合作关系的不确定性高；另外，沿线各国发展层次有差异，宗教文化交错，利益诉求不一，协调成本和风险都较大；

其次，美国实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战略扩张在亚洲的影响力，俄罗斯对中亚的控制也是由来已久，欧盟控制欧洲经济命脉，而“一带一路”旨在连接亚非欧大陆，在途经其他经济联盟时，会产生很大的重叠和竞争性排斥，既阻碍“一带一路”的推进，也将中国陷入两难之地，还可能会产生贸易上的大摩擦。

最后“一带一路”要求在基础建设、后勤补给、网络通信等方面投入巨大前期成本，各国都想少投入多效益，资金来源方式等也是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各国为保护本国经济不受冲击，可能对有政策执行差异和隐形贸易保护，在降税同时增加贸易壁垒。

（二）省际层面上的问题与挑战

1. 福建融入“一带”面临问题与挑战

福建拥有泛珠三角经济区中四川、云南、广西三省的投资合作基础，但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还要加大与重庆和西北部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5省的联系，因此，如何选择一个切入“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省市是需要解决的首要战略问题。

其次，福建处于较为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且为中国较早开放贸易的省市之一，而“一带”沿线地区多处于中西部，经济发展欠发达，进出口贸易总额差距大；政府赋予东南沿海地区某些优惠政策也使得投资环境基础不一，在融入过程中不可避免出现各省之间产业政策和区域扶持等问题，也是协调发展的一大障碍。

另外，交通路径的选择也是贸易便利与否的决定因素，如今中国纵横贯通，道路发达，高铁、火车、高速公路都四通八达，但运输成本也是地域间合作发展的能否高效推进的一大关键。

2. 福建融入“一路”面临问题与挑战

福建省融入“一路”面临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国家层面，国家的制度保障和各国政府人民的支持，外围压力显著减少，运行起来才更容易。针对福建省而言，首先，福建省投资合作区域窄，规模不大，主要还是依靠地缘优势吸引外资，没有形成投资布局规模化。

其次，福建省在产业水平上处于装配产业居多、劳动密集型居多、资源矿产行业居多，但一般

都处于产业链下游，核心技术和高端价值少，严重依赖国外公司，出口产品同质化程度高，竞争激烈，利润空间少，产业优势不足，这部分中小企业能否在区域竞争中存活下来是影响福建省经济稳定与否的重要因素。

另外，“一路”建设前期投入大，即使有国家支持，但资金仍会有缺口，如何融资来扩大港口建设、铁路建设、后勤补给以及选择何种的投资合作方式等也是急需解决的一大问题。

四、解决福建省融入“一带一路”投资合作面临问题的对策建议

（一）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面临问题的对策研究

1. 选择重庆作为融入“一带”切入点

福建省在泛珠三角经济区和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一个重点地带在于重庆，在地理位置上，重庆处于西北五省与珠三角经济区之间，在经济实力上，重庆作为中央直辖市，形成改革较早，经济发展基础好，前景宽；另外，“渝新欧”铁路总长1.1万公里，起点就为重庆市，通过该铁路在中国和欧洲之间运输高价值的商品比传统海运更有效，因而这条铁路越来越受到西方大公司的重视，重庆市正计划依托这一优势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的建设。因此，在选择切入点的时候，依据渝新欧铁路比海运有效性，重庆市是一个地理优势、经济优势于一体的好选择。

另外，纵观重庆市经济发展情况，主要以汽车工业为核心机械工业，以医药、天然气为基础的化学工业，以非金属材料为主的建材工业以及冶金工业、食品工业为优势产业；而福建省以通讯电子计算机、服装鞋帽、纺织、交通设备制造、化工原料等集中度较高；福建省与重庆市产业结构既有重叠又有互补；另外，在对外贸易上，重庆以机械器具、电气设备及零部件、船舶及运输设备、贱金属及其制品等为主，福建则为机械与运输设备、纺织、服装及衣着附件、鞋靴等，在对外贸易上既重叠又互补，故在产业结构和升级目标上具有一致性。通过加深合作和各自在“一带一路”上的枢纽地位，达成通往全球的贸易端口，带动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国内的投资合作会较之跨国合作有更多的沟通便利和合作动因，因而福建省与重庆的战略合作具有很好地可行性和设计性。

2. 福建省与重庆市投资合作建议

促进福建省与重庆市投资合作，共同联合完成“一带一路”在陆上和海上的无缝衔接。首先构建统筹合作机制，成立福建—重庆投资合作建设领导小组，统筹两地的重大战略规划及专项规划，在战略层次上高度一致，协调合作。

其次是建设涵盖面广的交通大通道。依托我国交通主线和海峡西岸综合运输通道，福建省补充建立外通东南亚各国，内连周边沿海省市及西南部地区的公路、铁路、港口、等交通方式，连贯“福建—西南省—欧盟各国”的国际综合物流大通道，还可以增加开通福州、厦门、泉州等口岸至重庆的铁路集装箱，有条件下可开启双向班列，使得福建省能通过重庆新渝欧铁路加快与欧洲各国的贸易往来发展进程，扩大贸易规模

再有，福建省可与重庆市在港口贸易上进行合作，共同吸引内陆货源和运输箱源，建设“合作港”，省去福建省相关企业在港口办理装卸、报关、检验等必须手续程序，而是直接从“合作港”内将货箱运抵港口，并直接登船出海，大大削减了等待时间和程序成本；现今，各港口都拥有现代化电子口岸平台，福建可通过与重庆电子口岸平台的对接，实现货物信息共享，运输信息跟踪，资源

互联互通，为进出口贸易提供远程、高效、现代化的服务。

同时，福建省应借助海峡优势，成为台湾内陆商贸往来的纽带。随着海峡西岸建设逐步完善，越来越多的台资企业进入中西部地区，举例来说，这些台资企业在重庆投资生产，将产生极大的对台物流需求，福建在对台贸易、物流运输等方面有最大的便捷度和正对性的优惠政策，可以运用这一优势，引进重庆市在福建港口设立独立的对台物流中转区；同时，重庆市近年对台湾的进出口额稳步提升，借助福建中转区，联合优惠政策和升级合作，能加大与台湾的联系和合作，对福建和重庆是互利双赢的。

另一方面，要加大与重庆的经贸合作深度，要首先消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封锁的政策法规，放松人员、技术、资本、货物、服务流动限制，形成透明高效、平等竞争的市场，再借助地区商会的人力资源，鼓励两地群体企业到各方建立工业园区，福建省就可以面向欧非大陆，实现企业在出口方向上的多样化和规模扩张，重庆可从福建港口出港与东南亚国家进行更便捷、运输成本更低的贸易往来，在福建—重庆的各种运输方式上，可共同设定优惠，如借鉴泛珠三角地区农业“绿色通道”，对运送农产品的受优惠车辆通过省际公路收费站时见面收取路桥费，吸引外商到两地的直接投资。

再有，区域性建设离不开完善的投资合作法律体系和高效的信息沟通平台，促进双边与多边资源共享，着重加强在区域内物流中转枢纽地的投资合作，共同建设投资合作网点，可涵盖基础设施服务、运输服务、金融服务等方面，如共同建立金融机构为两地间贸易合作提供资金和服务支持，针对建设过程中资金问题，可引入公私合作伙伴机制来融通资金，并扩大合作的辐射范围，促进周边地区经济发展。

（二）融入“海上丝绸之路”面临问题的对策研究

1. 抓住各国重点，引进优势产业，分层转移劣势产业

福建省与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贸易近年占有比重大，且在贸易额上保持顺差，这四国经济发展优于或与福建相似，中等技术密集型投资领域竞争加大，投资效益减少，可将福建省已成型的劳动密集产业以境外加工的转移形式转至越南、老挝等国，在投资空间和投资规模上扩张；东盟各国自然资源丰富各异，如印尼以渔业为主，老挝以林业突出，缅甸则以矿业资源丰富为投资热点，在自然资源上可根据各国优势扩大在该方面投资，保持福建省自然资源可持续发展；当然，投资规模的扩大不意味着各个国家各个方面都投资，要抓住重点，引进优势，分层转移劣势；对于新加坡这一发达国家，在新加坡国内设立贸易中心和交通网点，借助其经济影响力将福建省的投资合作带到更大的投资空间上。

表 4：分国别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金额

单位：万美元

地区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菲律宾	-2344	-6765	3317	1690	-985
泰国	70	-85	-11	-192	1998
马来西亚	1844	5728	9919	2780	-546
新加坡	4511	21747	15262	22210	53789

（数据来源：福建省 2009-2013 年统计年鉴）

在吸引东盟资金投资上，从表 4 看，要充分吸引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外商在福建投资是要点，政策上鼓励外国优势产业和龙头企业在福建投资建厂，促进福建产业升级，扩大外商投资规模；再有，福建省从南往北有漳州港、厦门港、泉州港、湄洲港、马尾港、三都澳港等港口，其中厦门港、福州港已是全国十大集装箱港，厦门空港是仅次于北京、上海和广州的第四大国际货运空港，从表 5 可看出，2013 年厦门、福州、泉州和漳州在利用外商投资上居前位，其余各区均低于 30000 万美元，要抓住这些地区的发展重点，侧重制定优惠政策以扩大外商投资规模，是外国投资在福建省空间上的延伸和扩展。

表 5：各区市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 单位：万美元

地区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福州市	103227	118524	127745	133877	143063
厦门市	168674	169651	172583	177453	187204
莆田市	18302	22952	25264	25559	30164
三明市	7460	8635	9201	10300	12500
泉州市	172002	149342	161511	131960	139112
漳州市	55018	70076	88739	89025	94552
南平市	6167	6787	7794	8733	10501
龙岩市	15225	16506	17762	19908	21598
宁德市	5672	7098	9512	12007	14433

（数据来源：福建省 2009-2013 年统计年鉴）

2. 选择具有比较优势和符合双方产业优化趋势的产业

投资合作应从各方产业结构优化角度出发，制定相应的产业选择机制，确定正确的产业投资方向；一方面引导东盟国家资金投向合适的产业，另一方面选择合适的对应产业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实现产业布局合理分配，投资结构优化，最大化投资效益。

（1）东盟对福建投资产业选择

首先，要吸引东盟在福建省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产业进入，以扩大直接投资数额；如东盟是世界热带经济作物大产地，生产技术成熟，产量逐年高升；矿产资源上，锡、石油、天然气等储量丰富，而福建在能源、黑色金属冶金辅助原料等矿产资源短缺，主要依靠进口；针对这些情况一面引导东盟的企业投资于福建的农业、石油化工业等，另一面引导东盟资金投向福建资源开发、冶金工艺等方面。

符合福建省产业优化趋势，在产业结构变化上有一致性的影响；福建省总产出逐年增长，第二产业稳定占至总产出的 70%左右，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分别占 5%和 25%左右，且各年总产出的增量上也以第二产业为主，第三产业为次，第一产业出现了增量略有减少的情况；故福建省现以第二产业为主，第三产业和第一产业为辅的模式，产业升级目标是保持第二产业主导，大力增强第三产业

产出，努力扶持第一产业；在这种情况下，要吸引东盟各国对福建省的第一和第三产业投资，在投资结构上调整产业内部分布，促进东盟对福建省投资合作的产业协同性和合理化，加快福建省产业转型和升级。

引导东盟向产业关联度强的技术密集型产业投资，目前，东盟对福建省的投资以制造业为主，服务业为辅，批发零售业次之，在建筑和农业等方面投资很少；吸引东盟的高科技技术产业以及研发、设计等技术核心产业来福建投资，引进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公司，促进福建省高端制造业的发展，提升核心竞争力。

促进双方贸易规模扩大、贸易结构优化，引导东盟向福建省有出口优势的产业进行直接投资，福建省在机械制造及运输设备（2539295 万美元）、服装（1645306 万美元）、鞋靴（1156626 万美元）以及电信及声音录制和电力机械、电器零件等方面的出口数额大，应引导东盟投资于技术含量高的深加工产业，提高福建与东盟的贸易水平。

（2）福建对东盟的投资产业选择

首先运用边际转移标准，将福建省过剩产能产业转移至在有优势地位的国家，实现双方获利。如东盟四国土地资源多、气候条件好，在农业生产上有很大优势，而福建省在初级产品生产水平一般，那么，福建省可对东盟的农业产业进行投资合作。

其次，福建省应以市场为导向，选择东盟有潜力的投资领域，如东盟资源丰富、潜力巨大，既能减少福建省对自身资源的依赖，又能获得新的利润点；同时也要关注东盟各国产业调整，投资符合改革升级一致性的产业和行业，确保投资效应良好，带来投资效益。

3. 跨国并购为主要方式，新建为辅助方式，创新银企集团投资合作模式

一直以来，福建省以国际工程承包、劳务合作为主要的对外投资合作方式，但目前贸易放开程度加大，核心技术掌握能力越来越重要，原有的投资方式无法满足现有发展要求，应采用跨国并购这一当前主流投资方式，并积极推动省内企业以更有针对性投资合作方式参与跨国合作。

跨国并购可以有效消除或降低行业壁垒，使企业以较低成本进入目标国市场，一般对于有一定影响力的企业，应鼓励其采用跨国并购方式进行投资合作；另外，对于互补性强的投资合作，如福建的电子机械、纺织和轻工生产能力强，而东盟国家在机械设备、服装等需求量高；在农业和资源方面，东盟较福建省更有比较优势，在互补性投资中，鼓励在这些行业进行跨国并购，缓和对外贸易摩擦；战略性资源投资，在允许情况下，选择跨国投资合作方式，以掌握上游资源，从价格上升中受益。

新建投资方式也较多采用，特别是面对东盟中的发展中国家；福建省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体现在低端技术密集产业重复建设，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明显不足，在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在开展投资合作时，如农副产品及水产品加工，应采用新建的方式来转移过剩的产能，规避贸易壁垒，带动相关产品的出口。

另外，组建大中小企业联合企业集团对外投资也是一种方式，这些企业“抱团走出去”并形成具有较强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进一步，将企业与选择的银行进行结合，形成银企集团，为跨国企业提供信贷支持、信息咨询、风险管理等方面服务，通过这种方式促进福建省在对

外投资合作中进一步壮大，主要适用于高科技产业对外投资合作的创新方式。

五、结论

通过分析福建省融入“一带”和“一路”的现有投资合作基础，认为福建在泛珠三角经济区和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投资基础上融入“一带一路”有很高的可行性；但在融入过程中，会受到来自国家层面的政治紧张问题、重叠竞争排斥等问题，省际层面的产业政策差异、资金缺口等问题，以及在投资规模、产业和方式上的选择问题；基于这些问题，结合重庆市的地理优势和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贸易产业结构，认为通过消除市场封锁，建立工业园区，设定通道优惠，完善投资法规及信息平台，促进福建省与重庆市投资合作，来实现福建融入“一带”；结合福建与东盟投资合作，认为扩大投资规模、选择产业实现投资合理化、以跨国投资为主，依据产业结合新建投资和联合企业集团投资方式这三方面加快福建融入“一路”步伐，并提供政策性建议。完成福建省在陆路和海路完成“一带一路”的无缝衔接。

主要参考文献：

- [1]刘赐贵, 发展海洋合作伙伴关系 推进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若干思考,《国际问题研究》2014 年第 4 期.
- [2]李建建 陈燕,福建—东盟双向投资前瞻,《亚太经济》2006 年第 2 期.
- [3]周宏芸,论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与绿地投资的选择,《特区经济》2006 年 12 月.
- [4]唐帆 陶红军, CAFTA 条件下福建对东盟贸易竞争力分析—以东盟四国 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为例,《福建农林大学学报》2009 年 12 月.
- [5]庞晓东,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和合作方式创新研究,《商业时代》2010 年 3 月.
- [6]袁小平 李叶芳,泛珠三角区域贸易与投资分析,《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 年第 4 期.
- [7]杨林 何春霞 陈芸,泛珠三角区域金融合作的策略,《粤港澳市场与价格》2008 年第 8 期.
- [8]何军明,厦门市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 新机遇与对策,《东南亚纵横》2011 年第 2 期.
- [9]钟巧花 林宏达,福建商务厅: 拓展福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
<http://fujian.people.com.cn/n/2014/0708/c337006-21610401.html>, 2014.10.12..
- [10]陈琦,重庆可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
<http://cq.people.com.cn/news/201488/201488238285677396.htm>, 2014.10.15
- [11]张羽,福建搭建与东盟合作“金桥”推动经贸往来,
<http://www.chinanews.com/df/2011/05-17/3047640.shtml>, 2014.10.13.
- [12]赵岗,“一带一路”融资创新需引入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机制,
http://news.ifeng.com/a/20141010/42172570_0.shtml, 2014.10.13.
- [13]孙贤迅, 福建拓展与泛珠三角区域各方全面合作,
http://news.china.com.cn/rollnews/2010-08/27/content_4034714.htm, 2014.10.28

作者简介:

徐宝林, 男, 经济学博士,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助理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风险资本投资、公司金融;

王畅, 女, 厦门大学金融系硕士研究生。

絲綢、白銀與帆船貿易： 1570–1760 年馬尼拉的福建商人

Qian Jiang (钱江)

Paper prepared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Maritime Silk Road of the 21st Century and Fujian” to be held in
Quanzhou, Fujian, 27th -28th November, 2014

It is generally held that hundreds of years before the coming of the Spaniards an extensive trade developed between the Philippines and south China, during which large quantities of trade pottery and other goods from China were brought into the islands.ⁱ Trade in consequence made it necessary for some of Chinese merchants and crew members, of whom almost all were Hokkiens, to sojourn in the Philippines.ⁱⁱ Nevertheless, the size of these early Hokkien sojourning communities that were established at various points along the junk trade route was very small prior to the Spanish conquest. When Miguel Lopez de Legazpi arrived in Manila in 1570, he found only a small Chinese community with some 40 Chinese merchants who had long settled there with their wives and children.ⁱⁱⁱ In fact, it was the coming of the Spaniards and the rise of Manila as the Asian hub of trans-Pacific commerce that significantly modified the pattern and conditions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junk trade with the Philippines and breathed new life into the early Hokkien communities scattered in the islands. The new opportunities offered by the Manila galleon trade between the Philippines and Mexico not only created profit for Hokkien merchants but also transformed their small settlements into a marked segregated community in Manila.

Sangleys and the Parian

The Hokkien merchants or “Sangleys”^{iv} as they were frequently called by the Spaniards were from Quanzhou and Zhangzhou prefectures in south Fujian. Generally speaking, of the Hokkien Sangleys

sojourned in Manila, the majority were those from the Zhangzhou prefecture (漳州府), notably from the towns or villages in Hai-cheng (海澄), Long-xi (龍溪) and Zhang-pu (漳浦).^v As was the custom, the merchants from Tong-an (同安) and Zhong-zuo-suo (中左所 i.e. present Amoy or Xiamen) identified themselves with the Zhangzhou merchant group though administratively they belonged to the Quanzhou prefecture (泉州府). The Quanzhou merchant group which predominantly comprised of those Hokkiens from Jin-jiang (晉江), Yong-chun (永春), Nan-an (南安) and An-xi (安溪) was also very active in Manila. What is especially noteworthy in this regard is the merchants from An-hai (安海), a coastal town adjacent to Quanzhou and the maritime headquarters of the famous Zheng family in the early 17th century, played formative roles in Manila in both the junk trade between Fujian and Manila and the sojourning community. The An-hai people's custom of loving to do business overseas and their deep involvement in the junk trade with Manila were faithfully illustrated by Li Guangjin (李光縉), a Quanzhou gentry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 as follows.

The people of An-ping (安平) are profit-seeking by nature. As soon as the trade with Manila was opened, ninety percent of them set sails for ocean to pursue the profit. Consequently when the barbarians made a surprise attack on the Chinese merchants last year, and killed all of them, no one from An-ping could escape. When the obituary reached their homes, the sound of mourning filled the whole town, and nobody could tell how many women of the town have thus become widows.^{vi}

Unlike other Hokkien Sangleys from the countryside of south Fujian who as a whole were peasants, the An-hai Sangleys had mainly been merchants before travelling to the Philippines. Their aim of venturing overseas was thus basically not to get away from their poor lives at home but to maximise profit with the capital pooled together with their clansmen. Therefore, the An-hai Sangleys were usually seen as the well-to-do merchants in Manila. This group of merchants was so famous among Hokkien Sangleys of Manila that any rich Chinese merchant in the town would as a custom be called *Anayes*, though the spelling of their names that frequently appear in the Spanish documents varies, such as *Anayes*, *Anhayes*, *Avay* or *Auhay*.^{vii} Detailed information on this particular Hokkien merchant group in Manila, however, is surprisingly patchy; what we know is that there were five or six hundred *Avays* merchants at Manila's *Parian* on the eve of the massacre of 1603.^{viii}

What is stressed above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that the An-hai merchants were the only wealthy Sangleys in Manila. Rather, various sources suggest that some of the Zhangzhou merchants were in effect part of the commercial élite of the sojourning community, such as Guansan, Sinu and Guachan, who conveyed the letters from the Manila authorities to the Fujian government after the massacre of 1603.^{ix} The residents of Manila also knew that whatever they needed, the merchants from Zhangzhou would very quickly carry the goods to the *Parian*.^x Possibly due to the prominence of the Sangleys from Zhangzhou or

Chincheo as it known to the Spaniards was widely known in the Philippines, the Spanish Bishop Salazar even used the term “the province of Chincheo” to address the whole Fujian province in 1590.^{xi}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junk trade with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need to wait for the proper monsoon for the return trip, more and more Sangleys moved into the newly established Spanish colony with goods and services from south Fujian. The growth of the Hokkien population in Manila following the Spanish conquest was phenomenal. In 1572, the Hokkiens numbered about 150. Sixteen years later,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submitted by the Manila *Audiencia* (the highest tribunal of justice), “there are over 10,000 Sangleys now in this city”.^{xii} The number of Hokkien Sangley reached its peak at the end of 1603. It was estimated by the Spanish authorities that they amounted from 24,000 to 30,000 on the eve of the massacre, an extraordinary number considering that the total number of Spaniards and Mexicans residing in the Philippines was only 1,200 at that time, of whom 700 lived in Manila.^{xiii} In 1639, approximately 23,000 Sangleys were killed in the second massacre. Nevertheless, massacre and expulsion were usually followed by gradual return of the Hokkiens, and in 1649, there were again some 15,000 Hokkien merchants and artisans living in the ghetto.^{xiv} The well-known contemporary account of the German ethnologist Fedor Jagor attests well what is mentioned above. While depicting the Chinese Sangleys, Fedor Jagor points out that “Manila has always been a favourite place for Chinese immigrants; and neither the hostility of the people, nor oppressing and prohibitory decrees for a long time by the Government, not even the repeated massacres, have been able to prevent their coming.”^{xv}

What ought not to be ignored is that unlike other contemporary Hokkien sojourning communities overseas, the Hokkien artisans, fishermen and farmers who arrived in Manila in the wake of the merchants soon constituted a significant percentage of the sojourning community, with the intention of staying for longer periods than was previously the habit. The actual scale of the Sangleys’ flooding into Manila can be seen from the data presented below, which copies from a special report on the Chinese immigration in the Philippines dated 4th July 1606.^{xvi}

Table 1 Statistics on the Number of Sangleys Shipped into Manila in 1606

Name of Junk’s Captain	Sangley Number	Name of Junk’s Captain	Sangley Number
Pinyon	322	Binçan, Quinten	294
Yantin	345	Sanagu	324
Cuheran	284	Selhuan	367
Onsan	300	Nohu	240
Sousan	423	Guarquico	323
Unican	230	Ay Pagu	204

Onray	265	Cime	250
Yansan	210	Ciggan	141
Zuan	163	Ciray	492
Ciquey	261	Tzutian	163
Tongon	259	Tzontzan	220
Licbeu	77	Buyan	301
Biçan	75	Total:	6,533

Whenever there was a lack of food supply or bustling economic activity in the town after every large massacre or mass expulsion, the Hokkien merchants and artisans were allowed or even encouraged anew into the colony. But if the Hokkien community swelled rapidly or its size reached an uncontrollable degree that would be seen by the suspicious Spaniards as a danger presented towards their safety, immediately another round of massacre of Chinese or mass expulsion would be launched by the Spanish authorities. The number of Hokkiens in Manila thus cyclically rose and fell, depending upon the economic situation of the Islands and the state of prejudice and antagonism against the sojourning Hokkiens.^{xvii} The following table outlines the demographic change of the Hokkien sojourners in Manila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discussion. Though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available for reconstructing the sojourning Hokkiens' demography is sporadic and sparse, the figures presented below do shed some light on the picture of the sojourning community.

Table 2 The Demography of the Hokkiens in Manila, 1570-1760 ^{xviii}

Year	Numbers	Year	Numbers
1570	40	1609	Around 8,000 in <i>Parian</i>
1572	150	1621	Over 24,000
1584	4,000	1622	21,000
1586	4,000-5,000	1627	12,000 in <i>Parian</i>
1587	Over 3,000	1634	Over 20,000 in <i>Parian</i>
1588	Over 10,000	1637	20,000
1589	4,000	1638	Around 30,000 (including 20,000 in <i>Parian</i>)
1590	12,000 (including 3,000-4,000 in <i>Parian</i>)	1639	25,000-30,000
1591	2,000 in <i>Parian</i>	1649-61	15,000 in <i>Parian</i>
1597	Over 10,000	1662	15,000

1599	Over 3,000 in <i>Parian</i>	1678-1690	Less than 6,000
1600	15,000	1687	6,000
1602	8,000 in <i>Parian</i>	1693	3,000 in <i>Parian</i>
1603	24,000-30,000	1740	Over 20,000
1605	Around 1,500 non-Christian Sangleys in <i>Parian</i>	1755	1,623
1606	Less than 6,000	c. 1761	6,200 in <i>Parian</i>

It is obvious that the sojourning population in Manila increased dramatically after 1590s, and the climax was reached around 1600. This trend was maintained for approximately forty years before it gradually declined, and the number in *Parian* continued to drop-off after 1662, when more and more Hokkien sojourners sought to live freely on islands or in inland areas where they could lie beyond Spanish control and rule. By the 1730s, the Hokkien sojourners, especially those who had been baptised, were actually scattered throughout the provinces of Luzon, such as Tondo, Bulacan, Pampanga, Laguan and Cavite, and all over the islands. The entire internal trade of the Philippines was therefore in the hands of these Hokkien merchants.

A second dimension to be noted is the social life of these sojourners. The Sangleys preserved most of the customs and life style of the Ming dynasty. For instance, in their teeming community, the Hokkiens wore long blue garments with wide sleeves, or white for mourning, but their chief men dressed in black or coloured silks. Underneath, all wore wide drawer-like trousers of the same material and a half hose of felt. They wore broad shoes of their own style, made of blue silk or other materials, embroidered with a braid and with a number of soles firmly sewn together. Like the Dutch in Java, the Spaniards were very curious about the Hokkiens' hairstyle. Morga observed that "They wear their hair long; it is very black, well cared for, wound around the head with a high knot, and with a hood or horse-hair coif on the top, which fits closely down to the middle of the forehead. Above all this they wear a high round hat, also of horse-hair, and of varying designs, according to the wearer's occupation and rank."^{xix}

On the other hand, the vice of gambling was popular among the Sangleys, as was often the case in other Hokkien communities overseas.^{xx} It seemed that only Sangleys were allowed to gamble in the *Parian* as one of their major diversions, and most of them were addicted to gambling, particularly the game called *metua*. When William Dampier, a British privateer who cruised the Philippines between 1686 and 1687, visited Manila, he was surprised to find out that the Chinese were great gamblers, and they would never be tired of it, playing night and day, until they lost all their estates, then it was usual for them to hang themselves.^{xxi} It seems that there had been a Hokkien tax farmer in charge of collecting gambling tax for the Spaniards. For example, the Sangleys had to pay a large sum of money annually to the Manila authorities for the gambling monopoly. In 1600, apart from 4,500 pesos of shop rent, the Spaniards

collected 1,600 pesos of the gambling tax from the farmer.^{xxiii} This monopoly tax continued throughout the history of the *Parian* and increased with the expansion of the sojourning population, and the annual sum reached 100,000 at the end of 17th century, as reported by Giovanni Francesco Gemelli-Careri, a wealthy Neapolitan dilettante.^{xxiii}

With regard to the religious life of these Hokkien sojourners, we know virtually nothing; though the Spanish sources, on which much of the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he Hokkien community depends, kept complaining that the Sangleys were idolatrous, exceedingly licentious and vicious insofar as their religion was concerned. It is very likely, as suggested by Professor Wang Gungwu, there would have been a temple in the *Parian* dedicated to Tian Hou (天后) and Guan Yu (關羽), or there were other small altars scattered in other buildings.^{xxiv} As a matter of fact, ample evidences gleaned from the following case studies on other Hokkien sojourning communities could be cited to demonstrate that it was customary among the overseas Hokkiens to build up their own temples for worshipping some particular Hokkien deities in the period under discussion. But strangely enough, neither the Spanish records nor other contemporaneous travel accounts did give information or depict the Chinese temples in the sojourning quarter.

Another important point to be noted concerns the tax-farming system within the Hokkien community. We know surprisingly little about this system and its internal operation, but the Spanish records do suggest that it existed within the sojourning community since its early period. The picture was clearer in the 17th and the 18th centuries as revealed by the contemporary writers. As a matter of fact, unlike the practice of the Hokkien community in Batavia, the tax-farming in Manila was manipulated through the *cabecilla* ("foreman" or "ringleader") system. There were several Hokkien *cabecillas* in the *Parian*, and above them there was a principal Hokkien *cabecilla*. The Manila authorities farmed the license tax to the principal Hokkien *cabecilla*, and let him to assign the collection job among his subordinates. Indubitably all of these Hokkien *cabecillas* would be members of the commercial élite in the *Parian*, Taking the case of a Hokkien newcomer as an example. Since many of the Hokkien sojourners were poor, they had to habitually attach to a Sangley *cabecilla* on his arrival. The Sangley *cabecilla* who was responsible for collecting taxes and tributes from his fellow countrymen would pay the residential license fee of six pesos per year for the poor Hokkiens. Then, during the period of indenture, the indentured Hokkien labourers had to work in the Sangley *cabecilla*'s shop as a shop boy, or as a *cargador* or day labourer. If he were able to learn some Tagalog and Spanish, he had an opportunity to become a walking vendor of tea or other commodities after he emancipated himself with the money he saved through extreme frugality, balancing his goods on a bamboo pole and trotting through the streets crying out the nature of his wares.^{xxv}

The Parian

There has been much discussion on the origin of the term "*Parian*". The matter of interest here is its equivalent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ources. So far three names found in the local private records or genealogies of south Fujian have been identified with the Hokkien sojourning quarter in

Manila. They are *Jian-nei* (濶內), *Jian-tou* (壩頭) and *Ba-lian-jie* (八蓮街). The name “*Jian-nei*” first appeared in 1617. When mentioning the formation of the Hokkien quarter, Zhang Xie (1574-1640), a native scholar of Longxi county, has the following in his *Dong Xi Yang Kao*:

Since the Chinese who went to Manila were in great numbers, so they always stayed on for a long time and did not return, which was called *Ya-dong* (壓冬 meaning: *passing the winter*). They stayed together in the *Jian-nei* (濶內) to make their living, and their numbers gradually increased to several tens of thousands. Of them, some cut their hairs and produced sons and grandsons there.^{xxvi}

Like *Jian-nei*, the name “*Jian-tou*” is also from the local records of the Zhangzhou prefecture. According to the Genealogy of the Xie Family (謝氏家乘) of Haicheng (海澄), about 35 members of the family died at *Jian-tou* (壩) in Manila during the period of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xxvii} On the other hand, though the name “*Ba-lian-jie*” is from the Hokkien private genealogy as well, it is recorded in a genealogy from the Quanzhou prefecture rather than the Zhangzhou prefecture.^{xxviii} Obviously terms like “*Jian-nei*” and “*Jian-tou*”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the foreign etymology but depict instead the actual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in which the Manila *Parian* located, while the name “*Ba-lian-jie*” or “*Parian Street*” was translated from the term “*Parian*”. It is difficult to know why the Zhangzhou Sangleys and the Quanzhou Sangleys adopted different names to call the same sojourning quarter in Manila, whether it was a mere coincidence or they did so deliberately is unknown. However, the impression given is that the residents of *Parian* were all certainly from south Fujian.

There were at least five Hokkien *Parians* in Manila and its environs around 1600. The aforementioned *Parian* was the principal one in which most of the sojourning Hokkien merchants settled. At the same time, Tondo across the Pasig River had another *Parian* consisting of 150 married Catholic Hokkien merchants, fishermen, peasants and artisans in 1585. By 1591 this *Parian* possessed 500 Sangleys. Of them, only 40 were Catholic Hokkiens.^{xxix} The third *Parian* was built by the Jesuits at Santa Cruz (Quiapo), also across the Pasig River. About 250 Hokkien sojourners were permitted to reside there in 1603 and many of them were peasants cultivating for the church.^{xxx} The fourth *Parian* was founded in the Dominicans’ town of Binondo, across the river from both the Spanish *intramuros* of Manila and the Hokkien *Parian*, where a small group of married Catholic Hokkiens including merchants and artisans were given a tract of land to live in 1594.^{xxxi} The fifth *Parian* was settled by a large group of non-Catholic Sangleys who lived in Cavite and devoted themselves largely to agriculture and fishing.^{xxxii}

Truthfully, the Hokkien ghetto in Manila did not come into being with the birth of the Spanish

colony. Instead, the Hokkien merchants and artisans were initially scattered among the Spaniards within the palisaded town. To keep the Hokkien Sangleys from being spread all over the town as well as to raise government revenues through the control over this transient group, the Spanish Governor Don Gonzalo Ronquillo de Peñalosa established the first *Parian* or *Alcaiceria* (silk market) for the Hokkien merchants in the closing months of 1581.^{xxxiii} The first *Parian* at Manila, which may have been situated on the south bank of the Pasig River, was razed to the ground by a terrible fire on 31st January 1583. Immediately another *Parian* was built at a farther place. From its establishment until 1860 when Governor Don Ramon Maria Solano y Llanderal ordered its demolition, the Hokkien *Parian* existed for almost three centuries. During this long period, either because of the massacres of the Hokkiens by the Spaniards or by accidentally catching fire, the *Parian* was repeatedly destroyed and rebuilt more than fifteen times, and transferred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Wherever it located, it was always kept within easy range of the Spanish cannons of Fort Santiago.^{xxxiv}

As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layout of the *Parian* in the 1590s, Bishop Salazar gives us a detailed account as follows:

At first it seemed absurd to think that human habitations were to be built in that marsh, but the Sangleys, who are very industrious, and a most ingenious people, managed it so well that, in a place seemingly uninhabitable, they have built a *Parian* resembling the other, although much larger and higher. According to them it suits them better than the other, because on the firm ground where the four rows of buildings are located they have built their houses and the streets leading through the *Parian*, a separate street for each row of buildings. There are long passages and the buildings are quadrangular in shape.

In the remaining space within the four fronts of the *Parian* is a large pond, which receives water from the sea through an estuary. In the middle of the pond is an islet, where the Sangleys who commit crimes receive their punishment, so as to be seen by all. The pond beautifies the *Parian* and proves to be of great advantage, because many ships sail into it through the aforesaid estuary at high tide, and bring to the *Parian* all the supplies, which are distributed thence all over the city.^{xxxv}

It should be added that the reason a new *Parian* could be rebuilt rapidly during the late 16th century and early 17th century was mainly because the materials used to construct the stores and houses were merely bamboo and nipa. This probably explains why the Hokkien quarter was frequently burned to the ground by fire during its 279-year history.^{xxxvi} Nevertheless, the sojourning quarter grew rapidly, as new houses were built and new shops were opened, and shortly it covered a large area, enclosed by

wooden palisades. The early four squares were increased to nine in the new *Parian* of 17th century, including five hundred new lodgings. The average *Parian* building as a rule would have two floors, the upper floor for residence and the ground floor for *tiendas* or stores, restaurants, or shops of various trades. Gradually the buildings gained tile roofs and were built closely together on the streets that divided the *barrio* or section into squares. During the period of Governor Francisco Tello de Guzman (1596-1602), open fields, low-lying fortifications, the moat, a major road, and a cemetery were added to the Hokkien quarter.^{xxxvii} The advantageous position of the *Parian* for trade was further advanced in the 18th century by a wooden bridge resting on stone buttresses which was built across the Pasig River from the *Parian* to Binondo. Thus, the *Parian*, by road, bridge and river, was connected to Binondo, Tondo, Ermita, Malate and other nearby districts. By 1755, there were 1,181 shops in the *Parian* and more than eight thousand Sangleyes were generally engaged in trade there.^{xxxviii} In short, the *Parian* functioned continuously as the nerve centre of economic activity in Manila.

The Commercial Activities in Parians

As elsewhere in the sojourning communities of Southeast Asia and East Asia, the Hokkien merchants of Manila also consisted of two mutually supporting groups. One group comprised those from coastal Fujian who were engaged in the junk trade between Fujian and Manila and would annually visit the colony with cargoes of silk and other Chinese goods. At the same time another group of merchants who sojourned in Manila would act as their agents or retailers to sell the goods for American silver shipped from Acapulco by the galleons, and accumulated local products for the return voyage. The commercial activities of the Hokkien merchants in Manila could thus be subdivided into two sections, namely the junk trade and the daily buying and selling.

It was in 1567, when the newly ascended Ming Emperor, Long-Qing (隆慶皇帝), approved the repeated plea of the Fujian Governor and the Grand Censor Tu Ze-min (福建巡撫都御史涂澤民), that the Hokkien junks began sailing from Yue-gang (月港 Moon Harbour), a well-known port for smuggling trade in Zhangzhou, to trade overseas legally. Four years later, the Spaniards worked their way into and established themselves in Manila with American silver. In other words, it was only after the 1570s did the junk trade between Fujian and the Philippines with an exchange of exceptionally high value enter a complete new era, which in turn brought China into the world economical system, as was argued by C.R. Boxer.^{xxxix} According to the records of the Ming dynasty, fifty Hokkien junks a year were initially granted licenses to trade in Southeast Asia. In 1589, the number of junks licensed for trading to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Oceans was raised to 88. This was later raised to 110 licenses in 1592, and in 1597, to 137 licenses.^{xl} Of them, about half the licenses would be used for trading in the Hispanic Manila. Based upon the data collected by the French historian Pierre Chaunu and other contemporary records, the number of Hokkien junks calling at Manila is given as follows:

Table 3 Hokkien junks arrivals in Manila, 1570-1760 ^{xii}

Year	Port	Fujian	Taiwan	Total
1570-1579		67		67
1580-1589		230		230
1590-1599		183		183
1600-1609		266		266
1610-1619		250		250
1620-1629		179	5	184
1630-1639		314	24	338
1640-1649		171	4	175
1650-1659		52		52
1660-1669		45	15	60
1670-1679		29	22	51
1680-1689		69	6	75
1690-1699		161		161
1700-1709		191		191
1710-1719		104	6	110
1720-1729		113	3	116
1730-1739		127		127
1740-1749		131		131
1750-1760		138		138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here that Pierre Chaunu's statistics were based on study of the *almojarifazgo*, or import and export duties, which covered only the taxed portion of the junk trade. It is widely known that smuggling was rampant in the Manila trade and the actual number of junks calling at the port of Manila was far in excess of the figure presented above.^{xlii} For instance, a large number of Hokkien merchants clandestinely visited Manila though their licenses issued were to Champa, Tonkin, Patani and Taiwan. The main reason, as was pointed out by the Fujian Grand Censor Shang Zhouzuo (商周祚) in 1623, was that Manila was close by, so the junk trade in silks for silver turned out to be particularly profitable for these venturesome Hokkiens.^{xliii}

In any case, as is evident from Table 3.3, the most remarkable growth of the Hokkien junk trade during this period was from the late 1570s to the mid-1640s, and the usual number of junks to visit Manila varied from twenty to forty each year. After 1645, however, the number of junks arriving at Manila

decreased sharply as a result of the civil war in China. In the years that followed, the maritime trade of China fell into the hands of the Ming-loyalist Zheng regime based in south Fujian and Taiwan. Consequently, the junk trade with Manila experienced a considerable slump for more than three decades and almost all the arrivals in the 1650s, 1660s and 1670s were in fact junks belonging to the Koxinga (國姓爺) lineage. A revival of the Hokkien junk trade to Manila occurred in 1683 when the Qing government conquered Taiwan and put an end to the civil strife, and the following year the ban on overseas trade was lifted. The junk trade expanded rapidly thereafter, with more than 27 junks calling at Manila in 1686 and a peak of 43 in 1709. ^{xliv}

With respect to the coming of the Hokkien junks, Antonio de Morga, then president of the Audiencia at Manila, gives a graphic account in his records: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somas and junks (which are large ships), come as a rule laden with goods from Great China to Manila. Every year thirty, sometimes forty, of these ships come, though they do not enter together as a fleet or armada, but in squadrons, with the monsoon and in settled weather, which ordinarily comes with the March new moon. ... They make the journey to Manila in fifteen or twenty days, sell their merchandise and return in good time, before the strong south-westerly winds set in at the end of May, or the first days of June, so as not to run into danger on their voyage." ^{xlv} Captain John Saris, of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also observed in 1613 that, "In the moneth of March, the Junckes bound for the Mannelies depart from Chanchu in Companies, sometimes foure, five, ten or more together, as they are readie." ^{xlvi}

When the junks arrived and anchored at the roadstead, the Spanish officials would carry out their inspection of the cargo. At the same time a formal valuation would be made of the worth of the goods according to the local market prices, for the Hokkien merchants had immediately to pay tariffs ranging from three per cent to six per cent on everything to the Manila authorities. As soon as the examination was over and the valuation was concluded, the cargo of merchandise would be unloaded, taken to the Parian, or to other establishments and warehouses outside the town. No Spaniard, sojourning Sangley, or any other person whatever would be permitted to board the junks to buy or bargain for goods and supplies, all of the transactions had to be done within the Parian. ^{xlvii}

As for commodities involved in the junk trade, it is widely accepted that the Chinese silk and American silver were the two principal items of this Pacific leg of China trade. In fact, Manila would have been nothing without the Yue-gang-Manila-Acapulco trading line. Morga, who was an eyewitness of the junk trade in its heyday, gives a catalogue of the rich and varied wares that are worth quoting at length:

Raw silk in bundles, of the fineness of two strands, and other silk of coarser quality; fine untwisted silk, white and of all colours, wound in small skeins; quantities of velvets, some plain and some embroidered in all sorts of figures, colours and fashions, others with body of

gold and embroidered with gold; woven stuffs and brocades, of gold and silver upon silk of various colours and patterns; quantities of gold and silver thread in skeins; damasks, satins, taffetas, and other cloths of all colours; linen made from grass, called lençesuelo; and white cotton cloth of different kinds and quantities. They also bring musk, benzoin and ivory; many bed ornaments, hangings, coverlets and tapestries of embroidered velvet; damask and gorvaran tapestries of different shades; tablecloths, cushions and carpets; horse-trappings of the same stuffs, and embroidered with glass beads and seed-pearls; also pearls and rubies, sapphires and crystal; metal basins, copper kettles and other copper and cast-iron pots; quantities of all sorts of nails, sheet-iron, tin and lead; and saltpetre and gunpowder. They supply the Spaniards with wheat flour; preserves made of orange, peach, pear, nutmeg and ginger, and other fruits of China; salt pork and other salt meats; live fowls of good breed and many fine capons; quantities of fresh fruits and oranges of all kinds; excellent chestnuts, walnuts, and chicueyes (both green and dried, a delicious fruit); quantities of fine thread of all kinds, needles and knick-knacks; little boxes and writing cases; beds, tables, chairs, and gilded benches, painted in many figures and patterns. They bring domestic buffaloes; geese that resemble swans; horses, some mules and asses; even caged birds, some of which talk, while others sing, and they make them play innumerable tricks. The Chinese furnish numberless other gewgaws and ornaments of little value and worth, which are esteemed among the Spaniards; fine crockery of all kinds; canganes, or cloth of Kaga, and black and blue robes; tacleys, which are beads of all kinds; strings of cornelians and other beads, and precious stones of all colours; pepper and other spices; and rarities, which, did I refer to them all, I would never finish, nor have sufficient paper for it. ^{xlviii}

Though there was an infinite variety in the cargoes of the junks, silks and textiles always comprised the bulk of the goods from Fujian. In the meantime, the Hokkien merchants were the dominant participants in this vast silk for silver trade. Like elsewhere in marketplaces overseas, the Hokkien merchants knew how to maximise their profit by waiting for the right timing or skilfully adjusting the prices of their cargo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ituation of the Manila market. The majority of sagacious and thrifty Hokkiens would not, for instance, do their bargaining until the junks returned to Fujian, holding their cargoes over till the following year's galleon. ^{xlix} When they saw the Spanish galleon laden with silver coins entering the port while there were not much Chinese goods left in the market, they would immediately raise the prices of their goods. Similarly, when they were informed that silver to be scarce at Manila they would cut down their shipments accordingly that year for a profitable sale. 1628 thus saw the scarcity of silver from Acapulco induce a rise in the prices of the goods in Manila. ¹ Perceivably what the Hokkien merchants aimed at was to trade for as much silver as possible and shipped it away to China. It

becomes clear that they did indee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arrying massive amounts of American silver into China. It was estimated that 150 tons of silver passed over the Pacific, especially out of Acapulco and through Manila on its way to China, on an annual basis. Of them, about 128 tons or five million pesos were sold ultimately to the Hokkien merchants annually, with a reported 307 tons being smuggled out in 1597. ^{li}

Given that the Hokkien merchants kept coming and sojourning in Manila in spite of the repeatedly expulsion and slaughter by the Spaniards, the profits derived from the junk trade must have been enormously high. Two contemporary Chinese writers tell us that the profits gleaned by the Hokkien merchants were usually several times of the cost, ^{lii} which matches with the report submitted to the Spanish King Felipe III dated 21st July, 1599. In the report, Hieronimo de Salazar y Salcedo, the Spanish royal fiscal, estimated that the profits made on the Chinese silk could reach 400 %. ^{liii} In fact, in some years when the market in Manila or Acapulco was starved for the Chinese silk and other luxury items, the profits reaped could probably be as high as 1000%.^{liv} Since the distance from Fujian to Manila was relatively short, and the voyage usually took about 10 days, it was possible for the Hokkien merchants to make a couple of trips each season. Considering the great risk on the sea, such as the loss of junks caused by typhoon or the plunder by the Dutch or pirates, certainly the nearer the foreign ports were to Fujian, the smaller were the risks and the expenses and the larger the profits, as was argued by the Dutch historian Meilink-Roelofs. ^{lv}

Closely related to the junk trade merchants was the group of merchants who sojourned in Manila. As is well documented in Spanish writings, the Hokkien merchants had a near-monopoly of retail business in the town. The Parian consequently became the nerve centre of the colonial capital's commercial life. In this colourful bazaar, people could find all kinds of goods and products of East and West. This sojourning merchant group grew rapidly. By 1588, the group regularly maintained 600 merchants and 150 shops in their quarter. ^{lvi} William Dampier wrote of these Sangleys: "the Chinese are the chiefest merchants, and they drive the greatest trade; for they have commonly twenty, thirty, or forty junks in the harbour at a time, and a great many merchants constantly residing in the city beside shop-keepers, and handy-craftsmen in abundance." ^{lvii}

Various sources available suggest that the sale of foodstuffs and the supply of markets and homes were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in these Sangleys' hands. Every morning, the Spaniards inhabited within the walled town would rush into the Parian to shop as soon as the gate was opened. The customers of the Chinese goods in the Parian were not the Spaniards alone, but also include the local Filipinos around Manila. Muslims from Mindanao and Sulu made regular visits to the Parian with bees'-wax and gold, and returned in their proas laden with Chinese silk, textile and calicoes. ^{lviii} As for the daily commercial life and the practice of Sangley retail traders in Parian, Bishop Salazar gives detailed account as follows:

This Parian has so adorned the city that I do not hesitate to affirm to your Majesty that no other known city in España or in these regions possesses anything so well worth seeing as this; for in it can be found the whole trade of China, with all kinds of goods and curious things which come from that country. ... Many bakers make bread with the wheat and fine flour which they bring from China, and sell it in the market-place and along the streets. This has much benefited the city, for they make good bread and sell it at low cost. ... They are so accommodating that when one has no money to pay for the bread, they give him credit and mark it on a tally. It happens that many soldiers get food this way all through the year, and the bakers never fail to provide them with all the bread they need. ... The Sangleys sell meat of animals raised in this country, as swine, deer, and carabaos (a kind of Italian buffalo, whose flesh is equal to beef). They also sell many fowls and eggs; and if they did not sell them we all would suffer want. They are so intent upon making a livelihood that even split wood is sold in the Parian. The city finds most of its sustenance in the fish which these Sangleys sell; they catch so much of it every day that the surplus is left in the street, and they sell it at so low a cost that for one real one can buy a sufficient quantity of fish to supply dinner and supper for one of the leading houses in the city. ... The Sangleys know how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right time; they sell their goods dearer when they know that there is money to buy them, but they never raise the price so as to make it unreasonable. ^{lix}

What Bishop Salazar witnessed in the 1590s was corroborated a century later by Giovanni Francesco Gemelli-Careri, who stated that “within a musket-shot of the gate of *Parian*, is the habitation of the Chinese merchants called Sangley, who in several streets have rich shops of silk, purcellane, and other commodities.” ^{lx} Another matter of interest is that the commercial activities of the Hokkien merchants were not confined to the *Parian*. In order to avoid being expelled from Manila, many non-Catholic Sangleys sought the protection of the Spaniards and lived at their homes. Some of the Hokkien merchants thus set up mini markets within the town and sold their goods at the homes of the Spanish proprietors. ^{lxi}

The picture of the sojourning merchant group came into sharper focus in the year 1689, when the Manila authorities prepared a list of the Hokkien merchants in *Parian* who attempted to be included in the group that had been granted special permission of leaving Manila within seven months after the mass expulsion. We are told by this list that among 774 Sangleys who benefited from the postponement granted, at least 291 merchants engaged in twenty different businesses while 483 artisans were occupied in 27 trades. A similar list was submitted to the Manila *Audiencia* in April 1700, from which one finds that except artisans' trades, the business categories decreased to fifteen while the sojourning merchants increased to 629. Of them, 113 were identified as Catholic Hokkiens and 516 were non-Catholic Hokkiens.

The situation remained more or less the same in 1745 with 592 shops in *Parian* dealing with the daily business. The following table based up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Manila authorities furnishes data on the number and kind of shops run by the Hokkien merchants in 1745. ^{lxii}

Table 4 Hokkien Shops in 1745's *Parian*

Business Category	Number	Business Category	Number
Silk Shop	21	Porcelain Shop	19
Hardware Store	39	Blanket Shop	131
Lumber Store	11	Kitchen Utensils Shop	16
Tobacco Shop	28	Chicken Shop	9
Wax Store	7	Retail Store	43
Sugar Shop	60	Oil Store	40
Fruit Shop	36	Rice Store	50
Vegetable Store	50	Fish Store	5
Pork Store	1	Coal Shop	1
<i>Buyo</i> Shop	13	Clothing Shop	12

It is interesting to note that the annual sales of these 592 shops amounted to 647,832 pesos according to the same report.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 fact that these figures were gathered during the period of economic depression, the business turnover of normal days in *Parian* possibly would have been close to or more than one million pesos. It was remarkable that the sizeable Hokkien sojourning quarter had so many shops in mid-18th century, and the amazing figure calculated could without doubt even put the *Parian* on a par with the other contemporary large bazaars of Southeast Asia.

Crucial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okkien merchant communities overseas was the rise of the institution of the guild. Although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is skimpy and most of it concerns the early 18th century, it is still possible to retrace a few traits of this institution and piece them together. It seemed that the Hokkien merchants and artisans in *Parian* were very well organised according to the division of trades, and each trade of merchants had their own guild to protect their interests. One finds that as early as 1628 all the Hokkien merchants and artisans in the *Parian* were acting in concert in dealing with the foreign customers. The Spanish Governor Juan de Tavora therefore complained in his letter that if he tried to change his shoemaker, immediately all the other Sangley shoemakers would refuse to sell him a shoe. He then concluded: "Among themselves they have great system and energy in all those of one trade acting together in all matters that affect them." ^{lxiii} Very likely, different commercial guilds soon emerged in *Parian* with the massive inflow of Hokkien merchants and artisans into Manila and established themselves

on foreign soil.

Another example concerns the 18th century. In a letter dated 7th July 1741, Justice Pedro Calderon Henriquez who was in charge of the tax rolls complained that the reason those Sangleys were able to control domestic trade was because they had perfect organisation. The Sangley merchants confederated and all of them were required to sell every product for a fixed uniform price so that they could monopolise the market. In order to defeat someone who tried to get into their business, they would not mind losing a thousand pesos in the competition. To convince the Fiscal in Madrid, Calderon Henriquez even gave two examples in his letter. One of the stories occurred between a group of Hokkien *mestizos* and the sojourning Sangleys in *Parian*. Since the selling of *buyo* or betel proved to be a profitable business in the Islands, and the monopoly on *buyo* trade had already been abolished, several Hokkien *mestizos* thus attempted to get started in this trade. But immediately the sojourning Sangleys who occupied themselves in the *buyo* business began to sell their goods more cheaply until the Hokkien *mestizos* were persuaded to abandon their attempt.^{lxiv} Though Calderon Henriquez did not point out the term “guild” in his letter, it is quite clear what he reported actually was referring to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rchant institution – “the guild”, and the activities masterminded by it. Despite the fact that we are told too little to be able to make a complete description of the institution, we certainly know enough about how this institution was adapted by the Hokkien sojourners in Manila to serve as an instrument to protect their commercial interests or as a communal cohesive force to strengthen the solidarity of their community, as suggested by the above information.

Various guilds among the Hokkien sojourners developed rapidly and some of them were even required by the Manila authorities to supply a wide range of goods for the Royal warehouse on a regular basis. The following table gives some of the names of guilds and their heads in the *Parian* as taken from the accounts of the Manila Treasury in 1754.^{lxv}

Table 5 Hokkien Guilds in 1754's *Parian*

Guild	Head's Name	Guild	Head's Name
Hardware Traders	Joco	Fish Traders	Guanzay, Janchinco, Mariano Enguio, Din Bico
Rice Traders	Guian, Cinco, Texco	Ceramic Traders	Checua
Lumber Merchants	Sinio	Sugar Merchants	Bidiaco, Quianco
Summer Mat traders	Quinco	Grocery Traders	Limchenco
Silk Cloth Merchants	Tan Uncheng	Shoe Traders	Joco
Meat Traders	Jose Ruiz Zuco	Candle Traders	Diquenco

Lime Traders	Tiangteco	Weights and Measures Traders	Quinson
Banana Merchants	Oylo	Vegetable Traders	No name provided

Largely as a result of the developments described above, the Hokkien merchants became indispensable to the colonial capital, and the Spanish community could not actually be maintained without the Sangleys. Taking the case of 1603 massacre as an example, “when the whole business was over the city found itself in distress, for since there were no Sangleys there were nothing to eat and no shoes to wear, no matter how exorbitant a price was offered. This was because the Sangleys were the people most engaged in trade, and the ones who brought into the city all the necessary provisions.”^{lxvi}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the Hokkien Community

At least three social strata could be observed in the Hokkien sojourning community of Manila.

(1) Upper stratum. Consisted of wealthy merchants, this commercial élite was not very large in size as compared with the whole Hokkien community, but they were generally trusted and respected among the sojourning Sangleys. Usually these rich merchants who maintained bazaars and commercial firms would sell silk, rayon, cotton cloth, wool, linen, etc. ... and deal in wholesale and retail business in the *Parian*. Through coordinating between different trades or guilds and negotiating with the Manila authorities on behalf of their fellow countrymen, some of them successfully established their power and control over the community. Prominent members of this commercial élite consequently became the heads of various guilds, Chiefs or other administrative officials of the sojourning community.

There is evidence to suggest that the leadership of the Hokkien sojourning community in Manila was vested in the hands of a few well-to-do individuals from Quanzhou insofar as the early stage was concerned. According to Argensola and Morga, more than 400 An-hai Sangleys in the *Parian* were ranked as the leading merchants in the early 17th century, with someone named Chican (沈官?) as their head.^{lxvii} Another instance was concerned with Li Dan or Andrea Dittis. Li Dan had been an influential and rich merchant as well as one of the *gobnadorcillos* of the Hokkien community in Manila before he escaped from the Spanish galleys in 1606, shortly after the first Chinese massacre of 1603.^{lxviii} The most famous merchant in point during the early days of the *Parian*, however, was Eng-Kang (黃官), the leader of the Hokkiens’ uprising of 1603. Little is known of his personal background, what we are told by the Spanish documents is that Eng-Kang also was a native of Quanzhou, and he had for some time joined a smuggling pirate group before coming to Manila. It was probably for this reason that he never dared to return to his home village in Fujian. Eng-Kang had been sojourning in Manila for several years when Lin Feng (林鳳)

attacked the newly established Spanish colony in 1574 with his large fleet. Very likely, he belonged to the first group of Hokkien sojourners in Manila and came to the Islands earlier than the Spaniards. Later on, he was baptised by the Spanish friars and adopted a Spanish name Joan Bautista de Vera. The fact that he was named after the Spanish Governor Santiago de Vera implies that the Governor possibly was his Godfather. All of the coeval Spanish documents record that Eng-Kang proved sagacious, industrious, and of efficacious energy, and by means of which he exercised his trading and came to possess great wealth and to have influence with the Spanish Governor. Moreover, this rich Sangley had many Godsons, dependants or even several black slaves. He was not only much favoured and respected by the Spaniards but was also very feared and loved by his fellow countrymen. It is for these reasons that he was twice elected and appointed as the *gobernadorcillo* of the Hokkien sojourners. ^{lxi}

Aside from a few community leaders, a group of merchant guild heads also constituted the backbone of the commercial , such as aforementioned Joco, Guanzay, Janchinco, Guian, Sinio, Limcheoco, Quinco and Tan Uncheng.

(2) Middle stratum. This social stratum included the bulk of petty traders and street peddlers who normally owned small *tiendas* or sari-sari stores, selling various articles at cheap prices. To make things more accessible, a large number of them would, as ambulatory vendors, approach the customers with his wares balanced across his shoulders on a bamboo pole. A census of the residents taken by the Manila Corporation in 1586 revealed that among 750 sojourning Hokkien merchants, about 450 were these petty traders. ^{lxx} Of them, bakers, pastry makers or restaurant owners were probably especially welcomed by the residents of Manila, since not only the Sangleys and the Filipinos, but the Spaniards also frequented these shops. ^{lxxi} Some of these petty traders later on became regular providers for the Spanish community in the fort. Juan Joco and Francisco Cinco, for example, were coconut oil trader who usually supplied the Manila Warehouse with oil, while Tanoco and Guiang sold rice to the Spaniards. ^{lxxii}

Also presented in this middle social level were some professionals such as doctors, druggists and apothecaries. According to Bishop Salazar's report, there were Hokkien doctors and apothecaries in the *Parian* who listed on their shops' placards in Chinese the service and medicine they were able to provide. ^{lxxiii} Some of young Hokkien scholars who were preparing to take the examinations organised by the Ming court or who failed in the examinations could be seen in the sojourning community as well. One of these scholars was baptised by the Spanish Bishop Almerici, and was given the name of Paul. ^{lxxiv}

(3) Lower stratum.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merchant class were the artisans, fishermen and farmers from south Fujian, who made up not only the majority of the sojourners residing in several small *Parians* or villages adjacent to Manila but a significant part of the community within the *Parian* as well. In fact, only fifteen years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Hispanic colonial capital, the notary of the *cabildo* or the city council, Simon López, met a great mass of Hokkien craftsmen, market gardeners, and manual labourers in Manila. According to his letter, "there are more than three hundred others— fishermen,

gardeners, hunters, weavers, brickmakers, lime-burners, carpenters, and ironworkers — who live outside the silk market, and without the city, upon the shores of the sea and river.”^{lxxv} As for those artisans who lived within the *Parian*, a long list of different trades can be found in the Spanish literature, such as silversmiths, bookbinders, painters, tailors, shoemakers, candle-makers, sugar-makers, silk-weavers, pot-makers, stonemasons, *petate* (summer sleeping mat) makers, boat-makers, wine-makers, weighing apparatus makers, jar-makers, dyers, stevedores, braziers, barbers, noodle-makers, foundry-men, hat-makers and sawyers.^{lxxvi}

The words of Bishop Salazar, who was always quite interested in the general conversion of sojourning Hokkiens in the Philippines, are especially significant on this point:

In this *Parian* are to be found workmen of all trades and handicrafts of a nation, and many of them in each occupation. They make much prettier articles than are made in España, and sometimes so cheap that I am ashamed to mention it. ... The handicrafts pursued by Spaniards have all died out because people buy their clothes and shoes from the Sangleys, who are very good craftsmen in Spanish fashion and make everything at very low cost. ... There are many gardeners among the Sangleys, who, in places which seemed totally unproductive, are raising many good vegetables of the kinds that grow in España and Mexico. They keep the market here as well supplied as that of Madrid or Salamanca. They make chairs, bridles, and stirrups of so good a quality and so cheaply that some merchants wish to load a cargo of these articles for Mexico.^{lxxvii}

The Bishop also emphatically illustrates in his letter how a Sangley sojourner was hired by a bookbinder from Mexico, and how the Sangley watched secretly his master’s practice at the bindery, then before long he set up himself as a bookbinder. What surprised the Spaniards of Manila most was that, very soon this Sangley became so excellent a bookbinder that his previous master had been forced to close his shop for good, because the Sangley had drawn all the trade in the town. Another example that has been widely quoted is the first Philippine book “*Doctrina Christiana*”. It was printed and bound by Keng Yong, a Hokkien sojourner in the *Parian* of San Gabriel in 1593.^{lxxviii} Over and over again throughout the Spanish colonial period, various writers echoed and re-echoed the essence of these statements in lengthy and detailed commentaries.

Apart from artisans, a large number of poor farmers, labourers, sailors and coolies who comprised the bottom layer of the lower social stratum in the Hokkien community could easily be seen outside the principal *Parian* of Manila. As we are told by the Spanish sources, 250 Hokkien farmers were employed in 1603 by the Jesuits in the village of Quiapo to cultivate fruit trees and vegetables while another 250 Hokkien farmers were found farming for the Augustinians in Tondo.^{lxxix} On the other hand, the Manila

authorities always tried to induce the Hokkien sojourners to work at farming, and those converted Sangleys who had married Filipino women could be even offered tracts of land in Manila's suburbs to cultivate. Nevertheless, the inducement introduced by the Spaniards was not that attractive to the sojourning Hokkiens because farming was of limited interest to them, and since they had already travelled to the Islands, they preferred to devote themselves to trade which would give them greater profit for less labour. Consequently, the Spaniards started to force the Sangleys to work in the rice fields from the early 1620s, and more than 6,000 Sangleys were compelled to farm the rice at Calamba in Laguna by 1639, which in turn caused an open Sangley rebellion. ^{lxxx}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commercial élite and the bulk of petty traders, artisans, farmers and fishermen is crucial in understanding this transient mercantile community. There can be no doubt that there were clear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ocial strata and regulations or customs governing the daily dress of the Sangleys. For instance, the poor Sangley would dress generally in dark trousers with a shirt open all down the front and would be fastened with wedges or knots, having long sleeves without cuffs. His head covering often would vary with his work. On the other hand, the rich Sangley would wear his silken gown, and wear his hair tied in a long queue. The costume regulation was not limited to the male Hokkien sojourners, it also could be applied to their wives. Therefore if the Sangley woman was poor, she generally wore black trousers and a blouse which hung down to about the middle of the thigh, and it was plain, with little form. By contrast, the rich Sangley women wore flowing silk sleeves and a high neckpiece. Over these was a sleeveless, neckless blouse which extended nearly to the knees and was fastened at the waist by a wide girdle. She also wore a rather narrow but long skirt with its hem covering the feet. ^{lxxxi} Nevertheless, what is cited above was not strong enough to convince people that class lines did exist within the Hokkien community.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there were three groups within the Hokkien community in terms of their attitudes towards the Hispanic authorities. Group A, consisting of a few individual Sangley Christians and well-to-do merchants, was a pro-Spaniard group. In order to get protection from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during their sojourning and to prove that they were loyal to the Manila authorities, they would sometimes report the developments within the *Parian* to the Spaniards. Group B was composed of a great mass of artisans, petty traders, fishermen, market gardeners and farmers who usually represented the mainstream of the sojourning community either in the striving for equal rights or in the struggle of anti-Hispanic colonial rule. What particularly characterised the mercantile community was Group C. Sandwiched between Group A and Group B, Group C comprised of majority of the wealthy merchants and converted Sangleys. Since these people had families, shops, cargoes or other property in the *Parian* to tend and normally they would wish to maintain good business terms with their Spanish customers, whilst hoping not to offend their poor fellow villagers, they always found themselves in a quandary whenever there was clash between the two ethnic groups. As a consequence, this group of Sangleys would initially stand aside and remained neutral in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Spaniards and their sojourning fellow countrymen while watch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ituation, they hesitated until they finally were forced to choose which side they had to join.

The different responses or performances by the three groups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 between a few rich merchants and the bulk of smaller traders and artisans were well represented in the uprising of 1603. The uprising was initially organised by the commercial élite of the community headed by its *Capitán* Eng-Kang as a natural response to the rumor that the Spaniards were preparing a general massacre of the Sangleys. According to Morga's account, Eng-Kang secretly ordered each of his fellow countrymen who was willing to join the revolt to bring him a needle through his adopted sons or henchmen. When Eng-Kang counted the needles and found that he had over 22,000 Hokkiens at his disposal, immediately a beginning was made in a small settlement close to the town of Tondo with mustered smaller artisans, tradesmen, and fishermen who comprised Group B. Very soon, the Spaniards were aware of the situation through the reports of some Sangley protégé from Group A. In the meantime those wealthier merchants and artisans who belonged to Group C did not take any risks themselves, but remained quietly in the *Parian* to protect their property despite that their poor fellow villagers across the Pasig River were persuading them to join in the uprising or threatening them with dire reprisals.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commercial élite and most of the sojourning Hokkiens remained harmonious so long as the uprising continued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Juan Ontal or Suntay, Eng-Kang's adopted son, though Eng-Kang himself had been arrested and executed within the town by the Spaniards. However, as soon as the poor Sangleys found out that the wealthy merchants across the river made no move to join the rebellion, and the merchandise was being taken out of the *Parian* and brought into the walled town, they immediately decided to abandon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ercial élite. Suntay was thus placed under arrest by his fellow countrymen and condemned to death together with some of his familiars as traitors, and two poor Sangleys were chosen supreme commanders by acclamation.^{lxxxiii} The uprising was thus destined to failure, for the ethnic community confronting the Spaniards was no longer a united one.

The Power Structure of the Hokkien Commun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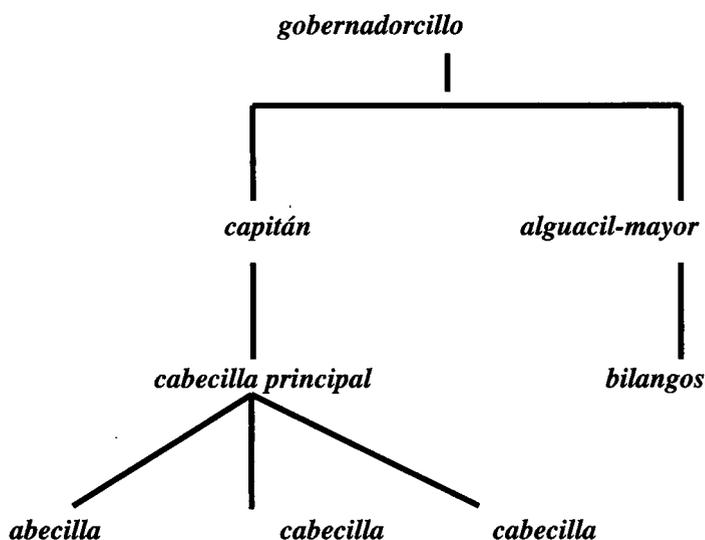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was the power structure or the officer system within the Hokkien community. Unfortunately, no source gave any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he inception of the Hokkien officer system in Manila. What we know for sure is that this system came into being before 1590, soon after the arrival of the Spaniard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first *Parian*. It is very likely that almost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the Spaniards adopted the traditional Asian practice of appointing a headman to manage the sojourning alien community. In any case, Bishop Salazar saw in 1590 a very large pond within the *Parian*, and in the centre of the pond was a small island where justice was done on those Sangleys who had violated the law.^{lxxxiii} In the following year, the Spanish Governor Gomez Perez Dasmariñs also mentioned

in his report that 2,000 Sangleys living within the *Parian* were supervised by their own governor and judge.

lxxxiv

The process by which a few fellow villagers among the sojourning Sangleys were chosen to be their administrative officers appears quite democratic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of the Spanish colonial officials; but aside from wealth, social status, ability and reputation, one of the major criteria used in the election was that these persons chosen should be converted Sangleys. Obviously, it was a policy imposed upon the community by the Spaniards. Accordingly three Hokkien officers including the *gobernadorcillo* as he was called in the Philippines could only be elected by a special group from its Christian members in a meeting presided over by the Spanish *alcalde-mayor* of Tondo. To assist the *gobernadorcillo*, two subalterns would be elected at the same time, one would be the chief deputy *gobernadorcillo* or *capitán*, and another would be the *alguacil-mayor* or constable. The officers of justice in the Hokkien quarter were called “*bilangos*”, and were appointed by the new *gobernadorcillo*. It is interesting to note that the group in charge of the election was composed of thirteen members, including the outgoing *gobernadorcillo*, the *ex-Capitáns*, the *cabecilla principal*, and the *cabecillas* or ringleaders, both past and present. When any number was lacking, it would be made up from the petty heads of various trade guilds. After the election, the Spanish authorities would grant these elected credentials to allow them to exercise jurisdiction in the community.^{lxxxv} In addition, as implied by the Spanish sources that the tenure of these Hokkien officers was limited and the election was held regularly in the *Parian*, but it would be hard to know as a rule how long these officers’ tenure would last during the period under discussion. The graphic illustration of the power structure is presented as follows.

Figure 1 Power Structure of the Hokkien Community in Manila



Regarding the Hokkien officer system in the *Parian*, Antonio de Morga, an eye-witness, has the

following in his records:

They have their own *alcayde* there with his court, prison and assistants to administer justice and to watch over them night and day, both to see they are safe and that they do not commit disorders. ...

They have a governor of their own race, a Christian, with assistant officers to help him to hear their legal cases in domestic and business affairs. Appeals from his decisions go to the *alcalde-mayor* of Tondo or the *Parian*, and in the last resort to the *audiencia* which also takes a special interest in the Sangleys and in everything concerning them. ^{lxxxvi}

It is evident that the Spaniards did not want to meddle with the inner affairs of the Hokkien community, and the sojourning Hokkiens were free to choose their headmen for themselves in Manila though this kind of election was practised within restricted limits set by the colonial authorities. Equally clear is that these Hokkien officers enjoyed a high authority among their fellowmates. It would be, however, misleading if one believes that the *Parian* was completely autonomous under its *gobernadorcillo* and other officers.

All sojourning Sangleys both within and without the *Parian* were thus under the immediate charge or jurisdiction of their *gobernadorcillo*. The Hokkien *gobernadorcillo* had the duty and power to collect taxes and tribute for the Spaniards, to settle disputes and keep order among his fellow countrymen, and to mediate with the Manila authorities on behalf of Sangleys. For instance, in 1729, the Spanish Governor Valdes Tamon ordered that all non-Catholic Sangleys living in the provinces of Tondo, Bulacan, Pampanga, Laguna and Cavite to move back to the *Parian* in Manila. The Hokkien *gobernadorcillo* and the heads of the various guilds then protested against this order and asked that at least they be allowed to continue trading and residing in the towns at a radius of five leagues around Manila and around Cavite, since many of these Sangleys could not practice their trades within the *Parian*. The Sangleys eventually won the struggle under the organisation of their officers, and the Spaniards were forced to withdraw the order for they did not want to lose a large amount of license tax levied from these Sangleys. ^{lxxxvii}

It must also be mentioned, to be complete, that unlike the situation in Batavia or Nagasaki, the positions of officer in the Hokkien community of Manila did not appear particularly attractive to the sojourners. The probable reason was that these officers did not have much salary or other benefits. Instead, they had sometimes to pay the tribute for their poor fellow villagers though a community chest was established in 1622, and each Sangley was required to submit 3 *toston* to the community chest to support them and two other Spanish officials financially. ^{lxxxviii} Moreover, as pointed out by Father Joaquin M. de Zuñiga, "These positions are honorary among them because they govern all the other Chinese the whole

year round and decide their cases even if they are not important enough. In spite of this, these positions are little desired, not only because those who have held them could not return to their country but might be put to death, but also because these positions are not of value.”^{lxxxix}

Information on the Hokkien *gobnadorcillos* appointed is, of course, much less detailed, the early period in particular. Apart from Li Dan and Eng-Kang, we are told that there was one by the name Francisco Zanco, who was elected as the *gobnadorcillo* in 1590. The next year, the name of Antonio Lopez, another converted Sangley in the *Parian*, was added to the list.^{xc} Without going back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business hub, suffice it to say that a majority of these commercial élite were prominent in their sojourning careers.

Formation of the Hokkien Mestizo Community

It needs to be noted that intermarriage with the Filipino women was a popular practice among sojourning Hokkiens from the 16th to the 18th century, since few Chinese women would be able to travel to the Philippines and live overseas with their husbands under the strict control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local patriarchal clan system of south Fujian. There would have been some intermarried Hokkien-Filipino families and *mestizos* when the Spaniards arrived in Manila, but this w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Hispanic colonial policy. To be true, it was the Spaniards together with the Catholic missionaries who deliberately encouraged and cultivated the growth of this particular community in the Philippines.

It seemed evident that the socio-religious policy pursued by the Spaniards in the Philippines was to Hispanise the whole islands by propagating Catholicism and inducing or forcing all the people to convert to Catholicism. The missionaries of the Dominican Order reached Manila in 1587, and to them was given the task to convert the Sangleys in the *Parian*. Seven years later, another small *Parian* was found in the area of Binondo by the Dominicans especially for those Catholic Sangleys who had married Filipinos and a group of prominent Hokkien merchant and artisans.^{xcⁱ} This community had contained about 500 Catholic Sangley families by 1603. However, most of these Sangleys converted not for spiritual salvation by any sincere wish, but rather by the material comforts they enjoyed there. Moreover, part of the reason they agreed to be baptised was that they dared not return to Fujian on account of debts incurred or crimes committed there, according to Antonio de Morga.^{xcⁱⁱ}

The Jesuits on the other hand established another greenhouse for the converted Sangleys at Santa Cruz between 1619 and 1634. To be fair, the enthusiasm to convert the Sangleys seemed not very successful in the early years, and had dimmed somewhat by 1584. The Hokkien converts were required to cut their queues as a visible act of conversion and baptism, it was considered by the Hokkiens as a disgrace, and consequently no one would dare to return to their home villages with such a mutilation.^{xcⁱⁱⁱ} Faced with strong opposition from the Hokkien community, the Spaniards were finally forced to relax the order of

cutting of the queue.

Gradually, a comparatively large ethnic community comprised of Hokkien-Filipino families and their *mestizo* descendants took form in the Manila area. In order to foster the Hispanisation among the Catholic Hokkiens, the Manila authorities especially granted Binondo to the Hokkien *mestizos* in perpetuity and allowed them limited privileges of self-government. These *mestizos* could even be exempted from being compelled to live in the *Parian* in 1581 when all of the sojourning Hokkiens were forced to concentrated in the ghetto.^{xciv} It was recorded that almost all of the population in some villages in central Luzon, such as Tambobong, was made up of *mestizos*.^{xcv} The community of *mestizo* in Binondo and Sta. Cruz grew steadily. In the 1680s, the *mestizo* community in Binondo became so influential that they began to ask for establishing their own *gremios* or corporations to protect their interests. As a result, in 1687, with the cooperation of the sojourning fellow countrymen, they formally organised the Community of Chinese and *Mestizos* of Binondo. This sodality was headed by a corporate council which comprised ten Hokkien sojourners and ten *mestizos*.^{xcvi}

Initially the Hokkien *mestizos* were associated with the church estates. Little by little they left the old occupations such as cultivating for the missionaries, started to build up their own businesses, and became active in trade of local agricultural commodities. As revealed by the Spanish documents, the entire internal trade of the Philippines fell into these *mestizos*' hands in the 18th and the 19th centuries. They sold in the inland towns or remote villages the merchandise from China which they obtained from the *Parian* on the one hand, and bought local products such as wax, cocoa, wheat, gold and trepang on the other.^{xcvii}

Thus, with the financial aptitude inherited from their Hokkien fathers, the *mestizos* were breaking away from the sojourning Hokkiens, and eventually established themselves as an independent commercial community in the Philippines.

Notes

-
- ⁱ Berthold Laufer, "The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to the Philippine Islands", *Smithsonian Miscellaneous Collections*, 50: 2 (1908),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p. 248-284; H. Otley Beyer,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in E. Arsenio Manuel, *Chinese Elements in the Tagalog Language*, Manila: Filipinana Publication, 1948, pp. ix-xxv; Robert B. Fox, "Chinese Pottery in the Philippines", in Schubert S.C. Liao ed., *Chinese Participation in Philippine Culture and Economy*, Manila: Schubert S.C. Liao, 1964, pp. 96-113; Liu Chi-Tien, *Zhong-fei Guanxi Shi* (劉芝田: 《中菲關係史》 History of Sino-Philippine Relations), Taipei: Cheng Chung Book Company, 1964, pp. 258-352.
- ⁱⁱ It is widely accepted that only until the end of the 18th century did a small number of Cantonese start to sojourn or emigrate in Manila. See Chen Lie-fu, *Feilübin de Lishi yu Zhong-fei Guanxi de Guoqu yu Xianzai* (陳烈甫: 《菲律賓的歷史與中菲關係的過去與現在》 The History of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China-Philippine Relations: Past and Present), Taipei: Zheng-zhong Shuju, 1968, p. 129.
- ⁱⁱⁱ "Relation of the Voyage to Luzon, (June 1570)", in E.H. Blair and J.A. Robertson eds.,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98, Cleveland: The Arthur H. Clark, Co., 1903-07, (hereafter as Blair and Robertson), Vol. 3, p. 101.

- iv There have been many debates on the origin and meaning of the term *Sangley*. Based upon a Manila manuscript of c. 1590 that contains a coloured picture of a Hokkien merchant couple with the title “Sangleys” and two Chinese characters “常來”, the late Professor C.R. Boxer argues that the term means “constantly coming”. He even suggests that the term is probably of Tagalog and not of Chinese origin since the Spanish Friar Martin de Rada mentioned it in his accounts of the Ming China as saying “The natives of these islands call China ‘Sangley’, and the Chinese merchants themselves call it Tunsua (Tiong-hoa in Hokkien); however its proper name nowadays is Taybin (Tai-bin in Hokkien)”. On the other hand, Edgar Wickberg contends that the term probably derived from the Chinese vocabulary “Shang-lü 商旅”, meaning “merchant traveller”. Indubitably these two explanations are not convincing. I am rather inclined to believe that the term *Sangley* derived from the Hokkien dialect “Sheng-li 生理”, meaning “trade” or “doing business”.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term *Sangley* or “Sheng-li 生理” was and still is very popular among Hokkiens. For instance, when talking about the smuggling with the Japanese traders, Zheng Ruo-zeng (鄭若曾) pointed out in the 16th century that “Of the people who usually smuggle with the Japanese, a majority are those from Zhangzhou and Quanzhou who do not have their own business (向來通倭多漳泉無生理之人)”. Another piece of evidence in point is a contemporary Spanish account by Juan de Medina, which was published in 1630. According to Juan de Medina, when the Hokkien merchants came to the Philippines for the first time, the natives were surprised by their strange appearance, and asked who they were. “The answer was ‘Sangley’ (or ‘merchants’); as one would say, ‘We are merchants’”. For the relevant references, see C.R. Boxer ed., *South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London: the Hakluyt Society, 1953, p. 260; Edgar Wickberg, *The Chinese in Philippine Life, 1850-1898*,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9; Zheng Ruo-zeng ed., *Chou-hai-tu-bian* (鄭若曾: 《籌海圖編》 *Illustrated Seaboard Strategy*), 1561-62, 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 Si-ku-quan-shu Zhen-ben-chu-ji edition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 reprint 1935, Vol. 12; Juan de Medina, “History of the Augustinian order in the Filipinas Islands, (1630)”, in Blair and Robertson, *Ibid.*, Vol. 23, p. 220; Berthold Laufer, “The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Ibid.*, p.268; George Phillips, “Early Spanish trade with Chincheo (Chang-chow)”, *The China Review*, 19(1890), p. 244, note 3; Fuchiwaki Hideo, “Shina Hirippin tsusho-jo no ‘Sangley’ ni tsuite”, (淵脅英雄: “支那菲律賓通商とのサングレイに就いて”) On ‘Sangley’ in the China-Philippine trade, *Rekishi to Chiri* (《歴史と地理》), 33-34 (1934), pp. 336-347.
- v When talking about Manila, He Qiaoyuan (何喬遠 1557-1631), a famous Hokkien historian of the Ming dynasty, pointed out that “Since the place is adjacent to Fujian, majority of the Zhangzhou people travelled there (其地邇閩, 閩之漳人多往焉).” See He Qiao-yuan, *Ming-shan Zang* (《名山藏》 A private compiled history of the Ming dynasty), 1640, Taipei: Cheng-wen Shuju reprint (台北: 成文書局重印), 1971, Vol. 62, Pt.3, entry of “Luzon”.
- vi Li Guangjin, *Jing-bi Ji* (李光縉: 《景璧集》 Collection of Li Guangjin’s works), 1637, Yangzhou: Jiangsu Guangling Guji Keyinshe reprint (揚州: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重印), 1996, Vol. 14, “Biography of two martyrs”. Li Guangjin (1549-1623), a native of Quanzhou, his works include *Jing-bi Ji* and *Si-shu Yao-zhi* (《四書要旨》 The essence of the Four Books). An-ping is another local name for An-hai. Obviously, the slaughter of Chinese merchants in Manila mentioned by Li Guangjin should be that one happened in 1603.
- vii “Letter to the King by Geronimo de Silva (Manila, 1st August 1621)”, in Blair and Robertson, *Ibid.*, Vol. 20, p. 109; “The Sangley insurrection by Pedro de Acuña and others (Manila, 12-23 December 1603)”, in Blair and Robertson, *Ibid.*, Vol. 12, pp. 155, 157.
- viii Bartolomé Leonardo de Argensola, *Conquista de las Islas Malvas*. In Blair and Robertson, *Ibid.*, Vol.16, pp. 211-318, especially pp. 290-298; “The Sangley insurrection by Pedro de Acuña and others (Manila, 12-23 December 1603)”, in Blair and Robertson, *Ibid.*, Vol.12, p. 154.
- ix Antonio de Morga, *Sucesos de las Islas Filipinas*, Mexico, 1609, translated by J.S. Cummins,

London: The Hakluyt Society, 1971, p. 226.

- ^x “Conquista de las Islas Malvas by Bartolomé Leonardo de Argensola (Madrid, 1609)”, in Blair and Robertson, *Ibid.*, Vol. 16, p. 234.
- ^{xi} “The Chinese and the *Parian* at Manila by Domingo de Salazar (Manila, 24th June, 1590)”, in Blair and Robertson, *Ibid.*, Vol. 7, p. 215.
- ^{xii} “Conquest of the island of Luzon (Manila, 20th April, 1572)”, in Blair and Robertson, *Ibid.*, Vol. 3, p. 167; “Letter from the Audiencia to Felipe II by Santiago de Vera and others (Manila, 25th June, 1588), in Blair and Robertson, *Ibid.*, Vol. 6, p. 316.
- ^{xiii} “Relation of the insurrection of the Chinese (Manila, c. March 1640)”, in Blair and Robertson, *Ibid.*, Vol. 29, p. 249.
- ^{xiv} “Description of the Philippine Islands by Bartolomé de Letona, (Mexico, 1662)”, in Blair and Robertson, *Ibid.*, Vol. 36, p. 200.
- ^{xv} Fedor Jagor, *Travels in the Philippines*, Manila: Filipiniana Book Guild, 1965, p. 248.
- ^{xvi} “Chinese immigration in the Philippines by Pedro Muñoz de Herrera and others (Manila July-November, 1606)”, in Blair and Robertson, *Ibid.*, Vol. 14, pp. 189-192.
- ^{xvii} A note must be added here on the reasons why the Spaniards were so hostile to this particular sojourning community. The attitudes and policies of the Spaniards towards the Hokkien sojourners underwent a major change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6th century. In fact, the Spaniards initially encouraged the arrival of the Hokkien merchants with their commodities and services to support this colony. Yet less than forty years after their settlement in Manila, the Spaniards developed a pattern of suspicion against the Hokkien sojourners which persisted for more than three centuries. In other words, the antagonism against the Hokkien sojourners crystallised in the initial colonial period between 1564 and 1603. This was in part due to the great soci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communities. The Hokkien sojourners in the Philippine Islands were the most energetic and commercial people, and occupied all economic classes from rich merchant to poor labourer. The Spaniards were, however, very different. They were civil and religious authorities, the soldiers, and the *encomenderos*. They were less interested in trade and commerce, crafts, or agricultural labour. As a result, the economy of the Spanish Philippines depended almost entirely upon the merchants and labourers from south Fujian -- to an extent that must have alarmed the Spaniards. At the same time, the Hokkien sojourners were infidels in the eyes of the Spaniards, not part of the culture and social order of the colony. It is understandable that the Spaniards saw this infidel population as constituting a threat to Spanish unity of Faith, and as an alien economic middle class endangering the preferred Spanish socio-economic structure. Thus, economically and culturally, the Spaniards felt themselves increasingly insecure and gradually changed their attitude towards the Hokkien sojourners from encouragement to suspicion and fear. With the changed attitude, the Spaniards attempted to control and limit the Hokkien sojourners’ activities in the Islands through segregation, expulsion, religious conversion and massacre.
- ^{xviii} Sources: Blair and Robertson, *Ibid.*, Vol. 3, pp. 101, 167; Vol. 6, pp. 61, 183, 302, 316; Vol. 7, pp. 89, 230; Vol. 8, pp. 97-98; Vol. 10, pp. 42, 259; Vol. 15, p. 305; Vol. 12, pp. 108, 168, 253; Vol. 14, pp. 189-191; Vol. 16, pp. 196-198, 206; Vol. 20, pp. 96-97; Vol. 22, pp. 211, 294; Vol. 24, p. 328; Vol. 25, p. 49; Vol. 26, p. 140; Vol. 27, p. 114; Vol. 29, pp. 69-70, 249; Vol. 32, p. 76; Vol. 35, p. 190; Vol. 36, pp. 200, 204-205; Vol. 42, p. 252; Yanai Kenji, “Manira no iwayuru ‘*arian*’ ni tsuite” (箭内健次: “フニテの所謂パリアンに就いて” On the so-called ‘*Parian*’ of Manila), *Taihoku Teikoku Daigaku Bunseigakubu, Shigakuka Kenkyu Nenpo* (《台北帝國大學史學科研究年報》), 5 (1938), p. 28.
- ^{xix} Antonio de Morga, *Sucesos de las Islas Filipinas*, *Ibid.*, p. 316.
- ^{xx} J.A. van der Chijs, ed., *Nederlandsch-Indisch Plakaatboek, 1602-1811*. *Ibid.*, Deel 3, pp. 260-262.
- ^{xxi} John Masfield ed. *Dampier’s Voyages*, London: E. Grant Richards, 1906, 2 Vols., Vol. 1, pp. 591-592.
- ^{xxii} Antonio de Morga, *Sucesos de las Islas Filipinas*, *Ibid.*, p. 300.

- xxiii Giovanni Francesco Gemelli-Careri, *A Voyage to the Philippines*, Manila: Filipiniana Book Guild, 1963, p. 10.
- xxiv Wang Gungwu, "Merchants without empires: the Hokkien sojourning communities", reprint in Wang Gungwu,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1, pp. 79-101, p. 92.
- xxv Pedro Ortiz Armengol, *Intramuros de Manila de 1571 hasta su destrucción en 1945* (The Intramuros of Manila: from 1571 to its destruction in 1945), Madrid: Ediciones de Cultura Hispanica, 1958, pp. 66, 126-128; Fr. Joaquin Martinez de Zuñiga, *Status of the Philippines in 1800*, Manila: Filipiniana Book Guild, 1973, pp. 208-213; Conrad Myrick, "The history of Manila from the Spanish conquest to 1700", in *Historical Bulletin*, 15:1-4 (1971), pp. 1-253, pp. 163-181.
- xxvi Zhang Xie, *Dong Xi Yang Kao*, (張燮: 《東西洋考》 A Study of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Oceans), Beijing: Zhonghua Shuju, reprint, 1981, Vol. 5, p. 89; He Qiao-yuan also mentions this term, see his *Ming-shan Zang*, Ibid., Vol. 62, Pt.3, entry of "Luzon".
- xxvii See Fu Yiling, "Xiamen Haicang Shitang Xieshi Jiacheng Youguan Huaqiao Shiliao" (傅衣凌: "廈門海滄石塘《謝氏家乘》有關華僑史料") Primary sources pertaining to the history of overseas Chinese as recorded in the Genealogy of the Xie family of Shitang, Haicang, Xiamen), in *Huaqiao Wenti Ziliao* (《華僑問題資料》 Materials on the Study of Overseas Chinese), Internal circulated Journal, Xiamen: Xiamen Daxue Nanyang Yanjiusuo, 1(1981), pp.62-74.
- xxviii See *Yongchun Pengxiang Zhengshi Zupu* (《永春鵬翔鄭氏族譜》 The genealogy of the Zheng family of Pengxiang, Yongchun), copy kept by Prof. Zheng Shanyu of the University of Overseas Chinese, Quanzhou.
- xxix "Account of the encomiendas in the Philipinas Islands by G.P. Dasmariñas (Manila, 31st May 1591)", in Blair and Robertson, Ibid., Vol. 8, p.100.
- xxx "Letters to Felipe III by Pedro de Acuña (July-December 1603)", in Blair and Robertson, Ibid., Vol.12, p. 129.
- xxxi "Letter to Filipe II by Antonio de Morga (Manila, 6th July 1596)", in Blair and Robertson, Ibid., Vol. 9, pp. 268-269. See also Edgar Wickberg, *The Chinese in Philippine Life*, Ibid., p. 18.
- xxxii "Letters to Felipe IV by Sebastian Hurtado de Corcuera (Manila, 30th June 1636)", in Blair and Robertson, Ibid., Vol. 26, pp. 139-140.
- xxxiii "Affairs in the Philipinas Islands by Domingo de Salazar (Manila, 1583)", in Blair and Robertson, Ibid., Vol. 5, pp. 236-237.
- xxxiv Several historical works have dealt particularly with the topic of the *Parian*. For examples of this genre of writings, see Yanai Kenji, "Manira no iwayuru 'Parian' ni tsuite", Ibid.; Alberto Santamaria O.P., "The Chinese *Parian* (El *Parian* de los Sangleyes)", in Alfonso Felix, Jr., ed.,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1570-1770*, Manila: Solidaridad Publishing House, 1966, pp. 67-118; Ch'en Ching-Ho,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Philippines*, Tokyo: The Centre for East Asian Cultural Studies, 1968; Liu Chi-Tien, "Huaqiao lai-fei de Faxiangdi - Jian-nei yu Ba-lian" (劉芝田: "華僑來菲的發祥地-澗內與八連", The cradle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Jian-nei or *Parian*), in Liu Chi-Tien, *Feil bin Minzu de Yuanyuan* (《菲律賓民族的淵源》 The origin of the Philippine nation), Hong Kong: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70, pp. 221-259.
- xxxv "The Chinese and the *Parian* at Manila by Domingo de Salazar (Manila, 24th June 1590)", in Blair and Robertson, Ibid., Vol. 7, pp. 224, 228.
- xxxvi The Hokkien quarter in Hispanic Manila definitely was not the only one to suffer from serious fires, most other contemporary quarters or indigenous and colonial cities were also plagued by periodic conflagrations, as depicted in the following chapters on the communities of Banten and Nagasaki.
- xxxvii "Letters to Filipe II by Francisco Tello (Manila, 29th April-12 August, 1597)", in Blair and Robertson, Ibid., Vol. 10, p.43.

- xxxviii *Archivo General de Indias of Seville: Filipinas*, 481, cited in Lourdes Diaz-Trechuelo, “The role of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 domestic economy”, in Alfonso Felix, Jr., ed.,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Ibid., Vol.1, pp. 207-208; John Foreman, *The Philippine Islands*, 2nd edition,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899, pp. 109-110; Pedro Ortiz Armengol, *Intramuros de Manila de 1571 hasta su destrucción en 1945* (The Intramuros of Manila: from 1571 to its destruction in 1945), Madrid: Ediciones de Cultura Hispanica, 1958, pp. 49-151; “The Chinese and the *Parian* at Manila by Domingo de Salazar (Manila, 24th June 1590)”, in Blair and Robertson, Ibid., Vol. 7, p. 224.
- xxxix Charles R. Boxer, *The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 1415-1825*, New York, 1969, p. 17.
- xi Zhang Xie, *Dong Xi Yang Kao*, Ibid., Vol. 7, “Section of Taxation”; *Ming Shenzong Shilu* (《明神宗實錄》 Veritable Records of the Ming Dynasty: Shenzong period), Vols. 210, 316.
- xii Sources:
- A) Pierre Chaunu, *Les Philippines et le Pacifique des Ibériques (XVI, XVII, XVIII siècles)*, Paris: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1960, 2 Vols., Vol. 1, pp. 148-191.
- B) Blair and Robertson, Ibid., Vol.3, pp. 74-77, 84-89, 94-95, 103-104, 181-182, 243, 298-299; Vol.4, p. 91; Vol. 5, p. 238; Vol. 6, pp. 61, 150, 302-303, 316; Vol. 7, pp. 34-35, 120; Vol. 8, pp. 237, 270; Vol. 10, p. 179; Vol. 11, p. 111; Vol. 12, p. 83; Vol. 14, pp. 51, 70, 189-191; Vol. 16, pp. 44, 177-178, 297; Vol. 18, pp. 38, 41, 66-72, 228-230; Vol. 19, p. 69; Vol. 20, pp. 32-33, 49-50; Vol. 22, pp. 96-97; Vol. 23, pp. 94, 193; Vol. 24, p. 208; Vol. 25, pp. 143-144; Vol. 26, pp. 276-277; Vol. 29, p. 306; Vol. 34, p. 298; Vol. 35, p. 177.
- C) *The Voyage of John Huyghen van Linschoten to the East Indies*, London: Hakluyt Society, 1885, 2 Vols., Vol. 1, p. 124.
- D) Ernest M. Satow ed., *The Voyage of John Saris to Japan*, London: Hakluyt Society, 1900, p. 226.
- E) “Dampier’s Account of the Philippines”, in John Pinkerton ed., *A General Collection of the Best and Most Interesting Voyages and Travels in All Parts of the World*, London, 1808, 17 Vols., Vol. 11, p. 38.
- F) H.T. Colenbrander and W. Ph. Coolhaas eds., *Jan Pieterszoon Coen; Bescheiden omtrent zijn bedrijf in Indië*, ’s-Gravenhage, 1919-1953, 7 Deels; Deel 1, pp. 184, 399; Deel 4, p. 726; Deel 7, pp. 55, 673.
- G) J.A. van der Chijs et al eds., *Dagh-Register gehouden int Casteel Batavia vant passerende daer ter plaetse als over geheel Nederlands-India, 1624-1682*, ’s-Gravenhage/Batavia, 31 Deels; 6th April, 1625; 28th March, 1631.
- xliii For the critical comment on Chaunu’s calculation, see Dennis O. Flynn and Arturo Giraldes, “Arbitrage, China, and world trade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38:4 (1995), pp. 429-448.
- xliiii *Ming Xizong Shilu* (《明熹宗實錄》 Veritable Records of the Ming Dynasty: Xizong period), Vol. 28, entry of “the fourth month, the third year of Tian-qi”.
- xliv For the detailed information, see Qian Jiang, *1570-1760 Zhongguo he Lusong de Maoyi* (錢江:《1570-1760 中國和呂宋的貿易》 The Junk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Luzon, 1570-1760), unpublished M.Phil. thesis, Xiamen University, January 1985, pp. 15-49.
- xlvi Antonio de Morga, *Sucesos de Las Islas Filipinas*, Ibid., p. 305.
- xlvii Ernest M. Satow ed., *The Voyage of Captain John Saris to Japan*, Ibid., pp. 226-227. For the general account of the junk trade and its relations with the Manila galleon, see William Lytle Schurz, *The Manila Galleon*, New York: E.P. Dutton, 1939, especially pp. 63-98.
- xlviii Antonio de Morga, *Sucesos de Las Islas Filipinas*, Ibid., pp. 306-307; “Affairs in the Philippines Islands by Domingo de Salazar (Manila, 1583)”, in Blair and Robertson, Ibid., Vol. 5, p. 239; “Annual receipts and expenditures of the Philippine government by Pedro de Caldierva de Mariaca (Manila, 18th August, 1608)”, in Blair and Robertson, Ibid., Vol. 14, p. 249.
- xlviii Antonio de Morga, *Sucesos de Las Islas Filipinas*, Ibid., pp. 305-306. See also Antonio de Morga,

- “Events in the Philippine Islands (Mexico, 1609)”, in Blair and Robertson, *Ibid.*, Vol. 16, p. 178.
- xlix Antonio de Morga, *Sucesos de Las Islas Filipinas*, *Ibid.*, p. 307.
- ¹ “Letters to Felipe IV by Juan Niño de Tavora (4th August 1628)”, in Blair and Robertson, *Ibid.*, Vol., 22, p. 271.
- li For the relevant discussions and estimations, see Chuan Hang-sheng, “Ming-Qing jian Meizhou Baiyin de Shuru Zhongguo” (全漢升:《明清間美洲白銀的輸入中國》The inflow of American silver into China from the late Ming to the mid-Qing period), *The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 2:1 (1969), pp. 61-75; C.R. Boxer, “Plata es Sangre: Sidelights on the Drain of Spanish-American Silver in the Far East, 1550-1700”, *Philippine Studies*, 18:3 (1970), pp. 457-478; John J. TePaske, “New World Silver, Castile and the Philippines, 1590-1800”, in J.F. Richards ed., *Precious Metals in the Later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Worlds*, Durham, 1983, pp. 425-446; Artur Attman, *American Bullion in the European World Trade, 1600-1800*, Göteborg, 1986; Qian Jiang, “1570-1760 nian Xishu Feilubin Liuru Zhongguo de Meizhou Baiyin” (錢江:“1570-1760年西屬菲律賓流入中國的美洲白銀” The inflow of American silver into China via the Spanish Philippines from 1570 to 1760), *Nanyang Wenti* (《南洋問題》), 3(1985), pp. 96-106.
- lii He Qiaoyuan, *Min Shu* (History of Fujian 何喬遠《閩書》), c. 1630 version (kept in the library of Nanyang Research Institute, Xiamen University), Vol. 39, “Banji Zhi” (版籍志 On population and taxation); Fu Yuanchu, *Qing Kai Yangjin Shu* (傅元初:《請開洋禁疏》Memorial on lifting the ban upon the overseas trade), in Gu Yanwu, *Tianxia Junguo Libing Shu*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Complete Accounts of the Geography and Economy of the Ming China), c.1662, Shanghai, 1903, reprint, Vol. 96, “Fujian”.
- liii “Letters from the royal fiscal to the King by Hieronimo de Salazar y Salcedo (Manila, 21st July 1599)”, in Blair and Robertson, *Ibid.*, Vol. 11, p. 111.
- liv “Letters from the archbishop of Manila to Felipe II by Ygnacio de Santibanez (Manila, 24-26 June 1598)”, in Blair and Robertson, *Ibid.*, Vol. 10, p. 143; “Early years of the Dutch in the East Indies”, in Blair and Robertson, *Ibid.*, Vol. 15, p. 303.
- lv M.A.P. Meilink-Roelofs, *Asian Trade and European Influence in the Indian Archipelago between 1500 and about 1630*,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62, p. 265.
- lvi “Relation of the Philippines Islands by Domingo de Salazar and others (Manila, 1586-88)”, in Blair and Robertson, *Ibid.*, Vol. 7, pp. 33-34.
- lvii William Dampier, *Dampier’s Account of the Philippines*, in John Pinkerton ed., *A General Collection of the Best and Most Interesting Voyages and Travels in All Parts of the World*, *Ibid.*, Vol. 11, p. 38.
- lviii John Masefield ed. *Dampier’s Voyages*, *Ibid.*, Vol. 1, p. 228; See also “Dampier’s Account of the Philippines”, in John Pinkerton ed., *A General Collection of the Best and Most Interesting Voyages and Travels*, *Ibid.*, p. 14.
- lix “The Chinese and the *Parian* at Manila by Domingo de Salazar (Manila, 24th June, 1590)”, in Blair and Robertson, *Ibid.*, Vol. 7, pp. 224-229.
- lx Giovanni Francesco Gemelli-Careri, *A Voyage to the Philippines*, *Ibid.*, 1963, p. 10.
- lxi “Complaints against the Chinese by Miguel de Benavides and others (Manila, 3-9th February 1605)”, in Blair and Robertson, *Ibid.*, Vol. 13, pp. 285-286.
- lxii *Archivo General de Indias of Seville: Filipinas, 67 and 202*, cited in Lourdes Diaz-Trechuelo, “The role of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 domestic economy”, *Ibid.*, pp. 187-199.
- lxiii “Letters to Felipe IV by Juan Niño de Tavora (Manila, 4th August, 1628)”, in Blair and Robertson, *Ibid.*, Vol. 22, p. 250.
- lxiv *Archivo General de Indias of Seville: Filipinas, 202*, cited in Lourdes Diaz-Trechuelo, “The role of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 domestic economy”, *Ibid.*, pp. 196-197.
- lxv *Archivo General de Indias of Seville: Filipinas, 571*, cited in Lourdes Diaz-Trechuelo, “The role of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 domestic economy”, *Ibid.*, pp. 201-206.

- lxvi Antonio de Morga, *Sucesos de Las Islas Filipinas*, Ibid., p. 225.
- lxvii “Conquista de las Islas Malucas by Bartolomé Leonardo de Argensola (Madrid, 1609)”, in Blair and Robertson, Ibid., Vol. 16, pp. 292-293; Antonio de Morga, *Sucesos de Las Islas Filipinas*, Ibid., p.218.
- lxviii Anthony Farrington ed.,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3-1623*, London: The British Library, 1991, 2 Vols., Vol. 1, p. 381. For a more detailed discussion on Li Dan and his role in the Hokkien community of Nagasaki, see the Chapter on the Hokkien community of Kyushu.
- lxix Antonio de Morga, *Sucesos de Las Islas Filipinas*, Ibid., p. 219; “Conquista de las Islas Malucas by Bartolomé Leonardo de Argensola (Madrid, 1609)”, in Blair and Robertson, Ibid., Vol. 16, pp. 290-291.
- lxx H. de la Costa, S.J., *The Jesuits in the Philippines, 1581-1768*,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68.
- lxxi “The Chinese and the *Parian* at Manila by Domingo de Salazar (Manila, 24th June, 1590)”, in Blair and Robertson, Ibid., Vol. 7, p. 225.
- lxxii *Archivo General de Indias of Seville: Filipinas, 571*, cited in Lourdes Diaz-Trechuelo, “The role of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 domestic economy”, Ibid., pp. 201-206.
- lxxiii “The Chinese and the *Parian* at Manila by Domingo de Salazar (Manila, 24th June, 1590)”, in Blair and Robertson, Ibid., Vol. 7, p. 225.
- lxxiv H. de la Costa, S.J., *The Jesuits in the Philippines*, Ibid., p. 69.
- lxxv “Relation of the Philipinas Islands by Domingo de Salazar and others (Manila, 1586-88”, in Blair and Robertson, Ibid., Vol. 7, pp. 33-34.
- lxxvi “The Chinese and the *Parian* at Manila by Domingo de Salazar (Manila, 24th June, 1590)”, in Blair and Robertson, Ibid., Vol. 7, pp. 212-238.
- lxxvii “The Chinese and the *Parian* at Manila by Domingo de Salazar (Manila, 24th June, 1590)”, in Blair and Robertson, Ibid., Vol. 7, pp. 225-228.
- lxxviii The best general account of the beginning of printing in the Philippines, according to P. van der Loon, is by W.E. Retana, *Orígenes de la imprenta filipina: Investigaciones históricas, bibliográficas y tipográficas*, Madrid, 1911. For the detailed studies on the early Chinese books translated and printed by sojourning Hokkiens in Manila, see P. van der Loon, “The Manila incunabula and early Hokkien studies”, *Asia Major*, 12 (1966), pp. 1-43.
- lxxix “Letters to Felipe III by Miguel de Benavides (Manila, 5-6th July, 1603)”, in Blair and Robertson, Ibid., Vol. 12, pp. 108-109.
- lxxx “Letters to Felipe IV by Juan Niño de Tavora (Cavite, 1st August, 1629)”, in Blair and Robertson, Ibid., Vol. 23, pp. 36-37; “Relation of the insurrection of the Chinese (unsigned and undated, probably in March 1640)”, in Blair and Robertson, Ibid., Vol. 29, pp. 201-207.
- lxxxii Pedro Ortiz Armengol, *Intramuros de Manila*, Ibid., pp. 126-128.
- lxxxiii “The Sanglely insurrection of 1603 by Miguel Rodriguez de Maldonado (Sevilla, 1606)”, in Blair and Robertson, Ibid., Vol. 14, pp. 119-139; Antonio de Morga, *Sucesos de Las Islas Filipinas*, Ibid., pp. 220-221.
- lxxxiiii “The Chinese and the *Parian* at Manila by Domingo de Salazar (Manila, 24th June 1590)”, in Blair and Robertson, Ibid., Vol. 7, p. 228.
- lxxxv “Account of the encomiendas in the Philipinas Islands by G.P. Dasmariñs (Manila, 31st May, 1591)”, in Blair and Robertson, Ibid., Vol. 8, p. 97.
- lxxxvi “Administration of the islands in 1609-1616”, in Blair and Robertson, Ibid., Vol. 17, pp. 327-328.
- lxxxvii Antonio de Morga, *Sucesos de Las Islas Filipinas*, Ibid., pp. 315-317.
- lxxxviii *Archivo General de Indias of Seville: Filipinas, 417*, cited in Lourdes Diaz-Trechuelo, “The role of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 domestic economy”, Ibid., p. 192.
- lxxxix “Letters to Felipe IV by Sebastian Hurtado de Corcuera (Manila, 30th June, 1636)”, in Blair and Robertson, Ibid., Vol. 26, pp. 143-145.
- lxxxix Fr. Joaquin Martinez de Zuñiga, *Status of the Philippines in 1800*, Ibid., p. 210.

-
- ^{xc} “The Chinese and the *Parian* at Manila by Domingo de Salazar (Manila, 24th June, 1590)”, in Blair and Robertson, *Ibid.*, Vol. 7, p.233.
- ^{xc} “Letter to Felipe II by Antonio de Morga (Manila, 6th July, 1596)”, in Blair and Robertson, *Ibid.*, Vol. 9, pp. 268-269.
- ^{xcii} Antonio de Morga, *Sucesos de Las Islas Filipinas*, *Ibid.*, pp. 315-316.
- ^{xciii} “The Chinese and the *Parian* at Manila by Domingo de Salazar (Manila, 24th June 1590)”, in Blair and Robertson, *Ibid.*, Vol. 7, p. 232.
- ^{xciv} “Relation of the Philipinas Islands by Domingo de Salazar and others (Manila, 1586)”, in Blair and Robertson, *Ibid.*, Vol. 7, p. 34.
- ^{xcv} Retana’s note in Zuñiga’s book, Vol. 2, p. 495, cited in Conrad Myrick, “The history of Manila”, *Ibid.*, p. 178.
- ^{xcvi} Edgar Wickberg, “The Chinese *Mestizo* in Philippine History”, *The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5:1 (1964), pp. 62-100, p. 70.
- ^{xcvii} Lourdes Diaz-Trechuelo, “The role of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 domestic economy”, *Ibid.*, p. 192.

作者简介:

钱江, 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

“海上丝绸之路”与明清之际的福建

对外文化交流

——以中西交通为考察视角

吴巍巍 林金水

内容摘要：“海上丝绸之路”作为古代东西方贸易交通的大动脉，在地理交通层面沟通着东西方世界的互动往来。在东西方商品贸易活动的基础上，“海上丝绸之路”还承载着中西文化交流的“使命”，西方人藉此积极开展对华文化交流。明清之际，西方人在福建东南沿海地区的文化活动呈现出积极发展的态势，西方天主教再度入闽传教，西方科学文化和社会文化等各类知识也随之传至福建社会。同时，福建文化乃至中国的多方面内涵，也借助“海丝”的通道，流播至西方世界，构筑了一段平等对话和积极往来的双向交流局面。

关键词：“海上丝绸之路” 明清之际 西方人 福建 对外文化交流中西交通

前 言

众所周知，“海上丝绸之路”是指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海上交通的路线。早在宋元时期，东西方之间的海外贸易开展得极为兴盛，藉由海路之交通平台，中西文化交流也蓬勃兴起，为后来东西方的交往和沟通奠定下坚实的基础。元朝灭亡后，中西交通和文化交往一度中断，一直到明朝的后半叶直至清代初年（即学界常称的“明清之际”），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东来对华贸易，大量殖民者、探险家、外交使节、商人、传教士们再度如缕不绝地梯航渡海前来东方，中西交往、沟通和东西方文化交流才重现生机，并渐入佳境，双方的互动认识与了解也逐步加深，可以这么说，“海上丝绸之路”承载着东西文化交流起承转合的重要“使命”。

15世纪末16世纪初，位于伊比利亚沿海一隅的葡萄牙率先揭开了世界航海史和地理大发现的序幕。由于陆路的阻滞，葡萄牙殖民势力迫切需要开辟新的航路前往东方寻找黄金、换取香料，从事海上贸易。1557年，葡萄牙人强行“租借”中国澳门，成功开辟了从里斯本经好望角到中国南部的航线。葡萄牙的“成果”刺激了西班牙、荷兰、英、法等国，这些西方殖民势力相继东来，并开辟了从欧洲经美洲穿越太平洋到达菲律宾再达中国东南沿海等线路，于是，自欧洲来中国的东西两条海道从此辟通，西方殖民者开始了对中国持续不断地贸易与探察。在这一轮中西交往的大潮中，西方国家多集中于中国东南海域从事活动，进而窥视、察探中国信息，位处东南沿海的福建社会于是便成为他们透视中国最重要的窗口之一，成为西方人开展对华文化活动的前沿平台。

一、葡萄牙人率先来闽及其文化活动

1517年,奉葡萄牙国王之命(与中国建立通商贸易关系),费尔南·佩雷斯·德·安特拉德(Fernao Perez d' Andrade)偕同身份为赴华使节的托梅·皮雷斯(Tomé Pires)抵达广东屯门,在说明来意后获准派使节前往觐见皇帝,这样,皮雷斯成为葡萄牙派往中国的第一任使臣。不过皮雷斯并未完成使命,而是离奇地成为阶下囚并最终死于广州狱中¹。而安特拉德等则没有随皮氏等人登岸,他于该年派遣一部分舰队,由马斯卡列纳斯(George Mascarenhas)率领,北上寻找琉球群岛,因气候所阻,航行至福建沿海而停留于Chincheo²,并乘机考察了福建沿岸、搜集有关信息,为葡萄牙人入闽求市埋下萌芽,这也是葡萄牙人首次到达福建并踏上闽地。

实际上,皮雷斯于来华的前一年即1515年在马六甲就曾四处搜集东方的各方面情报,并编写出《东方诸国记》一书,为葡萄牙了解中国提供了较为原始的情报,也为自己与中国打交道做好信息准备。该书较早地记录有关福建的点滴信息,体现出作者通过访问听闻而对福建所有的最初认识。该书记到:“……锦缎、花缎、织锦、纱、罗产自南京与侯官(福州);药用樟脑产自漳州。……在广州港的那一边还有一个海港,名叫福州港(Oquem即Foquem<或福建>,应皆为‘福州’一名的闽南方言或福州方言的对音——译者);从陆路而往需要走三天,若取水路则一天又一夜。此港是琉球人及其他民族的泊所”³。从中可见,皮氏对福建的认识颇为准确,这可能与他从马六甲的闽籍华侨或各国商人处打听到的信息有关,所以能对福建物产、地理交通特别是琉球在福建有专门驿所的情况有大致知晓;但由于尚非亲自考察,其记述还很粗浅,有待于葡人亲自走进福建土地进行直接的接触与观察。

马斯卡列纳斯一行率先做到了这一点,较之皮氏有了明显进步,他们能够鬼使神差般亲自踏上福建土地考察搜集当地信息,对福建社会有了一个直面的认识。不过其记述却同样简单,根据16世纪著名葡萄牙学者巴洛斯和卡斯特涅达等人著作的叙述,马斯卡列纳斯一行考察到了有关福建的一些重要信息,他们在福建逗留期间,曾与当地居民进行贸易,“马斯卡列纳斯在这个Chincheo城做了极有利的贸易”,发现在福建“可以赚到与广州同样多的利益”⁴;马氏还简要描述福建海岸外在景观和直接的印象,“沿福建Chincheo海岸行驶,那里是齐整的,散布着许多城镇、村落,航行中遇到许多驶往各地的船只”,还谈到福建居民,“……在该地Chincheo感觉到百姓比广州的要富有,比广州人更有礼……在那里停留时一直到的当地百姓的极友好善意的接待,他们是异教徒,白而俊秀,生活不错”⁵。葡萄牙人似乎对泉州较为了解,因为“多年习惯来它属下的一个货港做买卖”¹。

¹ 万明:《中葡早期关系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5-34页。

² 对于葡萄牙人马斯卡列纳斯一行所停留的Chincheo究竟为福建何地,目前学术界尚有分歧:一说为漳州,参见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55页、林金水、谢必震主编《福建对外文化交流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11页;另一说为泉州,参见张泽天:《中葡早期通商史》,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92页;第三说为尚不确定,认为还难以判定,参见(英)博克舍编注、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24—225页、万明:《中葡早期关系史》,第49页。笔者认为,虽然Chincheo究竟是哪一个地名尚有待于进一步考证,但马斯卡列纳斯一行曾到往福建沿海可谓是确凿无疑的。

³ (葡)托梅·皮雷斯:《1515年葡萄牙人笔下的中国》,该文由夏茂译自阿尔曼多·科特桑(Armando Cortesão)辑译:《托梅·皮雷斯的东方诸国记》(The Suma Oriental of Tomé Pires),伦敦1944年版,第1卷,载《中外关系史译丛》第四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287页。

⁴ 万明:《中葡早期关系史》,第49页。

⁵ (英)博克舍:《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224页。

16世纪葡萄牙人对福建进行较为全面而深入报道的著述应推伯来拉(Galeote Pereira亦被译作佩雷拉)的《中国报道》和克路士(Gaspar da Cruz也常被译为克鲁兹)的《中国志》。这两部作品代表了当时西方人认识中国的较高水平,对欧人认识中国及其中国观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两本著述中都有许多较为详尽地介绍福建社会的内容,他们对福建的介绍、报道,大大超过了前人及以往的作品,也极大地丰富了西人对福建乃至中国社会的认识。

伯来拉,葡萄牙殖民分子兼商人,16世纪中叶活动于中国东南沿海一带,从事走私贸易。1549年在诏安走马溪战役中被明朝军队俘虏,被囚禁于中国监狱中,后侥幸逃脱,逃出中国后撰写自己在华的见闻录,即《中国报道》(也被译为《中国见闻录》,约于1563年完稿并被收入集子出版。该书对福建的城市及村镇景致、农业技术、生活习俗、饮食、宗教信仰、城市建筑等作了记述,代表了当时葡萄牙人对福建的认识,并通过福建了解中国的行政体制、科举考试和律法制度等²。伯来拉的报道对欧洲产生很大影响,稍后的克路士《中国志》一书及后来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等就广泛参考和引用了伯来拉的记载。

克路士是一位天主教多明我会传教士,1556年曾到中国企图在华建立传教站,在广州居住数月后很快遭到驱逐,回国后于1569年出版了《中国志》(也被称为《中国情况记》),该书是一部体例较为完备的记述中国的作品,被誉为“欧洲出版第一部专记中国的书”,“克路士在广州停留的几周比马可波罗在中国度过的那许多年得到更充分的利用。比那位更负盛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对所见的中国的描写得更好更清楚”,“这位修士对中国生活和风俗所作的许多考查,启迪了那些尔后被认为是最早把中国揭示给欧洲的耶稣会士作家”³。不过,克路士未到过福建,其对福建社会的记录较多地参考伯来拉的报告,相对简略⁴。

二、西班牙人涉足福建沿海地区及其文化活动

葡萄牙人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活动刺激了其他西欧国家,与葡萄牙并称15、16世纪两大殖民先锋的西班牙更是按耐不住,他们紧随葡萄牙之后开辟了欧洲-美洲-菲律宾-中国的航线,并占据了菲律宾作为其在东南亚的殖民基地,并试图以此为跳板寻求与中国建立关系。1575年,适逢福建海防军队追剿海盗林凤集团至菲律宾海域,而林凤又被西班牙人包围,负责此次军事行动的福建把总王望高拜见西班牙菲律宾总督,双方商议合作:西班牙人协助擒拿林凤,作为回报,王同意西班牙派遣以修士拉达(MarDin de Rada)等一行为代表的使团赴闽,请求明政府准许与西班牙互市。

拉达是天主教奥斯定会传教士,博学多才,有“西班牙艺术的花朵和凤凰”之称。此行赴闽不仅担任与中国建立贸易关系的使命,还兼怀传播基督教和搜集中国情报信息的目的,该使团也是明末西方派到福建的第一个传教团⁵。拉达一行于1575年7月5日抵达厦门,并经泉州、兴化抵达福州,一路上颇受款待和礼遇。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该年8月2日林凤逃出西班牙的包围,加之新任西班牙菲律宾对待中国官员的不友善态度及明王朝对西班牙人心存顾虑,拉达一行于9月14日由王

¹ (葡)费尔南·门德斯·平托等著、王锁英译:《葡萄牙人在华见闻录》,澳门文化司署等1998年版,第30页。

² (英)博克舍:《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3-21页。

³ (英)博克舍:《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导言”,第36-37页。

⁴ (英)博克舍:《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63-71页。

⁵ 林金水、谢必震主编:《福建对外文化交流史》,第118页。

望高陪同被遣送回马尼拉，从此再也没踏上中国土地，西班牙与中国的第一次接触也告破产。不过，拉达在福建逗留期间，对福建社会有了一定的认识，他还从福建购买了一百多部中国书籍，在此基础上写就了《出使福建记》和《记大明的中国事情》两篇报告，留下其在闽台区域活动的历史证据。

在著作中，拉达对福建社会的记载和认识包含各方面点点滴滴零散的信息，涉及农业、道路交通、村镇、人口、物产、城市景观、城内街市、人民生活习俗、服饰、礼节、宗教信仰、官僚体制等¹，举凡种种涉及自然与人文的社会概况，都被收罗于拉达走马观花般的见闻和亲身体会；拉达一行还兼怀为殖民者打探记录军事情报信息的不光彩的行径，诚如杨钦章教授所指出：“西班牙人对中国海防力量仔细观察反映此行负有‘侦察中国’的使命，殖民军队和天主教会密切配合是西班牙实现殖民统治的重要手段”²。

拉达的两篇报道成为随后不久门多萨（J. G. de Mendoza）撰写《中华大帝国史》最为直接和主要的资料来源之一，如《中华大帝国史》的第二部的第一卷，就是根据拉达的第一篇报告并在此基础上详细叙述了拉达一行在福建的经历和见闻。

门多萨亦是奥斯定会修士，他潜心于学术研究，热衷于担负传教的使命，1575年拉达中国之行的报告传到西班牙，1581年西班牙王室曾计划实施向中国派遣使团，门多萨被委任为使团团长，帮助西班牙与中国建立联系。然而门多萨才到墨西哥就因为得不到支持而悻悻而归。虽然门多萨最终没有到过中国，但他在回国后广泛搜集资料，旁征博引，写成旷世奇作《中华大帝国史》³。该书所征引的资料包括了克路士、拉达及随拉达一同进入过福建的赫罗尼莫·马林（Lerónimo Marin）、米格尔·洛尔加（Miguel de Loarca）等人的作品，还有大量前人的使华报告、文件、信札及著述等，是一部体例十分完备、内容丰富而翔实的中国史志和资料汇编。此书在拉达等人之记述和报道的基础上，对福建的自然景观、建筑艺术、物产、人文风俗、科举教育制度、宗教信仰等，作了较为详实的描述，为西方世界传递了不少关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各个方面的文化信息⁴。该书于1585年在罗马付梓印行。出版后，在当时整个欧洲学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被一版再版。据统计，到16世纪末，门多萨的这部著作以7种不同文字（西、意、德、荷、法、英、拉丁）重印46次⁵，由此可见此书在当时欧洲之影响。著名汉学家莫东寅先生认为“此书为欧西东方学史上重要文集之一，实西洋关于中国专著之嚆矢，包括评述中国礼俗之西书也”⁶；方豪先生也认为“此书风行欧洲，即后出利玛窦之著作亦不能及”⁷，强调了该书在汉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三、荷兰人在台海地区的文化考察活动

荷兰是继葡、西而后起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因其在17世纪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霸主，被称为“欧洲的海上马车夫”。16世纪末，荷兰人开始逐渐称雄于世界海洋，1602年成立荷兰东印度公

¹（英）博克舍：《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171-222页。

²杨钦章：《西班牙奥斯定会士的首次泉州之行》，载《中外关系史论丛》第2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120页。

³（西）门多萨撰、何高济译：《中华大帝国史》，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

⁴（西）门多萨撰、何高济译：《中华大帝国史》，“绪论”第33-39页，正文第157-236页。

⁵吴孟雪、曾丽雅：《明代欧洲汉学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27页。

⁶莫东寅：《汉学发达史》，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46页。

⁷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册），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重印本，第971页。

司，发展对东方的贸易与交往。荷兰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活动，与福建社会结下了颇深的关系。荷兰人在台海地区的活动，从根本上看是出于发展对外贸易的需要，但是荷兰人却屡屡凭借海上军事力量对我国沿海地区进行武力进犯，特别是在1624年至1662年占据台湾近40年，给闽台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不安定的因素。清代初年，荷兰人与清政府关系若即若离，既有合作共同对付台湾，也有不断的冲突和矛盾。1683年郑氏降清后，荷兰人逐渐淡出中国海域¹。

以往学界在研究荷兰与闽台关系时，大多注意到荷兰人尤其是东印度公司对中国的殖民入侵和从事的海上贸易，即关注荷兰与福建沿海的经济贸易关系；还有对荷兰统治台湾期间的历史关注较多，而对于荷兰人对福建及台湾的文化事象之记载和报道，则鲜有涉及，目前学界对这一问题给与较多关注的是美国学者卫思韩（John E. Wills, Jr.）教授和国内学者林金水教授，后者在《福建对外文化交流史》中初步论述了荷兰文献中有关福建的记载，其中就有很多关于荷兰人对福建的报道和认识，为我们了解17世纪荷兰人视野中的福建社会，提供了一份很好的研究指南和参考。

荷兰人尤其是其东印度公司，在福建活动将近一个世纪，留下了汗牛充栋的档案资料，至今保存在海牙国家总档案馆。这些档案资料包括商业账项、日记与信件等，参考价值极大，生动再现了荷兰人在闽台活动的历史情景，并且最早最具体记述了在中外交涉中，中方的立场和态度，其细微到连天气的变化、官员的服饰、饮食起居、娱乐活动，甚至双方私人的私下交易也一览无遗地被记录下来。另外，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使节、商人、海员、军人等也频繁接触福建，“其时颇多之游历家，教士、海军、官吏等抵达福州，漳州、泉州，厦门，一带游历”²，这些人根据亲身经历，写下了许多珍贵的日记和记事、报告，这些档案资料和个人著述，对福建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和风俗等作了大量的记载和介绍，是当时荷兰和西方国家认识福建与台湾的主要信息来源³。

举例观之，在荷兰东印度公司档案文献中，有着福建史研究学者闻所未闻的类似中国笔记小说的记载。1663年10月16日，苗焦沙吾在泉州耿继茂帐篷中，目睹了郑氏将领杨富及其50名下属降清的仪式经过，仪式后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和娱乐活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群葡萄牙儿童表演的一出戏，他们是耿继茂抚养的专门用来向客人表演节目的儿童。这些儿童大概是从澳门购买来的亚洲或非洲的奴隶⁴。又如，荷兰档案中对福州天主教堂的记载也鲜为人知。1662年底，苗焦沙吾在福州会见了耶稣会士柏应理和何大化，并参观了他们的教堂。据苗氏记载，教堂的外表是中国寺庙的风格，内部装饰是中国化的，祭坛与香炉雕刻着龙和其它头首，完全是异端情调。只有有限的几张绘画与图片，才可以看出基督教的特征⁵。这对于我们理解明末天主教在中国“适应”的程度，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

在游历闽台的荷兰人所写的著作中，邦特库（Willem Ysbrantsz Bontekoe）的《东印度航海记》

¹ 有关荷兰在东南沿海的活动情况，前人学者已有较多的研究成果，可以参见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合订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41 年版；包乐史、庄国土：《〈荷使初访中国记〉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杨彦杰：《荷据时代台湾史》，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2000 年版；张维华：《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等书，这里不重复叙述。

² （美）麦克福（Franklin P. Metcalf）著、金云铭译：《十八世纪前游闽西人考》，《福建文化》第 2 卷第 2 期。

³ 参见林金水、谢必震主编：《福建对外文化交流史》，第 131-132 页。

⁴ Wills, Some Dutch Source on the Jesuit China Mission, 1662~1687, p. 67.

⁵ Wills, Some Dutch Source on the Jesuit China Mission, 1662~1687, p. 268.

一书可谓影响最大，该书荷兰文出版于1646年，是17世纪荷兰及至西方大众所喜爱的最畅销书之一，“在荷兰文学作品中所能夸耀的优秀旅行记中，没有一本能比邦特库船长那本著作更能深受欢迎而广泛流行”¹，该书曾一版再版，并被译成多种文字，风靡一时。此书的宝贵价值在于作者以亲身经历记载了荷兰人侵扰闽台的活动，可以弥补中文史料之不足。其中不乏以公正的态度，将其殖民主义行径披露于世。该书还记述了一些关于福建与台湾的社会文化信息，对于今人了解当时台海地区的历史与文化有所裨益。

四、英国人在福建沿海的植物考察

荷兰人淡出福建海域后，英国人继之而来。英国是继荷兰之后资本主义新兴大国，其殖民足迹遍布世界，1662年荷兰被逐出台湾后，英国人乘机而入，与郑氏集团建立贸易关系，在厦门设立工厂。至1676年，英国在厦门、台湾两地共投资黄金30000元，货物达20000元，而他们“在厦门建立的工厂，被认为是最佳的投资”²。英国人对在厦门贸易比在台湾更为重视，也更为成功。1681年郑氏退据台湾，英国人随之关闭在厦门工厂，转而决定在福州、广州建厂，对于福州通商，英国人早已注意到“在福州有交易之可能性”³。1688年英国人在厦门重开贸易，至1701年投资贸易额达34000英镑。此后，随着清政府闭关政策日严，英国人在福建海域贸易也逐渐萧条。可见，英国人早在明清交替之际就已经开始在我国东南沿海展开海上贸易，牛刀小试，这可以说是后来鸦片战争中英国人大规模的经济入侵和殖民侵略的渊藪之一，值得重视。

就在英国人与福建开展对外贸易的同时，一部分英国人十分注意采集中国东南地区尤其是福建的植物标本，他们对福建植物的考察，是西方人首次较具规模地对中国自然物产的探险采集，在中外关系史中有着重要的地位。1920年代于福建协和大学任教的麦克福教授对此一事象有着详细的介绍。据其研究，1685年，利班纳（Win Cheslaus Libanus）在厦门、舟山一带采集，其标本均寄给当时英国著名的植物分类学专家皮笛维尔（Petiver）和波拉克尼（Plukenet），其中有一羊齿植物还保存在伦敦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1695年，勃朗（Sam Brown）在厦门等地也采到不少植物，曾将乌柏种子传到英国，经8至10年后，种子生长成树。此外，还有1699至1700年，开尔（Kaier）、巴克莱（Barclay）两医士在厦门采集植物。而最重要、最著名的应推康宁罕爵士（Sir James Cunningham），他原是厦门及舟山公司的医师，1698年第一次来到厦门和鼓浪屿，同年回国。1701年8月13日第二次来华。1703年再到厦门，直至1709年回国，共采集600多种植物，皆送给他的好友皮笛维尔和波拉克尼等，后均完好保存在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其中38种标明采自厦门，有38种标明采自鳄鱼岛（即白犬岛，又名上沙下沙）⁴。英国人主要采集地点在厦门、舟山一带，说明“英国人在福建之作植物采集也，系与其在华商业发达史有直接关系”⁵。这些行为一方面大大丰富了植物分类学，在十七八世纪就向西方展示了福建植物种类的繁多与考察价值，扩大了福建在

¹（荷）威·伊·邦特库著、姚楠译：《东印度航海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译者序”，第2页。

² Philip Wilson Pitcher, *In and About Amoy, Shanghai and Foochow: The Methodist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a*, 1912, pp. 46-47.

³ 赖永祥：《郑英通商关系之检讨》，载郑成功研究学术讨论会学术组编《台湾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6页。

⁴（美）麦克福（Franklin P. Metcalf）著、金云铭译：《十八世纪前游闽西人考》，《福建文化》第2卷第2期。

⁵（美）麦克福（Franklin P. Metcalf）著、金云铭译：《十八世纪前游闽西人考》，《福建文化》第2卷第2期。

西方的影响，从而吸引着后来的西方探险者们来福建从事游历和考察；另一方面，它亦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对福建自然资源掠夺的见证。

五、明清耶稣会士在福建的传教与文化传播活动

1624年12月29日，意大利籍耶稣会士艾儒略随致仕归里的叶向高来到福州大地，开启了明末清初天主教在福建社会传播的历程。

艾儒略(Giulio Aleni 1582~1649年)，字思及，是利玛窦去世后又一辈声中西交通史的著名人物，对中西文化交流作出重大贡献，被中国士大夫誉为“西来孔子”¹，这么崇高的名誉，即使是其前辈利玛窦也未获得。他出生在意大利北部阿尔卑斯山下的布雷西亚城的尼诺(Leno)镇。Aleni即尼诺人的意思。他1600年加入耶稣会，1609年被差往东方传教，1610年抵达澳门，1613年获准进入中国内地，先后在河南、北京、上海、山西、江苏等地活动。1624年，他在杭州遇见致仕归里的原相国叶向高。叶向高对耶稣会士早有好感，曾是利玛窦的好友。此时与艾儒略会晤，相见恨晚，力邀他入闽。而艾儒略也有在福建传教之意，他们遂同舫南下，1624年12月29日抵达福州²。艾儒略在闽活动达25年之久，八闽大地，周游殆遍，每至一地，便与士大夫雅善晋接，广交朋友，传播教义，引导士人和平民百姓入教。据林金水教授考证，艾儒略在福建交游过的人数约二百零八人，超过其所考的利玛窦在华交游的士大夫人数。这些人中，上有卿相，下至士庶，而居多数者则是青衿儒士和地方缙绅，如儒学教官、庠生和贡生之类。他们是艾儒略在闽传教活动的社会基础与依靠对象。这一点同利玛窦主要结交朝廷大员迥然相异。在艾儒略的劝化下，“每年授洗约八九百人”。在闽期间，艾儒略“共建大堂22座，小堂不计，授洗一万余人”³。使元代以后一度沉寂的天主教又在福建复苏和传播。在他要求和影响下，其他耶稣会士也开始纷至沓来，协助艾儒略传教。他们主要来自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在福州、福清的有卢安德和林本笃；在建宁的有瞿西满、穆尼阁，在泉州有聂石宗，在南平有阳玛诺。明朝灭亡前，耶稣会士已在福州、延平、建宁、邵武、泉等府以及福宁州、建宁、福安两县建立住院⁴。

耶稣会在福建传播天主教，得到了南明政权隆武帝的支持和保护。福州天主堂是由艾儒略和叶向高长孙高州君兴建的。一日上(隆武帝)睹之，嫌其湫隘，谕令改建，“谓规制未壮，不足为上帝歆格地。乃式廓而轮奂之，树坊于门曰：‘敕建天主堂’，而(赐)匾于堂曰：‘上帝临汝’”⁵。唐王锡朱聿键在未登极之前，与耶稣会士已有交情。他曾因起兵勤王，得罪崇祯皇帝，而被废为庶人，“亲族不愿归附”，而耶稣会士毕方济“待他独厚”。隆武帝即位后，为感恩，欲邀请毕氏来闽供职，欲委以重任，并赠诗一首“今余登极八闽，今梁(毕方济字)奉召来朝，进颂含规，文叔云狂奴故态。诗以裁答，兼弁文首。天地年年故，蟾午日日新。金兰一友道，囊龠五人伦。怜彼华夷苦，拯余方寸仁。借旒安世后，太昊委来真。”⁶由于耶稣会士与隆武帝的这种特殊关系，他们都把福建天主教的发展，寄托于隆武帝身上。然而，隆武政权存在不到二年即告灭亡，耶稣会士的希望也随之

¹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85页。

² 林金水：《艾儒略与明末福州社会》，《海交史研究》，1992年第2期。

³ 萧若瑟：《天主教传行中国考》，河北献县天主堂1937年印，第200~202页。

⁴ Joseph Dehergne(荣振华)，S. J. Répertoire des Jesuites de Chine de 1552 A 1800, pp. 352~353.

⁵ 李嗣玄：《泰西思及艾先生行述》，巴黎国家图书馆，中文编号1017(无页码)。

⁶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第1册，香港公教真理学会出版，1970年，第201页。

破灭。

清军入主福建后，在朝廷，顺治皇帝对耶稣会士汤若望宠幸有加，授予他太常寺卿，诰封通议大夫，又御制“钦崇天道”匾额，送给天主堂悬挂，赐汤若望“通玄教师”。在地方，提督福建军务、巡抚福建都御史佟国器，是顺治正宫皇后的从弟，康熙外祖佟图赖之侄。在京时，佟国器对天主教早有夙闻，久为心折，他夫人已受洗入教，被耶稣会称为“亚加大夫人”（Madame Agathe），与徐光启的孙女“甘第大夫人”齐名。佟统兵南下，沿路遍访耶稣会士，加意保护他们。因此，清初福建天主教在巡抚佟国器庇护下，不但没有因明亡而亡。相反，传教的社会环境条件更加有利。顺治十二年（1655年），地方军政主要官员部院佟代、提督杨名高、藩司周亮工、臬司董名魁、大参郝惟纳、学使朱自洙、兵使祖建衡，以及监司诸郡邑侯、诸缙绅士庶，捐资重建福州天主堂，并勒石为记，由佟国器撰文并篆额。碑文最后说：“今天子定鼎之初，以汤子道未，擢太常寺卿，兼司天监，治历明时，咨诸会士，分寓四方，测度阐学。而何子德川乃复入闽，于福州省会，建堂瞻礼。余因思，中国居亚细亚洲十之一，而亚细亚又居天下五洲之一，东海西海，心同理同，敬天主爱人之说，皆吾人践修之所不能外也。而西士不惮险阻风波，来相勤勉者，岂有他哉？亦惟其教以敬天地之主为宗。故以爱天主所爱之人人为务焉耳，爰为之捐资鸠工，开其旧基，焕其堂宇，崇奉天主耶稣与圣母天神，永为会士阐道之所，与闽之士大夫，暨四方昭事君子，瞻像究心焉。”¹佟国器晚年在南京受洗入教。

清初在福建活动的耶稣会士，主要有碑中提到的何子，即何大化，字德川。何大化1648年到福州，与佟国器关系甚密，佟曾为何大化的《天主圣教蒙引要览》作序：“泰西何子斯篇，名曰《蒙引》，要使贤愚共喻，笃信立行，虔以奉天，而恪事其主；洁己爱人，虚心体道，终身惕若无贰虞，操持至积久而纯熟，寂度一室之内，俨然有天主以临之，所提撕警觉者，在在然矣。宁于凡庸之俦，驰骛征逐，事务纷颐，而莫知所适从，惟翘首而终始致叹于清虚碧落之邈不可即也，岂不重可惜哉！”何大化在该书自序中，对佟国器大加赞赏，“兹缘大中丞佟公弘功济世，大德匡时，捐俸建堂，崇尚天学；广搜西书，表彰正道。”²

康熙初，因杨光先挑起的历法之争，何大化同其他耶稣会士被押解到广州。这时，福建天主教与全国教会一样，受到了挫折，教堂被改作庙宇。康熙亲政后，历狱得到平反，何大化获赦准许回到福建。1669到1672年，为第13任耶稣会华南副省会长（艾儒略为第3任，1641~1649年），1677年卒于福州。

清初来闽的另一个耶稣会重要人物，是比利时的柏应理，他是四书拉丁文译本《中国哲学家孔子》的主要译者之一，被称为“把中国带回欧洲的人”。柏应理于1661年来福州，1663年应连江教徒的要求到该地布道。他在闽期间，正值清政府准备与荷兰东印度公司联合打击郑氏集团。柏应理是佛兰芒人，讲荷兰语，与东印度公司官员关系密切，向他们通报有关福州情况，让他们参观耶稣会在福州的教堂³。而有关福州教会的情况，也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由雅加达传到欧洲。

¹ 萧若瑟：《天主教传行中国考》，第271~272页。

²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第2册，第51页。

³ Jerome Heydrickx ed., Philippe Couplet. S. J. (1623~1693), Nettal, 1990, pp. 97-98.

在康熙下令禁止天主教之前，耶稣会士不时有人来福建。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象征主义者傅圣泽，于1699年到厦门；卜纳爵于1701年到汀州；还有1713年奉康熙之命来闽测绘地图的冯秉正。与明末相比，顺治康熙年间，耶稣会在福建有了更大的发展，在汀州和漳州又新设立了住院，来闽耶稣会士人数也多于明末。1664年，福州教徒为2000人，延平3600人，建宁200人，邵武400人。兴化、连江、长乐等地共有圣堂八座，会口8处。1701年，福建耶稣会住院7所，圣堂7座，教士6人¹。后来，随着礼仪之争愈争愈烈，1715年在福建籍官员上疏要求下，康熙下令禁止天主教。此后，耶稣会在福建势力逐渐消失。

明清之际艾儒略等西方传教士在福建开展传教活动、宣传和介绍天主教义理的同时，也把西学传入了福建社会。其中最集中反映西学在福建传播的是，崇祯十年（1637年）在晋江景教堂刻印出版的、由艾儒略撰写、相国蒋德璟校阅的《西方答问》。该书是当时中国人了解欧洲的一个窗口，它以一问一答的形式，实际上即是艾儒略与福建士大夫的对话，满足和解决中国士人提出的对西方充满好奇的一系列问题，大的如天文、历法、地理、政治、经济等问题，小的如饮食、人情、婚配、医药、丧服等西方的风土人情。此外，耶稣会传教士在八闽各地传教的同时，也掺杂传授一些西方的科学技术。还有就是通过福建士大夫在全国各地与传教士交游与接触，吸收到西学知识。这就是西学在福建传播的三个主要途径。

举例观之，艾儒略除了在《西方答问》中解答有关西方天文知识外，在福建各地布道时，还向教徒介绍了许多他们闻所未闻的知识，如关于昼夜长短和极昼极夜问题，中国人深感惊讶，连徐光启也“深求而不得”。对于利玛窦等耶稣会士传入的世界地图，福建士大夫多有看过，但他们未必都看得懂，因此他们借此机会向艾儒略请教。如福建士大夫问得最多最集中的问题主要是关于世界地图的经纬度、地圆学说、万有引力原理、地分五带、彩色描绘世界地图、时差问题等，艾儒略的回答及其所介绍的是近代西方地图测绘学的基本常识，与利玛窦介绍世界地图知识所不同的是，他做的是通俗性的科普宣传，而且其对象主要是福建士人。应福建士大夫的要求，艾儒略对西方的医学也作了介绍，“其医有内外二科，内科又分为二，有专以草木为药者，亦有兼用金石锻炼之药者，其看病诊脉之外，以玻璃瓶盛溺水，验其色，识其病根，又知病概由败血而生，则初病多以开脉出败血为法也”²；艾儒略还介绍了西方的建筑，“敝邦造室与贵邦稍异，大都以砖石为墙，墙基量墙之高而深称之，纯用砖石沙灰，少用木柱板壁，图其安住久居，而预防火患也。……”³。其他如西方政治制度、哲学、法律、教育、物产、手工业制造、金融货币、商贸、风土人情、生活礼俗、文化艺术等，艾儒略都一一作了回答和介绍，满足了福建士大夫求知猎奇的心态，也传播了西方文化的表现形态。

除了《西方问答》，艾儒略还编撰有《万国全图》、《坤舆图说》、《识方外纪》、《西学凡》、《几何要法》等介绍西方科学文化的作品，对于当时福建士大夫和中国知识界了解西学和西方社会文化，打开了一扇扇明亮的窗户。

¹ 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年版，第239~243页。

² 艾儒略：《西方答问》卷下，第19页。

³ 艾儒略：《西方答问》卷下，第21~22页。

六、福建与中西礼仪之争

礼仪之争，是17~18世纪中西历史上就中国祭祖、祭孔礼仪问题发生的一场大争论。这场争论，整整延续了一个多世纪，对东西方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中西交通史上的一件大事。福建与中西礼仪之争，有着极其特殊的联系，它自始至终都处于礼仪之争的漩涡中。礼仪之争的星星之火首先在福建点燃，其后又是在福建燃成熊熊大火，把礼仪之争推向高潮。许多福建奉教士大夫因此而卷入这场论争，对礼仪之争发表了他们的观点，最后又是福建士大夫率先提出禁止天主教，宣告礼仪之争的结束。

明末天主教传入中国后，以利玛窦为首的耶稣会士采取迎合儒家思想的“适应”策略，该策略之一就是允许中国信徒祭祖祭孔。耶稣会士艾儒略等来闽后，继承利玛窦的“适应”策略，允许教徒祭祖、祭孔。但是天主教内部、不同修会之间，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明末耶稣会来华之后，经教皇克勒门八世诏准，托钵修会（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也相继登上中国国土。1632年，西班牙多明我会士高琦由菲律宾，经台湾淡水，抵福安传教。次年，多明我会士黎玉范和方济各会士利安当应高琦神父邀请，也来到福安。方济各会士利安当来福安之后，曾跟随一个姓王的教徒学习中文。一天学到“祭”字时，王教徒向他解释说，“祭”相当于天主教“弥撒”，王还承认当时中国教徒可以祭祖、祭孔。为查明事情真相，黎、利二人在福安穆阳缪家祠堂参加中国教徒举行的一次祭祖礼仪，他们断定这些礼仪具有迷信色彩，应予以禁止。但福安原来是耶稣会的地盘，教徒有一部分是经艾儒略洗礼的，他们向艾儒略写信通报了情况，要求艾儒略对是否允许祭祖给予明确答复，而艾的回答是肯定的。这事使利安当感到恼火。为此，耶稣会士林本笃向利安当作了说明。1635年11月22日黎、利二人来到福州，和当时耶稣会副省会长傅汎际开会讨论祭祖问题，会上，他们提出13个问题要耶稣会士作解释。耶稣会士继续坚持原来的观点。双方月协商无效之后，托钵修士开始搜集材料。12月22日，他们在顶头私设法庭，招来11个教友，审问关于祭祖的细节。最后命他们在口供上画了押。1637年6月，利安当亲自将这份口供送到马尼拉，要求马尼拉大主教召开由神学家和宗教法学家参加的会议，遭到菲律宾耶稣会士的反对。后来，马尼拉大主教上书罗马教皇，要求谴责耶稣会的做法。而耶稣会远东巡视员李玛诺，获悉马尼拉大主教上书教皇信件副本后，立即致信马尼拉大主教，逐条驳斥了托钵修士的指控。1643年，黎玉范又亲自赴罗马游说，在向传信部报告中，提出17个问题。1645年，继任教皇英诺森十世发出通谕，正式作出答复。该通谕禁止中国教徒参加在孔庙举行的祭孔和在祠堂、家中举行的祭祖礼仪。这样，礼仪之争的星星之火，因福安教徒一“祭”字解释而点燃，并由福建至马尼拉，至罗马，最后燃成遍及东西方的燎原大火¹。

福建士大夫介入礼仪之争，大约在17世纪70年代。引发他们参加这场大辩论的是，方济各会士万济国写的一本小册子《辩祭》。万济国是礼仪之争的强硬派，他曾被福建督臣刘斗由福州州盘获而遣送广东。清初历狱平反后，南怀仁上疏康熙皇帝，请求准许万济国随同何大化回到福建。《辩祭》是他在礼仪之争发源地福安写的。它以传教士与福安秀士问答的形式，来表明托钵修士的立场和观点，在福建曾一度广泛流传。1681年，福州的耶稣会士李西满（Simao Rordrigues, 1645~1704）

¹ 详参林金水：《明清之际士大夫与中西礼仪之争》，《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西礼仪之争在福建》，《教育评论》1995年第3期。

发现《辩祭》一稿，认为值得商榷。于是他发动福建教徒批判该书。如福清李良爵写的《〈辩祭〉参评》，漳州严谟写的《辨祭》、《考疑》等。除此之外，耶稣会士为了在礼仪之争中替自己的立场观点寻找辩护的材料，曾向中国奉教士大夫了解他们对礼仪之争的看法，向他们发出调查提纲，要他们回答各种问题，因此，福建士大夫又写了不少为礼仪之争作辩护的著作，如李九功的《礼俗明辩》、《摘出问答汇抄》、《证礼刍议》，严谟的《李师条问》、《祭祖考》、《木主考》、《草稿》（两篇），及复耶稣会士穆若望瑟的信，将乐邱晟《致诸位神父书》，建瓯夏相公《回方老爷书》、《生祠缘由册》、《生祠故事》、《祭礼泡制》、《〈礼记〉祭制撮言》和《礼仪答问》。以上都是未发表的手稿，现保存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十分珍贵。在这些奉教士大夫中，有一些人从他们的父辈开始就信教，如李良爵为李九功（讳其香）之子，李九功曾是艾儒略的信徒，著有《励修一鉴》，并参与校辑其兄李九标汇编的艾儒略在福建的传教言行录《口铎日抄》。严谟是严赞化（字思参）之子，也是艾儒略的信徒和得力助手，严赞化为顺治年间漳州府学恩贡生，严谟为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龙溪县岁贡生。邱晟为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进士，官居“内阁中书，改授浙江诸暨县知县”。这些奉教士大夫，以他们所接受和理解的西方基督教神学观点，与中国传统的礼仪和风俗作了比较研究，广征博引古代经典，如《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周礼》、《仪礼》、《论语》、《中庸》、《白虎通》、《开元礼》、《文献通考》、《家礼》、《大明集礼》等，对儒家丧礼祭礼的理论作了全面的回顾和探讨，诸如祭风云雷雨、日蚀月蚀行礼、祭斋沐浴、子婚女嫁告祠堂、官长备酒行礼、家内祭五祀神、敬城隍、武官祭旗纛神、祭孤魂、民家备酒行礼、历代帝王庙人过下马、择地、祭关王、立生祠等问题，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看法。他们从祭祀祖先非为求福，其意义只是报本反始、追养继孝、事死如事生，以及教人和睦等方面，来论证它的非宗教性。

福建奉教士大夫除了对礼仪之争中有争议的问题发表他们的看法外，对于一些事关全局的原则问题，也表明了他们的态度和立场。首先，他们认为争论双方应该心平气和，虚己以听。其次，他们认为要明断中国事，必须详查中国书籍。再有，他们认为，天学（超性）和儒学（本性）两家不要相互指责，而要相互补益。最后，他们还向传教士提出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要变中土为西洋¹。福建奉教士大夫在礼仪之争中的言论和建议，表明了中国教徒在这场论争中的立场和态度，他们有的言论与他们的老师如出一辙，如在祭祖与敬孔上，有的则是学生对老师提出的批评与挑战，说明学生还有相对独立的个性，而不是一味盲从。然而，无论是迎合，还是批评，他们的心态十分矛盾，既希望基督教在中国广泛传播，又不希望中国变成西洋，既要捍卫儒家思想的正统性，又要忠于外来信仰的神圣性，他们只能在两者之间徘徊，搞平衡，舍此，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

礼仪之争不仅在福建和中国社会引起轩然大波，对西欧社会更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不仅涉及罗马天主教廷，还波及欧洲思想文化界。天主教传教士寄回欧洲的书信报告也被欧洲思想文化人士透悉，因礼仪之争涉及中国儒家文化的多个方面，也使得中国思想文化在欧洲思想界得以传播和扩散。这种知识的传递和文化的传播，如同一石激起千层浪，扩散出阵阵涟漪。特别重要的是，这场争论给欧洲知识界带去的思想理论源泉作用，使得他们利用中国文化中的相关要素，批判封建专制和思想禁锢，开创了启蒙思想运动的潮流。

¹ 参见林金水主编：《福建对外文化交流史》，第255~268页。

七、朱熹理学在西方的传播和影响¹

朱熹理学是福建中古文化的集中体现，它在西方的传播与影响，是福建文化对外传播和影响的最具体反映。明清之际，朱熹理学传到西方，主要有三个途径：

（一）通过耶稣会士利玛窦等人对朱熹理学的否定和批判，被动地、无意地传到西方。利玛窦的《天主实义》，是无意地传播理学的最有影响的一部著作。该书以“中士”、“西士”问答的形式，从基督教立场出发，对“太极”和“理”作了批判性介绍。利玛窦对理学的批判是比较温和的，是有限的。然而，这种温和态度成了一些人攻击耶稣会士与自然神论妥协的把柄，其中最激进的是龙华民，他猛烈抨击朱熹理学，经过龙华民的批判，朱熹理学被改头换面成了无神论的思想范畴。但他反对理学愈力，理学在西方的影响反而愈深，表面看“似乎是宋儒理学的厄运，现在看来却正是宋儒理学的幸运。”²因此，龙华民反倒成了早期向西方介绍理学的主要人物。后来，莱布尼茨主要就是从小华民的著作中获得朱熹理学思想。

（二）通过耶稣会士翻译的《四书》，不自觉地、间接地把朱熹理学传到西方。朱熹编辑的《四书章句集注》，是朱熹重要的理学著作之一，它“以经书注解的形式，宣传了自己的理学思想”³。在这部著作中，朱熹阐扬微言大义，谈析指理之际，无不反映出他本身独特的立场，即所谓“新儒学”的真精神。明末传教士来华后，不仅自己要学习《四书》，为了让西方人更多地了解儒家思想，从16世纪80年代末开始，耶稣会士持续不断地把《四书》译成西方的文字，从第一部《四书》译稿——罗明坚的《大学》，到17世纪初西方第一部完整的《四书》译本——卫方济《中华帝国六典》的问世，历经整整一个多世纪。《四书》中体现的朱熹理学思想，正是伴随这个翻译过程，间接或直接、自觉或不自觉传到西方。明清之际，《四书》译本在西方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柏应理等人翻译出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子》，该译本对朱熹理学的传播，还不在于译文间接采纳了朱注，而更主要的在于长达100页的题为《说明性的讲解》的《前言》中，对理学作了大量介绍。

（三）通过耶稣会士中象征主义者对朱熹理学的附会迎合，正面地、直接地把理学思想传到西方。象征主义者是儒家思想与基督教思想相容的最激进的拥护者，不但对古代儒家思想全盘接受，而且对宋明理学也加以全面肯定，要把朱熹理学解释成对基督教更有补益的思想，并试图证明朱熹理学思想不是无神论与唯物主义。在这些象征主义者中，马若瑟是最活跃的一分子。1728年9月28日，他写的题为《有关中国一神论的信札》（*letter sur le Monotheisme des Chinois*），对朱熹理学作了最详细的介绍。在这封信札中，他引用大量的中文资料论证朱熹理学是一神论。马若瑟认为朱熹不是西方学者所说的无神论者，恰恰相反，他是有神论者。值得指出的是，马若瑟在《信札》中还向西方读者介绍了福建朱子学者的观点。如他在对《大学》“明德”作诠释时，先引用朱熹的注释，后又引用蔡清⁴对朱注的评论。

明清之际传到西方的朱熹理学，对西方不同时代、不同阵营里的思想家、哲学家产生影响。其

¹ 详参林金水：《明清之际朱熹理学在西方的传播与影响》，载《朱子学刊》第六、七辑，1994、1995年。

² 朱谦之：《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5页。

³ 邱汉生：《朱熹〈四书集注〉的天理论和性论》，《中国史研究》，1979年2期。

⁴ 蔡清是明代福建朱子学者，字介夫，号虚斋，晋江人，成化丁酉（1477年）乡试第一，甲辰（1484年）第进士，授礼部郎中。

主要表现在：(1) 对西方怀疑论的影响。17、18 世纪的西方怀疑论，曾是进步思想家和哲家用以抨击和反对教会与经院哲学的思想武器，他们认为世俗、宗教、伦理的权威，是对人的思想的禁锢，只有自由之路才能使人们从这些禁锢中解脱出来，当时主要代表人物有笛卡儿和培尔。(2) 对偶因论的影响。偶因论从笛卡儿的二分化，走向彻底的宗教唯心主义的一元化，其主要代表人物有马勒伯朗士，其哲学名著为《一个基督教哲学家和一个中国哲学家的对话——论上帝的存在与本性》。(3) 对法国启蒙运动思想的影响。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领袖人物伏尔泰，同样也受到朱熹理学的影响。但与培尔不同，他受到的是朱熹理学有神论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他更多地受到象征主义者的宣传，尤其是傅圣泽。(4) 对莱布尼茨单子论¹的影响。莱布尼茨的单子论，与朱熹理学有许多极相似之处，对于朱熹的“理”与莱布尼茨的“单子”，美国学者秦家懿作了较为深入比较研究，认为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²。

八、结 语

明清之际，东西方交往以“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发展为契机，在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的殖民扩张的背景下，东西方文化交流开始了新一轮的进程。地处东南沿海的福建，在此一时期成为双方碰撞的重要交汇点。西方人借着殖民者扩张的“东风”，在福建沿海地区积极开展文化探察工作，这些活动对于西方人了解和认识中国，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西方世界藉此获得东方的种种知识，如拉达在福建购置的大批中国经典书籍，成为西人认知中国儒学文化的重要来源。这些都为日后欧洲的“中国热”奠定一定的基础。西方人前期的文化活动为西方天主教再次传入中国打探了先路，自明中后叶至清初，天主教传教士络绎不绝来到中国，开展了较大规模的传教活动。在传播宗教的同时，他们也将西方的科技文化和思想学说传至中国社会。以艾儒略为代表的天主教传教士开创了在福建传教的局面，同时，也积极践行着“学术传教”的适应性策略和路线。西方传教士将西学传播至福建的同时，也以这里为窗口，将福建文化的精华以及中国文化诸方面的知识信息（如朱熹理学思想等）传播至西方，成为沟通东西方思想文化交流的桥梁。礼仪之争的战火在福建的点燃，引发了东西方世界旷日持久的大争论和大讨论，此一过程本身也是东西方知识文化相传递的时期，礼仪之争最终结果是导致天主教在福建、在中国之传教被禁，也导致了东西方文化那种平等双向往来的管道被切断，中国日益内卷和封闭，而西方则继续走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并走上了一条向全球扩张和蔓延的罪恶之路。一百多年后，当东西方世界再度开启文化交流的大门时，世界的格局已经发生了惊天变化，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模样，再也回不到当年那种借由“海上丝绸之路”而进行着平等交流和对话的局面。

作者简介：

吴巍巍，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林金水，福建师范大学中国基督教研究中心教授。

¹ 单子论是莱布尼茨客观唯心主义体系的核心。这种理论认为，构成世界万物的基础是单子，单子是一种没有部分、不占有空间的东西。它不是物质性的存在物，而只能是一种精神的实体。一个单子中的变化和另一个单子中的变化之间有一种“前定和谐”。实际上，单子是一种灵魂。

² 秦家懿：《莱布尼茨和中国理学思想》，《中国哲学史研究》，1983 年第 4 期。

福建与海上丝绸之路的 历史渊源及重要贡献

徐文彬

内容摘要：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及范畴加以界定，分阶段探讨福建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渊源，指出其兴于隋唐、盛于宋元，明清仍维持强劲势头，直到近代，才渐趋衰落。福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不仅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促进中西交流碰撞，推动明清中国变迁，而且促进台湾与东南亚的开发，改变西方社会的消费理念，其影响极为深远。特殊的地理位置，经济中心的东移、区域开发的不断深入，是福建能够在海上丝绸之路扮演重要角色的原因所在。

关键词：福建 海上丝绸之路 历史渊源 重要贡献

福建地处东南沿海，北与浙江毗连、南与广东相接、与台湾隔海相望，海岸线长达 3324 公里，大小港湾多达上百处，特殊的地理位置，使福建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枢纽，海上丝绸之路的门户。

一、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及范畴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Richthofen, Ferdinand von)在《China: The results of My Travels and the Studies Based Thereon》一书中，首次提出“丝绸之路”的概念，原指两汉时期中国与中亚河中地区以及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其后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A. Herrmann)在《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丝路》(柏林，1910年)将丝路延伸至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确定了丝路的基本内涵。¹海上丝绸之路“使用越来越广泛，其外延也越来越大，甚至成了中西乃至整个中外多领域交流的代名词。”²该商路以丝绸命名，是因为中国丝绸主要通该商道远销中亚、欧洲，享有盛誉，以致当时希腊和罗马称中国为“丝国”。如中国在拉丁文译成 sina，即源于古希腊文 Sinai(丝)。丝绸之路形成于两汉时期，此后两千多年岁月，成为中外陆路贸易的主干道。

1903年，法国汉学家沙畹(douard mmanuel Chavannes)提出：“丝路有陆、海二道，北道出康居，南道为通印度诸港之海道，以婆庐羯为要港”。³首次提出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但未能被学界立即接受。1967年，日本学者三杉隆敏出版专著《探索海上丝绸之路》，产生较大影响。70年

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中国大百科全书 中国历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611页。

2耿昇：《法国汉学界对丝绸之路的研究》，《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第11页。

3沙畹 著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中华书局，2004年，第167页。

代初，香港学者饶宗颐在《蜀布与 Cinapatta——论早期中、印、缅之交通》一文的附论部分《海道之丝路与昆仑舶》，专门讨论了以广州为转口中心的海道丝路。80年代，国内学者陈炎正也致力于此方面研究，后将其成果辑成：《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此后，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展海上丝绸之路考察活动及一系列相关学术研讨会的召开，海上丝绸之路的影响不断扩大。¹

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海上丝绸之路较之陆上丝绸之路，交易大宗商品除丝绸外，还包括瓷器和茶叶，尤其在明清时期，瓷器和茶叶外贸金额更是大幅超过丝绸。因此学界又有“丝瓷之路”、“丝茶之路”、“茶叶之路”的不同称呼，“但丝绸出口贯穿始终，称丝绸之路可以涵盖全体，且更形象，更具浪漫色彩，业已被广泛接受。”²随着研究的渐趋成熟，一些学者专门探讨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如赵春晨对“海上丝绸之路”作如下定义：“它是以丝绸贸易为象征的、在中国古代曾长期存在的、中外之间的海上交通线及与之相伴随的经济贸易关系”。³但笔者认为，丝绸之路作为地理空间概念，它不仅代表中外经济贸易关系、还表现为中外政治文化交流，是依托该商道，古代中外友好关系的综合反映。如张骞出使西域、郑和七下西洋，主要是政治行为，无强烈的经济动机。就范畴而言，唐宋以来，朝鲜、日本、琉球等国与我国往来频繁，深受中华文化的影响，因此海上丝绸之路不仅包括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波斯湾、红海，远抵欧洲的南海航线；还应包括前往日本、朝鲜的东海航线，甚至应将十六世纪后兴起的跨太平洋航线，抵拉丁美的航线纳入其中。对于海上丝绸之路的时间下限，是否延伸至近代成为学界争论焦点，陈炎主张除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外，近代亦有海上丝绸之路，林士民、沈建国以宁波港为例，将近代视为海上丝绸之路萎靡期，陈高华研究员则认为鸦片战争的爆发标志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终结。赵春晨亦认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下限是作为古、近中国历史分界的鸦片战争。由于近代开埠后，中国社会变迁剧烈，较之传统社会呈现诸多不同，尤其在国际关系方面，反映诸多时代特征，但通过对历史连续体的考察，能够对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有更为深刻的理解，更准确把握其时代内涵及特殊地位，更好地实践“以史为鉴”的治学理念，因此本文将近代也纳入考察范围。

二、福建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渊源

海上丝绸之路是指历史上我国通过海路与各国所形成的贸易网络，由于出口的商品以丝绸、瓷器为大宗，又有“丝瓷之路”之称。它与陆上丝绸之路相辅相成，成为我国与各国友好往来，发挥国际影响力的主要途径。在二千多年的岁月中，海上丝绸之路的随国际形势而不断演变，福建凭借其特殊的地缘优势，在该商贸网络的地位逐渐凸显。

秦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初步形成。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派遣大军南下，征伐百越，设置桂林郡、象郡、南海郡、闽中郡，将两广及福建地区纳入了秦朝的版图。汉朝建立后，随着国力的强盛，汉武帝除派遣张骞凿空西域、开辟以长安为起点，途经河西走廊，远抵安息（波斯，即今伊朗）的陆上丝绸之路外，并积极经略南方，开辟以徐闻、合浦为起始港，途经印度、斯里兰卡的海上丝绸之路，使华夏器物行销西方，深受罗马贵族的喜爱。福建虽设立闽中郡，但开发有限、文教未兴，在海外

1 参见：陆芸《近30年来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述评》，《丝绸之路》，2013年第2期。

2 冯定雄：《新世纪以来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热点问题述略》，《中国史研究动态》，2012年第4期。

3 赵春晨在《关于“海上丝绸之路”概念及其历史下限的思考》，《学术研究》，2002年第7期，第90页。

贸易体系中扮演中转枢纽港角色，对外直接联系较少，如《后汉书·郑弘传》记载：“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风波艰阻，沉溺相系”。以致郑弘上奏，“开零陵、桂阳峽道”，改海陆运输为陆路运输，可见当时途径东冶（今福州）的航线并不成熟。

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北方地区陷入分裂，少数民族政权林立，战乱不断，局势动荡。中原士民为此纷纷南下，推动南部地区的开发，对外联系日趋频繁，航海贸易逐渐兴盛。如孙吴政权曾派卫温、诸葛直率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澶洲”，后“但夷洲数千人还”，夷洲即今天台湾，可见当时航海技术已较为先进，能够支持数万人军队渡海作战。随着对外交流的频繁，中国与东部岛国国建立密切关系。邪马台女王卑弥呼多次派遣使者赴华，被尊为亲魏倭王，赐以金印。许多波斯萨珊商人、天竺僧侣也通过海路，来华经商、传法。南海（广州）超越交趾，成为南方海外贸易的主要港口。福建逐渐崛起，在海上丝绸之路中扮演重要角色。如孙吴政权在此设立典船校尉、建立温麻船屯，作为造船的重要基地，后又在此基础上，设立温麻县，隶属晋安郡（今福州）。天竺优禅尼国僧人真谛取海路经东南亚来到广州，在梁朝都城建康等地弘法，后欲归国，辗转至晋安郡（福州），“遂欲汎舶棱伽修国。”因“道俗虔请，结誓留之”而作罢、后“又汎小船至梁安郡（泉州），更装大舶，欲返西国。”¹此处棱伽修国指马来半岛、西国指天竺国，而福州、泉州均能乘船前往，凸显其与海外交通亦趋于成熟。

唐代前期，李世民统一全国后，趁东突厥内乱之际，迅速将其平定，被四夷君长推戴为“天可汗”，并派兵征服高昌、焉耆、龟兹等国，设立安西都护府管辖四镇，恢复汉朝对西域的治理，陆上丝绸之路遂得以畅通，敦煌、阳关、玉门等地成为沿途商业重镇。与此同时，随着大运河的开通，南北经济文化的不断交融，吸引大食商人、日本遣唐使远渡重洋，来到中国经商、求法，学习先进的中华文化，在南北丝路共同支撑下，唐朝国势臻于顶峰，成为闻名世界的礼仪之邦，万邦来朝，经济极为繁荣，长安成为世界第一大都市。然后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势渐衰，回鹘、吐蕃崛起，安西四镇先后被攻陷，陆上丝绸之路几乎断绝。与此同时，北方的藩镇割据，不缴赋税，唐王朝只能依赖依靠东南沿海地区，维系运作。为开辟税源，唐王朝出台诸多措施，在广州等地设立市舶司，推动海上贸易发展，在诸多因素影响下，海上丝绸之路遂超过陆上丝绸之路，在我国对外贸易体系中占主导地位。广州作为南海交通最重要的港口，不仅有“蛮舶之利，珍货辐凑”，而且番人众多，数以万计。除广州外，扬州、明州、登州也成为重要的商埠。福建亦在海上丝绸之路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贝（约 951-911）在其著作中，将 Khanfou（广州）、al-wakin（交州）、Djanfou 和 Kantou（扬州）列为中国四大贸易港之一。桑原鹭藏（1870—1931 年）经过考证，认为 Djanfou 即泉州。²许多外国人在泉州生活定居，甚至长眠于此。在泉州东郊灵山，仍保存有该时期修建的伊斯兰教圣墓。福州作为福建的核心区域，亦是重要的对外商埠，据立于唐大中 10 年（856）的《球场山亭记》残碑记载，福州：“迹时廛闾阗阗，货贸实繁。”商业极其兴盛，但“海夷日窟，风俗时不恒”，海夷即指前来经商的胡商，由于数量众多，以致影响城市风俗。除商人外，日本空海等僧人也来福州开元寺求法，归国后创立密宗，均凸显福建在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

¹道宣《续高僧传》卷一，“拘那罗陀传”《大正藏》第 50 册，第 430 页。

²参见：苏基朗：《刺桐梦华录》，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13 页。

性。五代十国时期，王审知积极发展闽国海外贸易，招徕海中蛮夷商贾，并开凿黄崎海道，设甘棠港，成为链接南北海运的重要枢纽。

北宋建立后，虽然结束长时期分裂局面，却饱受辽国、西夏等国的军事威胁，陆上丝绸之路受到极大影响，因此海上丝绸之路成为宋代政府财政的重要来源。尤其在靖康之变后，南宋政权更积极发展海外贸易，使海上丝绸之路范围不断扩大，出现一批新兴的港口。除传统的大港外，江南等地的镇江港、青龙镇港、江阴港、杭州港、上海港、太仓港也日渐兴盛，吸引大批外国商人，享誉世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南海门户重镇的广州由于官员对海商过于勒索，导致南海番商纷纷来泉州贸易。¹至南宋时，泉州已能和广州并驾齐驱，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国家置市舶司于泉、广，招徕岛夷，阜通货贿，彼之所阙者，丝、瓷、茗、醴之属，皆所愿得。”²至元代时，泉州已经超过广州，被马克波罗被称为“世界东方第一大港”。由于地位重要，元朝政府曾于至十六年（1279年），在泉州增置泉州行省，后虽合并，仍将泉州作为福建省省会，故时人称：“泉，七闽之都会也。番货远物、异宝珍玩之所渊藪，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³福州发展之势虽不及泉州迅猛，却已是全国丝绸的主要产区，产品远销海外。福建商人贸易网络北至高丽、日本，南抵南洋、西至孟加拉、大食，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力。

明清时期，中央政府实行海禁政策，海外贸易有所衰落。日本、琉球等国通过朝贡方式，定期来华贸易，对交易的商品、时间、人数都做出严格规定。嘉靖二年（1523年），宁波发生“争贡之役”。闽、浙市舶司被裁，只有广东留存，更使两地朝贡贸易受到极大影响。尽管如此，福建仍然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并呈现若干新的特点。其一，贸易中心的转移。由于受港口淤塞，泉州港逐渐衰落，至明中期，漳州月港已成为全省外贸的中心，呈现“东接诸倭国，南连百奥疆，货物通行旅，资财聚富商”的气象，然而好景不长，月港也渐趋淤塞，贸易中心再次转移，至明末时，厦门成为新兴的贸易枢纽。省会福州由于地理位置优越，仍然有所发展，郑和七下西洋，均须到长乐候风，再从闽江入海口五虎门出海，其舰队有多只船只在福州建造，船员也多在福州招募。成化八年（1472年），福建市舶司由泉州迁置福州，设立“柔远驿”，招待琉球使者，成为中琉贸易的唯一港口。其二、民间贸易兴盛。尽管朝廷实行海禁，福建民众却敢于冲破禁令，闯荡海疆，开拓贸易，形成强大的海商集团。其典型者如郑经、郑成功集团，凭借实力，他们以厦门为基地，收复台湾，与清廷抗衡。海禁期间，更是独揽对外贸易，维系政权长达数十年。大批福建民众赴南洋经商，不仅推动经济交流，而且促进中外文化碰撞。明清西方传教士通过海路来到福建，设立教会，建造教堂，藉此为据点，辐射全国。

近代之后，在列强武力强迫下，中国对外开埠，较之传统时代的海上丝绸之路已有诸多不同，英法美等新兴列强成为贸易的主要对象、交易大宗商品由丝瓷转为茶叶等土特产品、贸易关系由平等转为不平等、上海成为全国的贸易中心。福建在开埠初期，尚居全国领先，五口通商即包括福州、厦门两城市。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福州一度成为国际性茶港，对外贸易总额曾位居全国第二，仅维

1 杜瑜：《海上丝绸之路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36页。

2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四四。

3 吴澄《吴文正公文集》卷十六，“逆姜曼卿赴泉州路序”。

系十余年，即告衰落，闽江航道淤塞严重，城市基础设施薄弱，以致解放前夕，时人认为其落后上海达半世纪。厦门开埠后不久，成为中国最大的苦力贩卖中心，英法洋行在厦门设立据点，采取诱骗手段，将数十万华工贩卖到南洋、美洲等地。20世纪，得益于华侨的投资，厦门城市建设较好，仍与上海等地有相当差距。

总之，福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枢纽，兴于隋唐、盛于宋元，明清仍维持强劲势头，直到近代，才渐趋衰落，特殊的地理位置，经济中心的东移、区域开发的不断深入，是福建能够在海上丝绸之路扮演重要角色的原因所在。福建的外贸港口呈南北两点分布，福州地处闽江下游，为闽中北区域的主要外贸港口。泉州港虽在宋元时期极其辉煌，后因内河淤塞，闽南区域的外贸枢纽港口遂转移到月港，再转移到厦门。除自然因素外，政治因素也对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影响极大，泉州港衰落，与明代市舶司迁移有极大关系，而福州凭借省会优势，在朝贡贸易体系中占据优势，换言之，政府的政策导向对港口兴衰能产生决定性影响。

三、福建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贡献

福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不仅塑造当地独特的区域景观，而且对全国、东西方国家都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具体表现如下方面。

(1) 促进中外文化交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福建成为中西文化的交汇处，一方面弘扬中华文化，对日本与南洋等地影响尤深。如唐代日本高僧从福州登陆，驻锡开元寺，在当地官员支持下，得到长安求法，归国后创立佛教真言宗，成为日本最大的佛教宗派。明代末年，福建高僧隐元从厦门渡海，登陆长崎，获得德川幕府支持，在京都建造黄檗山万福寺，形成独特的“黄檗文化”，成为日本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明清时期，琉球使者来华均须在福州登陆，在柔远驿驻扎后，再北上京城。因此许多琉球人在福州求学、学艺，回国后加以传播，使两地文化至今仍有颇多相似之处。除东亚外，许多福建人前往南洋经商，对当地文化影响极其深远，如越南李朝李公蕴原籍泉州、陈朝创始人陈日昷原籍长乐，他们仿照中国典章制度，推动当地汉化。明清以来，数以百万计的闽人下南洋，使当地建筑、民间信仰、社会组织刻上中华文化烙印。另一方面，西方文化也通过海路，得以福建中国传播，如前述真谛大师，毕生致力于弘法，被视为中国佛教四大译经家之一。宋元时期，泉州作为世界第一大港，成为伊斯兰教、景教、摩尼教等多元宗教汇聚之处。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搭乘商船，在福建设教会、建教堂，藉此辐射全国。如礼仪之争的爆发，即是因为担任福建代牧的外方传教会士颜当禁止辖区内的中国教徒祭祖敬孔，以致康熙帝下令禁教。

(2) 推动中国社会变迁。近世以来中国社会呈现诸多变化，与福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首先，人口数量的膨胀。明清之前，我国人口多在二千万与六千万之间徘徊，至乾隆6年（1741）已达到14,341万口，道光14年（1834）40,101万口，其增速远超前代，其重要原因即是甘薯的大面积种植。甘薯不仅能在沙地种植，而且产量极高，“一亩收数十石”，原产于南美，明万历年间，福建人陈振龙将其从吕宋引进，福建巡抚金学下令推广，逐渐在全国种植，成为民众应对灾荒的重要口粮。其次，金融体制的变革。近世之前，铜钱是国内的主要流通货币，常因铜矿匮乏而引发金融危机。明清时期，日本和美洲发现特大银矿，而福建商人通过与长崎、马尼拉等港口的贸易，将国内货物输送到国外，换取新开采的白银运回中国，从而推动赋税制度变革，

推动中国的社会变迁。再次，开风气之先。福建人通过海外贸易，拓展视野，对相对保守的农耕文化形成一定的冲击。如明代思想家李贽为泉州人，在商业氛围浓厚的环境中成长，所以蕴育其反对重农抑商，提倡功利主义的“异端”思想。又如近代历史上，福州名人辈出，出现林则徐、严复等时代为人，他们之所以能引领时代变革，得益于福州在海上丝绸之路所处的重要地位。

(3) 改变西方的消费理念。福建海商向西方出口丝绸、瓷器、茶叶，由于全国丝绸产地颇多，尚难以从文献分析福建丝绸对西方社会的具体影响，但德化瓷却在一定程度改变西方上层社会的消费理念。根据日本学者记载：“十六世纪初，这种白瓷(德化白瓷)偶然通过葡萄牙的东洋贸易船介绍到西欧以后，立刻得到全欧洲贵族阶层的欣赏和欢迎，并接受无限的订货。”¹武夷茶却更在相当程度改变西方民众的日常生活。17世纪之前，尚且没有形成喝茶的习惯，随着中国茶叶的输入，至十八世纪，英国、法国、北美等地已普遍形成喝茶习俗。这些茶有相当部分为武夷茶，如波士顿倾茶事件中，倒入大海的茶叶正是 VarBohea (武夷变种)。由于对茶叶的巨大需求，十九世纪初，西方人士不断到深入武夷山勘察，并趁签订《南京条约》之机，选择福州作为开埠口岸，以便于进口武夷茶。

(4) 促进台湾与东南亚开发。明清之前，台湾岛开发较少，居民以土著为主。明末时期，郑芝龙以台湾为基地，开展海外贸易，势力逐渐壮大。崇祯元年(1628年)，闽南大旱，郑芝龙灾民数万人，“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运到台湾垦荒定居。郑成功驱赶荷兰殖民者后，继续以台湾为基地，开展海外贸易，使台湾得到初步开放，成为东亚贸易体系的重要一环。近代开埠后，台湾的茶、糖、樟脑在欧美市场颇受欢迎，经济发展迅速，逐步实现近代化。东南亚在宋元时期，其社会形态较为原始，许多地方仍以海贝作为货币。明清时期，福建民众大量前往南洋经商，不仅推动当地的转口贸易，而且推动文化的发展。近代，闽籍华侨集团崛起，许多人成为当地的工商巨子、文化领袖，其贡献不言而喻。

(5) 维系福建区域社会稳定。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对福建社会稳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外贸的兴盛，不仅带来造船业、丝绸业、陶瓷业等相关茶叶的发展，而且在相当程度保证社会稳定。早在明代，福建巡抚许孚远即指出：“闽之福、兴、泉、漳，襟山带海。田不足耕，非市舶无以助衣食。”²清代随着福建人口膨胀，粮食严重不足，依赖海米输入。所谓海米，主要是从越南、暹罗等地的大米，它多由商人通过海运前去采购，并得到政府的支持，如“凡内地商民，有自备资本领照赴暹罗等国运米回闽赈济，数在二千石以内者，循例由督抚分别奖励，如运至二千石以上者，按数分别生监、民人，奏请赏给职衔顶带。”³极大鼓舞商人。福建民众大量前往南洋，也在相当程度缓解福建的人口压力。

福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不仅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促进中西交流碰撞，推动明清中国变迁，而且促进台湾与东南亚的开发，改变西方社会的消费理念，产生世界性的影响。福建丝绸之路之所以发挥如此之大，一方面是当时中国国力强盛，文化先进，受到诸国仰慕，所生产

1 上田恭辅 著《支那陶瓷之时代的研究》昭和 11 年出版，转引：叶文程、林忠干：《福建陶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344 页。

2 许孚远：《敬和堂集》卷四，“疏通海禁疏”，明万历刊本，第 27 页。

3 《清圣祖实录》卷二九八。

产品能够引领时尚，受到国外民众欢迎。另一方面则地处东海与南海交汇处，使福建具有独特的地理优势，而敢于拼搏，敢于闯荡的独特区域人文性格，使福建商人敢于冲破官府禁令，不断拓展丝路贸易范围，从而使影响深远。

四、结语

海上丝绸之路作为地理空间概念，它不仅代表中外经济贸易关系、还表现为中外政治文化交流，是依托该商道，古代中外友好关系的综合反映。福建与海上丝绸之路有深厚渊源，福州、泉州、漳州、厦门是对外的主要港口，从隋唐开始，即在海上丝绸之路上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尤其在宋元，泉州更成为世界第一大港，明清时期，尽管政府采取海禁政策，但福建对外联系仍较为频繁，直到近代，才渐趋衰落。福建海上之路的发展，不仅对东南全服、而且对全国、对欧亚大陆都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它促进中西文明的碰撞、推动明清中国变迁，引领欧美消费时尚等诸多领域都做出颇多贡献。福建海上丝绸之路之所以能够影响如斯，得益于东海与南海交汇处的地理优势，成为链接东南亚与东南亚的咽喉要地，而不惧风险，敢于闯荡的独特区域人文性格，使福建商人敢于创新，不断拓展贸易范围，使海上丝路历千年而不衰。

作者简介：

徐文彬，1979年6月出生，中共福建省委党校讲师，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博士。

我国相关省市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的主要做法及其启示

福建社科院课题组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多元化的特征，是我国推进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大平台，对稳定周边外交环境，打通对外经济新通道，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打造新的经济带和增长极，促进区域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部分省市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做法

“一带一路”规划是我国重要的中长期发展战略。目前，国家发改委等相关部门正在编制完善“一带一路”发展规划，有关省区已捷足先登，制定和出台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意见或行动方案，其中的一些做法值得借鉴。

1. “一带”省市（自治区）

丝绸之路经济带主要包括新疆、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重庆、四川、云南、广西等省市、自治区，其中：

新疆将发挥亚欧大陆核心地带的地缘优势、文明交汇的文化优势、富集的资源优势，努力当好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主力军和排头兵，加快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区域性交通枢纽中心、商贸物流中心、金融中心、文化科教中心和医疗服务中心，国家大型油气生产加工和储备基地、大型煤炭煤电煤化工基地、大型风电基地和国家能源资源陆上大通道。

陕西将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新起点，加快建设通江达海的立体化交通枢纽，积极探索内陆地区开展自由贸易的新模式，成为承接东部乃至全球产业转移的首选之地，沟通内陆与亚欧大陆桥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交通枢纽，丝绸之路经济带最大的物流中转中心，融汇亚欧丰富多元文化的重要平台。

甘肃已颁布《“丝绸之路经济带”甘肃段建设总体方案》，将着力构建兰州新区、敦煌国际文化旅游名城和中国丝绸之路博览会三大战略平台，重点推进道路互联互通、经贸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合作、经济新增长极、人文交流合作、战略平台建设等六大工程，加快建设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黄金段。

青海将全力打造交通命脉，充分发挥东进西联的节点作用，加快构建面向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绿色产品出口基地，面向国内的产业承接、资源加工的高端制造基地，加大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与交流。

宁夏以阿拉伯国家和穆斯林地区为重点，以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系为支撑，促进中阿全方位交

流合作，加快建设中阿空中丝绸之路、中阿互联网经济实验区、中阿金融合作实验区和中阿博览会战略平台，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支点。

云南加快研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定位、作用、布局和主要任务，将发挥连接交汇的战略支点作用，建设成为“一带一路”的重要门户、区域合作高地、睦邻外交战略通道和先行试验区。

广西将建设成为我国西南、中南地区面向东盟、走向世界的国际大通道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节点和重要平台。

与此同时，丝绸之路经济带省市（区）加强沟通合作，重视人文交流，形成发展合力，促进区域协同发展。如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区文化厅签署了《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北五省区文化发展战略联盟框架协议》。

2. “一路”省市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包括江苏、浙江、广东、福建、海南等省市，其中：

广东把参与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新一轮对外开放、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的重点工作，目前已形成《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重点国家发展规划和研究的研究报告》等11份研究成果，提出了以互信认同为根本，以互通互联为基础，以经贸合作为重点，以人文交流为纽带，以互利共赢为目标，联手港澳和周边省区，加强与沿线国家合作，推动陆海统筹，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争当我国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排头兵和主力军的规划思路，力求建设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增长极、战略枢纽、社会文化交流中心和陆海统筹发展的试验区。

江苏积极推进“一带一路”交会点及国家东中西区域合作示范区建设，加快打造东部陇海产业带和城镇轴，使之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拓展对内、对外开放新空间。

浙江将统筹规划和培育提升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积极打造和搭建有效联通“一带一路”沿线的物流通道和合作平台，加快宁波舟山自由贸易港区建设，加强与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互联互通，确立起浙江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中陆海统筹、东西互济的关键门户和战略地位。

海南要找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坐标，在对接与服务“一带一路”中，进一步增强经济开放度，把三沙市建设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服务基地、战略支点。

3. 其它省、市

黑龙江将以绥满铁路沿线中心城市为节点，边境口岸为桥头堡、枢纽站，绥芬河-满洲里-俄罗斯-欧洲铁路和绥芬河-俄远东港口陆海联运为战略通道，加快打造连接亚欧的东部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

江西争取纳入“一带一路”发展战略规划，积极引导企业抢占东盟、中亚等贸易市场，支持鼓励企业开展对外承包工程和对外投资，加快推进与陆上丝绸之路国家的合作。

此外，相关地市也积极行动。山东青岛将打造“一带一路”综合枢纽城市，加快建设双向开放桥头堡、东亚海洋合作平台、经贸合作枢纽和综合保障服务基地。陕西西安将秉承历史优势和开放传统，发挥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作用，加快建设成为亚欧合作交流的主要基地、国际化大都市。浙江宁波提出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江苏连云港将立足港口、陆桥、开放城市优势，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门户、物流基地、产业合作集聚区。海南三沙将建成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合作平台、服务基地、桥头堡与战略支点。广东深圳将构建区域协同发展新优势，加快发展湾区经济，推动粤港澳世界一流湾区建设，努力成为“一带一路”战略和南海开发的重要战略平台。湛江将发挥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优势，加快打造广东对接东盟的先行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节点和重要平台。广东惠州将建成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桥头堡、优势产业合作发展的聚集区、滨海旅游联动发展的示范区、民间交往文化交流的活力区。

二、对福建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启示

福建“一带一路”建设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人文基础，必须赋予崭新的时代内涵。应重视发挥福建的特色和优势，把握好“一带一路”建设重大机遇，积极主动作为，加快拓展互联互通、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空间，不断提升全方位开放水平。

一是明确政府角色。“一带一路”建设是跨区域、跨领域和多层次的合作，涵盖互联互通、经济走廊、海上通道安全、海洋资源开发和争端解决等机制安排，是一项长期、复杂的工程。要强化顶层设计，做好统筹协调，深化相关国家（地区）的协商沟通工作，形成行动一致的开放合作理念，共同制定区域开发政策，重点推进能源、沿线通道和优势产业合作，将优势互补转化为务实合作，实现互惠互利和共同发展。

二是推进协同发展。要根据新一轮对外开放战略取向，加快推进产业合作平台、金融合作平台和文化交流平台建设，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完善跨境产业转移利益分享机制，加快形成以点带面、从线到片的区域合作大格局，推进区域协同发展。要采取区别对待政策，突破区域和空间限制，提升厦漳泉、福莆宁城市群功能，以东盟国家为重点，加快打通南亚、中东和中亚国家经贸大通道，加快建设福建自由贸易区，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有效载体和重要抓手。

三是突出区域特色。建立健全对外投资管理服务机制，以远洋渔业、现代农业和能源矿产资源合作为重点，加快推进跨境产业合作园区、海上丝绸之路经济走廊建设。以保税港区、出口加工区为载体，加快推进跨境电子商务、跨境物流信息平台、境外营销网络和大宗进口商品交易市场建设，推进闽台联手开拓海外市场。立足华商网络资源、海洋蓝色经济优势，加快建设“海外福建”、“海上福建”，不断拓展经济发展空间，加快打造福建经济“升级版”。

四是强化经贸合作。充分发挥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文化优势，优先发展海路通道和空中走廊，推进厦门东南国际航运中心、港口物流园区、专业物流基地和配送物流中心建设，形成服务中西部地区、通江达海的重要通道。推进厦门邮轮母港建设，大力发展邮轮旅游，加快打造海上丝绸之路旅游经济圈。推进境外远洋渔业综合基地、东盟水产养殖基地建设，积极争取国家免征水产品进口增值税，加快设立马尾东盟海洋产业园，做大做强“中国——东盟海产品交易所”。

五是发挥海外侨胞的重要作用。“侨”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福建海外侨胞众多，经济实力雄厚，智力资源丰富，是福建发展对外关系的重要依靠力量。要充分发挥侨力资源的独特作用，依法维护海外侨胞合法权益，推进海外华侨华人在构建政治互信中起释疑解惑作用，在双边经贸合作中起桥梁纽带作用，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起穿线搭桥作用，在中外文化交流合作起融合发展作用。

六是创新人文交流合作模式。坚持经贸唱戏、文化搭台，充分发挥民间团体作用，通过缔结国

际友好城市，拓展海外华文教育，加快打造“一带一路”人文交流前沿平台、文化遗产开发保护平台。要更加注重人文交流，整合“智库”研究力量，通过举办厦门南洋文化节、泉州中国阿拉伯城市论坛、海上丝绸之路国际研讨会、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福建周”等系列活动，加快建立中国—东盟海洋合作中心、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城市联盟、海上丝绸之路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增强区域文化融合，寻找共同利益结合点，促进民心相通，扩大互利共赢合作基础。

执笔：李鸿阶、林心滢

作者简介：

李鸿阶，福建社科院副院长、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林心滢，福建社科院华侨华人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 战略构想与建设方略

全毅 汪洁 刘婉婷

内容摘要：共建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是我国新时期对外战略的重大调整，它以经略海洋和海洋合作为核心，发展与海上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为主线，促进中国与这些国家和平友好、港口互联互通与经贸交流机制创新，形成相互倚重，互利双赢的政治经济发展格局，为中国和平发展创造更好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环境。

关键词：海上丝绸之路 战略定位 建设方略

历史上，起始于中国的丝绸之路将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商业贸易链接起来，促进了东西方的货物交换和文化科技交流。丝绸之路可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以古都长安为起点，经河西走廊沿天山南北两路进入中亚地区，沿黑海南北两岸进入欧洲。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有东海启航线和南海启航线，从朝鲜半岛和东部沿海港口进入日本，或经徐闻、广州、泉州等南部沿海口岸经东南亚、印度洋进入欧洲和非洲。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出访中亚四国时提出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同年10月，习近平主席访问东南亚时在印尼国会发表演讲时指出，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个倡议将中国古代与亚非欧友好通商的历史与现实经济交流结合起来，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本文重点分析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战略意义及将建设方略。

一、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回顾

在探讨中国要重返海上丝绸之路之前，有必要回顾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历程。海上丝绸之路作为中国古代与外国进行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其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几个历史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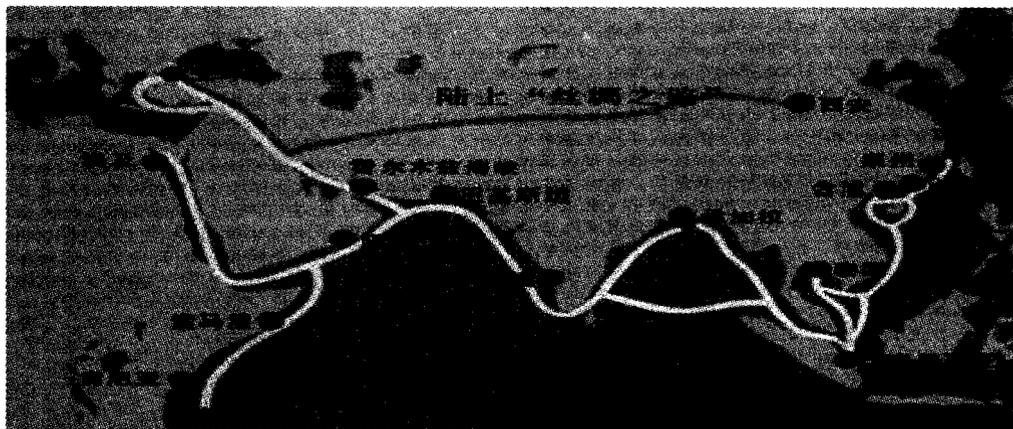
一是形成于秦汉时期。海上丝路古代有东海航线主要是从朝鲜半岛入日本和东部沿海进入日本、琉球、台湾诸岛，以及南海航线，南海航线始于何时有待考证，但史书据记载中国丝绸外传的时间最迟在公元前4世纪就已经传入印度和西方。秦末汉初南粤王赵佗墓出土的西亚式银器皿疑为波斯所产。《汉书·地理志》明确记载了汉武帝平定南粤后即派使者出使南洋和印度，抵达今天的斯里兰卡返航，当时海船运载的杂缯即为各种丝绸。广东的徐闻和广西的合浦是重要的南海航线始发港。

二是发展于唐宋时期。唐代中期陆上丝绸之路因战乱逐渐衰落，更加倚重海上丝绸之路，促进

了海上丝路的兴盛。宋代航海技术罗盘针的发明，使得海船航程到达西亚国家。由于江南丝绸、茶叶和瓷器的大量出口，使泉州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港。泉州留下许多阿拉伯商人的遗迹见证了当时中国与西方的贸易主要通过阿拉伯商人中转，以致于西方国家发起十字军东征，企图控制这条东西方商路，但以失败告终后激起西方世界另辟达到东方的新航路的动力。

三是兴盛于元明时期。元代的中国政府在东南沿海的宁波、泉州、广州、温州和杭州设置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明代永乐帝为宣国威于海外，派遣郑和率舰队出使西洋，郑和下西洋前后七次，历时 28 年（公元 1405-1433 年），最远到达非洲的肯尼亚，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庞大的船队带去丝绸、茶叶、瓷器、金银器皿、五金、书籍等产品。进口的货物主要包括：琉璃、珠宝、象牙、玛瑙、香料、胡椒、檀香等物品。但明代郑和下西洋未能继续扩大贸易成果，很快为海禁政策所代替。

四是转变于明中叶和清朝时期。郑和下西洋之后，明政府很快将造船所用的技术资料付之一炬，严禁建造可出海的大帆船。就在明朝实现海禁政策时，西方世界正在掀起一股发现新航路的地理大发现时代，1492 年葡萄牙人达伽马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占领印度西南部的果阿，并迅速进入明帝国的沿海地区，窃取了澳门。西班牙人哥伦布越过大西洋发现美洲大陆。1521 年麦哲伦船队成功横渡太平洋达到菲律宾宿务岛，并将其献给西班牙国王菲力二世。清代的中国政府也沿袭明代的海禁政策，只许广州一地对外通商。但西方殖民者几乎垄断了海上丝绸之路。



明中叶到清代西方殖民者控制下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澳门（广州）——果阿（印度）——里斯本（欧洲）的航线，走的是经南海下西洋即印度洋的传统丝绸之路。第二条是明代中后期开辟的漳州月港经马尼拉到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的太平洋航线。1565 年 6 月西班牙圣·巴布洛号大帆船从马尼拉出发，满载亚洲香料和商品运往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开辟了链接亚洲和美洲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时代。大帆船贸易时代于 1815 年结束、持续了 250 年。西班牙商人主要用美洲的金银（250 年间从美洲运往马尼拉的白银超过 4 亿两，其中 1/2 流入中国）换取从中国运来的生丝、丝绸、茶叶、棉布和瓷器以及一些工艺美术品等商品。这充分证明，至少在西方工业革命前，中国仍然是世界的经济与贸易中心。但也是中国走向衰落的转折点，因为这时中国政府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阻碍了东西方文化交流，导致中国的闭塞和落后；也使得中国的海外贸易完全被西方殖民者控

制，财富也逐渐流向西方。

基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航路和新时期的现实需要，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应规划西线、东线和北线三个战略方向。西线是我国出南海联系亚欧非的重要通道，是我国和平发展、保障能源和经济安全的海上命脉；东线经东海连接南太平洋岛国至拉美、北美，是打破海上围堵、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通道；北线是利用北冰洋航道、加强东北亚合作的重要通道，对我国开发极地资源具有战略意义。

二、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提出的背景及其意义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对外战略的重大调整。众所周知，中国对外开放是从东部沿海地区开始的，主要是向东开放，重点面向亚太地区的发达国家。而“一带一路”倡议主要是开放开发中国的中西部地区，重点是向西开放，面向西部的发展中国家。面向西部发展中国家及西部大开发战略是中国对外开放和区域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变。

中国实行对外战略调整主要基于以下因素：一方面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开放开发造成了东西部区域发展差距的持续扩大，而中西部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居住地区，由此造成民族矛盾和区域不稳定因素增加。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发展给周边国家带来双重的影响，周边国家在享受中国经济发展机遇的同时，对中国产生更大的防范心理。这种防范心理与美国重返东亚战略一拍即合，导致中国与东南部国家的海上争端迅速激化。同时在对外经贸关系上也面临以美国为主导的 TPP 和 TTIP 等经济集团的挤压。因此，中国在东边的发展空间受到空前挤压。以中国的文化精神和实际能力，很难跨越太平洋去挑战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为了破解中国发展困境和周边困局，寻求新的经贸发展空间，我国学者提出西进战略，即把眼光投向西部，将西部大开发战略与面向西部发展中国家开放结合起来。而“一带一路”倡议可谓中国转向西方的两个重要抓手，是中国对外战略的一次重大调整，同时也对赋予丝绸之路新的含义。

第一，新“海上丝绸之路”重在传递和平信息。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2000年前的秦汉时期，在明代郑和下西洋时期形成高潮，在东南亚和西亚、非洲国家留下许多遗迹，这些历史关系表明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是一个和平的贸易通道，中国没有通过开辟贸易航线去征服这些沿线国家，这与近代西方世界的地理大发现新航路开辟后充满征服与掠夺的贸易通道相比形成强烈对照。站在历史的高度着眼未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同样体现这种精神，跟老丝绸之路的沿线国家继续保持和平友好关系，实现互惠互利、共同发展。中国要传递的信息是，中国走向海洋，不会重复西方列强海上争夺霸权的老路，而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中国的发展不会威胁东南亚国家及丝路沿线国家的经济、政治与安全。

第二，开创亚洲互利共赢新格局，实现百年亚洲梦。历史上亚洲国家创造过辉煌的中华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和阿拉伯文明。而丝绸之路是这些文明相互交流和融合的重要纽带。今天中国的经济影响力正在辐射亚洲、非洲和拉美。但中华文明的复兴如果不与这些古老文化一道复兴，很难独善其身。因此，构建现代海上丝绸之路就是要通过海上互联互通、港口城市合作机制以及海洋经济合作等途径，将中国、东盟国家、南亚国家、海湾国家等联系起来，甚至辐射到非洲和欧洲地区，将复兴中华文明的中国梦与实现亚洲国家百年复兴的伟大梦想结合起来，承担增进各国利益、

扩大经济合作与经济援助的范围，提供公共治理和公共产品，让丝绸之路各国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树立中国良好的负责任大国形象。

第三，新海上丝路具有重大的经济战略意义。中国在东南亚和印度洋具有重要的战略利益：即经济利益与航路安全。中国 80% 的石油、50% 的天然气进口和 32% 的进出口商品要经过这条丝绸之路。拉美地区是我国重要资源与出口市场。当前，中国在印度洋进行的港口建设被西方冠以“珍珠链”战略，亚丁湾护航行为被说成是军事扩张。美国提出新丝绸之路计划以及打通印度洋与太平洋的印太战略，拉印度加入对华遏制圈，与太平洋岛链战略相结合构筑对华包围圈。中国构筑海上丝绸之路将打破这种僵局，它将欧亚地区国家普遍认同的古丝绸之路精神与中国的经济优势相结合，以经济为纽带，拓展并深化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利益，密切彼此的合作关系，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安全，有助于消除中国威胁论，形成有利于中国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格局。

第四，有利于实现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历史经验反复昭示，面海而兴、背海而衰，经略海洋是大国崛起的必要条件。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兴盛的标志，而实行海禁（郑和下西洋之后）和闭关锁国是中国走向衰落的根源。邓小平在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中国要经略海洋，2012 年中国制定了建设海洋强国的宏伟目标。建设海上丝绸之路将成为中国经略海洋的重大战略。印度洋是连结世界贸易航线的枢纽，更是中国与欧亚非国家进行商业贸易的必经之地。印度洋的安全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安全和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国家大战略。而且，印度洋是中国突破美国太平洋岛链的理想选择，在中国的两洋战略中，印度洋战略将极大地扩大中国的影响力，加快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

一带一路倡议具有两个显著特点：首先，它在机制安排上非常灵活，将现有制度安排与未来发展相结合，具有巨大的可塑性。其次，它尊重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差异性，沿线国家和地区无论就经济发展水平、还是社会文化都存在巨大差异。这是中国与西方大国不同的地方，与美国 TPP 安排的排他性形成强烈对比。新丝路倡议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及其大国胸怀，得到相关国家的积极回应。迪拜国际金融中心黎巴嫩籍首席经济学家纳萨·赛迪呼吁，地处亚非中间地带的海湾国家应该“转向东方”拥抱中国，更好地发挥联通作用，投身于中国倡议的“新丝绸之路”建设¹。可以说新丝路构想是中国从地区大国走向世界大国的路线图。

三、建设海上丝路的战略优势及其面临的挑战

（一）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优势

1. 悠久的海上丝绸之路留下丰富的历史遗迹。海上丝绸之路是一条和平、财富与文化交流之路。在先秦至汉唐时期，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向亚欧输出丝绸，输入香料和珠宝的商路。宋元时期海上丝路是中国输出陶瓷和茶叶，输入象牙、香料的商路。明清时期的海上丝路是输出中国瓷器、茶叶、五金，输入白银、香料的商路。所以海上丝路也称为陶瓷之路、香料之路，也是文化传递的路线。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就是通过丝绸之路由阿拉伯人传到西方，拉美的高产作物、西方的火炮、数学和天文知识等近代科学也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长期的贸易和文化交流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迹，比如中国的泉州市留下许多阿拉伯伊斯兰文化遗存，东南亚的三宝公（郑和）庙比国内还多。东非的肯尼亚留下中国陶瓷等众多历史遗迹。当然最重要的历史遗迹当属散布在东南亚等地的

¹（黎）纳萨·赛迪：海湾国家应融入“新丝绸之路”，孙西辉编译。原文载美国《赫芬顿邮报》网站。

华侨华人社会网络。

2. 丝绸之路留下中国“崇尚和平”的精神遗产。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朝贡体系”延续了数千年，直到西方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之后才走向衰落。朝贡体系虽然具有不平等的一面，很难为崇尚平等的西方所接收，但朝贡体系基本上是自然形成，体现了中国“礼尚往来”的文化精神，并非中国的刻意安排¹。郑和七下西洋，最远抵达非洲的肯尼亚，虽然有“宣国威于海外”的意图，但中国没有在沿途攻城略地，进行殖民统治。因此，数千年的海上丝路体现了中国人崇尚和平的精神。从历史中吸取营养，中国今天重返丝绸之路必须强调其和平性质。中国领导人赋予了古丝路精神新的内涵：即用和平友好、互惠互利、包容共鉴、共同发展的新理念建设新的丝绸之路。

3. 中国与丝路沿线国家具有优越的合作基础和潜力。欧亚非地区国家能源资源丰富，与我国经济合作潜力巨大。近年来，我国与上述国家的经贸合作取得快速发展。根据统计数据，2012年我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贸易总额高达13927亿美元，占我国外贸总额的36%，我国已经成为东南亚国家、南亚国家、海湾国家及一些拉非国家最重要的贸易对象和外资来源地。这意味着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经济体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具有优越的经贸合作基础。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国家组织间签署了一系列投资贸易协定，比如中国与印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缅甸及韩国签署了亚太贸易协定；与海湾国家搭建了中国—海合会合作论坛；与非洲国家搭建了中国非洲合作论坛；与东盟国家搭建了中国东盟自贸区；与新西兰、智利、秘鲁等国家加签署自贸区协议。各种合作论坛、经贸合作协议以及境外经济合作区等合作机制为建设海上丝绸之路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4. 东亚成熟的生产分工网络和廉价的海运优势。东亚地区公认的优势在于生产分工和日益深化的金融联系。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运输货物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如今这些航道仍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支撑着东亚绝无仅有的生产分工网络。强化这些联系将有助于在整个地区展开更加和谐的互动。当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运输成本急剧降低，所以该地区无论大小和技术发达与否，都可以通过生产零部件而非完整产品的专业化和规模经济获益。这是东亚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表现出色的主要原因。随着中国劳工成本的提高，中国转移产业的需求更加迫切。东南亚和海上丝路沿线的国家必然会因为这些产业转移获得好处。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将成为中国产业转移与构建生产分工体系的重要平台。

（二）面临的挑战：威胁与竞争

亚欧地区是大国博弈和竞争之地，美日印澳都提出各自的印太战略，使得这一地区所面临的安全形势异常复杂。建设海上丝路，中国面临着复杂的地缘政治挑战，中国的航路安全和和合作项目的可持续性受到严重威胁。

首先是南中国海问题。东南亚小国天生就具有害怕周边大国的心理，随着中国的崛起，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尤其是和中国存在海上主权冲突的国家对中国感到巨大的不确定性，甚至把中国视为主要威胁。开始“邀请”美国甚至日本、印度介入南中国海争端，把问题复杂化，并将降低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度作为政策选项。经济利益与安全及政治利益相比从来就微不足道。这些无疑会对中国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以及海上丝路倡议产生消极影响。

¹ 郑永年：“丝绸之路”与中国的“时代精神”。新加坡《联合早报》2014年6月10日。

其次是印度的地缘政治。中国要通过东南亚，走向印度洋和非洲，印度是关键。印度是南亚唯一的区域性大国，始终把地缘政治利益放在首位。中国的崛起和“走出去”必然引起印度的高度关注，中、印还存在边界领土纠纷。无论在中东，还是非洲，印度都是重要的角色，处理好中印关系对中国倡导的海上丝路建设至关重要。

再次是美、日“印太战略”的竞争。随着世界经济重心的东移，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利益攸关方对从南中国海到印度洋的印太地区给予高度重视。美国除了精心构筑太平洋岛链战略外，还高调宣布了新丝路计划和印太战略，日本提出以印太地区为重点的价值观外交，其遏制和围堵中国的意图非常明显。美日等国家挑拨和分化中国与该地区国家的关系。中缅密松电站、中泰大米换高铁、滇缅铁路等项目的波折都有美国和日本的背影。而美国控扼的马六甲更是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阿基里斯之踵。

最后，中东非洲局部地区形势动荡不安与贫穷。南苏丹、叙利亚、伊拉克因教派冲突和利益纷争陷入持久内战，阿富汗在北约撤离后也存在不确定性，此外该地区还面临像索马里海盗、基地组织极端伊斯兰运动、恐怖活动、毒品走私这样的非传统威胁，不稳定之弧与一带一路高度重叠。由此对该区域内开展经贸合作构成巨大威胁。如何维护中国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工程项目可持续性和工作人员的安全，对中国是一项巨大挑战。这一地带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潜力不足也是深化合作的主要障碍。

尽管存在这些威胁和挑战，但从中国未来安全以及周边外交和营造有利的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的实际需求看，一带一路建设仍然将是中国周边外交战略和对外开放的重要方向之一。从国际经验看，大国崛起的对外经济外交的战略重点无不聚焦于周边地区。

四、21 世纪海上丝路构想的目标定位与基本架构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求稳定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为此，全面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是我国周边外交战略的重要支撑和保障。中国是陆海兼备的国家，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将成为我国周边经济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陆海兼顾、均衡发展的对外开放格局。

对于如何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习近平提出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的“五通”举措。“五通”同样适用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如何实现“五通”，需要根据海上丝路的战略构想制定具体的政策和措施，保证新丝路倡议的落到实处。

（一）战略定位、发展目标与原则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定位是：承袭历史，以经略海洋、建设海洋强国为目标，从全球视角扩大我国对印度洋和亚欧非的开放，以经济外交和文化交流为手段，在广阔的亚欧非地区建立经济联系更加紧密、人文合作更加融合，提高沿线各国相互倚重，确保海上贸易通道安全，拓展我国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利益的发展空间。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目标是：以海洋经济合作为重点，通过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外交与人文交流，构建经济合作机制，推进沿线港口互联互通和自由贸易区建设，发展临港产业、货物贸易、海洋运输、海洋信息、远洋渔业、资源能源、以及非传统安全等领域的双边和多边

合作，确保商路畅通和安全，构筑 21 世纪海上和平之路、财富之路，打造海上繁荣之弧。

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应遵循一些基本原则：

(1) 双向互动。作为倡议需要吸引沿线国家的积极参与，沿线国家在多大程度上响应中国倡议会影响到丝绸之路建设的成效。中国已经向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斯里兰卡等国交换意见。海湾国家学者提出，新世界秩序要求海湾国家“转向东方”并融入“新丝绸之路”，建议海湾国家采取与中国和东盟签订自贸协议，融入“人民币区域”，与中国建立开发可再生能源、纳米技术和清洁技术的伙伴关系，最终达成一个相互支持的安全协议等建设性步骤。¹

(2) 互利双赢。从丝绸之路的历史看，它是一条财富与文化交流之路。新丝绸之路是将各国共同利益联合起来的天然纽带。我国确立以技术换资源、以资本换市场是一个互利双赢的想法。但中国产业转移出去后能否履行社会责任？关系到国外民意基础的建立，关系到中国企业的成败。因此，应将民生、教育、卫生、生态建设纳入对外援助与企业社会责任范畴，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是必须坚持的原则。

(3) 统筹协调。建设海上丝绸之路涉及近 60 个国家，国内各省和中央政府各部门。范围广泛，协调困难。吸引域外力量参与，要让沿线国家认识到新丝路建设带来的重大利益，消除这些国家的疑虑。同时要充分调动国内地方的积极性。因此，需要协调好沿线不同区域、次区域之间的合作关系，协调好境外合作与国内各产业及省区的发展关系，协调好各部门、各产业之间的发展关系。

(4) 官民结合。目前，一带一路倡议出现官民脱节现象，政府层面交往多民间交流少，社会无法形成区域共识。实际上，动员民间力量落实国家战略，有时比国家直接进行更加有利。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也需要大量资金，必须动员民间资本参与建设。比如，建造和经营港口及远洋渔业基地，高技术产业的跨国并购以及矿产资源的投资开发，民营企业就比国有企业更有优势。政府要做好制度安排，为民间交流合作搭建好平台，并为民间交流合作保驾护航，鼓励和引导民间执行国家政策。

(5) 市场导向。我国学者提出在中国国内需要调整经济结构，投资需求旺盛的时候，担忧将资源投入国外的收益能否得到保证？这就需要在对外合作中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讲求经济效益，实现合理利益回报，否则对外合作没有可持续性。中国对外援助基础设施和投资开发都需要符合效率原则，不断提出合作新思路、创新合作模式，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济协作新机制。

(二) 基本架构：构建三大支柱和七大支点

我们认为海上丝路建设应构建三大支柱、七大支点，重点推进，逐步深化。

1. 构建三大支柱：精神纽带、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

精神纽带：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是一个波斯文化、伊斯兰文化、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相互交流融合的重要通道。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一个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理念和倡议。坚持用中国、印度和缅甸三国前领导人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沿线国家之间的关系。尊重各自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差异，不将本国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强加于人。用和平友好、包容共鉴、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新理念建设新丝绸之路。在经贸合作和文化交流过程中取长补短，实现共同发展。

经贸合作：海上丝绸之路以历史上商贸往来拓展为贸易、投资和贸易投资便利化合作方向。硬

¹ (黎)纳萨·赛迪：海湾国家应融入“新丝绸之路”，孙西辉编译。原文载美国《赫芬顿邮报》网站。

件建设要优先发展海上互联互通，软件建设要优先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和自由化，发展双边自贸区和境外经济合作区。以此促进货物畅通和货币流通，实现产业合作和产业转移，建立健全地区供应链、产业链与价值链，形成沿线国际生产网络，提升经济合作水平，实现共同发展。

人文交流：由历史上的民间文化交流提升为政府层面和民间相结合的人文交流。以政府互动强化政策沟通，协调各国的外交、经济、文化政策，为民间交流创造条件。民间交流强化民心相通，重点做好文化、宗教、教育、医疗卫生、学术研究等领域的人文交流。鼓励高等院校校际交流和互派留学生，提升教育交流合作水平，进行人力资源开发，如厦门大学在马来西亚建立分校等。对欠发达国家进行教育和医疗卫生援助，提升其发展能力。

2. 以支点战略进行区域布局：重点建设七大支点

港口城市合作和自贸区建设可以作为重要战略支点。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应与沿线重点区域和国家签署自贸协定，并利用枢纽港拓展经贸合作。应发挥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与区域合作平台的作用，做好战略布局。海上丝路沿线分为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欧盟、南太平洋岛国、拉美七大区域，在七大区域构建七大战略支点，形成七大推进路径。

第一个支点中国东盟自贸区：中国东盟自贸区是中国最早建立的区域合作平台。东盟与中国陆海相连，历史上是中国移民下南洋，筚路蓝缕进行开拓的国度，是华侨华人最集中的地方，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最重要支撑点。2012年东盟10国面积约448万平方千米，人口约6.08亿人，GDP为2.33万亿美元。农业矿产资源丰富、经济发展水平与我国相当、市场潜力大。

近期内建设重点是在扩大从东盟进口解决贸易逆差的同时，推进“2+7”合作进程，全面提升CAFTA质量和标准，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充分发挥地缘优势，在农业、渔业、能源、金融等基础产业领域加强对话和合作，建立和健全地区供应链、产业链与价值链，提升东盟与中国产业在全球的竞争能力。

第二个支点是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是世界上重要的区域合作组织，2004年确立了建立自贸区的目标。2012年该地区总人口约15亿人，区域幅员近500万平方千米，4亿中产阶级和经济总量超过1.5万亿美元的经济实体，南盟正日益成为全球一支重要的经济力量。以建设中巴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为重要节点，可以辐射南亚地区。

近期内重点提升中巴自由贸易安排水平，启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合作机制，建设昆明—曼德勒—达卡—加尔各答的铁路或高速公路。打通中国新疆与巴基斯坦瓜德尔港以及中国云南与缅甸皎漂港的交通线可以破解马六甲困局。但国际陆路与海运不同，经过一个主权国家要比经过国际公海困难得多，需要强有力的整合能力。我国可以利用亚太贸易协定和RCEP合作平台深化与印度的经贸合作机制，全面提升与南亚区域经贸合作水平。

第三个支点海湾合作委员会：海合会是西亚最重要的区域组织，也是西亚社会最稳定的国家，通过海合会辐射西亚地区是理想选择。该区域能源资源丰富，是我国能源进口的主要来源地。该区域人口约7000万，区域面积近400万平方千米，2012年经济总量近1.5万亿美元，进出口贸易规模为1.2万亿美元，人均消费水平高、市场潜力巨大。

重点方向是推动中国海合会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进程，尽快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推动中国与海湾

国家合作由能源和矿产资源领域合作转向产业链合作，加强双方在新能源、纳米技术等新兴产业的合作，与阿联酋合作建设迪拜人民币境外交易中心，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第四个支点为南部非洲关税联盟：南部非洲关税同盟 2012 年人口规模达到 5892 万人，经济总量为 4180.6 亿美元，中国对南部非洲关税同盟出口 151.48 亿美元，进口 101.39 亿美元，是中国在非洲的最重要贸易伙伴。南非是金砖国家的重要成员，是非洲最重要的国家。

重点方向是深化在贸易与投资领域的合作，继续推动自由贸易谈判，并争取尽快达成中国在非洲的第一个自贸协议。同时，争取在南非及纳米比亚设立境外经济合作区建设，加强双边投资及矿业领域的合作。加强与塞舌尔和毛里求斯的海洋渔业合作。

第五个支点为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欧盟是世界上最大区域经济组织和经济最发达和规模最大的经济体，是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的终点。该区域总人口 5.05 亿人，经济总量 16.66 万亿美元。2012 年中国对欧盟出口 3342.69 亿美元，占中国出口总额的 16.32%，自欧盟进口 2120.71 亿美元，占中国进口总额的 11.66%。欧盟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进口来源地和最重要的经济伙伴。

中国与欧洲的冰岛和瑞士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但都不是欧盟国家。今后，中国欧盟合作的重点方向是推动中国欧盟投资协定谈判进程，争取尽快启动中国欧盟自贸区谈判，实施以市场为导向的自贸区战略。中欧合作由贸易向投资和技术研发等重要领域转移，全面深化中欧战略经济伙伴关系。

第六个支点为南太平洋岛国论坛：南太平洋论坛包括澳新等大洋洲国家和斐济、汤加等 16 个南太平洋岛国，海洋渔业和矿产资源丰富。目前中国正在加强与太平洋岛国论坛的合作，2006 年中国在斐济启动了“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等。作为“南南合作”的范畴之一，中国持续给予岛国无附加条件的援助，并在交往的过程中不断改进援助方式，着力帮助岛国能力建设等。

中国与新西兰签署了自贸协议，并正在与澳大利亚进行自贸协议谈判。未来重点方向是拓展与斐济、汤加、所罗门群岛等岛国的远洋渔业与安全合作，以及巴新与澳大利亚的矿产资源合作。加快与澳大利亚达成自贸协议，消除澳大利亚对中国威胁的疑虑。

第七个支点为拉美太平洋联盟：太平洋联盟是拉美国家面临太平洋的几个国家的经济一体化组织，由智利、秘鲁、墨西哥、哥伦比亚四国 2011 年 4 月 28 日宣布成立。其目的是通过提高商品、服务、资本和人员的自由流动，促进成员国家的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并促进拉美同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与商务交流。这些国家是拥有丰富的农业、渔业和矿产资源的新兴经济体。

2012 年太平洋联盟人口 2.5 亿，GDP 总值 20156 亿美元。与中国的贸易总额达到 1238.7 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的 3.2%，是中国在拉美的重要贸易伙伴。中国与智利和秘鲁签署了自贸协议，正在与哥伦比亚就自贸协议谈判展开可行性研究。墨西哥是北美自贸区的重要成员，通过它可以进入北美市场。中国加强与太平洋联盟的合作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可以探讨建立一个中国太平洋联盟自贸区，将其作为进入拉美市场的一个门户。

五、建设方略与重要举措制定外交战略与实施措施

政策沟通与协调属于政府层面的协商事务。中国周边外交战略一直以“睦邻、安邻、富邻”为

宗旨，2013年以来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确立以“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作为处理周边事务的原则。中国“丝绸之路”倡议如果不能为其他国家所接收，调动其积极性，倡议就难以得到落实。探索合作机制，各国形成共识很重要。要吸引这些国家参与，就要得到沿线国家及国际组织的理解，加强同该区域国家的深度沟通和协商，切实关注沿线国家的利益诉求，在国际事务中加强沟通与磋商，加强高层互访与政治互信，商洽经济合作事宜，促进双边合作关系的健康发展。

（一）促进港口建设及互联互通

海上丝绸之路以港口建设及互联互通为重点，促进海上航道的安全与高效。中国已经斥资100亿美元的海上合作基金用于东南亚和印度洋具有战略重要性沿岸国家建设港口、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目前主要用于帮助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的港口和道路建设，未来还要扩大非洲国家的港口和铁路项目建设，帮助这些国家发展电子商务、改进通关制度等能力建设，推动海关、质检、电子商务等部门的协调合作，实现基础设施标准协调化以及通关制度便利化，协调沿线国家运输与安全标准，降低贸易和投资成本。但海上丝绸之路所需要解决的支持海上互联互通的技术问题可能因为基础不足，而面临严峻的挑战。

（二）发展海洋产业促务实合作基础

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以经略海洋和海洋经济为重点，需要以海洋船舶、海洋工程装备等综合性较强的配套产业为基础，发展海洋科考和海洋调查、远洋运输和远洋渔业合作；与此同时，海洋船舶、海洋工程装备需要提供原材料、配套产品、运输系统、石化产业等众多基础配套产业。我国的海洋工业生产技术设备落后，资源综合利用率低、产品质量较低、成本高，影响了海洋高新技术成果的商品化和产业化。因此，从我国海洋相关产业的发展态势看，与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的配套要求仍有相当距离，基础设施建设和相关配套产业链需要加强。

（三）创新投融资机制促进金融合作

港口建设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需要巨额资金。国际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无法满足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但亚洲地区有足够的外汇储备和民间储蓄，如何动员这些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创新融资和利益分配机制和强化金融风险监管。中国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得到印度等相关国家的支持；中国设立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及中非合作基金，以及推进公私伙伴关系（PPP）计划，这些举措能够利用市场机制动员更多的国家参与新丝路基础设施建设；扩大亚洲债券市场以及双边货币互换规模，促进双边金融机构合作，共同建设香港、新加坡、迪拜、伦敦等离岸人民币交易中心，促进丝路沿线国家的货币流通。

（四）建设合作平台与经贸新规则

目前，我国搭建了中国非洲合作论坛、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中国海合会经贸合作论坛、中国欧盟合作论坛及中国拉美合作论坛等非约束性合作机制，签署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中国巴基斯坦自由贸易协定、中国新加坡自贸协定、亚太贸易协定、中国新西兰自贸协定、中国智利自贸协定、中国秘鲁自贸协定等制度性合作机制，以及与绝大多数沿线国家签署了双边或多边投资协定等。此外，还搭建了中国东盟商品博览会、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及十多个境外经济合作区等合作平台。中国应根据海上丝路建设的需要与战略安排跟沿线国家搭建更多的自贸区，双边投资协定

和境外经济合作区，简化出入境签证手续以及组建丝路沿线港口城市联盟等合作机制，促进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为双边和多边经济合作提供制度保障。

（五）实现内外联动与统筹协调

海上丝绸之路涉及的各国政府，应通过协商沟通，形成区域开放合作的基本政策，同时协调区域发展的能源、交通、通讯整体布局和优势产业、主导产业群，提出区域国家间开展横向经济联合与协作的具体方案。海上丝路建设还涉及国内部门与地区协调参与的问题。国内各部门和地区如何融入新海上丝路倡议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国内各部门相互掣肘，地区之间定位趋同相互竞争。如何形成合力共同对外，分工协作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国内区域之间应有所分工，比如西南诸省应面向南亚，重点拓展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中南半岛地区，北部湾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是链接西南诸省的出海通道应着力发展交通运输业。而广东、福建、浙江、上海、江苏、山东等省则应重点拓展印度洋沿岸的南亚、西亚、非洲地区，以及南太平洋岛国和拉美地区。

（六）深化开放与创新体制机制

中国要走向国门必须建立开放型经济体制，做到内外协调。比如我国的车辆和船舶要到国外，就要允许国外船舶和车辆进入我国境内。但我国公安和边防部门不答应。国内部门对外经贸很不熟悉，国内口与对外口协调困难，要打破利益集团的藩篱，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因此，要利用开放倒逼改革的机制，进行国内体制机制创新，尽力适应丝路建设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

六、海上丝绸之路应妥善协调的若干重大关系问题

重返海上丝绸之路是一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安全与外交的综合性战略，必须处理好几组重大关系问题。

第一，处理好传播和平理念与处理海上争端的关系。中国要想和平崛起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面临着无穷挑战。要实现丝绸之路精神，就需要分析中国周边所面临的挑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与日本和部分东盟国家的海上争端。处理海上争端，中国需要足够的理性与耐性，不让争端升级严重到影响区域合作的程度。也就是中国尽量要用和平协商的方式处理纠纷。倡导和平利用和合作开发海洋资源，用互惠互利和共同发展来消弭分歧，避免因海洋争端发生战争。

第二，处理好中印地缘政治的竞争与合作关系问题。印度与中国存在陆上领土纠纷，颇为关注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中国要重返丝绸之路进入印度洋必然要引起印度的关注。中国与印度相处数千年，没有爆发过大的冲突；中国高僧玄奘到印度学习取经被传为佳话。今天中印隔着难以逾越的喜马拉雅山脉，两国不存在爆发大规模冲突的基础。中国走向印度洋如果能照顾到印度的地缘政治利益，就可以找到巨大的合作空间。比如扩大进口、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合作，产业合作等，对方都是具有吸引力的巨大市场。

第三，处理好经济与文化相互支持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影响力正在辐射亚洲、非洲、中东和拉美地区。中国倡议的重建丝绸之路，首先当然是经济利益的互动。但中国需要为这些地区提供公共产品、输出软实力，就需要解决经济与文化相互支持的问题。实际上，在构建国际经济合作机制的过程中，经济的辐射力与文化传播力同样重要。应充分利用丝绸之路文化与精神，扩大我国与沿线

国家和地区的人文交流，包括学术研究、文化、教育、医疗、文化创意产业的合作，提升我国的软实力，为推动经济合作奠定民意基础。

第四，处理好国内产业升级与产业转移的关系问题。有学者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所要解决的是资源魔咒问题，而海上丝绸之路则要解决产业转移和市场问题，构建以中国为核心的国际生产网络体系。像美国与东亚建立的生产与消费的关系那样，中国与周边构建生产与消费体系，我们的经济基础还很不够。可以根据比较优势原则，将中国具有比较优势或即将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向东盟及欠发达国家和非洲国家转移；加强与印度、海湾国家、南非等国家和地区新能源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合作，探索与沿线国家建立生产分工体系，完善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将国内生产过剩的产业向这些地区转移，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

第五，处理好航道安全与境外资产保障问题。不仅航道安全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而且中国“走出去”企业和员工的财产生命安全也需要提供安全保障。若无能力自卫，一切都是空谈，比如中国在伊拉克、利比亚、苏丹等国的资产损失。中国护航及对外救援和救灾需要建立综合性保障基地。过去我国搭美国的便车，几乎没有对这条航道安全投入力量。随着美国页岩气开发成功及能源自给，战略力量转向亚太和调整军事部署，中国需要确保不会出现威胁其战略利益和新丝路安全的力量真空。当然，中国战略力量进入丝绸之路，必须与相关方进行合作，比如东盟国家（如湄公河联合执法）、海湾国家（如亚丁湾护航）、印度洋国家，建立共同安全机制来保护航道安全以及中国走出去企业和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

表 1：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经济关系（2012 年）

中国与对象国		经济概况		双边贸易		双边投资	
		GDP (亿美元)	人口 (百万)	出口 (百万美 元)	进口 (百万美 元)	对外投资 (百万美 元)	利用外资 (百万美 元)
中国—东盟	印尼	8780	246.9	29387.1	21659.5	1361.29	63.78
	马来西亚	3050	29.24	29723.0	28742.9	199.04	317.51
	新加坡	2765	5.312	39168.3	43912.1	1518.75	6305.08
	泰国	2502	66.79	36956.5	26899.6	478.6	77.72
	菲律宾	3660	96.71	7136.4	6159.1	74.9	132.21
	文莱	169.5	0.412	1252.24	355.33	0.99	151.09
	越南	1558	88.77	29035.0	12836.0	349.43	3.16
	柬埔寨	140.4	14.86	2612.2	1682.7	559.66	16.6
	缅甸	594.4	52.8	5673.3	1298.2	3.84	748.96

	老挝	94.19	6.646	937.09	791.03	808.82	2
	东盟小计	23313.49	608.44	181881.13	144336.46	5355.32	7818.11
中国-南亚区域合作联盟	印度	11036	1237	47677.4	18797.19	276.81	44.06
	巴基斯坦	2251	179.2	9276.49	3140.39	88.93	1.83
	斯里兰卡	594.2	20.33	3001.3	161.96	16.75	0.2
	孟加拉国	1164	154.7	7970.09	479.73	33.03	2.27
	马尔代夫	21.13	0.3384	76.488	0.186	0	0
	南亚小计	15066.33	1591.56	68001.768	22579.45	415.52	48.36
	中国与海湾合作委员会	沙特	7110	28.29	18452.9	54861.1	153.67
阿联酋		3838	9.21	29568.3	10851.9	105.11	129.63
阿曼		781.1	3.31	1811.5	16974.9	3.37	0
科威特		1832	3.25	2089.3	10467.2	-11.88	0
巴林		303.6	1.32	1202.7	348.4	5.08	0.79
卡塔尔		1924	2.05	1205.1	7278.1	84.46	27.06
海合会小计		15788.7	47.43	54329.8	100781.6	339.81	207.35
中国与伊朗		5524	76.42	11602.8	24864.3	702.14	4.1
中国与伊拉克		2158	32.58	4912.3	12656.4	148.4	0.93
也门		319.93	23.85	837.6	2899	14.07	2.87
土耳其		7888.63	73.997	15585.7	3509.3	502.5	15.56
海湾国家合计		31679.26	254.28	87268.2	144710.6	1706.92	230.81
中国与埃及		2628	80.72	6590.7	1320.7	119.41	5.67
中国与苏丹		630.3	37.19	1222.2	191.9	-1.69	0.07
中国与埃塞俄比亚		417.2	91.73	2572.4	320.9	121.56	0
中国与吉布提		13.536	0.8597	902.47	0.617	0	0
中国与索马里		9170	10.2	101.11	3.10	0	0
中国与肯尼亚		407.0	43.18	2788.76	52.41	78.73	2.09
中国与坦桑尼亚		282.4	47.78	1162.9	525.0	119.7	0

中国与莫桑比克	142.4	25.2	940.89	403.32	230.52	0	
中国与毛里求斯	104.9	1.29	620.17	10.71	57.83	958.73	
中国与塞舌尔	11.3	0.09	33.17	0.26	53.4	365.07	
中国与马达加斯加	99.8	22.29	542.4	114.4	8.43	0	
中国与南部非洲 关税联盟	4180.6	59.82	15148.9	10139.1	-699.07	16.05	
红海与东非小计	18087.43	420.35	32626.08	13082.4	88.82	1347.68	
中国与欧盟(27国)	166600	505.6	334269.5	212071.1	6119.9	2595	
中国与南太平洋岛国论坛	澳大利亚	15324.08	22.72	8577.1	3823.3	2172.98	337.97
	新西兰	1714.67	4.43	6249	5555.2	94.06	118.9
	巴布亚新几内亚	156.54	7.17	574.8	302.1	25.69	0
	斐济	40.35	0.87	214.03	22.16	68.32	0
	汤加	4.72	0.105	12.6	2	0	1.59
	其他南岛国家(11)	38.337	1.2936	2253.879	415.754	52.05	1767.4
南太岛国论坛小计	17278.70	537.76	17881.41	10120.51	8627.06	2225.86	
中国与拉美太平洋联盟	智利	2662.6	17.46	14432.1	18218.4	26.22	20.75
	秘鲁	1926.36	29.99	7807.5	7849	-49.37	0.16
	哥伦比亚	3703.28	47.7	9564.7	3343.1	83.51	0.03
	墨西哥	11864.6	120.85	56936.1	5720.9	100.42	14.87
太平洋联盟小计	20156.84	216	88740.4	35131.4	160.78	35.81	
总计	292182.05	4134.29	810668.49	582031.92	22474.32	14301.63	
占比	40.20%	58.69%	39.57%	32%	25.6%	12.8%	

2012年世界GDP总值为726800亿美元，世界人口总数为7043.9百万人。

2012年中国出口总额为2048714百万美元，进口总额为1818405百万美元；进出口总额3867119百万美元。

2012年中国利用外资总额为111716.14百万美元，中国对外投资总额为87803.53百万美元

表 2：中国与海上丝路沿线国家合作机制

	重要合作项目	重要合作机制
中国—东盟	<p>中国广西·印尼沃诺吉利经贸合作区位于印度尼西亚中爪哇省沃诺吉利县县城，合作区的产业定位是以木薯为主要原料的精细化工及建材、制药等等行业。2014年4月中国印尼能源论坛签署《印尼巴厘岛塞露坎巴湾电站（380兆瓦）股东合资协议书》、《合资公司组建协议及合作开采矿山、锰产品深加工备忘录》等协议。</p>	<p>1994年中印政府签署《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2001年签署《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协定》2010年4月签署《中国印尼关于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合作会谈纪要》强化基础设施投资。</p>
	<p>1、中国—马来西亚钦州产业园区于2012年4月开工，是中国和马来西亚两国政府合作的第一个园区。 2、中国与马来西亚两国政府共建的关丹产业园区也在同步建设 3、石油合作：中国公司投资石油化工可享受优惠。</p>	<p>《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马来西亚政府关于马中关丹产业园合作的协定》、两国《海运协定》和《民用航空运输协定》</p>
	<p>1、中国和新加坡自由贸易区； 2、中新苏州工业园区； 3、中新天津生态城 4、大连集装箱港码头</p>	<p>《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协定》、《经济合作和促进贸易与投资谅解备忘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新加坡政府自由贸易协定》、《中新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等10多项合作协定</p>
	<p>泰国泰中罗勇工业园是由中国华立集团与泰国安美德集团在泰国合作开发的面向中国投资者的现代化工业区 南宁与泰国农业技术、食品加工、食品安全合作，种植生产橡胶进口。 2007年签署两国《天然气项目合作协议》</p>	<p>《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泰国就中国加入WTO的双边协议》，《中泰双边货币互换协议》</p>
	<p>中国—菲律宾经贸论坛</p>	<p>《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协定》、《经济合作和促进贸易与投资谅解备忘录》、《关于扩大和深化双边经济贸易的框架协定》、2011年《经贸合作五年发展规划》</p>

	文莱	文莱政府将参与《区域全面经济关系协议（RCEP）》谈判	《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协定》、《能源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农业合作谅解备忘录》中国水稻种植、渔业养殖项目。
	越南	龙江工业园是由浙江省前江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在越南前江省投资的工业园项目，园区产业规划以轻工、电子、建材、化工、服装等行业为主； 深圳-海防经济贸易合作区（越南海防安阳工业区）项目； 百色-高平国际公路开通，协议两国货车可以直达指定的地方。	《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协定》、《关于扩大和深化双边经济贸易的框架协定》、2011年《中越经贸合作五年发展规划》
	柬埔寨	《6号公路二期扩建优惠贷款协议》； 《马德旺多功能水坝优惠贷款协议》； 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是中国商务部推动的首批境外经济合作区。	《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中柬经济合作协定》《中柬关于成立经济贸易合作委员会协定》《中柬农业合作谅解备忘录》
	缅甸	中国投资数十亿美元开发位于缅甸西部兰里岛北端的皎漂港，它是中缅油气管道的起点。中缅油气管道项目；中缅木姐-皎漂铁路建设备忘录及补充协议；中国和缅甸公司镍矿合作勘探协议。	《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1971年中缅签署贸易协定，双方给予最惠国待遇，《关于建设中缅原油和天然气管道的政府协议》
	老挝	老挝-中国商业投资论坛 中国电工投资兴建南奔水电站项目的特许经营及购电合作协议。 关于修建公路的协议和航空运输协定，民航和邮电合作协议	《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协定》、《中国、老挝、缅甸和泰国四国澜沧江-湄公河商船通航协定》、《经济和技术合作协定》
中国-亚太贸易协定	印度	正在研究中印自贸区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计划	2006年签署《双边投资保护协定》，1994年签署《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和两国银行合作谅解备忘录》
	斯里兰卡	2011年8月，斯里兰卡与中国招商局国际有限公司签署了科伦坡港南集装箱码头项目BOT协议，总投资超过了5亿。	1986年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关于相互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2003年签署了避免双重征税协议。还签署了互免国际航运和海运收入税收的协议。

	孟加拉国	中国-孟加拉国经贸合作论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计划	1996年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和《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韩国	1、“韩国际产业园区”是中韩最大合作项目，是中国国家商务部确定给予重点扶持的“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园区”之一。 2、2012年5月启动中韩自贸区谈判，2014年5月26日举行第十一轮谈判	《双边投资保护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贸易协定》、《海运协定》
中国与海湾合作委员会	沙特	2004年11月，中国建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在沙特以总承包方式，在沙特西部马加达地区建造了一条日产5000吨水泥的现代化生产线，这是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在沙特承建的首个大型水泥项目	《双边投资保护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与沙特阿拉伯王国商工部关于贸易救济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阿联酋	中国凤城是中国在迪拜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的大型国际化商业项目，是中阿两国经贸合作的亮点	《双边投资保护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双边劳务合作谅解备忘录》
	阿曼		《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协定》
	科威特		《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协定》、《经济、贸易和技术合作框架协议》
	巴林		《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协定》、《经济、贸易和技术合作框架协议》、《互相给予最惠国待遇换文》
	卡塔尔		《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协定》、《贸易协定》
中国与伊朗	能源合作：原油销售协议同意每天向中国出口40万桶石油；伊朗对中国石油工业下游产业投资以维持国际收支平衡	2014年伊朗—中国投资与商贸合作论坛	
中国与伊拉克	油田开发、石油工程协议：30亿美元石油服务合同，中国石油伊拉克公司建设中东油气田合作区；机电市场合作：同意华为、中兴、杭州三泰电子技术有限公司、苏州建材工程有限公司等四家中国企业作为供货经营商	中国-伊拉克经贸合作论坛；中国、伊拉克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混合委员会会议；《中国伊拉克政府航空交通运输协定》	

中国与埃及	埃及苏伊士（西北）经贸合作区是我国政府批准的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由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在埃及设立的埃及泰达投资公司负责开发、建设和运营。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和埃及石油部签署《关于石油合作谅解备忘录》。	《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协定》、《海关行政互助协定》、《关于在石油领域开展合作的框架协议》
中国与埃塞俄比亚	2014年5月中国埃塞俄比亚签署16项合作协议，内容涉及经贸合作、电力建设、矿物开采、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承包项目。	《中国与埃塞俄比亚双边投资促进和保护协定》、《政府间科学技术合作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协定》
中国与坦桑尼亚	由中国公司投资建设的坦桑尼亚巴加莫约港口和临港工业区	《中国与坦桑尼亚双边投资促进和保护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坦桑尼亚联合国政府提供优惠贴息贷款框架协议》、《航空运输协定》
中国与索马里		《经济与技术合作协定》、《中国索马里贸易协定》
中国与肯尼亚	中国在肯尼亚修建的蒙巴萨-内罗毕铁路	《双边投资保护协定》
中国与毛里求斯	毛里求斯天利经贸合作区是国家商务部批准的首批境外经贸合作区之一，由山西天利实业集团投资建设	《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协定》、《双边劳务合作协定》
中国与塞舌尔		《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协定》
中国与巴基斯坦	1、巴基斯坦拉哈尔中国经济区特区，是经商务部批准建设的首批“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之一。2、2012年巴政府将境内唯一深水港瓜达尔港的控股权交给三家中国企业，分别是中国海外港口控股公司、招商局国际有限公司和中国远洋运输集团。3、中国和巴基斯坦自由贸易区和中巴经济走廊	《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协定》、《中巴自由贸易协定》、2011年《中巴经贸合作五年发展规划》
中国与莫桑比克		
中国与马达加斯加		《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

中国与南部非洲联盟	中国-南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项目；中国建设银行与南非兰特银行达成战略合作谅解备忘录，扩大双方咨询、融资、投资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中国莱索托土地利用规划技术援助项目。	《中国和博茨瓦纳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中国和博茨瓦纳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协定》、《中国和纳米比亚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国和南非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中国和南非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协定》、《中国南非政府海运协定》和《海关互助协定》	
中国与欧盟 (27国)	1、2008年6月，中国远洋集团的以43亿欧元获得了位于希腊首都雅典的比雷埃夫斯港35年的专属经营权。2、2010年中国大陆上港集团成为比利时泽布吕赫码头公司第二大股东。	中国-欧盟合作论坛、《中国与欧盟贸易与经济合作协定》、拟议中的《中国与欧盟投资保护协定》	
中国与南太平洋岛国论坛	澳大利亚	1、2007年9月4日澳大利亚西澳铁路和Oakajee港口项目投资合作协议正式签署； 2、1994年12月22日，澳中集团公司与江苏省吴江市人民政府合作建立澳大利亚工业园区的协议正式签定 3、中国与澳大利亚自贸区正在谈判	1、1988年签署《相互鼓励和保护投资协定》；2、1985年签署《避免双重征税协定》；3、1999年签署《关于在信息产业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4、2001年签署《中澳运输合作谅解备忘录》；5、2003年签署《中澳贸易与经济框架协议》、《中澳关于相互承认高等教育文凭和学位证书的协议》、《中澳天然气技术伙伴关系基金管理协议》；6、2004年签署《中澳政府民用航空运输协定》
	新西兰	1、2014年北京通用航空有限公司与新西兰太平洋航空航天公司全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暨中新航空产业园成立； 2、已签署协定的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区	1986年9月关于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协定 1988年11月两国投资保护协定 2008年中国与新西兰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巴布亚新几内亚	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投资开采的瑞木镍钴矿项目，是迄今为止我在太平洋岛国地区最大的投资项目	1976年10月12日两国建交；1991年签署《双边投资保护协定》；1994年签署《避免双重征税协定》；1996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政府渔业合作协定》；1996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政府贸易协定》；1997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政府关于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与巴新互免签证协定》；

	斐济	<p>1、2011年5月30日，第110届广交会招商招展工作组与斐济-中国贸易委员会在苏瓦假日酒店共同举办“第110届广交会苏瓦推介会”；</p> <p>2、2012年9月14日竣工的南德瑞瓦图水电站位于主岛中北部 Sigatoka 河源头上游，建设合同总额 1.24 亿美元，中国开发银行提供约 60% 的商业贷款，其余由 ANZ 银行和 BSP 银行融资。工程由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总承包建设；</p>	<p>《中斐农业、矿业、教育合作谅解备忘录》3 个文件</p> <p>《中斐加强基础设施合作谅解备忘录》</p> <p>《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与斐济总商会机构促进经贸合作谅解备忘录》</p> <p>《中国地震局与斐济群岛共和国矿产资源局地震研究合作谅解备忘录》</p> <p>2011年4月18日，中国贸促会与斐济贸易投资局在苏瓦共同举办“中国-斐济贸易投资论坛”</p>
	汤加	<p>1、中国华闻事业发展总公司和汤加国际日期变更线酒店有限公司于2001年5月正式成立了中汤间第一家合资企业—晋富国际日期变更线酒店有限公司，于10月开始试运营</p> <p>2、2004年9月，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与汤加海岸线有限公司就更新升级汤加移动通讯设备和技术进行合作</p> <p>3、2011年8月2日，中国援汤加主岛干线公路升级改造二期项目施工合同签订仪式在汤加交通部举行</p>	<p>1、2005年1月19日中汤双方签署《中汤双边市场准入协定》；</p> <p>2、2005年4月13日双方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旅游局和汤加王国政府旅游观光局关于中国旅游团队赴汤加旅游实施方案的谅解备忘录》；</p> <p>3、2010年9月21日中国银联和汤加旅游协会签署了合作备忘录；</p> <p>4、2011年3月4日签订了关于中国向汤加提供无偿援助的经济技术合作协定。</p>
	基里巴斯		<p>1、1980年6月25日两国建交；2、1990年2月、1994年3月和1999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基里巴斯共和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3、1996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基里巴斯共和国政府关于在基里巴斯建立中国航天测控站协定》；3、1997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基里巴斯共和国政府关于基里巴斯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保留名誉领事馆协定》；4、1998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基里巴斯共和国政府贸易协定》；</p>

中国与太平洋联盟	智利	<p>1、2007年7月12日上海港与智利瓦尔帕莱索港正式结成友好港口</p> <p>2、2009年11月13日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智利共和国政府航空服务协定》；</p> <p>3、2009年11月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智利共和国政府关于海关合作与行政互助的协定》；</p>	<p>1、1970年12月15日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智利共和国政府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p> <p>2、2005年11月18日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智利共和国政府自由贸易协定》；</p> <p>2008年4月13日签署《关于服务贸易的补充协定》；</p> <p>2012年9月9日签署《关于投资的补充协定》</p>
	秘鲁	<p>1、2014年中国、巴西、秘鲁将共建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两洋铁路</p> <p>2、已签署协议的中国-秘鲁自由贸易区</p>	<p>1988年签署《中国和秘鲁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基础协定》</p> <p>1994年签署《中国和秘鲁政府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议》；</p> <p>2009年签署《中国-秘鲁自由贸易协定》</p>
	哥伦比亚	<p>1、2012年5月10日上午，中国-哥伦比亚贸易和投资论坛在北京召开</p> <p>2、正在研究中国与哥伦比亚自由贸易区</p>	<p>1981年7月建交。2004年4月，中哥两国农业部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与哥伦比亚农业及农村发展部农业及相关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p> <p>6、2005年5月，中国信息产业部与哥通讯部签署《中国信息产业部与哥通讯部电讯领域合作协议》；</p> <p>7、2005年5月，中哥两国政府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哥伦比亚共和国动、植物检疫协定》；</p>
	墨西哥	<p>墨西哥中国(宁波)吉利工业经济贸易合作区</p> <p>2008年7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墨西哥合众国政府关于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的协定</p> <p>2005年9月12日中国政府和墨西哥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p>	<p>2013年6月4日签署以下8个：</p> <p>1、中国商务部与墨西哥经济部关于加强贸易救济合作的谅解备忘录；</p> <p>2、中国商务部与墨西哥通信交通部关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p> <p>3、中国商务部与墨西哥经济部关于在高层工作组机制下设立新兴产业经贸合作工作小组的谅解备忘录；</p> <p>4、中国商务部与墨西哥经济部矿业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p> <p>5、中国进出口银行、墨西哥国民银行与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框架协议；</p> <p>6、关于共同举办第九届中国—拉美企业家高峰会的谅解备忘录；</p> <p>7、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与墨西哥投资和贸易促进局关于中国—拉美企业家理事会合作的谅解备忘录；</p> <p>8、中国进出口银行与墨西哥外贸银行合作协议</p>

作者简介:

全毅, 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委员, 福建社会科学院亚太经济杂志总编, 研究员。研究方向: 亚太经济与国际贸易;

汪洁, 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国际贸易专业研究生;

刘婉婷, 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专业研究生。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空间范围、 时代特征与战略愿景

黄茂兴、贾学凯

海上丝绸之路自古有之，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一直是中外进行经贸与文化往来的海上大通道。随着 21 世纪中国的崛起和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这条古老的通道又开始焕发出新的活力。2013 年 10 月 3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东南亚国家，在印尼做了题为《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演讲，提出要与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发展海洋伙伴关系，共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¹。当前，“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已成为政界、商界、民间、学术界所关注的焦点。本文试着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来阐述“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内涵、时代特征、空间范围和战略目标，以期能对深化这一重大战略认识提供有益参考。

一、“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内涵与空间范围

1.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内涵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源于古海上丝绸之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被重新提出，是新一届中央政府对外战略的顶层设计，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战略概念，中国在丝路沿线国家所进行的有利于互联互通、区域合作、共同发展的外交举措都可以归到“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之下，因此“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可以说是一个指引合作的理念，实现合作的平台。下面，着重从合作动机、合作内容和合作模式三个方面来阐述“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具体内涵。

第一，维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构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根本动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融入全球化进程，对外经贸联系日益加深，2013 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 4.16 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吸引外资 1239 亿美元，连续多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输入国，对外贸易与投资对稳定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已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但随着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经济的稳定受到剧烈冲击，对外贸易投资过度依赖发达国家的问题凸显。同时随着美国的战略东移，中国与周边国家在东海、南海上的利益冲突频发，中国遵循多年的保守型外交策略受到严峻挑战。中国经过 30 多年的快速发展，现已成为世界经济总量第二大国、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第二大吸收外资国、第三大对外投资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参与全球化的物质实力日渐增强，但受制于经济体制的影响，“引进来”与“走出去”仍受到诸多限制，

¹习近平.《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在印尼国会的演讲[R]. 人民网, 2013-10-03.

依然不具备引领全球化的能力。当今世界，区域合作已主导全球化发展，TPP、TTIP 等超大自由贸易区的形成，必将会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全球需求结构深度调整，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2008—2012 年发展中国家进口总额占全球进口的比重由 39% 升至 45%，全球经贸格局东升西降趋势明显¹。因此，通过建设“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促进区域合作，形成良好的外部环境，积极开拓新兴市场，发挥强大的物质基础优势，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更大的影响力参与到全球化的进程当中，对维持经济的稳定发展，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意义。

第二，构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涉及的内容众多，重点围绕“五通”的战略倡议而展开，即“政策沟通、道路连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想通”。“五通”是“一带一路”战略首次提出时的核心内容，为后续的一系列丝路外交奠定了基础。本文以“五通”为基础，并整合后续丝路外交中我国政府及领导人所提出的各种政策、方针、措施、项目，将“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建的主要内容概括为：统一的政策法规、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便利的贸易与投资、以本币为主的金融合作和更加紧密的人文联系。其中，统一的政策法规，主要包括巩固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政治互信，在此基础上求同存异，协调各国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协商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整合各方在贸易、投资、金融、海关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法规和管理制度，让政策法规为区域经济融合开绿灯。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建设是构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初期重点，包括海上港口互联互通，港口与腹地互联互通，陆上铁路、公路互联互通，空中航线互联互通，通信网络互联互通，能源管道互联互通，形成亚非范围内的高效互联的基础设施网络，为打造新的区域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实现区域融合奠定物质基础。便利的贸易与投资是“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内容，通过贸易与投资便利化的制度安排，降低贸易壁垒与投资限制，提高双边、多边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水平，释放各国的贸易投资潜力。中国的企业要借助“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积极“走出去”，化解国内产能过剩与国内资本走不出去的问题，尤其是在能源方面，要发挥中国资本与技术的优势，扩大海外能源产业的投资，确保国家的能源安全。金融合作是“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的助推器，以本币为主的金融合作包括稳步开放金融市场，扩大本币结算和货币互换的规模，建立多边结算体系与货币互换网络，构建和完善区域金融安全和服务网络；中国应积极推动人民币走出去战略，使人民币成为区域性的功能货币，并主导建立区域性的开发基金或银行，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推进提供融资渠道。更加紧密的人文联系包括，加强政府层面的沟通和民间的交流，扩大旅游、教育、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人员往来，密切人文交流，为各国之间的合作打好感情基础。

第三，“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涉及国家多，跨越范围广，国家之间差异巨大，利益诉求难以统一，决定了它不可能采用传统的区域合作模式，即要通过签署统一的自由贸易协定，构建自由贸易区，然后升级为货币共同体与政治共同体。传统的合作方式要求各个国家对主权和利益做出巨大的让步，不可能符合“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建的现实，因此“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1 汪洋.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人民网. 2013-11-22.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1122/c1001-23620181.html>

不能是零和博弈，或是利益换利益，而是采取更加务实的合作模式，在不损害各国现有利益的前提下，实现利益最大化，打造利益共同体。“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不是一个实体和机制，而是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将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合作机制，借助区域合作平台，通过更多的双赢或多赢的经济合作项目和贸易与投资便利化制度来促进区域融合发展，不寻求建立排他性的关税同盟或是超国家的管理机构，而是在开放、包容、平等、互利的原则上促进区域合作，最终实现各国共同发展。

2.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主要空间范围

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有三条航线，分别为东海航线：主要是从中国的东部港口出发到达朝鲜、日本；南海航线也是影响最大的一条航线：主要从中国的东南和南部的港口出发，经东南亚、南亚的各个沿海国家到达西亚、北非和印度洋西岸的沿海国家；美洲航线：主要从福建的泉州出发，经菲律宾的马尼拉到达美洲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建主要围绕着南海航线展开。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提出之后，中国高层“海丝”外交所涉及到的国家包括东盟十国，南亚的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马尔代夫，西亚和北非的阿拉伯联盟。我们将这些国家划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空间范围，并根据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各国联系的紧密程度，分为三部分即东盟部分、南亚部分、波斯湾和红海部分(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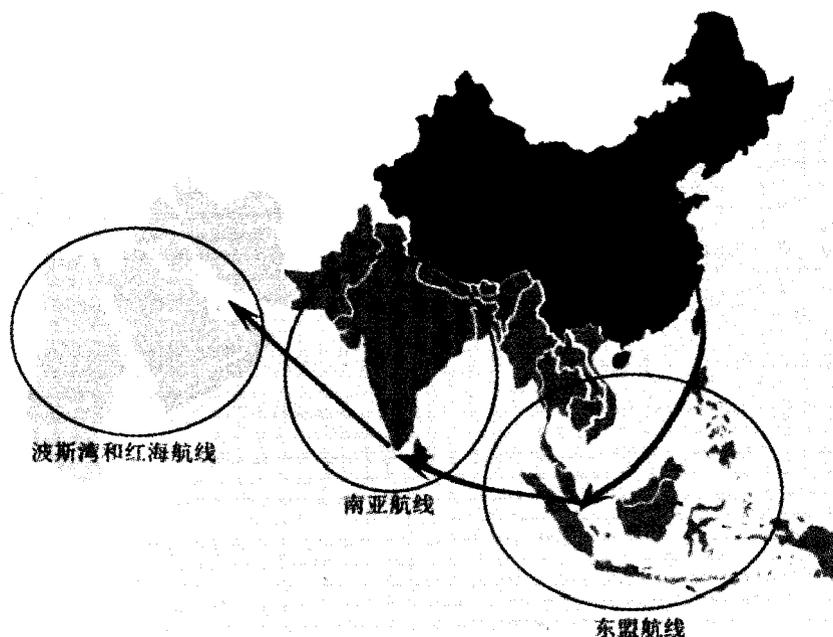


图1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主要空间范围

首先，东盟航线。东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空间范围内距离中国最近并与中国联系最紧密的部分，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中之重。如表1所示，东盟人口与经济总量巨大，大部分国家都是中低收入国家，经济增长迅速，除老挝之外都为海洋国家，拥有新加

¹ 陈炎. 略论“海上丝绸之路”[J]. 历史研究, 1982, (06).

坡、马尼拉、雅加达、海防等众多的港口城市。中国和东盟山水相连，血脉相亲、文化相通，利益相融，自 1991 年中国与东盟开启对话进程以来，双方已在互联互通、金融、海上、农业、信息通信技术、人力资源开发、相互投资、湄公河流域开发、交通、能源、文化、旅游、公共卫生、环境等 20 多个领域开展合作。目前双方互为重要的投资贸易伙伴，2013 年双边贸易额达到 4436 亿美元，东盟已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成为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东盟相互投资总额在 2013 年达到 140.9 亿美元，东盟成为中国企业投资合作的首选地，目前中国企业 16 个境外经贸合作区有 5 个落户东盟，为各区域之最。根据新加坡大华银行调查显示，中国有六成企业计划对外投资，且首选东南亚地区。中国东盟的合作机制、平台众多，涉及政治、经贸、安全、科技、文化、次区域合作、海上合作等方方面面，其中，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是中国与东盟最重要、最高级别的对话机制，是中国东盟合作的风向标；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是推动中国与东盟的全面经济合作，促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重要经贸合作平台；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是中国设立的，专注与投资东盟基础设施、能源和自然资源等领域的离岸股权投资基金，对东盟的公路、铁路、水路、航空、信息通信的互联互通起了重大作用。中国、东盟在经贸投资上越来越深的相互依赖关系，以及自贸区的建设和各种各样的合作机制都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在东盟的推行奠定良好的基础。

可以说，东盟是推进“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中之重，做好东盟范围内的“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会对其他部分的推进产生巨大的示范效应。在“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框架下，东盟范围内区域合作的拓展空间和重点发展方向有：一是积极推动自贸区升级谈判，扩大双方贸易投资开放的领域，力争使双边贸易额在 2020 达到 1 万亿美元，新增双向投资 1500 亿美元；二是已经推动达成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合作框架，提升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规模，用好中国—东盟互联互通合作委员会、国—东盟交通部长会等机制加强陆上海上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推动“泛亚铁路”的建设；三是利用好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稳步推进包括海洋经济、海上环保科研海上搜救等在内的海上合作；四是共同制定《中国—东盟文化合作行动计划》，密切人文、科技、环保等交流。

表 1 2013 年东盟航线范围内主要国家概况

国家和地区	总人口 (亿人)	GDP ^① (亿美元)	人均 GDP ^① (美元)	GDP 增长率 (%)	主要港口城市
文莱	0.04	161.1	38563.3	-1.75	斯里巴加湾港、 麻拉
柬埔寨	0.15	152.5	1007.6	7.46	西哈努克港
印度尼西亚	2.50	8683.5	3475.2	5.78	雅加达
老挝	0.07	111.4	1645.7	8.15	NA
马来西亚	0.30	3124.4	10513.7	4.68	巴生港、槟城

缅甸	0.53	531 ^②	870.8 ^②	6.3 ^②	仰光
菲律宾	0.98	2720.2	2764.6	7.16	马尼拉
新加坡	0.05	2979.4	55182	3.85	新加坡
泰国	0.67	3872.5	5779.0	1.77	曼谷、林查班
越南	0.90	1713.9	1910.5	5.42	海防、胡志明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注:①现价美元 ②2012年数据)

其次,南亚航线。南亚航线位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中段,面向印度洋,是世界商贸水上要道,全球一半集装箱货运、1/3散运及2/3石油运输都要取道印度洋,它是东南亚和东亚连接非洲、中东、欧美的必经之路¹。南亚部分四个国家除马尔代夫外,其他三个国家均为中低收入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但增长迅速,都为海洋国家,主要港口城市包括:加尔各答、孟买、卡拉奇、瓜达尔、科伦坡。印度是南亚最重要的国家,为仅次于美国、中国、日本的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但长期以来受经济结构互补性不强和印度市场开放程度低等因素的影响,中印两国的经贸关系与两国的经济规模并不匹配,2013年双边贸易额为654亿美元,2012年投资额仅为3.2亿美元,投资贸易空间急待开拓。另外,印度一直视中国为竞争对手,而且一直存在着领土纠纷,中印之间长期缺乏信任。巴基斯坦是南亚的重要国家,中国全方位的战略伙伴,临近世界能源基地波斯湾,是中国在南亚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战略基点。南亚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普遍落后,因此工程承包成为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的亮点,2013年中国在这四个国家的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达到111亿美元,其中印度、巴基斯坦是中国对外工程承包的第四大和第八大市场。中国对南亚的工程承包重点集中在港口建设,其中瓜达尔港是中国承包建设的巴基斯坦第三大港,靠近霍尔木兹海峡,是印度洋上的咽喉要地,将来可以作为东亚国家转口贸易及中亚内陆国家出海口,中国在2013年2月取得瓜达尔港的经营权,使得中国通过“中巴经济走廊”开通一条从阿拉伯海直接通往新疆等西部地区的能源的通道成为可能。另外斯里兰卡的科伦坡港南集装箱码头和汉班托塔港也是中国参与建设的重要海港,科伦坡港南集装箱码头是中国在斯里兰卡的最大投资项目,建成后会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枢纽。在自贸区建设上中国与这四个国家还处于起步阶段,只与巴基斯坦签署了完整的协议,在合作机制和平台建设上也不够完善,仅在一些政府层面的对话机制,缺乏更能激活贸易与投资合作的工商界的合作平台。

南亚处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枢纽地带,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至关重要,但中国与南亚的合作现状是:与小国的联系紧密程度远远大于地区超级大国印度。因此,加深与印度的合作,发展与印度的战略伙伴关系成为南亚部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关键。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框架下,南亚范围内区域合作的拓展空间和重点发展方向:一是推进自贸区建设,扩大双方贸易投资额,尤其是尽快启动与印度的自由贸易区谈判,争取在2020年使双边贸易额达到1500亿美元;二是通过铁路、公路的等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建设进程,通过参与南亚港口建设推进海上互联互通;三是加大对南亚尤其是印度的工业

¹ 卢永昌,李苏.斯里兰卡 Hambantota 港口项目港址选择及一期工程设计介绍[J].《水运工程》,2009(7):45.

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工业园区,升级和修建高速铁路;四是建立海上合作对话机制,就海洋事务、海上安全交换意见,坚强海上合作;五是共同制定“文化交流计划”,密切人文联系。

表 2 2013 年南亚航线范围内主要国家概况

国家和地区	总人口 (亿人)	GDP ^① (亿美元)	人均 GDP ^① (美元)	GDP 增长率 (%)	主要港口城市
印度	12.52	18768.0	1498.9	5.02	加尔各答、孟买
巴基斯坦	1.82	2366.3	1299.1	6.07	卡拉奇、瓜达尔
斯里兰卡	0.20	671.8	3279.9	7.25	科伦坡、汉班托塔
马尔代夫	0.00	23.0	6665.8	3.71	马累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注:①现价美元)

最后,波斯湾和红海航线。波斯湾和红海航线区域范围内主要是阿拉伯国家联盟。阿拉伯国家联盟简称阿盟,由西亚和北非的 22 个阿拉伯国家组成,包括阿尔及利亚、阿联酋、阿曼、埃及、巴勒斯坦、巴林、吉布提、卡塔尔、科威特、黎巴嫩、利比亚、毛里塔尼亚、摩洛哥、沙特、苏丹、索马里、突尼斯、叙利亚、也门、伊拉克、约旦、科摩罗。阿盟国家是世界最主要的能源基地,拥有全球 62% 的石油储量和 24% 的天然气资源,对中国乃至世界的能源安全都至关重要。阿盟国家经济发展状况表现不一,如表 3 所示,有高收入的产油国,如海合会六国的沙特、阿联酋、阿曼、卡塔尔、巴林、科威特,这些国家社会稳定,经济增长迅速;也有低收入的非产油国,如也门,北非的苏丹、埃及,社会局势动荡,经济甚至出现负增长。阿盟国家重要的港口城市有达曼、吉达、迪拜、多哈、苏赫奈泉、苏丹港等。古代阿拉伯商人和中国的商人就通过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往来于中阿之间,为东西方文明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当代中阿在资源禀赋和经济结构上的互补性,使中阿经贸联系日趋紧密,为中阿携手共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目前,中国已是阿盟国家第二大贸易伙伴,阿盟国家是中国第七大贸易伙伴,中阿贸易额在 2013 年达到 2389 亿美元,阿盟更是中国最主要的能源合作伙伴、重要的工程承包和海外投资市场,2013 年中国从阿拉伯国家进口原油达 1.33 亿吨,占中国总进口量的 47.2%,在阿盟完成承包工程营业额达到 234.26 亿美元,沙特成为中国对外承包工程第二大市场。在自贸区建设上中阿还处在比较落后的阶段,目前中国与阿盟内部海合会的自贸区谈判已处于停滞状态,自贸区谈判亟待重启。中阿合作论坛是中阿之间最重要的交流机制,下设部长级会议、高管委员会、企业家大会、能源合作大会、高教和科研交流、文化交流等多个子机制,是促进中阿合作和推进“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全方位平台。

阿拉伯国家位于“一带一路”的西端交汇地带,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天然和重要合作伙伴。建设好“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阿应利用好现有的合作机制,尤其是中阿论坛,发挥好各国的优势,促进资源要素在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之间有序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突破中阿务实合作转型升级面临的瓶颈制约,实现从能源到投资、科技、文化全方位的合作。在“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框架下,波斯湾和红海范围内区域合作的拓展空间和重点发展方向:一是扩大中阿双边贸易

和相互投资，并就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建立适当的制度安排，尽快重启与海合会的自贸区谈判；二是加强中阿在铁路、公路、港口、民航、电信等领域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积极参与阿拉伯半岛铁路等战略项目建设；三是拓展金融、核能、航天等新领域合作，带动中阿务实合作转型升级；四是深化油气领域上下游合作，开拓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领域合作，实现双方能源发展长期规划的对接；五是扩大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人文领域交流，促进文明之间的交流对话。

表 3 2013 年波斯湾和红海航线范围内主要国家概况

国家和地区	总人口 (亿人)	GDP ^① (亿美元)	人均 GDP ^① (美元)	GDP 增长率 (%)	主要港口城市和 自贸区
沙特阿拉伯	0.29	7452.7	25851.6	3.80	达曼、吉达
阿联酋	0.09	3838 ^②	41681. ^②	4.37 ^②	迪拜、沙加
阿曼	0.04	805.7	22180.8	5.07	玛斯奎特
卡塔尔	0.02	2024.5	93352.0	5.55	多哈
巴林	0.01	327.8	24612.5	5.49	巴林港
科威特	0.04	1832.2 ^②	56366. ^②	6.19 ^②	科威特城
伊拉克	0.31	2228.8	6669.5	3.95	巴士拉
也门	0.24	359.5	1473.1	4.16	亚丁港
埃及	0.82	2719.7	3314.5	2.10	苏赫奈泉
苏丹	0.38	665.5	1752.9	-6.00	苏丹港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注：阿盟成员国有 22 个，本文选取波斯湾和红海沿线的海合会六国及伊拉克、也门、埃及、苏丹四国做重点介绍。①现价美元。②2012 年数据。)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涉及的空间范围十分广阔，国家众多，各国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社会文化等方面差异较大，因此其构建过程必定漫长复杂，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秉持平等开放的原则，从实施起来比较容易的国家开始，然后以点带面、逐步推进，最终实现广泛区域内的深化合作。

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时代特征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党中央、国务院根据全球形势深刻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不仅对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意义，而且会对构建新型的世界经贸格局，促进全球化进程，实现各国经济繁荣、人民生活幸福，以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一)“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实现“两个 100 年”奋斗目标的重要战略支撑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两个 100 年”的奋斗目标，即在党成立 100 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在新中国成立 100 周年时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两个 100 年”目标是中国梦的核心内容，是中国人民一直追逐的梦想。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启，中国终于踏上了实现梦想的正确道路，改革开放也成为了决定当代中国命运和实现“两个 100 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一步。当前，中国逐渐走到了改革的攻坚区、深水区，如何深化改革开放，支撑中国进一步发展，成为了实现“两个 100 年”奋斗目标的关键。“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有助于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和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对内倒逼改革，释放制度红利；对外拓展空间，谋求更大发展，通过实现深化改革为“两个 100 年”奋斗目标提供重要战略支撑。“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中国站在对外开放新起点上，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的主动出击，必将推动中国利用好战略机遇期，渡过经济社会转型的矛盾凸显期，向着实现“两个 100 年”奋斗目标昂扬前进。

（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连接中国梦与世界梦的桥梁

鼓励其他国家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寻求中国梦与世界梦的相通性，是中国模式之国家治理与民族复兴层面在外交领域的体现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中国的外交理念，亲、诚、惠、容是中国的周边外交理念，“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模式，就是这些外交模式和外交理念的具体表现。首先，“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尊重各国的发展模式，不干涉他国内政；其次，“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致力于做大共同利益，通过各国发挥各自比较优势，促进区域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把经济互补性转化为发展推动力，做大共同利益的蛋糕，形成互补互利互惠的良好局面；再次，“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会对周边国家乃至整个世界发展带来巨大的机遇，今明两年，将有 1/3 的中国省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 1 万美元，未来 7 年，预计中国将进口超过 17 万亿美元商品，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达到 1.2 万亿美元，到 2020 年，将有 6 亿中国人进入中等收入阶层，一个巨大的“世界市场”将日益呈现在世人面前。“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发挥各自优势，实现多元共生、包容共进，共同造福于本地区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为基本路径，即不损人利己，也不图谋霸权，给亚洲和世界带来的是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通过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将“中国梦”与“世界梦”相连，通过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来实现各国经济共繁荣，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梦。“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连接中国梦与世界梦的桥梁，通过实现中国梦来促进实现世界梦，又通过实现世界梦形成良好的外部环境促进中国梦的实现，最终实现全世界共同的繁荣发展。

（三）“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错综复杂的竞争环境下的战略突围

当前，世界形势深刻变化，新兴国家不断崛起，发达国家实力下滑，虽然新兴国家不断重塑着国际竞争格局，但发达国家仍掌握着世界政治、经济、安全博弈的主导权。进入 21 世纪，世界范围内市场、技术、资源等方面的竞争日益激烈，经济危机后美国积极推动 TPP 与 TTIP 的谈判来主导新的国际贸易规则，并试图将中国排除在新的贸易体系之外；世界经济中心东移，亚太逐渐成为各国利益争夺的焦点，尤其在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后，美国提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积极拉拢日、韩、菲遏制中国的崛起，挤压中国在亚太的战略空间；区域合作方兴未艾，中国虽然很早就主导成立了

1 中国外交模式的意义[N]. 王义桅.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4-9-22(01).

以安全问题为主要内容的上海合作组织，但在其他的多边的区域合作方面并没有什么建树，与中国联系最紧密的东亚一体化也是由东盟主导，并随着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美国和俄罗斯加入东亚峰会，使得东亚一体化进程中的大国博弈更加激烈。“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下拓展战略空间的主动出击，有助于中国整合区域资源，构建自己主导的区域经贸体系，变革现有的世界经贸格局；有助于中国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制定新的国际规则 and 标准，掌握国际竞争的主动权。“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以更加积极姿态参与全球治理，在新起点上谋划走向未来的全球战略，将改变过去中国国际秩序被动接受者的局面，实现中国全球战略的突围，使中国真正成为能够主动提出并主导议题，构建世界秩序的世界大国。

（四）“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传播中华文明的重要通道

自古以来，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路一样，不但沟通了古代东西方之间的贸易和友好往来，增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了解和友谊，而且也推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是东西文化交流的大通道，对世界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¹。“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秉承古海上丝绸之路的精神，把推进人文交流，弘扬中华文明作为自己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东盟部分，双方将共同制定《中国-东盟文化合作行动计划》，办好 2014 年中国-东盟文化交流年活动，中国将为东盟提供更多奖学金名额和资金促进双方教育和人文交流；在南亚部分，中印将启动“中国-印度文化交流计划”，中斯将在斯里兰卡中国文化中心，中方愿向马方提供更多政府奖学金名额，为马尔代夫公民学习汉语提供协助，在公务员培训方面同马方开展合作；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方面，中阿双方决定把 2014 年和 2015 年定为中阿友好年，今后 3 年，将为阿拉伯国家再培训 6000 名各类人才，未来 10 年，将组织 10000 名中阿艺术家互访交流，推动并支持 200 家中阿文化机构开展对口合作。“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通过各种的文化交流项目，必将让世界更加了解当代中国，让中国中华文明更加远播。

三、“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愿景

（一）以自贸区和港口为依托实现互联互通

互联互通的贸易物流与网络连接是“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最基本的目标，是将各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物质纽带。自贸区和港口作为互联互通网络上的结点，是实现互联互通的依托，更是各个国家之间开放的窗口。因此，要实现以自贸区和港口建设为重点的互联互通，促进生产要素在区域内的合理流动，充分发挥各国的资源优势，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深化金融和物流合作，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本质上是区域一体化的一部分，在其构建过程中，要着重深化物流与金融方面的合作，推动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在深化物流合作方面，要加强公路、铁路、海路、航空等各个领域的互联互通，形成现代化的物流网络。在金融合作方面，金融合作一直是新兴经济体合作的薄弱环节，两次金融危机使亚洲的新兴经济体认识到，只有新兴国家联合起来才能抵御金融危机的冲击。因此，构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要通过深化物流与金融的合作，实现以物流与金融的一体化促进区域一体化的发展。

（三）构建新型多边友好关系，形成开放型经济新格局

¹ 陈炎. 海上丝绸之路对世界文明的贡献[J]. 今日中国(中文版), 2001(12).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在广阔空间范围内的合作，能够以经贸为主线，突破地缘与文化的限制，串联起亚非欧范围内的广大国家，为中国与广大亚非国家构建起平等、开放、互利旨在实现共同发展的新型多边友好关系，推动形成中国对外开放的新格局。通过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方面能够平衡中国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摆脱投资与贸易对发达国家的过度依赖，开拓新的贸易、投资空间；另一方面能够平衡“引进来”与“走出去”之间的关系，改变中国长期以来资本流入大于资本流出的格局，促进中国资本走出去，更多的流入亚非等新兴经济体，形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均衡发展，“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四）加快人文交流合作，实现心灵沟通与文明对话

“海上丝绸之路”自古以来就不单是一条贸易通道，更是一条连接不同国家的文化纽带。当今世界文明向多极化发展，文化逐渐超过经济和意识形态成为造成国际冲突的主要根源，而欧盟区域一体化的成功则体现了文明相似性在实现区域合作上的凝聚力，因此加强人文交流，实现文明与文明之间的相互包容就成为国家与国之间实现合作的支撑。“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涵盖的文明众多，这种合作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多样性就决定了其内部必然存在着诸多矛盾，缺乏实现合作的文化凝聚力，因此想要“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持久稳定，就必须把实现文明之间的沟通与包容作为基础性的战略目标，通过加强人文交流，实现心灵沟通与文明对话。

参考文献：

- [1]芮传明.丝绸之路研究入门(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
- [2]沈济时.丝绸之路(M).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 [3]刘迎胜.丝绸之路(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
- [4]徐素琴.“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历程(N).南方日报,2014年1月5日.
- [5]李利安.丝绸之路:人类文明交往的历史足迹(N).光明日报2014年8月6日.
- [6]蒋希衡 程国强.国内外专家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看法和建议综述(N).中国经济时报,2014年8月21日.

作者简介：

黄茂兴，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贾学凯，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及其当前推进

周兴泰

内容摘要：本文主要通过历史回顾的形式梳理了我国“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是如何从国家领导人出访提出的双边、地区关系发展倡议发展为新时期、新形势下我国针对周边外交工作的一项重要战略谋划和顶层设计，再到上升成为一项重要的国家总体发展与对外开放战略的，它从初步设想、外交倡议到总结定型、全党决议再到政府跟进而最终成为我国政府年度工作重点的全过程。并详细梳理了从中央政府到中央各部委再到地方政府、学界、舆论传媒和民间、实业界对于这一构想的宣传、规划和研究推介。总结了这一战略构想提出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背景、它的推介主体、推介平台、推介的主要内容，以及政商学、民间、传媒界之间的相互协作等。最后还就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应注意的各方面问题提出了几点看法，包括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应注意其他国家的看法和感受，应统筹协调好国内各地方、各部门、各种资源避免各自为政、重复建设、资源浪费，应该善加利用已经积累起来的经济人文与政治资源、应同其他国家的相关设想和规划实现对接和协调式发展以及应该处理好一带与一路建设之间的关系、投入资源搭建平台实现科研、规划和项目落地的扎实推进等。

关键词：一带一路 丝绸之路经济带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周边外交 对外开放

一、“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与升华

2013年9月3至1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中亚四国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并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八次峰会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在统观历史与当前、政治与经济、国际与国内、安全与发展等各个领域的基础之上，在9月7日于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所做的《弘扬人民友谊 共创美好未来》的重要演讲中提出——“2100多年前，中国汉代的张骞肩负和平友好使命，两次出使中亚，开启了中国同中亚各国友好交往的大门，开辟出一条横贯东西、连接欧亚的丝绸之路”，“千百年来，在这条古老的丝绸之路上，各国人民共同谱写出千古传诵的友好篇章”，“20多年来，随着中国同欧亚国家关系快速发展，古老的丝绸之路日益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以新的形式把中国同欧亚国家的互利合作不断推向新的历史高度”，“当前，中国同中亚国家关系发展面临难得机遇”，“为了使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这是一项造福沿途各国人民的大事业。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先做起来，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的战略构想，并就此提出五点建议，即“五通”，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企望以此与广大中亚国家“全面加强

务实合作，将政治关系优势、地缘毗邻优势、经济互补优势转化为务实合作优势、持续增长优势，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¹在随后召开的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的大会发言中习主席还提到——“务实合作是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原动力。上海合作组织 6 个成员国和 5 个观察员国都位于古丝绸之路沿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和观察员国，我们有责任把丝绸之路精神传承下去，发扬光大。”²习主席的这两次讲话受到与会各国元首及政府会上会后的高度评价与积极回应。³因此，在今年 9 月 12 日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举行的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上习主席在做《凝心聚力 精诚协作 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再上新台阶》的大会发言时，特别提到——“我去年访问中亚期间，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高度关注和热情回应。对此，我深受鼓舞，也深表感谢。目前，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正进入务实合作新阶段，中方制定的规划基本成形。欢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积极参与，共商大计、共建项目、共享收益，共同创新区域合作和南南合作模式，促进上海合作组织地区互联互通和新型工业化进程。”⁴

关于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2013 年 10 月 2 日至 8 日，习近平主席利用访问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并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第二十一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机会，于 10 月 3 日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题为《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演讲时指出——“在 2000 多年前的中国汉代，两国人民就克服大海的阻隔，打开了往来的大门。15 世纪初，中国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七次远洋航海，每次都到访印尼群岛，足迹遍及爪哇、苏门答腊、加里曼丹等地，留下了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佳话，许多都传诵至今”，“今年是中国和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10 周年，中国和东盟关系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方高度重视印尼在东盟的地位和影响，愿同印尼和其他东盟国家共同努力，使双方成为兴衰相伴、安危与共、同舟共济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携手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双方和本地区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愿通过扩大同东盟国家各领域

¹ 弘扬人民友谊共创美好未来——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

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iliao_611306/zt_611380/dnzt_611382/ydyl_667839/zyxw_667918/t1074151.shtml

² 弘扬“上海精神”促进共同发展——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

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iliao_611306/zt_611380/dnzt_611382/ydyl_667839/zyxw_667918/t1076570.shtml

³ 共建文明互鉴共同发展的新时代丝绸之路——外交部长王毅谈习近平主席访问中亚四国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

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iliao_611306/zt_611380/dnzt_611382/ydyl_667839/zyxw_667918/t1076722.shtml；传承丝路精神 共创美好明天——记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iliao_611306/zt_611380/dnzt_611382/ydyl_667839/zyxw_667918/t1076721.shtml；白俄罗斯总理、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驻华大使谈“丝绸之路经济带”，

http://news.xinhuanet.com/photo/2014-02/28/c_126203655.htm；纳扎尔巴耶夫：“丝绸之路经济带”帮助我们更好地相互理解，<http://cpc.people.com.cn/n/2014/0520/c164113-25041644.html>；各国元首寄语丝绸之路经济带，<http://energy.people.com.cn/n/2014/0914/c389073-25657618.html>

⁴ 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全文），

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iliao_611306/zyjh_611308/t1190748.shtml

务实合作，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同东盟国家共享机遇、共迎挑战，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¹习主席的这一倡议也同样受到了东南亚各国元首及政府的高度评价与积极回应。²

在这两次重要的出访之后，2013年10月24至25日，我国首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会议，“主要任务是，总结经验、研判形势、统一思想、开拓未来，确定今后5年至10年周边外交工作的战略目标、基本方针、总体布局，明确解决周边外交面临的重大问题的工作思路和实施方案。”³全体政治局常委、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出席了会议，外交部长王毅作了总结发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有关金融机构和国有重要骨干企业的负责同志，驻有关国家使节、部分常驻国际和地区组织代表和外交部驻香港、澳门公署特派员、部分专门事务大使、特使和代表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可见党和国家对这次会议的重视。正如习主席所言：“做好周边外交工作，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需要”，因此我们“要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使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包括“要同有关国家共同努力，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好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要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扩大贸易、投资合作空间，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新格局”等。⁴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是做好新形势下我国周边外交工作的一项重要布局，而这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是在习主席出访中亚、东南亚多国并出席多场重要国际峰会的背景下回国之后所召开的，是一场高层次、方向性的会议，对未来5至10年我国的周边外交工作做了总体规划和部署，因此我们也不难看出从时间和层次上来说它绝非临时安排，而应该是在召开之前已经有着充分的论证和考虑，是与这些出访进行统筹协调布置和安排的，应该是一场总结成果规划未来统一未来5至10年我国周边外交工作总体思路和行动的组织协调与动员大会。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一带一路”战略构想被提升到了未来5至10年我国周边外交工作重要设计和行动方向的高度，使它成为党和国家在新时期、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把握我国外交全局所做的适应新时期我国周边外交工作需要的一项重大战略谋划和顶层设计。

而在接下来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2013年11月9至12日在北京召开）及其所通过的会议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这一战略构想则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面对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新形势，《决定》要求“加快沿边开放步伐，允许沿边重点口岸、边境城市、经济合作区在人员往来、加工物流、旅游等方面实行特殊方式和政策。

¹ 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在印度尼西亚国会的演讲，

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iliao_611306/zt_611380/dnzt_611382/ydy1_667839/zyxw_667918/t1084354.shtml

² 开创周边外交新局，推进亚太区域合作——外交部长王毅谈习近平主席访问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并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一领导人非正式会议，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10/09/c_117626324.htm；建设“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南海政策亮点，http://opinion.china.com.cn/opinion_84_83584.html；我的梦是乐见中国建成新海上丝绸之路——专访印尼驻华大使易慕龙，

http://www.chinatradenews.com.cn/founder/html/2014-01/14/content_44820.htm?div=-1

³ 习近平：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http://news.xinhuanet.com/2013-10/25/c_117878944.htm

⁴ 习近平：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http://news.xinhuanet.com/2013-10/25/c_117878944.htm

建立开发性金融机构，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¹从而将这一战略构想不仅仅是作为新时期我国周边外交工作的一项重要设计和重要举措，而是强调要把它作为新形势下我国面向国际国内开发开放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来推进和实施，从而将其上升为一项国家总体发展和对外开放战略，实现了国际与国内、沿陆与向海、开放与开发的完美对接。正如有众多学者所提出的，在冷战结束特别是9·11恐怖袭击和08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政治经济形势以及我国的周边外交环境都发生了诸多变化的情况下，这一战略构想的提出与实施必将为我国的未来中长期发展指明新的道路和方向，对于我国面对新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发展形势，实现内联外引、全面开发开放、以开放倒逼国内经济改革、体制改革和产业升级以及企业走出去，实现安定团结的周边外交环境，带动沿边周边的开放开发共同发展，打造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保障我国国内政治经济生活的稳定和国家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早日实现我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国崛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梦的实现都必将起到重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二、“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当前推进

从以上梳理来看，“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从领导人的外访提出，到经过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升为一项重要的国家外交战略，再到上升为一项重要的国家总体发展与对外开放战略前后用时总共不过三个多月，可见这一战略构想对于我国、对于我国周边各个国家的进一步发展来说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所以甫一提出它就受到了国际国内各方面的高度关注与积极重视，在国内方面尤其表现为从中央到地方，从中央各部委到地方各地市，从政产学研到社会舆论传媒界的全民热议，积极行动与推进。

1. 中央层面的推进

(1) 中央政府

在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之后不久，上合组织框架下的区域经济合作平台——欧亚经济论坛2013年会于9月26至28日在陕西西安举行，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出席会议并发表主旨演讲。在演讲中他再次强调，欧亚国家要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务实的举措，推动区域合作向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高水平拓展，使“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早日结出丰硕果实，造福各国人民，并就此提出四点建议。²

而在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几乎同时，2013年10月9日李克强总理在文莱出席第十六次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发表的重要演讲中提出了中国—东盟共同打造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两条政治共识和七个领域的合作设想，即中国—东盟“2+7合作框架”，其中重要的一条即稳步推进海上合作，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并指出——“中方已设立30亿元人民币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欢迎各国积极申报项目，第一批落实的17个项目将

¹ 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9页。

² 汪洋出席2013欧亚经济论坛时强调：传承丝路精神 深化务实合作 共同担负起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任，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iliao_611306/zt_611380/dnzt_611382/ydy1_667839/zyxw_667918/t1081536.shtml

用于支持海洋经济、海上互联互通、海上环保和科研、海上搜救等合作。渔业合作直接惠及民生，有利稳定，应当先行。中方支持今年 11 月在印尼举办‘中国-东盟海洋合作论坛’。”¹从而使习主席提出的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首先在东南亚开始落地实施。

另外，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不久，2013 年 12 月 10 日至 13 日 2013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在分析当前国际国内经济新形势，总结 2013 年经济工作、提出 2014 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时强调并指出，2014 年经济工作的六大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即要“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抓紧制定战略规划，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加强海上通道互联互通建设，拉紧相互利益纽带。”²

2014 年 1 月 17 日，习近平主席在会见来华出席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第三轮战略对话的海合会代表团时，向海合会国家发出邀请——中方愿同海方共同努力，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并收到相关国家的积极回应。³而在 2014 年 2 月 10 至 12 日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十七轮会谈上，中方代表、国务委员杨洁篪邀请印度共建 21 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印方代表、印度安全顾问梅农接受了中方的邀请，并对海上丝绸之路做出了积极评价。同一周内，中国还向斯里兰卡提出了共建“海上丝绸之路”的邀请，斯里兰卡表达了参与的积极意愿。⁴同样，2014 年 6 月 5 日，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在北京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弘扬丝路精神，深化中阿合作》的重要讲话，向全体阿拉伯国家发出了共建“一带一路”的邀请，并受到各国的积极响应。⁵最近习近平主席的出访蒙古、出访塔吉克斯坦、马尔代夫、斯里兰卡和印度等国，再次与有关国家就“一带一路”建设问题进行了探讨。从而表明“一带一路”建设构想正逐步从中亚、东南亚扩展到南亚、海湾阿拉伯国家再到全体中东北非阿拉伯国家。当然，作为历史上古老海陆丝绸之路的两大终点的非洲和欧洲国家早晚也必然将会被纳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框架之内，而且还可以向南北美洲、南太平洋和大洋洲国家扩展。而在今年 5 月 20 日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的联合声明》中，双方则以声明的形式确认了两国将寻找中国倡议的丝绸之路经济带项目和俄罗斯提议的欧亚经济联盟之间可行的契合点，并进行部门合作以推动包括地区交通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共同项目。⁶

¹ 李克强在第 16 次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全文），

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iliao_611306/zt_611380/dnzt_611382/ydyl_667839/zyxw_667918/t1086491.shtml

²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提出明年经济工作六大任务，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3-12/13/c_118553239.htm

³ 习近平会见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代表团，

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iliao_611306/zt_611380/dnzt_611382/ydyl_667839/zyxw_667918/t1120042.shtml

⁴ 中国邀印度共建海上丝绸之路，<http://ucwap.ifeng.com/news/dalu/news?aid=78368458&p=1>

⁵ 习近平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

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iliao_611306/zt_611380/dnzt_611382/ydyl_667839/zyxw_667918/t1162491.shtml

⁶ 中俄关于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的联合声明，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5/20/c_1110779577_3.htm

2014年3月全国两会召开，李克强总理在向全国人大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回顾2013年工作成就时指出“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是2013年一项重要的工作成就，而2014年中央政府的一项重点工作则是“抓紧规划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推进孟中印缅、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推出一批重大支撑项目，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新空间。”¹由此，这一原本针对新形势下我国做好周边外交工作的战略构想经过初步设想、外交倡议、总结定型、全党决议、政府跟进而最终成为我国政府年度工作的重点。

同样的推介还出现在了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的年会上（2014年4月8至11日海南博鳌），在本次论坛的主旨演讲中李克强总理再次向广大国家发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邀请。²同时，本次分论坛还有两场分论坛活动具体探讨了“一带一路”的建设问题，包括“丝绸之路的复兴：对话亚洲领导人”分论坛和“海上丝绸之路与华商经济”分论坛，国务委员杨洁篪、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裘援平、副主任何亚非以及东南亚等国家领导人、国内多名知名学者出席了这两场分论坛并发表了相关看法。³类似的论坛在2014年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和商务与投资峰会期间以及2014年的第十八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期间也有举行。

而在文化方面，2014年6月22日，中国申报的大运河项目和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跨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项目被一起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关于丝绸之路，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它是东西方之间融合、交流和对话之路，近两千年以来为人类的共同繁荣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此次申报的路段被世界遗产委员会建议命名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这一申报的成功必将有利于相关遗迹的保护以及旅游业等的发展。

在中央地方方面，2014年7月17至19日，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在福建省调研时强调，福建省一定要抓住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机遇，推动福建改革开放的科学发展。

目前关于“一带一路”建设中央层面的最新消息是2014年10月24日，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的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签约，共同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正是2013年10月2日习近平主席在雅加达同印尼总统苏西洛举行会谈时表示的为促进本地区互联互通建设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方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愿向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本地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的具体实现，它的成立必将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和为各国提供强大的行为动力。按照设计，它将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总部设在北京，法定资本1000亿美元。

（2）中央各部委

2013年10月29日，由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主办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合作的愿景”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围绕如何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从而加强同周边国家与地区的经贸合作与往来等议题进行了研讨。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等国驻华大使及在京主要研究机构

¹ 李克强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文字实录），http://www.gov.cn/guowuyuan/2014-03/05/content_2629550.htm

² 李克强在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全文），

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iliao_611306/zt_611380/dnzt_611382/ydyl_667839/zyxw_667918/t1145916.shtml

³ <http://boao.qq.com/>

的专家学者参加了论坛并发言。

2013年11月15日,多家媒体报道,近日,国家发改委在京召开丝绸之路经济带思路研究座谈会,标志着从国家层面研究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问题正式启动,并指出此项工作由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共同牵头,中国科学院地理所具体承担前期研究任务;在空间走向上,初步形成以欧亚大陆桥为主的北线、以石油天然气管道为主的中线、以跨国公路为主的南线三条线;国内区域范围目前包括西北五省、重庆、四川、内蒙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还将扩展到其它省区;此次座谈会是官方首次证实国家层面启动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显示了国家对这一战略的重视。2013年12月14日,国家发改委和外交部举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座谈会,有西北五省、西南4省市以及东部5省参加。西北五省,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西南四省市包括重庆、四川、云南、广西;东部5省包括江苏、浙江、广东、福建、海南。

2014年3月22至24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4在北京举行,分论坛二的主题是“建设陆海丝绸之路”,联合国第六十七届大会主席、塞尔维亚共和国前外交部长武克·耶雷米奇主持,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陕西省副省长还有多名学者出席并进行了研讨。张业遂表示,希望通过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打造中国对外开放的升级版。并指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在他看来有三个层面的考虑,包括是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需要、是推进亚洲区域合作的需要和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需要等。¹

而在文化方面,2014年4月24日,由国家文物局、北京市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北京市文物局、福建省文化厅共同承办的“直挂云帆济沧海——海上丝绸之路特展”在北京首都博物馆拉开序幕,国家有关部委及省市领导人出席了开幕式。²2014年8月24日晚,由文化部、国家海洋局、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办,福建省文化厅、文化部艺术司、国家海洋局宣传教育中心承办,福建省歌舞剧院创排的大型舞剧《丝海梦寻》在国家大剧院演出,³此后还赴上海、陕西、澳门和东南亚等国家进行了演出。

同时在宣传研讨方面,外交部网站还专门辟出一带一路专题,跟踪报道有关“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领导人相关活动。⁴2014年6月26日,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新疆社会科学院共同承办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国际研讨会”在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新疆党委书记张春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蔡名照出席开幕式并致辞,这次会议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共享与共赢共荣的新机遇”为主题,议题分别是“丝绸之路:过去、现在和未来”和“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⁵

2. 地方层面的推进

2013年9月下旬欧亚经济论坛在西安举行,来自土库曼斯坦马雷市、亚美尼亚久姆里市、乌兹

¹ <http://www.cdrf.org.cn/plus/list.php?tid=289>, 完整会场发言:

<http://finance.qq.com/zt2014/gcfz/sczl.htm>

² “直挂云帆济沧海-海上丝绸之路特展”在首博开展,

http://www.gov.cn/xinwen/2014-04/25/content_2666623.htm

³ http://fjrb.fjsen.com/fjrb/html/2014-08/25/content_763466.htm?div=-1

⁴ 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iliao_611306/zt_611380/dnzt_611382/ydyl_667839/

⁵ 丝绸之路经济带国际研讨会在乌鲁木齐开幕, http://news.xinhuanet.com/2014-06/26/c_1111337673.htm

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市、印度新德里市、葡萄牙里斯本市等丝绸之路沿线城市的领导人在本届论坛上共同发表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安宣言》，倡议建立合作机制，创新合作模式，深化经贸、旅游、科技、环保、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合作，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期待这将有效促进丝绸之路沿线城市开展务实合作，把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伟大战略构想变成美好现实。紧接着，2013年10月20日在西安举行的酒泉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座谈会上，酒泉市委书记马光明表示，酒泉位于丝绸之路的丝绸之路的中段，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中，具有承东接西的独特优势，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重要节点城市。为此，未来酒泉要做大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打造新能源产业战略高地和文化旅游产业战略高地。

2013年10月18日，“丝路远帆——海上丝绸之路文物精品七省联展”在福建省博物院正式拉开序幕，同时还召开了“海上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

2013年10月25日，连云港举办了丝绸之路经济带（东中西区域）合作论坛。连云港市委书记李强指出连云港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进一步深化区域合作，与大家一道分享机遇，共同推动经济带的建设。连云港市代市长赵晓江推介了合作项目。开幕式上，兰州大学校长王乘与赵晓江签署了校地合作协议。论坛还发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书。

2013年11月28日，中国·新疆乌鲁木齐2013“丝绸之路经济带城市合作发展论坛”隆重开幕，来自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格鲁吉亚、土耳其、伊朗7个国家，国内外24个城市的300多位代表和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谋“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大计。此次论坛由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主办，以“五通促发展、共建经济带”为主题，旨在探讨和交流丝绸之路经济带城市合作发展之策，为各城市增进了解、凝聚共识、加深友谊、扩大合作搭建平台。论坛期间还举办了“乌鲁木齐·连云港丝绸之路经济带东西桥头堡对话”活动，就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合作协议举行了签约仪式。此外，还举办了连云港服务新疆暨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推介会。

2014年1月15日，《人民日报》第7版刊发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陈武《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关于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的文章，文章就广西如何找准定位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提出了设想和看法。2014年两会期间，福建省泉州市市长郑新聪向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建议，支持泉州市建设“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¹3月27日，西北五省区社科院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研讨会暨《西北蓝皮书》协调会、院长联席会议在青海召开，确定把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作为2015年度《西北蓝皮书》的重点专题。2014年9月1日，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尤权在《求是》刊文《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枢纽》，提出福建融入国家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各项设想。

2014年5月18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市长（高峰）论坛作为第十六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重要配套活动之一在福建省福州市举行，邀请了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地区和国内相关城市的市长及政府高层、知名专家、经济学家、金融投资机构、商协会代表等广泛的参与，以“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主题，就产业合作、园区对接、跨境交易、港口物流等方面的议题进行了磋商，

¹ http://fjrb.fjsen.com/fjrb/html/2014-03/07/content_717590.htm?div=-1

期望打造一个共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机制。¹

2014 年 5 月 24 至 25 日, 首届“丝绸之路经济带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高峰论坛”作为第十八届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暨首届丝绸之路国际贸易博览会的重要对话交流活动之一在陕西师范大学举行, 来自西北五省区高校、社科院、文化企事业单位的百余位专家学者和师生代表, 围绕西部地区, 特别是陕西省如何充分发挥地缘、区位、文化、旅游等多方优势, 以强烈的机遇意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 做好丝路文化资源保护、文化产业开发、文化旅游业发展和文化战略发展等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²

2014 年 6 月 21 日, 南海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研讨会在海南省海口市举行, 来自国家文物局、中国博物馆协会丝绸之路专业委员会、海南省文物局、福建省文物局等部门的 50 余名官员、专家、学者共同发起《南海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共同宣言》, 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等省区学界支持海南省将“海上丝绸之路南海段”申报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海上丝绸之路预备名单》。

2014 年 9 月 1 至 6 日, 第四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暨中国—亚欧经济发展合作论坛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 主题为“开放合作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³2014 年 9 月 8 至 11 日, 第十八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 本次洽谈会期间也举行了有关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活动的论坛研讨活动。⁴

2014 年 9 月 9 日, 时值我国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一周年之际, 国内第一部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为研究对象的蓝皮书《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报告(2014)》正式出版, 全书分为总报告、综合篇、经济篇、社会文化篇四个部分。其中, 作为总报告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形势分析与展望》由陕西省社科院课题组完成, 认为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不断深化, 未来将展现六大趋势: 区域合作协商机制将更为深入; 多路径道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速; 能源合作更为紧密; 贸易与投资发展进一步提升丝路沿线经济体的对外开放水平; 金融服务的改善将助推丝路货币流通; 科技、教育、文化交流将大大促进民心相通。综合篇分别就陕西、甘肃、新疆、青海等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现状及后续推进策略等问题进行了研究。经济篇则主要研究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贸易投资、产业发展合作、货币流通、金融开放等经济发展问题。在以民心相通为主题的社会文化篇中, 学者们主要围绕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文化认同、文化传播、文化交流等问题推出了系列研究成果。⁵

2014 年 9 月 12 日, 第七届中国—东盟智库战略对话论坛正式开幕, 由中国社科院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联合主办, 主题为“共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主要议题有共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共建中国—新加坡经济走廊和共同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等。

3. 学界层面的推进

2013 年 12 月 25 日, 由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与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共同设立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研究院揭牌仪式暨首届丝绸之路经济发展论坛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举行。按计划, 双方将各筹资

¹ <http://www.china518.gov.cn/21stsilkroad/index.html>

² 首届丝绸之路经济带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高峰论坛在西安举行, <http://www.sxta.gov.cn/proscenium/content/2014-06-17/10055.html>

³ <http://www.xj.xinhuanet.com/zt/2014yaoubh/>

⁴ <http://www.chinafair.org.cn/china/index/index.aspx>

⁵ 任宗哲、石英、白宽犁主编:《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报告(2014)》,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版。

50 万元设立共同研究基金,每年发布研究项目指南,定向支持丝绸之路经济带相关领域的专题研究。此外,还将每年举办“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论坛”,出版《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研究》,并向社会公开发布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发展的评价研究。在随后进行的论坛上,多位专家就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发展建言献策。

2014年1月18日,“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选择与陕西对策”研讨会在西北大学举行。与会专家围绕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背景、意义、内涵、发展要点、国别形势、陕西和西安选择、古丝绸之路经贸往来特点以及中亚学院建设等问题发表演讲并展开深入讨论,西北大学副教授马莉莉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报告:2014》(讨论稿)进行了系统介绍。

2014年1月19日,由浙江师范大学环东海海疆与海洋文化研究所与中国武警学院边防系合作举办的“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海洋战略学术座谈会在河北廊坊召开,与会学者就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海洋战略、海洋战略与中国和平复兴、中国海洋开发的历史与现状、中国海疆管理与海洋安全机制等相关议题进行了主题演讲并展开讨论。¹

2014年3月11日,为服务于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华侨大学成立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作为整合各方研究力量的校属科研机构,统筹开展海上丝绸之路的科学研究、学术交流,希望为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打造决策咨询智库。²同年9月14日,由福建省侨办、中国新闻社、福建社科院、福建省社科联合会、华侨大学联合主办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高端论坛”在华侨大学举行,国务院侨办主任裘援平在论坛上作主旨演讲,国内多名知名学者出席并作主题发言。³同时,由这几家单位合作共建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也正式揭牌。⁴

2014年5月22日,为落实习近平主席倡议和广东省委省政府关于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战略部署,加快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在广东省委宣传部的支持下,“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正式成立并举行了揭牌仪式,揭牌仪式以后还举行了“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学术研讨会。⁵

2014年6月5日,在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局、中山大学共同主办的“广东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研讨会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宣布正式成立并举行了揭牌仪式。按照设计,它将以中山大学环南中国海研究院、国家软实力研究院、亚太研究院和海洋学院为基础,联合广西民族大学、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云南大学等学术机构,以及经济、科技、外交、国防等相关部门,旨在通过跨学科、跨部门、跨地域的协同创新研究,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研究领域国内权威、国际一流的学术研究和决策咨询机构。未来将重点围绕海上丝绸之路区域的文明进程、海上丝绸之路区域体系的形成与演变、海上丝绸之路区域网络与流动、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研究、东南亚国家的政治走向及其影响、中国与东盟的区域经济合作与人文交流、海洋法

¹ “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海洋战略学术座谈会会议综述, <http://ecsr.zjnu.edu.cn/show.aspx?id=445&cid=4>

² 服务“一带一路”发展战略 华大成立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 <http://news.hqu.edu.cn/hdxw/34168.html>

³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高端论坛”在华大举办 国务院侨办主任裘援平作主旨演讲, <http://news.hqu.edu.cn/hdxw/36785.html>

⁴ 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揭牌成立, <http://news.hqu.edu.cn/hdxw/36791.html>

⁵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成立, http://www.gdass.gov.cn/MessageInfo_2875.shtml

与非传统安全及海事合作机制等7个方面展开研究。¹

2014年6月2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室和《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联合主办了题为“南海争端解决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主要围绕西沙“981”事件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之间是否存在冲突以及中国政策是否转向主动出击、区域外代表性国家在南海争端上所持的立场及其变化、菲律宾案件的进展与可能前景、越南提请国际司法机构裁决的条件以及中国法律应对的可能性、必要性与步骤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2014年6月26日,广西民族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的“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学术研讨会在广西民族大学召开,十几名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围绕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展开深入研讨。

2014年6月27至28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承办召开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与未来:12国智库论坛”,来自中国、俄罗斯、中亚五国、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美国等12个国家的智库代表出席,主办方还发布了题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愿景与路径”的研究报告。此次论坛的成果及发布的报告后被编辑成书出版,即《欧亚时代—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蓝皮书2014-2015》,主要涵盖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新欧亚时代的关系如何、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有哪些难点与障碍、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各国关系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中国未来关系如何等主题。²

另外,由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属的《中国投资》杂志社主办的首届“一带一路”华夏论坛于2014年9月5日在北京召开,来自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华侨大学等多家机构的专家学者和来自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肯尼亚等亚非欧19个国家使馆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的代表共聚一堂,围绕如何与沿线国家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一主题展开了相关讨论。在论坛上一些企业也分享了他们从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中看到的商机,如中建(郑州)城市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就表示,目前郑州正在以陆空衔接的多式联运格局,联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物流通道枢纽,正在成为新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由中建公司建设的郑州滨河国际新城将在这一节点上发挥重要作用。³

同时,还有一些刊物围绕“一带一路”主题进行了征文,比如由广西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广西东南亚经济与政治研究中心主办的《东南亚纵横》月刊。

4.传媒界的推进

2014年2月23日,中国新闻社在福建泉州举行“新世纪丝绸之路经济论坛”,并同时启动“丝绸之路华媒万里行”活动,来自20多个国家的近60家海外华文媒体代表、中新社丝绸之路专家顾问团代表、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使节代表、丝绸之路沿线城市及企业代表、中国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等200余人出席了这次论坛。论坛期间除了嘉宾发言之外还举办了“丝绸之路”大讲堂和“丝绸之路”新商机对话会活动。⁴

¹ 中大成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 <http://gd.people.com.cn/n/2014/0606/c123932-21361148.html>

²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主编:《欧亚时代—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蓝皮书2014-2015》,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年版。

³ 首届“一带一路”华夏论坛在京召开, <http://finance.chinanews.com/cj/2014/09-05/6568630.shtml>

⁴ <http://www.chinanews.com/gn/z/hmwlx2014/>

2014年8月18日,人民网“行走新丝路”报道启动仪式在北京、西安、泉州三地同时启动。据介绍,“行走新丝路”报道团队由60多位记者、名人和意见领袖参与,分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两条线路,涉及国内十多个城市和13个海外国家,分别从西安和泉州出发,在近2个月的时间里将途经陕西、甘肃、新疆、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多个省市,以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伊朗、泰国、缅甸、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埃及、土耳其等13个国家。相关报道将以中文、英语、俄语、哈萨克语等多个语种呈现,以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多种形式展现,全面覆盖PC互联网、微博、微信、客户端等平台,目的在于真实记录目睹和聆听到的故事,记录发展中的开放的中国,记录一个多元的世界。其形式还包括“一带一路”大使系列谈和专家系列谈。¹而在此前人民网已经开设了“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报道专题。²同时,凤凰网还启动了“寻路中国: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报道,中国网也启动了“网络名人丝路行”报道,中国经济网则启动了“舞动丝绸之路经济带”报道等。³

5.民间、实业界的推进

2013年12月20日,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亚欧大陆桥物流分会成立大会在乌鲁木齐举行,乌鲁木齐市委、市铁路局、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和新疆自治区相关的部门领导,以及北京、天津、上海等15个省市的近百家大中型物流企业的负责人和中国物联网应用与推进联盟、河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等13家沿桥社团组织代表约200人出席。会上所成立的亚欧大陆桥物流分会被设定为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的分支机构,是由国内沿亚欧大陆桥从事物流行业的相关企业、事业单位、研究机构、社会组织及个人自愿参加组成的区域性、专业性、非盈利性的社团组织。规定它将以推动亚欧间国际物流业和国内段物流业发展为方向,以研究亚欧大陆桥国际物流中涉及运输体系、运输方式、运输法规存在的问题为工作重点,以提供信息、咨询、协调、方案设计、案例示范等服务为主要内容,依靠政府相关部门和国内外专业协会,联系众多物流企业,促进业务拓展,更好地为广大制造业、外贸业客户服务。⁴相信这一组织的成立对于畅通亚欧大陆桥,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必将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而就在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出访欧洲期间,3月29日,“丝绸之路经济联盟”在乌鲁木齐成立。联盟由亚美尼亚国家发展署、吉尔吉斯斯坦工商会、塔吉克斯坦工商会、乌克兰基辅工商会、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工商会、哈萨克斯坦卡拉干达工商会6家国外民间机构和上海进出口商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际商会、新疆华和国际商务咨询有限公司3家中方民间机构共同发起,并签署倡议书。该联盟被设定为纯民间的商业机构,总部设于乌鲁木齐,宗旨在于促进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商协会及会员企业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合作。⁵

2014年7月11日,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海员服务发展”为主题的2014年中国航海日论

¹ <http://finance.people.com.cn/BIG5/387602/>

² <http://world1.people.com.cn/GB/8212/191606/374837/index.html>

³ <http://city.ifeng.com/special/xlzg/>; http://v.china.com.cn/zhuanti/node_7212260.htm;
<http://www.ce.cn/ztpd/xwzt/guonei/2014/scz11/index.shtml>

⁴ 郑小新、车海龙:《畅通亚欧大陆桥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 中交协亚欧大陆桥物流分会在乌鲁木齐成立》,《大陆桥视野》2014年第1期,第65-67页。

⁵ <http://www.srecoal.com/>

坛在山东举行。此次论坛由中国航海学会、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和山东省日照市政府在日照市共同主办，中国航海日活动组委会常务副主任、交通运输部副部长何建中出席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建设海上丝绸之路，要加强互联互通设施建设，特别要在港口、口岸、物流和信息设施等领域努力与沿线国家就合作方向、重点内容和共建机制等方面开展研究谋划，要更加注重大力推进多式联运和集疏运体系建设；要提升海运便利化水平。特别注重深化与沿线国家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加强多边和双边磋商，尤其注重在海运会谈政府合作机制下，努力促进和鼓励相关行业、企业开展多层次交流与合作。推动便利化运输，关键要推进“一站式”通关，切实解决好“一站式”通关的标准、规范、机制、信息化等问题；要加强海上安全合作。重点加强航行安全、海上搜救和应急处置、船舶防污染、新能效船舶研发、海事技术交流与人员培训等领域的合作，尤其注重海上安全合作机制和制度建设，拓展合作领域，共同打造区域海上交通安全保障体系；要推进国际物流体系建设。与沿线国家积极发展物流业，建立以“一单式”多式联运为标志的区域物流体系，融入全球物流网络。深化我国重要港口与国际重要港口的合作，加大综合交通枢纽、国际物流中心等基础设施投入，依托东北亚物流信息服务网络，建设区域性国际物流信息平台，实现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物流信息共享合作。来自交通运输部、外交部、国家海洋局、中央外宣办、国家体育总局等部委以及有关港航企事业单位、院校和科研机构、海员服务和引航机构等代表参加了论坛。¹

2014年8月24日，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与兰州大学共同主办的“一带一路”文化圆桌会议在兰州开幕，来自中国、俄罗斯、美国、日本、印度、泰国、伊朗、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阿富汗、不丹、土耳其、英国、德国、法国、奥地利、挪威、澳大利亚等21个国家的近百位专家学者汇聚一堂，深入探讨如何发挥民间组织与高校的作用，推进“一带一路”区域内国家间的交流与合作。²为此会议的主办方还专门开通了兰大和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丝绸之路经济带”文化圆桌会议官方微博。³

2014年8月28日，由广东公共外交协会主办，广东国际商会、省商务厅、省文化厅、省友协、广东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广东广播电视台等共同承办的“广交世界共赢发展”暨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交流会在广州召开，部分外国驻穗总领馆官员、外国商协会代表和世界500强驻穗高管等出席，围绕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主题，以演讲和自由交流相结合的形式，促进中外政府官员、商协会、企业家的思想碰撞，旨在推动广东与世界各国在经贸、科技、旅游、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合作。⁴

2014年10月15日，六合院（福建）古典艺术家具有限公司捐资500万元在华侨大学设立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研究与发展基金（六合院基金），支持华侨大学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华侨大学校长贾益民在捐赠仪式现场指出，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研究与发展基金（六合院基金）的设立，是“及时雨”，“适应了学校推动海丝研究的需要”，必将极大地推动华大海海上丝

¹ http://www.wti.ac.cn/article.aspx?menuid=1332&tab=tab_News&tabid=1963

² <http://news.lzu.edu.cn/c/201408/31482.html>

³ <http://weibo.com/u/5217212569?s=6cm7D0>

⁴ 广交世界共赢发展 广东与海丝沿线国共商合作，
http://gz.ifeng.com/zaobanche/detail_2014_08/31/2853903_0.shtml

绸之路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为更好地服务“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服务海西经济区建设、凝聚世界华侨华人参与新丝路建设、促进海丝沿线国家经济文化的交流互动和共同繁荣注入强大的正能量。同时六合院（福建）古典艺术家具有限公司董事长朱志悦先生也表示，将加强六合院与华侨大学在诸多领域的交流合作，把海丝研究课题作为公司重大的文化研究课题，希望“为海丝课题的研究与开发贡献力量，为华侨大学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¹有了机构的编制和经费的支撑，2014年11月4日，华侨大学2014年“海上丝绸之路”专项研究课题下达，确定15个重点课题和15个一般课题，要求分别以专著和高水平论文的形式结项，以期推动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高水平、团队性、内涵式发展，力求在较短的时间内拿出成批次高质量的精品成果以服务于国家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²

三、启示与小结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发现，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由于其重要性和及时性，十分顺应国际国内形势发展需要，并且能够为各方带来巨大的发展利益，所以一经提出就受到了国际国内政商学界和舆论传媒的高度关注与积极回应，对此，中国政府也从中央到地方、从官方到民间都进行了积极的宣传、推介和研究。从中国方面的推介来看，它们都是我国最高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主席在双边出访时提出来的。“一带”提出于对中亚国家也是我国的西部重要邻国的哈萨克斯坦的访问中，并在随后的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上受到有关国家元首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回应。“一路”则是在东南亚，在与我国隔海相望的海上邻国印度尼西亚提出来的，在随后的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并同样受到了与会各国领导人的积极评价与热情回应。

两大构想一个沿陆一个向海，都是针对我国的周边国家首先提出来的，提出过程中也首先强调中亚和东南亚是我国外交的优先方向，我国愿同有关国家在这里打造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希望让中国的发展惠及周边，从而实现周边外交座谈会上所提出的亲、诚、惠、容的共同发展，这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我国周边外交的重视，有在新形势下进一步深化我国“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外交布局的意蕴。应该来说这是适应美国推行重返亚太、亚太再平衡战略、积极打算从阿富汗撤军、推动中亚“新丝绸之路”计划以来我国周边环境变化与形势发展需要的大战略谋划。

同时，08金融危机及其扩散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诸多负面效应，中亚、高加索、中东北非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各国国内的安全稳定都面临着巨大压力，发展问题突出，中国在欧美国家的投资、贸易面临着各种阻力，国内企业走出去、内部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体制改革压力增大，在这种情况下，与一带一路国家进行合作面临着重大的机遇和利益契合点。一带一路国家资源、能源或原材料、人力资源、市场等丰富、广阔，为中国的资金、技术、设备、相关产业、过剩的产能等走出去提供了重要的空间。而这些国家大多属于发展中国家，也急需各种资金、技术、设备和专业技术人员等为其国内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动力和支持。两相结合，避开欧美发达国家，实现发展中国家的南南合作共同发展，不仅有利于各国国内的经济、政治、社会稳定、社会团结，而且也将有利于

¹ <http://news.hqu.edu.cn/hdxw/37180.html>

² <http://www.skc.hqu.edu.cn/s/178/t/961/fa/b1/info64177.htm>

打破以欧美为中心的当今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实现以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中心的经济合作发展新模式。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旨在货币流通的双边货币互换及用本币实现双边贸易结算对于规避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等国的货币政策对相关国家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就能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而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它则对于人民币的国际化，打破美元霸权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有利于我国的国家经济金融安全。

正是基于以上这些背景和原因，所以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一经提出就受到了国际国内的积极欢迎和热情回应，同时就国内来说，还有几点原因，包括，由于长期以来我国的开放前沿地带主要是在东南沿海，导致东西部发展几十年来一直处于不平衡状态，现在提出“一带”设想则非常有利于将我国上世纪末提出“西部大开发”以来所集聚的发展能量与西部各国实现对接，进一步推动我国西部地区的发展，改变东西部发展严重不平衡的局面。而对于东部沿海各省份来说，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目前各地区也面临着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压力，“一带一路”构想的提出，对于我国内部调整产业结构、进行产业升级，推动企业走出去，推动开放倒逼改革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所以，一经提出就立即得到了国内各地方的积极响应与规划，如广西提出要打造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新门户和新枢纽，福建省泉州市提出要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福建省提出要打造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枢纽，新疆则提出要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等。

就推介平台来说，上合组织、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中国东盟博览会、贸易与投资峰会、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战略对话、中阿合作论坛、欧亚经济论坛、博鳌亚洲论坛、中国国际贸易投资洽谈会等等都是主要的推介平台。就推介的内容来说，五通及其具体的方面则是重点，而针对各国地区的不同，相关内容又各有侧重。就推介的主体来说，中央政府、中央各部委、地方各相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其下属各部门、各地市都在积极研究和探讨提出自身的规划，在这方面各省市的社科院系统、各地同国内各知名高校、民间团体、协会等之间的合作探讨则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智力支持。而在传媒宣传方面，各地的宣传部门、中央地方甚至香港的各大媒体都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以不同形式、从不同角度在推出着有关一带一路建设的各种专题报道。而在深入的研究方面各地方高校则是一支除各政府部门研究机构、社科院之外最重要的研究力量，利用自身优势它们实现了校地合作、政学合作、商学合作、不断创新合作形式和机构设置，为此像华侨大学等有关高校还成立了专门的研究院，与地方社科部门、新闻传媒等进行合作共建，延请国内相关领域知名专家学者、相关领导等出任名誉职务、高级顾问、讲座教授等共同努力打造智库型的研究机构，力图为国家的一带一路建设提出有深度的学理研究和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在肯定以上这些背景与推进工作的同时，也有几点必须注意的问题需要强调：第一是如何更好地做到在向有关国家和地区推介的同时做到增信释疑，打消某些国家的消极评价与疑虑，比如认为一带一路是旨在打造属于中国的大国势力范围、可能会侵蚀有关国家的地区影响力等，获得他们的积极回应与支持，从而更好更加有效的予以推进，实现中国的这一构想与相关国家的类似构想之间，比如在中亚包括联合国、美国、俄罗斯伊朗等国等等在这一地区的各种新丝路、互联互通计划等之间的相互结合，在东南亚特别是中南半岛，比如中国的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计划与印度的东向政策之间的结合等。

第二，国内的中央地方、各部委、地方各省市等之间应该努力实现分工合作、密切协调，以便充分利用各自的优势资源实现有取向性的跨越式发展，必须避免重复建设、资源浪费、各自为政式的发展，打造优势产业群、产业带、项目集群，努力摸索创新发展和内联外引合作新模式，实现高效可持续的集约式内涵式发展。在这一点上国际国内相关领域和地区已经有了较好的尝试，比如中国—马来西亚钦州、关丹产业园区“两国双园建设”、中国—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天津生态城建设等都是值得借鉴的合作模式，而在国内六省九市发展成为七省九市为海上丝绸之路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新疆乌鲁木齐—江苏连云港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北五省区社科院联合研究丝绸之路经济带，国际国内丝路相关城市论坛共商发展大计等也都是值得借鉴和继续发扬的合作模式。

第三，长期以来，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也积累了丰富的经济人文和政治资源，并还有诸多手段继续储集这些资源，必须积极引导善加利用从而有效推动我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走出去在沿线各国落地生根，同时深入政府、商界和民间。比如我国在海丝沿线国家有着几千万的华侨华人以及新出去的新侨移民，它们将是我国推动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国内企业走出去与当地华商企业实现直接对接也将是一个轻便快捷而极具合作效益与发展前景的合作模式，值得进一步的关注和探讨。同时，利用与相关国家华侨华人的文化联系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华文教育、孔子学院的建立、吸引更多的国外学生到中国留学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不过这里也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即侨居国的政府、民间的看法及相关态度，历史上某些国家曾出现过严重的排华事件，虽然在中国更加发展强大的今天，有关问题可能不一定会以当年那么严重的形式出现，但是也必须加以注意，以免为某些不良势力所利用从而引起不必要的问题。

第四，综合目前对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来看，目前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研究已经较为成熟并走上了正式轨道，有大量的论文和相关专著、蓝皮书出版，而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则相对来说要滞后的多，相关论文远远少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研究，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研究专题、较高水平的论文，特别是相比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来说还没有一部专著或论文集、或蓝皮书或者说是公开发布的研究报告，有影响力的研究团队和研究人员也还没有出现，智力资源是政策规划和项目实施的根本，在这些方面必须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并投入资源积极加以引导和推进。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某种程度上甚至其重要性要超越丝绸之路经济带，因为目前来说关系到我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仍然像近代以来一样来自于海上，朝核危机、钓鱼岛争端、南海问题、中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性矛盾等问题都主要是在我国的东南沿海地带展现出来。而丝绸之路经济带则主要涉及的是国内发展不平衡问题和西部边陲的稳定问题，虽然也很重要，但是相比于整个国家的安全和可能发生的外部军事冲突来说则相对要好很多，而且在这里还有上合组织的合作框架来予以保障，所以我们必须加紧探讨的不但应该是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上的经济合作，而且还应适时探讨在相关地区如何实现政治稳定及其相应的模式与保障机制，虽然目前来看难度仍然较大，但是前期的相关探讨和模式设计仍然是必要的。总的来说，一带一路建设的经济重心可能应该放在丝绸之路经济带，而政治重心则似乎应该放在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上，以经济联系带动政治互信，促进领土、领海和地缘政治纠纷的解决似乎应该是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主要方向，并以此实现中国由地区性大国向全球性大国的转变。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的战略前沿，而丝

绸之路经济带则是中国的战略大后方，我们应该与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新经济走廊、中俄蒙经济走廊等统筹起来协调予以发展。

作者简介：

周兴泰，华侨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及其建设路径¹

贾益民 许培源

内容提要：一带一路是中央统揽国内国外两个大局，基于国家主权安全和经济发展利益需要，在周边和国际环境趋于复杂的背景下，提出的一个重大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战略的构想。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基本路径是：以国际经贸合作为核心，以海上运输通道和基础设施建设为依托，以沿线的重点港口、中心城市、资源区块、产业园区为重点支撑，以海洋捕鱼合作为牵引，以人文旅游交流为纽带，构筑陆海空立体交通网络，形成开放式国际经济合作带，形成具有强大产业聚集效能的经济走廊，以这种利益交融互利共赢的一体化的伙伴关系，来安抚周边国家，稳定南海局势，维护通道安全，获取战略支点，拓展发展空间。

关键词：海上丝绸之路 亚太经济合作 政经互动

一、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内涵及其战略意义

（一）一带一路的提出

2013年10月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提出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这与2013年9月习近平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一脉相承。一带一路是中央统揽国内国外两个大局，基于国家主权安全和经济发展利益需要，在周边和国际环境趋于复杂的背景下，提出的一个重大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战略的构想。目的是通过向西向海开发开放，形成沿海沿边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把握陆地和海上区域合作的主动权，贯通陆海战略大通道，打造我们周边地区的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安全合作的利益和命运共同体，以更加牢固的国家安全屏障、更加广阔的国际市场空间，更加紧密的战略伙伴网络，来突破美日的战略围堵，海权争端的压力，和内外发展的瓶颈，营造更为宽松的国际和周边环境，实现我们国家的和平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内涵

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有三条路线：一是东洋航线，由中国沿海港口经东海黄海至朝鲜、韩国和日本的航线；二是南洋航线，由中国沿海港口至东南亚诸国的航线；三是西洋航线，由中国沿海港口经南海过马六甲海峡，至南亚、西亚和东非沿海及美洲诸国的航线。现实中的海上丝绸之路，有南线和西线两大走向，这两条线路的核心区域，一是连接台湾海峡，关乎国家统一大业；一是穿越南海，牵动我们的海权争端，面向东盟各国，依托中国境外首个自由贸易区，贯通马六甲海峡，是扼守战略地图的大通道，是我们国家主权安全及经济发展利益海外最集中，与我们相互依存、利益

¹ 本文部分内容由2014年9月14日在华侨大学举办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高端论坛”的专家发言整理而成。

交融、安危与共程度最高的地区。因此，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既是国家发展、区域合作和周边外交的需要，也是维护民族主权，建设海洋强国的需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更重要更紧迫的战略意义。我们必须在国家最高层面和战略全局上去做权威的解读、统一的认识、科学的谋划和整体的推进。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一个基于中国沿海始发，途经东南亚、南亚、波斯湾、红海湾及印度洋西岸各国的航线，是通过沿线港口及其城市合作建立起来的经贸合作网络，包含了沿线国家的海洋经济合作关系。依据中国古代航海鼎盛时期所到达最远的地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航线大体上又可以分为三段：东南亚（包括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柬埔寨、缅甸等，简称东盟10国）；南亚及波斯湾（包括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巴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曼等12国）；红海湾及印度洋西岸（包括也门、埃及、苏丹、厄立特里亚、吉布提、索马里、肯尼亚、坦桑尼亚、莫桑比等9国）。¹

（三）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意义²

习主席提出建设海上丝绸之路，至少具有四重战略意义：

1. 有利于中国在亚太区域合作中赢得主动。进入新世纪，中国加速崛起，GDP 超越日本、贸易超越美国，在亚太地区影响力大幅提升。美国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推进跨太平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TPP），推动一个没有中国参与的美国主导的“美式”亚太经济一体化，以此分化、阻扰当前的东亚一体化（中国-东盟自贸区，10+1，RCEP 的 10+3，10+6）进程。TPP 会产生强大的贸易和投资转移效应，对中国对外经贸的影响是全局性的，中国提出建设海上丝绸之路，以巩固和拓展一体化成果，争取在亚太区域合作中赢得主动。

2. 有利于构建多元平衡的开放体系，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当前，我国的进出口贸易过度依赖欧美发达国家，不仅贸易摩擦频发，而且增长空间有限。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市场潜力巨大、能源和原材料丰富。建设海上丝绸之路，既拓展市场，又保障能源。在国际投资方面，我国目前主要是吸引外资，对外投资明显不足。建设海上丝绸之路，推动中国企业到海丝沿线国家投资，有利于实现“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构建多元平衡的开放体系，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3. 有利于推进以海上丝绸之路为载体的经贸制度建设和全球经济治理。我国是经济大国（GDP、FDI 世界第二，货物贸易世界第一），但全球经贸制度和规则一直由发达国家主导，处于被动地位。TPP 具有竞争性、排他性，推行着美国的“新贸易政策”及“人权高于主权”的价值观³。相比之下，中国倡议的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一个开放、多元、包容、可延展经贸合作和经济治理平台，可以团结更多国家、汇聚更多变革能量，推动全球治理和改革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推进以

¹ 见陈万灵，何传添. 海上丝绸之路的各方博弈及其经贸定位. 改革，2014年第3期。

² 本部分内容作者是在厦门9.8投洽会“海外华商投资中国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分论坛接受电视访谈的发言整理而成。

³ 见刘中伟，沈家文. 美国亚太贸易战略新趋势：基于对《美韩自由贸易协定》的研究视角. 当代亚太，2013年第1期。

海上丝绸之路为载体的经贸制度建设和全球经济治理。

4. 有利于经略和平发展的周边环境，向世界展示一个开放、和平、自信的中国，参与并推动世界和平发展。习主席提出的“命运共同体”，是当前中国周边外交的战略方向。冷战以来，亚洲地区的力量格局发生显著变化，主要是中国的崛起、美国的焦虑、日本的失落。中国的崛起客观上使西太平洋地区出现中国和美国为核心的双中心格局。美国的“再平衡”战略有失偏颇，刺激一些国家铤而走险，甚至妄言围堵中国，致使一些领土争端问题升温。¹

中国领导人以共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诠释中国外交新理念，把中国梦（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同周边国家人民的幸福、周边国家的发展对接起来，使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海上丝绸之路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开放、和平、自信的中国，为世界和平发展指明了方向。

二、中国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优势和困难

（一）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有关各方的博弈²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区位早已引起世界各国重视，不少国家早已或明或暗进行布局，展开争取丝绸之路建设主动权的博弈。

一是美国“新丝绸之路”行动计划。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斯塔尔提出了“大中亚”思想和“新丝绸之路”构想，主张建设一个连接南亚、中亚和西亚的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网络。这一构想得到美国政府支持。2011 年 7 月，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访问阿富汗、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四国，极力推行“新丝绸之路”倡议——以阿富汗为中心，希望阿富汗邻国投资、出力来维护美国在欧亚大陆腹地发展过程中的主导地位。

二是印度、伊朗和阿富汗共同推进南亚“南方丝绸之路”建设行动。试图打通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但是受美国对伊朗制裁的影响，加之印巴两国关系不佳，以致南亚“南方丝绸之路”建设和运行受阻。

三是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三国“通道”。“通道”对于加强中西亚经济合作组织各成员国交通领域的合作，促进欧亚大陆之间的合作起到重大促进作用。上述“丝绸之路”计划和行动显示了东亚、南亚、中亚、西亚各国围绕“通道”建设出现了复杂的竞合格局。

四是 TPP、TTIP 和 RCEP。近些年来，围绕亚洲与欧洲“通道”，有关国家展开了更大范围的合作与竞争。美国首先提出了更大的“亚太地区再平衡”战略。在经贸方面，构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TP），以阻碍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对亚太地区逐步形成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起到了分化作用，阻扰了亚洲向西亚和欧洲的扩展。同时，欧美联合构建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推行更加自由化的国际经贸规则，从欧洲大陆方面阻碍亚洲与欧洲的经贸合作进程。TTP 和 TTIP 阻滞中国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建立的东亚—中亚—西亚的经贸合作关系，从而限制了中国海上的拓展空间。

因此，对于中国提出的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相关国家会采取不同行动，或积极参与，或中立，

¹ 见阮宗泽，中国需要构建怎样的周边。国际问题研究，2014 年第 2 期。

² 本部分参考：陈万灵，何传添，海上丝绸之路的各方博弈及其经贸定位。改革，2014 年第 3 期。

或消极甚至阻扰。有关各方的行动会对海上丝路国家战略的实施产生影响。

（二）中国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优势

一是地缘优势突出。我们国家处于亚太地区的中心位置，同时也处于欧亚大陆地缘战略区和海洋地缘战略区的一个结合位。这个海区既是连接欧亚非三大洲和太平洋两岸诸航线的重要枢纽所必经的海域，又是中国周边地区海上贸易的经济走廊，有着良好通达性，中国倡议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其地缘优势突出。

二是历史渊源深厚。从汉代到隋唐，再到宋元，海上丝绸之路推动中原文化与海洋文明融合发展，在东南沿海形成了诸多重要的港口和对外通商的口岸，曾经创造过海上国际贸易的辉煌历史。它涵盖了中国的航海史、造船史、港口史、海外贸易史、移民史、国际关系史、中外科技文化交流史等十分丰富的内容，海上丝绸之路文化，是沿线国家和地区大家共同的历史和文化。

三是人文联系亲密。中华文明在中国周边地区历史上的影响根深蒂固，儒家文化得到广泛的认同，并且形成了共通的东亚文化或者叫文明圈。数百年来中国沿海大量的移民到东南亚国家，据最新统计，海外华人华侨不少于 6200 万人，其中 80% 以上都集中在这个方向。那么，这种文化同一性、价值认同感，加上民族向心力所产生的共同或相似的语言、价值观、思维方式、生活习俗、民族性格、地缘意识、血缘关系、历史传统等文化要素，都可能转化为具有某种凝聚力和整合效能的软力量，赋予国际关系、地域合作和向外发展特殊的精神动力和人文资源。另外中华文化圈，或者是中华文化的影响，还催生出以中国为中心、以华人为主导、以华资即华商资本为引擎的华人经济圈，形成工商业和金融业经济网络和增长中心，对周边国家产生了磁石般的吸引力，带动了整个地区的投资、贸易、旅游、交通、通讯等各个领域的网络化的发展。这无疑为以文化为纽带开展广泛深入的地区合作创造了优良的物质条件。

四是区域合作深化。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东亚地区客观上形成了一个梯度传递型的区域分工体系，接力棒式的产业和技术的传递关系，在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之后，一些低端的加工制造，像纺织业、制鞋业等这样一些低端制造业，就自然的会向越南、孟加拉等一些国家转移。初步形成的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合作共同推进的这样一种多层次、开放型、多样化、包容性的区域合作组织和架构，特别是中国—东盟自贸区以及某些次区域合作，深化了中国同东南亚和南亚国家之间的经贸联系，提升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虽然这个程度还不够高，但这为未来各个领域的合作提供了基础条件、机制保障和先期经验。

（三）中国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困难

一是沿线国家很多，涉及多边机制，协调难度较大。一路建设大概辐射沿路几十个国家，有人说三十个国家，有人说甚至还要更多，涉及到亚太经合组织（APEC）、东盟（ASEAN）、南亚共同体（SAC）、跨太平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协定（TPP）、区域全面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错综复杂的经贸合作和制度安排。沿线各国的政治生态迥异，政策规划有别，宗教文化不同，民族犬牙交错，利益诉求多元，与我国的关系有亲有疏，他们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是抱有厚望的，同时也担心我们背后有什么战略意图，担心失去对地区的主导权，还有顾忌南海争端、边界纠纷、主权让渡、资源保护和生态环境等等，难以形成统一建设的共识。

二是地区矛盾复杂，南海争端突出。沿线的部分国家政局动荡，南亚地区的反恐形势严峻，一些国家之间存在着边界纠纷，特别是我国与沿线六个国家存在着领土主权和海洋国际争端，一些国家在美国的怂恿下，不时在南海制造事端，对海上合作和共同开发态度消极，我们国家 60%甚至更多的能源资源经过马六甲海峡，可以说，中国未来的安全威胁主要来自海上。

三是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合作基础不牢，一体化程度欠缺。沿线各国的发展不平衡，各国之间的政治安全互信不足，同我国贸易投资自由化的程度不一，海上商贸物流通关体系有待完善，各国都无力出资互联互通，寄希望于中国来提供大规模援助或贷款。东南亚国家同我国的西南省区现在有一些融合，像云南广西，但是这种陆路联合和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口岸和边贸的管理还有待加强，管理制度创新不足。另外，到目前为止边贸对经济带拉动作用并不明显。

四是外部因素干扰，大国博弈激烈，多国可能会搅局。美国长期主导亚太海洋地缘战略格局，控制着和我国相关的日本海、渤海、黄海、东海、南海等太平洋边缘海，以及朝鲜海峡、琉球诸海道、台湾海峡、巴士海峡、马六甲海峡等半封闭海区和航道，在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中进一步严守同盟国强化岛链和海域的军事部署，加大舰机对我国的抵近侦察，实际上，这是国际关系界、国际战略界一直议论的对华战略包围圈问题。再加上有些国家挑唆我国域外的一些国家，在南海一些地方制造事端，干扰我国维护通道安全、控制重要港口、推动海上合作等等，遏制我国实现海洋强国的目标，我们必须清醒思考、沉着应对。

三、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路径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基本路径是：以国际经贸合作为核心，以海上运输通道和基础设施建设为依托，以沿线的重点港口、中心城市、资源区块、产业园区为重点支撑，以海洋捕鱼合作为牵引，以人文旅游交流为纽带，构筑陆海空立体交通网络，形成开放式国际经济合作带，形成具有强大产业聚集效能的经济走廊，以这种利益交融互利共赢的一体化的伙伴关系，来安抚周边国家，稳定南海局势，维护通道安全，获取战略支点，拓展发展空间。

要在周边矛盾如此复杂，风险挑战如此之多的这样一个战略方向上推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需要有宽广的视野。所谓宽广，就是要统筹国家主权安全和经济发展利益需要，从长远的角度去整体的规划、科学的论证、统筹的推进，特别要注意几个方面：

（一）总体规划要务实

不管怎样出台规划，都要立足周边实际和现有的基础，由近及远、先易后难、化整为零、循序渐进。所谓立足现实，就是要更多的考虑集成沿线零散的项目，像串联泛亚铁路公路等项目，要培育国际化、便利化、法治化的营商和通关环境，要重视相关规则、标准的制定和推广，要形成多边协调、各国参与、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民间配合的格局，以企业和项目为纽带，与各国利益实现捆绑，而不是完全另搞一套，更不能一厢情愿，不计成本、重复建设，恶性竞争，造成国家资源极大浪费，在这方面国内国际都是有经验和教训可以汲取的。

（二）战略重点要突出

海上丝绸之路涉及这么多的国家、这么多的省区、这么多的部门，各有各的意图和算盘，不能

变成一个什么都往里装的大筐，也不能搞成我们对外要包打天下的一个公益事业，要帮助人家去建这建那，这个我们做不到，我们国家现在还有很多地区很多民众没有解决温饱问题，所以谋划海上丝绸之路的时候，一定要突出国家的总体战略意图，坚持我们的战略需求导向，确定哪些是国家投入的核心区域、重点对象、优先领域、重大项目以及关键节点，哪些要更多地引导地方、市场和企业去发挥作用，哪些必须要借助沿线国家、区域组织、次区域合作以及国际融资渠道，哪些需要依托现有项目和基础条件，按照轻重缓急来谋篇布局，虚实结合、精准发力、重点突破。要综合国家主权安全和经济发展利益来推动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不一定要严格循着古商道去走，立足现实也包含这一层含义。

（三）经贸合作要先行¹

要双边和多边结合来推进我国的自贸区战略，争取年内启动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谈判，推动 2015 年完成区域全面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加强同美国推动的 TPP 谈判的某种沟通和互动，推动构建亚太自由贸易区，这是 APEC 会议上提出的。总体而言，习近平访问中亚时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做法，即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也是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基本方式方法。五通中，政策沟通是基础，民心相通是目标，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是 21 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内容²。

1. 道路联通。①海上互联互通：涉及港口及航线、物流集散和交易设施，重点是打造东南亚重要港口与西南陆地的通道，对接西南陆上丝绸之路。同时，落实海洋经济、环保、科研、搜救以及渔业合作，为化解南海问题加强海上合作尤其是服务贸易合作提供新的思路。②陆上—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互联互通。加快中国与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缅甸等 6 国的陆路通道建设；重点推动 GMS 公路和铁路运输通道及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以“高铁换大米”为样板，推进泛亚铁路计划。③航空、油气管道、信息联通问题。

2. 贸易畅通。除了传统的消除关税非关税壁垒、实施一站式通关等措施深化与海丝沿线国家的贸易合作，以及放宽市场准入吸引沿线国家来华投资之外，重点是：①加快向东盟国家走出去步伐。东亚地区独特的垂直分工制造网络是其竞争力的主要来源。近年来，随着中国工资加速增长，一些制造行业向东盟国家转移是一种趋势。中国企业到东盟投资，华人华侨可以发挥独特的桥梁和纽带作用。②与东盟国家合作建立自由贸易（园）区。如中马在广西钦州与马来西亚关丹创建的“两国双园”国际产业园，以此推动超越 WTO、甚至超越 TPP 的深度的经贸一体化合作。③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应发挥中国在建筑、咨询、信息技术等服务的优势，以及新加坡在金融服务、其它东盟国家在旅游、运输服务的优势，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同时，创新服务贸易模式，如“高铁换大米”模式，成立中国—东盟联合运输公司，通过在国家边境换火车头的形式，将集装箱运输进行到底，甚至打通海上丝绸之路与“新渝欧线”运输通道等。

¹ 本部分内容作者在厦门 9.8 投洽会“海外华商投资中国与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分论坛接受电视访谈的发言整理而成。

² 海丝沿线国家众多，经济、政治、文化、宗教迥异，差异化是亚太经贸合作的特点，因此，建设 21 海上丝绸之路不可能形成一个类似于 TPP 的高标准、一致性的区域合作组织，相反，次区域合作将成为主流。本文以中国—东盟区域合作为例分析如何以五通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3. 货币流通。①结算货币问题。现在，中国-东盟经贸交易的每一美元都要到美国去结算，成本太高。要尽快与各个国家签订货币互换协议，推动人民币在东亚的区域化、国际化。②金融体系问题。中国领导人提议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东盟及本地区的互联互通提供融资平台。

以上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合作，将打造一个深度一体化的、活力四射的中国-东盟自贸区，一个升级版的自贸区，中国-东盟合作也将步入更加辉煌的“钻石十年”。

（四）外交运筹要镇定，要发挥高层的战略引领作用

这么大一个区域合作战略工程，一定要加强高层的战略引领，要做好东盟和重点国家的工作，加强宏观政策和发展规划的协调，不仅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还要跟沿线国家沟通协调，加紧商签投资保护、交通运输、贸易便利化、金融合作、司法协助等相关的一些协议，推动海上国际合作，共同保护海上航道安全，打击海上跨国犯罪，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掌握南海规则的制定权，要双边和多边结合来推进我们的自贸区战略，吸纳区域组织、金融机构、域外国家包括欧洲的参与，也不排斥美国企业的进入，因为再进入它也不具备这样一种地缘的优势、区位优势。总的想法就是最大限度地要去分散我们的战略压力，减少推进这个战略的阻力。

（五）风险防范要充分

要加强内部管理，突出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重视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避开一些争议问题和敏感领域。坚持先予后取、多予少取，不干涉别国内政，不介入别国之间的矛盾，减少因为中方自身问题而引发外界的不良反应。要设计一些民生项目，推动形成一些早期的收获，让沿线国家早一点尝到甜头。海丝战略规划要有风险评估，要有应对预案，要有危机管理机制。要加强对港口要地的一些枢纽工程和油气管线境外园区等的安全防护。要重视开展预防外交，深化同东盟国家的海上合作和反恐合作，稳妥地处理南海争端。

（六）人文交流要推进

对外要多讲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和文化，同时赋予睦邻友好互利共赢的新内涵，同沿线国家加强人文交流，增设友好城市和协调机制，共同打造世界遗产和风景旅游，共同申办海上丝绸之路的，之路，之旅，之都，之节等等。要发扬智慧，多开展这样的活动，开展文化产业和文化贸易合作，深入实施人脉工程，加强教育、智库、媒体、非政府组织等等的交流，重视发挥华侨华人在参与建设、协助公关、舆论宣传等方面的独特作用。深化与侨团商会的联系，引导沿线国家的侨胞特别是侨商积极投身华商投资产业聚集区建设，与侨商合作或者委托其争取战略项目和能源资源。

（七）宣传推介要低调

相关的宣传和规划的通路，应该内外有别。我们不是要搞什么阴谋，但是涉及国家安全利益的，对外说了就会引起外界不必要的猜忌，因此对外要坚持多做少说。要多讲历史，讲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多讲互利共赢，海上丝绸之路是沿线各国大家共同的路，体现的并不仅仅是中国梦，而是地区梦，世界梦。要营造一个能够争取相关国家民众理解和支持的舆论氛围，吸引沿线各国的参与，同时可以避免招致不必要的误解和反弹，甚至引发外交和安全风险。我们现在办的一些主题活动，要努力把把这些活动办到国外去，要同我们的企业或文化走出去相结合，在整个战略推进过程中，要淡化官方和中国色彩，突出区域合作与共荣这一条康庄大道。

四、福建融入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一）福建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的优势与定位

福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同时还是连接台湾台海两岸的重要通道，这就决定了，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福建首当其冲。福建有面向亚太地区的重要港口，同时也是中国著名的侨乡，同东盟国家的渊源深厚，同东南亚的侨胞血脉相连，有着丰富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积淀，在新丝路建设中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人文优势、经济优势和历史优势，完全能够承接商贸人文的历史辉煌，发挥贯通海上和海外的特色和优势，成为新丝路互联互通的重要枢纽、经贸合作的前沿平台、人文交流的重要纽带。在国家总体规划中应该陆海统筹、里外联动、科学布局，要强调精准发力，把好钢用在刀刃上，把钱用在该花的地方，强调全局和整体利益的平衡。要引导相关的省市，有序、理性地参与新丝路建设，要尽快确定福建省等为重点的省份，并明确分工，在加快对外通道建设，搭建商贸物流平台，深化多元贸易往来，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加强海洋开发合作，推动人文交流融合，聚合港澳台侨资源等方面，充分发挥福建省的先导作用。福建省要做足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底蕴深厚这篇大文章，做足福建省在海外特别是东南亚地区这个方向上，人脉关系非常深厚这样一篇大文章，大力支持像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民间博物馆、国际文化交流基地等这样的平台建设，这些与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大战略是密切相关的。

（二）华侨华人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¹

华人华侨历来是外资企业“走进来”的主体，同时也将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领路人。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要充分发挥华人华侨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作用，福建是著名的侨乡，在这方面福建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要架设“侨”梁、给力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福建应该：

1. 以“侨”为渠道，织就市场营销网络。华人华侨在东南亚国家建立起大到跨国企业，小到便利店的市场流通网络，这是福建企业产品进入当地市场的重要途径。福建的轻工业品生产发达，像纺织服装、鞋帽和陶瓷等竞争力强劲，可是在国外自己建立销售渠道的成本高、风险大，因此可以借助当地华商经营多年的销售渠道和企业口碑等迅速融入当地市场，获得当地消费者的认同。

2. 以“侨”为中介，实施“走出去”战略。华人华侨融通中外文化、政治、经济，对住在国的社会、法律、风土人情了然于胸，在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和合作中具有独特的优势，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天然桥梁。

华人华侨可以帮助国内企业克服投资进入障碍（比如了解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有哪些需求，当地政府希望哪些产业得到发展，需要什么资源投入），降低对外投资的政治、法律和安全风险；也可以助力中国与丝路沿线国家政府间的合作，推动海丝战略规划落地实施。当然，也可以直接与华人华侨合作投资，即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又可以避免由于产业结构雷同等原因可能给华人华侨企业造成的负面冲击。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不仅要惠及海丝沿线各个国家和地区，更要惠及在中国革命和改革开放中做出重要贡献的海外华人华侨群体，我想这也是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所期待的，是一

¹ 本部分内容作者由作者在厦门 9.8 投洽会“海外华商投资中国与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分论坛接受电视访谈的发言整理而成。

件极为重要、极有意义的事情。

3. 以“侨”为示范，发扬“丝路精神”。我们说以“侨”带路，似乎与“海丝”沿线国家和地区合作就必须通过华人华侨，这种思路就比较“单一”。其实从华人华侨在东南亚的成功来看，最为重要的是“丝路精神”。秦汉以来，他们步履鲸波，到一个陌生甚至不利的环境里，跟不同国家和民族的进行合作，不仅生存了下来，而且枝繁叶茂，这是古丝路精神之所在，也是今天企业“走出去”要好好借鉴和学习的。当然，现代华商也应该抓住新世纪丝绸之路建设的商机、搭乘中国与海丝沿线国家深化区域合作的快车，继续发扬“丝路精神”，即壮大自己的企业，又为祖国的发展做贡献。

（三）东南国际航运中心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要以东南国际航运中心为载体，推进与“一带一路”互联互通。推动完善厦门—东盟、中东主要港口城市合作网络和机制，明确主推航线，根据贸易发展需求加密货运航线，加强与东盟各国港口城市之间的互联互通，争取到2020年厦门港与“一带一路”的海上航线达40条以上，空中航线达20条以上，形成“一带一路”客货运快速通道。同时，加大厦门口岸通关环节的疏导，简化通关手续，提高通关时效，为企业提供更便捷的服务，吸引周边地区（泉州、漳州、龙岩、潮汕、赣东南等）的“一带一路”货源来厦中转，打造中转枢纽，以国际航运中心为牵引，推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四）海洋产业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¹

1. 以国际化的视野打造海洋产业体系。福建远洋渔业的规模位居全国第二，远赴南太平洋、印度洋、非洲沿海进行捕捞作业，已经具备了获取全球渔业资源的能力。近年来，福建水产品出口迅猛增长。去年全省出口额超50亿美元，居全国第一，今年全国首个中国—东盟海产品交易所在福州马尾成立，初步具备了渔业产品的分销和定价能力。

此外，福建远洋渔业还在印尼、缅甸等国家建立了海外渔业基地（印尼金马安、马老奇、瑟兰岛，缅甸仰光、伊洛瓦底等），今后还要进一步发展与远洋渔业相关的渔业资源调查、渔场探测、冷库、物流、水产品深加工、海洋食品开发、远洋渔船检测服务等，建立国际性的全产业链，并掌握捕捞、加工和交易等关键环节，取得核心竞争力。

2. 推动海洋产业的科技研发与合作。在海洋经济技术方面，美国等发达国家在海洋高端产业的研发上处于领先地位，而以东盟国家为代表的我国周边邻国仍然以传统的海洋资源开发为主，海洋工程装备、海洋生物、海洋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领域发展缓慢，产业规模较小，技术水平不高。

我国海洋技术处于发达国家和东盟之间，因此一方面要重视发达国家高端技术的引进，另一方面要推动自主知识产权的海洋技术向东盟和海丝沿线输出，福建可以先行先试，建设中国—东盟海洋合作中心，把福建省建成国际性的海洋产业合作和技术交流中心。

两岸四地经贸合作、华人华侨资源、海洋海岸条件、东南国际航运中心是福建省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支点，在这些方面，国家是寄予厚望的。

¹ 本部分内容作者在厦门9.8投洽会“海外华商投资中国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分论坛接受电视访谈的发言整理而成。

基金项目：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基金重点项目，TPP 的投资效应及非 TPP 亚太国家的战略选择（编号：HSZD2014-03）。

作者简介：

贾益民，华侨大学校长、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院长、教授；

许培源（1970~ ），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副院长、经济与金融学院副院长，主要从事国际经济与国际贸易的教学和研究。在国际贸易、亚太经贸合作领域完成国家级或省部级项目 8 项，在 CSSCI 期刊发表论文 30 篇，担任中国国际贸易学会理事、福建省亚太经济合作与发展研究会常务理事、福建省经济学会副秘书长，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加强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服务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余兴光 许江 胡毅 张汉女

水下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保护并继承这些珍贵的水下文化遗产，深入挖掘其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是落实国家海洋文化发展战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需要。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部署，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均对海洋工作做出了重要批示，显示出党中央国务院对海洋问题的关注和重视。海洋强国不仅体现在维护国家权益、开发利用资源、发展海洋经济上，也包括传承和弘扬海洋历史文化、发展公益性的海洋文化事业等内容，为建设海洋强国注入精神动力。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规定(2001年)，水下文化遗产是指“至少100年来，周期性地或连续地，部分或全部位于水下的具有文化、历史或考古价值的所有人类生存的遗迹”。公约列举的水下文化遗产包括遗址、建筑、房屋、人工制品(artifacts)、人类遗骸、船舶、飞行器、其他运输工具或其任何部分及其所载货物或内容物，以及相关具有考古价值的环境、自然环境和具有史前意义的物品等。许多水下遗址在海底已保存了数百甚至上千年，它们代表着不同的文化，存在于世界各地的海洋、江河、湖泊、沼泽和湿地等不同地理地貌和沉积环境当中。其中，以沉船最为常见、数量最多^[1]。据世界船舶界权威估计，全世界海洋中约有300万艘未被发现的沉船^[2]，这些沉船较为集中的地区大多是历史上海上交通较为发达的区域，比如地中海海域、欧洲到北美的航线、中国到东南亚航线以及中国到日本航线等海域。

2013年底，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重要演讲时明确提出了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宏观战略构想。“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海上大通道，既有源远流长的历史脉络，更是面向未来的时代抉择。开发海洋资源，发展海洋文化，已经成为沿海地区寻求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关注点和增长点。水下文化遗产是海洋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是我们祖先认识海洋、经略海洋的历史见证，作为中外交通贸易、合作交流的物化表现具有超越时空、跨越国界的影响力，以此为基础彰显海上丝绸之路的千年传承，对于增进不同文化间的认同、互信、感情具有重要意义。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保护好、研究好、展示好水下文化遗产，充分发掘和展示水下文化遗产所承载的海洋文化魅力，努力在全社会形成关注海洋、热爱海洋、保护海洋的浓厚氛围，是海洋强国建设的题中应有之意。

中国拥有近三百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海疆、一万八千多公里的海岸线和丰富的内陆水域，其中蕴含着种类多样、数量巨大的水下文物。水下文化遗产内涵和外延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而丰富和拓展，

保护对象日益复杂多样, 已经由沉船及船载文物, 扩展到海上丝绸之路、沿海海防和海战遗迹、古港口、造船厂、沿海盐业遗址等多种类型。自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以来, 我国水下考古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巨大变化, 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考古和文献资料表明, 华夏先民至少在新石器时代就开始了探索海洋的活动。特别是唐宋以降, 随着水上航运技术的成熟、海外贸易的扩大和海洋文化的繁荣, 在现代中国有效管辖的海洋和内陆水体中留存下了种类多样、数量巨大的水下文化遗产^[3]。广东“南海 I 号”整体打捞、海南西沙“华光礁 I 号”、福建平潭“碗礁 I 号”等沉船的抢救性发掘项目均获得成功, 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存在问题

20 世纪后半叶以来, 随着全球化、现代化思潮与运动的出现和加速, 文化标准化、武力冲突、环境恶化、旅游业、沿海工程建设等的威胁, 已使不计其数的文化遗产(包括水下文化遗产)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甚至面临消失的危险。目前, 我国的水下文物保护尚存在一系列亟需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 4 个方面

(一) 家底不清已成制约瓶颈

我国水下文物保护工作起步较晚, 探测保护技术尚处于初始阶段, 水下文物的家底依然不够清晰, 这已成为水下文物保护事业发展的瓶颈之一; 家底不清、保护缺位、管理滞后仍然是水下文物保护工作中的几个根本性的问题, 而水下文物调查不能有效开展是基础性原因。近 30 年来, 我国的水下文物调查单纯以渔民“线索”为指引, 几乎所有的探测设备都是用来进一步明确渔民线索的具体位置, 而缺乏主动性的找寻与探索。虽然水下文物的探测手段尤其是基于地球物理基础的探测手段已有一定应用, 但我国对这些手段的应用还多局限于通过线索发现水下文物后, 对已知沉船位置、形态及埋藏深度等的探测, 并未系统总结相关的调查经验, 也缺乏用现代探测手段如何实现从被动探测到主动发现的工作方式转变。

(二) 水下文物盗采等不法行为依然猖獗

水下文物盗掘、盗捞、倒卖等不法行为依然猖獗, 保护形势十分严峻, 由于国内外文物热、收藏热、投资热的不断升温, 为了高额利润, 沿海地区盗捞和走私水下文物的非法活动日益猖獗, 水下文化遗产的安全形势非常严峻。非法打捞在掠走大批文物的同时, 往往伴随着粗暴、野蛮的工作方式, 对水下文物遗存造成严重破坏。“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外贸易的重要通道, 受当时航海技术的限制, 大量船只沉没于该条航线及周边海域。伴随船只沉没且能历经岁月保存的大量古代文物、瓷器成为盗捞者追逐的目标。著名的“华光礁 I 号”、“碗礁一号”等沉船都是在已遭破坏情况下所进行的抢救性发掘;

(三) 经济发展潜在威胁水下文物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我国经济布局进一步向海滨地区集聚, 滨海或海岛旅游业及各类滨海经济区渐次提出, 涉海用海项目急剧增多, 在很大程度上比内陆地区更为严重地威胁到海洋自然遗产和海洋文化遗产的安全; 其中许多目前都面临着自然损坏和人为破坏的危险, 使水下蕴藏的许多珍贵的历史信息可能完全丧失。为协调遗存在近岸海区水下文化遗产的安全和沿海经济的发展, 需要对水下文物的分布区域、遗存环境进行详细地调查和评估, 进而进行科学的规划管理和合理的

开发保护。

（四）境外人员的蓄意破坏不容忽视

新形势下境外人员蓄意盗捞、破坏我国水下文物，将给我国的海洋权益带来严重威胁。这些海底文化遗存是我国维护南海主权的重要法理依据。而那些在南海与我国有“主权争议”的国家，往往会对这些海底遗存采取“非法手段”进行破坏。一方面通过盗捞文物，获取经济利益；另外就是蓄意破坏中国南海水下文物遗存，以销毁中国关于南海主权的历史证据。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水下文物保护的研究进展

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公约》生效实施，标志着国际社会对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的重视。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均为海洋大国及水下文化遗产大国。美国在1972年颁布了《国家海洋保护区法》，禁止占有、出售、提供销售、购买、进口、出口、递送、携带或运输违反该法获得的任何水下文化遗产；英国在1973年颁布了《沉船保护法》，禁止在限制区内未经许可损毁、移动沉船及其所载物体，禁止未经许可直接针对遗址的潜水和捞救作业等，以安全保护领海中具有特殊历史或考古重要性的沉船及其遗址，以免被未经许可的人员干扰、劫掠或破坏；欧洲理事会1978年起草的《水下文化遗产报告》首次提出沿海国应该建立200海里的“文化保护区（cultural protection zone）”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并在“文化遗产的第848号建议”中予以肯定；加拿大政府2002年在《国家海洋法》（1997年）的基础上，颁布了《国家海洋保全区法》，实施了《国家海洋保护区战略》，建立了由海洋保护区、海洋野生动物保护区和国家海洋保育区三大核心计划组成的加拿大联邦海洋保护区网络，其中，国家海洋保育区主要用来保护和保全有代表性的加拿大海洋自然与文化遗产，并提供公共教育与欣赏机会。21世纪已被国际社会公认为“海洋世纪”，全球性新一轮“重返海洋”的蓝色开发浪潮已全面兴起，沿海地区的大幅度、高强度开发，沿海区域的城市化和城市群进程、沿海地区的工程建设和旅游开发，都在很大程度上比内陆地区更为严重地威胁到海洋自然遗产和海洋文化遗产的安全，因而对沿海区域的海洋文化遗产的探测、保护显得更为迫切和急需。对此，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代表的国际组织给予了及时和密切的关注，各国政府及相关学者为此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与立法工作。国外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立法中多有水下保护区的设计，其水下文化遗产分类分级保护体系多与海洋规划相结合，有海洋公园（marine park）、水下文化遗产区（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 zone）、海洋保护区（marine preserved /protected area）、水下考古径（underwater archaeological trail）等概念与类型。如意大利水下公园就分为水下考古公园（Underwater archaeological parks）、水下考古保留区（Underwater archaeological reserves）、水下生态考古或水下自然考古公园与保留区（Underwater eco-archaeological or underwater nature-archaeological parks and reserves）、未触动过的水下考古保留区（Untouched underwater archaeological reserves）几类。

对于《联合国海洋公约》等国际公约和决议，我国作为缔约国或参与国，从中央政府到各级地方政府和相关学术界，均采取了积极行动，并制定了一系列国家和地方的相应法规。1982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02年修订后的《文物保护法》确立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

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保护工作方针，为开展水下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与开发管理提供了法律依据。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条例》提出了水下文物保护单位、水下文物保护区的概念及报批程序与管理方式^[4]。2009年修订的《福建省文物保护管理条例》、《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中设立了“水下文物保护区”制度，但在实际操作中面临很多机制和技术困难。我国经过20多年的历程，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步入全面发展新时期：（1）从水下考古走向全方位水下文物保护。2007年12月“南海I号”沉船整体打捞、整体搬迁、异地清理的“奇思异想”变成现实，沉睡海底800多年的南宋沉船入住现代“水晶宫”，这标志着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巨大进步以及保护技术的重大创新和突破^[5]。2009年5月18日，世界第一座遗址类水下博物馆——重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建成开馆，这标志着原址保护的重要性在我国开始得到充分重视。目前正在抢救保护的“南澳I号”，采用潮汐表、水下双向通话、双瓶作业、缓冲打捞篮等先进水下考古、打捞设备，大大提高了海底考察、打捞效率及出水文物的安全。（2）从内水扩展到沿海，随着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理念、技术、人员装备、后勤保障等方面的不断进步，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水域已经逐步拓展到南海和西沙等远海海域，工作内容从单纯的水下考古，扩展到出水文物保护、巡查监护、执法管理、学术科研等多个领域。（3）从单一部门主导到多方统筹协作。自1987年，国务院批准成立由国家文物局牵头、多部委参与的“国家水下考古协调小组”以来，国家文物局已与外交、科技、公安、边防、财政、交通运输、海监等多个部门建立了良好的联系机制，在打击非法盗捞和走私水下文物活动、开展水下文物监控、日常巡护和远海水下考古等多方面进行了紧密、有效合作。尤其是近年来，与海洋部门的合作日益密切，1998年成立了“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心”，举办了一系列海上丝绸之路研讨活动，并呼吁联合申报海上丝绸之路世界遗产；2009年我国成立了“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2010年国家海洋局与国家文物局签署了《关于合作开展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框架协议》，将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列为海洋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家文物局也将海上丝绸之路考古列入“十二五”规划。2013年，鉴于新时期发展建设与水下文物保护所面临的新形势和新问题，国家海洋局实施了首个有关水下文物探测保护的海洋公益性科研行业专项课题“水下文物探测、保护技术体系研究与示范”，该课题由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牵头，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以及福建省文物局等的大力支持下，整合国内优势科研力量，旨在为水下文物探测、保护技术的系统化、规范化进行有益的探索和尝试。2014年9月4日，在青岛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与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受到国家海洋局、国家文物局高度重视，进一步拓展了双方合作领域。此外，中国水下考古专用船舶“中国考古01号”于9月5日正式投入使用，大大加强了水下考古能力建设。

（二）水下文物探测方法的研究进展

水下文物探测与陆地考古相比要困难得多，是名副其实的“大海捞针”。水下世界与空气隔绝，光学、声学条件极差，致使水下考古工作不能按田野考古常规方法进行；深水中的低温、水质和氮气麻醉也严重影响着探测工作者的正常工作。这些状况促使水下探测工作要借助于现代科学装备和方法，地球物理勘探学中，除了磁法、声纳法^[6]，常用的还有电法、地震法、重力和放射性等方法。这些方法在陆地考古勘探中都获得了不少成功的应用实例，也逐步被应用于水下文物探测中^[7]。近

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卫星遥感、地球物理综合探测方法在水下文物探测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也推动了水下考古事业发展。特别是利用侧扫声纳和多波束测深系统进行海底目标物探测技术的发展,充分利用侧扫声纳和多波束测深系统能够探测海底目标物的特点,并形成目标物位置、三维影像图和声像图等方面的优点,近年来在水下探测及水下考古中获得了成功。

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探险家菲希尔在佛罗里达海峡寻找公元1622年沉没的西班牙货船“阿托卡”号过程中,尝试运用了遥感和地球物理勘探学中的某些方法。菲希尔采用了地球物理勘探学中的磁法、声纳(声反射法)进一步探测沉船的位置。1967年美国曾应用自然电场法探寻到公元1864年沉于海中一只装甲舰。美国也曾应用磁法寻找内战时期沉于水中的火车头、大炮等,并获得理想的效果。在欧洲,考古学家们多次应用声纳类方法探测出埋藏在海底的沉船和城市遗址^[8]。总体而言,基于声学方法探测的技术已经在水下文物考古中展露头角,但一些在陆上考古中应用相对成熟的探测方法如电法、重力法等则因为海洋背景环境噪声的复杂性而难以广泛应用。1989年11月我国考古工作者和日本“水中考古学研究所”合作,在广东台山附近海域中的“南海一号”沉船考古探查中应用了旁侧声纳法,探明了该沉船的位置。1993年夏,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室在组织对辽宁绥中县三道岗海域的元代沉船探查中,应用浅层地震法对沉船及其海底环境进行探测,结果提供了沉船遗存厚度为1.1~3.6米,最高顶面高于海底2.5米的探测资料^[9]。2002年大连“五·七”空难发生后,天津海事局海测大队利用一侧扫声纳和多波束测深系统对飞机失事海域进行了扫海测量。根据声纳和多波束的扫海结果,陆续打捞出了大量的机体残骸,包括机首的右半部和部分飞机右侧舷窗、飞机的机翼、垂直尾翼、发动机、发动机倒流罩、印有公司名称的机体外壳、座椅等等^[10]。声纳和多波束结合的探测方法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和取得重大成功经验。

三、水下文化遗产的探测与保护

对于水下文化遗产的研究,首先要对其分布特征进行调研。通过收集、整理历史上的港口码头位置、贸易往来航线资料或古海战场、古沉船等史料记录,圈定沉船事故多发海域,结合现有的现代海上调查研究成果,如声纳图谱、多波束资料等,研究近岸海域水下遗产的基本特征和分布规律,进而确定重点调查研究海域。近岸海域古沉船是否深埋或者露出海底面,主要受海底水动力条件、沉积速率等的控制。水动力条件控制古沉船在海底的位置是否会慢慢移动,沉积环境控制古沉船的埋藏深度。根据重点研究海域的地质相关资料,研究沉积环境演化与海陆变迁过程,分析重点研究海域的水动力条件、沉积物沉积速率和近代地质构造(活动断层)变化,利用史上古沉船的沉船时间记录,可以计算出古沉船大概的埋藏深度,并可以确定古沉船沉没入海以后,有没有较大的位置变动。

其次,建立近岸海域水下文化遗产探测与保护技术体系。主要应用地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物理海洋、海洋生物生态等多学科方法开展水下文化遗产探测保护综合研究,建立系统的探测与保护技术体系。根据第一步的调研工作,对圈定的重点研究海域或有文物出产海域进行古沉船、古水下遗迹调查,主要应用磁力探测、金属探测仪、侧扫声纳、多波束、浅地层剖面探测等海洋地球物理方法。磁力探测的磁力异常区,可能为近代钢质沉船或者装有大量金属器具的木质古代沉船。侧扫声纳可以根据探测所得图像的明暗程度,判断海底出露物体是否为古沉船,并能给出描述海底目

标物的大概位置。结合多波束资料可以确定其具体位置，不同位置的相对高度，二者联合使用则可以对海底古沉船进行准确的定性、定量分析和全面解释。地震波在海底地层传播过程中，遇到古沉船、古遗迹时引起地震波传播变化。因此埋在海底底层中的古沉船或古遗迹在浅地层剖面仪、单道的地震图谱上会有一定显示，据此可以计算出古沉船或古遗迹等水下文化遗产的埋藏深度，并可以确定其埋藏位置。在此基础上，结合分辨率更高的多波束声纳和相控阵三维声学摄像声纳等进行细部特征识别，辅之以水下摄像和水下探摸等手段，根据以上海洋调查，可确定水下遗产等具体分布位置，再运用地质、地球化学、物理海洋学、海洋生物生态的研究评估结果，对水下遗产进行风险评估研究，最终建立近岸海域水下文化遗产探测与保护技术体系。

第三，建立水下文化遗产探测与保护技术示范区。根据对圈定的重点研究海域的调查研究结果，选择比较重要有代表意义的水下文化遗产海域作为示范区。在示范区应用建立的水下文化遗产探测与保护技术体系，探测研究水下文化遗产的环境状况及相应的保护政策，评估其经济、文化、历史价值，为水下文化遗产探测保护提供示范。

四、展望

水下文化遗产是国家海洋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运用现代海洋探测技术，对我国近岸海域水下文化遗产的基本特征和分布规律进行系统的研究分析，选择重点海区进行水下文化遗产探测与保护技术研究。在此基础上，建立规范化的水下文化遗产探测保护技术体系，不仅可为我国海域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与管理提供技术支撑及科学指导，而且对研究复原我国航海、贸易、造船、陶瓷等历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更有益于弘扬我国海洋文化、促进海洋经济快速发展。

水下文物的探测与保护有着密切的联系，探测是为了更好的保护，而保护离不开前期的探测。规范、科学、有效的探测技术体系必将为更好的进行水下文物保护提供基础。2013年，国家海洋局正式启动了海洋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项目“水下文物探测、保护技术体系研究与示范”，项目的主要目标包括收集整理水下文物历史信息，分析评价水下文物保存现状；以现代海洋物理调查手段为基础，系统进行水下文物探测技术研究，建立水下文物探测技术体系；开展水下文物保存环境现状调查以及保存环境评估技术方法研究，提出保护对策；为我国水下文物的探测、保护与管理提供技术支撑及科学指导。相信随着我国对海洋的不断关注和重视，有关水下文物探测技术和保护工作必将迎来进一步发展，进而更好的服务和传递“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致谢：课题组成员在课题实施与探讨中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参考文献：

- [1]赵亚娟,张亮.从“南海一号”事件看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的完善[J].法学,2007,(1):118-125.
- [2]张一鸿.水下文化遗产面临的威胁与保护[J].世界文化,2007,(7):48-49.
- [3]魏峻,中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现状与未来,国际博物馆(中文版),2008,62(4),100-105
- [4]赵亚娟.中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现状与建议.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08,10(1),27-30

[5]魏峻. “南海 I 号”沉船考古与水下文化遗产保护[J]. 文化遗产, 2008, (1): 148-153.

[6]Green J.,The application of side scan sonar and magnetometer to the location of. archaeological sites.AIMA Bulletin, 2002,26,119-131.

[7]Bailey G.N.,Flemming N.C.,Archaeology of the continental shelf: Marine resources, submerged landscapes and underwater archaeology, 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 2008,27,2153 - 2165

[8]张寅生.水下考古与水下考古探测技术. 东南文化,1996,4,29-33.

[9]孙键.绥中三道岗元代沉船的发现. 国际博物馆(中文版),2001,62(4),114-118.

[10]李鲜枫,张铁军,黄永军.侧扫声纳与多波束测深系统在大连“五·七”空难搜救中的应用. 气象水文海洋仪器,2005,1,33-37.

作者简介:

余兴光,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所长、教授级高工。

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

兴衰的政治影响因素

尹 焯

内容摘要：海上丝绸之路既是中外间的海上交通路线，也是一种复杂的经济、社会现象，因而决定和影响它的因素也是纷繁复杂的，本文试就影响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兴衰的政治因素进行归纳、分析。

关键词：海上丝绸之路 兴衰 政治因素

引 言

“海上丝绸之路”就是以丝绸贸易为象征的、在中国古代曾长期存在的、中外之间的海上交通线及与之相伴随的经济贸易关系^①。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曾对世界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卓越贡献，促进了人类社会的繁荣与进步。通过这条海路，中国输出的货物主要包括丝绸、陶瓷、茶叶、纸张和各种日用品，输入中国的货物主要有香药、宝货等；通过这条海路，中国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及其它发明传往各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程；也是通过这条海路，中国特有的思想文化传播到各国，海外诸国的生产技术和各种思想文化，不断传入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作为中外间的海上交通路线和一种对外贸易关系，其发展、兴衰势必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政治力量的作用尤为关键。它的发展之所以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特征，比如汉代是海丝开辟的时代、魏晋南北朝海丝持续发展、隋唐时期海丝蓬勃发展、宋元时期为其空前繁荣期、明代是其由盛转衰期、清代海丝停滞与逐渐衰落……无不与当时国内外政治环境、统治者的理念、态度等政治因素密切相关。笔者于本文梳理、归纳了影响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兴衰的几点政治因素，希望通过这一整理工作，对当代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建设起到一定借鉴作用。

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态度以及基于此而制订的对外贸易制度、政策和所设置的官方机构等，对某一时期海外贸易的兴衰有着重大影响。比如，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空前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统治阶级实行积极发展海外贸易的政策。而明朝政府实行“海禁”政策，则使海丝贸易由盛转衰。我们知道，任何社会意识的产生总是来源

^① 赵春晨. 关于“海上丝绸之路”概念及其历史下限的思考[J]. 学术研究, 2002(7).

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并根源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那么，统治者对海外贸易的态度以及相关策略的制定实施也同样受到以下几种情形的影响：

一、统治者自身的思想政治理念从一定程度上左右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

唐代政权对海外贸易极为重视。唐太宗奉行开明的对外政策，对“远夷”不歧视。他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这种政策使得：大批胡商从陆路或海路来到中国，他们可以与中国人通婚，也可以长期居住在中国。唐朝有少数民族官员，甚至有相当数量的外国官员。如此开放的对外政策，使唐朝的海上贸易更加频繁，中国的丝绸和其他工艺品换来了玻璃、水晶、象牙等奢侈品；又从国外进口来利于生产需要的马匹、牛、羊等牲畜。

明太祖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出身赤贫的皇帝，有着朴素的政治理念。他的政治理想是建立一个“鸡犬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简朴农业社会。如有可能，甚至想废除货币和商品交易。他在军队中实行卫所制，官兵自耕自食，亦兵亦农。因此不难想象，明朝著名的“海禁”政策与他这种治国理念也是分不开的。

二、国内外政治形势，是统治者制定相应海外贸易策略的重要依据

北宋宋辽对峙期间，因高丽与辽接壤，宋政府担心商人到高丽贸易可能会把一些禁运的物资卖给辽朝，曾一度禁止商贾泛海去高丽。到了宋神宗时，两国恢复了友好关系，宋政府于元丰二年（1079年）正式颁布法令允许商人去高丽经商。南宋宋金对峙时期，宋政府担心高丽与金互通消息，帮助金朝由海上奔袭南宋都城所在的两浙路，两个政权间的关系曾一度疏远。后来南宋与高丽恢复了政府间的密切关系，海上贸易往来也更加频繁。

明嘉靖二年（1523年），宁波发生了一个史称为“争贡之役”（1523—1524）的事件。两起日本贡使相继到达宁波，因礼仪问题发生械斗，在宁波、绍兴等地烧杀抢掠，东南沿海为之大震。此事件后，明政府不仅革罢了福建、浙江二市舶司，还派人巡视海防并屡下海禁之诏。嘉靖三年（1524年）四月，明廷规定福建沿海居民“凡番夷贡船官未报视，而先迎贩私货者”、“私代番夷收买禁物者”、“搅（搅）造违式海船私鬻番夷者”^①，均要论罪，并张榜晓谕浙江、广东一体执行。嘉靖四年（1525年）八月，兵部下令浙1、福二省查禁双桅海船，“但双桅者即捕之”^②。嘉靖八年（1529年）十二月，“出给榜文，禁沿海居民毋得私充牙行，居积番货……违者，一体重治”^③。嘉靖十二年（1533年）九月又重申，浙、福、两广“一切违禁大船，尽数毁之。自后沿海军民私与市贼，其邻舍不举者，连坐”^④。这说明争贡之役后，明廷强化了“海禁”政策，加强防范百姓与外番的往来。

三、中国古代对外贸易有“突出封建政治，外交与外贸合一”的特征

扩大政治声望，抚服四夷之心，不计较物质利益，是对外贸易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政策思想。古代海丝贸易也同样实施经济服从政治、外贸服从外交的原则，以使其他民族政治上服从甚至归属中国。

① 《明世宗实录》卷 38，嘉靖三年四月壬寅，第 956—957 页。

② 《明世宗实录》卷 54，嘉靖四年八月甲辰，第 1333 页。

③ 《明世宗实录》卷 54，嘉靖四年八月甲辰，第 1333 页。

④ 《明世宗实录》卷 154，嘉靖十二年九月辛亥，第 3488—3489 页。

隋唐王朝国力强盛、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由此带来的对外政治影响的扩大，对这时期海外贸易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刺激和促进作用。中国周围许多国家都同隋唐王朝建立了政治友好关系，比如东南亚诸多国家，如林邑（今越南中南部）、真腊（今柬埔寨）、骠国（今缅甸），以及马来半岛、南亚和西南亚的很多国家。而这些国家和中国的往来，多数要靠海上通道，这样一来势必对海丝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因此说，海外贸易的开展皆是以强大国家力量为后盾的，同时又是与外交、政治、军事、经济相结合的活动。

封建朝廷历来讲究“天朝恩泽”，有“天朝无物不有”的经济自大思想，使得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同外国进行朝贡贸易时，偏好于将中国的“赐”大于外国的“贡”。如宋王朝以“交聘”形式同海外国家进行交易，不少国家以朝贡名义来宋，“往往皆射利于中国也”。宋政权出于政治考虑，不仅免税优待各国“贡物”，还赠其价值高于贡品的物品。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大食俞卢和地国贡乳香等”，宋政府按照广州时价回赠钱两千九百贯，并额外加银二千两。

明朱棣派郑和七次出使西洋的原因之一就是加强与海外诸国的联系，扩大明朝的政治影响。而郑和船队在进行贸易活动的同时，实际又充当着外交代表团的角色。从随同郑和出海的人员对郑和船队航行经历的相关记载中，可以了解到，他们每到一地，首先与当地领袖人物建立联系，然后开展贸易活动。比如，中国船队到阿丹国，“国王即谕其国人，但有珍宝许令卖易”。也就是说，其国事访问和商务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既是一种政治联系，也存在一种由官方进行的贸易关系。

四、古代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另一种对外贸易政策思想是出于统治阶级自身奢侈生活的需要，贸易所得主要用于满足统治者的生活所需

明朝时候，当政者主张进口“美玉明珠，孔翠犀象，大宛之马，西旅之獒”等珍奇物品以满足“中国（实为统治阶级）之所好”。永乐帝本人就是奢侈生活方式的追求者。而郑和出使西洋每到一处，都了解各国的物产，并有目的地用以物易物的方式同这些国家进行贸易。从船队带回来的物品中可以看出，除了一些药材外，也多是奢侈品和观赏物，如珍宝、香料、珍禽异兽等。这反映了别国官方赠予郑和船队的物品以及船队所进行的贸易，主要是为封建帝王和官僚贵族服务的。清朝进口的商品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供统治阶级享受的奢侈品和高级消费品，如宝石、香料、首饰、戒指、高级毛织品、鱼翅、燕窝之类。

五、“重农抑商”传统思想影响海外贸易政策的制定实施

“重农抑商”是贯穿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的重要思想政策，用以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统治阶级把农商关系视为本末关系甚至对立关系。“农”，包括小农及以小农为基础的农业经济，“重农”目的是稳定国家兵源、财源（赋税）与社会经济基础；“商”，指的是商品经济与资本市场，“抑商”含有防止政权对立面或异己力量出现的根本目的。

明代海丝贸易就突出体现了其“重农抑商”的色彩，即“海禁政策”。一方面，明统治者继承了种种“抑商”的传统思想；另一方面，私人海上贸易的迅速发展导致新的社会经济关系产生，这势必对封建专制政权带来一定威胁，于是明世宗决计实行严厉的“海禁”，禁止私人进行海上贸易。

清朝与“重农抑商”相适应的对外政策是闭关锁国，对外贸易方面则继承了明代的海禁政策。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廷为防范西方殖民者骚扰中国沿海地区，关闭了江海、浙海、闽海三

个口岸，限定广州为惟一对外通商口岸，并且对丝绸、茶叶等传统产品的出口量，严格加以控制，直至宣宗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时止。

六、中央集权的外贸管理机构是皇权意志的体现，也是贯彻封建政府对海外贸易政策的重要保证

商品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海外贸易地位的上升，唐初统治者建置了管理对外贸易的职能机构市舶司，由中央委派专职官员负责掌管水路贸易，开始将市舶收入纳入政府财政（唐以前的统治者认为“不必仰其赋入，以益中国”）。市舶司的主要职能，一是接待外商，颁发凭引，监督和管理中外商人的贸易活动和船舶的进出港口；二是对进口货物分类征收实物税；三是处置舶货。宋、元、明时期，这一机构相沿并不断发展，体现了中央政府对海外贸易的集权管治。

南宋因只存半壁江山，使得其财政收入来源大为减少。政府的开支却十分庞大：对金战争的费用、皇室奢靡生活等。政府出于增加财政收入的考虑，就更加把发展海外贸易视作维持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宋高宗曾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施得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

七、中国古代对外贸易法律制度集中反映了统治阶级对进出口商品的统制管理

中国古代政府除有一套管理机构，还有一系列管理制度，用以规范对外贸易。

在进出口商品结构上，政府进行严格统制。为满足统治阶级的奢侈需求，政府对许多商品采取了“禁榷”（注：禁榷制度，是指国家垄断盐、铁等重要商品的生产和经销，禁止民间私相交易。）的专卖制度。汉唐以来的这一制度在宋代得到进一步发展，农业税渐居次要地位，而禁榷获利和商税渐成财政收入的主体。在宋代 300 多种进口商品中，政府禁榷的约占一半以上，除传统的盐、茶和酒外，还有矾、香药、铁、石炭（煤）及醋等。

明代的勘合贸易制度，实质上是一种商品进出口的许可证制度。“勘”即“核对”，“合”为“相同”，“勘合”就是证书。简言之就是将两半文书合在一起，通过对其印识字号与内容的比较、勘验，从而辨别真伪、防止欺诈。凡是得到明政府认可的国家，均发给“勘合”。也就是说，各国只有以进贡的名义方能允许进入中国交易，否则，一律禁止、阻回。持有“勘合”前来中国的海船，都带有“贡品”和其他货物。勘合制度是为配合明朝贡贸易而实行的，是明朝中央专制制度的集中体现。

结 语

纵观整个中国古代历史，海上丝绸之路作为交通路线和一种对外贸易关系，总体而言是呈发展趋势的。即便是在清代闭关锁国和厉行“海禁”期间，也未能完全隔绝中外海上贸易。海上丝绸之路对于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各方面都有促进发展作用；同时也极大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步。古代既已如此，当代研究、建设海上丝绸之路，更是一项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伟大事业。正如中国航海学会理事长徐祖远在第五届中国国际航运文化节上讲到的那样，“建设海上丝绸之路，在一定意义上，有利于重建世界秩序”。

参考文献：

[1]李舒瑾著.中国近代外贸思想研究[M].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

[2]陈高华,吴泰,郭松义著.海上丝绸之路[M].北京:海洋出版社,1991.

[3]孙毅夫主编.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M].北京:中国画报出版公司,1989年.

[4]白海军著.海盗帝国[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7.

[5]广州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发展中心,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广州古都学会编.论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8.

[6]万钧著.唐太宗[M].北京: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

[7]芳子,王刚编.你可能不知道的1000个历史细节(明代卷)[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10.

[8]杨金森 范中义著.中国海防史(上)[M].北京:海洋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

尹焯,女,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文学硕士,现为福建省图书馆馆员,于闽图地方文献研究室从事“海上丝绸之路”课题研究工作。

论海丝文化中的契约精神

——由侨批金融业引发的思考

林芳惠 吴凤娇

内容摘要：契约精神在“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曾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本文在界定契约精神基本内涵的基础上，以侨批金融业为例系统考证了“海丝之路”中发展的契约自由、平等、信守等特质，并提出契约精神承载着海丝文化的核心价值、引导着海丝文化的理性选择、契合着中西方法律文化信仰。未来，对内应积极推进契约市场经济制度、契约法律制度与契约道德体系等建设；对外则应以构建海上贸易契约合作机制和海上贸易契约纠纷解决机制。

关键词：契约精神 海丝文化 侨批金融业

引 言

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 von Richthofen)在1877年出版的《中国亲程旅行记》中，描绘了我国途经西域到希腊、罗马的交通路线，并首次使用了“丝绸之路”一词。尔后，法国汉学家沙畹在《西突厥史料》中再次提到：“丝路有海、陆二道，北道出康居，南道为通印度诸港之海道”，由此有“海上丝绸之路”之称谓。作为中外贸易与文化交流的海上通道，“海上丝绸之路”堪称迄今为止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从某种意义上说，“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就是中华文化与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相互碰撞、交融并不断创新的历史。回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进程，其无疑留给人类大量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海丝文化中的“包容并蓄”、“多元开放”及“开拓进取”等海洋精神，学界进行了大量的探讨，让我们得以窥见贯穿始终的一种强大精神力量的传承。但是，在海丝文化中，有一种特质，即契约精神却未被赋予足够的关注。事实上，在漫长的“海上丝绸之路”诞生、发展与演变过程中，契约精神曾发挥过巨大的推动作用，而更为重要的是，它对未来致力于重建“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议题。

一、契约精神的界定

契约一词由拉丁语 contracts 发展而来，原义为交易，本质上是一种契约自由和意思自治的理念。契约有正式和非正式之分，前者限于法律、法规、合同、规则、准则等约束性文本；后者则包括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自发形成、共同遵守的风俗、习惯、宗教和信仰等。因此，契约既是制度，也是文化。¹传统的商业文明是建立在契约的基础之上的。因为在传统商业文明下，契约代表着

¹ 钟祥财. 近代上海的契约精神[J]. 传承, 2012(5): 88

商业关系双方的承诺，信用与契约紧密联系在一起，甚至信用要靠契约来维系。当契约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时，契约精神也就形成了。

“契约精神”是基于商品交换关系的一般要求而焕发出的一种平等、自由和人权的民主精神。作为现代法治与文明社会的一种主流精神，契约精神的形成与发展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历经亚里士多德、阿奎那等多位思想家的发展，逐渐演变为一种精细的、完善的和深邃的思想文化观念，并内在于西方社会的精神血脉中，进而形成了现代契约理论。契约精神并非神化的道德标尺，而是一种理性的关系，是一种自主人格的张扬。时至今日，由于其丰富的内涵，契约精神已经涵盖法学、政治学和伦理学等多种学科。在广义上，契约精神基本与法治精神等同；在狭义上，契约精神则涵盖了契约自由、平等、信守等私人契约精神。¹诚如《法国民法典》第 1134 条规定，“契约在当事人之间具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藉此表达了立法者对当事人之间神圣契约的尊崇，彰显了契约精神作为私法自治之基础与核心地位。

二、海丝文化中的契约精神考证——侨批金融业

（一）侨批金融业发展概况

侨批金融业的产生与海上贸易、海外移民密不可分。在开拓“海上丝绸之路”的进程中，以福建人和潮人为主的华人逐步向海外移民，其历史最早可追溯到隋唐，初具规模始于宋末元初，至明清两代，华人海外移民呈发展趋势。由是，汇款与通信成为海外侨胞与海内侨眷密切联系的基本途径。在当时金融和邮政机构尚未建立或极不健全的情况下，催生了一种通过民间渠道以及后来的金融机构寄往国内的金融工具——侨批，由此自发兴起一个专理寄递侨批的新兴行业——侨批金融业，²并最终形成一个专门为华人解送信件与汇款的国际金融市场。

侨批，俗称“番批”，是指海外侨胞通过民间渠道及后来的金融邮政机构寄回国内、连带家书或简单附言的汇款凭证，其主要功能是汇款，包含汇款信息、家书及附言等基本要素，为一种“银信合封”的传递物，兼具国际汇兑工具、流通货币载体以及个人信用产品等多重金融属性。如“将其置于整个亚洲近代化的大背景下进行考量”，侨批当属“亚洲贸易圈扩展的一种衍生物，是近代中国跨域移民在东南亚区域和全球范围内的金融贸易活动的产物。”³然侨批一词虽流传、沿用上百年以上，却未见诸于国内任何词典，最早产生于何时也因缺乏原始资料已无从考证。但据可考史料，侨批经营成为一种业态，即侨批金融业大致形成于 19 世纪早期，跨越清末、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期，历经水客递送——批局经营——银行统管三种模式，主要分布在福建、广东、香港及东南亚各地。侨批金融业的组织即为批信局⁴，主营业务是汇款，批信只是办理侨汇时的附属，“回批”也只是侨汇已得到解付的凭证，具体汇兑业务包括信汇、票汇及电汇、转汇等。⁵

¹ 韩伟. 传统中国不乏契约精神[J]. 书屋, 2014 (3): 40

² 侨批研究小组. 侨批及侨批业略考[J]. 福建金融. 2011 (4): 67-72.

³ 滨下武志. 南洋侨批史: 侨汇的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 转引自丁丽兴. 新史料·新视角·新价值——“中国侨批·世界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13 (2): 73.

⁴ 批信局因时因地名称各异, 有“侨批局”、“银信局”、“批信局”、“民信局”、“华侨民信局”、“汇兑信局”、“汇兑局”、“侨批馆”、“汇兑庄”等十多种, 较正式的称呼为“民信局”或“批信局”。

⁵ 信汇是侨批金融业首创的汇兑方式以及批局运营最基本的形式, 一般是在侨批正面左上角写有“外附 X 币 X 元”,

作为国际金融市场的先行者，批信局大多把总部设在海外，少部分设在国内侨乡。根据目前已掌握的史料，最早的批局首推广东澄海籍侨胞于清道光十五年（1835）创办的，同时在汕头和新加坡等地开展业务的致成批局。而影响最为深远者，当属郭有品于光绪六年（1880）创办的漳州首家侨批局——“天一批郊”，主要经营吕宋与福建闽南侨乡之间的侨批银信汇兑，在国内设有漳州、泉州、同安、上海及香港等9家分局，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缅甸等国设24家分局，鼎盛时期办理的批款（侨汇）额上千万大银，占闽南一带侨汇总额的三分之一。解放后，侨批金融业由银行归口管理，但仍保留私营经济性质。1977年我国撤消私营侨批机构，由银行接办侨汇业务，侨批人员则全部由银行吸收为职工，私营的侨批业机构自此消失。1986年主管侨批业务的中国银行取消送侨批上门的传统制度，改由收批人凭通知单到银行取汇。从此，侨批金融业务已无异于一般银行汇款。

（二）侨批金融业蕴含的契约精神

毋庸置疑，侨批既是我国海外移民史上的一种独特现象，也是海上丝绸之路进程中的一个缩影，更是海外华人在其“过番”生涯中创造的、留给子孙后代的一笔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作为一个“百年跨国的特殊金融业态”，侨批金融业的产生、发展与繁荣得益于闽、粤等商人的勇敢与智慧，但更离不开其长期恪守的“逐利不忘义、灵活要守信”的契约价值理念。

1. 侨批金融业蕴含着以理性为基础的契约自由精神

作为契约精神的核心，契约自由精神包含着选择缔约者的自由、决定缔约内容与方式的自由等内涵。法国经济学家阿尔芒多·萨波利(Armando Sapori)说过：“商业契约的出现意味着契约精神张扬理性、平等、自由等价值，其中自由是核心，是契约的生命。”侨批金融业不同于为民商、官商服务的“晋商票号”，为专业经营华侨移民侨批的私营商业性服务行业，属典型的“草根金融”。因而，侨批经营者的业务多以帮熟人带批信、带款为主，缔约主体间信息了解较为充分，缔约内容与方式灵活，充分尊重客户的自由选择权利，既可以直接向侨眷转交批信和批款，也可以将所托批款采购货物回家乡出售后按原款额和批信一并交付侨眷，实现了契约关系的良性平衡与互动。

2. 侨批金融业蕴含着以尊重为前提的契约平等精神

作为契约精神的前提，契约平等精神意指契约主体地位平等，互为对待给付，无人有超出契约的特权。侨批金融业提供的是一种富有情感的“个人金融”服务，主要服务对象是海外华侨社区与国内侨乡的操闽粤等方言的人群。相同的人文环境与特定的金融业务使得侨批经营者与侨胞、侨眷之间的信息基本对称，主体地位相对平等，因而在侨批寄送关系中，双方基本消除了人格上的歧视，缔结契约完全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事。

3. 侨批金融业蕴含着以诚信为核心的契约信守精神

作为契约精神的灵魂，契约信守精神是契约从习惯上升为精神的伦理基础。只有契约信守在社会生活中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主流，契约的价值才得以真正体现。“无规矩不成方圆”。侨批金融业谨遵这一规矩，以诚信为生命线，集中体现了侨批经营者“笃求诚信”的精神品质。正是由于侨批经营者均能恪守“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的信条兢兢业业地工作，经由“水客”侨批派送员

使用当时流通货币的名称如龙银、大银、洋银、国币、金圆券等，“外付（附）即外寄的意思。

的递送，侨批总能一件不缺、分文不少地送到侨眷手里。当然，侨批的诚信也是行业的“潜规则”使然。假如侨批局不守信用，随便丢批报失、侵吞批款，必将丧失侨胞及其眷属的信赖而“自取灭亡”。与此同时，侨批金融业的诚信，也体现于寄批的广大华侨。他们都表现出互相信任，信守诺言的良好意识，即使一般批局为寄批者垫付批款，根本上没有任何担保或办理借据之类的凭证，仅凭口头承诺，回批到时亦能回收批款。

三、契约精神在海丝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海上丝绸之路”虽以丝绸贸易为开端，但其意义却远远超过丝绸贸易的范围。它把世界各地的文化发源地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条连接亚、非、欧、美的海上大动脉，并使这些古代文明经过海上大动脉的互相交流而大放异彩，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海丝文化。在丰富的海丝文化中，以侨批金融业为代表的契约精神已然内化为海上贸易经营者的持续动力和自觉行为，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与繁荣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一）承载着海丝文化的核心价值

“海上丝绸之路”是我国海外贸易史上最为灿烂的一个篇章。在漫长的海上丝绸之路进程中，包括中国在内的欧亚非“海丝”国家在长期的贸易往来中形成了独特的贸易自由、宗教传播自由、意思自治等“开放多元”的一体文化，将“海丝”各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透过看似纷繁复杂的海丝文化，有一种理念始终贯穿其中，那就是一份“信任至上”的契约精神，它的出现传递着人与人之间平等、自由、守信的交易关系，反映着当时海上贸易发展特别是国际金融业发展的空前盛况，推动着海上交易市场的发展。

（二）引导着海丝文化的理性选择

海上贸易主体的自由个性必然导致其市场上追逐利益的最大化，逐利性与隐蔽性极易引发违约行为，故最需要的是理性的选择。而契约精神张扬理性、自由、守信等特点恰与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不谋而合。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指出：“在市场交易中不存在成本的假定是不现实的”¹。因此，作为市场交易基本活动，海上贸易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交易成本。那么，当交易成本过高，超出了双方的效用预期，契约主体可能就要理性地终止交易，避免损失扩大。

（三）契合着中西方法律文化信仰

海上跨国贸易比单一文化环境下的贸易显然更具挑战性。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延伸，当不同特质的闽越文化、中原文化、海洋文化碰撞到一起，冲突与融合便是不可避免的。在西方，契约常与法律相比拟，人们对契约极为敬畏，主张“合意生法律”，认为当事人的协议高于法律规定，强调当事人之间所订立的契约即为当事人的立法。²不过，契约精神并非西方所特有，事实上，中国的儒家文化也非常强调契约精神，甚至将其作为一种制度性安排，认为契约就是“立信”、“结信”与“征信”，这一点在侨批金融业的经营上已展现无疑。只是中国儒家的自由、平等、诚信等契约精神更多的以个人修养和信用为基础，而西方则更侧重于落在纸上的规范文本。由此可见，虽然中

¹科斯. 盛洪译, 生产的制度结构[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2. 157-158.

²霍存福. 中国古代契约精神的内涵及其现代价值—敬畏契约、尊重契约与对契约的制度性安排之理解[J] 2008.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8 (5): 57-64

西方在法律文化上存有差异，但崇尚理性、自由、平等的契约精神理念并无本质区别。也正是这一信仰将以闽粤为主的传统中华文化与各种外来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并相互整合、融汇贯通，最终形成了包含舟船文化、航海文化、海神文化、宗教文化和从商意识、包容心态及价值观念等在内的独具一格的“海丝文化”。

概言之，侨批金融业所蕴含的契约精神，倡导的是一种平等、守信且为社会所公认的行为准则，是一种代表了人类文明和进步的规则。它是商业文明中不可或缺的基石，是维护契约关系平衡互动的内在要求，对“海上丝绸之路”及海丝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具有非凡的意义。

四、海丝文化新纪元重塑契约精神之路径

2013年9月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同年10月，又在出访东盟国家时提出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在此背景下，回溯往昔，不难发现，海丝文化中那种信守、平等、自由的契约精神对开拓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显然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但遗憾的是，改革开放政策推行三十多年来，我国的经济规模虽然迅速增长，但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自然经济体制、熟人社会以及违约制约机制不完善等诸多原因，凭信用维系的契约精神的构建与发展明显滞后，违背诚信、不尊重契约现象屡屡发生，甚至有人直言中国历来就没有契约传统。对此，笔者以为，在重走“海上丝绸之路”的今天重提契约精神，绝不应一味地指责中国人缺乏契约精神，而应全面反思当下社会经济制度与文化，一方面，回归中国传统契约法律文化，挖掘其中与现代性相融合的有益因子，大力推进诚实信用的契约市场经济制度、契约法律制度与契约道德体系建设；另一方面，加强与国外“海丝”国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交流，构建以契约精神为指引的海上贸易制度体系，为当代中国重塑与国际接轨的海丝文化注入新活力。

（一）国内方面：构筑契约型经济制度体系

契约精神导源于商品经济的内在要求，其所包含的契约自由、平等、信守以及救济精神是支撑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价值基础，对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转以及海外市场的开拓都有着积极作用。因而，我国欲打造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之中心，理应先将自身建设成为一个契约型国家。

1. 完善契约型市场经济制度

市场经济是一种自由、平等、竞争的经济。虽然我们不能将市场中所有的经济关系都简单归结为契约关系，但是，契约关系无疑最集中、最准确地体现了市场经济关系的特性。由此可知，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商业契约，而商业契约的缔结与履行所需要的契约精神又推动着市场发展。换言之，契约精神是市场经济之魂，离开了契约精神，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将很难发挥作用。

然而，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时间较短，发育还很不成熟，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有待构建。因此，欲构建成为一种契约式的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应以经济契约为基本运行机制，遏制市场主体缺乏自律、唯利是图、不择手段牟取暴利的现象，借助经济规则管理、引导市场主体树立良好的契约观念，进而构筑规范的市场经济秩序与运行机制。

2. 健全契约型法律制度

在私法领域中，契约不仅成为缔造主体权利、义务的主要依据与来源，更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媒介交易的工具和自、平等的价值表达工具。¹形成文字的合同、法律、法规，是实体化的契约；忠实地履行和自觉地遵守，则是精神化的契约。²因而，在法律上健全契约制度，首要的着眼点在于完善契约合同制度。市场化就是契约化，市场的有序运行依赖于合同债务的严格履行和债权的充分实现，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取决于作为交易基本规则的合同制度的完善。

3. 重构契约型道德体系

广义的契约精神既内含法制建设，同时也包括法治之外的道德约束。我国传统文化中历来存在契约严守精神，认为“信任高于一切”，“信”甚至被作为“五常”中的重要内容确定下来。正所谓“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言必信，行必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这些民谚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主义商业道德的主要内容，反映了儒家文化将诚信上升到一般的做人准则，甚至深入到中华民族道德文化的血液中。为此，我国构建完善的契约道德体系一方面须摒弃过去脱离世俗生活基础的、形而上学的、高不可及的价值范式，通过建立征信档案等多种方式提升个体成员的道德修养；另一方面则须培养群体契约道德，在全社会倡导公平竞争、重诺守信、遵纪守法、等价交换的道德伦理精神。³

（二）国际方面：构建契约型海上贸易制度体系

契约精神既是西方宪政、民主与法治的前提和基础，也是理解西方社会、政治、法律的钥匙。“海丝”多元文化的发展不是孤立的现象，它是与周边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就决定了“海上丝绸之路”中心的建设必须加强与“海丝”各国的文化交流，拓展以契约精神为保障的合作与发展路径，打造以契约精神为指引的海上贸易制度体系。

一方面，打造海上贸易契约合作机制。作为中国与亚欧文化交流、贸易互通的黄金通道，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促进了世界经济和文明的发展，迎来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开元盛世”。而今重建“海上丝绸之路”，我国除应与“海丝”各国继续保持互信、互让等友好观念外，还需进一步协调好海上贸易契约合作关系，促进海上贸易快速、健康发展，让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契约精神绽放出更加灿烂的光芒。

具体而言，我国可从以下路径打造全新的海上贸易契约合作机制：一是尊重彼此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加强与“海丝”各国之间的政府往来，增进沟通与相互了解，巩固政治和战略互信，加快培育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竞争的新优势；二是本着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原则，驱动带动区域发展的开放引擎，促进贸易畅通，打造自贸区升级版，积极深化与“海丝”各国间的经济、金融、能源、服务等多层次、宽领域、高水平合作，利用双方的势开展经济合作，提升“海丝”各国经贸一体化进程；三是以海洋经济为突破口，藉契约精神搭建“海丝”各国经贸文化“国际接轨”的平台，推动合作交流国际化，健全常态化的合作交流机制；四是在平等、自由等契约精神指引下

¹ 王春梅. 现代契约精神的异化与回归[J]. 江汉论坛. 2014(1): 99

² 汪中求. 契约精神[M].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9. 20

³ 刘胜梅. 契约精神及其培育路径[J]. 学术探索. 2012(10): 13.

全面拓宽对外开放合作格局，加强与“海丝”各国海关和签证机构的诚信沟通与合作，建立国际安全合作机制。

另一方面，建设海上贸易契约纠纷解决机制。现代商业是一个既分工又合作的时代，即使是合作的双方也有着不同的利益和诉求。因而，在海上贸易合作与发展过程中，“海丝”各国间的贸易竞争与摩擦在所难免。对此，只有各国从政府部门到商业机构乃至个人都尊重契约精神，争议时均依约依法办事，而不以“国情”为由轻易置“契约精神”于不顾，经贸往来活动才可以真正有序、公平地进行。对此，包括中国在内的“海丝”各国首先应在契约精神的理性之光照耀下积极开展协议分工，增强互信互利，以合作代替竞争；其次，建立海上贸易民间沟通机制，加强各国行业协会与进出口商会间的合作，及时交换信息、沟通情况，避免并及时解决可能出现的贸易摩擦，维护双边贸易的均衡发展；再次，建立“海丝”各国政府间的协调机制，如政府首长联席会议制度、政府秘书长联系制度等；最后，建立非政府组织的协调机制，借助非政府组织的参与调动各经济实体和民间组织的力量，过滤掉彼此的分歧，推动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

五、结语

在现代文明中，契约精神是这个日新月异的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根基，也是商业文明赖以存在的基础。今天，重建“海上丝绸之路”表达了我国重返世界舞台中心、重建亚太秩序以及重获中华话语权的努力。在这一特殊背景下，回首往昔，寻找“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进程中侨批金融业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显然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那种倡导理性、自由、平等以及诚实守信的精神传承至今仍然深入民族骨髓，并终将成为引领当代人开拓“海上丝绸之路”的动力源泉。

Research on the Spirit of Contract in Haisi Culture

——the Thinking Triggered by the Overseas Chinese Financial Industry

LIN Fang-hui, WU Feng-jiao

Abstract: The spirit of contract played a great role i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aritime Silk Road”. On the basis of defining the basic connotation of the spirit of contract, the overseas Chinese financial industry is taken as an example in this paper in order to research systematically the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freedom of contract, contractual equality and contractual integrity in Haisi culture. At the same time,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at the spirit of contract carries the core value of Haisi culture, guides the rational choice of Haisi culture and fits with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legal cultural beliefs. In the future, the internal construction, including the contrac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the legal system of contracts and contract morality system, should be actively promoted. And the external construction, including the contract

cooperation mechanism of maritime trade and the contract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of maritime trade, should be actively promoted too.

Key words: the spirit of contract; Haisi culture; overseas Chinese financial industry

作者简介:

林芳惠, 闽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基于包容性合作的“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港口物流大通道建设

刘松先

内容摘要：建设“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具有全球视野的新一轮扩大开放的重大方略。加快融入“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成为了福建沿海地区发展思路的新选项。海上丝绸之路一直以来与福建的发展紧密相连，一方面海外贸易的发展推动了福建经济文化各方面的进步，另一方面福建也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绵延起了重要作用。港口群是“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战略资源。从交通、区位、物流集散的速度、成本及辐射范围来看，港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最佳枢纽，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和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关键是港口物流，从现有区域合作机制着手，搭建战略平台，通过交通来带动物流，用物流带动产业，用产业带动城市，用城市带动整个经济，最后形成一个经济带，携手重现海上丝绸之路繁荣。提出，包括打造以港口为枢纽综合运输体系，打造以港口为平台的贸易基地，打造以对台经贸为平台的自由贸易港（区），打造以港口为载体的文化传播“新商道”，打造包容性合作的“福建、东盟、台湾”三地物流产业合作圈。

关键词：海上丝绸之路 港口物流 协同发展 包容性合作

一、引言

2013 年 10 月 3 日，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表示：“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即“一带一路”。

国家发改委正牵头研究制定“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规划。

《中共福建省委关于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提出，在发挥对台优势和巩固闽港澳侨合作的同时，打造新的海上丝绸之路，进一步密切同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经贸合作。加快融入“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成为福建沿海地区发展思路的新选项。福州打造“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枢纽城市；泉州市打造“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莆田抓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机遇，建五大海洋经济区；厦门打造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

枢纽。

19世纪末,德国地质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1833—1905)把古代陆上的中西贸易通道形象生动地称为丝绸之路,为人们普遍接受;1913年,法国汉学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认为丝路有海陆两道,并在其所著的《西突厥史料》中首先提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1];日本学者三杉隆敏1967年出版了《探索海上丝绸之路》专著,较早研究海上丝绸之路;国内对“海上丝路”概念的作多方面详尽考释者是北京大学的陈炎教授。近年来,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不断深入,研究的热点和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

(1)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赵春晨“海上丝绸之路”是以丝绸贸易为象征的在中国古代曾长期存在的中外之间的海上交通线及与之相伴随的经济贸易关系^[2]。

(2)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始发港的研究:最多的是泉州、广州、宁波和北海。如韩湖初等认为北部湾地区是汉代海丝路的最早始发港;黄伟宗则称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发祥地^[3]。

(3)海上丝绸之路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如马勇认为东南亚国家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通道、东西方商品的重要集散地、东西方商品的重要消费市场。而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对东南亚地区的社会历史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4]。

(4)海上丝绸之路的社会属性。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指中外之间海上航行和贸易往来的道路,而且还是指在古代长期存在的特定性质的中外间的贸易和交往关系。

(5)海上丝绸之路衰落的衰落:在明中叶以后和清代前期已经衰落,并逐渐被西人的殖民贸易所替代^[3]。

从以上文献研究的成果看,人们都认为“海上丝绸之路”是历史上相当长时期里曾存在过的东西方之间海上贸易和交通的道路。但是有关这条道路起止的时间、涉及的地域范围、社会属性等,不同学者存在不同观点。

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时代内涵

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历史上以丝绸贸易为象征、连接中外海上贸易的交通线、推动商业贸易繁荣发展的黄金路线,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源远流长的中外经济贸易和人文交流关系。如今,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具有全球视野的新一轮扩大开放的重大方略。

经济全球化正向纵深发展,区域合作的新时代已经到来。沿线国家加强与中国合作是大势所趋,中国欢迎周边国家和地区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三十多年来,我国改革开放正沿着“招商引资——走出去——共同发展”的方向发展。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正是把经贸合作、共同发展放在重要位置。

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有利于加速区域一体化步伐,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搁置争议、增进共识、合作共赢,推动构建和平稳定、共同发展的周边环境。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成为全球第三大的自由贸易区,我国连续4年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是我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例如,2013年马来西亚和中国双边贸易额达1060.8亿美元,同比增长11.9%,占中国与东盟贸易额近1/4,中国和新加坡的贸易总额达到758.51亿美元,中国与印尼的双边贸易总额达到680亿美元。

他们在东盟国家与中国的贸易额中排名前三位。

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可以打造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海上经济大通道，有利于我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在港口航运、海洋能源、经济贸易、科技创新、生态环境、人文交流等领域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将推动中国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三大对外投资国之一。沿线一些国家经济发展的愿望强烈，急需资金与技术，可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重点地区。例如中方出资14亿美元的“科伦坡(斯里兰卡首都)港口城市”项目是斯里兰卡迄今为止最大的外资项目。未来五年，中国对外投资总额预计达5000亿美元。

有利于为我国沿海地区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拓展经济发展空间，建立国际贸易和投资网络，转移过剩的生产能力，调整和升级产业结构。

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目前，中国原油对外依存度突破60%。进口主要是通过海运穿过马六甲海峡，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国家加强能源合作，有利于保障能源安全，对中国保障能源安全意义重大。

三、港口群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经济枢纽

(一)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

港口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和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自南线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与发展，其主港曾发生过变迁。从公元3世纪30年代起，广州凭借自身拥有的海上交通中心的优越条件，成为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由广州经南海、印度洋，到达波斯湾各国的航线。

宋末至元代时，泉州超越广州，并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称为“世界第一大港”，其海舶往来东海、南海，非常活跃。海上贸易东至日本，西达东南亚、波斯、阿拉伯、非洲。宋代泉州造船业发达，有“泉舶”之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承认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便是泉州。明初海禁，加之战乱，泉州港逐渐衰落，漳州月港兴起。从近代开始，厦门港开始崛起。特别是在鸦片战争及“五口通商”之后，厦门一举成为我国海外贸易主要港口之一。

(二) “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关键是港口物流

从交通、区位、物流集散的速度、成本及辐射范围来看，港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最佳枢纽。但是，过去的许多传统港口主要提供船舶停靠、海运货物的装卸和仓储服务，只发挥了“运输中心”的作用，就世界港口历史发展进程而言，只能被归为“第一代”港口。如今，这些港口利用自身优势正在由单一化功能向多元化转型，向“第二代”港口发展。“第二代”港口加速临港产业集群，推动了港口城市建设、物流运输和临港加工出口等产业的发展，港口演变为地区贸易及经济发展的“服务中心”。未来，在经济全球化、市场国际化和信息网络化的发展趋势下，港口被赋予了新的功能——“国际物流中心”，也被称为“第三代”港口。众多的沿海以及内河港口转型成为重要节点、经济枢纽、产业基地和国际物流配送中心，对“海上丝绸之路”通道的建设起着极其重要的支撑作用。近年来两岸港口物流（集装箱吞吐量）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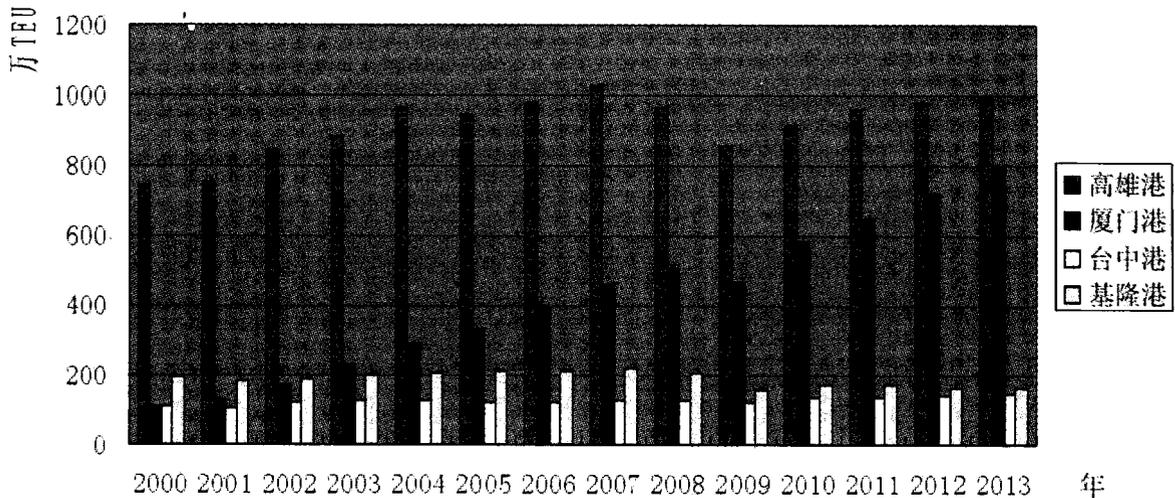


图1 近年来两岸港口集装箱吞吐量

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发展物流业首当其冲。但是海上丝绸之路，也不畅通，使贸易便利化受阻，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所以加大对国际通道基础设施的投入，加快建设国际物流大通道，已处在风口浪尖上^[5]。

四、基于包容性合作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互联互通的港口物流大通道

(一) 思路——“两个主动融入”

1. 抓住机遇，主动融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在即将出台的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发展规划中争取更多政策红利。福建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有着显著优势，改革开放以来，福建不断创新对外开放的思路，与台湾、东南亚、南亚等地的经贸合作大幅度提升，对外开放平台也不断增加，区域内贸易流动和相互依赖性日益增加，奠定了互连互通的基础，依托区位优势，发挥福建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连接交汇的战略支点作用，运用先行先试政策，加快与周边国家和地区互联互通和产业对接，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发挥好重要门户作用。

2. 抓住机遇，主动融入中国—东盟国家合作框架，特别是“中国—东盟自贸区”建成后，将成为发展中国家间最大的自由贸易区。福建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突出与东盟的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扩大双向投资规模。目前，东盟也成为福建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四大外资来源地。2013年，福建与东盟双边贸易额达243亿美元，实际利用来自东盟的外资达3.47亿美元，“闽企”在东盟设立的境外企业和分支机构达156家，对外投资额4.5亿美元。

(二) 重点领域

以港口群为龙头、以产业群为支撑、以城市群为依托，由点到面不断深化合作，构建对外经济合作“大通道”和“桥头堡”。

从现有区域合作机制着手，搭建战略平台，通过交通来带动物流，用物流带动产业，用产业带动城市，用城市带动整个经济，最后形成一个经济带，携手重现海上丝绸之路繁荣。

(三) 具体对策

1. 打造以港口为枢纽综合运输体系

(1) 以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契机，把厦门、福州、泉州打造成“海上丝绸之路”航运枢纽城市。

(2) 把握物流关键节点，打通海上丝绸之路港口的互联互通与联动，构建沿线港口间的合作协调机制，进行合理分工，避免同质化和过度竞争产生的资源浪费和负面效应，让货运方式、货运内容和运量、仓储、仓储节点、投资、行业细分、节点城市都更加丰富。

(3) 推动港口的互联互通与联动，打造以港口为枢纽的资源配置中心。全面推进港口功能转型升级，整合港口产业链和供应链，促进港口业务与临港产业深化合作和互动发展。

(4) 进一步优化港口集疏运体系，实现多式联运的无缝对接。优化港口资源配置、完善港口、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构筑沿海地区连接中西部地区的快速运输大通道。

2. 打造以港口为平台的贸易基地

(1) 两岸合力打造以港口物流为平台的两岸贸易中心。将两岸贸易中心打造为台湾商品大陆营销中心、区域性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服务贸易商大陆服务中心“三大中心”。

2013年厦门对台双边贸易总值达到81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5.9%，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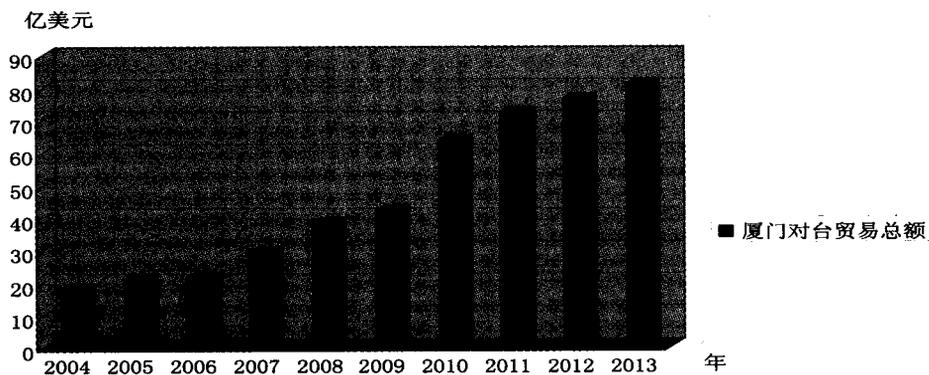


图2 近年厦门对台双边贸易总值

2013年厦门市对台贸易比重占同期厦门市进出口总值的9.6%，如图3所示。但是两岸贸易主要发生在两岸台商之间，两岸企业之间的贸易增长微乎其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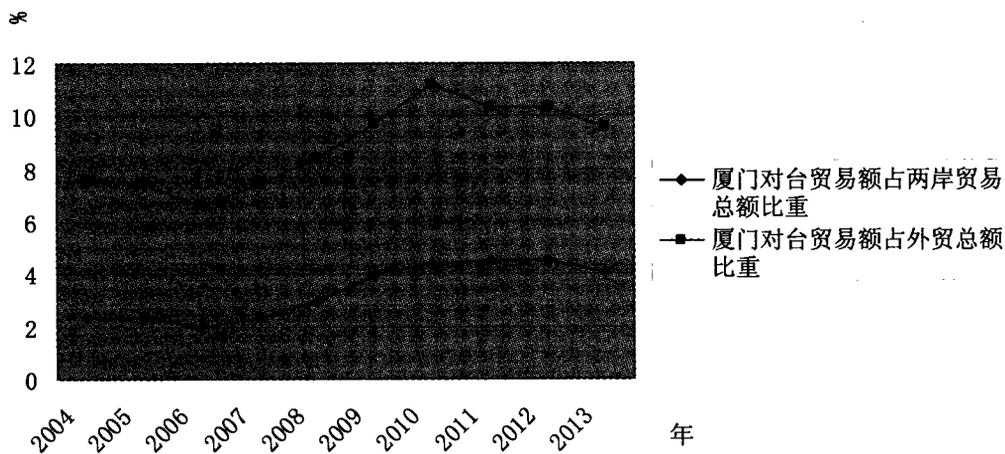


图3 厦门对台贸易额所占比重

(2) 以港口物流带动基建、能源、先进制造业、海洋新兴产业、旅游、信息服务、产业金融、服务外包等产业发展。

(3) 专业化的港口服务成为全球航运越来越强烈的需求, 大力发展信息、金融、经贸等港口物流增值服务, 建设两岸“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的“关港贸”一体化信息对接平台, 提高管理效率, 推动物流贸易业务联动发展。

3. 打造以对台经贸为平台的自由贸易港(区)

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海陆交通综合枢纽大港需要有自由港(区)的便利条件。而且自由贸易区的贸易便利化、自由化水平特别有利于发展港口的中转业务。因此, 建议在福建设立“海上丝绸之路自由贸易区”, 加强政策协调, 落实具体合作措施, 边建设边申报。

现在ECFA(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和两岸服贸协议都存在不少障碍。在这种情况下, 福建自贸区的建设就更加重要, 很多ECFA推不动的东西都可以拿到自贸区进行局部的先行先试。

4. 打造以港口为载体的文化传播“新商道”

海上丝路不仅是经济往来贸易的代名词, 还有着与之俱来的文化交流。尊重不同文明的多样性, 加强文明间对话和包容性合作成为时代要求。

目前, 聚居东南亚的2000多万华侨华人当中, 祖籍福建的有1000多万, 在长期的经贸往来积累的人脉和合作关系形成了世界闽南文化圈, 搭建沟通交流平台如厦门的南洋论坛, 泉州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节。2012年中国赴东盟游客达732万人次, 较10年前增加了2.6倍, 中国已成为东盟第二大游客来源地^[6]。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是一条和平发展之路、文化之路。海上丝路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申报活动, 有助于为建设二十一世纪海上丝路输入文化动力^[7]。通过文化传播的合作与创新, 打造以港口为载体的文化传播“新商道”, 与沿线国家和地区不断建立广泛联系, 密切地区间交往。

5. 打造包容性合作的“福建、东盟、台湾”三地物流产业合作圈

在包容性增长理念指导下^[8], 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发展, 使得目前世界多边和双边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如火如荼, 已经签订和正在协商的自由贸易协议不断增加。

自中国与东盟开展海上务实合作以来, 被喻为旗舰项目的中国—东盟港口城市合作网络正在悄然布局中, 将开辟更多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航运航线, 形成区域性航运网络。中国与东盟10国签署了中国—东盟自贸区《服务贸易协议》, 为中国与东盟各国物流发展搭建了良好平台, 为区域内物流企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从而推动双方贸易的发展; 同时随着各国交通运输系统互相对接, 地区运输合作加强, 物流业参与边境贸易和跨境贸易货运的渠道更加顺畅。抓住中国与东盟自贸区发展机遇, 逐步将港口升级为促进经济发展和服务于国际贸易的综合物流中心, 通过港口物流核心业务向周边地区辐射, 带动进出口贸易。

加强与台湾自由经济示范区的对接, 扩大对台先行先试。2013年3月, 台湾有关部门公布“自由经济示范区”规划方案, 将台湾已设立的“台北港、台中港、基隆港、高雄港、苏澳港”及“桃园国际航空城”的“五海一空”等6个自由贸易港区直接升级为“自由经济示范区”。

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符合沿线国家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根本利益。要坚持以“平等合

作、互利共赢、开放包容、和谐和睦”为基本原则的新型价值观、合作观、发展观，要着眼于发展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海洋合作伙伴关系^[9]，通过港务企业之间的深度合作、邮轮经济圈构建、快捷海上物流通道建设、跨境电子商务、跨境人民币业务等方面的工作，共建“福建、东盟、台湾”三地间的物流产业合作圈，可以把各自的产业优势更充分地发挥出来，实现优势互补，共同提升在国际产业分工的地位，避免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被边缘化，实现共赢。

参考文献

- [1] 陆芸.近30年来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述评[J].丝绸之路, 2013(2): 13-16.
- [2] 赵春晨.关于“海上丝绸之路”概念及其历史下限的思考[J].学术研究, 2002, (7): 88-91.
- [3] 韩湖初, 杨士弘.关于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始发港研究述评[J].地理科学, 2004, 24(6): 738-745.
- [4] 马勇.东南亚与海上丝绸之路[J].云南社会科学, 2001, (6): 77-81.
- [5] 丁俊发.新丝绸之路的国际大战略[J].中国储运, 2013, (12): 30.
- [6] 刘新生.携手打造新“海上丝绸之路”[J].东南亚纵横, 2014, (2): 3-5.
- [7] 黄小晶.广州: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思考[J].??? 发表时间: 2014-07-29 来源: 党建网http://www.dangjian.cn/sy/jjq/zxdjxx/201407/t20140729_2087388.shtml
- [8] 王俊.包容性发展视域下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路径选择[J].江海学刊, 2012, (6): 37-41.
- [9] 刘赐贵.发展海洋合作伙伴关系推进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若干思考[J].国际问题研究, 2014(4): 1-8.

作者简介:

刘松先, 男, 管理学博士, 2010年福建省高校新世纪优秀人才; 厦门理工学院管理学院副院长, 教授。研究方向: 企业竞争战略, 运营管理与决策方法, 产业集群。

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的开发策略研究

王玉国

内容摘要：“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提出，对于深化区域合作、促进亚太繁荣、推动全球发展具有战略意义。建设“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对充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推动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以及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的战略定位应包括：文化创新带、交流先行区、经济增长极、区域稳定剂和文化传播器。因此，建设“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的策略为：（1）制订“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总体规划，提供政策支持；（2）提供专项基金扶持，调动各界社会资本，发展文化产业；（3）举办文化产业论坛，建立区域合作机制；（4）推动海上丝绸之路申遗，打造海上丝绸之路文化旅游；（5）加强海上丝绸之路学术研究，拓展文化产业项目；（6）筹建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园区，落实重点文化产业项目；（7）借助海上丝绸之路传播中华文化，增强台胞、华人、华侨中华民族凝聚力。最终，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促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

关键词：海上丝绸之路 文化产业

201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访问东盟国家时，为进一步深化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构建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双方乃至本地区人民的福祉而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抓紧规划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对于“海上丝绸之路”，前人已有诸多研究¹。但在“一带一路”提出之前，对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主要从历史、航路、贸易以及文化交流等方面；在“一带一路”提出之后，相关研究开始转向海洋强国、经贸等方向。但对于“海上丝绸之路”与文化产业的研 究则甚少²。“丝绸之路经济带”提出后，文化部提出以文化先行方式建设“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文化部与中国文化产业

¹ 相关研究综述可参见龚缨晏主编《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百年回顾》（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11月）和纪云飞主编《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年鉴（2013）》（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前者将“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分为萌芽时期（1840-1900年）、形成时期（1901-1948年）、停滞时期（1948-1977年）和繁荣时期（1978-2000年），回顾了百年来“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从港口、航路、船舶、贸易、海疆政策、文化交流、政治往来、海外移民等专题进行综述，并从中国与东亚、东南亚、欧洲、美洲等区域综述“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后者总结了近年“海上丝绸之路”与海洋强国建设、东海航线、南海航线、中西政经交流、中西文化交流、中国博物馆事业等方面的研究现状。

² 公开发表论文仅见刘根勤、陈超华《广州亚运会与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产业的开发策略研究》（《文化遗产》2010年第2期）。

协会联合先后组织两次研讨会，探讨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建设、定位等¹。但“海上丝绸之路”与“陆路丝绸之路”所覆盖范围不同，其文化产业带的定位及开发也必然存在差异。因此，本文拟从“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的战略意义、战略定位及开发策略几方面，探讨“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的开发。

一、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的战略意义

通常认为，海上丝绸之路早在中国秦汉时期就已出现。唐中后期，陆路丝绸之路因战乱受阻，并且中国经济重心转移到南方，海上丝绸之路取代陆路丝绸之路，成为中外贸易主通道。宋元时期，航海技术的突破和世界经贸需求使海上丝绸之路达到鼎盛。海上丝绸之路沿线覆盖大半个地球的人类历史活动，成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文化交流也成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组成部分。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自然也离不开文化交流，因此开发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一）充实海上丝绸之路规划

11 月 4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研究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规划，指出“要坚持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共同推进，促进我国同沿线国家教育、旅游、学术、艺术等人文交流”。²文化产业不仅具有强大的经济效应，还可以通过优质文化产品，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国家、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因此，推动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是“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实“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规划。

（二）推动我国文化产业发展

文化产业是文化与经济有机的结合，文化的经济功能需要通过文化产业化才能实现其经济价值。文化产业是一个朝阳产业、绿色产业，具有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小，科技含量高、发展潜力大，市场需求强、消费空间大，开发价值高、投资机会多等特点。因此，文化产业对促进经济增长、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文化产业起步晚，丰富的文化资源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开发和利用。目前我国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大概在 5 万亿元左右，产值约占 GDP 的 3.2%³，但美国文化产业的产值已占美国 GDP 总量的 18-25%。因此，开发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对推动我们文化产业具有重要意义。

（三）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

2000 年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交流史表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只有积极对外文化交流，吸取世界先进文化，才能推动自身文化的发展，增强自身文化的竞争力。近年来，东西方思想文化交流频繁，一些国家通过文化产业，借助文化产品，输出其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美剧、韩剧充斥着中国大陆市场，严重影响到青少年对美国 and 韩国的热衷。文化产业承载着一个国家的文化理

¹ 2014 年 5 月 8 日，文化部和中国文化产业协会联合主办“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建设研讨会”；2014 年 9 月 4 日，文化部文化产业司、财政部文资办、中国文化产业协会联合主办“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合作发展论坛”。

² 《加快推进丝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路的建设》，

http://news.xinhuanet.com/house/zz/2014-11-07/c_1113151830.htm, 2014-11-8。

³ 《2015 年中国文化产业产值或将占 GDP 规模的 5%》，<http://www.askci.com/news/201307/03/039312287335.shtml>, 2014-11-8。

念、文化价值和文化追求，反映着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开发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对于我国扭转文化贸易逆差，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

二、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的战略定位

清华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熊澄宇教授认为，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的战略定位包括 4 个方面，分别是文化创新带、交流先行区、经济增长级和区域稳定器。¹但“海上丝绸之路”和“陆路丝绸之路”存在差异，其战略定位也必然存在差异。本人认为“海上丝绸之路”除了熊澄宇教授总结的 4 个方面外，还应具有传播中华文化的定位。

广义的“海上丝绸之路”分三大航线：一是东洋航线，由中国沿海至朝鲜、韩国和日本等；二是南洋航线，由中国沿海至东南亚诸国等；三是西洋航线，由中国沿海至南亚、西亚、东非及至欧洲诸国等。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则是以点带线、以线带面，串起连通东盟、南亚、西亚、北非、欧洲等各大经济板块的市场链，发展面向南海、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战略合作经济带。由此，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实际上包括传统的南洋航线和西洋航线，即经中国沿海、台湾海峡、南海、波斯湾、红海，途径南亚、中亚及欧洲等国。

中国东南沿海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航段，其中广东、福建最为重要。早在唐宋时期，广东、福建沿海民众依赖这条航路远赴东南亚、南亚、北非等地谋生。到了明清时期，由于东南沿海的生存压力，沿海民众开始向海外发展，近的移民到台湾，远的前往交趾、爪哇、马来西亚、柬埔寨、菲律宾、文莱以至欧洲，或短期或长期定居海外，从事商业、农业、采矿业、园艺业和渔业，对居住地的矿山、农业、港口、商品流通等作出巨大的贡献，同时也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互动。改革开放以后，华人更是沿着这条航路，前往南亚、西亚、北非、欧洲等地经商或定居。目前，在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国家和地区生活着众多华人、华侨和华裔，据统计印尼华侨华人总数近 1000 万，是世界上华人最多的国家。²马来西亚的华裔人口有 640 万，占全马总人口 24.6%。³新加坡华侨华人总数约 353.5 万，占新加坡居民人口的 74.1%，新加坡成为除中国外唯一以华族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⁴在国内的东南沿海，则形成泉州、漳州、潮州、广州、江门等著名侨乡。伴随着海上丝绸之路，伴随着海外移民，中华文化也传播到海外，形成当地的聚集区文化。同时，境外的文化观念也传回移民的迁出地，经过吸收与融合，形成独特的侨乡文化。华侨华人居住地与祖籍国中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是华侨华人逐步融于居住地的历史，也是中华文化境外传播的历史。因此，中华文化是中国大陆联系海外华人华侨的精神纽带。从这个角度而言，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还应肩负着与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华人华侨加强联系，传播中华文化的战略定位。

三、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的开发策略

（一）制订总体规划，提供政策支持

国家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以来，文化部与财政部密切联系，委托中国文化产业协会、清

¹ 《熊澄宇：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的四个定位》，

<http://culture.people.com.cn/BIG5/n/2014/0905/c172318-25610340.html>, 2014-11-8。

² 《印度尼西亚华侨华人概况》，<http://www.chinaqw.com/hqhr/2014/04-21/1142.shtml>, 2014-11-8。

³ 《马来西亚华侨华人概况》，<http://www.chinaqw.com/hqhr/2014/04-21/1156.shtml>, 2014-11-8。

⁴ 《新加坡华侨华人概况》，<http://www.chinaqw.com/hqhr/2014/04-21/1143.shtml>, 2014-11-8。

华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开展前期研究，着手编制《丝绸之路文化产业战略规划》。目前，该规划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将听取各方意见后，修改完善，正式发布还有待时日。但可以预期的是，该战略规划将从国家的高度对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加以规划，统筹协调丝路沿线丰富的文化资源，避免因行政体制的条块分割、地区间缺乏协调，导致各地产业结构雷同，甚至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的现象。因此，该规划将对丝绸之路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同样，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的发展也需要从国家的高度制订区域文化产业专项规划，对地方省、市文化产业发展是一个极大的推动和促进。规划的编制，要与国家“一带一路”整体规划相衔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部署，以提升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文化产业发展水平和竞争力为基础，推动对外文化贸易和文化交流。

鉴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特点，该规划除文化部与财政部之外，还应邀请外交部、国家海洋局、国台办、侨办等机构共同参与，整体规划，统筹境内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省、市，更好地发掘各地区独特的文化资源，促进文化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同时促进各地区文化产业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同时，加强与台湾地区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地区的文化交流，吸收借鉴其他地区优秀文化，也弘扬中华文化，让中华文化走出去。因此，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的战略定位应包括：文化创新带、交流先行区、经济增长极、区域稳定剂和文化传播器。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的战略布局上，应该从境外、国家、省、市等层面加以规划，使文化产业的发展有条不紊，各显其能。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的总体规划还要做好时间布局，确定近期、中期、长期的计划和领域，由易到难、由近及远，以点带线、由线到面，将文化产业落实。

在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总体规划的指导下，中央部委制订出台切实可行的支持政策，地方政府根据各地文化产业实际情况，制订体现本地特点和地方特色的文化产业发展规划，最终形成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战略格局。

（二）专项基金扶持，调动各界资本

2014年5月18日，为了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积极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福州市政府、国开行福建分行、中非发展基金有限公司基金携手，签署《关于共同推动设立基金积极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设立总规模100亿元人民币的基金。11月4日，习近平主席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研究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规划时，指出发起并同一些国家合作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要为“一带一路”有关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设立丝路基金是要利用我国资金实力直接支持“一带一路”建设。¹由此可见，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政府，都重视“一带一路”的发展，成立基金支持相关建设。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也受到相关基金的扶持。因此，无论是国家级的丝路基金，还是地方级的海上丝绸之路基金，都可以设置专项基金，扶持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产业的发展。

习近平主席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还指出“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长期工程，要做

¹ 《加快推进丝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路的建设》，
http://news.xinhuanet.com/house/zz/2014-11-07/c_1113151830.htm, 2014-11-8.

好统筹协调工作，“发挥市场机制作用，鼓励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等各类企业参与”，“积极引导民营资本参与”。¹对于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产业也是如此，在专项基金扶持的同时，还应鼓励各类社会资本通过多种形式参与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发展，尤其是争取民营资本参与文化产业发展。

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建设，无论是专项基金扶持，还是调动各类社会资本，都要按照市场机制和国际惯例办事，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保证透明公开，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基础。

（三）举办文化论坛，建立合作机制

文化部提出以文化先行方式建设“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计划定期举办“高峰论坛”，共同探讨多边文化经贸发展规划、文化项目合作、文化交流活动等议题。²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也应定期举办“高峰文化论坛”，邀请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或地区、境内各省市的高级官员、文化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等，共同探讨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产业的发展、合作及交流等。同时，在高峰论坛之下，设立文化产业主题论坛，可以结合相关产业设立影视、演艺娱乐、动漫游戏、文化旅游、工艺美术、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文化、工业制造、建筑设计、文化体育等主题论坛，也可以结合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产品设立丝绸文化、陶瓷文化、茶文化等主题论坛等，以增进各个国家和地区间的文化交流，促进文化产业合作。

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多始发港、多航线的特点，就始发港而言，可以梳理出蓬莱、扬州、宁波、福州、泉州、漳州、广州、北海八个中国主要“海上丝绸之路”城市。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涉及到我国东南、西南沿海、沿边各省区，这既需要各省区发挥自身优势，又需要合力共建。因此，我国政府应设立一个专门机构来协调相关省区间的关系，打破行业和地区壁垒，根据各省区文化资源状况，建立和完善文化产业区域合作机制，加强各省区的文化产业分工和协作，鼓励文化企业跨区域经营，以形成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力。在对外方面，也要建立对话磋商合作机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国家或地区领导人会议、文化部长会议，制定和通过纲领性文件、各种文化产业合作协议等，也可以考虑设置日常组织机制，包括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秘书处、联合专家组和专业工作组等。总之，建立全方位合作机制，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合作的系统机制，有助于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的发展。

（四）推动海丝申遗，打造文化旅游

海上丝绸之路作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纽带，延续了2000多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时间上与空间上承载了大半个地球的历史活动。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全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早在1992年，泉州开始筹划申请世界遗产，2001年上报国家文物局。2003年，因海上丝绸之路多起点、多航线的特点，国家文物局同意广州等地递交的捆绑申遗方案。2006年12月，泉州、宁波、广州3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12年11月，联合申报城市数量扩增至9座城市，泉州、广州、宁波、扬州、北海、漳州、福州、南京、蓬莱，再次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根据申遗日程，2015年完成准备工作，2016年正式送交世遗大会审议。在建设

¹ 《加快推进丝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路的建设》，

http://news.xinhuanet.com/house/zz/2014-11-07/c_1113151830.htm, 2014-11-8。

² 《文化部提出建设“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构想》，http://news.xinhuanet.com/2014-05/06/c_1110553596.htm, 2014-11-8。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之际，更应该积极推动海上丝绸之路申请世界遗产，打造全新的文化生产力，使文化遗产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芒，让“申遗”成为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的经济增长点和转型发展的“加速器”。

文化遗产是文化产业创新的思想宝库，可以以“海上丝绸之路”为载体，带动了不同层次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搭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桥梁，把文化遗产打造成为全人类的共享财富。海上丝绸之路沿途国家多、路线长、遗迹广，完全可以打造豪华邮轮“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之旅”，或根据历史名人，打造“郑和下西洋之旅”和“马可波罗归乡之旅”，沿海上丝绸之路前往各国，感受历史、文化、文物、宗教、艺术等，感受昔日经济文化交流的盛况。

平遥古城申遗成功后，对传统工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抢救，成功申报平遥牛肉传统加工工艺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目前，平遥传统牛肉工艺年生产量4000多万吨，年产值达1.44亿元，带来巨大经济效益。海上丝绸之路申遗成功后，也可以借鉴平遥古城的经验，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与开发，打造旅游纪念品或伴手礼，在开发文化产业的同时，也扩大海上丝绸之路的影响。

（五）加强学术研究，拓展文化产业

目前，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对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历史、文化、经贸等方面，对于“海上丝绸之路”与文化产业的研究则较集中在旅游产业。实际上，文化旅游产业仅仅是文化产业的一个方面，文化产业还包括影视、演艺娱乐、动漫游戏、工艺美术、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文化、工业制造、建筑设计、文化体育诸多方面。2010年，在宁波举办了“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沿途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就选取了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南海航线沿途历经的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七个省各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重温海上丝绸之路。2014年，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立项，由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泉州广播电视台三家联合制作的7集《海上丝绸之路》已经开拍，将从航运、贸易、金融、科技、文化、移民、梦想等多层面、多角度展现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对沿线各国所产生的影响。该片拍成后，将在国外多家主流电视频道播出，将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在影视文化产业开发的一个案例。

“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或地区历史悠久，文化资源丰富，重要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不胜枚举，还有许多资源可以开发。因此，应该进一步加强学术研究，研究“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历史与文化、沿线港口和城市、中外政治和文化交流等，尤其要运用文化产业学的视角，捕捉可以将历史文化转换成产业的闪光点，让文化产业化，让产业文化化。

（六）筹建文化园区，落实重点项目

文化产业园区是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专业化、集约化水平的重要载体，实现了文化经济规模和范围的扩张。诸如美国硅谷、中国中关村，已经成为软件信息产业的地标；美国好莱坞、印度宝莱坞，则是电影工业的代名词。这些世界较为成熟的文化产业园区，都是建立在特色文化资源，依赖特色区域资源，发展起来的。反之，这些文化产业园区又以其强大的吸纳和辐射力，对区域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因此，可以筹建“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园区，以“海上丝绸之路”特色文化资源为基础，提高文化产业的规模化、集约化，推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经济发展。在联合申

报世遗的9个城市中，泉州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唯一认定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城市，还是世界唯一同时入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3个类别“非遗”名录的城市，享有世界多元文化展示中心、世界宗教博物馆、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等美誉。泉州市已打造大型舞剧《丝海梦寻》，讲述了800年前福建泉州刺桐港一家两代水手远航西亚的故事，再现宋元时期这座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城市的辉煌和东西方文明交流融合的盛况。此外，泉州市还投资建设多功能“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国际文化交流展示中心”，加大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展示与保护。因此，可以考虑在泉州筹建“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园区，在现有的基础上，加大落实重点项目建设。

（七）传播中华文化，凝聚台胞华侨

从历史文化渊源来看，台湾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两岸同属中华文化圈。从现实来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大陆经济与东盟、南亚等连接起来，台湾作为亚太地区重要经济体，如果和大陆联合起来，有助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发挥更大的效应。台湾方面对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却表现冷淡，没有给出积极的回应。但近年来，两岸在文化产业的交流与互动频繁，海峡两岸文博会、图交会、艺博会、旅博会、茶博会等，都已形成品牌效应。因此，可以借助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先行先试，加强与台湾的文化产业交流与合作，推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同时，利用两岸中华文化的同根同源，增强台湾同胞的中华民族凝聚力。

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还生活着众多华人华侨，同样需要借助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加强与他们的联系，诸如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联合举办中国节，举办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展，以及影视、演艺、旅游等多种活动，增强海外华人华侨对中华文化的认识与认同，增强他们的中华民族凝聚力。通过这些活动，还可以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传播中华文化，提升中华文化的软实力。

四、结论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提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而“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则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充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推动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以及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文化传播器是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的重要战略定位之一，应从多方面加强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的开发。

作者简介：

王玉国，男，1975年，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台湾历史与台湾文化。

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与广告产业合作研究初探

张 璠

内容摘要：随着世界格局和地区形势的变化，各国间经贸关系的迅速发展，各国对区域性目标市场的争夺将日益激烈。基于上述背景，我国政府提出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发展战略。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大框架下，本文主要分析了广告产业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合作关系。具体分为四个部分：一是合作的可能性探讨，从产业属性看，两者有很大的交叉融合领域，从经济领域向社会领域扩散等特点，进而为双方合作提供基础；二是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对广告产业的影响，认为主要集中体现在提升发展空间、促进对外合作交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三个层面；三是广告产业对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所起的作用，首先发挥宣传功能，运用广告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其次发挥沟通功能，帮助人们进行贸易、生活沟通，传递信息；最后为相关产业提供产业服务，拓展市场，发挥广告先声作用；四是海上丝绸之路框架下的福建省广告产业发展新思路，提出针对宣传对象的不同，福建省广告公司要区别对待，将“中国特色+福建特色+地方特色”综合运用，服务不同的广告需求的建议。

关键词：海上丝绸之路 广告产品合作 初探

一、可能性探讨：共同属性为合作建立深厚根基

所谓广告产业，是指代理广告业务或提供相关营销传播服务的广告公司与承揽并发布广告的广告媒介在同一市场上的相互关系的集合¹。从定义可以看出，与广告产业相关的主体较多，除了广告公司外，还有相关的营销传播公司、媒介公司等，在广告发展的今天，公共关系、咨询、整合营销等外延要素也促进了广告产业新形态的形成。由此可以判断，广告产业还在不断发展变化过程当中，对其产业的属性问题虽然为广告学界、业界所关注，但并没有清晰明确的表达出来。总的来讲，主要有以下两种代表性观点。

第一，商业服务业。在国家统计局网站在2013年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²中，广告业隶属于租赁和商业服务类。同时，对广告业做出了规定，指在报纸、期刊、路牌、灯箱、橱窗、互联网、通讯设备及广播电影电视等媒介上为客户策划、制作的有偿宣传活动。该分类方式着重强调广告为企业客户服务的经济功能，也是从广告业诞生至今一直被认可的身份。

第二，文化创意产业。广告具有文化创意产业属性是伴随着国家一系列政策提出的。2004年4月《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正式由国家统计局出台，首次从统计学意义上对文化创意产业概念和范围做出权威界定，其中广告业属于文化艺术服务类，居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2008年国家工商行政

¹廖秉宜，《自主与创新：中国广告产业发展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tjbz/hyflbz/>

管理总局、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的《关于促进广告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知识密集、技术密集、人才密集的广告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创意经济中的重要产业。2009年《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中，广告产业与文化创意、影视制作、出版发行、印刷复制、演艺娱乐、文化会展、数字内容和动漫等并列为国家重点文化产业。2011年以来，中央有关部门陆续出台相关文件，为广告产业定位并鼓励其发展。具有代表性的有三大事件：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文化产业结构调整，发展壮大广告等传统文化产业”；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确定“促进广告业健康发展”；国家发改委发布了《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首次把“广告创意、广告策划、广告设计、广告制作”列为鼓励类。由此可见，广告产业的定位在国家层面得以肯定。

综上所述，我国广告产业隶属现代服务业，同时又是文化产业、创意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进步，广告产业的外延仍将不断扩展，这种独特的产业性质能够更好地服务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反观海上丝绸之路，有学者通过历史梳理，进行了总结论证¹：中国丝绸通过海路外传，最初只是在经济上有互通有无，作为商品交换，后来突破了经济范畴，发展为政治、外交、宗教、文化、艺术乃至与人民生活都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并且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从我国广告产业的属性看，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所涉猎的领域，有很大程度的交叉融合，这一点，为广告产业发展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提供了合作的可能性。

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对广告产业的影响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广告经营额年均递增 30%左右，已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广告市场，一组对比数据为证：2003 年，中国广告经营额 1078.68 亿元，2013 年达到 5019.75 亿元；2003 年，中国有广告经营单位 10 万户，2013 年达到 44.5 万户；2003 年，中国有广告从业人员 87 万人，2013 年达到 262 万人²，我国广告行业成为增长最快的行业之一。然而在辉煌的背后，广告产业也面临诸多问题，急需进行产业升级，从量的发展向质的转变。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将为广告产业提供新的机会。

首先，将提升中国广告产业未来增长空间。从增长速度来看，相较 2012 年，2013 年我国广告经营企业、从业人员和广告经营额增速分别下降 9.5、10.1 和 43.5 个百分点³，广告出现增速放缓的现象，因此广告产业也需要拓展发展空间。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涉及到与中国相连的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汶莱、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十个国家，从地理层面拓展了广告市场；同时，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紧紧围绕港口航运、海洋能源、经济贸易、科技创新、生态环境、人文交流、旅游产业等领域开展全方位合作，这些领域为广告发展从产业层面提供了更多的发挥作用的机会。

其次，进一步促进中国广告产业对外合作交流空间。从我们国家的广告产业发展历史来看，较多的和美国、日本等广告发达国家合作，而对与海上丝绸之路沿岸国家的广告交流合作机会非常少。事实上，广告是为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不同地区的广告具有不同的特点，都值得我

1 陈炎著，《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第 52 页

2 《中国广告市场居世界第二》，经济日报，http://finance.ifeng.com/a/20140510/12304873_0.shtml

3 《2013 年我国广告经营额同期增长 6.8%》，<http://www.chinairn.com/news/20140418/100731970.shtml>

们关注和学习。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帮助广告产业打开了另外一扇窗，我国尤其是沿海相关省份，如广东、福建，都应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沿岸国家地区的广告交流与合作，增强我国广告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第三，进一步促进中国广告产业结构调整。面对新的市场，如何帮助国家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如何帮助企业进行更好地品牌建设和传播？如何与当地广告公司处理好关系，在竞争的基础上进行较好地合作？如何更好地融入当地的文化并有效地利用它们？如何更好地了解当地的消费者？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摆在了我国广告业的面前。我国广告业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框架下的服务国家和企业的过程中，必将经历一系列的挑战，实现本产业的调整、优化和升级。

三、广告产业对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所起的作用

广告产业发挥的作用源于广告的功能。在广告学研究中，广告功能为很多学者所关注，研究成果也在不断丰富，将广告功能从经济领域扩展至社会领域。依托广告功能，在新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过程中，广告产业所起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宣传功能，主要对国家形象进行有效宣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构建和平稳定周边环境的战略举措，是外交政策的首要。因此，国家形象的建立尤为重要。广告是经济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很多场合下，广告充当了一个国家和城市的标志，表达出所在时代人们的寻求欲望，从而形成基于大众文化的时代标志，尤其是公益广告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在我国，公益广告用于国家形象宣传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借助大事件、社会热点进行的宣传。如2008北京奥运会、2010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宣传采取以活动举办城市形象为中心带动国家整体形象的策略；二是采取主动走出去的策略，对整体国家形象进行宣传。2009年，由商务部牵头推出系列广告“中国制造”，在CNN（美国有线新闻网）等国际主流媒体进行了为期6个月的播放，是我们国家第一次采用广告形式在国外进行的宣传；2011年，“中国形象”广告片——人物篇（50名中国名人），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播出，六块巨型电子显示屏同时播放这一60秒的广告片，用自信、智慧、美丽、勇敢、才能等诠释中国人形象，引起世界的关注。鉴于已有经验，我们国家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应进一步宣传中国爱好和平、谋求共同发展的国家利益观，对当下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塑造国家良好形象有着重要的意义。

其次，沟通功能，不同国家和地区历史文化尤其是民间沟通。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是立体的工程，不仅需要政策环境、交通物流等硬件方面的支持，还需要民间的沟通。这比国家形象宣传更为重要，民间沟通是实实在在的交往，是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纵观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史，大批中国人移居海外经商，同时也有不少外国商人留居中国境内。古代华侨出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商人、水手到海外贸易，由于种种原因在海外定居；政治动乱、农民战争失败后，有的人避居海外，有的人是生活所迫到海外谋生等¹。这些华侨与当地人民友好相处，辛勤劳动，互相帮助，进行贸易交往的同时，也带去了我国的民间文化，如广州佛山的舞狮表演等，更加生动地展示我国的国家形象。在民间沟通的背后，实质是贸易的不断增长，广告成为信息传递的重要手段，充

¹陈高华，《略论泉州与海上丝绸之路》，李冀平等主编《泉州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3页

分利用当地媒体和华侨媒体进行信息的传递，海上贸易的增长，进一步促进了人员的往来，旅游、文化、相关产品不断丰富，为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构建了一个巨大的发展空间。

第三，服务功能，有效为其他不同产业之间提供服务。广告产业作为一个高关联度的产业，其发展往往可以影响和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与广告相关联的我国产业大体分三类¹：第一类集中在原材料领域，如钢铁、煤炭等行业，广告投放不大，关联度较低；第二类不仅影响大，而且波动也大，如房地产、汽车、家电、通信产品等；第三类影响大但波动不大，如日常必需品、食品、饮料等快速消费品。总之，广告产业发展与快速消费品、社会服务业、房地产业、汽车业、加工制造业、金融保险业、通信业等产业发展具有密切的关联性，对传媒产业发展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国务院参事室参事、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将海上丝绸之路沿岸国家分为两个基本类型，一种是自然资源和旅游资源丰富的国家，一种是劳动力资源丰富国家。对前者，中国快速发展会提供最可靠的市场，会是最多的旅游观光客的来源。而对后者，中国的产业转移会给他们带来一个工业化现代化的战略机遇期²。由此可见，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涉及到旅游产业、自然资源相关产业和我国产业转移涉及到的相关产业，范围非常广泛，需要广告产业发挥服务功能，帮助相关产业进行宣传、引导和开拓市场。

四、海上丝绸之路框架下的福建省广告产业发展新思路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福建省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尤其对广告产业来讲，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为其提供了更多发展机遇。那么如何利用好这次机会，构建福建省广告产业的竞争优势呢？从广告公司角度来看，笔者认为总的要把握好三个特色，即“中国特色+福建特色+地方特色”。

从国家形象宣传层面看，广告宣传要特别注意中国特色的文化。美国著名广告人伊丽莎白·泰勒说：“看一看某个国家的广告，基本上也就看到了这个国家生活层面的大部分，因为广告创意不仅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文化取向，也反映了一国人民的爱好和价值观。”³因此，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过程中，偏向国家层面的广告宣传应该多多关注“中国元素”。“中国元素”不仅成为时下一个热门概念，也成为国际国内广告创作和广告营销中炙手可热的宠儿。2006年，举办首次中国元素国际创意大赛，由此引发一系列对“中国元素”的探索与讨论。尤其在公益广告中，中国元素占据重要位置，发挥重要作用。

从企业品牌及相关活动宣传层面看，广告宣传要特别注意福建特色，尤其是针对福建省内企业的宣传。福建省与海上丝绸之路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福建省的很多特色文化也随着华侨的迁移而流传到其他国家。同时，很多国外人士的迁入也使得福建文化具有多元性，尤其是泉州文化。以泉州南音为例，古称弦管，不仅长期在泉州传唱，同时不断地向周边地区发展，首先遍及闽南地区，而后传遍台湾、香港和澳门，并随着闽南华侨的足迹，传播到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泰国等闽南华侨聚居地，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南音文化圈。因此，在品牌宣传时，福建特色文化较能很好地与当地文化进行对接。

从具体产品宣传层面看，如果针对海上丝绸之路沿岸国家的消费者，广告宣传则要注意地方特

¹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编著，《广告业发展与监管》，中国工商出版社，2012年版，第13-14页

²全球专家学者热议“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http://news.xinhuanet.com/expo/2014-11/04/c_127175397.htm

³陈培爱主编，《创意产业与中国广告业》，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6页

色。具体的产品宣传，最终目的是产品销售量的提升。因此，要通过调查了解当地消费者的生活形态、消费习惯以及认可的文化，以消费者为核心，进行广告诉求的提炼。同时，要运用当地的文化元素，比较为广大消费者所接受。

综上，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为福建省广告产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机会，针对宣传对象的不同，福建省广告公司要区别对待，将“中国特色+福建特色+地方特色”综合运用，服务不同的广告需求。同时，在应对机会与挑战中，得以健康发展。

作者简介：

张璠，华侨大学文学院讲师。

海上丝绸之路文献资源保障体系研究

陈彬强

内容摘要：海上丝绸之路文献是反映古代中国海外交通贸易的各种历史文献以及现代研究文献的总和，对于中国重提海上丝绸之路、解决海洋岛屿争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具有重要意义。文章最后从系统梳理文献、加强联合采购、促进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等三个方面提出了建设海上丝绸之路文献资源保障体系的措施。

关键词：海上丝绸之路 文献保障 资源共享

一、海上丝绸之路文献概况

2013年10月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尼国会发表演讲，提出建设中国—东盟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宏伟蓝图，重启海丝经济圈战略。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的徐闻古港、合浦古港、广州港就开启了海上丝绸之路；宋元时期，福建泉州刺桐港成为东方第一大港，与埃及亚历山大港齐名，并称为世界最大港口；明成祖时期，郑和率领200多艘海船、2.7万多人远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开展朝贡贸易，拜访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堪称是“大航海时代”的先驱。在长期的海外交往中，中华文化始终向世界传递、表达的是和谐发展、互惠互利的东方智慧和中国特色。

海上丝绸之路文献是反映古代中国海外交通贸易的各种历史文献以及现代研究文献的总和，涉及的文献类型包括各种史料、方志、文学作品、艺术作品、考古资料、族谱、碑刻、铭文、舆图，以及现代学者的各种研究论著。海上丝绸之路地跨太平洋和印度洋，时间跨度至少为两千多年，体现的是中国与海外的丝绸茶瓷香料贸易往来以及中国本土文化与东亚儒家文化圈、东南亚多元文化圈、南亚印度教文化圈、阿拉伯伊斯兰教文化圈、西方基督教文化圈等多种不同文化圈的碰撞与交融，相关的历史文献记载浩如烟海，既有《汉书·地理志》、《海录碎事》、《南蕃香录》、《诸蕃志》、《岛夷志略》、《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朝贡典录》、《海国闻见录》、《海国图志》等历代中国学者关于海外地理、风物的描述文本，又包括了众多海外旅行家撰写的游记，如《道里邦国志》、《马可·波罗游记》、《地理书》、《马黎诺里奉使东方录》、《鄂多立克东游录》、《异域奇游胜览》、《中国报道》、《出使福建记》、《记大明的中国事情》、《中国印度见闻录》等等。这些古代文献，不仅记载了历代中外交通的变迁和海外贸易的兴衰，也叙述了文化碰撞给双方带来的生活方式和心理心态的改变，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通过文献记载，可以想见出当时的中国人如何认知本土之外的世界，参与全球化的和谐交往进程，诠释中华文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大同社会愿景。

现代学术界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关注始于19世纪。1877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在《中

国亲程旅行记》一书中最早提出“丝绸之路”的提法，之后法国汉学家沙畹在《西突厥史料》中提出丝路有陆海两道的说法。1967年，日本学者三杉隆敏在他的《探索海上丝绸之路》一书中首次提及“海上丝绸之路”，这个概念如今已被学术界所普遍接受。至此，海上丝绸之路逐渐成为20世纪西方汉学研究的一个热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在1987年发起“丝绸之路：对话之路综合考察”十年规划大型项目，并且于1990年组织了由30多个国家50多位科学家与新闻记者组成的海上远征队，从威尼斯出发历经22个港口城市，并在泉州与广州考察期间举办座谈会，分别以《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出版了论文集。就国内研究而言，北京大学的陈炎教授在他的《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两本专著中，首次对陆、海两条丝路进行了考释。上世纪90年代以来，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向纵深发展，涌现出一批高水平的著作，如陈高华等人编写的《海上丝绸之路》，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心等编的《海上丝路之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海上丝路之研究》、中国航海学会编的《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黄启臣主编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等等。

不过，这些研究成果仅是冰山一角。实际上，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涉及的范围极为宽广，涵盖了语言学、文学、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宗教学、艺术学等人文学科，又牵涉到天文学、地理学、航海学、生物学等多个自然学科，相关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很多文献仅从题名很难看出其相关性。例如，《南海史话》、《南海诸岛史地论证》、《泉州宗教石刻》、《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坤輿万国全图解密——明代测绘世界》等，从文献题名上看似乎与海上丝绸之路关联度不大，但其研究内容却有相当篇幅涉及古代中外海上航线的考释，当然可以看作是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一部分。类似的文献非常之多，这就需要文献工作者具备一定的学术功底，才能从纷繁复杂的文献中抽取所需信息，在此基础上确立的海上丝绸之路文献资源保障体系方具备全面性和科学性。

二、建设海上丝绸之路文献资源保障体系的重要意义

自2013年习近平主席分别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这条贯穿欧亚大陆、连接亚欧非经济圈的世界最长经济走廊和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合作带开始进入务实合作、全面推进新阶段。2014年11月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将其列为会议主要议题，研究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规划、发起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设立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建设布局谋篇。而在2014年11月举行的APEC领导人会议上，“一带一路”再次成为国际社会热议的焦点。中国诚心诚意对待沿线国家，言必信、行必果的实际行动正在国际社会赢得越来越多的认可。“‘一带一路’秉承的是开放包容的丝路精神，不限国别范围，不是一个实体，不再另起炉灶，不搞封闭排外机制，不以控制他国经济命脉、改变他国政治制度为目的，有意愿的国家和经济体均可参与。通过‘一带一路’，世界见识到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气度和胸襟¹。”无疑，中国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秉持的是和谐交往、互惠共赢、平等对话、共存共荣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精神，显现着全球化的理想状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西方世界在“地理大发现”后推行的所谓全球化进展模式，则是建立在血腥掠夺与不平等交换基础之上，是一种赤裸裸的以西方为中心的殖民主义扩张。

¹ “一带一路”，APEC 涌动新机遇[N]. 人民日报, 2014-11-08:05.

建设海上丝绸之路文献资源保障体系，可以为现代中国重提海上丝绸之路提供完备的历史文献依据。通过对历朝历代中国海外交通贸易往来文献和海外旅行家游记的文本梳理，可以以史为鉴，看出海洋及海洋航海贸易对大国和文明兴衰的深刻影响，也可以看出商业力量是如何推动国家政策的变化，以及国家和民间商业力量如何合力应对国际间的竞争，这些对当前国家推动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启发上尤其有当代意义。透过历史文献，我们也可以观察到古代中国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目的不是为了殖民称霸，而是与各国平等对话、互惠共赢，遵循的是开放包容、和谐共处的理念，传递的是兼收并蓄的开放胸襟和多元共生的文化性格。古代如此，现代也是如此。中国现在重提海上丝绸之路，不干涉他国内政，不控制他国经济，在平等开展海外贸易中互惠互利、共谋发展，因袭的实际上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传承下来的精神。历史文献还向世界说明了一个事实：中国自古以来都没有称霸世界的野心，即使在海权具有明显优势的时代，中国也不会通过强权胁迫弱小国家开展不平等贸易，中国向世界展现的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和强国形象，赢得了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的赞许和尊敬。而中国现在的和平崛起正是延续、发展古代中国树立的大国形象，对世界政治秩序和经济发展而言是利好而不是威胁，这种与西方殖民扩张主义完全不同的崛起模式，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建设海上丝绸之路文献资源保障体系，也有利于发现我国在争端岛屿拥有主权的的历史证据和法理依据。海洋岛屿主权争端事关当事国重大主权、安全和经济利益，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岛屿争端几乎遍布全球各个海域。据初步统计，全世界近 60 个国家存在岛屿争端，占全世界沿海国总数的 40%¹。我国在东海和南海海域也存在一些岛屿争端，如中日钓鱼岛争端、中菲黄岩岛争端、中越南沙群岛争端等，其中大多属于历史遗留问题，也有一些是经济利益驱动使然。如中日钓鱼岛争端既属于 19 世纪日本殖民侵占的遗留问题，也是二战后对日本战争罪行清算不彻底的后果，当中还涉及东海油气田的经济利益争夺。通过对海上丝绸之路文献的挖掘和整理，可以发现我国在这些岛屿上拥有明确无疑主权的的历史证据和法理依据，为我国日后解决岛屿主权争端提供十分有利的条件。例如，有关钓鱼岛的最早文献记载，据目前所知，是写成于明代永乐年间的一部海道针经《顺风相送》（1403 年），其中“福建往琉球”部分记载：“北风东涌开洋，用甲卯取彭家山。用甲卯及单卯取钓鱼屿²。”由此可知，早在 14、15 世纪，中国就已发现并命名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比日本人自称“发现”这个岛屿早了数百年。1556 年，郑若曾著有《筹海图编》，在《沿海山沙图》中，记录了台湾、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等岛屿属于福建海防范围以内，标明了这些岛屿的位置与统管区域。1621 年，茅元仪在其所著《武备志》的《福建沿海山沙图》中，把钓鱼山、黄毛山、赤屿绘入福建海防图。可见，至少在明代，中国已对钓鱼岛实施有效主权支配，因此中国对钓鱼岛群岛拥有无可辩驳的主权。国家图书馆拟将有关钓鱼岛的所有文献辑录成《文献为证——钓鱼岛文献图籍录》一书，共收录文献约 120 种、图 260 幅，客观、准确地呈现钓鱼岛问题的概貌，以大量中外文献充分体现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国的历史与法理依据³。中国在南海诸岛留下的诸多史迹也有丰富的文献记

¹张海天. 全球海洋岛屿争端面面观[J]. 求是, 2012(16): 55-56.

²向达校注. 两种海道针经[M]. 中外交通史籍丛刊, 中华书局, 1961: 96.

³廖祥. 国家图书馆将编纂出版《文献为证——钓鱼岛文献图籍录》[N]. 新华日报, 2013-6-04: 8.

载,有赖于学术界对其进行系统地搜集、整理和论证,为今后中国同周边国家妥善解决海洋岛屿争端打好历史文献证据基础。

建设海上丝绸之路文献资源保障体系,对于中国“海上丝绸之路”项目能否成功申遗也具有重要作用。目前,由泉州、广州、宁波、扬州、北海、漳州、福州、南京、蓬莱等九城市联合申报“海上丝绸之路”项目已经顺利入选《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根据工作日程,2015年我国将完成海上丝绸之路申遗的准备工作,2016年开始申报。而决定申遗能否成功的重要环节,除了代表性的物质文化遗存,还需要有相应的文献记载。海上丝绸之路申遗,既需要有由航道、舟船、码头、仓储、货物,与海关、海防等相应设施连结而成的物质文化遗存,同时还要有与活动相对应的文献记载对照,方符合申遗的基本条件,才有可能申遗成功。完备的海上丝绸之路文献资源保障体系,可以为海上丝绸之路提供最为详实、全面的文献资料,使申报材料更丰富、更完整、也更具说服力,从而大大提高了申报通过的成功率。

三、建设海上丝绸之路文献资源保障体系措施

(一) 尽快摸清家底,对海上丝绸之路文献进行系统地挖掘和梳理

海上丝绸之路学是一门汇聚众多学科、多元化综合研究的学问,涵盖了大多数人文学科和部分自然学科。海上丝绸之路学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古已有之,但是作为一门学说则是现今学人的主观建构,其文献学并不是一个自足的整体。海上丝绸之路文献的特点是“散”,体现在同一类材料可以分散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典籍,也可以分散在不同语言、不同信仰、不同国家的不同典籍里面¹。由于缺乏专门的分类整理,造成了研究对象极广但是文献资料极其分散的情况;从中寻找参考资料有如海底捞针,对研究者的利用十分不利。但是,完备的资料是进行学术研究的基本条件,海上丝绸之路的持续深入研究有赖于文献的爬梳整理,这项对技术要求很高的基础工作仍然需要有人来做。

从陆、海两条丝路文献的搜集整理成果对比来看,陆上丝绸之路由于较早受到学术界的关注,相关文献的整理起步也较早,在100多年的持续研究热潮中,陆上丝绸之路文献经过科研人员的努力挖掘和整理,迄今已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目前,国内已陆续出版的专题文献整理工具书有《丝绸之路文献叙录》、《丝绸之路文献研究书目索引》、《丝绸之路资料汇钞》、《中国丝绸之路辞典》、《丝绸之路文化大辞典》、《丝绸之路大辞典》、《丝绸之路人物以及《中亚史地文献综述》等等。借助前人的工作,研究人员对陆上丝绸之路文献的特性有了进一步体验和认识,为今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很好的文献基础。与之相比,海上丝绸之路文献的搜集整理工作大大落后,相关成果极为鲜见,仅有《广州文化遗产·海上丝绸之路——文献辑要卷》等少数几种,且整理的文献以广州地方史料为主,尚未见有对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献进行整体爬梳整理的工具书问世。

因此,当务之急是对涉及海上丝绸之路的古今内外文献进行系统地挖掘与梳理,彻底摸清海上丝绸之路学研究的文献家底。为了解决学术研究中的文献需求和合理采购文献需要,最首要的任务应该是对所有海上丝绸之路文献进行科学、系统地分类辑目。通过文献目录的编制,厘清海上丝绸之路学术史,明晰现有成果,发现学术热点,使后来的研究者能够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前进,从而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减少学术浪费。同时,也能为文献采访部门提供采购文献的依据。在现有基

¹范春义. 丝绸之路文献学研究亟待拓展[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3-6-14:05.

础非常薄弱的情况下,需要相关高校和研究机构尽快组织专业人员对文献进行大规模的搜集、整理,如对原始海上丝绸之路文献的摘录汇编、书目提要,对中外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文献的辑目索引,对考古研究文献的分片整理、编制出版等等。

(二) 联合文献采购,实现海上丝绸之路文献资源效益最大化

海上丝绸之路文献具有点多面广的特点,造成文献极为分散、覆盖面非常之大,古代文献、地方文献与海外文献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极大影响了文献资源保障体系的完备性。而在文献价格不断上涨的今天,大多数图书馆普遍存在购书经费短缺的问题,尽管图书馆界已采取多种应对办法,但仍无法根本解决。仅依靠一个或少数几个图书馆完成海上丝绸之路文献资源建设,可能不太现实。要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要争取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多方筹集资金,保证一定的文献采购规模,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应尽量遵循减少复本、增加种类的原则,以保证文献资源的覆盖率。另一方面,为了提高文献资源利用率,杜绝因大规模重复建设而造成不必要的浪费,还需要加大各文献机构之间的合作力度,协调各方利益,实现优势互补,走联合采购之路。

就国内而言,尤其要建立九个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城市之间的文献联合采购机制。九个城市本身就藏有极为丰富的海上丝绸之路文献史料,而为了联合申遗,都还有加强对各自相关文献资源的采购需要。因此,为了使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效益,防止大规模重复建设造成不必要浪费,建议九个城市的图书馆统一由文化部或国家图书馆领导,部署海上丝绸之路文献的联合采购。在实行对文献资源的分布和利用进行全面调查、评估的基础之上,领导单位通过行政干预制定协调统一的文献资源采购机制,明确规定各成员馆的任务、目标、义务和权利,结合原来的馆藏文献优势、自身特色和实际需求,实行各有侧重的采购计划,并处理好电子文献与纸质文献的采购比例关系、现实馆藏与文献传递的关系,扬长避短、择优选择,扩大馆藏文献利用的同时,保证各馆重点收藏的完备性和系统性。此外,还要积极与各地的档案馆、博物馆等其他类型地方文献收藏单位统筹规划、协同建设,形成联合共建、优势互补¹。最终实现文献资源在馆藏建设、协调发展、联合保障等方面形成实效,全面提高海上丝绸之路文献的整体保障水平。

(三) 加强数字开发,做好海上丝绸之路文献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

图书馆是现代信息资源的集散中心,在知识创新体系中,文献数字化建设属于知识组织、知识传播的一种方式,是对馆藏信息资源或社会信息资源开发的有力手段。在实践中,加强资源共享,开发虚拟馆藏,是提高保障率又不会影响利用率的有效途径²。海上丝绸之路文献的数字化建设与信息资源共享是网络信息环境对文献建设的必然要求,这就更进一步要求各馆不仅要建立文献联合采购机制,还必须通过协调合作,建设覆盖各馆的网络体系,实现海上丝绸之路文献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在网络化建设中,可以根据具体的共享活动、资源种类的不同,灵活选用适宜的合作形式。从具体情况来看,综合各馆在信息资源建设和共享方面的合作深度,可考虑采用以集中型资源为主体,以分布型特色资源为补充的综合型共享模式,即由一个或多个大型文献信息资源中心为核心,以各具特色的分布式文献信息资源共享系统为依托,以统一书目检索平台和服务平台为支撑,开展

¹ 郭卫华. 图书馆地方文献资源建设存在的问题[J]. 图书馆论坛, 2006(2): 150-152.

² 吕俊生. 网络环境下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与文献保障体系[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0(2): 42-45.

文献信息资源共享活动¹。在这种模式中,购买、管理数字文献资源采取集中型管理模式,而对各馆藏海上丝绸之路文献书目资源和特色数字资源等自有资源则采用分散型模式进行共享。

各成员馆在开发各自的海上丝绸之路文献特色数字资源过程中,应按照“统一规划、统筹兼顾、适度分工,联合保障”的原则进行,要注意根据本馆性质、任务、要求,以及馆藏重点和文献的利用情况,紧密结合藏书现状,划分出各种文献的数字化优先级别,有计划、分步骤地逐步实现重点文献的馆藏数字化,通过网络体系与各成员馆实现共享。同时,也要考虑地方政府、社会各界的信息需求和科研人员的特殊要求,优先开发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文献,建立区别于其他馆的数据库,如泉州的宗教石刻文献以及有关阿拉伯后裔的文献史料保存较多,泉州馆可优先进行数字化处理,建成相关特色资源数据库,这样既能避免重复建设,保持自己的特点和独立性,体现“人无我有”的价值,又能最大程度地满足地方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

此外,图书馆还可以借助多种全国性文献信息共建共享服务体系,进一步补充、完善海上丝绸之路文献资源保障体系。自1990年代以来,以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CASHL)和高等学校中英文图书数字化国际合作计划(CADAL)为代表的国家级信息资源共建共享体系已初具规模并稳步发展,它们在纸质书刊的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特色数据库建设、联合目录等方面的建设已取得不斐的成绩^{2[9]}。图书馆亦可乘此东风,合理利用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资源,努力发掘海上丝绸之路文献,并与自身的整体性文献开发相结合,积极开展多学科、多语种、多类型的全方位保障建设,形成多渠道的联合保障机制,促进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图书馆综合实力的可持续发展。

四、结语

文献是学术研究开展的基石,建设海上丝绸之路文献资源保障体系是保证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得以全面推进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在现代化信息管理技术得以广泛应用的今天,图书馆应尽快发挥自身优势,提升文献信息资源的质量,提高文献信息保障率,建立一个科学、合理、完备的海上丝绸之路文献资源保障体系,从而为海上丝绸之路学术研究提供提供强有力的文献和服务支撑。

Literature Support System of Maritime Silk Road

Chen Bin-qiang

Abstract: Maritime Silk Road document is the total of ancient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historical traffic and trade document. It is important for raking Maritime Silk Road, solving the island dispute and declaring the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Finally, this article advances the methods of building literature support of Maritime Silk Road: collecting literature, strengthening combined purchases and promoting resources

¹姚晓霞,朱强.国外高等教育文献资源共享模式[J].中国教育网络,2013(9):65-67.

²马继刚等.人文社科文献保障与共建共享的现状分析与发展策略[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3(2):26-30.

building and sharing.

Keywords: Maritime Silk Road; Literature Support; Resources Sharing

作者简介:

陈彬强 (1979-), 男, 福建南安人, 泉州师范学院图书馆馆员, 西南大学历史学硕士, 发表论文 9 篇, 参编著作一部, 研究方向为图书馆史和文献资源建设。

从税收沿革思考“海上丝绸之路”发展

福建省税务学会课题组

内容摘要：追溯“海上丝绸之路”和历代税收的演变，分析“海上丝绸之路”与相关税收的关系，收集福建省的税收收入与外贸进出口额以及 GDP 等数据，进行回归性分析并建立数学模型，应用现代经济理论，从税收角度提出我省发展“海上丝绸之路”的思路。

关键词：海丝之路 税收沿革 税收建议 计量模型 回归分析

福建省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地之一，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在新时期发展“海上丝绸之路”将具有外交与经济的双重意义。本文从“海上丝绸之路”历史发展以及税收的角度出发，收集福建省的税收与外贸进出口以及 GDP 等数据，建立数学模型进行回归性分析，并应用现代经济理论，结合国内现有的税收优惠政策，提出符合福建发展的税收建议，以加快福建省打造成海上丝绸之路互联互通的重要枢纽、经贸合作的前沿平台、人文交流的重要纽带。

一、“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税收及其沿革

（一）“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缘由

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可追溯至汉代，是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海上通道，泉州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唯一认定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海上丝绸之路是由当时各个大洋间一系列港口网点组成的国际贸易网。在唐宋元的繁盛期，中国境内主要有泉州、广州、宁波三个主港和其他支线港等组成。

根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时，我国东南沿海有一条通往东南亚、印度洋北部诸国、红海沿岸、东北非和波斯湾诸国的海上航路，叫作“广州通海夷道”，这便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叫法。早期这条海上航路运送的主要大宗货物是丝绸，所以大家都把这条连接东西方的海道叫作海上丝绸之路。到了宋元时期，瓷器的出口渐渐成为主要货物，因此，人们也把它叫作“海上陶瓷之路”。同时，还由于输入的商品历来主要是香料，因此也把它称作“海上香料之路”。唐朝中后期，丝绸之路因战乱而荒废，同时期中国经济重心也转移到南方，而海路又远比陆路运量大成本低安全度高，“海上丝绸之路”便取代陆路成为中外贸易主通道。特别是宋朝商业科技高度发展，指南针和水密封舱等航海技术的发明和之前牵星术、地文潮流等航海知识的积累，加上阿拉伯世界对海洋贸易热忱，使海上丝绸之路达到空前繁盛。明朝海禁，海上丝绸之路衰落。郑和下西洋实质是朝贡性质的航海行为，难以为继无法持久。海禁导致民间海外贸易被迫转型为走私性质的私商贸易。民间海外贸易的需求张力和朝廷政策的矛盾冲突始

终贯穿明清两朝。明清仅有几次有限度开禁都是被动的权宜之策。无政治武装支持的中国海商无力挑战大航海时代政治军事商业合一的西方扩张势力，海禁导致中国退出海洋竞争，是近代中国积弱落后的关键。

（二）“海上丝绸之路”涉及的主要税收

“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是货物的对外贸易，它所涉及的税收主要有“商税”和“市舶税”。在了解具体税种之前，我们一起来浏览一下我国税收演变的大体过程。

1. 以土地为赋税的六种税制

我国税收起源于土地的贡赋，《孟子·滕文公上》记载：“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意思是，夏朝行贡法，商朝行助法，西周行彻法，三者的税率都是十分之一。这种税制也叫“公田之税”，是我国第一种税制。

到了春秋战国，铁质农具和牛耕的广泛使用，农民有余力开垦私田，而不肯尽力于公田，导致井田制瓦解。统治者适时进行变法，把公田分给个人，然后按每个人实际耕种的面积征税，历史上叫着“履亩而税”，这是历史上的第二种税制。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由租赋制发展为租调制，即征收田赋和户调，取代了从汉以来二百多年的田租、口赋和算赋制度，是一次重大的改革。到了隋唐时期，在租调制的基础上又发展为“租庸调制”——也就是我国的第三种税制，这种税制是以均田制的推行为基础的赋役制度。此制规定，凡是均田人户，不论其家授田是多少，均按丁交纳定额的赋税并服一定的徭役。即“有田就有租，有户就有调，有身就有庸。”这种税制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延续五百多年，一直到唐朝中期实行两税法之后，租调制度才被取代而完成了历史使命。

第四种税制是“两税法”。它是针对当时土地兼并严重，户籍混乱，管理困难的情况进行改革的。其课税标准是不分丁男、中男，都按照拥有土地和财产的多少纳税；纳税期限分为夏税和秋税两期交纳。

明中叶后，土地兼并剧烈，地权高度集中，加以官绅包揽、大户诡寄、徭役日重、农民逃徙，里甲户丁和田额已多不实，政府财政收入减少。针对这种现象，国家从保证赋役出发，遂逐渐把编征徭役的重心由户丁转向田亩。因此出现了——第五种税制“一条鞭法”。一条鞭法的改革，主要是役法改革。将力役部分摊入田赋，加强了力役由户丁转向土地的趋势。

第六种税制是“摊丁入亩”。就是以康熙五十年丁册 24621324 丁为常额。计算丁银 335 万余两。把丁银摊入地，实行地、丁合一征收。“摊丁入亩”是赋役史上一次重大改革。

表 1：夏——清以土地为主的赋税制度沿革简要

	夏	商	周	春秋	战国	秦	汉	三国	晋	南北朝	隋	唐	宋	元	明	清
田税	第一种税制			第二种税制				第三种税制				第四种税制		第五种税制	第六种税制	

	公田之税		履亩而税		租庸调 有田就有租，有户就有调，有身就有庸。	两税法 唐之两税法包括丁钱与徭役；宋之两税法仅为田赋。	一条鞭法	摊丁入亩
劳役		力役 兵役	力役、兵役、更赋					
人头税				口赋 算赋				

2. 工商税收沿革以及“海上丝绸之路”涉及到主要税收

随着畜牧业的发展，手工业的进步，社会产品的剩余产生了互通有无的需要，社会上出现了专门从事商业的阶层。这样与其相对应的税收也就产生了。早在西周时期，开征了关市之赋，据《周礼》记载，包括关市税和山泽税两类。之后工商税的税种以及征收的品目就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财政的需要，相应而增（详见表2，周一清主要工商税种沿革简要）。

表2：周一清——清主要工商税种沿革简要

	周	春秋	汉	隋	唐	宋	元	明	清
流转税	关市之赋		关市税		关税		商税	商税	关税
			酒专卖、酒课						
收益税			贯贷税		率贷借商				
资源税	山泽之赋	盐专卖 铁专卖	山泽税 铁专卖	盐税	茶课 矿税		岁课 盐税 茶税	盐税 茶税 坑冶课	盐税 茶税 矿税
财产税			缗钱税 车船税		间架税 户税		市舶课	市舶课	契税
行为税			牲畜税		除陌钱	印契税	额外课 及杂敛	杂敛	牲畜税 杂税

“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是对外贸易，因此，对商业贸易征收的税收它都会涉及到，但最直接的是市舶的征税。如：

汉代的关市税，对出关货物和在市肆上的商贩进行征税。

隋唐时期对外贸易十分发达，封建政府对外采取开放政策，许多外国商人来中国做买卖，广州等城市成为主要的通商口岸，国家在这里设有市舶使，专门负责检查出入船舶，征收关税。元和年间(公元806—820年)，外国商船进入港口，市舶使负责检查船内装运的货物，并向他们征收“舶脚”，也称为“下碇税”，即相当于现代的吨税，属于国境关税的性质。随着对外贸易事业的不断发展，来中国做买卖的商船和商人不断增多，关税收入也日渐增多。

宋朝与海外诸国的贸易，至宋朝始进入兴盛阶段。太祖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在广州设市舶司主管海上贸易，以后又在杭州、明州、秀州之华亭(今上海淞江县)、密州之板桥(今山东胶县)等

沿海都市设立市舶司。宋承唐制，将国内出海贸易的商舶及海外诸国来华贸易的商舶，统称之为市舶。宋朝统治者鼓励海上贸易，凡来华贸易的外国客旅，国家出资，设宴款待，如来华市舶少，或不来，则派吏出海招致。南宋尤其重视市舶。目的是“招徕远人，阜通货贿。”宋朝对市舶实行统制政策。凡海外诸国来华贸易的船只，或出海贸易的国内商舶，都必须经市舶司检查，同时对舶来商品实行垄断制度。即入港船只所载之货，先由市舶司征税，然后国家从中收买一部分商品，即抽买。征税、抽买之后，市舶司给以凭证，方许与民贸易。

在元代海外贸易得到显著发展，在杭州、上海、澈浦、温州、庆元、广东、泉州等地设七个市舶司，主持对外贸易和市舶抽分事宜。元统治者对外贸易的原则是“损中国无用之费，易远方难制之物。”为配合对外贸易的管理，国家制定了较前代更为完备的市舶课制度。其初期沿袭宋朝旧制，至元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在杭州、泉州实行外贸统制制度，即官府自备船舶和本钱，选派人员对外贸易，所得利润，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参加贸易的人取其三。同时规定权豪势要之家，不得用自己的钱下番贸易，违者籍没家产之半。国外客旅随官船来华贸易的，依例抽分。至元二十九年又定抽分之数及漏税之法。规定在泉州、福州等处已抽分的舶货，如在本省有市舶司的地区出卖，不要另外征税，细货征二十五分之一，粗货征三十分之一，此后其他各市舶司均仿照执行。到仁宗延元年(公元1314年)因香货、药物减少，价值陡增，遂广开外贸，重新制定市舶条例。凡出海贸易，必须由官府批准，给以凭证，私自出海者，没其货物，查实后将没官物的一半付告发者充赏。

明朝对海外诸国来华贸易的货物，不征市舶课。至于国内商船则实行禁海政策，一般严禁出海，只有官府派官率船出海，如郑和七下西洋即属于此。但其目的不在于进行贸易。只是招抚远人。明代也没有市舶司，但只负责贡舶管理和监视，通报敌情，不负责商舶的管理和征税。商船的发展是在明后期万历年间。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巡抚刘尧海以船税充饷，“岁以六千两为额”。于是制定海税禁约十七章。自此，唯不准去日本贩日货通倭寇，去其它海外诸国皆可。征税的原则，有水饷、陆饷、加增饷之分。所谓水饷，即以船的广狭为准，饷出于商船；所谓陆饷，即以货之多寡，计值征饷，春饷出于铺商；所谓加增饷，即去吕宋岛(在今菲律宾)的商船返回时所携带的商品甚少，征收水饷、陆饷不多，故对这些船加征一百五十两，称加增饷。商船税课，万历四年为一万两，十一年为二万两，二十二年增为二万九千余两。

清初，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政府在粤、闽、浙、苏4省设立海关，这是中国近代海关制度的开始。海关征税，分货税和船钞两部分。货税征收无一定税则，除正税之外，另征各项规银及附加，一般说来，正税较轻，但外加部分有时竟倍于正额。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关税收入也随之增加。关税的种类有进口税和出口税，进口税是指外国货物进入关境或国境时所课的关税，也称输入税。出口税指本国货物出口时，对经过关境的货物所课的关税，也称输出税。

(三) 税收沿革对“海上丝绸之路”启发

纵观历史，税收是伴随着国家产生而产生的，税收的基础是经济，经济的发展以及结构的变化，税收征收的对象也会随之改变。就以“市舶税”来说，它便贯穿着整个“海上丝绸之路”历史。为此，无论是古代的“市舶课”，还是近代的关税，税收与对外贸易的发展总有着密切的联系。

1. 历史的市舶“市舶税”更多的是为了筹集资金，在经济调节方面不会太突出

两汉到隋唐时期，我国对外贸易虽然也十分发达，商品远销印度欧洲，但是始终没有完整系统的税收财政制度为之相匹配。宋承唐制，将国内出海贸易的商舶及海外诸国来华贸易的商舶，统称之为市舶。宋朝统治者鼓励海上贸易，凡来华贸易的外国客旅，国家出资，设宴款待，如来华市舶少或不来，则派吏出海招致。南宋尤其重视市舶。目的是“招徕远人，阜通货贿。”

在元代为鼓励土货出口，曾实行双抽、单抽之法，对土货实行单抽，对蕃货实行双抽（即加倍征收）。至元二十一年（公元 1284 年）在杭州、泉州实行外贸统制制度，即官府自备船舶和本钱，选派人员对外贸易，所得利润，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参加贸易的人取其三。同时规定权豪势要之家，不得用自己的钱下番贸易，违者籍没家产之半。国外客旅随官船来华贸易的，依例抽分。至元二十九年又定抽分之数及漏税之法。规定在泉州、福州等处已抽分的舶货，如在本省有市舶司的地区出卖，不要另外征税，细货征二十五分之一，粗货征三十分之一，此后其他各市舶司均仿照执行。

2. 现代鼓励出口的税收政策举要

如今的对外贸易已经摆脱了过去单纯“国家根据需要或充内府库藏，或交官营手工作坊，供皇室官吏度用，或转售商人获取巨利”的需求，更多的是从国家战略层出发，与之相应的税收政策更是调节地区产业结构，保证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尤其是出口退税政策，极大地鼓励我国的货物出口，以无税的商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1）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关税等税收对进出口贸易的作用主要有：一是与各国进行税收谈判，签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以发展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国际经济技术交往。二是根据国家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对进口商品征收进口关税，保护国内市场和幼稚产业，维护国家的经济独立和经济利益。三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对某些出口产品征收出口关税，以限制国内紧缺资源的外流，保证国内生产、生活的需要。四是为扩大出口，实行出口退税制度，鼓励国内产品走向国际市场，增强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五是根据发展生产和技术进步的需要，实行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设备，加速中国经济的发展。六是对外国人和外国企业来源于中国的收入和所得征收所得税，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

（2）现阶段出口商品的税收优惠政策

除了出口货物采取出口退税外，我国现阶段的出口商品所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还有：增值税方面，既包含对特定商品免税（国税发〔1994〕31号），如来料加工复出口的货物；也包括对特定纳税人免税（国税发〔1994〕31号），如对外承包工程公司；以及国家为了促进部分产品或者行业，如暂时出境货物暂不征税、保税区出口货物退免税等。所得税方面，具体包括：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 3 个税种的税收优惠。如出口信用保险业务先征后返（财税字〔1998〕41号）；出口企业再投资退税；境外所得个人所得税补扣等。

国家税收优惠政策是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产业转型升级以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在不同的时期进行调整，用好用足这些税收政策，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是有利的。

二、我省 GDP、进出口贸易与税收的关系分析

以下我们将通过收集 1995—2012 年福建省生产总值 G、税收收入 T 和进出口总额 J（包含进口

数据和出口数据)的数据(见表3),建立数学模型,进行计量分析。

表3: 1995—2012年福建省GDP、税收收入和进出口数据 单位:亿元

年度	税收收入	进出口总额	出口总额	进口总额	GDP
1995	120.08	1210.55	662.70	547.85	2094.90
1996	128.71	1288.14	695.74	592.40	2484.25
1997	146.11	1486.13	848.96	637.17	2870.90
1998	164.55	1420.56	824.81	595.75	3159.91
1999	195.89	1458.55	856.93	601.61	3414.19
2000	265.13	1756.87	1068.55	688.32	3764.54
2001	308	1872.98	1152.49	720.49	4072.85
2002	350.12	2350.85	1437.96	912.89	4467.55
2003	418.8	2924.25	1749.28	1174.96	4983.67
2004	499.46	3933.81	2433.00	1500.81	5763.35
2005	574.02	4457.21	2854.15	1603.06	6554.69
2006	675.54	4937.55	3251.43	1686.12	7583.85
2007	826.51	5661.24	3797.47	1863.77	9248.53
2008	1022.72	5890.90	3958.14	1932.76	10823.01
2009	1126.97	5440.85	3642.22	1798.63	12236.53
2010	1392.78	7363.88	4839.73	2524.15	14737.12
2011	1676.89	9269.83	5996.21	3273.62	17560.18
2012	1919.5	9843.6	6175.7	3667.9	19701.78

注:进出口总额数据来源于1995—2013《中国统计年鉴》、《福建省统计年鉴》;税收收入数据来源于《1995—2013福建国税税收收入统计资料(精编版)》,税收收入是国、地税税收收入合计,含海关代征,出口退税未予剔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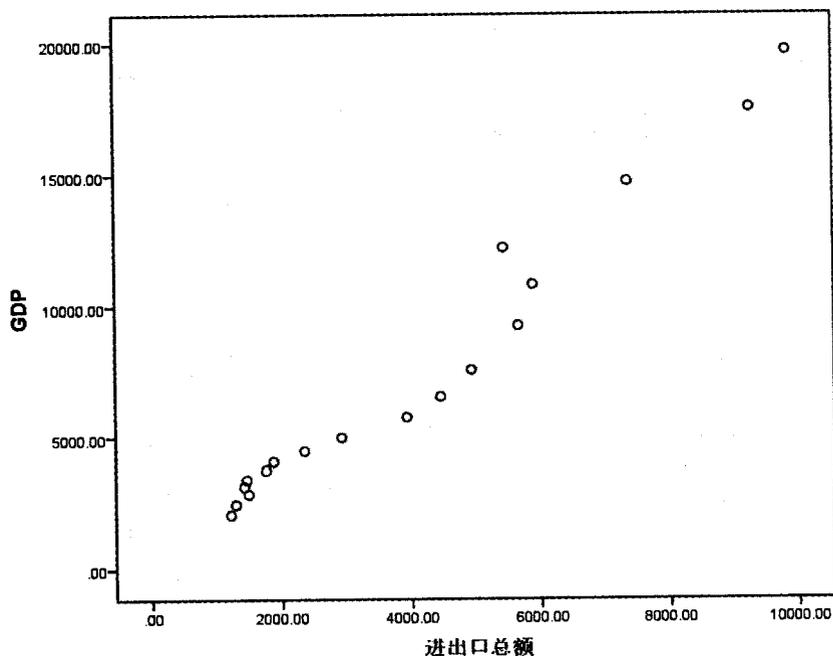
(一)我省进出口情况和经济发展水平(GDP)的相关性分析

表4: GDP与进出口总额的相关系数矩阵
相关性

		GDP	进出口总额
GDP	Pearson 相关性	1	0.981
	显著性(双侧)		.000
	平方与叉积的和	495460834.048	249692051.923
	协方差	29144754.944	14687767.760
	N	18	18
进出口总额	Pearson 相关性	0.981	1
	显著性(双侧)	.000	
	平方与叉积的和	249692051.923	130720259.252
	协方差	14687767.760	7689427.015
	N	18	18

** . 在 .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由表4可知，在1%的显著水平下，进出口总额与GDP的person简单相关系数为0.981，相关系数检验的概率p值近似为0，可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线性关系。因此，GDP与进出口总额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即GDP会受进出口总额的正向影响。



如图 1：进出口总额与 GDP 的矩阵散点图

表 5：GDP 与进口总额的相关系数矩阵

		相关性	
		GDP	进口总额
GDP	Pearson 相关性	1	0.978**
	显著性 (双侧)		.000
	平方与叉积的和	495460834.048	84721942.776
	协方差	29144754.944	4983643.693
	N	18	18
进口总额	Pearson 相关性	0.978**	1
	显著性 (双侧)	.000	
	平方与叉积的和	84721942.776	15139320.564
	协方差	4983643.693	890548.268
	N	18	18

** . 在 .01 水平 (双侧) 上显著相关。

表5可知，GDP与进口总额的简单相关系数为0.978，同上，GDP会受进口总额的正向影响

表 6：GDP 与出口总额的相关系数矩阵

		相关性	
		出口总额	GDP
出口总额	Pearson 相关性	1	0.979
	显著性 (双侧)		.000
	平方与叉积的和	57350480.117	164970175.748
	协方差	3373557.654	9704127.985
	N	18	18
GDP	Pearson 相关性	0.979**	1
	显著性 (双侧)	.000	
	平方与叉积的和	164970175.748	495460834.048
	协方差	9704127.985	29144754.944
	N	18	18

**. 在 .01 水平 (双侧) 上显著相关。

表6可知，GDP与进口总额的简单相关系数为0.979，同上，GDP会受出口总额的正向影响

(二) 福建省进出口总额与税收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表 7：进出口总额与税收收入的相关系数矩阵

		相关性	
		进出口总额	税收收入
进出口总额	Pearson 相关性	1	0.984
	显著性 (双侧)		.000
	平方与叉积的和	130720259.252	25908363.977
	协方差	7689427.015	1524021.410
	N	18	18
税收收入	Pearson 相关性	0.984**	1
	显著性 (双侧)	.000	
	平方与叉积的和	25908363.977	5300636.768
	协方差	1524021.410	311802.163
	N	18	18

**. 在 .01 水平 (双侧) 上显著相关。

表7可知，进出口总额与税收收入在1%的显著水平下的person简单相关系数为0.984，说明二者的关系是正向相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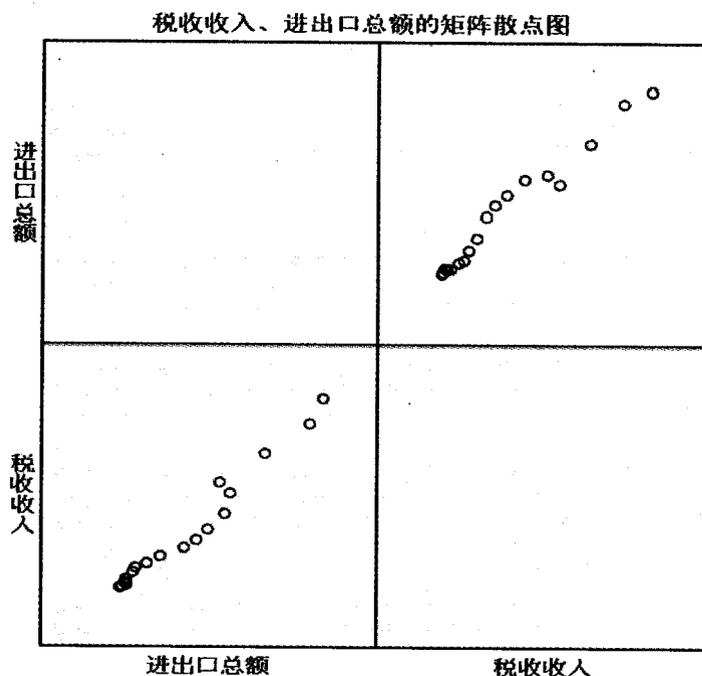


图 2：税收收入与进出口总额的矩阵散点图

综上所述，福建省的税收收入（T）与进出口总额（J）互为正向促进关系。

（三）福建省生产总值 GDP 与进出口总额的回归模型分析

首先进行协整检验，建立 $\ln gdp$ （GDP 变化率）和 $\ln O$ （出口额变化率）， $\ln I$ （进口额变化率）的回归模型：

$$\ln gdp = 1.873 + 0.228 \ln I + 0.686 \ln O$$

其中 $D.W. = 0.473$ 。说明残差项具有较强的一阶自相关性。所以需要引入滞后项，得到如下误差修正模型：

$$\Delta \ln gdp = 0.05 \Delta \ln O + 0.153 \Delta \ln I - 0.133 \ln gdp_{t-1} + 0.178 \ln I_{t-1} + \varepsilon$$

模型中回归系数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拟合优度 97.5%。误差修正系数为 -0.133，符合反向修正机制，同时也说明了长期均衡对短期波动的影响较大。

上述误差回归模型，因系数 0.05 和 0.153 为正数，说明短期内，我省 GDP 和进出口增长存在紧密的联系，从增长率角度看，短期内出口对 GDP 的增长具有更强的作用，而进口对 GDP 的增长促进作用相对较弱。但是从长期均衡看，进口和出口都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而且进口的作用更明显。

三、从税收角度对发展“海上丝绸之路”的几点建议

上述模型分析，显示我省的 GDP 增长速度与进出口增长存在着紧密的关联，而且也显示，短期内出口对 GDP 的增长具有更强的作用，而进口对 GDP 的增长促进作用相对较弱。从长期均衡看，

进口和出口都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而且进口的作用更明显。模型的分析结果与现代经济理论是十分吻合的，因为，现代经济理论认为，一国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以从短期贡献和长期贡献两个角度来分析。从短期来看，一国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净出口需求三个因素，因此，净出口额的增长必定有利于经济的增长。但是，如果从长期供给的角度分析，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则是要素供给的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两大类。要素供给投入的增加包括资本和劳动供给的增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则包括技术进步、产业结构优化、规模经济、制度创新等等。

为此我们认为，在短期方面仍然要采取积极的政策，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在长期方面，从税收的角度来说，就是要用好用足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做大做强实现跨国经营，提升人力资源水平和技术设备更新，以保证企业的技术进步、产业结构优化和规模壮大以及制度的创新。

（一）采取积极的政策，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

对外开发程度越高，国内居民对国外产品的消费期望也越高，根据支出法核算 GDP 的方法，随着国内居民消费的增加，必然带动经济水平的提高，也必然促使国内税收的增加。根据 VAR 数据模型建立的“税收收入 T 和进出口总额 J 的脉冲响应”结果：进出口总额对福建省税收收入具有促进作用，但作用效果具有时滞性。因此，缩短进出口的周期，可以缩短进出口总额对税收正向作用的时滞性，也就可以促进经济和增加税收。福建国税从 2012 年至 2014 年 3 月，办理出口退（免）税 1498.3 亿元，其中直接出口退税 1172.9 亿元。这从税收角度，就是要尽快落实出口退税，加速企业资金周转，缩短资金增值周期，提高资本使用效率，促进进出口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有利于企业的壮大发展。

一直以来，出口都是福建省 GDP 的主要贡献点，世界性金融危机的爆发对我省外贸出口造成了很大的不利影响。为了走出这些不利影响，我们应从着力优化进出口结构入手。

在进口方面，福建省作为中国沿海几个经济大省之一，但是资源稀缺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加工贸易是福建省主要的外贸增长方式，在加工贸易中原材料、能源的进口又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因此，福建省应该积极主动的将进口政策与产业结构调整、技术改造紧密结合起来，有秩序的进口当前福建经济建设急需的资源、原材料以及先进的技术、设备，优先安排有利于福建产业优化的进口商品结构，适度加大高科技产品和先进技术的进口，采取有利于国外先进技术引进的进口政策，如采购的生产设备符合国家产业目录中的鼓励类且不在国家不予免税进口商品目录以内，可以申请免缴海关进口关税，确保福建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

在出口方面，一要努力实现加工贸易从贴牌加工向自主品牌加工出口的转变。通过消化国外新技术，提高福建省加工贸易的层次和水平，推动加工贸易从接受国外品牌贴牌加工转向自主品牌接收国外订单出口，进一步提高加工贸易产品的附加值。二要大力发展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继续做好相关产业链的“扩容”，加大相关方面的引资力度，对重点外贸出口企业在政策上予以倾斜，特别是加快对具有自主技术的机电、高新技术产业的培养与发展壮大，在现有企业生产的规模上，以期形成外商投资聚集效应和产业升级的良性互动。三要支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产

品和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扩大高新技术产品、服务产品和农产品加工出口，进一步限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

（二）鼓励企业做大做强实现跨国经营

1. 鼓励有实力的企业并购重组

根据规模经济理论，在一特定时期内，企业产品绝对量增加时，其单位成本下降，即扩大经营规模可以降低平均成本，从而提高利润水平。因此有针对性的引导相关行业的企业做大做强，如航运企业、光缆等通信网络产业等，鼓励有实力的企业进行并购和重组。在此可借鉴上海自贸区关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内企业以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等资产重组行为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3〕91号）的相关条款，结合福建省省情实际，提出适合福建省企业并购重组的税收优惠政策。例如注册在省内的企业或个人股东，因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等资产重组行为而产生的资产评估增值部分，可在不超过5年期限内分期缴纳所得税。按照现行规定，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等资产重组行为产生的资产评估增值部分，如果是个人出资的，一律要求按照个人财产转让所得一次性计税；如果是企业出资，则一律要求企业视同销售所得或者视同财产转让所得一次性计税。近几年由于资金链的短缺，在纳税人缺乏必要的纳税资金的情况下，不得不举债纳税或者想方设法逃避纳税。这实际上不利于企业和个人的投资来促进资本的流动，也在无形中阻碍了一些企业的重组和改制进程。上海自贸试验区的税收优惠政策允许纳税人分期纳税，对相关投资者而言无疑是重大利好，对于省内企业做大做强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 引导企业积极“走出去”，降低生产成本

根据要素禀赋论，“一国的比较优势产品，也因而应出口的产品，是他需在生产上密集使用该国相对充裕而便宜的生产要素生产的产品；一国的比较劣势产品，也因而应进口的产品，是它需在生产上密集使用该国相对稀缺而昂贵的生产要素生产的产品。”比如，劳动力丰裕的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相反，资本丰裕的国家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而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劳动力成本的不断增加，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以逐渐不适应地区经济的发展。因此把生产工厂设立在劳动力相对的低廉的东南亚国家，于企业而言不仅有助于降低生产成本，还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企业更快打开所在地区的市场，以更低的成本获取企业所稀缺的资源，享受所在地的税收优惠政策，同时也有助于促进省内的产业的转型升级，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提升人力资源水平，及时更新设备

从长远发展来看，提高全要素劳动生产率是发展经济的重要所在，因此，要用好现有鼓励技术进步的税收优惠政策，人才引进以及增大对员工业务培训的力度，同时鼓励企业更新设备，提高产能。

1. 筑巢引凤，高端人才“引进来”

人才兴国，高端人才的引进对于福建省的发展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此可以借鉴《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法人合伙人企业所得税试点政策的通知》的相关内容，对企业的高端人才、技术型研发人员和社会紧缺类人才在获取类似股权激励时

实行个人所得税分期纳税政策，比如一位技术人员获得了股权激励，短期内没有现金，按照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征收政策，需立刻缴纳个人所得税，这位技术人员可以利用优惠政策在转让股权获得现金后再缴纳，可以理解为个人所得税缴纳有了一个缓征期。用现有的税收优惠政策留住高精尖人才，为企业的发展壮大所用，为福建省的进一步建设发展所用。

2. 加大培训力度，增加人才储备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法人合伙人企业所得税试点政策的通知》还规定企业可以将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比例由 2.5% 提高到 8%，且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这也有助于企业加大对员工的培训投入，提高职工的业务素质，增加企业的储备人才。

3. 加速固定设备折旧，鼓励及时更新设备

早期实行的企业固定资产的生产型增值税税制严重制约了企业市场竞争力。固定资产增值税由生产型转型为消费型后，企业不仅可以加速设备更新淘汰落后产能，更提高了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竞争能力，有利于促进经济健康、持久的发展。2014 年 10 月 20 日，财政部 税务总局联合发文《关于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75 号），“对生物药品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 6 个行业的企业 2014 年 1 月 1 日后新购进的固定资产，可缩短折旧年限或采取加速折旧的方法。对上述 6 个行业的小型微利企业 2014 年 1 月 1 日后新购进的研发和生产经营共用的仪器、设备，单位价值不超过 100 万元的，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不再分年度计算折旧；单位价值超过 100 万元的，可缩短折旧年限或采取加速折旧的方法。”“所有行业企业 2014 年 1 月 1 日后新购进的专门用于研发的仪器、设备，单位价值不超过 100 万元的，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不再分年度计算折旧；单位价值超过 100 万元的，可缩短折旧年限或采取加速折旧的方法”。

（四）创新税收服务机制，引导纳税人诚信经营

随着税务总局关于“便民办税春风行动”的不断落实，福建省国税局不断优化自身的业务流程，适应时代的发展，应用信息技术，破解纳税人任何涉税事项需要到办税大厅进行受理的难题。借鉴上海自贸区的涉税业务创新行为的《关于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创新税收服务的通知》（税总函〔2014〕298 号）相关内容，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和“便民办税春风行动”指引下，更好的为纳税人提供优质的服务。比如，在税务登记上，试行税务登记网上自动赋码管理，减轻纳税人往返税务机关申请税务开业登记负担；提升发票管理的能力，积极推广电子发票的运用和推广等；推行网上资格认定，例如对新办企业取消辅导期，推行网上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直接认定；在风险管控方面，加强事中管理工作，对违规纳税人纳入辅导期管理并实施动态监控等。

此外，通过建立纳税人信用登记信息平台，提供纳税信用评价结果查询的端口，有助于进一步提升纳税人的税收遵从度。税务机关根据评价结果，实施分类服务和管理，如对 A 级纳税人给予主

动公开、放宽用票量等激励措施；对 D 级纳税人加大税务日常监管力度的同时，将纳税信用评价结果通报相关部门，有助于企业的规范经营与诚信经营，促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课题组成员：包逸生 林琳 林书 张云江

参考文献：

[1]孙翊刚.中国赋税史.中国税务出版社 2007.

[2]郑仲兵等.中国古代赋税史料辑要(上下册)中国税务出版社 2004.

Gemstone Trade on the Maritime Silk Route: Based on Discoveries from Ming Tombs

Jiang Bo

In my presentation, firstly, I would like to draw your attention to two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thus to say, the two most important Ming tombs excavated by Chinese archaeologists. Then, I will focus on the descrip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the gemstones from these two burials, we will discuss who use these gemstones, what kinds of gems they are, and where so many Gemstones came from. Finally, I would like to deal with the oversea trade of luxury gems in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My first study case is the mausoleum of Emperor Wanli (1563-1620) and his two wives, Empress Duan (passed away in 1620) and Empress Jing (passed away in 1611). Emperor Wanli was crowned on June 10, 1572 and died on July 21, 1620 at his age of 58. It was recorded that Wanli held the longest reign in history of Ming Dynasty.

Emperor Wanli's burial, the Dingling Mausoleum, located to the northwest of his Capital Beijing, was excavated by my formal institute,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IACASS) in 1950s. Gemstones from this mausoleum mostly be used as attached ornaments to jewelries, crown/coronets, and Belts; except for that, my elder colleagues also found 12 packages (313 pieces) of gemstones from the three coffins. These gemstones were intentionally placed nearby the heads of Emperor Wanli and his two wives, obviously showing they were valuable personal belongings to the owners.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totally 248 jewelries were unearthed from Dingling and most of them were elaborately inlaid gemstones as ornaments. Except for 12 pieces were kept in two boxes, most of these jewelries were found at/near the heads of the bodies. There were totally 199 hairpins found, most of them were found in pairs. Gemstones, usually together with jade and pearls, were used as attached ornaments to jewelries. It was recorded in historical literature that jewelry with gems or pearls were called "*Taozhang*" (桃杖). But people never get the opportunity to figure out the real appearance of *Taozhang* until these jewelries discovered from Dingling.

One of the most impressive objects is this earring which belongs to Empress Jing: the main body of the design is a jade rabbit pounding medicine. The design of this artifact was inspired by the classic fairy tale of Lady Chang'e with her rabbit on the moon. Masterfully, on the head of the rabbit there was decorated a piece of ruby, while on the bottom there are three gemstones, with an opal in the center and two rubies on the two sides.

Gems and pearls are purposely used as ornaments onto the emperor's crowns and the empress' coronets. This is a formal hat belongs to the Emperor Wanli, such a kind of hat was called in Chinese *Yi-shan-guan* (翼善冠). Here we can see carefully selected rubies, sapphires, turquoises and pearls on the hat. But, if we compare this hat with the coronets, we will find the later has much more gemstone ornaments than the Emperor's.

Totally, 12 belts were discovered in this mausoleum. Unlike earlier period, here gemstones were used as delicate ornaments of leather belts and jade belt hooks. Jade belt has been used in the early period like Qin-han Period, but it was in the Ming Dynasty, valuable gemstones were selected as attachments.

Before we have an extended discussion about the gems from Dingling, let's come to my second study case: the Liangzhuangwang Mausoleum.

This is the tomb of Feudatory King Liangzhuangwang and his wife, located in the northwest of Hubei Province where his kingdom was founded. Based on the epitaph, we can know details of the owner and the exact date of the tomb. Liangzhuangwang's name is Zhu Zhanji, born in 1411, passed away on Jan 12, 1441, and then buried on August 26 of the same year. His wife was buried into this tomb 10 years later on March 17, 1451. In 2001, This well preserved mausoleum was excavated by Hubei Provincial Inst. of Archaeology. The discovery of this tomb became one of the hottest news because it unearthed so many valuable treasures, including numerous gemstones.

Up to now, Liangzhuangwang Mausoleum ranked as the second richest tomb of Ming Dynasty, just next to the above mentioned Dingling. People found totally more than 3400 jewelries from this tomb. Scientists identified 772 gems attached to these jewelries and classified them into 18 types.

Like jewelries from Dingling, hairpins were always inlaid with rubies, sapphires, opals, and turquoises etc.. The biggest sapphire from Liangzhuangwang Mausoleum weights more than 200 carats. This mausoleum provides evidence how the Ming people made use of priceless gemstone as the top of official caps.

Now we can extend discussion of these gemstones. The first question is: who use these Gems?

For Chinese archaeologists, we found many Ming Tombs, but only from high-level tombs like mausoleums of Dingling and Liangzhuangwang, here we find gemstones in rich numbers. For common tombs, gemstone is very rare.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clues that gemstones only be distributed and circulated in the high-lever class of Ming society, thus to say, only imperial family members and top officers owned the rights and capabilities to use gemstone, this resulted in gemstones gradually became a symbol of social status.

Oversea treasures were strictly controll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hen the business ship came back to ancient Chinese port cities like Quanzhou, custom officers will board on the ship made a very clear registration of the cargos, high-valued objects like Gems will directly be sent to the Imperial Treasure-house. Then, the imperial court, or the emperor himself, made the decisions of the fate of these gems. In a word, the distribution and circulation of gems were strictly controlled by the imperial court.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resources, the imperial family use gemstone in large scale for ceremonies like ritual practices, conferring titles, weddings, etc.. Furthermore, the imperial family members were required to wear suitable jewelrie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festivals, ceremonies, and seasons. That's why archaeologists find so many different types of jewelries and gemstones from Dingling and Liangzhuangwang Mausoleum. For example, the empress need to wear different coronets at different ceremonies, this help us to understand the four types of coronets in Dingling, classified by the numbers of dragons (12/9/6/3)and gemstones.

The second discussion is what kinds of gemstones were used by the Ming people?

For the analysis and research of gemstones from Liangzhuangwang Mausoleum, totally 772 objects were examined and they were classified into 18 types. This slide shows the varieties of gems from this burial. Here we can see rubies, sapphires, opals, emeralds and turquoises account for the main stream. In other words, among the five most valuable gemstones, we found the four kinds of gems in Ming tombs, except diamonds.

Here then comes the third question: Where were these gems from?

Chinese archaeologists try to find out where this gems from. Turquoise, China did have the tradition to use this stone as ornaments for over at least 3000 thousand years and we do find turquoises in Erlitou Site (C-14 Date: -1750~1500 B.C.)and YinXu Site (14th Century B.C. to 11th Century B.C.) Recently, Chinese archaeologists have found the ancient turquoise mine sites respectively in Hubei and Shanxi Provinces. But, the key point is, China is not the origin place of ruby, sapphire, opal and emerald. As from the modern

mineralogy knowledge, these gemstone can only get from India, Sri Lanka, Cambodia, Thailand, and Australia etc..

So, when dealing with the origin places of Gemstones, we have the chance to extend our discussion to Maritime Silk Route and the Zheng He's Navigation.

Emperor Wanli and Feudatory King Liangzhuangwang, respectively lived 1563-1620, and 1411-1441, experienced the booming of oversea trade stimulated by the Zheng He Navigation. Archaeological evidences in these two tombs help us to trace back the history of Gemstone trade during the Mid and Late Ming Dynasty.

As you may know, from 1405 to 1433, Zheng He navigated to *Xiyang* for seven times and went as far as to the Arabic Sea and the east coast of Africa. *Xiyang* (namely *West Sea*, “西洋”),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geography concept referring to Southeast Asia and the India Ocean Area where Zheng He's fleet ever visited. Economically, to keep the oversea trade balance, the Chinese vessels carried out with ceramics, silk and tea etc., to oversea markets, and brought back Gemstones, spices and gold/silver artifacts to China. This trade model existed for several centuries until the Portuguese and the Dutch established their trade network in east world in fifteen to sixteen Century.

Zheng He's subordinates, Fei Xin, Ma Huan and Gong Zhen, not only mentioned Zheng He's fleet's visiting to the above mentioned gemstones' origin places but also intentionally and detailedly described how the Chinese businessman traded with local people for gemstones in Ceylon (Sri Lanks), Guli (Calicut in India), Hormuz, Malacca and Indonesia. Here I want to particularly mention that, Liangzhuangwang lived at the same period with Zheng He, and his wife died at the same year of 1433 like Zheng He did. More importantly, we do find gold ingots purchased by Zheng He's fleet in the year of 1421 from Indian Ocean area! This is a strong evidence to support the opinion that those gemstones were import from *Xiyang* Area

Finally, I would like to briefly talk a little about the influence to Chinese culture brought in by the trade of gemstones. We can see Gemstones may be used as props for Daoism Wuxing Philosophy (Five Elements Thoughts). For example, in Dingling, we find gemstones selected and arranged as five groups, five colors, and five numbers for the Daoism burial custom.

作者简介:

姜波, 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所长, 研究员。

设计激活传统——建设与弘扬“海丝”文化

卢新燕

内容摘要：福建泉州作为中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在东西方文明交流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特定的海洋环境，特殊的海洋生产方式和地域历史文化的长期积淀，使“海丝之路”不仅承载着人类社会的文明，同时也体现了闽越文化、中原文化和异域文化的多元性融合。通过创意设计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提升国家软实力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文章从传统元素与现代设计相结合，数字化设计传播，特色文化的旅游，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等方面探讨建设与弘扬“海丝”文化。

关键词：海丝文化 创意设计 价值转化

引言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历代有所变迁，但只有泉州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认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徐闻古港，从公元3世纪30年代起，广州取代徐闻、合浦成为海丝主港，宋末至元代时，泉州超越广州，并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称为“世界第一大港”。明人顾炎武说过：“海者，闽人之田也”，丰富的海洋资源、特定的海洋环境、特殊的生产形式和深厚的历史积淀，构成了他们独特的海洋贸易方式。海上丝绸之路的最初形成是一种自发状态，基于生存的需要出海寻找生路，而现代意义的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是指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文化和经济的交往。

一、设计激活“海丝”传统服饰文化

福建是纺织服装大省，服装行业同时也是福建重要支柱产业之一，打造具有“海丝”文化地域特色服饰品牌，通过设计激活传统服饰文化，传承弘扬“海丝”精神。泉州传统服饰有着得天独厚“海丝”文化背景，是历史发展的见证，也是民族智慧的结晶，具有独特的海洋民俗文化特征，泉州惠安女、蟠埔女海洋文化特色的服饰已被收录到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泉州蟠埔女服饰以簪花围为特色，所戴茉莉、素馨等鲜花来自附近云麓村，而云麓村原先主人就是南宋阿拉伯人，泉州提举市舶司蒲寿庚其兄蒲寿晟的私家花园—云麓花园，从阿拉伯引进移植奇异花卉一直延续至今，蟠埔村的老年妇女还习惯在头上包扎头巾，也似阿拉伯式的“番巾”，鲜花和头巾数百年来成了蟠埔女头饰的时尚，同时也洋溢着浓郁的海洋文化气息，也足见“海丝”的渊源。随着现代生产方式的改变和审美标准的不同，传统服饰在现代都市中面对逐渐弱化的危机，传统穿戴习俗在现代生活方式中已逐渐消失的趋势，这也是历史发展的自然规律，如何让传统服饰文化在现代社会中重获生机，在“危”中寻找“机”遇，这也是时代赋予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

设计是文化、艺术与科学技术结合的产物，时尚设计就是将时尚元素融入设计生活中，时尚英文为 fashion，马上就联想到 T 台上的时装，“非遗”惠安女、蟳埔女服饰传承与弘扬，我们不仅要馆藏更要创意转化与时尚接轨，通过时尚设计激活传统文化。福建是服装大省，中商情报网数据显示：2012 年 1-12 月，福建省纺织服装、服饰业共计实现销售收入达 1348.85 亿元，同比增长 14.33%；利润总额为 128.57 亿元，同比增长 21.05%；行业毛利率为 18.9%。^[1]尤其是晋江、石狮的男装和童装品牌在全国服装行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得天独厚服装行业技术和背景，是我们打造海洋文化为背景的民族服饰品牌，开发传统服饰背后的文化内涵强有力的支撑。作为“非遗”服饰文化与时尚设计结合，传承与创作在传统文化与创意经济的结合中共存，福建柒牌男装推出的中华立领，才子男装的梅花演绎，都是身边打造传统服饰文化的典范。传统服饰文化借助时尚设计之手，把“非遗”传统服饰错落有致的拼接特点，落档宽腿的传统服饰元素，巧妙转化为时装的设计元素，赋予传统文化新的生命，蟳埔服饰以花为美，我们还可以推出花卉元素的设计，中国的花卉不仅品种丰富，而且各有各的吉祥之意，近几年来代表中国花卉寓意的设计元素一直受到国内外服装设计师的关注青睐，每年国际时装周上东方元素层出不穷，John Galliano 中国风的水墨元素，Valentino 将青花瓷中国风图案，越来越多的奢侈品牌开始重视中国这一潜在的消费市场，挖掘和提炼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的精华，东方文化已成为了时尚界的时尚主题。五千年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一直是我们的现代设计不断的灵感源泉，通过现代设计激活优秀的传统文化，“海丝”文化从各个方面走向世界。

二、数字化设计激活“海丝”文化及价值转化

海丝文化分为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大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相对于物质文化遗产而言的，她不是以独立的物质文化存在，而是赖于人类的活动而存在，载体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变化必然导致文化的变化，载体的消失无疑伴随着文化的消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指出：“各种形式的文化遗产都应当作为人类的经历和期望的见证得到保护、开发利用和代代相传，以支持各种创作和建立各种文化之间的真正对话”。随着科技的发展，3D 数字化技术传承，成为传统文化一种新的载体，运用录音、录像、动漫、网络多媒体等数字化手段，建立“非遗”档案和数据库，传统博物馆典藏扩展到数字化博物馆的演绎，通过录像、影视制作非物质文化遗产纪录片，挖掘散落在民间的蟳埔女服饰相关的传说故事，通过数字动漫、数字电影再度演绎，非遗传统文化还可以作为现代电影、动漫的创作素材，更有利于传统文化的经济价值的转化，借助新媒体手机、网络传播方式，数字化的传统文化载体更容易走向世界。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传承与保护，能让传统习俗活动的现场再现，让更多人直观了解“非遗”文化的精髓，传统文化通过数字化传播融入普通人的现代生活，数字化传承赋予“非遗”新的生命力。

数字动漫与“海丝”文化传播相结合，数字动漫以创意设计与科学技术为手段，实现对“海丝”文化的传播，在网络虚拟世界中的传播方式，特别是当下高速发展的电子商务，不仅可以带动“海丝”元素的品牌文化的对外交流，而且还会带来更高的经济效益，约翰·霍金斯在《创意经济》一书中明确指出，创意产业已不仅仅是一个理念，而是有着巨大经济效益。服装品牌传播靠的是品牌后面的文化，来引领消费者，这是一个文化的价值取向。目前国内和国际动漫发展方向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动画片的影视剧制作，通过动漫独特的幻想和表达方式，传达一种我们向往的生活方式

或生活态度，传递某种信息。二是开创动漫衍生产品市场，对动漫作品进行二次开发利用，设计衍生产品并推向市场，提升动漫作品的附加价值，国内外由动画漫画等衍生出的人物、文具、玩具、游戏软件和服装等已经形成一个巨大的“动漫产业链”。创建虚拟动漫“海丝”文化形象代言人，“海丝”文化故事的动漫剧演绎，还有“海丝”文化动漫衍生产品的开发等，运用数字动漫将抽象的传统文化可视化、形象化、动态化，使其更加具有认知性和传播性，在对外交流和推广中，形成海丝文化传播新的运作模式。

三、开发主题旅游设计——建设及弘扬“海丝”文化

“海丝”文化是地域文化的产物，海丝之路也是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载体，同时也是民族精神的外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世代相传的无形的文化遗产，同时也是一个民族古老生命活态的记忆，对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关键在于其“活态”的传承，包括生活方式、信仰、民俗活动等之间的相互“活态”存续的形式。开发海滨生态旅游，回归自然和走向海洋是时尚旅游的发展趋势，海滨自然景观区别不大，我们需要的是特色文化旅游，特别是民俗文化与自然景观的整合，轻松休闲、体验参与与互动的形式下，丰富和扩大传统文化在创意旅游中的内涵，更好地促进传统文化与创意产业的结合。泉州海丝之路的起点，渊源丰富的海洋文化为背景，拥有众多十分珍贵的有关“海上丝绸之路”的文物古迹，泉州的宋代古船、九日祈风石刻、郑和下西洋的碑刻等古文物，又见证泉州曾经有过的中外经贸文化交流的昌盛繁荣。

开发主题旅游，如建筑主题旅游，服饰主题旅游，海滨特色文化旅游等主题。以服饰文化旅游为例，泉州的惠安女、蟳埔女“非遗”渔女服饰文化为主题，作为“海丝”出海口的蟳埔村渔女的服饰是蟳埔村的最大特色，服饰文化是民俗文化村的品牌资源，以“非遗”渔女服饰作为民俗村的文化创意 LOGO 推向市场，走向世界，打造海洋文化为背景的特色民俗旅游，通过渔女服饰唤起对海上丝绸之路的记忆，同时也是区别其他旅游景点的重要标志，主题文化旅游是“海丝”文化背景渔女服饰传承的重要途径。我们不妨通过以下几点对服饰文化旅游价值提升的探讨，第一，通过典藏陈列方式来保护性传承，建立传统服饰陈列馆，渔女服饰作为承载千百年来地域传统文化的载体，保护是我们的责任。第二，通过服饰穿戴打造体验式创意旅游，体验渔女海洋生产习俗，体验渔女装扮习俗，游客穿着渔女服装，和渔女一起切身体验海上劳作、撬海蛎等独特生活方式；第三，举办各种传统的节事活动，节日盛装的需求促进了传统服饰的传承和发展，游客可以积极参与互动渔女各种民俗娱乐活动，将民俗文化与旅游休闲有机结合起来，让更多人加入“非遗”传承的行列。第四，开发相关服饰旅游产品，除服饰产品外还可以开发渔女题材首饰、包袋、画册、挂历、挂件、纪念币等纪念品。第五，打造以花为主题旅游活动或主题乐园，蟳埔女以花为美，以花为荣，以花为礼的习俗，一直广为流传，节日喜事都有送花的习俗，特别是蟳埔女婚俗，订婚、结婚都要准备上千串鲜花向亲友分送，鲜花被誉为美好幸福的象征，让游客徜徉在花的海洋里，借助产业组合的思路还可以带动海滨美食产业的附加值。“非遗”渔女服饰借助创意旅游，突破传统旅游资源的开发局限性，同时借助传统文化与旅游产业整合的思路，还可以开发特色地域文化，带动地域经济的发展。

四、抓住机遇建设弘扬“海丝”文化

福建是中国最早实行对外开放的省份之一，古刺桐港的出海口，昔日海丝之路的繁荣“千帆竞发刺桐港，百舸争流丝绸路”就是从这里走向世界。《中共福建省委关于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通过官方媒体全文对外发布，打造新的海上丝绸之路，进一步密切同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经贸合作，创新外经贸体制机制，开拓新市场。中国已成为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去年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额达 4000 多亿美元。新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仅是经济领域，同时也是文化领域的深入，国家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副司长王福州说，“中国和东盟的合作由经济领域逐渐扩大深化到包括非遗在内的其他领域”，中国—东盟中心秘书长马明强也表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密切人与人之间关系以及他们之间进行交流和了解的要素，它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2]中国和东盟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的合作对推动新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有着特殊的意义。在新海丝之路的建设中，积极参与中国—东盟非物质遗产传承活动，通过非遗的项目合作共同探讨非遗的传统文化的价值转化，利用外资渠道，打造福建特色旅游，创建海洋服饰的特色民族品牌，通过新媒体数字化推广，让传统文化走出国门等等，新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无疑给有着“海丝”文化传承与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结 语

福建泉州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神秘的“海丝之路”不仅带来了中西文化的交融，更是海洋文化源远流长的记忆，文化的传承就是我们民族基因和民族精神的传承，“海丝”物质和非物质文化与现代创意产业相结合，在传统文化资源中介入创意经济的元素，进一步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的价值转化，更好地实现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把传统文化运用到现代设计中去，赋予“海丝”文化新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2012 年福建省纺织服装、服饰业经济效益分析[EB/OL],
<http://www.askci.com/news/201302/17/1711472160578.shtml>.

[2]中国—东盟文化交流推进双边关系全面发展[EB/OL],
<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3/09-11/5274654.shtml>.

[3]记者王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我们的民族认同[N].解放日报.2008.3.08.

作者简介：

卢新燕（1974—），女，籍贯：安徽，闽江学院服装与艺术工程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艺术设计。

妈祖信仰与海上丝绸之路

连心豪

一、妈祖信仰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时代产物

(一) 汉代海上对外贸易只是不经常性的偶发现象

《汉书·地理志》记载：“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繒而往。……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

考古发现南越王时代的广州造船厂遗址。王杰《中国最早的海外贸易管理官员创置于汉代》，《海交史研究》1992.2。然而，位于雷州半岛的徐闻、合浦这则唯一的汉代航海、外贸史料，只能证明这是一种偶发的现象，还很不经常普遍。徐闻、合浦还只是孤立的航海、外贸点，尚未连点成线，即尚未形成“海丝之路”。

(二) 唐宋开启海上丝绸之路

南北朝之后，陆上丝绸之路转向海上丝绸之路。大食商人先至。

《宋书·蛮夷传》：“汎海凌波，因风远至”，“舟舶继路，商使交属”。《梁书·王僧儒传》：南海郡“海舶每岁数至”。

市舶制度：唐，创始；宋，完善；元，鼎盛；明清，衰落。

《唐会要·少府监》：“南中有诸国舶，宜令所司，每年四月以前，预支应须市物，委本道长吏，舶到十日内，依数交付价值市了，任百姓交易，其官市物，送少府监简择进内。”《资治通鉴·唐纪五十》：“广州素为众舶所凑”。

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为安南市舶使。

唐代多以节度使“兼领”市舶使，尚无专职与专门机构。市舶口岸：交州（交趾、交阯，安南）、广州、明州（宁波）、扬州。泉州刺桐港于唐末五代崛起。

宋代，设置了专门的对外贸易管理机构市舶司，广州（广南东路）、泉州（福建路）、杭州、明州（两浙路）11个 秀州、密州板桥镇（胶州）江阴、板桥、青龙镇、华亭市舶务

赵汝适《诸蕃志》志国：58个国家、地区。志物：脑子、没药、血竭、笃褥香、生香、笈香、乳香、龙涎香、沉香、檀香、降真香、丁香、苏合香油、肉豆蔻、蔷薇水、安息香等。《宋会要·蕃夷》“香料之路”、“瓷器之路”（泉州后渚宋代沉船、九日山祈风石刻，南海沉船、碗礁一号）。

元代口岸：泉州、广州、温州、杭州、庆元、澈浦、上海镇。

从众多市舶口岸的涌现、中外海上交通航线的开辟、稳定及其繁盛的中外贸易，海上丝绸之路终于形成。连线网络状，几乎同时产生。

(三) 郑和下西洋在某种意义上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顶峰

郑和《天妃灵应之记》碑：……自永乐三年奉使西洋……大小凡三十余国，涉沧溟十万余里。观夫海洋，洪涛接天。巨浪如山，视诸夷域，迥隔于烟霞缥缈之间。而我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者，诚荷朝廷威福之致，尤赖天妃之神护佑之德也。神之灵固尝著于昔时，而盛显于当代。溟渤之间，或遇风涛，即有神灯烛于帆樯。灵光一临，则变险为夷，虽在颠连，亦保无虞。及临外邦，番王之不恭者生擒之，蛮寇之侵掠者剿灭之，由是海道清宁，番人仰赖者，皆神之赐也。神之感应，未易殫举。昔尝奏请于朝，纪德太常，建宫于南京龙江之上，永传祀典。钦蒙御制记文，以彰灵贶，褒美至矣！然神之灵，无往不在。若长乐南山之行宫，余由舟师累驻于斯，伺风开洋，乃于永乐十年奏建，以为官军祈报之所，既严且整。右有南山塔寺，历岁久深，荒凉颓圯，每就修葺，数载之间，殿堂禅室，弘胜旧规。今年春仍往诸番，舫舟兹港，复修佛宇神宫，益加华美。而又发心施财，鼎建三清宝殿一所于宫之左，雕妆神像，粲然一新，钟鼓供仪，靡不具备。金谓如是，庶足以尽恭事天地神明之心。众愿如斯，咸乐趋事，殿庑宏丽，不日成之。画栋连云，如翬如翼，且有青松翠竹，掩映左右，神安人悦，诚胜境也。斯土斯民，岂不咸臻福利哉！人能竭忠以事君，则事无不立；竭诚以事神，则祷无不应。和等上荷圣君宠命之隆，下致远夷敬信之厚，统舟师之众，掌钱帛之多，夙夜拳拳，惟恐弗逮，敢不竭忠以国事，竭诚于神明乎？师旅之安宁，往回之康济者，乌可不知所自乎？是用著神之德于石……

妈祖是郑和下西洋的保护神，郑和下西洋又反过来促进了妈祖信仰的传播。

二、妈祖信仰与海上丝绸之路相伴而生

（一）妈祖庙是“海丝”的精神支柱

中世纪，科学尚未昌明。“走船跑马三分命”，只能借助神的力量。船上设置神龛舱，《东西洋考》卷九《舟师考》：司香专司祭祀天妃等舟神。

北洋水师靖远舰妈祖神位。朝鲜李朝档案《备边司誊录》记载，纯祖、宪宗时（清嘉庆、道光年间），查有山东蓬莱船一起、福建船二起，船上均带有天后神像。“拜码头”。

会馆是明清时期都市中的同乡、商帮同业团体。京都、省会，科举试馆。

会馆天后宫（福建会馆，天妃宫、天后宫、天上宫）。山陕会馆，关帝；江西会馆，万寿宫；四川会馆，川主庙；湖广会馆，禹王宫；岭南会馆，南华宫；江南总管府。

兴安会馆、泉漳会馆、汀州会馆、潮汕会馆、广西的粤东会馆、三江会馆、辽宁的山东会馆。

（二）妈祖庙是“海丝”的物质载体

伦敦大英图书馆藏清代漳州民间道教科仪书《安船酌献科》所载“下南”、“上北”针路沿途所经港口及朝拜的宫庙。其中著名的港口妈祖宫有：

下南：（漳州海澄）娘妈宫、海门、古[鼓]浪屿、大担、浯屿、连江、六鳌、州门、宫前、悬钟、南澳、大蓝袍、表尾、甲子、遮浪、龟灵、幞头门、厝香炉、□安庙、虎头门。

上北：大担、寮罗、东澳、金门、围头、永宁、大队[坠]、搭[獭]窟、宗[崇]武、湄州[洲]、平海、南日、宫仔前、古屿门、磁澳、定海、鸡母澳、三沙、三盘、牛头门、青门、舟山、宁波府、乍浦深港澳、上海港口、马头山、尽山头、清[青]州庙岛。

《粤海关志》卷五《图上》：总巡口、东炮台口、紫泥口、镇口口、澳门总口、乌坎总口、神泉

口、甲子口、碣石口、汕尾口、稔山口、墩头口、靖海口、澄海口、北炮台口、水东口、碣州口、芷蓼口、暗铺口、阳江口、钦州口、海口总口、铺前口、沙荖口、陵水口。

（三）妈祖庙是“海丝”的重要标志物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的妈祖庙：泉州天后宫（第三批），山东烟台福建会馆天后宫（第四批），宁波庆安会馆、安澜会馆（第五批），湄洲妈祖祖庙、永定西陂天后宫、云南会泽福建会馆天后宫、天津大直沽天妃宫遗址（第六批），天津天后宫、莆田平海天后宫、江苏太仓浏河天妃宫遗址、湖南芷江天后宫（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附属：蓬莱阁天后宫（第二批，蓬莱阁），锦州天后宫（第五批，广济寺古建筑群），洪江天后宫（第六批，洪江古建筑群），淮阴惠济祠（第六批，大运河）。

沿海：福建、江浙、环渤海、岭南（两广，含海南岛）。台湾。南海诸岛：西沙永兴岛猫注娘娘庙（巴婆庙）。内陆：长江流域（鄱阳湖，汉江，川江、岷江、沱江、嘉陵江、金沙江各水系）、云贵（蒙自、会理）、山西太谷。

三、妈祖信仰无远弗届

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妈祖信仰。童家洲：《日本、东南亚华侨华人的妈祖信仰》，《莆仙文化研究——首届莆仙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2年。26个国家和地区。

（一）东亚

朝鲜：妈祖始封“顺济”，缘于路允迪出使册封朝鲜。台湾学者陈正祥考证，平安道海岸曾建有妈祖庙。完岛等处也发现有妈祖宫庙遗迹。

琉球：明太祖为了便于琉球朝贡贸易，赐予通事及善操舟者闽人三十六姓。明清两代琉球册封使臣的记录中，多有妈祖显圣保佑的记载。他们将妈祖信仰传播到琉球。琉球有上天妃宫（久米村）、下天妃宫（那霸天使馆旁）和姑米山天妃宫。

日本：日本南九州鹿儿岛片浦港有“野间岳”（“娘妈山”的和音），传说天妃化身飘流抵岸。日本古籍《三国名胜图会》载，日本永禄十年（1566年）修建的野间岳神社西宫，内供祀妈祖神及千里眼和顺风耳神木像，证明此时妈祖信奉已传至该处。此后32年，即1598年前后，明末一位将军林北山，带着供奉的一尊高45公分木雕妈祖像、一尊高8.5公分妈祖小木雕像，以及陪神千里眼和顺风耳，还有两尊手持团扇的侍从等共五尊神像，携眷冒险乘帆船到片浦港的笠沙地方。后来林北山入籍日本，其家族蕃衍于片浦，其所奉祀的妈祖始终保持“林家娘妈”的称号。证明林北山一家，可能是把莆田湄洲屿妈祖信仰，原封不动地带到日本儿岛的。华侨三江帮、泉漳帮、福州帮船主们发起捐资，创建“唐三寺”兴福寺、福济寺、崇福寺。长崎崇福寺、兴福寺都有妈祖堂。长崎崇福寺观音堂内亦祀天后圣母。长崎“唐人坊”小天后宫，泉漳帮“八闽会馆”（福建会馆），福州帮崇福寺妈祖诞。横滨天后宫。

（二）东南亚

菲律宾：全菲华侨奉祀的小规模天后圣母庙或妈祖庙约百余家。描东牙示省达亚社天后圣母庙。南吕宋天上圣母宫、马尼拉马拉本福清宫、保安宫、隐尼宫，宿务妈祖庙、拉允省隆天宫。

马来西亚：马六甲青云亭、宝山亭，檳榔屿广福宫。据宋元末统计，马来西亚共有天后宫35

座：其中马六甲 8 座、槟城 6 座、霹雳 6 座、柔佛 5 座、彭亨 4 座、吉兰丹 2 座、雪兰莪 1 座、丁加奴 1 座、沙巴 1 座、沙捞越古晋 1 座。吉隆坡乐圣岭天后宫。马来西亚兴安会馆总会下属 27 个地方性兴安会馆。李天锡《海外与港澳台妈祖信仰研究》49 座。2008 年《马来西亚天后宫大观》第二辑李雄之序，以妈祖为正祀或副祀的会馆、宗祠或庙宇不少于 200 座。

新加坡天福宫，直落亚逸（马来语意为海湾），福建会馆。广惠肇帮宁阳会馆，潮州帮粤海清庙，永春会馆，海南帮琼州会馆，兴安会馆。林氏大宗祠九龙宫。水上交通行业公会，摩托船主联合会，红灯码头电船公会，炭商公会。义顺西河公司天后宫、木山圣母宫、星洲金榜山亭天后会、林借港亚妈宫、云峰天后宫、浮罗乌敏半港天后宫、后港联合庙天后宫。

印尼：廖内群岛丹绒槟榔天后圣母庙，爪哇岛三宝垄妈祖庙。1550 年雅加达金德院，北苏门答腊、丹戎槟榔、山口洋。加里曼丹、苏门答腊。

越南：《嘉定通志·风俗志·城池志》潘安镇柴棍铺（今属胡志明市）西天后庙，温陵（泉州）会馆，霞漳（漳州）会馆。平顺省旧省城郭外清代有天后祠。会安福建会馆、会安广肇会馆、潮州会馆，胡志明市天后宫。边和七府古庙、堤岸中华理事总会、三山会馆、义安会馆、琼府会馆。

泰国：段立生《泰国的中式寺庙》曼谷迈的集路七圣母祖庙（潮汕），石龙军路七圣母庙（琼侨），石龙军路新兴宫（福建海澄），素叻府天后圣母庙（琼侨），洛坤城天后宫（潮州饶平），洛坤府达努普区莱姆村天后庙。曼谷玄天上帝庙、素叻府顺福宫、素叻府班多本头公庙、北揽府那空砂旺市本头古庙、宋卡城隍配祀天后。林氏天后宫理事会、天后宫“连修堂”。

缅甸：丹老天后宫、勃生三圣宫、东吁福元宫。

（三）其他地区

美国檀香山、旧金山、大华府地区，加拿大维多利亚市等有清末所建奉祀妈祖的馆庙。如美国旧金山市普斯特的列圣宫（天后庙）由华侨亚清创建于 1850 年，加州威化委镇的云林庙（天后庙）重建于 1874 年；还有华侨富户邝利家族在加州奥罗维尔所建合祀妈祖的列圣宫建成于 1873 年；华府肇庆会馆重建于宣统三年（1911 年），四楼为天后庙。加拿大维多利亚的中华会馆建于光绪十年（1884 年），奉祀天后等神。在巴西圣保罗、阿根廷、法国巴黎、挪威、丹麦、墨西哥、新西兰、澳大利亚、南非、毛里求斯等地都已有天后宫或会馆天后宫等妈祖祀奉场所。

作者简介：

连心豪，厦门大学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教授。

弘扬妈祖文化正能量， 构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文化枢纽

黄瑞国

内容摘要：妈祖文化是活态文化，穿透千年历史风云仍在各领域显示出活力，她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瑰宝，是华人华侨与台湾同胞的文化纽带和精神桥梁。本文论述了海洋文明是妈祖文化的重要源头，简述了妈祖文化传播世界各国的概况，提出妈祖文化是海上丝绸之路系统传播中华主流的起点人文交流的先行者，是东方海洋文化的光辉旗帜的看法。妈祖文化在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可以起到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先行作用，可充分发挥妈祖文化民间外交的作用，以妈祖文化为纽带构建世界妈祖文化经济圈，建议我省要举办常年性的《妈祖文化论坛》，主题或以妈祖文化与海洋文明，或以妈祖文化与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或以妈祖海洋和平发展等。同时，建议我省与东南亚国家及台湾地区开展以妈祖文化为龙头的文化交流以及冠以妈祖文化产业园的各类产业合作，加大妈祖文化产业建设力度，加大开发妈祖文化的朝圣旅游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旅游力度，主打“全球华人祭拜妈祖圣地——中国湄洲”主导品牌，紧紧围绕“世界妈祖文化中心”的旅游总体形象，打造妈祖文化特色旅游品牌和线路等。把我省建设成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文化枢纽和妈祖文化产业的龙头，让妈祖成为推动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外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交流的使者。

关键词：妈祖文化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文化枢纽

妈祖信仰肇于宋、成于元、兴于明、盛于清、繁荣于近现代，绵延千年而历久弥新，她是一种活态文化，蕴涵着丰富的历史、社会、人文、民俗、宗教、经济、政治等广泛而深刻的内涵与价值。妈祖信众分布世界 33 个国家和地区，信众 2 亿多人，尤其在东南亚及台湾地区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妈祖文化对祖国的统一及联络华人华侨起到重要的精神与文化纽带作用，习近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三十九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加强妈祖文化建设作出了重要指示。2009 年 9 月“妈祖信俗”成功入选联合国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文化财富。国外学者纷纷对此研究，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第一篇研究妈祖文化的论文是 1842 年新加坡传教士尚德撰写的《妈祖婆生日之论》，我国学者的妈祖文化研究第一篇学术论文是 1916 年蜚庵撰写的《台湾妈祖庙游记及天妃考略》等。据不完全统计，当前全国有三十三所高校和研究机构开展妈祖文化研究，福建、天津、山东、海南、广东、上海、江苏、辽宁、台湾等十多个省市设有三十多个妈祖文化研究会，美国、法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等十多个国家的学者开展妈祖文化研究，有关妈祖文化的著作

近三百部，学术论文三千多篇，硕博论文三百多篇。妈祖文化源于中国属于世界。

一、妈祖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守护神

1. 海洋文明是妈祖文化重要源头

妈祖信仰诞于莆田有其必然性。从妈祖信仰诞生的历史、经济背景来看，当时宋朝受到北方金、辽等政权的打击下，原有的陆上向欧洲腹地的经贸被切断，这对偏隅于南方的宋朝政权的经济来说是致命打击，出于国内政权的稳定性，势必要大力发展海上贸易，据有关研究表明，公元1128年海上贸易的收入占宋朝国家总收入的20%。¹

莆田背倚戴云山脉，面对太平洋，海岸漫长，湾阔港深，海运发达，当时著名的港口有：枫亭港（太平港），白湖，宁海，秀屿港，贤良港等，海路发达，莆田自古就有地少人多的特点，面向大海谋生是必然的手段。正如宋代著名诗人刘克庄在《送王南海》二首诗句所说的：“土荒耕地少，海近贩人多”。古代莆田造船业发达，明浙江巡抚张延登《请申海禁疏》（载《明季北路》卷五）记载：“福建的延平、长汀、邵武、建宁四府出产并输出松木、绿棉，驾海出洋往往租借兴化府的大海船”。²所以，海外贸易昌盛。北宋名臣蔡襄著的《荔枝谱》中记载：“荔枝水陆浮转，以入京师。外至北戎，本夏，其东南舟行新罗、日本、流球，大食之属，莫不爱好，重利酬之。”宋代莆田还有瓷器等输往日本、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等地³。这些宋代莆田的海洋活动为妈祖信仰的产生提供了基础条件。

妈祖文化之所以从莆田走向世界，是由多种因素所决定的，概括而言，神话思维是妈祖信仰诞生的摇篮；海洋经济是妈祖文化形成的经济基础；农耕文化与海洋文化的交融是妈祖文化形成的文化基础；妈祖生平事迹是妈祖文化形成的心理基础；历代统治者的重视与敕封是妈祖文化形成的政治基础；历代民众的信仰是妈祖文化形成的社会基础；历代文人名士是妈祖文化形成的有力推手；妈祖文化的包容性是妈祖文化历久弥新的动力源泉；妈祖文化的内涵与精神实质是妈祖文化得以传承与弘扬的决定因素；海上丝绸之路是妈祖文化传播世界各地的途径。⁴

2. 妈祖文化在海上丝绸之路的传播

公元987年妈祖仙逝后，湄洲人立庙祭祀。据明黄仲昭《八闽通志》中记载，宋真宗咸平二年，即公元999年，在平海澳建有一座妈祖庙。宋哲宗元祐元年，即1086年，在宁海镇（今属涵江区）建有圣墩祖庙，宁海当时是商业、渔业十分繁荣的港口，被称为“南北洋货物进出的内外港”，从这里货物通往沿海各省乃至东南亚国家，至此，妈祖信仰向国内外传播开来。

据史载，珠江口的东莞县在宋代创建了妈祖宫；杭州当时是南宋的都城，在绍兴民间建有妈祖宫（艮山祠）；泉州是宋代的最大海港之一，泉州的天后宫建于庆元二年；浙江宁波也是南宋的主要海港之一，在绍熙二年（1191年）创建了妈祖宫；上海于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也建了妈祖宫；天津的天后宫始建元代至元年间，泰定三年（1326年）重新敕建；江苏太仓刘家港庙建于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这里是漕运的出海口，同时也是郑和下西洋的出发点，郑和纪念馆也建于此；元

¹ 陈炎. 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10月第2版, 第37页。

² 陈光荣. 寻根揽胜兴化府[M]. 福州: 海风出版社, 2000年10月第1版, 第136页。

³ 蔡国耀. 闽台妈祖[M]. 福州: 海风出版社, 2013年5月第1版, 第12页。

⁴ 黄瑞国. 《妈祖学概论》[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3年8月第1版, 第3页。

朝廷重视海上运输和贸易，在各大漕运当地建了一批妈祖行宫，至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年），列入当时国家祀典的妈祖行宫的有天津、淮安、苏州（平江）、昆山、太仓、杭州、绍兴、宁波、台州、温州、南平、福州、莆田（白湖）、莆田（湄洲）、泉州等十八个。雍正十一年（1733年），诏令各省督抚并府州县行春秋二祭，至此，除少数民族地区外，所有省会和许多郡县纷纷修建了妈祖宫。

公元1123年，给事中路允迪奉旨出使高丽国，途中脱险，认为是宁海圣墩妈祖显灵护航，上奏朝廷，宋徽宗下诏赐予宁海圣墩妈祖庙号“顺济”，妈祖从此得到官方的正式承认，由此而后的历代皇帝的三十六次敕封推进了妈祖信仰在国内外的传播。明洪武初，明太祖“敕封闽人三十六姓”赴琉球定居，主要担任通事（翻译）、教授四书五经等，后在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建有妈祖宫。据日本黑田安雄教授说，在日本民族中信奉妈祖除有史可稽的片浦林家妈祖外，尚有北半岛的大间浦、茨城县北部的矶原、同县中部的珂奏、萨摩半岛的坊津。在东南亚的国家，有马六甲的青云亭创建于明代，宝山亭创建于清代（1795年）；新加坡天福宫创建于1850年；马来西亚的槟榔屿的广福宫创建于清代（1800年），泰国的曼谷石龙军路的圣母庙创建于1856年，并以妈祖为街道名称；越南胡志明市穗城会馆，始建于清乾隆二十五年（1761年）；缅甸南部丹老统衙街的丹老天后宫，创建于1824年；印度尼西亚的南班登安街也建有妈祖庙，其创建于1856年。东南亚国家普遍建有妈祖庙，她们是随着海上丝绸之路建立的，同时也极大地推动海上丝绸之路的不断发展。

在妈祖信仰世界性传播中，当数郑和七下西洋影响力最大，从郑和所立的《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碑》、《天妃之神灵应记》碑对历次下西洋的记载中，表明了七下西洋的宗旨是“宣德化而柔远人”，郑和是中国政府的和平使者，他带去的是先进的中国文化、科学技术与丝绸、瓷器及其它手工业品，带回来的是各国的文化、香料、药材和奇珍异宝。可以说，郑和七下西洋在所到达的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印度尼西亚、越南、文莱、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印度、东帝汶、伊朗、孟加拉、索马里、马尔代夫、也门、沙特阿拉伯、莫桑比克，阿曼等国家），不仅留下了中华民族的物质形象遗产——妈祖宫庙，同时也留下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形象遗产——妈祖文化，纵观中国与世界交流史册，这种现象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文明的交流史册上也属罕见的。

从妈祖文化传播史来看，先是民众自发，后是官民共同推动；先是从事海河活动的人群，后扩展到各个行业；先是以华人华侨为主，现渐渐扩展到其它民族或国家；先是国内的沿海城市，后扩展到内陆各地；先是东南亚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日本等国，后是世界各地如美国、法国、挪威、丹麦、加拿大、墨西哥等国家。据报道，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加州、纽约州、夏威夷及首都华盛顿，澳洲的悉尼、墨尔本，巴西的圣保罗，南非的开普敦，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等城市也先后从台湾北港朝天宫和湄洲祖庙分灵神像，建造庙宇供奉。南美洲的巴西近几十年由台湾去的华侨骤增，因此妈祖信仰在圣保罗市也得到传播。法国巴黎的“真一堂”更尊妈祖为世界和平女神。

3. 妈祖是东方海洋文化的光辉旗帜

（1）妈祖是历史道德典范

千百年来民众把向往至亲、至善、至美、至真的人性以及追求美好理想的愿景寄托在妈祖身上，把妈祖塑造成一个完美无缺的历史道德典范。纵观妈祖的传说，显示出崇尚自由和平，诸如郑和下

西洋等；家国情怀，诸如井泉济师助施琅收复台湾等；抵御外侮的民族精神，诸如破倭寇等；舍生取义，诸如海上救难等；仁爱之心，诸如治病济贫等；和谐包容之心，诸如化恶为善等；孝悌之道，诸如伏机救亲等等，所以，应从儒释道文化与海洋文化两方面阐述妈祖文化，如此，可知妈祖的精神是“仁爱、正义、勇敢、和平、自由、开放、多元、包容、共赢”。这种精神内涵是全人类永恒追求的美好理想，建立起这种认识，对全面、准确地理解妈祖精神，对提高妈祖文化应有的历史文化地位及在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作用有着重要的意义与作用。

（2）妈祖文化的本质是圣贤文化

中国自古就有传承与弘扬圣贤文化的传统。历史上，妈祖确有其人。从妈祖的传说与现实来看，妈祖信仰中有道教的成分，如天人合一的观念；也有佛教的成分，如慈悲为怀的观念；更多的具有儒家的成分，如孝悌之道，似道非道，似佛非佛，似儒非儒。妈祖不属于任何一种宗教，她没有宗教的教义教规，也没有固定的教徒等。妈祖文化与宗教文化是属于不同性质的文化，但诸教却热切把妈祖文化纳入自身文化体系的一部分，如佛教、道教、天主教等。同时，诞生于海洋文明的妈祖文化自然也具备海洋文化特性，诸如进取性、外向性、开放性、多元性、兼容性和生命的本然性等。在妈祖事迹中体现的博爱、自由、正义、和平的宝贵特质，具有普遍的文化人类学意义，具有共有的“人类主体价值观”，尤其是“和平”的理念，表达了全人类共同的心声，具有世界文化的共性。总而言之，是妈祖的德行感动了民众，后来人把妈祖塑造成为心仪的圣贤，寄托着人类的理想与向往。

（3）妈祖文化是海上丝绸之路系统传播中华主流文化的使者

从我国与国外交流史来看，宋代以前海上丝路以丝绸、瓷器、珍宝、香料乃至宗教均属个别的文化交流，而自宋以降，随着先人漂洋过海，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国家无不留下妈祖大量的史迹、文化等，这些历史印记最为系统与完整地展示了中华文化——儒释道与海洋文化的内涵，这是中华主流文化系统走向世界的生动写照，难能可贵，绝无仅有的，从这个意义而言，妈祖文化是海上丝绸之路系统传播中华主流文化的起点。

从妈祖文化在各国的存在而言，妈祖具有民间外交的功能与作用，是文化交流的使者。

其一，妈祖是官民同敬的圣贤，从传播史来看，妈祖信仰最早是从从事海上贸易的船工、商人等传播开来的，妈祖来自于民众，又在民众中扎根，妈祖精神是人类向往和追求的理想人格模式，展示了普通民众的美好理想，在民众心目中，妈祖福佑四方的万能保护神。

其二，妈祖信仰具有草根性的特点，妈祖拥有广泛的民众基础，使得不同文化背景的民众在同一妈祖信仰的旗帜下容易沟通、理解与达到共识。

其三，世界各地的妈祖宫庙是具有强大的号召力。一般而言，妈祖宫庙的主持人由所在地颇有名望的人士担任，无论在政界、商界、企业界或在民众中拥有广泛的影响力，他们是理想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热心传播者。

其四，世界三十多个国家的妈祖庙是一座座中华文化的展示馆。《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指出：“我国文化遗产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是各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全人类文明的瑰宝”。妈祖宫庙的一砖一瓦充满了

中华文化的元素，宫庙里的一笔一画讲的是中国故事，庙里供奉的有妈祖，也有或是儒教，或是道教，或是佛教的神明，或是古代圣贤，充满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

其五，世界各地的妈祖宫庙是永久性的传播中华文化的讲坛。一般而言，所有侨居海外的各国华人小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以妈祖庙作为同乡会或商会，是各国华人的政治文化及小区中心，不仅是各国华人的精神殿堂，还是所在国妈祖信众的朝圣之地。所以，妈祖宫庙的存在是长久的，这就为宣扬中华文化提供了永久性的讲坛。

其六，世界各地拥有大批虔诚的妈祖信众。世界各地都有华人区，100%地成了妈祖信仰区，这种影响扩大到亚裔等其他族群。同时，妈祖信众则是与当地民众接触最多，最为亲近的群体，对宣扬中华精神最为接地气，最近人心，最易取得“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历史表明，数百年来，存在各国的妈祖文化是可以让不同文化背景的民众达到相互沟通和理解，起到文明交流互鉴的作用。可以说，妈祖千百年以来在默默践行着自由、文明、包容、和谐，正义、合作共赢的海上丝绸之路的精神，传播着中华文明。如今，随着更多的国人走向世界，妈祖文化的影响已扩大到更多的国家。如能对妈祖文化善加弘扬，势必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软着力插上腾飞的翅膀，从这个意义来说，妈祖文化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华文化交流的使者。如果和国家推行的“孔子学院”一道共同传播中华文化，最大程度寻求人类价值观之中的存有共识，建立起中华文化与各国文化交流的平台，真正实现中华文化“走出国门与走进民众心里”的目标。¹

妈祖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她荟萃了儒释道文化与海洋文化的精髓，具有世界文化的共性，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正是妈祖文化能穿透千年的历史风云，仍为当今世人所敬仰的魅力所在，妈祖文化是东方海洋文化的光辉旗帜。

二、弘扬妈祖文化的正能量，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枢纽

弘扬妈祖文化正能量要做到汲其精华、弃其糟粕，要认识到妈祖文化其本质上是圣贤文化，要建立起妈祖文化“走出国门与走进民众心里”的机制，要给学术团体与社会团体更多的政策与资金支持，充分发挥湄洲妈祖祖庙具有全球妈祖信众凝聚力的作用，广泛开展国际妈祖文化交流，使之成为沟通海上丝绸之路各国人民心灵的平台。

1. 面向世界强力推动妈祖文化宣传与交流的力度与广度

当前，在加强对台妈祖文化交流的同时，也要主动加强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妈祖文化交流，在交流中增进各国文化的相互了解与共鸣，同时，不仅仅把妈祖作为朝圣的对象，更要把妈祖文化的真谛，即把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开来，通过妈祖文化给各国带去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如此，才能做到文化相通，民心相通。具体做法：其一以湄洲妈祖祖庙或贤良港妈祖祖祠为龙头，大力开展与世界各国及国内有影响力的妈祖宫庙或组织的朝圣或寻根活动；其二重视妈祖文化的宣传，办好有关刊物、网页等，并与各国妈祖宫庙开展交流；其三，创办妈祖学院，定期举办祈福暨妈祖文化讲习活动，把海上丝绸之路的传说——妈祖的故事讲给世界；其四，适时召开世界性妈祖祖庙朝圣或妈祖回娘家活动。等等。

¹ 赵婀娜。2014年10月9日。第17—19版，人民日报。

2. 常年举办妈祖文化论坛

(1) 举办“妈祖海洋和平发展”或“妈祖文化与海洋文明”等专题论坛

妈祖文化源头之一是海洋文明，上个世纪联合国有关组织授予妈祖为世界海上和平女神，在妈祖故里湄洲岛创立一民间性、国际性的海洋和平发展论坛，定期召开会议探讨研究解决国际间存在问题的方案，为政府间海洋事务合作提供思路，营造氛围。论坛的性质是官方授权的民间、定期、定址、开放性的国际性会议，论坛的宗旨是弘扬妈祖的和平精神，以和平协商、平等互惠、合作共赢为主旨，立足东南亚，面向海上丝绸之路及世界各国，推动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和世界海洋事业和平发展，推动相关各方海洋开发与保护事务的对话、交流、协调与合作。并可以考虑设立国际性民间组织并以它的名义设立“妈祖海洋和平发展”奖项，奖励对象是对海洋和平发展做出贡献的个人或民间组织（包括台湾地区），以促进台海和平以及我国东南海域的和平共处，开创和谐海洋的新局面，为建设海上丝绸之路做出应有贡献。

(2) 举办国际性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妈祖文化”论坛

海上丝绸之路与妈祖文化如同血肉不可分割，福建有着不可替代的妈祖圣地的优势，又有丰富的海外华人华侨的人脉，可以充分发挥妈祖在海外华人华侨心中具有崇高地位的作用，探讨如何发挥妈祖文化在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的纽带作用，切实加强各国经济文化的联动。

3. 加大妈祖文化产业建设力度

(1) 妈祖文化的朝圣旅游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旅游开发

主打“全球华人祭拜妈祖圣地——中国湄洲”主导品牌，紧紧围绕“世界妈祖文化中心”的旅游总体形象，打造妈祖文化特色旅游品牌和线路，加强形象宣传与品牌推广，开拓市场，整体推进，积极争取纳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黄金旅游线路之中，并努力把湄洲岛建设成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旅游线上的高含金量的旅游圣地，把妈祖文化旅游极力推向世界。

其一，精心设计为期2天的“湄洲祈福海景游”的岛内朝圣旅游产品，为之要精选朝圣的内容，注重朝圣的内涵；整合岛内旅游资源，如对湄屿潮音、鹅尾神石园(地质公园)等进行景点的精选并根据传说串编成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对岛内旅游的管理体制进行有效地整合，创新和理顺旅游多头管理体制和景区运行机制，整合旅游资源，组建新的旅游发展集团公司；增添黄金沙滩的游玩项目，尤其是夜晚的娱乐节目，形成白天朝圣看海，晚上看富有妈祖文化特色的戏剧或歌舞剧的文化与旅游相融合的良好氛围，以期吸引游客；积极筹建海上丝绸之路（万国）或港澳台风情购物一条街等等，总之，打造以朝圣、吃、住、行、游、玩、购、娱等一条龙的旅游产品，同时要特别重视在岛内建立起较高水平的医院，以解除游客尤其是台湾与东南亚国家游客的后顾之忧。让湄洲岛成为朝圣之岛、祈福之岛、安全之岛、快乐之岛。

其二，精心设计以湄洲岛为主，兼顾岛外的妈祖民俗文化游，或是听古（名）人讲妈祖（诗韵妈祖，读古诗拜妈祖）、妈祖民俗文化体验游、妈祖民俗乡村风情游等旅游项目，时间可以设计为2—3天。

其三，积极筹划妈祖信仰圈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旅游精品产品

方案一：与沿海省市知名妈祖宫庙的有关部门联谊，开展集妈祖朝圣、文化景观、风土人情、

自然风光为一体的旅游产品，以“妈祖号”游轮的名义开设与周边沿海的城市如上海、广东、天津、海南等妈祖信众比较多的城市之间的海上旅游路线：

方案二：在清朝，就已开辟了一条朝圣航线，即湄洲——澎湖——台湾的航线。如康熙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闽浙总督姚启圣到湄洲祖庙祈风，九月初五到澎湖，后再到台湾颁发恩敕，十五日从台湾返航。¹我省应增开与台湾台中市的航班，与台湾的中、南部的妈祖信众广泛开展认祖寻根、朝圣旅游交流等活动。

方案三：积极筹划与东南亚国家合作开展海上丝绸朝圣旅游的产品。加快妈祖文化创意产业的开发，如妈祖动漫、电视、电影、戏剧、文学等的开发。一个电视剧可以带红一片经济，如《少林寺》的一部电影让中国的功夫红遍海内外，并创造了“少林”经济。打造《踏寻妈祖的足迹》等类似的电视纪录片，用光影记录辉煌的妈祖文化史迹，把国内外妈祖宫庙的当地化的妈祖民俗文化、当地风土人情、自然风光，华人华侨的奋斗史等结合起来，拍成系列电视片，则可以起到海上丝绸之路民众的心理共鸣，收到良好的社会经济成效。

（2）海上丝绸之路妈祖信仰圈的经济联动建设

①建立我省与东南亚妈祖信仰圈的沿海国家经济联动机制

以妈祖文化为纽带，构建与东南亚国家紧密型的经济联动机制，促进我省产品的开发和贸易与妈祖文化观光旅游业的发展，如实行股份制建设世界妈祖文化观光园或打造国际性妈祖民俗体育产业等。

②建立我省与台湾妈祖文创产业联动机制

台湾妈祖文化人口占其总数的四分之三，同时台湾文化创意产业比较发达，利用这些优势，推进闽台妈祖文化产业的合作，诸如旅游、动漫、广告、电视或以妈祖冠名的各类产业园区或在台商较集中地区筹建妈祖文化园等，据台湾台中市文化部门规划，有意投资 200 亿台币建立台中妈祖文化产业园，以打造一个让世界妈祖信众朝拜与休闲的乐园。莆田市有万众信仰的妈祖祖庙和祖祠，且与台中仅距 72 海里，有着海上交通的便利，如果两岸加强合作，则商机无限，极大促进闽台合作。

妈祖文化是东方海洋文化的光辉旗帜，我省是妈祖文化的发祥地，具有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优势，充分发挥其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先天条件，实现与各国人民人文交流、文明互鉴的文化软着力，把我省建设成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文化枢纽和妈祖文化产业的龙头，让妈祖成为推动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外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交流的使者。

作者简介：

黄瑞国，莆田学院教授。

¹ 陈光荣.《寻根揽胜兴化府》.福州：海风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138页。

泉州重启“海上丝路”的战略思考

林华东

内容摘要：刺桐港宋元时期是世界一流的港口，泉州这座“光明之城”历史上曾经是“市井十洲人”的国际化大都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泉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党中央国务院要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泉州义不容辞应该成为海上新丝路的先行区。作为“东亚文化之都”，泉州已经拥有“自强创新的实力和爱拼敢赢的精神、坚实的历史积淀和对外交往能力、现实的发展空间和地缘优势、联手台湾和两岸共赢的有利条件、海外侨商资源和人脉优势”等有利条件；泉州要建设新海丝先行区，需要争取重建国家级刺桐港和泉州自贸区等方面的政策支持，需要着力打造国家级“海上丝路研究院”和“海上丝路刺桐论坛”等大型活动平台。借助“海丝先行区”泉州将在推动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为海丝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和平安谐发展做出贡献。

关键词：泉州“海上丝路” 战略 思考

一、历史影响与启示

2000 多年前，以中国徐闻港、合浦港等港口为率先起点，经历千余年的海航努力，终于在东南沿海的泉州，成就了世界一流的刺桐港，构建了全球性的贸易网络。泉州也因之成为联合国认定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中国在与世界展开商贸活动的同时，推动了 19 世纪之前世界的和平发展。2000 多年后的今天，一条“新海上丝路”的战略构想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正式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这项战略必将开启一场全新的中外文明对话，泉州也将在这个历史机遇中重启海上丝路的辉煌。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从中国东南沿海，经过中南半岛和南海诸国，穿过印度洋，进入红海，抵达东非和欧洲，成为中国与外国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海上大通道，并推动了沿线各国的共同发展。中国输往世界各地的主要货物，从丝绸到瓷器与茶叶，形成一股持续吹向全球的东方文明之风。尤其是在宋元时期，中国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大幅提升以及指南针在航海中的运用，更是全面提升了商船远航能力，私人海上贸易得到全面发展。以泉州为代表的中国“海上丝路”商贸，同世界 60 多个国家有着直接的往来。泉州那种国际化大都市的繁荣景象，那种“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热闹场面，透过意大利马可·波罗和阿拉伯伊本·白图泰等旅行家的笔墨，引发了西方世界一窥东方文明的大航海时代的热潮。

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中国还传播着我们的民族工艺和儒道思想，对“海上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以及欧洲各地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甚至掀起了“中国热”。除了丝绸，瓷器和茶叶对世界产生

过巨大的影响。

那时，俄国、法国、埃及等很多国家都崇尚收藏中国瓷器或以之为外交礼品，把中国的瓷器作为身份的象征或类似黄金的代货币。在中国瓷器的影响下，世界各国的制瓷工业得到发展，从阿拉伯国家仿制中国式的瓷坛，到波斯结合中国瓷器工艺创造出的波斯陶器，之后泰国、越南、埃及、荷兰、法国、德国、俄国、丹麦、英国、西班牙等国也都掌握了制瓷技术，甚至通过中国瓷器工艺与本国文化的结合，创新出许多产品。随着这些国家崇尚中国瓷器之风的盛行，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观念随之改变。值得注意的是，崇尚中国瓷器的观念也融合到了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文化之中。

随着茶叶的输出，中国茶文化也传播到世界各地，从生活方式到思维理念对许多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公元9世纪日本刮起一股“弘仁茶风”，贵族间出现了模仿中国人品茶的风潮。公元12世纪，日本僧人将中国茶种带回日本种植，经过长期的本土化，最终形成独特的日本茶道。17世纪初，荷兰率先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将茶叶输入欧洲，开始推行饮茶之风。18、19世纪，茶叶在英国开始由奢侈品转变为大众饮品，饮茶也成为英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发生在1773年12月16日的著名的美国“波士顿倾茶”事件，埋下了美国人反英斗争的种子。2年后，美国爆发了独立战争。1776年美国发表《独立宣言》，7年后英国终于承认美国的独立。

海上丝绸之路在将中国的丝绸茶瓷和其他商品推向世界的同时，为我们留下了中国经略海洋、走向世界的伟大历史，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早期的开放水平和推动全球发展的巨大贡献。

明清以来，朝廷开始放弃经略海洋，海上优势终于渐渐失去，主权开始遭受践踏，领土被步步分割。就在这段苦难的历史中，闽南人继续创造维护海权的神话。明清时期闽南传奇商人李旦、颜思齐和其后的郑芝龙、郑成功父子，不但执掌当时亚洲最大的民间航海贸易，而且建立了一支庞大的贸易集团。他们在维护祖国东南海权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尤其是郑成功在抵抗外来侵略者、收复台湾上功绩显赫。清初泉州人施琅在《恭陈台湾弃留疏》中，透过台湾全面陈述了中国海防的意义和经略海洋的必要，在清初的海洋经略中产生了关键性的作用。历史上还有一大批闽南人筚路蓝缕，在“海上丝路”沿线国家定居，开发生产。通过“侨批档案”（2013年列入“世界记忆名录”），就足以证明闽南华侨华裔艰辛的足迹。目前，在海外生存发展的闽南籍华人大约有2000万人。他们作为关心祖国富强的华侨华裔，也是新世纪我国联系海外、重塑“海上丝路”的一支重要力量。

历史证明，海上丝绸之路曾经带动中国经济文化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国际化视野的开放交流也因此成为世界发展的思想共识；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推动了世界的进步和发展。当下，中国正在启动与东盟及世界各国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战略，历史上创下的海洋经济观念、和谐互惠意识、多元共生意愿，将为国家战略发展再次提供丰厚的历史基础。曾经的海丝文化借助商贸活动把中华文明传递给世界，并且展现了中华文化和谐共荣的思想；曾经的海丝文化向世界开创了公平友善的商贸样式，使中国成为东亚文明的中心；曾经的海丝文化通过航海的艰辛检视了中华民族坚韧不拔迎接挑战的智慧；曾经的海丝文化证明了中国经略海洋的能力和水平。“友善、包容、互惠、共生、坚韧、创先”的“海丝文化”内涵，对于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对于中国与世界的

深层次互动，无疑具有深刻的启迪和极其重要的当代意义。¹

二、当下机遇与优势

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重要演讲时明确提出，中国致力于加强同东盟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愿同东盟国家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面对这样一个利好的消息，泉州能否先行一步？泉州曾经有过历史的辉煌，创造了世界第一大港刺桐港，“光明之城”成为国际化大都市。党中央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路，其中的内涵远比古代更具有深刻的意义和更丰富的内容。据商务部研究院产业国际化战略研究所所长张威介绍，2013年海上丝绸之路国家（不含中国）人口约26亿，GDP总值达到7.4万亿美元，与中国的贸易总额达到7938亿美元，占2013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9.2%。²由此可见，发挥海上丝路的作用，具有战略性价值。2013年，泉州的GDP总值为5200多亿元，其中很多都是面向海洋的实体经济，民营企业占90%。当年，泉州的进出口贸易额达到291亿美元，其中55%是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除了传统的海洋渔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水盐业，临港工业、港口物流业、滨海旅游业等产业发展迅速，海水综合利用、海洋新能源、海洋生物医药业等海洋新兴产业也正加速兴起。泉州千余年来始终未放弃海上丝路的联通和海洋经济。

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在国内引起全面的躁动，无论是沿海城市，还是内陆省份，无不纷纷启动建设规划。就福建省来说，当下的泉州，从城市体量到城市发展水平，与厦门、福州等地相比仍存在巨大的差距。“福厦漳泉”都在力争先行！走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时代的泉州，能否借力国家战略重现辉煌？泉州市副市长陈荣洲在接受凤凰城市采访时说：“我们第一时间提出，在中央的战略指引下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不叫示范区，而叫先行区，意思就是我们要尽快搭上这辆不排他的快车，和大家一起走。”³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泉州先行一步，并不意味着一直领先，但如果不能先行一步，也许就会落伍！其实，泉州建设先行区已经具备许多优势。

（一）有自强创新的实力和爱拼敢赢的精神

泉州人历来就有创业发展和商贸能力，形成了令世人叹服的爱拼敢赢、重义求利的风格。⁴创造出许多发展奇迹，目前单上市公司已达87家。改革开放以来，泉州凭借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创造了经济发展的“泉州模式”，获批国家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综合改革试验区”和省级“民营经济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全国率先开展多领域改革试验。在2013年泉州进出口总额291亿美元中，与海丝沿线国家的进出口贸易额占52%，累计利用外资41.5亿美元。泉州纺织服装、鞋业、石化三大产业销售收入达4600亿元。截至目前，泉州已在海丝国家、地区投资或设立办事处27个，泉州港已与23个国家和地区开辟了国际运输航线。这些都为东盟、中东国家的经贸往来和产业转移提供巨大的潜能和发展空间。

（二）有坚实的历史积淀和对外交往能力

¹ 此节参阅林华东《海上丝路的影响与启示》《人民日报》2014年10月19日

² 参阅冯其予 薛志伟《海上丝路：构建海洋经济的“黄金走廊”》《经济日报》2014年07月16日

³ 陈荣洲《泉州要尽快搭上海上丝绸之路快车》凤凰城市2014年10月23日

⁴ 参阅林华东《闽南文化：闽南族群的精神家园》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10月

众所周知，最迟自南朝起，泉州就开始对外海航贸易。宋元时期，泉州就已是“市井十洲人”的世界性港口城市。以泉州人为代表的中华民族同中东、欧美、非洲等世界各国建立了充分的互信共赢的经济环境和发展空间，“你好我也好”的合作共生理念展示闽南文化的魅力。以泉州为代表的闽南文化与阿拉伯文明在刺桐港交汇，至今还留下5万多阿拉伯后裔。泉州的多元宗教文化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立为全球第一个“世界多元文化展示中心”；泉州的和谐包容已经被东南亚和中东等国家和地区人民广泛认同。泉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重乡崇祖、爱拼敢赢、重义求利、山海交融的丰厚文化底蕴，¹已经成为今日拓展的软实力。“东亚文化之都”为泉州走向世界形成一股强大的动力，今日的泉州完全有能力在国家对外文化合作交流中发挥比历史上更大的作用。

（三）有现实的发展空间和地缘优势

我国经历30余年的改革开放，对外经贸已经从亚洲走向全球；但是，就目前形势看，亚洲国家仍然是我们对外拓展的主要领域。国家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其最重要的涵盖区域正是亚洲地区。海丝沿线的亚洲国家大部分都是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这些亚洲国家与中国的经贸发展关系一直处于比较稳定的态势。泉州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这些国家联通的桥头堡，进一步加强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广泛合作，建立稳定健康的对外经贸关系，对于中国的发展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与海上丝绸之路各国的合作，首先需要航道联通。历史上从泉州出发的海上丝路，其成功的模式为今天的中国经贸通道建设奠定了基础。泉州完全可以为建设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先试，重塑刺桐港的能力，加强物流的集散功能，营造区域经济合作的和谐环境。其次是贸易畅通。贸易畅通的前提是沿线国家层面的政策协调，方能减少贸易壁垒和投资障碍，扩大贸易规模，优化贸易结构。至于推动中国企业到沿线国家开展投资合作，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这是一个历史性机遇，泉州企业必将大有作为，率先拓展。在加快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自贸区建设方面，泉州如果能先行成为自贸区，一定能凭自己的实力创造性地设计中国与沿线国家加强合作的新模式和新路径，为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做出先行贡献。

（四）有联手台湾和两岸共赢的有利条件

2014年10月，由商务部中国投资洽谈会主办的首届“丝绸之路”国际合作论坛上，北京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李义虎接受《人民政协报》记者采访时说：“在当前新形势下，台湾参与大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既可为台湾更深程度地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创造条件，又能避免经济被日益边缘化的危机，可谓推动两岸经济共同发展的务实可行路径。”²泉州和台湾一衣带水，商贸往来、民间交流等方面互动频繁，合作基础良好。泉州是台湾同胞最重要的祖籍地。台湾的许多产业拥有领先地位，产品竞争力较强。如果能借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东风，必能将自己的品牌、文化和产业更好地显示给“海丝”沿岸的国家和城市。泉州正是联手台湾开拓海上丝路国际市场的最佳伙伴。两岸携手，共同应对和解答海丝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贸易等方面的问题，让企业融合发展，让中华文化和闽南文化走向世界，让世界进一步了解台湾和大陆。

¹参阅林华东《闽南文化的精神和基本内涵》《光明日报·理论版》2009年11月17日

²孙金诚《借道“丝绸之路”台湾可免除经济边缘化危机》《人民政协报》2014年11月01日

（五）有海外侨商资源和人脉优势

千余年来，尤其是近一二百年来，泉州人不断走向世界。大凡有江河湖海的地方，都有泉州人的帆影；海丝沿线的国家和地区，都有闽南人的声音和足迹。推动沿海地区的发展、守护祖国东南海疆、开拓海上丝绸之路，泉州人作出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也因此，泉州拥有影响广泛的“世界泉商”群体。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泉州在海外的华侨华裔将近 800 万人，其中 90% 左右居住在东南亚等海丝沿线国家。这些泉州籍乡亲从商业贸易走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行业，走向金融、商业地产、城市综合体开发、海洋新兴产业等领域，已经为当地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成为这些国家的重要甚至核心经济支柱。在海外长期的经历使他们深知，只有祖国强大，华侨才真正有地位。因此，他们热爱祖国、热爱家乡，具有很强的经济实力和社会活动能力，与泉州祖籍地保持相当密切的联系，是泉州建设海丝之路先行区的外部支撑力量，更是当前推动与海丝国家经贸文化交流合作可借助的重要力量与实际参与者。

三、战略实施与意义

泉州要重启“海上丝路”的辉煌，就必须先行一步，建设好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

改革开放砥砺泉州发展，深厚历史催生当代光芒；“民办特区”美誉实至名归，“泉州模式”铸就改革开放典型。泉州已经连续十五年经济总值全省排名第一，形成了石化、纺织服装、鞋业 3 个产值超千亿元，装备制造、建筑建材、食品饮料 3 个产值超 500 亿元的产业集群。据有关资料显示，自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泉州对外贸易迅速崛起，出口渠道不断拓宽，与 190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往来关系；外贸进出口从 1979 年的 0.04 亿美元增长到 2013 年的 291.5 亿美元，年均递增 30%；出口从 1979 年的 0.02 亿美元发展到 2013 年的 164.9 亿美元，年均增长 30%。

泉州要建设海上丝路先行区，先行一步，必须具有国际站位和时代站位，必须积极践行习总书记提出的“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的战略构想，从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角度，对内发扬曾经的海丝起点优势，建设大通道，提升物流集散能力，重现天下货仓功能；对外要积极申报建设自贸区，做好金改区的实验，把泉州刺桐港提升到国家层面，加大与海丝沿线港口的互联互通，推动各方经贸合作发展，重现国际化大都市实景；依托古刺桐港海纳百川、包容并蓄的历史事迹，建设与海丝沿线互赢共生的平台，加大文化沟通力度，提升合作思想共识，讲好和谐多元共赢新故事。

回眸历史，泉州能云集世界商人，与宋元时期当局开放的政策很有关系¹。今天，泉州要在 21 世纪海上丝路国家战略棋局下成为先行区，不仅仅需要依靠自身的实力和不懈努力，更重要的是必须争取国家的认可和政策支持。

（一）需要获得国家 2 个方面的政策支持

1. 重建国家级刺桐港

鉴于刺桐港的历史影响和今天的营运实力，应努力把今天泉州港的建设变成国家意志，从国家利益出发，合并湄洲湾港，重构刺桐港蓝图。此事需要泉州市的努力，²更需要福建省委省政府的认

¹ 参阅林华东 苏黎明《泉州成为“世界宗教博物馆”的历史原因》《光明日报·理论》2014 年 1 月 29 日

² 我曾于 2007 年元月以“构建泉州形象港，提升泉州港的竞争力、形象力和综合力”为题向泉州市政协提交一份提

可，还需要全力以赴的申报。一旦泉州港重获新生，借助历史上的国际影响，必将重振古港雄风。

2. 建设泉州自贸区

鉴于“中国—东盟”海丝沿线的沟通急需贸易畅通和货币流通，因此有必要积极争取政策支持，在泉州建设自贸区，构建泉州融入“海丝”国家之间协作共赢的长效机制。

此外，泉州还应主动构建各类沟通渠道。譬如搭建区域协作合作平台。借助“金改区”动力，引导民资、侨资与国家政策性资金深度对接，创新丰富泉州民间资本融入国家战略性对外投资的渠道和途径。再如，通过先行区的有利优势，支持泉州远洋捕捞企业参与中国与东盟、南盟成员中的海洋国家和具备条件的非洲国家之间在海洋渔业领域的商业协作；支持泉州企业和民间组织探索海上安全、海洋开发、海洋科研、渔权协作和航线规划等多领域的国际合作。

(二) 需要全力打造 2 个活动平台

1. 在泉州建设国家级“海上丝路研究院”

依托“海上丝路研究院”，可以更加专注于探索历史上海丝成就的人文精神和历史经验，为世界提供中华文明的文明史与和平意愿；同时，打造“海上丝路研究院”，也能为更好地提升泉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学术地位和文化品位。

首先，泉州“海丝”文化遗产遗存丰富，是全球首个“世界多元文化展示中心”。激活泉州的“海丝”文物和历史遗存，建设当代发展的参照系，必将使海上丝路的战略获得更广泛的认可和参与。所以，通过“海丝之路研究院”，加强对“海丝”的学术研究，鼓励各种力量参与“海丝”文化的挖掘和传播，推出一批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和现实应用价值的学术成果，展示古代海丝的历史魅力和今日海丝的发展愿景。

其次，挖掘泉州与东南亚血缘关系突出、文化往来密切等方面优势，为南洋华裔族群寻根谒祖搭建服务平台，打造南洋华人的精神家园。依托研究院密切与海丝国家的民间往来，逐步建立“海丝”相关国家（地区）间的教育交流和学术往来的长效机制。

再次，依托研究院设立“海丝”宗教文化交流中心，集中和整合泉州现有的宗教文化资源，发挥伊斯兰教圣墓、清净寺、真武庙等宗教文化资源优势，精心打造伊斯兰历史文化陈列馆、清水祖师文化节、妈祖文化等一批“海丝”宗教文化和民俗信仰交流品牌；以泉籍华侨依托“海丝”沿线向外移民、迁徙、发展的历史沿革和伊斯兰文明在泉州登陆、传播、演进的史迹遗存等为基础，策划生成一批泉州与“海丝”相关国家（地区）的文化交流和学术研究项目。

2. 在泉州建立“海上丝路刺桐论坛”

“海上丝路刺桐论坛”是泉州先行区广泛联系海丝各国的重要纽带，是打造“海丝”文化交流品牌的重要阵地和商务活动的重要平台。因此，致力建成“海上丝路刺桐论坛”（Citong Forum for Maritime Silk Road），使之产生“博鳌亚洲论坛”（Boao Forum for Asia）式的影响。

首先，依托论坛联络海丝沿线国家的人文往来，以泉州获评首批“东亚文化之都”为契机，加强与欧洲文化之都、阿拉伯文化之都、东南亚历史文化名城等“海丝”沿线文化之都的人文交流和友好往来。推进中国对外影响力，构建民心相通、经贸互促、文化互敬、秩序和谐的思想共识。

案，获得港务局、港口部门和媒体以及社会各届的密切关注。该提案于 2008 年 12 月获政协泉州委员会优秀提案奖。

其次，依托论坛将“海丝”文化的发掘、传承、诠释和开发作为泉州对外交流活动的重点，策划一批“海丝文化”展示系列活动，组织“海上看泉州”、“印象海丝”大型演出等活动，丰富泉州“海丝”文化旅游的项目和内涵。开展民间外交，广泛传播中华文化，凝聚侨胞、侨亲、侨商力量，以亲情、乡情、友情为纽带，以闽南文化为桥梁，以合作共赢，互惠互利为基础，大力支持、鼓励华侨华裔回乡创业发展、参与公益事业。

再次，依托论坛打造“海丝”商务投资展会和多边商务交流平台，深化“海丝”沿线城市间的交流与合作。诸如，与“海丝”沿线国家（地区）的主要城市共同筹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城市联盟；筹办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品牌博览会等交流平台等一系列大型活动。此外，还应以“论坛”建设为契机，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为企业、社团和其它民间组织到“海丝”沿线城市举办经贸文化交流活动积极创造条件。

泉州建设先行区就是致力再现历史上海丝起点城市的英姿，在当前大好机遇下先走一步，对内实现样板作用，对外提供共生共进的发展模式。借助“海丝先行区”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通过泉州的发展推动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为海丝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和平和谐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简介：

林华东，泉州师范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社科院文化研究中心闽南文化研究基地、台盟中央闽南文化交流研究基地主任。

作为文化线路的“海上丝绸之路： 泉州史迹”遗产保护研究¹

骆文伟

内容摘要：文化线路作为一种全新的遗产概念，为“海上丝绸之路：泉州史迹”遗产保护带来了新理念和重要的启示，“海上丝绸之路：泉州史迹”遗产保护应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开发”、树立“整体性”理念、唤醒公众参与意识、建构共生理念等原则。

关键词：文化线路 世界文化遗产 “海上丝绸之路 泉州史迹” 遗产保护

1993年桑地亚哥·德·卡姆波斯特拉朝圣路(santiago de Compostela)的西班牙部分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与此同时，一种全新的遗产保护概念——“文化线路”(cultural routes or cultural itinerary)走进世界遗产领域。自1998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²成立文化线路科学委员会(CIIC)³，通过了《CIIC章程》等一系列文件；到2003年世界遗产委员会《行动指南》给予“文化线路”明确的定义；再到2005年ICOMOS第15届大会形成《文化线路宪章》(草案)，文化线路迅速成为近年来世界遗产保护界关注的热点。

一、文化线路的定义、特征及发展趋势

2003年ICOMOS提交给世界遗产委员会《行动指南》修订计划的讨论稿里，把文化线路的定义为：“文化线路是一种陆地道路、水道或者混合类型的通道，其形态特征的定型和形成基于它自身具体的和历史的动态发展和功能演变；它代表了人们的迁徙和流动，代表了一定时间内国家和地区内部或国家和地区之间人们的交往，代表了多维度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互惠和持续不断的交流；并代表了因此产生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流与相互滋养，这些滋养长期以来通过物质和非物质遗产不断地得到体现”。^[1]

这个定义概括了文化线路的如下几个特征：首先，它的本质是与一定历史时间相联系的人类交往和迁移的路线，包括一切构成该路线的内容：城镇、村庄、建筑、闸门、码头、驿站、桥梁等文化元素，还有山脉、陆地、河流、植被等和路线紧密联系的自然元素。其次，作为一种线形文化景

¹ 本文系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编号：13BGL085)和2012年泉州市社科规划重点项目(编号：2012Z03)阶段性成果。

²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Monuments and Sites)是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主要咨询机构，简称ICOMOS。

³ CIIC(The ICOMOS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mmittee on Cultural Routes)是国际古迹理事会文化线路科技委员英文简称。

观，它的尺度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是国际的，也可以是国内的，可以是地区间的，也可以是地区内部的；可以是一个文化区域内部的，也可以是不同文化区域间的。第三，它的价值构成是多元的、多层次的：既有作为线路整体的文化价值，又有承载该线路的自然地本身作为山地、平原、河谷等生态系统拥有的生态价值；不仅包括分布在其内部的建筑和其他单体遗产自身的价值，还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涵的价值。^[2]

文化线路的内涵和外延进一步拓展，体现出世界文化遗产研究和保护朝以下趋向发展：遗产规模由点状向线状和面状发展，保护对象由遗产本体扩展到周边环境、视线走廊；遗产类型由静态同时向动态和活态发展^[3]；由重视帝王将相伟绩与宫廷遗产同时向民间遗产发展；由重视城市遗产向同时重视乡镇、农村遗产发展^[4]；由强调文化内涵同时也强调经济价值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能力^[5]；由重视历史价值向同时重视现实价值发展；由重视纯文化意义遗产向同时重视反映人地和谐关系复合遗产发展^[6]；由单一文化向强调跨国界或跨地区的交流和多维对话，突出文化多样性；利益主体由重视国家意志同时向重视公众参与态度、行为发展^[7]；遗产申报由地区独立申报同时向跨区、跨国联合申报发展^[8]。

二、“海上丝绸之路：泉州史迹”遗产资源概况和特征

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华文明 5000 年传承经久不衰，拥有着十分丰富的文化线路遗产资源¹，其中以丝绸之路最引人瞩目，在地区乃至世界经济文化的交流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海上丝绸之路（maritime silk route）²，是相对陆上丝绸之路而言的，指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海外贸易的海上交通路线。通过此路将古代中国的丝绸、茶叶、陶瓷、铁器等物产销往欧洲和亚非其他国家，而欧洲商人则通过此路将香料、药材、宝石、毛织品、象牙等带到中国（海上丝绸之路路线如图 1³示）。海上丝绸之路是连接东西方重要的海上通道，也是一条沟通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对话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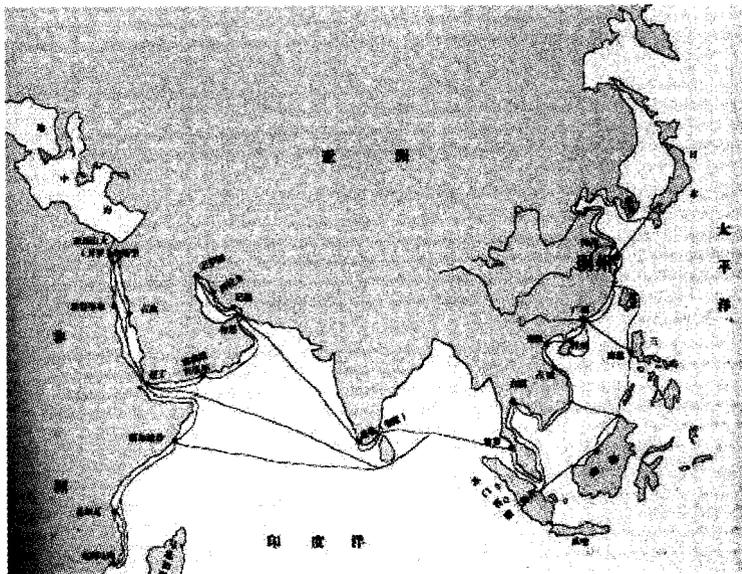


图 1 海上丝绸之路路线图

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中西文化长期在这里交流汇聚，遗留下大量罕见的海上丝绸

¹ 截止 2012 年 11 月，被列入国家文化遗产的文化线路有丝绸之路、北京中轴线、大运河、蜀道、灵渠等 5 处，潜在文化线路遗产主要有：茶马古道、秦直道、三峡古栈道、豫晋“朝拜之路”、徽杭古道、藏彝走廊、北京长河、川黔驿道、浙东唐诗之路、滇越铁路、长征线路等。我国现拥有 45 项世界遗产，但我国至今尚无 1 项世界文化线路遗产。

² 海上丝绸之路是由日本学者三杉隆敏在他 1967 年出版的《探索海上丝绸之路》的专著中初次提及，这个概念如今已被学术界所普遍接受。

³ 图片来自天津北方网 <http://www.enorth.com.cn>

之路文物古迹和辉煌古今的文化遗存，全市仅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达 32 处。根据港口地理、主题与历史的关系，大体可分为：航海与通商贸易、城市本身的历史、宗教与多元文化等三大类史迹。同时，泉州也是闽南文化主要发祥地和闽南文化遗产的富集区，具有闽南文化、中原文化、迁徙文化、海洋文化等文化特征，拥有包括方言、口传、宗教、武术、医药、饮食、民俗、音乐、戏剧、美术、习俗、建筑和传统技艺等大量的优质非物质文化遗产。泉州现拥有南音、水密隔舱海船制造技术、传统木结构营造技艺、妈祖信俗等 4 个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31 个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这些海丝文化遗产真实记录了曾被誉“东方第一大港”刺桐港的历史原貌，呈现出种类齐全、强聚分布、内容丰富、保存完整、时间跨度大等特征，它们从不同侧面展示了中国东南沿海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和变化，以及海上丝绸之路全盛时期人类文明交流的轨迹，见证了世界历史上多元文化和平共处、互相交融、共同发展的辉煌历程。

三、文化线路对“海上丝绸之路：泉州史迹”遗产保护的启示

“文化线路”无论作为重新审视人类遗产的新视野和新思维，抑或是文化遗产保护的新类型和新方法，对照文化线路的定义、特征、内涵、倡导的中心目标以及真实性的标准，对“海上丝绸之路：泉州史迹”遗产保护的理论和实践都带来十分重要的启示。

（一）树立“整体性”理念

“文化线路”历史悠久、体量庞大，具有跨文化、多维度、大尺度、生态多样性等特性，这就要求我们从多维视野来重新审视文化遗产，要突出其多维价值及整体价值。对这些在空间、时间、类型维度上相互联系的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应倡导“整体性”和“区域性”理念。

首先，遗产保护运动应从对单体文物的保护，发展到保护成片的城镇、村落、街区景观整体乃至包含独特文化资源的线性景观。以“海上丝绸之路：泉州史迹”为纽带实施的文化线路保护，将有效扩大遗产的保护范围，能极大推动区域遗产的保护。要加大对老城区、古街区、古瓷窑、水下文物的保护和发掘，通过对分散的文物和遗址进行文化线路多元价值评析，讲述各文化遗存与“海上丝绸之路”商贸往来的关联，以论证古刺桐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在此基础上形成泉州海丝遗产的完整形象。

其次，丝绸之路是省、部、全国乃至国际上的联合，必须建立起区域协同创新机制。“海上丝绸之路”是一条跨越上万公里海上线路，仅仅在国内部分就有数千公里，目前进入国家遗产名单的城市就有九个¹，也没有哪一个城市可以完成单独申报。在申遗过程中，如果有一个城市或一个点出现问题，那么整个项目就要面临失败，因此必须保证不出现城市短板。要争取在国家文物局指导下，建立专门的机构，统筹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九城市文化遗产立法、保护、利用、研究和联合申遗工作，搭建政府、文物管理部门、博物馆“三位一体”的运作平台，建立信息共享、政策互通、人才共育、品牌共塑、遗产联展等联动协作机制，以保证各申遗城市能够“齐头并进”，努力做好各地海丝史迹的整合以及海丝线路的时空衔接，构筑起一个新的、完整的国家性海丝文化遗产保护网络。除此，在国家文物局和联合国申遗职能部门的支持，尽早启动“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遗产国际

¹ 在最新公布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12 年 11 月更新）中，共有福建泉州、浙江宁波、广东广州、江苏南京、扬州、山东蓬莱、广西北海、福建漳州、福州等 9 个进入“海上丝绸之路”国家文化遗产名单。

协商会，争取与“陆上丝绸之路”项目同时捆绑申报，一次成功。

（二）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开发”

“海上丝绸之路：泉州史迹”的遗产保护是泉州遗产工作的重心。首先，要严格对照文化线路的内涵和特征，始终坚持以“保护第一，合理开放”和“社会文化效益与经济效益并重”的基本原则，正确处理好保护与开发的关系，真正实现保护——利用——再保护的良性循环。

首先，应重点做好以下几项保护工作：1. 除重点保护好已公布的国家、省、市三级文物保护单位外，还必须保护好虽未定级但经过评析确有遗产价值的古建筑、历史文化街区、历史遗址遗迹等，还应抢救性保护好已被损害的文物古迹遗存和在城市建设经拆除的古民居建筑构件。2. 整体保护好老城区中的整体格局和历史风貌。这包括：①“鲤鱼城”的平面形状、方位、轴线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棋盘式路网道、护城河和破腹沟两大自然水系；②传统民居“红砖白石双坡顶、出砖入石燕尾脊”等营造技艺；③骑楼及中西合璧古民居；④遍布于城区中的刺桐树和其他各种古树名木^[9]。3. 严格按照“修旧如旧”原则来整治遗产地及周边环境。如规划建设好德济门遗址公园、锡兰王子陵园遗址、五里桥、洛阳桥中国名桥主题公园、磁灶窑址泉州外销瓷文化公园、法石村“海上丝绸之路”文化旅游街等一批精品景区。4. 积极申报泉州北管、泉州拍胸舞、梨园戏、泉州提线木偶戏、晋江布袋木偶戏、高甲戏、惠安石雕、泉州花灯、惠安女服饰、德化瓷烧制技艺和法属波利尼西亚联合申报“南岛语族迁徙”^[10]等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5. 对于泉州海丝文化线路的历史记载、有关于人员组成、旅行证件、文献以及包括民俗、民风、戏曲在内的非物质遗产等方面资料，都应统一进行整理。6. 重点建设好泉州海交馆综合展、磁灶窑址泉州外销陶瓷展、泉州博物馆“世界多元文化展示中心”等一批精品展览馆，同时要通过加强博物馆、档案馆建设，丰富海丝历史文化展示体系和展示功能。

其次，文化线路自身就是天然的“旅游线路”，其构成线路资源内容丰富、类型多样、特征鲜明、具有多功能性，众多线性特征造就文化线路不可多得的遗产旅游优势和开发价值。其旅游功能正因它以遗产保护为目的特性，使以其为基点进行的旅游开发都将着力于遗产的可持续性，这将有利于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的共赢。^[11]自泉州启动海丝旅游专项以来，泉州海丝遗产旅游虽得到一定的发展，各遗产地旅游发展水平也不尽相同，但总体上海丝旅游条块分割严重、旅游开发层次较低，旅游的可进入性较弱，旅游市场开发很不理想。为此，应树立区域旅游合作理念、实施旅游资源统一管理、探索旅游资源专业化、市场化运作的新举措，精心打造海丝旅游品牌。

第三，文化线路同样把历史文化内涵放在首位，但相对于文化遗产，文化线路同时也强调经济价值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能力。因此，泉州海丝遗产工作还应坚持“社会文化效益与经济效益并重”的原则，实现遗产资源保护和开发对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的综合效益和长远效应。

（三）唤醒公众参与意识

世界遗产体现着“一个国家(地区)的意识形态渊源”，换言之，遗产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一国、一地区的“文化身份”象征。理清自己的意识形态渊源，确认自身的文化身份，才能在缤纷的世界、地方文化、政治舞台上鲜明的树立自己的形象。文化线路倡导的中心目标就是要借助保护和申报世界遗产这样的机制唤起社会公众对遗产热爱和关注。^[12]文化线路突出并培育社区的参与意

识,把社会公众对建立文化线路的意愿作为辨别文化线路真实性标准之一。当前在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遗产已家喻户晓,但是社会各界尤其是公众,缺乏对世界遗产内涵准确理解,对文物及其保护的意義认识不到位,社区公众参与保护的意識淡薄。要利用各种新闻媒体系统地、分系列地开展遗产资源的普及宣传,通过举办“海上丝绸之路”旅游文化节、世界闽南文化节、元宵踩街、海洋文化节、中国遗产日宣传等重大节庆活动,唤醒人们对海丝线路遗产的认同感,唤醒全民参与保护的意識,在外围形成严密的“保护带”。要通过制定吸纳社会资金的优惠政策和措施,建立完善的遗产保护投入机制,建立起遗产保护专项基金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重点用于国家、省级风景名胜区规划、文物古迹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

(四) 建构共生理念¹

共生是指共生单元之间在一定的共生环境中按某种共生模式形成的相互谐调、共存共赢关系。一般而言,共生由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环境等三要素构成。^[13]在遗产区域建构共生理念,符合文化线路遗产的特征要求。

首先,要实现宗教和文化的多元共生。中世纪刺桐港繁荣兴盛,商人、旅行家、僧侣及各行各业的外国人荟集于此,带来了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摩尼教、日本教和犹太教等文化,并和中国本土的儒教、道教和民间宗教互相辉映、相互融合,共同缔造了泉州宗教文化多元并存的局面。由于事过境迁,我们已经很难对泉州历史上的各个宗教文化的历史脉络作出精确无误的复原和现况定位。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借助历史文献和田野调研资料,从历史的视野重温泉州多元宗教共存现象,对它们的历史与现况进行了纵向考述和横向比较,随着时间的推移、磨合及对话,而彼此尊重、求同存异,进而融合、相互合作,从而为人类福祉做出贡献。

其次,要实现城市现代化与历史文化遗产的共生。随着泉州经济飞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泉州海丝文化遗产保护与城乡建设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泉州老城区在全国“旧城改造”的热潮中“全面开花”,引发了一场对老城区的“建设性破坏”。文化被誉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不仅是城市发展的独特见证,同时也是城市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均衡和谐发展的重要资源。根据我国现行的法律政策,可以对历史文化遗产实行分层次、并根据不同特点采取不同方式进行保护。^[14]第一个层次是城市单体文物,主要包括古建筑、古墓葬、古遗址、石刻、名人故居和近现代有纪念意义的建筑物等,要遵循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保存历史的原貌和真迹。第二个层次是具有传统风貌的历史街区,如中山路、西街、旧馆驿、井亭巷、金鱼巷、聚宝街、青龙巷、万寿路、伍堡街等等,要保存历史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第三个层次是历史文化名城,包括老城区的格局旧貌、平面形状、方位、轴线以及与之相关联的道路骨架,河网水系、古城楼等,不仅要保护城市的文物古迹和历史地段,还要保护和延续古城的格局和历史风貌。

第三,要实现文化遗存、自然环境、非物质文化遗产共生。在我国,文化线路往往是文化、自然、非物质三位一体的大型遗产,自然环境在文化线路的历史形成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精神塑造和民族性格形成过程中起到限定和约束作用,众多民族千百年来保留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为

¹ “共生”(Symbiosis)一词来源于希腊语,最早缘于生物学,由德国真菌学家德贝里(Anton de Bary)在1879年提出,意指“不同种属的生物按某种物质联系共同生活”。20世纪50年代以后,共生方法开始应用于社会领域。

文化线路增添了无穷的韵味。文化线路以线路作为纽带,把线路及其构成部分作为整体资源进行保护,既保护文化遗产自身、也保护其赖以生存的环境,又要保护遗留下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要注意避免和克服我国遗产保护中长期存在的两种不平衡倾向:一是“重文化遗产轻自然遗产”,二是“重物质文化遗产轻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把具有广泛性、普遍意义的各类遗产纳入到保护体系中来。因此,海上丝绸之路:泉州史迹”文化线路保护应尽可能涵盖:①文化遗产元素,即前文提及的航海与通商贸易、城市本身的历史、宗教与多元文化等三大类史迹;②自然遗产元素,即彰显出人类开拓进取精神的海丝文化线路经过的发源地、传播中的具体场所、发生重要影响地点的地形地貌、自然景色;③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即包括无形的语言、音乐、习俗、手工艺制作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习俗。

除此,泉州海丝遗产保护还应该实现生活与遗产、传统与现代、人与自然、人与遗产和谐共生的思想理念,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和最广的地域范围来保护和延续历史文化脉络,更全面、更立体地展示城市的历史文化发展轨迹,在继承历史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形成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的交相辉映,人文资源与自然资源的相互依托。

世界遗产的保护和申报既是申报地梳理、完备、健全、提升形象的过程,也是自觉接受国际规则监督的过程。借鉴文化线路这一文化、自然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并举的理念和方法,对于“海丝丝绸之路:泉州史迹”遗产保护和申报无疑是非常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坚信,只要精心保护,基础工作做扎实了,“海上丝绸之路:泉州史迹”终能昂首进入《世界遗产名录》。

参考文献:

- [1] CIIC. 3rd Draft Annotated Revised Op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 Madrid, Spain,2003.
- [2] 李伟等.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新动向——文化线路[J].城市问题,2005(4).
- [3] 徐嵩龄.第三国策:论中国文化自然遗产的保护[M].科学出版社,2005版.
- [4] 刘小方.文化线路遗产——旅游的跨文化之路[J].《中国西部》杂志旅游刊,2013(1).
- [5] 王志芳等.遗产廊道——美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一种较新的方法[J].中国园林,2001(5).
- [6] 见参考文献[1].
- [7] Gayle McPherson. Public memories and private tastes: The shifting definitions of museums and their visitors in the UK. Museum Management and Curatorship 2006,21(1).
- [8] 刘睿文.多国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模式的引入.经济地理[J].2005(3).
- [9] 何振良,庄小波.泉州老城区文化遗产现状调查与保护对策研究[J].泉州学林.2009(2).
- [10] “南岛语族迁徙”计划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EB/OL].泉州网,(2010-11-23)
[2010-11-23].http://www.qzwb.com/mnwhw/content/2010-11/23/content_3511402_2.htm.
- [11] 见参考文献[2].
- [12] 李伟,俞孔坚.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新动向——文化线路[J].城市问题,2005(4).

[13] 张健华等. 闽台旅游合作的共生模式研究[J]. 福建论坛.2008(3).

[14] 见参考文献[9].

作者简介:

骆文伟(1969—), 男, 福建惠安人, 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世界遗产和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泉州古代陶瓷与海上茶瓷之路

陈建中

内容摘要：泉州早在远古时期已有人类在这一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周时为七闽地；春秋战国为越地；秦至隋，先后分属闽中郡、闽越国、建安郡、晋安郡所辖。隋开皇九年（589年）改郡为县，隶属泉州（治所在今福州），泉州之名始用。唐嗣圣元年（684年）置武荣州，景云二年（711年）改武荣州为泉州，泉州单独建制开始，隶属闽州都督府。在盛唐的开元六年（718年）州城治所自丰州迁至今址，泉州文明从此逐入新的一页。

根据历次考古资料发现，泉州窑始烧于商周时期，境内发现历代古窑址472处。泉州陶瓷文化形成于商周时期的原始青瓷；汉晋以来中原士庶的南迁，带来了先进的陶瓷生产技术；经过隋唐、五代的发展，宋元时期泉州的陶瓷与茶叶一样成为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重要外销商品。本文拟就以泉州古代陶瓷来探讨海上茶瓷之路的形成与发展。

关键词：泉州 古代陶瓷 海上茶瓷

一、古代泉州陶瓷

在二十世纪50、60年代的野外考古调查中，考古工作者在泉州境内的古人类遗址中也发现了一批新石器时代至秦汉时期的印纹陶、印纹硬陶和原始瓷，他们主要分布在晋江、南安、永春、德化，分别在永春的牛头寨、鳌山、石花寨、万春寨、九兜山，南安的狮子山、寨仔山、困狗山、蜘蛛山，德化的云尾山、牛尾寨、四埔山、后坪山，惠安的大岞山，石狮的寺山、洞后寨、许村寨和晋江的庵山等地。在南安水头大盈村后寨山发现了一处青铜时期的遗址，除了原始青瓷外，还有青铜戈、戚、铍、铃和玉璜、玉戈。特别是2007年10月6日在德化与永春交界的寮田尖山，发现了一处印纹软陶、印纹硬陶、原始青瓷混合叠压的堆积层，并在堆积层的旁边发现了一处窑床的断面，经福建省考古队专家确认为一处商周时期的窑址。

中原人入泉后与原住民和睦相处，开疆拓土，建设和谐的家园，与他们一起入泉的是中原先进的文化和手工业生产技术，对泉州窑青瓷的生产注入了先进的生产工艺，不仅造型、制作工艺、烧成工艺等方面都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经过南北朝时期的发展，泉州窑的陶瓷生产工艺技术已经成熟，并开始显示出自己的特色。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在南安丰州镇发现了六朝时期的古墓一百多座，经过考古发掘，出土了以青瓷为主的大批随葬品。其中年代最早的纪年墓为西晋太康五年（284年），出土的青瓷器主要有五连罐、小盂、鸡首壶、盘口壶、三足炉、钵、托盅、双系罐、鏝斗、砚台、虎子、碗、盘、博山炉、插器等，其中五连罐应为东汉至东吴时期的魂瓶。这批出土的青瓷，釉呈青绿，或深绿，或浅绿，或部分窑变呈紫灰，釉面明亮，玻璃相好。胎质硬，但磁化程度较低，

呈灰色，或淡黄，胎釉结合差，常出现脱釉现象。出土的这批青瓷年代都早于南朝，虽然泉州除晋江磁灶溪口山发现一处南朝窑址外，其它地方尚未发现这一时期的窑址，但从其数量来看，外地带入的可能性小，笔者认为应是以本地烧制为主。

唐、五代泉州瓷器生产的窑场主要分布在晋江、惠安、南安等沿海地区和德化的边远山区。窑址主要有：南安洪濂的四甲、大尾洋、坝头；惠安黄塘及南埔的山仔头、银厝尾、宫后山；晋江磁灶的虎仔山、后山、后壁山、狗仔山、龟山一址、龟山二址、童子山；德化美湖的墓林。产品为青瓷，器型主要有碗、盏、罐、壶、洗、钵、盆、缸等。这一时期泉州的青瓷生产技术有了很大的进步，胎质瓷化程度比以前高，胎釉结合有了很大的改善，除极少部分烧成温度不够外，很少发现有釉面脱落的现象。

经过隋、唐、五代的发展，泉州陶瓷生产技术已趋于成熟，为宋元时期泉州窑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宋元时期，泉州窑不论是在产品质量、器物种类，还是在窑炉烧成技术等方面都有明显的飞跃。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陶瓷业发展迅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从沿海到山区，窑烟四起，窑炉作坊遍布泉州各县的城里乡间，至今泉州各地共发现有这一时期的窑址 160 多处。主要窑场介绍如下：

1. 泉州东门窑位于市区东郊的碗窑乡，顺水路可直通海边，分南北二窑，主要器型有碗、洗、盘、碟、罐、炉、瓶等。北窑产青瓷和青白瓷，而南窑则以青瓷为主。
2. 晋江主要分布在磁灶镇及附近的地区，产品主要以碗、盘、盆、杯、碟、盏、瓶、罐为主，装饰有釉下刻、划，瓷种有酱釉瓷、黑釉瓷、青瓷、绿釉瓷等，并开始出现釉下的铁锈褐彩工艺。
3. 同安主要集中在汀溪一带，产品以碗、碟、杯、洗、壶为主，装饰以釉下刻、划为主，瓷种有青瓷、青白瓷等。
4. 安溪主要分布在边远的龙门镇桂瑶乡和城郊的魁斗镇。产品有碗、洗、碟、盒、盘、杯、盏、瓶等，以碗为大宗。瓷种桂瑶以青瓷为主，而魁斗则兼烧青白瓷。
5. 永春主要分布在边远的玉斗、一都和湖洋三个乡镇，主要烧制青瓷和青白瓷，器型有碗、盘、杯、碟、盏、壶等，以碗为主。
6. 南安主要分布在东田、仑仑、水头、康美、梅山、罗东等乡镇，窑场规模大，分布广，仅东田窑就有 38 个窑场分布点。产品有碗、碟、盒、盆、瓶、罐、壶、洗等。瓷种有青瓷和青白瓷。
7. 德化主要集中在城区周边的乡镇，分布点密集，窑场大。产品主要有碗、盘、杯、碟、洗、壶、瓶、罐、高足杯、盒等，瓷种有青白瓷、青瓷、影青瓷、黑釉瓷、酱釉瓷等，装饰工艺有釉下刻、划及少数釉下酱彩。

明清时期，朝廷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颁布了禁海令，强制居民内迁，影响了沿海地区的手工业生产，陶瓷也不例外，所以这一时期泉州的窑场大多内迁。根据考古调查资料记载，沿海地区除个别边远山村外，这一时期的窑址都集中在安溪、永春、德化。

安溪明代开始烧制青花瓷，同时还烧制青瓷和白瓷；清代以青花瓷为主，兼烧白瓷和印青花，已发现窑址分布点 130 多处。永春明清时期主要烧制白瓷、青花瓷和青瓷，已发现窑址分布点 20 多处。德化明代以烧制白瓷为主，其白瓷的胎质坚硬、细腻，釉色洁白、莹润，倍受世人喜爱，明

代中晚期已开始烧制青花瓷和五彩瓷；清代以青花瓷为主，还兼烧青瓷、白瓷和五彩瓷，窑场分布范围广，产量大，已发现窑址分布点 190 多处。

1. 安溪

安溪在泉州西北部，距泉州 58 公里，在晋江西溪上游，顺溪水而下可直抵泉州港；西南通九龙江支流，汇入漳州港。水、陆路交通十分便捷，是古代闽南港口陶瓷贸易商品的重要生产基地之一。

据历次考古资料统计，安溪古陶瓷生产窑址达 160 多处，其中五代、宋、元时期 36 处，明清时期 126 处，瓷种有青瓷、青白瓷、哥釉瓷、青花瓷等，产品种类繁多。

从考古调查采集的标本上看，明代早期是安溪青花瓷的创烧时期，安溪魁斗镇的草北窑和尾溪深掩仔窑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草北窑和深掩仔窑由宋元时期的青瓷发展到明代早期的釉下彩绘青花。因此，在窑址采集的标本中发现：有釉下彩青花排点纹、卷草纹、单字纹（一、十、米、福、禄、寿、元、玉等）、火焰纹等装饰的器物保留有宋元的风格，即器物敞口、浅腹、矮圈足、足底露胎、足心乳凸，最显著的特征是圈足刀法向内倾斜呈“倒梯形”。到明代中晚期，安溪青花瓷已进入兴盛阶段，青花纹饰除新出现的蕉叶纹、荷叶纹、菊瓣纹及单字款外，又增加了各式各样的山水人物、花鸟花卉、符咒及词句文字等，而器型的款式也有了新变化。这一时期安溪青花瓷已收入志书记载：“……昔时只作粗青碗。近则制花又更清次于烧磁……”，并在嘉靖五年纪年墓考古发掘出土的青花瓷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佐证。早期受宋元风格的影响较大，发展较慢，窑场主要分布在县城周边地区，以魁斗村的草北窑、尾溪村的深掩仔窑和翰苑村的上山窑为代表，明代中期主要分布在与漳州华安县交界的龙涓地区，以珠塔村的内窑和庄灶村的庄灶窑为代表，明代晚期主要分布在边远的长坑地区，以月眉村的月眉窑为代表。清代是安溪青花瓷的全盛时期，发现的窑址遍及全县的山山水水，早期主要以翰苑村的双溪窑、灶坪村的下尾水窑、银坑村的葫芦仑窑、科洋村的琵琶仑窑、科名村的宫仔尾窑等为代表，中期以科洋村的琵琶仑窑、科名村的宫仔尾窑、翰苑村的双溪窑、云集村的云集窑、扶地村的扶地窑为代表，晚期以翰苑村的双溪窑、银坑村的葫芦仑窑为代表。

安溪青花瓷主要器型有碗、盘、杯、碟、瓶、炉、灯盏、壶、罐、匙等，胎白或灰白或灰色，质地坚硬或较酥脆，釉色白中微泛青或青白。青花装饰丰富，装饰图案主要有：松、竹、梅、牵牛花、菊花、草叶、卷草、狮、鹿、缠枝牡丹、双喜缠枝花、蝙蝠、石榴、“福”、“禄”、“寿”，单句和整段诗词等地方民间生活题材的植物、山水人物、动物、吉祥文字及诗词的青花纹饰。典型青花堂号、商号款有：协盛、阮玉、尚玉、泉玉、瑞玉、合源等。

安溪青花瓷自明初开始烧造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提高的过程，器型从单一性发展到多样性，釉下彩绘青花装饰从单一的图形、文字发展到图案丰富多彩的山水人物等，装饰工艺也从手绘发展到提高生产效率的印青花。

2. 永春

永春在泉州的东北面，北与瓷都德化交界，南与南安相接，西与安溪比邻，东与仙游交接。水陆交通便捷，南下入晋江直达泉州。良好的自然资源，造就永春瓷业的繁盛。

永春于后唐长兴四年（933 年）建县。永春青花瓷是在唐、宋、元青瓷、青白瓷生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志书上记载：“泥产山中，穴而伐之，便而出之，碓舂细滑，入水飞澄，陶净石渣，

顿于石井，以漉其，乃搏埴为器……”这段文字内容详细记述了陶瓷生产的方法和步骤。从窑址采集的标本看，湖洋碗芸窑和碗窑坑是明代永春青花瓷生产的代表性窑址。湖洋碗芸窑是在元代青釉瓷的基础上改烧青花瓷的，该窑采集的青花瓷标本留有明显的元代制作工艺特征。碗芸窑烧制青花瓷比碗窑坑要早。因此，永春青花瓷的始烧年代应为明代早期。

碗芸窑青花瓷的器型以碗为主，敞口，浅腹，圈足。胎灰，质地坚硬。釉青白，时有泛绿。足底有乳突，不施釉。外壁釉下绘青花，纹饰有点状纹、卷枝草叶纹、缠枝纹、折枝花果，内底釉下双圈，在圈内草书“福”、“禄”、“寿”、“花”、“三”、“大”、“叁”、“天”、“玉”、“杉”、“井”、“仁”、“东”等以及一些小草纹状的图案。碗窑坑窑青花器型以碗为主，兼有杯、碟、罐等。碗：敞口、浅腹、圈足；胎灰白质坚；施白釉，圈足内外露胎，足底有乳突。釉下青花纹饰有卷草纹、点状纹、叶纹等。

清代永春青花瓷主要分布在介福、苏坑、东平、湖洋等四个乡镇。窑址有介福的陈兰窑、黑坝窑、外窑、长垅窑、风流岭岭头窑、过路溪窑、白格窑、南社岭脚窑，苏坑的瓷窑庵窑、窑后山窑、圣人格窑，东平的石蔗山窑，湖洋的碗窑仑窑等。青花瓷的器型有碗、盘、杯、碟、盆、匙、瓶、罐、炉等，尤以碗、盘最多。胎呈白或灰白质坚，施白釉，釉面莹亮。青花色泽浓重、淡雅有致，结构随意，地方民间气息浓郁，纹饰取材丰富，主要有：卷草纹、云龙纹、折枝花果纹、牵牛花纹、飞凤纹、牡丹纹、圈点纹、缠枝花纹、缠枝蝴蝶纹、缠枝“喜”字纹、寿字纹、佛手纹、诗句、山水人物等，以及随意极强的小草、小动物、小花、小水滴、小火焰等各种细小的装饰纹饰。青花款识主要有：元月记、成、吉、永、宝珍、双、开源、合珍、成化年制等堂号、商号及吉祥底款。

永春青花瓷始烧于明代早期，窑场大多分布在与德化交界的介福、苏坑、湖洋等乡镇，永春青花瓷产品器型、装饰等方面对德化青花瓷的烧造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3. 德化

德化在泉州的北部，距泉州 120 多公里。东与莆田市的仙游、福州市的永泰县毗邻，北与三明市的尤溪县交界，西与三明市的大田县接壤，南与永春县相连。昔时水路往东经过大樟溪入闽江到福州，陆路向南翻山到永春后经水路运输两日可达泉州，交通运输便捷。

凭借独特的自然资源优势，德化自唐代建窑烧制瓷器开始，历代陶瓷窑业生产技术不断发展、创新。宋元明清，德化陶瓷以其优良的品质和精湛的工艺在世界瓷坛上赢得盛誉。

德化青花瓷始烧于明代中期。明嘉靖三十八年陈素轩墓出土的墓志铭已采用釉下青花色料撰写铭文，由此可见，德化青花瓷在明嘉靖年间正处于创烧阶段。德化青花瓷以烧造时间长、范围广、规模大、产量高、品种多而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大宗商品。

从考古资料上看，德化青花瓷可分为初创期、兴盛期、全盛期和衰退期。初创期自明代中期至清初顺治时期，这一时期处于试烧阶段，主要窑场分布在靠近永春的浔中、三班镇和与尤溪县交界的葛坑镇，窑址以浔中的东头窑、龙浔的屈斗宫窑丙址、葛坑的下仓尾窑、石坊窑、双溪口窑和苏田窑为代表。兴盛期为清早期，自康熙至乾隆时期，这一时期朝廷实行海禁，居民内迁，人才、资金内流，促进了德化陶瓷业的发展。查阅民间族谱发现，城关及周边乡镇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从事瓷业，农忙务农，农闲务瓷，亦农亦瓷。在地方史志上也出现了官员和文人墨客赋诗咏颂瓷业景象，

窑场主要分布在浔中、三班、上涌等乡镇，代表性窑址有浔中的石排格窑、后所窑、东头窑、三班的新窑、梅岭窑、上涌的后寮庵窑、杨梅的牛头尾山窑等。全盛期为清代中晚期，自嘉庆至道光时期。这一时期青花瓷占主导地位，窑场遍及全县的大部分乡村，产量大，品质优良，装饰图案题材丰富。衰退期为清末至民国时期，这一时期青花发色明显淡化，构图层次感差，器物造型粗笨，开始出现印青花及其它色釉瓷种。窑场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代表性窑址有：浔中的前欧窑、茶林庵窑、东头窑、岭兜窑，三班的上寮窑等。

德化青花瓷自明代中晚期兴起之后，到清代进入了兴盛和全盛时期。从历次考古资料统计，除美湖、盖德两个乡镇外，全县共发现青花窑址 177 处。

明代，德化青花瓷处于兴起时期，器型以碗为主，间以少量的罐、杯、碟等。胎灰白或白，质坚，施乳浊釉，透明度较差，且白中微泛青。青花色料以土钴为主，含铁成份较高，发色灰黑，较暗淡。青花装饰图案简单，以单字、单项图案为主，结构简洁大方。如葛坑下仓尾窑采集的青花瓷碗：敞口、鼓腹，矮圈足，底露胎，有乳突，外壁釉下青花，内底饰釉下青花单字草书“春”、“花”、“玉”、“香”等。

清代，德化青花瓷出现了兴盛和全盛期，器物造型增多，有碗、盘、杯、碟、水注、壶、罐、盒、匙、炉、瓶等。德化青花瓷胎洁白，质坚，釉色洁白，透明，晚期时有出现乳浊、缩釉现象。这一时期的装饰图案有“绘青花”和“印青花”两种，取材图案纹饰广泛，内容丰富，综合起来有以下几类：

1. 动物图案：有云中飞凤、团凤、展翅团凤、梅中鸣雀、云中飞龙、草中游鱼、林中飞凤、水中追鱼、火龙、戏龙、林中飞雀、雄狮飞云、麒麟回头、团凤祝寿、松鹤图、草中蝴蝶、云中蝙蝠等。

2. 植物图案：有石榴花木、水草、菊花、缠枝花、梅花、葡萄、牵牛花、灵芝草、松枝竹、兰花、缠枝藤草、牡丹、葵花、芭蕉、杨柳、佛手等。

3. 点线图案：有点圈纹、卷浪纹、点纹、斜线交叉纹、网格纹、水波纹、竖线纹、曲线纹、飘带纹等。

4. 山水人物图：有山水风光、风景附名诗句、婴戏图、城楼图、湖中垂钓、水乡人家、异石花草、水乡生活、柳条飘扬、神话传说、仙游图、高士图、三星图、晨读图、对奕图等。

5. 文字图案：有单字“寿”、“喜”、“丰”、“福”、“多”字或诗句“志在书中”、“粒粒皆辛苦”“咬得菜根，百事可为”、“晨兴半柱香”、“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等。

6. 边饰图案：有竹叶、蕉叶、莲纹、卷线纹、雷云纹、树叶纹、缠枝纹等。

二、海上茶瓷之路

国内外学者对中世纪沟通东西方的海路有多种称谓，如“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瓷之路”、“海上香料之路”、“海上陶瓷之路”等，而“海上丝绸之路”是最通俗、最常用的提法。新航路开辟之后，尤其是 18 世纪以来，中国茶叶成为与陶瓷一样重要的外销商品，对人类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有着重大的影响，因此把这一时期的东西方航路称为“海上茶瓷之路”，更为贴切。

闽南自古以来一直是我国主要的陶瓷生产中心之一，在人类陶瓷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据

考古调查和实物标本检测显示，早在 3000 多年前的商代，泉州德化已懂得烧制原始青瓷，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生产原始青瓷的窑址之一。

两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中原移民入闽，少数士族和豪门带来了精美的青瓷器物，给闽南地区青瓷的生产注入了先进的生产工艺，在造型、制作、烧成等技艺方面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城市考古发现了一处两晋至南朝时期的古墓群，经过考古发掘，出土了以青瓷为主的大批随葬品，其中年代最早的纪年墓为西晋太康五年（284 年），出土青瓷器主要有五连罐、小孟、鸡首壶、盘口壶、三足炉、钵、托盅、双系罐、鏝斗、砚台、虎子、碗、盘、博山炉、插器等。与这一古墓群相连的丰州九日山莲花峰上有一方晋人题的“莲花茶襟，太元丙子”石刻，晋太元丙子年（376 年）石刻是闽南地区乃至福建全境最早涉及茶事的珍贵记录。

经过南北朝时期的发展，闽南地区的陶瓷生产工艺技术已经成熟。隋唐五代闽南青瓷生产技术有了很大进步，陶瓷除了作为人们的主要生活用具，还作为商品开始进入外销领域。晋江的磁灶、同安的杏林许厝和祥露、德化的墓林等地的制瓷水平初显，器型主要有碗、盏、罐、壶、洗、钵、盆、缸等。而为迎合饮茶之风和海外市场，闽南地区的青瓷盏、碗、罐等饮茶器具产量大增。

宋元时期，随着古刺桐港对外贸易的繁荣，陶瓷业发展迅猛，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从沿海到山区，窑烟四起，遍布城乡，主要烧制青瓷、青白釉瓷、黑釉瓷、白釉瓷等，著名的窑址有安溪的桂窑、德化的碗坪仑窑、屈斗宫窑、同安的汀溪窑、晋江的磁灶窑等。这一时期，不论是产品质量、器物种类，还是窑炉烧成技术，均有明显飞跃。在移民和皇亲贵族的深刻影响下，宋元闽南的饮茶风尚日兴。蔚然成风的饮茶活动直接带动了制瓷产业的发展。闽南地区各窑群的产品不知其数地销往海外，今天在中世纪东西方航路沿途上的国家和地区、以及水下考古中频频发现。这一时期，供饮茶用的闽南地区生产的陶瓷器具，主要包括磁灶窑陶质风炉、陶质提梁烧水壶，汀溪、漳浦、安溪、永春、德化、同安、南安的青瓷茶壶、茶盏等。

宋元安溪龙门镇桂瑶村的桂窑，生产了大量具有地域特色的青釉瓷茶盏、茶壶，以供斗茶和三五成群聚友品饮之用，与闽北建阳斗茶用的黑釉瓷茶盏形成鲜明对比，是福建宋代南北两地斗茶的典型代表。尤其龙门乡桂窑烧制的青瓷盏，与同安窑生产的青瓷盏出口到东北亚，在日本被称为“珠光青瓷”。

元代，闽南地区的一些窑场开始烧制白瓷，但严格意义上的高水平白瓷首推明代德化窑的白瓷产品。德化窑是明代全国烧制白瓷的中心，除了白釉瓷观音等塑像之外，其他各类白釉瓷器物均大量销往海外。主要产品有杯、炉、觚、瓶、壶、碗、盘、碟、洗、盏、灯、雕塑佛道和民间神仙人物、动物及印章等等，品种丰富，应有尽有。在西方，德化白瓷被誉为“中国白”（Blanc de Chine）。德化产的白釉螭龙茶壶、茶杯传到欧洲后，倍受王室贵族的推崇收藏。为之后咖啡、中国茶叶饮料在欧洲的流行。德化白瓷给欧洲制瓷业的研制生产提供了灵感和实物参照。

明清时期，除了烧制白瓷、青瓷外，闽南地区涌现出青花瓷窑群和窑场，其中德化、安溪、平和、华安都有较大规模的窑群。近年来，在日本、东南亚、斯里兰卡、印度和坦桑尼亚等地都发现有闽南的青花瓷。如日本出土的芭蕉叶纹、釉上红彩折枝花纹、“天启型”山水纹、题诗句、云龙纹、变形梵纹、印“寿”石榴纹等与饮茶用具相关的青花瓷盘、壶、杯、罐等。由此可见，闽南青花瓷

在明清两代继宋元的青瓷和青白瓷仍旧大量运销亚、非许多国家和地区。在西方人 1780 年代绘制的《中华帝国图》右下方，清晰地描绘了青花茶杯、茶罐等。

闽南陶瓷窑场生产的饮茶器具自宋代开始大量外销，由于航线、气候、造船技术、航海技术等种种原因，一些运载闽南茶、瓷及其它商品的船只遇难沉入海底。随着世界水下考古事业的发展，部分沉船经水下考古浮出水面。这些在海上茶瓷之路上沉没的古代商船让我们联想起了当年闽南茶瓷在这条航线上穿梭的影子。

这些经水下考古调查和发掘出水有闽南瓷器茶具的沉船有：1974 年，国家、省、市考古工作者联合组织考古发掘，在福建泉州湾出土的后渚沉船。1983 年 7 月，英国迈克·哈彻第一次发现并组织水下打捞，在欧洲被称为哈彻大帆船。哈彻大帆船沉船遗址位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中国南海海域，是明崇祯十六年至清顺治三年(1643~1646 年)间沉没的一艘中国大帆船。1984 年 7 月，迈克·哈彻的水下打捞公司调查发现并组织实施打捞的“哥德马尔森号”，又称“南京号”，沉船遗址位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南中国海海域。该船是一艘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商船，经专家考证沉没时间为乾隆十七年(1752 年)。1987 年，中国广东省阳江市南海海域发现的南海一号。1996 年，在中国海南省三沙市西沙华光礁海域发现的华光礁一号。1998 年，在海南省三沙市西沙北礁海域调查发现的海南省西沙“北礁 1 号”沉船遗址。1999 年，在中国海南省三沙市南沙海域，澳大利亚一家海洋公司把清代道光二年(1822 年)的“泰兴号”中国沉船打捞出水。2002 年，在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关帝庙前海域调查发现发现的漳州东山关帝庙沉船。2007 年，在中国广东省汕头市南澳岛县海域发现的南澳一号。2008 年，在福建省平潭县碗礁南侧海域调查发现发现的平潭九梁沉船。2008 年，在泉州市丰泽区东海街道浔浦海域调查发现发现的泉州浔浦沉船。2008 年，在泉州市泉港区大竹岛海域调查发现发现的福建泉州大竹岛沉船。2009 年，在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墟里海域调查发现发现的山东蓬莱墟里沉船。2009 年，在福建漳州龙海白屿岛的西北海域调查发现发现的福建漳州龙海白屿沉船。2009 年，在福建漳州龙海浯屿岛东海域调查发现发现的福建漳州龙海九节礁沉船。2010 年，在福建平潭碗礁东南海域调查发现发现的福建“碗礁二号”沉船。2010 年，在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炎亭镇海域调查发现发现的温州炎亭沉船。2010 年，在浙江省宁波市石浦县渔山海域调查发现发现的宁波渔山坟碑礁沉船。2010 年，在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围头湾海域调查发现发现的泉州围头湾沉船。

根据水下考古和闽南人迁徙地的考古发现表明：虽然当年的茶叶已不复存在，但与茶叶相伴的茶具的出水与出土，都有力地证明了闽南地区的海上茶瓷贸易给海上茶瓷之路的形成、发展与繁荣所作出的贡献。闽南人开创了“海上茶瓷之路”，带动了东西方各种观念与文化的相互交融。

三、结语

闽南地区饮茶器具艺术的发展与演变，反映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自古以来随着饮茶活动的发展，其品饮艺术也在不断地得到升华，同时又为当地陶瓷产业的发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从闽南地区生产的青瓷、青白瓷、白瓷、色釉瓷到青花瓷，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陶瓷工艺的每一次重大发展与突破，都会带动茶具艺术新的变革与发展。而且，不同时代的精神气质、文化环境和艺术氛围也隐含在茶具艺术的每一次发展中，使之成为格调高雅、丰富多彩的实用与艺术的综合物，并散发着浓郁的地域文化气息。

如今，随着社会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增加了人们的生活压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越来越少，饮茶成为使人获得片刻宁静、轻松、愉悦的享受。因此，各种各样的茶坊、茶楼成为人们消遣休闲的好去处，饮茶风尚带动了陶瓷茶具设计的空前兴旺，市场上出现了各式各样的陶瓷茶具。而当代陶艺的兴起，更带动了陶瓷茶具设计审美领域的革新。当代陶艺主张个性张扬与观念的表达，艺术效果力求新颖独特，创作空间无限，陶瓷茶具的设计在某种层面上已经成为生活中新的元素，文人茶具的出现是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特色。文人们将饮茶活动与陶瓷茶具设计结合起来，融入自己的生活，反映了在浮躁、功利的现实世界里文人追求回归自然的愿望。

无论是大航海自由贸易时代，还是海禁时代；无论是朝贡贸易时代，还是海洋帝国时代，闽南人都敞开大海一样的胸怀，放眼世界，从“海洋文明”到“海上茶瓷之路”，迎纳中西方多彩文化，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作出卓越贡献。以茶、瓷为主要商品的“海上茶瓷之路”，在宋元时期就达到高度成熟发达的程度，引起东西方文化的交流碰撞，对世界各地的经济、文化都起着重要的作用。至今，闽南乌龙茶和陶瓷仍在传承中发扬光大，成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继续在“海上茶瓷之路”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作者简介：

陈建中，泉州市博物馆馆长，文博研究馆员。

莆田市融入“一带一路”战略的主要优势及其对策

蔡天新

内容摘要:“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等东盟国家时为了促进区域共同体形成而提出的倡议。这一战略构想是在古丝绸之路概念基础上形成的一个新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构想,引起世界各国特别是古丝绸之路周边国家和地区的高度重视,并列入了第二十二届北京 APEC 会议议题。莆田市作为海上古丝绸之路的始发点之一,有着众多的人文优势和地理资源优势,如妈祖文化、港口码头、交通枢纽、旅游资源和产业、侨乡、莆商等。莆田市应紧紧抓住机遇,积极凸显妈祖文化在新丝绸之路中的地位和作用,积极申报并筹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湄洲岛自由贸易区,并结合莆田市的人文优势和生态环境优势,构建世界妈祖文化旅游中心。同时,要充分发挥莆田港口和交通枢纽优势,大力促进莆田现代物流业发展。另外,还要发挥海外莆籍侨商和国内广大莆商的资金、信息、技术、理念和管理经验等方面的优势,积极拓展海外市场,扩大莆田与东盟国家的对外经济交流,促进莆田市经济社会的跨越发展。

关键词: 新丝绸之路 莆田市 对外合作 经济交流

“一带一路”构想是在古丝绸之路概念基础上形成的一个新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2013 年 9 月和 10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等东盟国家时,分别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简称“一带一路”战略构想。2014 年 3 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要求各级政府:抓紧规划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中国经济在新的起点上履行大国责任、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具体体现,既是区域经济合作的客观需要,也是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经济共同发展的重大举措。一方面,从我国与欧亚地区的经济贸易发展分析,欧亚国家已成为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已占全世界总额的 55%左右,并拥有世界总人口的 70%和世界已探明能源资源的 75%左右。

“这样的经济体量,再加上世界最有竞争力的经济发展速度,使得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望成为新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大动脉。”¹近几年来,中国与欧亚地区的双边贸易不断扩大,据国务委员杨洁篪在今年博鳌论坛上公布的数据:2013 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额已超过 1 万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 1/4。在过去 10 年中,中国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额年均增长 19%,较同期外贸年均增速高 4 个百分点。所以,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中国要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

¹ 人民网:丝路经济带可在 35 年内建成, <http://finance.people.com.cn/n/2014/0628/c1004-25213174.html>。

必须积极拓展欧亚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市场和资本。另一方面，从中国经济结构状况分析，经济总量的 70%是分布在沿海省份，90%的进出口总额是通过海运完成的，东南亚各国自古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和组成部分。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历史与现实需要出发，着眼于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为了深化与加强与东盟的合作，构建更加紧密的经济共同体，提出了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这一区域经济共同发展的战略构想，既成为中国扩大对外开放、促进中国与东亚和东南亚各国经济交流与合作的新平台，又保证了国家安全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可以说这是一个双赢的大区域性战略。这次北京 APEC 会议，还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作为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内容，列入了大会议题，引起了与会国家的高度关注。另外，从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看，“一带一路”战略，既能促进我国调整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和满足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客观需要，又可以进一步推动西部大开发、扩大中国与丝绸之路周边国家的经济交流与人员往来，促使中国企业“走出去”，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转型，为全面深化改革创造更好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可见，“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一、目前全国各地已经掀起了建设“一带一路”的热潮

“一带一路”构想是中国在和平崛起的关键时期提出的一个具有全球视野的战略倡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各项社会事业蓬勃发展，不但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进到了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和第一贸易大国的位置。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决策，客观上要求中国在更大的范围、更大的空间、更广阔的领域来推动资源要素的流动，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实现地区经济的优势互补。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是目前全球最大的经济圈和区域共同体，它东边牵着亚太经济圈，西边系着发达的欧洲经济圈，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长、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提出之后，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地方政府的广泛关注，自 2013 年底至今，各省市规划、布局“一带一路”战略的行动如火如荼、高潮迭起。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率先成立了《“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促进新疆对外开放》课题研究小组，就新疆与欧亚国家的经济交流与协作进行了专题研究；中国最南边的海南省也成立了“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所，全面系统地研究“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云南省则由发改委牵头，组织专家学者进行新丝绸之路的十大课题调研，完成了云南“一带一路”战略的总体方案设计。西安市已经正式出台了《关于加快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的实施方案》，兰州市也审议通过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兰州市实施方案》。还有浙江宁波、广东湛江等地，纷纷抓住建设新丝绸之路的战略机遇，努力将本地区打造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始发港和“一带一路”的战略支点。特别是从 2014 年下半年起，东南沿海各省纷纷争抢“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地，制定出台了许多“一带一路”战略方案和实施计划，各省市、各地区有关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竞争进入了白热化状态。

福建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新战略实施，已经制定出台了《关于贯彻落实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战略的实施意见》，并要求各地市积极融入新丝绸之路经济战略之中。省委政策研究室组织各地市进行了专题调研，省委宣

传部、社科联等单位正在筹办福建省“一带一路”战略研讨会。特别是泉州市已经走在全国前例，向中央呈报了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总体方案”。莆田市也紧锣密鼓地制定《关于贯彻落实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战略的行动计划》。厦门、福州、漳州、宁德等地市，都在积极制定和实施“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方案和行动计划。可见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对于福建省以及各设区市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但由于各地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基础设施不大一样，资源条件和文化底蕴也有差异，各设区市融入“一带一路”战略的具体措施和行动计划也不可能一致。本文拟就莆田市融入福建省“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主要优势和对策，进行个案分析与研究，提出一些不成熟的建议，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二、莆田市融入“一带一路”战略的主要优势

莆田市地处我国东南沿海，镇海峡西岸中部，控八闽水陆要冲，其交通枢纽地位在福建乃至全国都具有重要意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独树一帜的海洋文化和颇具魅力的地域文化积淀，既为莆田古代对外经济交流和人员往来创造了条件，又为今天莆田市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奠定了基础，开辟了广阔前景。

第一，莆田市具有得天独厚的海洋港口优势。莆田地处东海之滨，福建中部，境内港湾环抱，岛屿众多，全市共有海岸线343.6千米，占全省海岸线总长的10.3%。莆田市海域广阔，港口资源丰富，有平海、莆禧、醴泉三个半岛和150多个大小岛屿，总面积59.02平方千米，大部分为大陆岛，少数岛屿由沿海沙洲扩展而成，12个岛屿有常住居民，其中南日岛面积最大，是福建省四大岛屿之一，由70多个岛、屿、礁组成，总面积59.02平方千米。第二大岛是湄洲岛，总面积16.02平方千米，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地之一，现是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也是对台小额贸易试验区。莆田市境内还有湄洲湾、兴化湾和平海湾等三大海湾，以及秀屿港、东湖港、三江口港、枫亭港等多个港口。特别是湄洲湾秀屿港，水深港阔，不冻不淤，口外岛屿拱卫，内侧有半岛或岬角环抱，形成“口小腹大”海湾，避风条件好，是发展港口经济和开展对外贸易的天然良港。莆田市既有发展海洋经济和开展对外贸易的优越条件，又有发展现代旅游业的天然资源和人文优势，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海洋资源，以及港口优势，客观上为莆田市融入“一带一路”战略奠定了基础。

第二，莆田市具有独树一帜的妈祖文化优势。莆田是妈祖的故乡，湄洲岛上有“东方麦加”之称的妈祖庙，也是世界各地华裔商人和广大妈祖信徒共同崇拜的圣地。据宋《仙溪志》记载：“本军眉洲林氏女，为巫，能知人祸福，歿而人祠之，航海者有祷必应……沿海郡县皆立祠焉”。¹有关妈祖“灵迹”的记载甚多，有人说她“初为巫祝”，常替人驱邪治病，屡验不爽，谓之“灵女”；有人说她小时候得高人指点，能知天文地理，谓之“神女”；也有人说她自幼熟悉水性，16岁那年其父渡海舟履，溺水救父，因孝闻名，谓之“孝女”；还有人说她经常救护海上遇难渔船，被称为“龙女”……林默一生虽然短暂，但她乐善好施、助人为乐的精神永远活在百姓心中。据《世界妈祖庙大全》统计：目前世界各地约有5000多座妈祖庙，2亿多妈祖信徒。妈祖之所以能从地方民间信仰演变为全国乃至世界性的海洋文化，其中也有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缘由。一方面，妈祖文化是古代海上经济

¹（宋）黄岩孙撰《仙溪志》卷三，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8页。

交流和对外贸易的产物。早在唐朝末期，福建沿海商贸发达，海运繁忙，莆商足迹遍及我国东南沿海各省和东南亚各国，但因古代交通工具简陋，海难事故频发，能够拯救海难的妈祖自然成为广大海商的保护神，故商船航行到哪里，商人们就将妈祖信仰传播到哪里，凡莆商或闽商足迹所到之处，必建有妈祖庙；凡是商业繁荣之地，妈祖香火必然旺盛，自古以来妈祖就是商人和海上贸易的保护神。另一方面，妈祖的大爱精神符合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妈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行善救困、舍身取义”精神，不仅为中国古代百姓所乐以接受，也被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所认可，这也是妈祖信仰长盛不衰和妈祖文化源远流长的关键所在。今天，尽管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但人们对妈祖的大爱精神仍然崇拜有加，这种信仰必将成为莆田市乃至福建省融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一条重要捷径。因为促进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区域经贸各领域的发展与合作，既是对共同体区域蕴藏的巨大潜力的开发，也是对世界历史文化的传承。

第三，莆田市具有人数众多的商贾队伍优势。莆田历来人多地少，资源有限，百姓生活艰难，自古就有“成家立业”的商业意识和“从商为贾”、“重商趋利”的商业观念。莆田境内对外贸易起源于隋末唐初，据《福建商业志》记载：“隋唐时期，福建的福兴漳泉四大平原得到开发，商业逐渐发展。隋开运河之后，唐设馆驿，辟险阻，内地与福建的交通与货运日趋便捷。中唐理财家刘宴称：‘且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蜀，前指闽越……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货往来，昧旦永日……’”¹特别是在唐代经济繁荣的大背景下，莆田对外贸易迅速崛起，“莆仙沿海成为过往贡舶蕃客的重要停靠口岸。当时江口、莆口、瑞明(今涵江)、枫亭，已成为易货互市的繁华集镇，设有待宾馆和枫亭驿，招待官差、蕃客。大型船舶曾直驶进莆口(今城厢区南门、筱塘一带)”²。进入宋代之后，兴化军三县(莆田、仙游、兴化)有不少百姓背井离乡，外出谋生，逐渐养成了“走四方”的经商习俗。从明代起，大批莆商迁徙东南亚各国和东亚各国经商或定居，促进了莆田与海外经济交流和人员往来的发展。据史书记载：“莆田县陈、柯、蔡、许、李、王等姓氏族谱载。他们的先人在明太祖元年至成祖永乐元年(1368—1403)间就移居东南亚。”³二战结束后，东南亚各国经济开始腾飞，海外莆商抓住机遇，投资创业，大力发展，成绩斐然，出现了众多事业有成的商贾巨富，造就了亚洲四大天王(新加坡华人首富)黄廷芳、印尼著名银行家李文正、新加坡金鹰集团(中华慈善大使)陈江和等一大批商界精英。中国改革开放后，国内经济发展，商路畅通，莆田人纷纷外出经商创业，莆商队伍迅速壮大，知名度大幅提高。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世界各地约有130多万莆商，足迹遍及世界各地，仅国内各大中城市就有70多万莆商活跃在各行各业，成为中国商界的一支劲旅，与徽商、晋商、浙商等著名商帮一样，成为人们所熟知的莆田商帮，赢得了“中国犹太人”的美誉。尤其是在民营医院、木材建材、珠宝首饰、工艺美术、民营加油站、餐饮小吃、鞋革等行业，莆商独树一帜，颇有建树，在全国市场占主导地位。据有关部门统计：莆商曾经控制了全国90%的木材市场、80%的民营医院，70%的油画商品、50%的民营油站、40%的金银珠宝，仅这几大行业的莆商每年创造的GDP达就达4000多亿元人民币，产值超过8000亿。引导海内外莆商融入莆田市“一带一路”战

¹ 《福建商业志》，中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² 《莆田市外经贸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³ 《城厢区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1页。

略，大有文章可做。

第四，莆田市具有融入“一带一路”战略的基本基础设施。一方面，莆田市具有发展现代物流、旅游业和对外贸易的资源和条件。改革开放以来，莆田市始终把发展港口城市作为战略目标，始终将有限的财力大部分投入到港口基础设施建设之中，目前已经初步形成了湄洲湾、兴化湾、港口集疏运体系，对外贸易的国家已达 170 多个，与莆田港口通航的国家和地区达 27 个，通航的港口有 50 多个。莆田境内的公路基础设施也比较完善，沈海高速、沈海高速复线、莆永高速、湄渝高速贯穿莆田全境，形成了一个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特别是福厦高铁、向莆铁路的建成运营，以及湄洲湾港口铁路支线、秀屿木材加工区铁路专用线、兴化湾南岸铁路支线等铁路通道的筹建，不但将使莆田融入中国东南沿海高速铁路网之中，而且进一步畅通莆田市连接长三角、珠三角，以及福州、泉州、厦门和江西、湖南等内陆地区的海上通道。另外，正在筹建中的莆田军民合用机场，也将成为对台和与东盟各国通航的支线机场。莆田市已经形成了通畅便捷、全方位的海陆空疏运体系。另一方面，莆田市还拥有临港先进制造业、现代物流业、现代旅游业、现代农业、木材加工、精细化工、工艺美术，以及鞋业、服装、电子、食品等新兴产业，这些都是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优势产业。

三、莆田市融入“一带一路”战略的主要对策

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是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经济发展构想的实践，建设“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推进福建省以及东南沿海各省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重大决策。新丝绸之路战略的构建与实施，对经济相对落后的莆田市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如何使莆田市有效地融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之中，既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问题，也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任务的重大举措。在此，就如何发挥莆田的传统文化优势和现代资源条件，尽快融入新丝绸之路战略之中，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莆田市要借助妈祖文化的影响力，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中抢占先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既是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战略，又是中国和世界海洋文化的传承。莆田是妈祖文化的发源地，妈祖信仰既是维系古代海上贸易的纽带，也是现代世界海洋文化的重要内容，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绝对绕不开妈祖文化这一重要内容。莆田市应大力凸显妈祖文化在“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的纽带作用，努力筹建“世界妈祖文化中心”，积极承办“海上丝绸之路和平论坛”、“世界海洋文化和平论坛”、“海峡两岸妈祖文化高峰论坛”和“世界妈祖文化学术研讨会”等大型盛会，着力扩大妈祖文化在世界各国的影响力，凸显妈祖文化在“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地位。另一方面，要积极开展以妈祖文化为主题的世界海洋文化交流活动，着力办好妈祖文化节旅游节、妈祖大祭、湄洲妈祖海外巡游、妈祖文物展等，也可以编制一套适用世界各地新妈祖庙开光、点眼和册封、祭典等仪式，为世界各地的妈祖信徒提供服务，促进妈祖文化交流的扩大与发展，增进海外华人华侨对祖国的认同感，进而促进莆田市与海外各国的经济交流和贸易发展。同时，还可以通过妈祖文化发祥地优势，申报“海上丝绸之路保护神”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提高妈祖文化在“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中的地位，使莆田市在“一带一路”战略中争取到更大的舞台、更重要的地位，发挥更大的作用，取得更大的成效。

第二，紧紧抓住“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家战略正在规划的契机，建议省政府向国务院申请设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湄洲岛自由贸易区”。湄洲岛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始发点之一，妈祖文化是连接海外华人华侨的海洋文化纽带。早在唐宋时期，莆田就“有‘游商海贾，履风涛历险阻，牟利于他郡外蕃’”记载。当时木帆船已能远航至阿拉伯及东南亚、朝鲜、日本一带，并逐渐形成了一个“无兴（化）不成镇”的“兴化商帮”。¹明代郑和下西洋时，也把妈祖作为海上保护神，并随着郑和船队从海上丝绸之路传播到世界各地。据史书记载：“明永乐至宣德年间，在我国航海史上出现了举世闻名的郑和下西洋事件，成为人类史上最早的航海壮举，也是明代最大规模的海上外交活动。郑和在20余年间内七下西洋，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促进了妈祖文化在海外的广泛传播。”“郑和船队从江苏出发，经福建、广东沿海再往我国南海诸岛出国访问，每当船到码头，必先祭拜妈祖，如果发现没有妈祖庙的码头，便带头捐建天后宫。郑和还规定：凡出使或出海官船，必祭妈祖，并数次亲临莆田湄州祖庙进行朝拜，邀请兴化船工和商人一道出海，多次奏请朝廷加封妈祖，积极推动妈祖文化在海内外的广泛传播。”²随着郑和下西洋船队的广泛外交，莆田与东南亚各国和东亚各国的经济交流和人员往来也日益频繁。可见，湄洲岛作为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发点之一，是有历史依据的；莆田市是妈祖文化的发源地，也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在湄洲岛建立国家级海上“丝绸之路自由贸易区”，既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又赋予了丰富的现实内容，不但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第三，以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契机，积极筹建莆田市海峡西岸现代物流基地。海上丝绸之路的主题是经济交流与合作，其核心是贸易与物流，莆田市应利用海峡西岸交通枢纽的优势，抢占先机，积极推进海峡两岸现代物流基地建设。具体地说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要根据“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需要和省政府关于建设“大港口、大通道、大物流”的战略要求，结合莆田市港口物流发展需要，高起点、大手笔、前瞻性地定位莆田市现代物流业的发展战略，着力将莆田市打造成为海峡西岸物流基地。二要根据“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新战略和国务院关于“建设连通海峡两岸的现代物流中心”的战略决策，结合莆田市在海峡两岸经贸合作中的地理优势，着力凸显莆田市在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促进海峡两岸物流中心的建立与形成。三要在各港口、码头、火车站和物流基地的功能定位上，坚持高起点规划，前瞻性布局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将现代物流业规划与莆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市规划和区域经济发展规划，以及其他产业发展规划有机地衔接起来，统筹规划，协调发展。四要以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契机，着力推进莆田现代物流业的快速发展，发挥莆田市在东南沿海的交通枢纽作用和对外贸易优势。

第四，借助“一带一路”区域合作战略形成与实施的历史机遇，大力推进莆田现代旅游业发展。一方面，要统筹规划、全面整合莆田境内旅游资源，形成以妈祖文化为核心、海洋文化为主体，寺庙文化、祈梦文化、武术文化、民俗风情、进士文化和清官廉吏等名人文化为补充的世界妈祖文化旅游中心。另一方面，要以平海湾、兴化湾、湄洲湾和湄洲岛、南日岛等岛屿的滨海资源为依托，

¹ 《莆田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441页。

² 蔡天新撰：《莆商发展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63页。

大力发展滨海旅游、海钓休闲和度假旅游产业，建设国家级的“海上丝绸之路旅游度假胜地”。同时，要加强对莆田北部山区旅游资源的整合，建立一个以九鲤湖、九龙谷、麦斜岩、菜溪岩、永兴岩、金钟水库、东圳水库等自然景观为主的生态休闲度假旅游圈，着力促进莆田现代旅游业的快速发展。

第五，发挥海内外莆商的资金、信息、理念、技术和管理经验等优势，帮助莆田市拓展海上丝绸之路。一方面，要充分发挥莆田侨乡优势，努力拓展海外市场。莆田市有 100 多万海外华人华侨，约有 60 多万侨商，其中 90% 为新生代侨商，主要分布在新丝绸之路走廊周边，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各国和东亚各国，欧洲、北美洲和非洲等到地区，涉及金融证券、电子 IT、房地产业、服装饰品、塑料玩具、新农业开发、餐饮业、工艺品、超市、纺织、轮胎、造纸、钢铁、航运、石油等行业，出现了众多的著名侨商，如印度尼西亚的金融世家李文光和李文明、“钢铁大王”陈财基、“轮胎大王”林德祥和姚子兴、海钻集团总裁关文龙等著名莆商；在新加坡有交通业巨擘林荣、石油大亨林恩强和餐饮业领军人物黄日昌、周颖南等著名莆商；马来西亚有福建社团联合会会长童玉锦、东马运输有限公司董事长郑天祥等著名侨商；莆港澳台地区有台湾立祥公司张承璜、香港房地产大亨黄志祥、电子行业领军人物林平基、“西装大王”吴良好、荣获“香港青年工业家奖”的许奇峰等，都是海外侨商的佼佼者，有不少莆商企业进入世界华人企业 500 强。莆田市要积极着力引导海外侨商积极参与新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使莆田在“一带一路”战略中争取到更加广阔的经济交流空间与合作领域。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国内莆商的重要作用，推进莆田市同欧亚、非洲和东亚各国的经济联系。中国改革开放后，莆田人奔赴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国经商创业，许多莆商事业有成，如在阿根廷就有郭加迪、王庆苍、陈荣华、关国武等 1000 多现代莆商；在西班牙有蔡俊凡、陈铭泉、李森、王建国、黄文荣等 1500 多改革开放后刚出去的莆商；在纳米比亚也有林金淡、陈庆平 200 多莆田人在经营餐饮、超市等行业。特别是港澳台地区，莆商众多，实力雄厚，人数达 15 万之多。还有南非的郭顺元、巴西的郑金云、帕劳华人总商会会长陈驰等，都是改革开放后外出投资创业的年轻莆商。海内外莆商，观念超前，经营有方，事业辉煌，资本雄厚，正确引导广大莆商加盟莆田市“一带一路”战略，将成为莆田市对外经济交流与贸易合作的一支劲旅。

第六，创新合作模式，大胆先行先试，以市场化模式推进莆田市的“一带一路”建设。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构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核心问题是拓展对外经济交流，促进本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这就要求各级政府管理部门的监管理念要适应国际市场运行的基本规则，作为地方政府应着重于宏观管理、市场规则的制定、市场秩序的规范、社会诚信的建立，努力为区域经济健康发保驾护航。同时，建设“一带一路”区域经济共同体，涉及众多国家和地区，由于国家制度差异、经济模式不同和传统文化差别，将成为各国融入“一带一路”的主要障碍，克服这些差异和障碍的最好办法，就是要遵循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才能保证区域经济有序地竞争和健康地发展。所以，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丝绸之路”区域共同体，无论是从国家战略高度考虑，还是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层面分析，最重要的是要遵循经济全球化规律。所以，无论是福建省的“一带一路”战略，还是莆田市的新丝绸之路建设都必须立足省情、市情，按照党的三中全会提出的“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改革精神，坚持“市场引导、政府引导、企业参与”的原则，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努力营造一个良性发

展的经济竞争环境和市场竞争机制。特别是经济相对滞后的莆田市，既要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又要大胆选择一些项目进行市场化运作尝试，如属于会展经济范畴的“妈祖文化旅游节”、“中国（莆田）海峡工艺品博览会”、“中华武术文化节”、“国际红木文化节”等大型展会，完全可以采取“BOT”或“BT”等模式，通过国际招标或聘请专门从事会展经济的国内外著名运营商来运作。还有港口、码头、物流园区的投资、建设、运营等，都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采取国际招标方式运作。特别是“自由贸易试验区”、“妈祖文化创意园区”、“海峡两岸现代物流中心”、“海上丝绸之路保护神”世遗申报等重大项目，都可以采取市场化运作模式，在这方面国外有许多成功的先例，可以大胆地借鉴，即使在改革中出现问题或失误，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俗话说“失败乃成功之母”，没有失败的教训就没有成功的经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提出“大胆创新，宽容失误”，只有大胆先行先试，勇于探索创新，才能使莆田市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实施过程中赢得先机，取得重大突破，才有机会改变莆田市经济社会相对落后的局面。如果不突破常规，因循守旧，按部就班，莆田市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将永远无法超越兄弟地区。

总之，古丝绸之路曾是经济共赢、文明互鉴的合作范本，“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不仅是中华民族实现中国梦的重大决策，也是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共同事业。融入“一带一路”区域经济共同战略，对莆田市来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历史契机，在国家总体规划未出台之前，可以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从“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等五个方面先做起来，发挥莆田市传统文化优势和现代资源优势，大胆创新、先行先试，争取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过程中赢得先机、争取更大的作为，取得更大的成效。

作者简介：

蔡天新，男，1955年出生，现体系中共莆田市委教授、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地方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漳州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思路与对策

谢艺麟

漳州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必须要了解漳州在明清时期“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海丝”）的辉煌历史，才能更有底气提出发展的思路与对策。

一、明清时期漳州“海丝”的辉煌业绩及其历史地位

（一）明清时期漳州“海丝”的辉煌业绩

自陈元光开漳以来，漳州一直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港口城市。早在宋朝时期，漳州是福建四大造船基地之一，并受泉州刺桐港辐射，开始“海丝”贸易。明朝中后期，由于月港（在今龙海市海澄镇）的开放，漳州经济十分繁荣，被誉为“闽南大都会”，号称“小苏杭”。漳州“海丝”贸易取得前所未有的辉煌。

1. 月港是明朝中后期“海丝”唯一合法始发港。隆庆元年（1567年），明朝政府准许月港“贩东西二洋”，使月港成为当时中国唯一合法的对外贸易港口。由于具有垄断地位，漳州海商利用月港主导了中国的对外贸易，月港因此成为16世纪后期至17世纪中叶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海外交通贸易的中心，也是国际闻名遐迩的贸易港口，被葡萄牙人叫为Chincheo。¹至崇祯五年（1632年），明朝政府结束对月港的管理，港口繁荣景象不如往昔。但漳州海商依然利用浦头、角美、石码、海澄、浮宫、港尾、佛昙、旧镇、下寨、铜陵、梅岭等港口继续从事对外贸易，从未间断。

2. 漳州的造船业非常发达。宋绍兴年间（1131-1162年），漳州每年被政府征用的船只就达120艘。明朝时，漳州的造船业更加发达，是著名战船——福船的主要制造地。抗倭名将俞大猷在广东打仗时，曾派人到漳州督造战船80多艘。漳州民间人士花巨资私造巨船，载重可达200-500吨之间，可抗风暴，适宜远洋，每年有上百艘巨船对外贸易。

3. 漳州涌现许多著名海商和航海家。漳州有记录的最早海商是南宋的黄琼。明清时期，漳州涌现了许多优秀的航海家、海商，如明朝五次追随郑和、后率船队八下西洋的王景弘，最早开发澳门的海商严启盛，出使琉球册封尚德为中山王的潘荣，十八世纪世界首富、清朝广州十三行首任商总潘振承，清朝广州十三行重要行商潘有度、叶上林、潘长耀、谢嘉梧、潘仕成等，支援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抗法的台湾首富林维源，被暹罗国王封为宋卡城主、爵位世袭八代的吴让（也叫吴阳），拥有32个跨国分局的银信物流集团——天一总局的创办人郭有品等。

4. 漳州海商开辟数十条航线，并积极传播闽南文化。漳州海商以月港为中心，开辟了20多条航线，与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商品贸易。其中，漳州月港→吕宋马尼拉→墨西哥阿卡普尔科港的大三角航线，是大帆船时代维持最久的一条国际贸易航线，延续了250多年。由于季风、洋流的原因，

¹ 廖大珂：《16-18世纪初欧洲人地图中的Chincheo港》，政协漳州市委员会编《第二届海商论坛暨“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座谈会论文集》，2011年12月，第69页。

有一部分漳州海商逗留海外，融入当地，日本、琉球至今仍有漳州籍王、阮、毛、陈等姓氏的后裔。大多数漳州海商主要聚居在东南亚，他们把闽南文化传播到侨居国。如1600年，“甲必丹”郑芳扬在马六甲修建了一座青云亭（也叫观音亭），尊奉汉传佛教。1628年，漳州海商陈冲一的后裔在日本长崎修建了福济寺（俗称漳州寺），供奉妈祖，成为长崎最雄伟壮观的唐人寺院。

5. 漳州人研究海外交通史的成就显著。明朝王景弘的《赴西洋水程》，是明清时期航海人员的导航秘籍。诏安县人吴朴是我国古代第一个认定漳州为当时南北海上交通路线中心的学者，著有《渡海方程》（别称《顺风相送》）。该书是世界上最早记录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也是中国第一部刻印既有国内海运又有东西洋海运的航海针经。明朝龙溪县人张燮的《东西洋考》是当今学者研究海外交通史案头必备的工具书。此外，明朝漳浦县人杨一葵的《裔乘》、清朝漳浦县人程日烱的《噶喇吧纪略》和龙溪县人王大海的《海岛逸志》在海外交通史、华侨史研究方面也占有重要地位。

6. 漳州的纺织业相当先进。明清时期，漳州的纺织业开始由家庭副业向专营作坊发展，并具有一定的规模，纺织技术也不断改进，生产出许多精美的丝织品，如漳丝、漳绸、漳绒、漳绣、漳纱、漳绢、漳缎、漳布等。其中漳绒（也叫“天鹅绒”）畅销欧洲、日本；漳布还占领了欧洲最重要的纺织基地——西班牙的安达卢西亚，西班牙的王公大臣和贵妇人以穿“漳州产安达卢西亚布”为荣。¹

7. 漳州的制瓷业十分兴盛。漳州瓷器生产始于宋朝，盛于明朝中后期，衰落于清朝中后期。南宋时期，漳浦罗宛井窑就有99座；明朝时，平和南胜、五寨就连片出现十里窑烟，规模十分壮观。此外，华安高安窑、龙文东溪窑、南靖金山窑、河头窑、漳浦英山窑、赤土窑等数十处也有一定的规模。这些瓷器大部分从月港出口，运售到东南亚、日本和欧美。欧美国家称漳州瓷为“克拉克瓷”。

8. 外国银元源源不断流入漳州。从16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在长达近400年的时间里，漳州海商把瓷器、茶叶、丝绸售往世界各地，赚取银元，当时全球（主要是美洲和日本）生产的白银大部分通过贸易流入漳州月港，而后在闽南一带流通的番银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版别。外国银元在漳州流通时间跨度之长、数量之大、国别之众、版本之多，是其它城市所少见的。²

（二）明清时期漳州“海丝”的历史地位

虽然只有65年辉煌的历史，但月港是明朝中后期唯一合法的“海丝”港口，也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它上承宋元时期的泉州“海丝”文化，下启清朝中后期的广州“海丝”文化。因此，月港在中国乃至国际海洋交通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1. 月港第一次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民间海外贸易。月港的开外，漳州海商是主导力量，使民间海外贸易迅速发展起来，结束了明朝近200年的“朝贡”贸易，标志着自汉朝以来我国1000多年以官方垄断为主的海外贸易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2. 月港第一次开创了民间海外贸易的管理体制。为加强月港的对外贸易，明朝政府在海澄县专门设立了督饷馆，对进出月港的船只征收“水饷”、“陆饷”、“加增饷”等3种商税。仅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明朝政府在月港就收取了35100多两白银的商税，漳州因月港而成为明王

¹ 苏文菁：《闽商文化》第九讲《前工业时代的制造业与文化行销》，政协福建省委员会主管主办《政协天地》2010年第10期，第62页。

² 林南中：《早期“番银”见证明清时期闽南商贸繁华》，政协漳州市委员会编《漳州海商论坛论文集》，2009年11月，第194页。

朝的“天子南库”。¹

3. 月港的民间对外贸易促进中国经济史上的第一次大飞跃。蕃薯、烟草、花生等都是在明万历年间从国外经月港传入中国，而后逐渐扩种到国内其它地方，改写了中国农作物种植史和经济史。葡萄牙、西班牙从美洲掠夺数亿万两白银与漳州海商进行贸易，白银就从月港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各地，使中国的货币市场发生了巨大变化，白银逐步成为中国市场的主要流通货币，促使明朝万历年内阁首辅张居正推广“一条鞭法”。月港开放时期是漳州经济社会在历史上的第一次腾飞。这一时期，明朝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一，远远超过西方列强经济总量的总和。

4. 漳州海商与西方殖民者第一次共同推动了经济贸易全球化。16世纪中后期，漳州海商代表东方最强的中华帝国，“欧洲三剑客”（即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则代表西方列强，双方根据“和平、平等、诚信”的原则，以物换银的方式进行贸易，各取所需，互惠互利，实现双赢，并共同推动了第一次全球化的经济贸易。这种贸易也促进了中国东南沿海商品经济的繁荣和资本主义的萌芽。

5. 漳州第一次大规模移民对台湾和东南亚的开发作出巨大的贡献。随着月港的兴起，漳州也出现了移民热潮，过台湾，到日本，下南洋，闯世界，对台湾和东南亚的开发，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与繁荣，都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如“开台王”颜思齐、“阿里山神”吴凤、“开宜兰鼻祖”吴沙、“板桥林家”、“雾峰林家”等为代表的漳州人开发台湾，造福台湾，至今为人称道。在东南亚的漳州人所作出的贡献，更是多如繁星，举不胜举。当代最为出名的是新加坡第4任总统黄金辉、菲律宾第11任总统科·阿基诺夫人，他们祖籍分别在龙海市和漳州台商投资区。

二、漳州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势与困难

（一）漳州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势

随着“一带一路”宏大构想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漳州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具有一定的优势：

1. 交通优势。漳州陆路有2条国道、3条高速公路、1条铁路、2条高速铁路穿境而过，未来还有厦漳同城大道、沿海大通道和漳永、漳梅高速公路以及民用机场等路网的建设。漳州海岸线长715公里，有20多个天然港湾，可建设150个万吨级以上的泊位码头。漳州港、古雷港、东山港等对台、对外贸易优势逐步凸显。漳州具有做好“大港口、大通道、大物流”的优势。

2. 生态优势。漳州是福建省生态先行示范区，更是国家级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核心区，生态城市竞争力位居福建省第一。漳州市委、市政府提出建设“田园都市、生态之城”，保护青山绿水，构建闽南文化生态走廊，发展低碳产业，走环境友好型之路，使宜居宜业的生态环境成为漳州吸引台资、外资落地生产的最大优势。

3. 腹地优势。漳州陆域面积达1.26万平方公里。与周边省份和城市相比，漳州目前处于工业发展第二波的初始阶段，无论是沿海县（市），还是山区县，都还有许多土地储备，可供规模工业的用地需要。在工业转型升级、产业对接方面，漳州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4. 人文优势。漳州是著名的侨乡和台湾同胞重要祖籍地。旅居海外的漳州籍侨胞有100万人，设立100多个侨社，台湾同胞中有35.8%祖籍是漳州的，漳州籍的港澳同胞有10万人。漳州还有6个国际友城。漳州籍的移民把闽南文化和妈祖、关帝、开漳圣王、大道公、三平祖师公等民间信仰

¹ 政协福建省龙海市委编《明代闽南大都会·“小苏杭”——海澄月港》，2010年5月，第4页。

文化，以及南山寺的汉传佛教文化传播到海外。

（二）漳州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困难

漳州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中已经取得一些成效，但不可否认也存在一些困难，主要表现为：

1. 认识不足。大部分干部群众漳州“海丝”申遗的重要性认识模糊，申遗积极性不高，存在畏难情绪，有的人甚至错误认为，漳州“海丝”申遗没有给基层带来益处，反而增加地方政府的接待和财力负担。“一带一路”建设又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多数干部还没有很好领会中央的意图，对漳州如何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没有认真思考，甚至认为与己无关。

2. 宣传不够。漳州干部群众对月港和明清漳州海商辉煌业绩的研究不够，本地新闻媒体对漳州“海丝”的宣传造势也不够到位，导致月港和漳州海商在国内外的知名度不高，不利于漳州参与21世纪“海丝”建设和国际竞争。漳州虽然有主动邀请中央新闻媒体报道漳州“海丝”的一些情况，但主动走向海外宣传漳州“海丝”文化的举措不多。

3. 指导不强。漳州市“海丝”申遗工作领导小组的成员经常变换工作岗位，没有及时进行调整补充，没有有效地指导、协调“海丝”申遗工作。同时，对如何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漳州尚未完成顶层设计，还没有找到有效的结合点和突破口，形成完整的对策与发展思路相对滞后。

4. 投入不多。漳州各级财政对“海丝”申遗的投入相对较少，有的地方没有把“海丝”申遗所需要的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与其它8个申遗城市相比，漳州“海丝”申遗领导小组办公室人手少，经费紧张，申遗工作存在突击现象，没有循序渐进的工作理念，后续工作没有未雨绸缪，对漳州“海丝”旅游缺乏专题规划。

5. 保护不力。龙海、平和、华安县（市）对“海丝”文化遗址的保护措施不够有力，所有“海丝”文化遗址基本上处于无人看管状态，破坏性生产和建设现象依然存在。漳州“海丝”文化遗址亟待保护、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

6. 项目不精。尽管漳州已经遴选了31个项目，计划投资1100亿元，准备融入21世纪“海丝”建设。但经贸合作类项目仅占9个，不到总数的三分之一。同时，精品项目不多，有的项目“海丝”特色不够明显。

7. 对接不繁。从总体上看，漳州与台港澳、东盟各国的人文和产业对接比较多，但与东北亚、南亚、西亚、非洲和欧美各国的对接则比较少，产业融合度相对较低，民间人文互动不够频繁。

三、漳州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思路与对策

（一）加强领导力量，做好顶层设计

坚强的领导力量是干事创业的核心。漳州要通过上层建筑，准确把握漳州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意义，准确定位漳州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地位与作用，积极谋划漳州“海丝”申遗和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思路，推动各项工作有效开展。

1. 成立“一带一路”建设领导小组。要在漳州“海丝”申遗工作领导小组的基础上，成立漳州市“一带一路”建设领导小组，由漳州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亲自挂帅。该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牵头协调、领导市直有关部门、各县（市、区）和各个开发区或投资区，有效开展漳州“海丝”申遗的后续工作，推进漳州融入21世纪“海丝”建设的各项工作。要定期召开该领导小组联席会议，

实行一盘棋运作，形成合力，统筹推进漳州“一带一路”建设，确实把漳州建成 21 世纪“海丝”建设的重要枢纽城市和先行示范区。

2. 出台贯彻落实“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实施意见。要认真学习领会党中央和福建省委关于建设“一带一路”的有关文件精神，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五通”（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目标，结合漳州的优势和实际情况，完成顶层设计，尽快出台关于贯彻落实“一带一路”建设战略的实施意见，积极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并把任务分解给市直有关部门、各县（市、区）和各个开发区或投资区，明确责任分工，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全面提升漳州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促进漳州经济社会科学发展跨越发展。

（二）增加财力投入，促进“海丝”建设

漳州“海丝”文化遗址是漳州作为“海丝”申遗城市和 21 世纪“海丝”重要枢纽城市的重要标志。如果没有保护好“海丝”文化遗址，漳州就无法进行“海丝”申遗，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检查也就无从谈起，漳州作为 21 世纪“海丝”重要枢纽城市和先行示范区也失去理论支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此，建议漳州市委、市政府增加财政投入，推进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各项工作。

1. 保护和修缮“海丝”文化遗址。要对平和南胜窑、华安东溪窑做到重点保护和专人管理，进一步修缮“海丝”文化重点遗址，特别要修缮好月港古码头，并把台投区鸿渐番仔楼、郑和庙和许氏祖祠、潘厝古民居等明清时期漳州海商遗址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并积极申报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要重新普查漳州“海丝”文化遗址，做好漳州“海丝”文化水下考古工作，争取打捞海底沉船；要积极与福建省文物局和国家文物局沟通，争取把漳浦的罗宛井窑、南靖的金山窑和诏安的梅岭港也列入漳州“海丝”申遗的文化遗址。

2. 增加“海丝”申遗经费。要把漳州“海丝”申遗所需的经费列入市、县（市）级政府财政年度预算，每年有所递增，直至申遗成功。同时要加大投入，抓紧对漳州“海丝”文化遗址的周边环境进行有效整治，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漳州“海丝”申遗奠定厚实的基础，为发展漳州“海丝”文化旅游事业做好前期工作。

3. 建设中国海洋文化博物馆。要学习广州、泉州、扬州建设有关“海丝”博物馆的经验，积极向上争取资金，在龙海市择地建设一座“中国海洋文化博物馆”，放置漳州海域打捞出来的文物。该馆是漳州“海丝”申遗必备的硬件项目，应列入漳州融入 21 世纪“海丝”建设的重点项目。要把该馆建成集收藏、研究、展示、交流和服务等功能为一体的全国性海洋文化交流与合作基地，并申请列入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4. 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要畅通海上通道和完善临港复合交通体系，抓好以港口集疏运体系建设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建设，重点推进招银港区集装箱码头群建设，开辟与台湾、东盟贸易的新航线；要加快古雷油品储备中转基地和古雷港区、后石港区 30 万吨级码头群建设，提升古雷港区大型油品和漳州招商局开发区大宗商品集疏运能力，形成对接“海丝”、面向全球、运行高效的港口综合运输体系，将漳州建成“一带一路”石油化工和大型散杂货物枢纽港。要开通与“海丝”相关国家之间的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强化漳州海上贸易与陆地贸易间的衔接功能，将漳州建设成

为内陆地区接驳“海丝”航路的重要出海通道，争取开通东山与台湾高雄、澎湖的海上客货直航线。要加快港尾铁路支线和漳州-梅州高速公路的建设，力争早日并入连接中西部地区的全国铁路网和高速公路网，服务漳州融入“一带一路”建设。要在“十三五”期间切实推进漳州民用机场的建设，开辟空中新航线，缩短与台港澳、东盟等贸易国家和地区的时空距离，形成立体交通和贸易体系。

（三）加大宣传力度，提升漳州形象

形象靠宣传。漳州市委、市政府要提升“海丝”城市的形象，可以借鉴土楼申遗的宣传经验，抓好以下五项工作：

1. 编印《清宫漳州秘档》。据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存有明清时期有关漳州的档案材料 4000 多条。这些材料在全国各大图书馆都没办法找到，十分珍贵，对研究明清时期漳州历史特别是“海丝”历史有极大的帮助。建议漳州市政府责成漳州市方志办密切联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尽快编印《清宫漳州秘档》系列丛书，为漳州“海丝”申遗提供史籍依据。

2. 翻印本地有关“海丝”文化的史籍。要依托漳州四套班子理论研究室的力量和闽南师范大学、市属高校、市属文化研究团体以及市、县（市、区）博物馆、图书馆的专家学者，进一步加深漳州“海丝”文化研究，收集、整理和翻印明清时期漳州“海丝”的历史文献，特别是整理吴朴、张燮、杨一葵、程日焮、王大海等人的著作，为专家学者和广大文史工作者研究漳州“海丝”历史文化提供史籍参考。此外，要大力支持漳州市政协编印《中国“海丝”文化·漳州篇》丛书。

3. 申请举办“中国航海日”活动。“中国航海日”是国家交通部于 2005 年 7 月 11 日为纪念郑和下西洋 600 周年而设立的一个固定节日活动。举办“中国航海日”活动，可以充分展示一座城市海洋经济和海洋文化的综合实力。北京、上海、青岛、太仓、大连、泉州、南京、南通、日照等市已先后举办了 9 届“中国航海日”。漳州市政府应积极向国家交通部申请，举办 2015 年或 2016 年的“中国航海日”活动，并在漳州长期设置“中国航海日”南方论坛基地，邀请台港澳和东盟港口城市参与互动，并开展 21 世纪“海丝”投资贸易洽谈系列活动，再现漳州明清时期的“海丝”文化，进一步提升漳州文化的软实力。

4. 持续举办“海丝”高峰论坛。要学习泉州、宁波每年举办“海丝”文化节的经验，在漳州市政协主办“漳州海商论坛”的基础上，升格为漳州市委、市政府主办“中国‘海丝’高峰论坛”，邀请海内外客商、有关专家学者来漳参加 21 世纪“海丝”国际经贸洽谈和学术研讨会，考察“海丝”遗址和投资环境。今后，要把该论坛作为固定的载体，可以每年或两年召开一次，为漳州对接国内“海丝”申遗六省九市和台港澳地区、东北亚、东盟、南亚、东盟、非盟、欧美各国提供平台，以提高漳州在国内外的知名度。

5. 大力宣传漳州“海丝”文化。建议编写漳州“海丝”乡土教材，在广大中小学校普及漳州“海丝”文化知识；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习、宣传月港和明清漳州海商的辉煌历史，充分认识漳州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意义、所处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进一步激发漳州干部群众参与“海丝”申遗和融入 21 世纪“海丝”建设的良好社会氛围；要学习广西省在中央电视台播放三集电视专题片《海上新丝路》的做法，继续邀请中央、省、市各大新闻媒体、网络走入漳州，联合创作出品有关漳州“海丝”的影视作品，实行立体播放，进一步广泛宣传漳州“海丝”文化；同时也要走出去，

到日本、韩国、东南亚、南亚、西亚和欧美各国宣传漳州“海丝”文化。

（四）规划“海丝”项目，做好“三维”招商

融入 21 世纪“海丝”建设，项目对接是关键。漳州应实行项目带动战略，着重规划“海丝”精品项目，重点做好与台湾、东盟、西亚和欧美各国的“三维”招商。

1. 在全国率先建设对台产业对接与合作示范区。要根据漳州“一带一廊”、“两群”、“四组团”的发展布局，进一步发挥对台的独特优势，以东山、漳浦、台投区、招商局经济开发区、古雷港经济开发区为主，积极收储土地，规划对台产业对接与合作项目，以更加优惠的政策，进一步加大对台招商引资力度，切实加强漳台在远洋渔业、水产品加工、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和石化、电力等能源产业方面的合作与交流。特别要加快古雷石化产业链招商，延伸芳烃、烯烃及化工新材料产业链，大力生产有机化工原料、三大合成材料和精细化工产品，以及石化下游深加工产品，努力对接中石油、中石化、台湾石化企业和西亚、非洲石油或天然气生产国的企业，切实把古雷港经济开发区打造成世界一流的石化产业示范区。

2. 在全国率先建设与东盟港口城市产业合作示范区。漳州台商投资区的“天一总局”在清朝后期至民国初期，共设置 32 个分局，其中国内有 9 个分局，国外有 23 个分局，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银信物流跨国集团。因此，漳州要以修复“天一总局”总局这一国家文物保护单位为契机，积极寻找“天一总局”的国外 23 个分局的城市，与这些城市建立港口联盟或国际友好城市，在金融、通讯、造船、海洋运输、远洋渔业、物流和其它产业进行对接与合作；同时，每年也可以在台投区举办“中华侨批·世界记忆工程国际论坛”，邀请台港澳同胞和日本、韩国、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国、欧美各国的华人华侨参与，并开展招商引资活动，达到文化研究与经贸合作相结合的效果。要加快建设“海西滨海华侨城”，利用在常山的华侨对接境外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亲属的优势，打好“侨”牌，鼓励海外侨胞特别是东南亚华人华侨到常山投资兴业，承接“海丝”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转移，努力打造东南亚风情园。

3. 在全国率先建设对接欧美各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孵化基地。要切实推进漳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建设，重点做好对接欧美各国的高新技术产业，争取在电子信息、机械装备、生物医药、汽车制造、建材、食品等产业方面与欧美各国进行合作与交流，加强科研队伍的建设，加大科技合作与攻关力度，使欧美各国的一些高新技术产业能够在该开发区得到孵化，并转化为生产力，促进漳州高新技术产业的转型升级，助推漳州经济快速发展。

4. 加快规划和开辟漳州“海丝”旅游线路。随着丝绸之路申遗成功，“海丝”作为文化线路提升到国家层面进行申遗也将提速。因此，漳州要尽快组织力量，对漳州“海丝”旅游作专题规划，引进国内外有旅游开发资质的企业，按照旅游六要素的要求，逐步对漳州境内的“海丝”文化遗址进行开发利用，培训壮大漳州导游队伍，开通漳州海上一日游或漳州“海丝”、“福建土楼”两日游，在国内外积极开展“海丝”旅游营销活动，让国内外游客尽情领略漳州山水之美、生态之美、文化之美，使“海丝”文化旅游业成为漳州经济增长的新亮点。

（五）出台扶持政策，搞好自由贸易

国家发改委已将古雷列为全国七大石化基地之一。福建省政府也将漳州深化两岸产业合作区列

入加快福建科学发展跨越发展行动计划。因此，漳州要乘势而上，积极向上争取财税、金融和开放政策的支持，出台相关配套措施，重点做好对台与东盟的自由贸易。

1. 争取在东山设立对台自由贸易区。漳州是台商投资第三大密集区，对台小额贸易逐年递增。2014年1-8月，漳州往台湾出口79489万美元，比增48.5%。因此，漳州要学习平潭的经验，积极主动向福建省委、省政府和国家有关部门申请，努力争取国务院同意批准，在东山设立对台自由贸易区，在海峡两岸东山水产品加工基地的基础上，建立海峡两岸商品交易市场和保税物流园区，落实好ECFA及后续协议，加速漳州对接台湾自由贸易港，以推动漳州沿海县（市）经济的新一轮快速发展。

2. 争取中国-东盟自由贸易政策的延伸。2009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议签订后，漳州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得到发展。2013年，漳州对“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占全市出口总量的60.3%。其中，东盟还是漳州最大的出口市场，进出口总额达15.1亿美元。因此，漳州要借鉴广西南宁的经验，积极主动与中国-东盟中心秘书处联系，争取中国-东盟自由贸易政策延伸到漳州，进一步建立健全商务、金融、财政、海关、国检、税务等多部门联动的外经贸发展促进体系，提升出口退税、检验检疫、口岸通关等方面服务水平，并利用交通优势，在漳州招商局经济开发区或古雷港经济开发区设立漳州-东盟自由贸易园区，构建更加开放的经济新体制，形成漳州经济科学发展跨越发展的新引擎，使之成为漳州21世纪“海丝”建设的新平台。

（六）强化经贸合作，深化产业融合

合作双赢，这是世界共识。漳州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必须与台港澳、东北亚、东盟、南亚、西亚、中亚、非洲和欧美各国加强贸易往来，促进双方产业融合。

1. 积极拓展新兴市场。漳州要用好中国-东盟、中国-新加坡、中国-巴基斯坦等自贸区优惠政策，积极开拓新兴出口市场，促进双边贸易稳定增长。组织漳州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参加广交会、东盟博览会、马来西亚中国商品展、新加坡福建商品展等重点展会，切实办好“漳州味”巡展世界系列活动，引导企业开拓东盟、西亚、非洲等新兴市场，推动出口市场的多元化，增加企业对外贸易的机会。

2. 扩大双向投资服务。东盟国家在漳州投资项目363个，总投资14.5亿美元，漳州企业在东盟国家投资项目8个，总投资1.68亿美元，双方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因此，漳州要开展针对东盟、中东、中亚以及欧美各国的国际招商、投资、贸易合作，密切经贸、旅游和人员往来。同时，要支持漳州民营企业大胆走出去，赴东盟、中亚、南美等进行投资，建设资源开发、境外生产加工、涉外渔业、营销网络等项目，如支持漳州旗滨玻璃有限公司在新加坡设立东盟销售总部，鼓励万达集团有限公司在香港或境外上市融资，助力企业更好更快发展。要加强与东盟等国家和地区的能源、资源供应合作，推动能源、资源勘探与开发领域的合作。

3. 深化与台港澳合作。漳州要充分利用举办“海峡两岸农博会、花博会”等展会和参加“9·8”投洽会、“6·18”项目成果交易会，举办以“海丝”建设为主题的系列活动，切实加强台港澳投资贸易促进机构合作，积极开展海外联合招商活动；要切实利用台港澳的融资渠道和营销网络，扩大对台港澳贸易和转口贸易；要进一步加强与台港澳在服务业领域的合作，吸引台港澳金融机构在漳州设立分支机构，积极争取在漳州试点开展台资企业集团内部人民币跨境双向贸易结算业务，打

通制约两岸产业深度合作的金融瓶颈。要加快发展现代农业，鼓励漳浦台湾农民创业园开展专业化招商，引导符合产业政策导向的台资企业、外资企业落户古雷台湾石化产业园区、漳州台商投资区、漳浦台湾农民创业园、海峡花卉集散中心。

（七）发挥“三胞”作用，加强人文交流

在进行经贸合作、项目和产业对接的同时，漳州要加强与海丝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人文往来，以经济共同繁荣促进政治互信和民心互通，实现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深度融合，提高双方人民的认同感，促进双方建立更加友好的交流氛围。

1. 加强民间文化交流。漳州要积极发挥人文优势，加强与台港澳地区和东盟各国的民间文化交流。漳州文化演出团体要以闽南文化为统领，融合“海丝”文化、海商文化、土楼文化和妈祖、关帝、开漳圣王、大道公、三平祖师公等民间信仰文化，以及南山寺、东明寺的汉传佛教文化，打造一台具有漳州特色的“海丝”文化歌舞剧，到台港澳地区和东盟各国进行演出，并开展芗剧、木偶、锦歌、剪纸等特色文化专场演出，增进台港澳同胞和东盟各国华人、华侨对漳州的了解与信任，凝集共同信仰的文化力量。要利用举办“海峡两岸关帝文化节”、“国际开漳圣王文化联谊会”、“三平祖师公文化节”、“土楼文化旅游节”等节庆，邀请台港澳同胞和东盟各国华人、华侨来漳参加活动，进而推动漳州旅游业、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2. 发挥侨胞和侨社作用。搞好“一带一路”建设，海外华人、华侨是重要的参与者。因此，漳州要加强与海外漳州籍华人、华侨以及侨社、商会加强联系，邀请侨社、商会负责人来漳旅游访问、寻根谒祖，增进他们对故乡的情感认同；要进一步挖掘侨资与侨智，邀请他们来漳考察投资环境，鼓励他们在漳投资兴业、移民安居，引资引智，促进漳州经济发展。

3. 积极拓展国际友城。漳州在巩固已有的6个国际友城的基础上，要积极寻找商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城市缔结友好协议，并以此为契机，构筑双方密切往来的合作平台，进而促进双方经贸活动的开展。

参考文献：

- [1]李金明著.漳州港.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1年8月.
- [2]李金明著.海外交通与文化交流.云南出版集团公司、云南美术出版社, 2006年7月.
- [3]廖大珂著.福建海外交通史.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2年10月.
- [4]陈自强著.泉漳集.国际华文出版社, 2004年12月.
- [5]李国荣主编.章波、李炳编著.帝国商行：广州十三行.九州出版社, 2007年1月.
- [6]潘刚儿、黄启臣、陈国栋编著.广州十三行之一：潘同文（孚）行.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6年6月.

作者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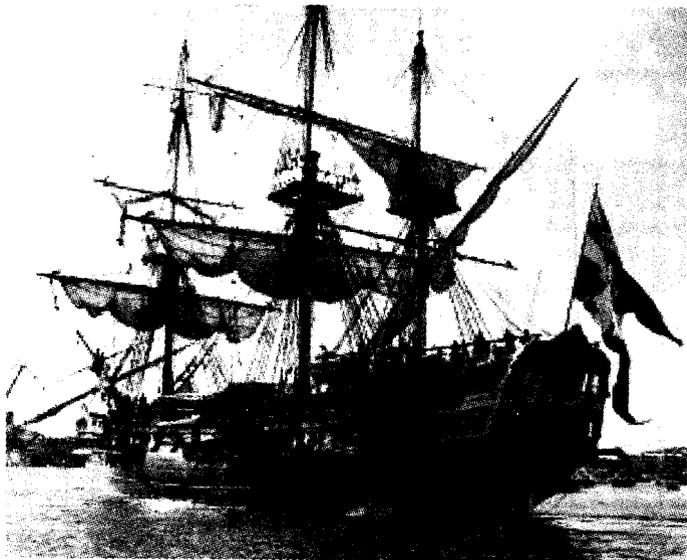
谢艺麟（1969年~ ），男，福建省漳浦县人，漳州市政协文教卫体委副调研员，漳州市闽南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漳州市历史学会副会长。

挖掘月港文化资源，积极参与海丝建设

江智猛

内容摘要：十五世纪末期至十七世纪中期，随着我国东南沿海对外贸易的发展，位于龙海市海澄镇的月港一度成了“海舶鳞集、商贾咸聚”、“农贸杂半、走洋如市、朝夕皆海、酬醉皆夷产”的外贸通商港口，被誉为“闽南一大都会”、“小苏杭”。它与汉唐时期的福州甘棠港，宋元时期的泉州后渚港和清代的厦门港，并称福建古代“四大商港”。直到清初为统一台湾，实行迁界海禁，才直接导致月港的衰落，取而代之的是对岸毗邻的厦门港崛起。以月港为中心，以陶瓷为主要贸易输出品的海外贸易，是明清时期漳州“海丝”文化的独特见证，也是全国“海丝”申遗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今天的“海丝”建设具有独特的借鉴和启迪作用。

关键词：月港 兴衰历史 海丝建设



对于海洋，人类从远古开始，就充满着求知的欲望，充满着探索的热情。历史一页页翻过，我国人民漂洋过海，从事商贸、文化交流的海上交通路线，形成了“海上丝绸之路”。

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是东西方商贸流通、人员往来、文化交融的重要海上通道，对当时中国和海外贸易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在传承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和平友好、互利共赢价值理念的基础上，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合作层次更高，覆盖范围更广，参与国家更多，将串起连通东盟、南亚、西亚、北非、欧洲等各大经济板块的市场链。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对于形成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新格局、促进我国与沿线国家的友谊、合作

与共赢，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月港旧码头

一、月港兴衰史迹

漳州月港，一个“海舶鳞集、商贾咸聚”的闻名巨镇，一个几乎给古老帝国带来无上荣耀的商港，可谓是全球化的映海明月。它因“一水中堑，环绕如偃月”而得名，是明朝中后期“海上丝路”民间唯一合法的始发港，闻名全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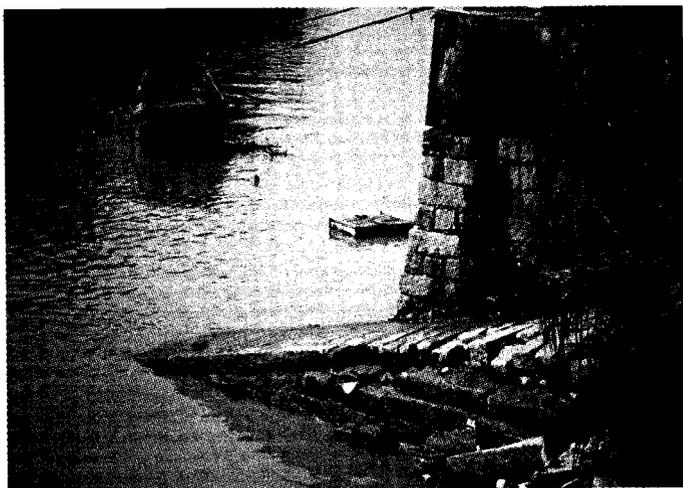
(一)

当历史回到六百多年前的明朝初期，为了防止方国珍、张士诚旧部逃亡海上的残余势力卷土重来，也为了防范日益突出的倭寇问题，洪武三年（1370年）明太祖下令撤掉泉州、漳州等处的市舶司，厉行海禁政策，严禁沿海居民私自出海贸易。次年，再次颁布禁海令，重申沿海居民必须遵守法纪，不得私自出海。《赤嵌笔谈》载：“洪武五年（1372年），以居民叛服无常，遂出大兵，驱其大族，徙置漳泉间”。反复重申“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洪武二十年（1387年）明政府下令撤除澎湖巡检司，“尽徙屿民，废巡司而墟其地”。随后，东南沿海地区原有的福州、泉州等对外通商港口逐一被关闭，商船进出受到严厉的查禁。当时有些民间海外商船，为了冲破官府“海禁”限制，继续开展海外贸易，而多方求索。他们无意之中探得月港自然条件良好，可以做为商船停靠和装卸货物的港口，而且距九龙江出海处只十几公里航程，没有驻扎巡查“海禁”的官兵，就选择该处作为对外走私交易据点，因此这一地区迅速成为私人海上贸易的重要口岸。当时不仅民间存在着广泛的走私活动，就是政府官员、军人也参与其中。据《明太祖实录》的记载，在明永乐年间（1403-1424年），“缘海军民人等，近年以来，往天下蕃，交通外国。”嘉靖以后，由于江南地区社会经济的繁荣，商业性农业和民营手工业的兴盛，社会分工的不断扩大，商品种类与数量迅速增多，东南沿海的私人海上贸易得到飞速发展，出现了一批私人海上贸易集团，他们兼有武装，“亦商亦盗”，海商集团主要由漳州人组成。这些海商集团，在没有国家政府作为后盾的情况下，依然执掌着东洋各国海上贸易的牛耳。这种局面的形成，充分说明了当时东南沿海人民经商之众多，分布范围之广阔，经济实力和武装实力之雄厚。因而，他们便从四面八方会聚而来，以月港作为暗中对外通商的

港口。据史料记载正德年间（1506-1521年）的月港，居民数万家，沿街“贾肆星列”，港口“贾舶鳞次”，“水犀火浣之珍，琥珀龙涎之异，香尘载道，玉屑盈衢”。群众生活富裕，“方珍之物，家贮户积”、“其民无不曳绣蹶珠者”，成为“藉舟楫之利，以腴丽甲天下”的南方“小苏杭”。

月港“货贝聚集”。从华安、平和、漳平甚至江西境内，无数的货物顺着九龙江支流聚集月港，等待出洋。带着浓郁异国情调的商品同样云集于此：有雕刻得十分精致的犀牛角，有磨洗得又白又亮的象牙，有洁白如雪的燕窝，就连寺庙里燃烧的烛香，也带着异国的檀香味。据《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当时抵达月港的海外国家物品，包括暹罗、柬埔寨的苏木、胡椒、象牙等，都是中国人十分喜爱的，吕宋则盛产银子。所以从月港出口的货物，若销往暹罗、柬埔寨等西洋国家，就以当地的产物相抵；若销往吕宋，往往换回大量银元。据《东西洋考》“陆饷”统计，当时从月港进口的货物有116种，

大多是海外的土特产，如番被、番藤席、黄腊、冰片、草席、番纸、番镜、火炬、粗丝布、西洋布，还有各种皮货，如沙鱼皮、獐皮、獭皮、马皮、蛇皮、猿皮，以及各种矿物，如金、锡、铅、铜、矾土等。此外，江西的瓷器、福建的糖品、果品，也深受海外民众喜爱。据明万历三十七年我国民间海外贸易开往日本商船的《装载货物清单》来看，当时输往海外的商品除了丝织品、瓷器、糖、果品外，还有铁、纸、布、竹器、药材、茶、酒、漆器、金钱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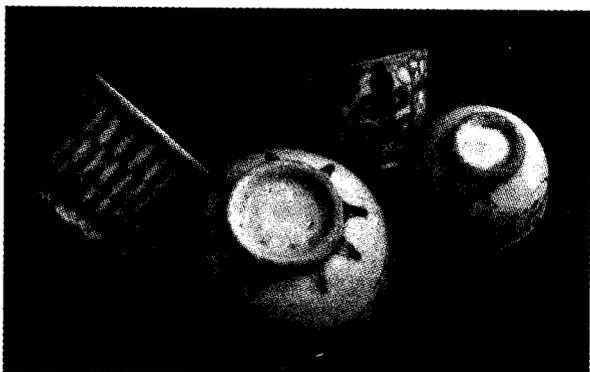


古月港码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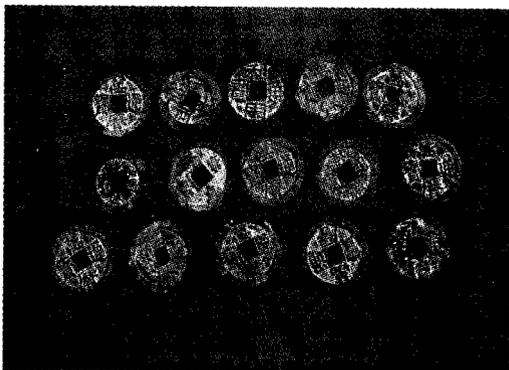
万历年间是月港发展的黄金时代，盛况空前，“四方异客，皆集月港”。往返商旅，相望于途。明朝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泉漳商民，贩东西洋代农贾之利，比比皆然。”福建航运业，出现了“富者出货，固得捆载而归，贫者为佣，亦博升米自给”，或“富者出货，贫者出力，懋迁居利”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每年仲夏至中秋，风汛期间，由月港发船的商船，多达200余艘，少亦六七十艘。明朝周起元《东西洋考·序》载：“五方之贾，熙熙水国，剝舂艘，分市东西路，其捆载奇珍，故异物不足述，而所贸易金钱，岁无虑数十万。”月港的繁荣，给明政府带来巨大的关税收入，随着私人海上贸易的发展，税额不断上升。《福建省志·财税志》第一篇，《财政收入·关税》载：隆庆六年（1572年）“开设舶税，仅数千金”，万历四年（1576年）“饷溢额至万金”，万历十一年（1583年）“累增至二万有余”，万历二十三年（1594年），“饷骤溢至二万九千两”。从此以后月港商税收入保持在三万两左右，月港因此有“天子南库”之称。

月港是明朝中后期，我国东南沿海的主要贸易港，是东南沿海与东西洋贸易中心和交通中心，月港开放是郑和下西洋后我国第一次近代意义上对外贸易交流，在世界海上交通史和贸易史上，都占有一定的地位。月港与汉唐时期的福州港，宋元时期的泉州港和清朝的厦门港，并称福建历史上的“四大贸易商港”。

(二)



(月港打捞瓷器)



(月港打捞铜钱)

月港海外贸易的兴盛打开了漳州通往世界的大门。对外开放的月港，促进了港口经济的繁荣。月港的停泊点，散布于北岸的嵩屿、海沧、石美、玉洲、澳头，南岸的屿仔尾、海门岛、浮宫、海澄月港、石码、福河以及港口外的大径、卓岐、浯屿和中左所等。月港附近的玉枕洲、海沧、福河、石码、浮宫、屿仔尾、大径、卓岐等，多为“北船”（航行于温、宁、沪、津）和“横洋船”（川走台湾、澎湖）的停泊发船点。海澄月港，为当时海上外贸进出口货物的主要集散地。首先是码头星罗棋布，“据遗址考察，明清时期月港溪尾不足一公里的海岸就设七个码头，即饷馆码头、路头尾码头、箍行码头（又名中股码头）、容川码头、店仔码头、阿哥伯码头、溪尾码头。”（《漳州市志》卷五，《港口码头·月港码头》）其次是港市的繁荣。根据黄仲义先生《月港商市遗址》记述，如今有据可查的就有七个港市：县口市、港口市、旧桥市、新桥头市、芦沈港市、下尾街市、南门外市。街市大都临着港道，小船可以一直开到店门口。这些港市是主要的商品交易地点。月港附近的居民几乎家家有店面，家家做生意，有豆饼行、米行、糖冬瓜行、冰糖行、药材行、铸鼎行等等。从华安、平和、漳平甚至江西境内，无数的货物顺着九龙江聚集月港，等待出洋。带着浓郁异国情调的商品同样云集于此。到了明代后期，粮食和银元逐渐成为月港的主要进口货物。月港的街道、码头、店铺、寺庙，聚集着操各地口音的八方来客，其中不乏高鼻子蓝眼睛的西洋人。早在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葡萄牙商船东来互市，在广东受到阻挠，就北上停靠月港。这以后，不断地有外国商船来到月港。

漳州人丰富的海上航行和经商经验，在我国人民反西方殖民主义斗争中作出了贡献。天启二年（1622年），荷兰殖民者占据澎湖，且驱之复至。他们先后以澎湖、台湾为据点，横行台湾海峡，在漳泉沿海大肆烧杀抢掠，妄图切断月港与东南亚（特别是吕宋）的贸易，给月港带来极大的破坏。代表闽南海商利益的郑芝龙武装集团在反侵略争夺海上贸易权的斗争中作出了贡献。闽南海外贸易势力的杰出代表郑成功，在漳泉沿海商民的支持下，收复了台湾，郑氏集团中，漳州人发挥重要作用，他们为反对荷兰侵略者的斗争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为来往于漳台两地贸易奠定了基础。

(三)

富足的月港，在繁荣的背后也隐藏着许多社会问题。比如：倭寇、税吏、朝廷派来的宦官或鱼

肉百姓，或打家劫舍，无法抑制占有月港遍地财富的欲望。为了利润，商人们锱铢必较，上演着一幕幕尔虞我诈的商战片。在月港，数千年形成的封建社会尊卑贵贱观念受到了挑战。当官不再是体现人生价值的唯一指标，经济上的富足同样能使人们获得应有的社会地位与尊重。财主们驾车乘马，自在张扬地穿过大街小巷，所到之处，获得的是羡慕的目光。长期在封建等级压抑下的人性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释放，这里的官员显然要比内地官员多了些开放和平等的胸怀，甚至小孩子见了仕官也敢肆无忌惮地直呼其名。民间赌博、斗鸡养狗之风盛行，月港人耽于享受的现象突出。当时，价值百金的鸽鸟，人们竞相购买；每对白兔价值数十金，人们眼睛眨都不眨就买下了，像养儿子似的对它们娇生惯养；睡的是棉被，吃的是生菜。月港美女云集，歌舞升平。白天，人们乘坐着香车宝马招摇过市，女孩们涂脂抹粉，甚至连街上的空气都带着脂粉香。夜色降临，码头上停泊的大小船只齐齐亮起了灯笼，江面上灯火闪烁，甚至盖过了夜空中繁星的光亮。人们在游船上，在酒肆歌楼中，浅唱低吟，交杯问盏，“夜夜有酒夜夜醉”，嬉游歌舞直至天色发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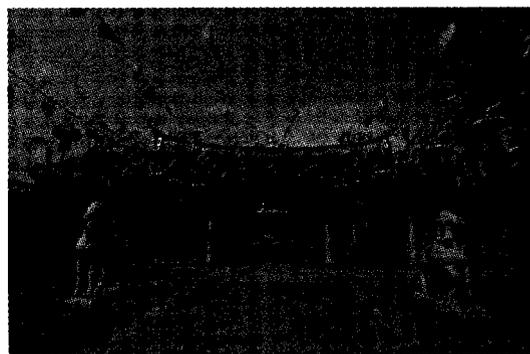
为了加强月港的社会治安管理，嘉靖九年（1530年），政府在海沧设立安边馆。三十年（1551年）在月港设立靖海馆。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福建巡抚谭纶把靖海馆改为海防馆，设海防同知驻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漳州知府唐九德建议将龙溪、漳浦各割一部分成立海澄县，经福建巡抚汪道昆、巡按王宗载报请批准后，嘉靖四十五年置海澄县。

从明代景泰年间初兴，到万历年间，月港历经170年兴盛之后就逐步衰落了。其主要原因是战乱、西方殖民者东侵、封建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等。郑成功据守台湾后，清政府又实行残酷的“迁界”和“海禁”政策，月港的海外贸易就彻底衰败了。后来为新兴的厦门港所取代。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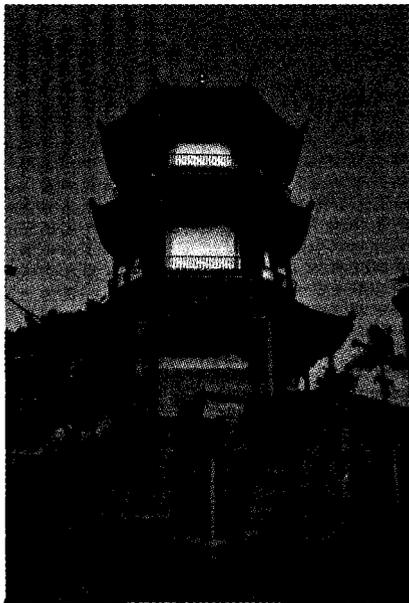


（文庙）



（城隍庙）

漳州月港虽然早已风光不再，但是保存至今400多年之久的孔庙、城隍庙、观海寺、帆巷、晏海楼、萃贤坊等古建筑，仍可见证当年的辉煌。始建于明隆庆元年（1567年）的孔庙，坐落于月溪西面的龙海二中校园内，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主殿大成殿、前殿的两厢、后殿的崇圣阁以及庙前的泮池仍保存完好，古风犹存。经过修缮，现已成为该校的图书馆。大成殿前树立着一尊孔子雕像，泮池上建起两座拱桥，桥西还有一座夫子亭，以及大大小小的石雕，浑然一体，相映成趣，令人流连忘返。从文庙出来，向东走50米，再沿西门桥南面的小路走进去，就可以看到多处历史遗迹了。当年的港市遗址，今仍依稀可见。江岸一里多的古港口，还能见到七个古码头。并在古码头附近出



晏海楼

土过古船的大铁锚(今存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在容川码头旧址，有一道石板路伸入江中，码头以东的港口桥，建于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桥上仍可见桥墩残垣。容川码头附近的“豆巷”，是当年月港最热闹的贸易集市。百余公尺的笔直巷道上，街容店貌仍作为古迹按原样保存。豆巷内有供奉关帝公的“武圣殿”。港口的东端，有始建于明万历十年的六角柱形四层古军事建筑——晏海楼。为加强对海盗的监视侦察，知县瞿寅于万历八至十一年间(1580-1583年)，在县城东北角上始建一座两层的瞭望台，“以障海口东北之虚”，寄寓“波平海晏”的愿望，取名晏海楼。楼的底层设有枪眼多处，并辟一条暗道直通县衙(今党校食堂)。这样，晏海楼瞭望台与周围九都堡、溪尾铙城、大泥铙城、镇远楼等互为犄角，互相呼应，形成一个较完整的防御系统。

晏海楼作为明代月港(海澄)兴衰的象征，它吸引着不少当时的文人墨客，登楼怀古，赋诗酬唱。登上四楼，凭栏远眺，壮丽山河，尽收眼底。明著名诗人张燮《登晏海楼》(明万历甲午举人清乾隆《龙溪县志》卷22)有诗为证：

飞盖移樽逐胜游，凉生衣带已深秋。
月明倒映江如月，楼尽遥连屨作楼。
埤霓风前横短笛，烟波天外有归舟。
凭栏转觉机心息，安稳平沙卧白鸥。

从晏海楼出来，不远就是月港公园，内有一尊锈迹斑斑的明代大炮，还有几块石碑，从后门出去，就到了中山路，一眼可以望见萃贤坊。回忆历史，典藏岁月。月港虽然衰落了，但几经风雨，留存至今的“晏海楼”、“观海寺”、“孔子庙”、“城隍庙”、“萃贤坊”等一批遗址仍是古月港文化旅游的宝贵资源，也是探索明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史料。

二、月港历史地位

十五世纪末，漳州月港对外贸易在我国海外交通史和国际贸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月港是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我国东南地区海外交通贸易中心和枢纽。月港辉煌的历史奠定了漳州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地位，对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是其它“海丝”城市无与伦比的。

1. 月港开创了我国民间海外贸易的先河

从隆庆元年(1567年)至崇祯五年(1632年)，漳州月港至少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的繁盛。况且是以合法的民间贸易港的身份跻身名港之列。它结束了明代前期维持近200年的朝贡贸易，使明代后期的私人海外贸易得以迅速地发展起来；它标志我国历史上持续近1000多年的以官方垄断为主的海外贸易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使我国海外贸易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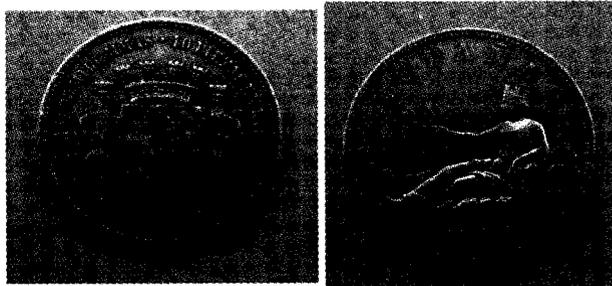
自隆庆元年以后，海澄月港一直维持全国唯一允许商人外出海外经商的口岸地位，月港一直是

明中后期中国唯一国内商人合法出海贸易港口。明《神宗实录》明万历六年（1577）十一月辛亥条载，兵部题：“而航海商贩尽由漳泉，止于道府告给引文为据，此皆沿海居民，富者出资，贫者出力，懋迁居利积久弊滋，缘为奸盗者已非一日。今总督凌云翼议将下番船舶一一由海道挂号，验其丈尺，审其货物，当出海回籍之候，俱欲照数盘验，不许夹带违禁货物。巡抚福建刘志向一谓漳州澳船须令赴官告给船由文引并将货物登记；二谓泉漳商船无可辨查，要行该有司将大小船只编刻字号，每船十立一甲长，给文为验；……伏乞敕下闽广，该地方官查照前议，斟酌施行。”

隆庆元年之后，月港的民间海外贸易得到明朝政府的认可。张燮说：“市舶之设，始于唐、宋，大率夷人入市中国。中国而商于夷，未有今日之夥者也”。它改变了我国海外贸易历来以外国商人来华贸易为主的状况。徐晓望认为：月港开禁标志着明朝政府终于承认私人海上贸易的合法性，而经营海外贸易的商人有可能通过合法的方式经营谋利。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中国海外贸易也从贡舶贸易转变为商舶贸易，由以亚洲各国为主要贸易对象转变为以欧美国家为主要贸易对象，海上丝绸之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的丝绸、瓷器、茶、糖等大宗商品远销世界各地，获得了更加广阔的海外市场，东南沿海地区的商品经济和海洋经济得到空前发展。

2. 月港开创了中国的白银时代

以月港为主的东南沿海地区，大量番银流入，极大地刺激了国内货币的流通，扩大了交易市场。同时，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和外国金融垄断者，他们的地位因而日益上升，并开始逐渐代替中国历史上的大地主而垄断经济。在随后历史的演化中，以引进白银和依赖外国资本为业的商人们，逐步发展成为垄断和支配中国国内经济的主导力量。可以说，早在16世纪中叶，中国近代“买办商人”的前身已经开始出现，海外金融力量支配中国经济的问题也已经初露端倪。



援引《明史》的说法：正统初年明英宗“弛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恰恰是明朝国家治理能力的下降，由于大明宝钞的失败、钞法的败坏造成的财政危机，才导致了“朝野皆用银”。大规模的进口白银改变了明朝原有的货币体系，明王朝也就只能向世界货币市场和国内掌握着大量白银货币的商人妥协了。直到万历年间，张居正当国，下令全国百姓以交纳白银而免除赋役的“一条鞭法”，白银作为主币才终于得到朝廷官方所认可。“一条鞭法”是最典型的国内商人阶级与国家、社会力量大博弈的产物，而“一条鞭法”的强力推行正如张居正所说的“势所必然、势所必行”。张居正“重商主义政策”这种前所未有的改革，一方面使得农民的负担空前加重；另一方面却使得商人、特别是沿海商人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也使得市场在白银的驱动下，前所未有地活跃起来，它促进了这一时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商帮的形成和市镇的兴起。至隆庆元年（1567），明穆宗朱载堉颁布诏令：“凡买卖货物，值银一钱以上者，银钱兼使；一钱以下只许用钱。”而隆庆元年这条“银钱兼使”的法令，其重要性在于，它是明朝首次以法权形式肯定了白银为合法货币，并且是用法权形式把白银作为主币的货币形态固定了下来，同时又以法的形式将城市工商的地位、权利固定下来。到嘉靖年间，白银的主币化过程逐步完成；在明朝中后期，白银普遍通行于全社会，并最终占据货币流通领域的主

导地位，标志着白银货币化的已经完成。

明朝政府最终用法令确立白银作为国家税收和储备货币，原因固然复杂，但概括起来主要有两个因素：在内因方面，明初建立自主的、合理的货币发钞体系、建立信用货币的努力最终失败了；在外因方面，西方殖民者掠夺美洲白银，并大量输入中国，使得商人垄断社会经济，也使中国商品具有国际性，使中国成为世界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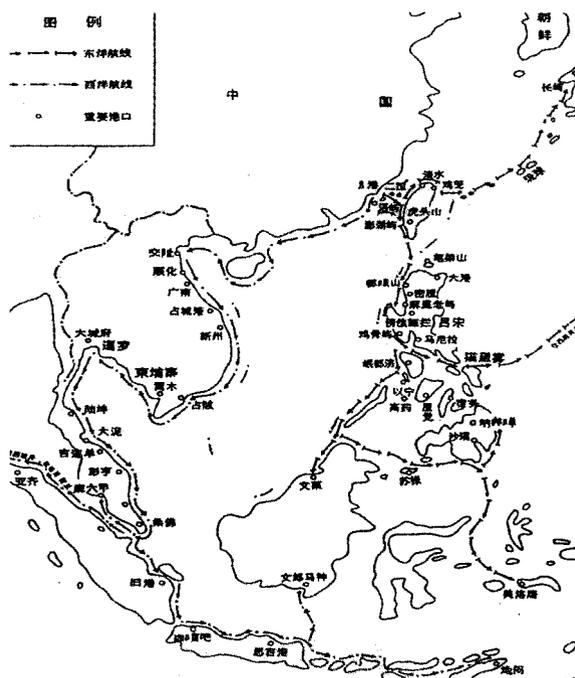
所以说，漳州月港推动一个新的“白银世界”开始。从此，以白银货币化为标志，中国社会经济货币化的过程使古代封建社会开始走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中国由此主动地走向了世界，并使明代中国积极参与世界经济体系的初步建构，为整体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出现做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

3.月港开创了中国海外贸易全球化

十六世纪初，依靠海上势力崛起的西方大国东向扩张，进入印度洋和太平洋，逐鹿海上，浊浪滔天。在南亚、东南亚战略要地建立要塞，并视中国商船为强敌。葡人占领马六甲，“与华人酬酢，屡肆辘张，故贾船希往者。直诣苏门答腊，必道经彼国。佛郎机见华人不肯驻，辄迎击于海门，掠其货以归。数年以来，波路断绝。然彼与澳夷同种，片帆指香山，便与粤人为市，亦不甚藉商舶彼间也。”面对凶险，谁与争锋？月港开放之初，并不限制出洋商船的数量。从万历十七年（1589年）开始，限定每年出洋商船的数量为88艘，后来增至110艘。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总数达到137艘。作为月港一港而言，每年有上百艘商船扬帆出洋，是甚为可观的。以每船约载300人计，每年从月港出洋经商者，至少有3.3万人。

以往中国的海外贸易，大都是外国人入市，中国商人为坐商。月港海商则为行商，扬帆出海分贩东西洋，经商范围十分广阔，东起日本、朝鲜，中经菲律宾群岛，直到南洋各国，到处都有他们活动的足迹。嘉靖年间，前往日本的福建海商，因遇台风，漂到朝鲜就有1000多人，如王乞乘坐的一条大船在朝鲜黄竹岛停泊，同船的福建海商共150多人。直接到日本经商的福建商人更多。“嘉靖甲辰，忽有漳通西洋番船为风飘至彼岛（指日本），回易得利，归告其党，转相传走”，于是出现大量通倭现象，“今虽山居谷汲，闻风争至，田亩之夫，缀耒不耕，赍贷子母钱往市者，握筹而算，可坐致富也”。

当时月港拥有18条往东西洋的航线，与东南亚、南亚和东北亚等47个国家和地区有直接贸易往来。如越南、泰国、柬埔寨、马来半岛、新加坡、爪哇、苏门答腊、菲律宾群岛、马鲁古群岛、加里曼丹等，并常抵日本、印度。月港海商还通过马尼拉这个中继站和南洋群岛的其他地方，直接



月港对外贸易航线

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欧洲商人进行广泛交易，并从而与美洲发生了贸易关系。16世纪漳州地区海船上传抄的十五世纪的针路抄本《顺风相送》记录有自月港门户浯屿、太武出发往西洋针路七条：太武——彭坊，浯屿——大泥、吉兰丹（马来西亚）；浯屿——柬埔寨；浯屿——杜板，浯屿——杜板、饶潼，太武、浯屿——诸葛担篮，太武、浯屿——涝维（印尼）。往东洋针路三条：太武——吕宋，浯屿——麻里吕（菲律宾）；太武——琉球。

17世纪闽南海商由月港出洋经商人数较多，分布较广，从而改变了长期以来外商来华贸易为主的倾向。所以张燮的《东西洋考》说：“市舶之设，始于唐宋，大率夷人入市中国，中国而商于夷，未有今日之伙也”。总之，明代漳州月港开辟了世界大帆船航海史上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条共建贸易航线。月港海上贸易北上到达琉球、日本、朝鲜，南下到达东南亚各国，西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西欧殖民国家进行环球贸易，到达拉丁美洲，第一次将中国商品的贸易范围扩至拉美和欧洲。该航线持续了两个半世纪，是世界大帆船航海史上运作时间最长的一条国际贸易航线。时间跨度之长、数量之大、国别之多，都是世界罕见的。

4. 首创民间海外贸易的管理机制

随着月港的海外贸易迅速崛起，出现了“货物通行旅，资财聚富商，雕镂犀角巧，磨洗象牙光”的繁荣景象，明政府为了加强对海商的控制。嘉靖九年（公元1531年），根据巡抚都御史胡璉的建议，把巡海道移驻漳州，并在月港东北10多里的海沧澳建立安边馆，委各府通判一员驻扎，半年一易。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复于月港建立靖海馆，以“通判往来巡辑”。不久，海盗商人谢志占据月港，接着，海商张维等二十四将又“结巢盘踞”，使政府完全失去控制，月港地区“殆同化外”。于是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巡抚谭纶下令招抚，“仍请设海防同知，颀理海上事，更靖海馆为海防馆”，由海防同知驻扎。隆庆、万历年间，为了征收商税，加强管理，才把海防馆改为督饷馆，馆址在“县治之右，即靖海馆旧基”。从明朝政府相继在月港设立安边馆→靖海馆→海防馆→督饷馆的过程，可以看出虽然督饷馆是从安边馆，靖海馆，海防馆发展过来的，但安边馆、靖海馆，海防馆主要是对月港海商的镇压机构，而督饷馆才真正是对月港海商的管理机构。明朝政府不仅设置了专门的管理机构，而且制订了一些管理法令与条例。

商船进出港口的管理办法：月港海商出海贸易，首先要得到明政府的批准，由海防官发给船引后，才能启航，每张船引“征税有差，名曰补税”。每次请引以100张为率，每一张船引都要详细填写船商的姓名、年貌、户籍、住址、开向何处、回销日期，以及限定的器械、货物等商品名称，“商众务尽数填引，毋得遗漏”，同时海防



督饷馆

官及各州县要设置循环号簿2扇，照商引登录器械、货物、姓名、年龄、户籍、住址、向往何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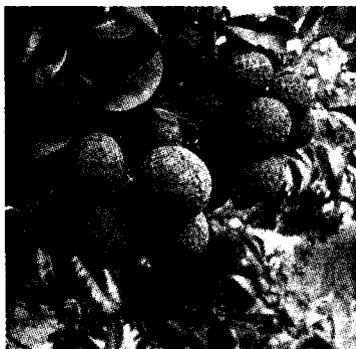
期限等，“按日登记。”^[45]如所报有差错，船没官；如货物斤数不同，货没官。商船出港时，由督饷馆派人登船验引，防止夹带各种违禁品及兵器出口。出海商船经过盘验，果无夹带违禁货物出洋，方许封识开驾。

当时商税的征收办法：月港海商的税收制度由从前的抽份制改为饷银制。这种商税共分3种：一为水饷，也称“丈抽法”。类似近代的船钞，其定税率不以船的载重量，而以船的广狭为准，按照船只大小而征收船税，出之船商。二为陆饷，即商品的进口税。是按出口货物的多寡或价值的高低来计算的，征之于购买进口货物的铺商。三为加增饷。是专门征收从吕宋回来的商船税，一般由船主负担。以上3种税都是货币税，从贡舶贸易抽分实物税到征收货币税，这是中国关税制度的重大变化，反映了明代对外贸易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新的封建海关管理制度由此产生并发挥长远的影响。

5.在海丝申遗文化链条中不可或缺

在“海丝申遗”时空链条中不可或缺。从时间上看，漳州月港是承上启下的过渡性港口。闽南地区的对外贸易港口主要有三大变化：宋元时期的泉州港、明代的月港、清代的厦门港。月港上承宋元时期的泉州“海丝文化”，下启清代广州、厦门“海丝文化”；从地理上看，沿海贸易空间不可或缺。漳州处于上接东海和黄海，下连南海的重要位置，处于中国“海丝”的中南部。

6.改变了中国传统种植业，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



番薯、花生、马铃薯、番茄、菠萝、玉米首次从月港输入到江西乃至山西、河南，丰富我国农作物的种类，使农耕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时，月港的发展，促进了漳州经济尤其是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手工业生产快速发展，纺织业、制糖业、造船业日益壮大，漳州城内“百工鳞集，机杼炉锤”，成为一个手工业发达的城市。同时，漳州与东南亚、印度支那半岛以及朝鲜、日本等47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直接贸易关系，漳州的茶、糖、水果等农产品及加工制品，以及纺织品、陶瓷器等手工艺品，通过月港远涉重洋大量行销海外。所以，月港的兴盛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雇佣关系，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同时，月港的发展，推动了漳州与海内外的生产技术、科技成果、农产品品种的相互交流传播，促进了闽南地方文化的繁荣发展，丰富了漳州人民物质文化生活。

7.进一步养成了闽南人的人文性格

当时海外贸易商从事的是国与国之间的长途贩运贸易，他们必须长途跋涉，历尽惊涛骇浪之苦，故风险性特别高，大起大落，久而久之养成了亡命的个性，使海澄当地民俗变得极其剽悍，地方官

员深感头痛。如蒋孟育在《赠姚海澄奏续序》中写道：“以海市为业，得则潮涌，失则沓散。不利则轻弃其父母妻子，安为夷鬼，利则倚钱作势，以讼为威，至罔常难治也。”吕旻在《新建海澄县城碑记》中也写道：“顾其地滨海，潮汐吐纳，夷艘鳞集，游业奇民，捐生免利，灭没风涛间，少牴牾辄按剑相视，剽悍成俗，莫可禁遏，当道者忧之。”（《海澄县志·艺文志》）。

随着漳州月港的快速发展，漳州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甘冒风险、敢拼爱赢的海商，潘启、郑和、王景弘等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这些月港海商视大海为舞台、以世界为市场，过台湾、下南洋、闯东洋、泛西洋，开辟了世界大帆船航海史上维持最久的一条贸易航线。在他们的身上突出体现了“顺风使舵、敢顶风浪、敢拼会赢、借船出海、同舟共济、情深似海”的精神，他们抱团取暖、共同发展、懂得感恩、爱国爱乡。月港海商人物史迹，生动地展示了中国古代海洋文明史，是明清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时期的重要历史见证，也是研究海外交通史、华侨史的重要实例。

一是能够“顺风使舵”，市场信息、触角非常灵敏，敢于决策，善于决策；二是“敢顶风浪”，敢拼会赢，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三是善于“借船出海”，懂得草船借箭，借力发展；四是“同舟共济”，有团队精神，能够抱团取暖，共同发展；五是“情深似海”，懂得感恩，爱国爱乡，办公益、做慈善，回馈社会。这支海商队伍，既是漳州改革的动力、发展的栋梁，也将是参与“海丝”建设的生力军。

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人力、物力、财力三要素缺一不可，需要同时发力。就人力而言，漳州深厚的“海丝”渊源，孕育了海商特质，传承至今。

三、月港主动参与海丝建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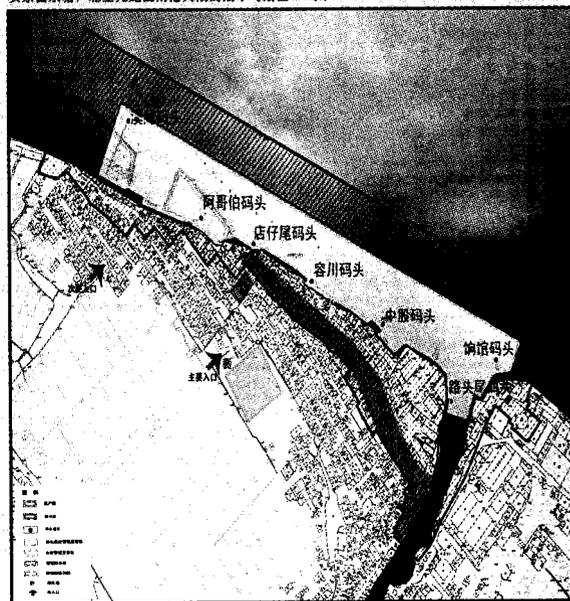
漳州月港的兴盛是漳州发展史上辉煌的一页，也是“海丝”发展史上绚丽的篇章。月港文化是一种海丝文化，是海洋文化、开放文化、走出去的文化。今天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需要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和扬帆远航的抱负，力求更加开放、开拓和开明。

今天我们打好“海丝月港”这张闻名世界的王牌，弘扬古月港历史文化对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有着非凡意义。漳州“海上丝绸之路”申遗正逢其时，顺应时势，着眼于海洋与东南亚及台湾地区，服务于国家建设“海洋强国”与发展“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宏伟蓝图，漳州不懈努力，不辱使命。

龙海的发展要利用“月港”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有利契机，与“海丝”城市建立交流合作机制、文化交流基地、交流对接，携手共建“一带一路”经济体。特别是要

“海上丝绸之路”古月港码头保护规划图

- 一、核心区面积为7.25公顷，四至边界如下：东至客运码头西侧建筑，南至龙海市配合饲料厂前门，西至旗尾码头水塘边，北至九龙江南港大潮高潮平均潮位40米。
- 二、缓冲区面积为11.88公顷，四至边界如下：东至轮渡码头，南至港口水闸，西至普贤码头东面水塘，北至九龙江南港大潮高潮平均潮位100米。



突出在“月港”与台湾、东南亚的地位、影响的关系渊源，加强对台经济、文化交流。龙海空间腹地大，不只是历史名城，还是沿海水域，港口众多，交通设施便利，龙海要发挥自身人文精神，通过对月港的挖掘和拓展建设，以厦漳泉同城化为契机，以厦门湾为中转，海陆并行，配合厦门港打好内港基础，以九龙江口的月港航道为基础开发港口经济和临港工业，打造滨海城市特色产业，利用月港知名品牌和龙海具备的人缘、地缘、商缘优势，打造“新的月港”，发挥“活的海丝”，推进龙海经济和文化双赢发展。

我们要充分发挥漳州与龙海对台、港口、生态优势，主动融入，积极作为。21世纪的海丝之路，台商不能缺席。龙海要进一步发挥对台优势。当前重中之重是两岸要携手建设漳台文化产业园区、农业产业园区、工业产业园区，全力打造世界一流对台经济产业基地，做到两岸联手赚世界的钱。此外，还要发挥港口优势和生态优势，进一步扩大对外贸易，发展绿色产业，走出一条“百姓富”与“生态美”有机统一的绿色“海丝”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 [1]广东通志卷 58.
- [2]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 9.
- [3]明史卷 325.
- [4]宝庆：四明志.
- [5]周中夏：宁波港历史上的衰落。载海交史研究 1985 年第 1 期.
- [6]光绪台州府志武备志.乐清县志卷 14.
- [7]藤田丰八：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丝考第 381—385.
- [8]筹海图编卷 4、5.
- [9]朱纨：暨余杂集卷 2.
- [10]王在晋：赵鏐.
- [11]李绍文：云间杂识.
- [12]包何：送李使君赴泉州.全唐诗卷 7.
- [13]真德秀：申商书省乞拔降度牒添助宗子请给。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 15.
- [14]吴澄：送姜曼卿赴泉州路录事序、吴文正公集卷 16.
- [15]张燮：东西洋考卷 7.
- [16]黄御史集卷 3.
- [17]温溢：咏福州.輿地纪胜卷 128.
- [18]参署林仁川：明代中琉贸易的特点和福建市舶司的衰亡。载海交史研究 1988 年第 1 期.
- [19]顾祖禹：续史方輿纪要卷 99.
- [20]乾隆：海澄县志卷 24.
- [21]乾隆：海澄县志卷 22.

- [22]乾隆：海澄县志卷 7.
- [23]明经世文编卷 243.
- [24]明经世文编卷 267.
- [25]乾隆：海澄县志卷 18.
- [26]朱纨：鹭余杂集卷 23.
- [27]董应举：崇祖集·闽海事宜.
- [28]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 96.
- [29]张燮：东西洋考卷 12.
- [30]周起元：东西洋考·序.
- [31]张燮：东西洋考卷 7.
- [32]陈自强：论明代漳州月港的历史地位、海交史研究总第 5 期.
- [33]（美）菲律乔治：西班牙与漳州之初期通商.
- [34]皇明名臣经济录卷四三.
- [35]明正统实录卷五八.
- [36]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三.
- [37]郑若曾郑开阳杂著卷四.
- [38]乾隆海澄县志卷二四.
- [39]沈云台湾郑氏始末.
- [40]张燮.东西洋考（卷四）[M].
- [41]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 9 册第 1368 页.
- [42]乾隆海澄县志卷十一.
- [43]何乔远闽书卷三〇.
- [44]张燮东西洋考卷七.
- [45]许孚远敬和堂集卷七.
- [46]¹李国祥、杨昶主编，薛国中、韦洪编，明实录类纂福建台湾卷，海禁，武汉：武汉出版社，1993 年 10 月。第 515-516 页。¹

作者简介：

江智猛，龙海市社科联主席、龙海市海丝文化研究会会长。

海舟行茶道 闽茶香四海

——建茶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地位与历史影响研究

蔡清毅

内容摘要：得益于海上丝绸之路和历史移民，福建以自身独特的种茶、制茶、品茶和伺茶的技术和文化，率先将茶叶作为一种商品，传播中国文明。福建人把茶、瓷、丝三位一体，创造福建之于世界的意义，在让海上丝绸之路交易结构发生变化的同时，依托这条通道奠定自己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多个主港地位、打下世界茶产业的基础、对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等文明产生积极影响，更成为两岸品茗同味一心的主体创造者。

关键词：建茶 海上丝绸之路 地位 历史影响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海上通道。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

最早起源于巴蜀之地的茶叶发现、茶产业发展，茶文化的发明和传播，是中国人对世界历史的一大贡献。而得益于海洋经济和历史移民，闽台茶人率先将茶叶作为一种商品，开辟“丝茶之路”，并逐步地将茶文化传播到中国的周边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福建茶叶对于世界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语言、习俗、产业和经济与政治等方面。实际上，福建茶叶的影响，远不止在宋代冠绝天下，也在于近代欧美人对其的嗜好和追逐，甚至发动战争来窃取。

福建最早之于世界的意义，乃是茶、瓷、丝，这恰好是19世纪中国被卷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三种重要商品。¹在近代历史进程的几大战争中，茶叶以一种更深层的方式影响局势。从更深层次来讲，福建茶叶对世界文化史有着深远的影响，对世界文明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福建茶叶于海上丝绸之路的意义

海上丝绸之路，最初由丝绸等贸易而起，当然不限于丝绸，中晚唐起陶瓷上升至出口货物之首位，称陶瓷之路；清代茶叶出口上升至首位，称丝茶之路。

福建之于世界的意义，乃是茶、瓷和丝绸。丝绸是茶的柔软外衣，茶被包裹、缠绕，之后安详华贵地躺在茶盒中，等取出品饮时，便与精美的瓷器发生了关系。闽台茶人固执的认为，只有三者的结合，才能传达中国式的声音。

（一）茶叶改变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货物结构

¹ [美]何伟亚. 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12

福建种茶历史悠久。福建南安莲花峰有一处刻有“莲花茶襟”摩崖石刻，边下署“太元丙子”4个小字（即公元376年）。古时“茶”与“荼”意思相通，这一石刻比陆羽撰著的《茶经》还早404年。到晚唐以及宋代对建茶以及建安窑的推崇，让福建茶叶从此香飘九州，长活在中国的茶话语体系中。

晚唐建茶作为地方政府的贡茶，开始显露名声。宋元时期福建茶文化发展一浪高过一浪。北苑茶作为皇家御焙，持续458年，蔡襄、丁谓等人，在此精心制作龙凤团茶，倾倒朝野；私焙壑源茶叶，比肩龙凤；分茶、斗茶在宋元二朝风流天下，大观皇帝亲为著作，提炼中国茶道；建盏风靡天下。闽中的茶种、茶器和制茶、品茗方法一同传至东瀛、朝鲜，成为日本茶道、朝鲜茶礼之源。元代武夷茶声名鹊起，御茶美名天下传。明清时期，茶叶创新增多，开创乌龙制茶工艺，茶叶贸易渐盛，武夷山的茶山、茶水更加点缀了福建茶的文化底韵。

福建（闽字）自古以来，海运发达，为茶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福建早在唐代就开辟了泉州刺桐港，明初辟漳州月港，明末清初辟厦门港。据《宋会要辑稿》载：“国家置市舶司于泉（泉州）、广（广州），招徕岛夷，阜通货贿，彼之所阙者，丝、瓷、茗（指茶叶）、醴（指酒）之属，皆所愿得。”¹可见宋宋代开始，茶叶已经成为出口的商品。到郑和下西洋打开了茶叶之门，外销渐盛。福建茶人取代长期倒卖中国茶的契丹人，²从Kitan（契丹）到Boheatea（武夷茶），从chai（陆路传播对茶的称呼）到tea（海路对茶的称呼）的转变，后两者成为中国茶的代名词。

1596年，荷兰人在爪哇不丹建立东洋贸易据点，明代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荷兰商人首次购到由厦门运去的茶叶。1644年英国著名茶商托马斯卡洛韦（Thomas Garraway）在《茶叶的种植、质量和品质》一书中说：“英国的茶叶，起初是东印度公司从厦门引进的。”

明末清初，茶禁松弛，福建茶叶出口大量增加。海路尚未畅通之时，陆路已经出现，晋茶帮开辟了“万里茶路”，有利的推动了中欧经济的交流。

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东印度公司委托厦门商馆代买茶叶150担直接运往英国。1699年该公司定购的茶叶有优质绿茶300桶、武夷茶80桶。1702年该公司载运的整船茶叶，松萝茶占2/3，珠茶占1/6，武夷茶占1/6。而此时绿茶和乌龙茶的出口是同时进行的。

福建省茶叶出口最早是以绿茶为主，以后武夷茶逐源增多，成为中国在欧州的代称。17世纪末、18世纪初，我国茶叶出口地仅有福州、泉州、广州三个口岸。1751-176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输入茶叶1678余万千克。其中武夷茶2363万磅（1063.35万千克）占总输入量的63.3%，可见这时期输入英国的茶叶以武夷为主（平均每年约100万千克左右）。在英国武夷茶被誉为“东方美人”。因此，许多国家对“茶”的语音，多由厦门方言“Tay”的读音称茶为“Thee”。

鸦片战争之后的1842年，福州、厦门成为中国五大通商口岸；北上的茶叶之路走向没落，被新的海上茶之路所代替。清光绪后期（1898年），由福州“闽海关”、厦门“厦海关”、宁德三都澳“福海关”，均为福建茶叶出口的重要港埠；广州、潮州、漳州、泉州、厦门等地茶帮兴起。福建和台湾茶叶大量输出，促进了茶饮料在各地的普及，并成为世界上最富盛名的三大饮料之一。近代，三都

¹ 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十卷[M] 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

² 周重林. 从茶叶看福建人的“偷渡”精神[J]. 锦绣 2010年5月号

澳成为中国“海上茶叶之路”，出口茶量曾占全国出口茶的26—30%，占全省出口总量的47—60%；当代更辟有其他新港口，茶叶出口更加便捷。由于外贸兴起，茶叶生产的发展亦是必然现象。光绪初年为福建茶业的最盛时期。光绪四年（1878年），福建茶叶出口达80多万担（4万吨），约占当时全国年出口量的1/3。

二、海上丝茶之路上的福建多主港地位

海上丝绸之路是由当时东西洋间一系列港口网点组成的国际贸易网。每一朝代的海上丝绸之路都会出现主要贸易港口和次要贸易港口。海上丝绸之路是由单向到多向、由线状到网状的转变过程。¹因为茶叶的兴起和创新，福建在主要贸易节点中占有不可多得的多个位置。

1. 泉州港——海上丝茶之路

199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对丝绸之路的综合考察，认定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根据记载，南朝（420—589年），就有出口阿拉伯的茶叶从泉州港输出。早于马可波罗280年前就来到中国的意大利商人雅各在《光明之城》中说：“在城里的市场上，可以看到……一种用灌木的小叶子做成的饮料，那种东西在他们中间很受重视，不过尝起来都很苦。”²这种饮料就是茶叶。而光明之城就是泉州。应该说这是西欧首载中国茶的著作。

宋政府在泉州设置专职提举官，以管理包括建茶在内的对外贸易事项，同时，又屡次“申严私贩（武夷茶）入海之禁”、甚至于严令：“载建茶入海者斩！”³茶叶与钱币虽然严禁私贩，但由于有利可图，每年仍有大量的茶叶从泉州港偷运出海。南宋时，中国茶销路日广，日本等国皆愿进口茶叶，如嘉定十五年（公元1222年）十月十一日臣僚言：“国家置舶习于泉广，招来岛夷，阜通货贿。波之所阙青，如瓷器，茗酒之属，皆愿所得”，泉州是福建茶叶外销的重要港口。

陈龙先生指出“宋代福建茶在国内达到首屈一指的地位，著名的建瓯北苑御茶园，生产当时国内最名贵的贡茶，‘建溪官茶天下绝’（陆游），茶叶成了宋元时期泉州港海外贸易的宝货之一。在泉州港后渚出土的宋代远洋海船货舱中发现装载茶叶的大型茶壶，闽台之间的海上来往早已开始。”⁴

2. 厦门港——世界茶港 乌龙通道

具有“八闽门户”之称厦门港，昔日为中国乌龙茶输出最大的港口，也是茶叶出口最大的输出口岸，被称为茶叶海上“丝绸之路”起点。1689年，厦门出口茶叶150担，开中国内地茶叶直销英国市场之先。茶叶又以武夷、安溪等地的乌龙茶（青茶）为主。鸦片战争五口通商后兴起，尤以咸丰至光绪年间最为兴盛，1869~1881年间，每年有3000~4000吨乌龙茶由厦门出口。⁵1877年，从厦门口岸出口的乌龙茶达到5425.68吨的历史最高纪录。⁶之后，因为茶叶品质以次充好，无法与台湾、日本产品竞争，对欧美出口逐步衰落。1923年，厦门成立茶叶同业公会，有茶行茶庄40多家。这时及之后，厦门口岸出口局限在东南亚地区。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乌龙茶热”兴起，厦门再次成为乌龙茶出口和消费的集散中心。乌龙茶行销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如今厦门，有茶店和茶艺

¹舒曼：何为“丝、茶之路”？

² [意]雅各·德安科纳/[英]大卫·塞尔本著[M].光明之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3月出版。

³ 据民国《崇安县新志》记载：朝野杂记云，绍兴十三年，诏载建茶入海者斩。可见建茶的贵重。

⁴ 陈龙，饮茶思源。[J]农业考古.1992年第4期

⁵ 陈慈玉，《近代中国茶业的发展与世界市场》，台北市：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82，页183-187。

⁶ 张永存，《福建乌龙茶60年产销历程》，中国茶叶，2010,32(5)P9-11

馆近2万家，茶文化浓郁，茶叶界有种说法全国茶叶看福建，福建茶叶看厦门。厦门正在打造“世界茶都”，恢复世界茶港的历史。

3. 三都澳——中国近代海上茶路

宁德市三都澳是“中国第一，世界少有”的天然深水港，近代中国东南“海上茶叶之路”。出口茶量曾占全国出口茶的26—30%，占全省出口总量的47—60%。

三都澳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68年）五月八日成立“福海关”。“福海关”成立不久，出口茶叶从1899年的8.91万提升至1910年的12.39万担。海关报告中指出：“其他各口出现的贸易萧条，至今为止还没影响本口。”1915年国际红茶畅销，该埠出口茶上升到建港后的第一次最高水平，达142588担。1923年三都澳出口茶达历史最高水平。据《中华民国十二年（1923年）之都澳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论述：“本年春间欧美各国所存红茶无多……出口之数，较上年多至两倍有奇，……春间绿茶，在此方销路极广”。这年茶叶输出量达142829担，比1922年增长36.52%。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三都澳出口茶量约保持于十一万担左右。

4. 马尾港——独领风骚“闽海关”

19世纪中叶，福州成为五大通商口岸和全国三大茶市之一。

1853年，太平天国运动和上海小刀会起义切断了武夷山运往广州的旧茶路及运往上海的新茶路，福州成为武夷茶区唯一能保持出口路线畅通的口岸，从而使福州一跃成为国际茶叶贸易的中心之一，改变了鸦片战争中国对外贸易格局，使茶叶贸易成为福建地区的经济支柱。

对此，美国传教士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这样描述：有数据表明，福州的茶叶贸易是快速发展的，1856—1857年间，从4月30日算起，广州出口茶叶21359865磅，上海是36919064磅，福州34019000磅。1859年7月起，广州向美国出口了3558424磅的茶叶，厦门是5265100磅，上海是6893900磅，福州则达11293600磅。福州出口的茶叶总数比广州和上海的总和还要多一百万磅。同期，运往英国的茶叶，广州是41586000，上海12331000磅，福州达到36085000磅，相当于上海和广州总和的三分之二。1863—1864年间，截止到5月31日，福州运往英国的茶叶额达43500000磅，到澳大利亚的是8300000磅，美国7000000磅，总计超过5800万磅。从这些数据中，我们不难看出福州在商业上的重要地位。福州大踏步地成为中国最重要的领事港之一。截止到1863年12月31日，福州进口货物总值超过1050万美元。与广州、上海不同的是，福州无丝绸可出口。¹港口输出货物总值中，茶叶几达80%，各茶类一应俱全。

5. 武夷山—恰克图的万里茶路

最后有必要说明一下，与海上丝绸之路相连的万里茶路。这是在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由山西商人开拓从福建武夷山下梅村至中俄边境恰克图的贸易通道。全程5150公里，这条路被后人称为“万里茶路”。武夷山茶路绵延清代200余年，成为我国历史上继汉唐丝绸之路之后，又一条重要的亚欧国际商路。其中茶叶贸易占九成以上。经此道运往恰克图之茶叶，雍正十三年（1735年）为一万普特²，道光十年（1830年）达十四万普特，道光三十年（1850年）又达到三万普特，百年间增

¹ Justus, Doolittle. 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 Vol.1 introduction P20

² 1普特=16.8千克

加了 30 倍。

二、凭借海上丝绸之路，建茶奠定世界茶产业的基础

中国、印度、斯里兰卡一直以来都是世界三大茶产业基地。中国是世界茶叶的发源地，但要说福建是世界茶产业的发源地，恐怕多数人就知之不详，甚至认为是夸大其词了。

1. 从茶单词发音看

如今世界饮茶之风遍及世界五大洲，大致有 50 多个国家种植或试种茶叶。中国给了世界茶的名字、茶的知识、茶的文化习俗、茶的栽培加工技术、品饮艺术。我国的茶叶传播到西方有两条通道，一条是丝绸之路，经过俄罗斯，到达希腊、土耳其等国家，所以这些国家中“茶”的发音和汉语北方话里的发音很相似的；而另外一条“海上丝绸之路”是从福建东南沿海出发，到达欧洲，主要是西班牙，因此西语以及和西语同语族的法语、意大利等的发音与闽南话的发音几乎一样，而英语和西语同语系不同语族的发音也比较近似。

在英国，早期是以“CHA”来称呼茶的，但自从厦门进口茶叶后，即依照闽南话来称茶为“TEA”，西方各国语言种“茶”一词，大多源于福建厦门及广东方言中“茶”的读音。

■ 福建（厦门）语音一线（福建——te）				
捷克 te	意大利 te	马来西亚 the	斯里兰卡 they	芬兰 tee
印度 tey (chaya)	荷兰 thee (thee)	英国 tea (tea)	德国 tee (tee)	挪威 te
法国 the	匈牙利 tea	西班牙 te	丹麦 te (te)	瑞典 te
■ 普通话及广东语音一线（普通话——cha）				
北京 cha	朝鲜 cha	孟加拉 cha	伊朗 cha (tzai)	日本 cha
蒙古 chai	土耳其 chay	希腊 te-ai	阿尔巴尼亚 cai	
波兰 chai	葡萄牙 cha	阿拉伯 chay	俄罗斯 chai (tchai)	

2. 从茶品种科学看

福建茶产区的戴云山脉、武夷山脉是生物多样性的标本产地，生长在峰峦岩壑之中，环境差异大，各处的实生茶树是有性生殖群体，经过历史和自然的选择，演变成互有差异的众多单从、名丛和品种，素有“茶树良种王国”之称。福建单株选育命名从宋代就开始了，至今已有 830 多个品种，保存种质资源 8000 多份，福鼎大白茶为全国良种标准种。全省良种普及率占种植总积的 95%，其品种数量和良种普及率位居世界前茅。其中，这又以武夷山为最。1942 年，茶叶专家林馥泉调查单武夷山中就达千种以上。正因如此，瑞典权威的植物学家林奈将世界茶叶分为两个变种，其中之一就是武夷变种 (var. Bohea)。在英国《茶叶字典》中“武夷 (Bohea)”条的注释为：“中国福建省武夷 (WU-I) 山所产的茶，经常用于最好的中国红茶 (china black tea)”。1840-1850 年间，英国科学家发现茶叶中之单宁，并分离茶出一物，命名为“武夷酸”。欧美把 Bohea 作为中国茶的总称，由此可见福建茶叶影响的广泛及重大。

3. 从茶叶生产技术及制作工艺看

历史以来，福建茶品类名列华夏之冠，引领世界潮流。自唐至明就产蜡面茶、团茶、散茶、叶茶、蒸青、炒青绿茶。明清时期，福建茶农先后在世界范围内首创了红茶（熏烟“小种红茶”、工夫红茶）、乌龙茶（闽北乌龙、闽南乌龙）、茉莉花茶（再加工茶）、白茶等四种茶叶，尤其乌龙茶的制作工艺把茶叶制作技术推向顶峰。同时，福建境内也产黄茶、砖茶，连同原有的绿茶，六大茶类七种品类俱全。其中乌龙茶、白茶、茉莉花茶、小种红茶均属于中国特种茶。1950年，茶叶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椽根据茶叶制作工艺，把茶叶分为六类，为福建成为中国第一产茶大省奠定了理论基础。

茶叶种植和生产方面，福建贡献更是值得称赞。明崇祯九年（1636年）安溪茶农发明茶树整株压条育苗法，这是茶树从有性繁殖到无性繁殖的重大发明。1920年前后，安溪茶农实验茶树长穗扦插成功，到1935年短穗育苗在安溪西¹乡获得成功，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先进和最广泛运用的茶树无性繁殖法，在世界茶业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1957年，开始向全国和世界推广，如今成为世界各产区最重要的繁殖方式。

4.从世界茶业格局看

到19世纪，殖民者们感到光靠从中国买茶去专卖，已经无法满足其贪婪的心，茶树也成为他们觊觎的目标。美威廉·乌克斯在其《茶叶全书》第9、22章中写到²：1934年，英国茶委员会 Gordon 到中国，去乔装打扮，进入武夷山，设法偷走茶籽，次年在印度阿萨姆地等地种植成功。1936年，戈登又到中国，了解种、制茶技术并雇用了中国茶工去种制茶叶。1837年制出样茶，1938年成功运到伦敦。其制方法与武夷山乌龙茶的制作工艺相同，1874年才省去做青、炒青等工序，改制“工夫红茶”。这段历史充分说明，福建茶种和茶工以及茶工艺，最早奠定了世界第一产茶大国印度的茶叶基础。这些茶树的后裔又输入斯里兰卡，成为第三大产茶国的茶之祖。正是福建茶叶对世界茶叶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四、福建茶文化对世界文明的影响

连绵中国茶文化历史，福建茶文化凝聚着地理灵性，随着丝绸之路的传播，福建茶叶不仅在中国茶叶史上，而且在世界文明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茶叶及茶文化所到之处都深深的影响在地文化，这里举其要者论述。

1.建茶是日本茶道文化的根

中国饮茶的高峰在宋代，宋代茶叶的圣地在北苑。这里盛行斗茶，历史上叫“茗战”，这种活动后来传入宫中，风靡全国。这对茶叶生产和烹茶技艺的提升是一个有力的推动。关于建茶对日本茶道的影响，李尾咕认为：宋代福建的“建安”茶叶广为种植，斗茶盛行，建安斗茶代表着中国宋代茶文化的最高水平，并通过各种途径向日本传播，对日本茶道的草创有着极大的贡献。建安斗茶影响日本的传播途径：（一）通过浙江一带间接传到日本；（二）通过泉州大港直接传到日本；（三）通过麻沙、书坊的刻书，将建安斗茶之风传到日本；（四）日本和福建商人、僧侣等直接进行交流；建安斗茶与日本茶道存在大量的同质部分。如：茶宪、点、击拂等斗茶精华，建盏及其制作工艺、考

¹谢志群，刘渊滨. 茶树短穗扦插历史渊源[J]. 福州：福建茶叶，2000年特刊

²（美）乌克斯 著，依佳，刘涛，姜海蒂译. 茶叶全书【M】上海：东方出版社，2011

古资料等，都印证日本茶道的建安源流。¹

1995年1月10日，日本东京博物馆副馆长林屋靖三参观了“北苑”遗址之后说：这里是中国古代精制茶的始祖地。

陈龙先生认为：“日本国人从中土引进了茶种、制茶技艺，并在吸收宋人茶艺的基础上，形成了有大和民族特色的日本茶道文化，建安成为中国茶艺文化的发祥地，日本茶道文化的根。”²日本茶道四谛——清静和寂，与宋徽宗居于北苑茶艺基础上提出的“清静谿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至今，日本茶具仍以福建德化出产的黑瓷茶具为佳。

同时建茶文化也极大影响朝鲜茶礼、新加坡等国茶文化的形成。

2. BOHEATEA（武夷茶）对英国茶文化的影响

在中国，茶承载着一部厚重无比的历史。在西方，茶则被视为神性恩惠，英国人以茶为神（god tea）。正是茶在各自不同的宇宙观图式所占据的相同地位，才使得商品交易成为可能。

“明末崇祯十三年红茶（有工夫茶、武夷茶、小种茶、白毫等）始由荷兰转至英伦”，³福建红茶从此进入英国，由英国发端，渗透入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最终形成了与东方相映成趣的另一种“茶文化”。

在英国，早期是以“CHA”来称呼茶的，但自从厦门进口茶叶后，即依照闽南话来称茶为“TEA”，称最好红茶为“BOHEATEA”（武夷茶），为武夷的谐音。在武夷茶山，每个茶农都能自豪的说出这个跟当地话音近的单词。

1657年，咖啡店老板托马斯·加勒维在伦敦开了第一家茶叶店。1662年，葡萄牙公主凯瑟琳嫁与英国国王查尔斯二世，武夷茶这一珍品随着凯瑟琳一起进入英国皇室。凯瑟琳视茶为天赐的健美饮料、崇茶、嗜茶，而被世人称为“饮茶皇后”，她的肖像被英国商人用在武夷红茶的包装上。正是由于她的倡导，饮茶在英国宫廷盛行起来，接着扩展到各王公贵族豪富世家。饮武夷茶对欧洲人的情趣和生活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许多富有的家庭纷纷效法中国茶宴形式，邀请亲朋好友聚会品茗。一首英国民谣这样唱的：“当时钟敲响四下时，世上的一切瞬间为茶而停。”

1700年伦敦已有800多家咖啡馆兼营茶水，同时有众多的杂货店开始供应茶叶。英国输入茶叶1669年只100多磅，不到10年至4000多磅，1721年突破100万磅。1751-176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输入茶叶3700余万磅，其中武夷茶2363万多磅，占总输入量63.30%。武夷茶至此名扬海外，被誉之为“东方美人”。英吉利人云：“武夷茶色，红如玛瑙，质之佳胜过印度、锡兰远甚”。

英国的许多文豪泰斗纷纷在自己的著作中，表示了对武夷茶的欣赏与热爱。外国诗人写诗缺乏灵感时常祈求道“神啊，主啊，请赐我一些灵感”，而英国诗人拜伦则在《唐璜》中深情地说：“我一定要去求助于武夷的红茶，真可惜酒却是那么地有害，因为茶和咖啡使我们更为严肃”。柯勒律治也曾经写道：“因为有茶喝要感谢上帝！没有茶的世界真难以想像——让人怎么活！侥幸我自己生在有了茶以后的世界”。塞缪尔·约翰逊自称“与茶为伴欢娱黄昏，与茶为伴抚慰良宵，与茶为伴迎接

¹ 李尾咕. 宋代建安茶文化与日本茶道. 教育前沿. 2006年04期

² 陈龙. 饮茶思源. [J]农业考古. 1992年第4期

³ 萧一山. 清代通史(6), 卷二[M]北京: 中华书局, 1987年: 第847页

晨曦。典型顽固不化的茶鬼”。佩尼罗对品茶的精神文明更赞赏备至：“茶之所在，即是希望之所在。”

英国工业革命与饮茶盛行的时间几乎重叠，可能不是偶然的现象。有学者指出，在以人力为中心的工业化时代，茶叶的重要性“犹如非人力机械时代的蒸汽机”，“如果没有茶叶，大英帝国和英国工业化就不会出现。如果没有茶叶常规供应，英国企业将会倒闭”。¹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个观点可能并不夸张。²

3.一片树叶与两场战争

人们似乎无法把淡雅飘逸的茶香与血腥的战争联系在一起，然而，在某一个特别的历史时刻，茶叶的确是人类争夺的战略资源。³

从1664年，茶叶作为“中国时尚的高级奢侈品”被英国人认识之后，英国对中国茶叶的需求增长迅猛，没有适合中国消费的英国人只能用白银来换取茶叶。为了茶叶，英国人一方面设法从美洲弄到白银，一方面又庆幸在印度找到了鸦片。于是，世界因为茶叶、白银和鸦片而连接在一起了。⁴

18世纪，茶叶成为全球贸易链条的关键一环。对于中国茶叶争夺，最终引发了两场战争。一场改变了中国国体，使中国由封建社会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场催生了美利坚共和国，改变了世界格局。

(1) 建茶与鸦片战争

1607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从澳门收购武夷茶，将茶叶首度输入欧洲。茶叶很快风靡英国和欧美。到1650年荷兰人几乎垄断茶叶贸易。

164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厦门设立贸易办事处，开始与荷兰人在茶叶贸易上发生摩擦。经过两次英荷战争，英国渐渐取代荷兰垄断地位。1669年，英国立法禁止茶叶由荷兰输入，授予英国东印度公司茶叶专营权。还特别规定，回英船只必须载满七分之一的武夷茶才能靠岸。

茶叶贸易对英国财政也至关重要。打败荷兰20年之后，东印度公司每年在茶叶贸易中获利都在一百万镑以上，占商业总利润的90%，同时占英国国库总收入的10%。⁵中国茶叶成为风靡世界的健康饮料。其中武夷茶叶占了重头。如1755-1760年间，在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输入的茶叶中武夷茶占据了63.3%。鸦片战争前夕，两江总督梁章钜曾说：“该夷所必需者，中国之茶叶。而崇安所产，尤为该夷所醉心。”

鸦片战争以前，主要从武夷山出去的茶路主要是两条，一是崇安到广州，一是崇安到上海，前者全长2885里，通常需要50至60天才能到达，后者全程1860里，也要24天到达。这对茶叶出口贸易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不能适应世界茶叶市场急剧增长的需要。欧洲急需找到新的通路。

183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阿美士德号作一次试探性的航行。这艘船四月二日到达厦门。胡夏米等对厦门的印象是：“虽然本地没有任何物产，但由于它的特殊地理位置，以及当地人民的善于航海

¹ Alan Macfarlane and Ivis Maefadane. Green Tea: The Empire of Tea, Ebury Press London, 2003, pp. 179, 189.

² 仲伟民. 茶叶、鸦片贸易对19世纪中国经济的影响[J]. 南京: 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8. 2. 99~113

³ 中央电视台10套《探索·发现》栏目. 茶叶战争. [N]. 大众网—大众日报. 2010-12-01

⁴ 周重林、太俊林. 茶叶战争与天朝的兴衰[M].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2. 08

⁵ 中央电视台10套《探索·发现》栏目. 茶叶战争, 2010-12-1, 21:225 播出

经商，所以成为中国最繁盛的城市之一”，“由于港口的优良，厦门早就成为中华帝国最大的市场之一。船只可直接靠岸，装卸货物极为方便，既可躲避台风，进出港口又无搁浅之虞”，“无论就它的位置、财富，或者是出口的原料来说，厦门无疑是欧洲人前来贸易的最好港口之一”。4月21日，阿美士德号到达闽江口，不顾阻拦闯入福州港，5月3日到达福州。在福州期间，英人一方面勘探福州港，收集军事情报，另一方面着重考察福州的经济和商业，认为“就福州地位与商业的便利来说，那帝国的城市在地位上很少比福州更适宜的……福州与广州相比，也是一个分配英国毛织品更适中的地点”，还认为，闽江上游是“一切最好的红茶产地”，通过闽江运茶至福州出口要比从广州出口节省运费，因此，福州又是很理想的茶叶输出港。

正是由于茶叶、丝绸等中国器物的贸易输入导致中西贸易逆差甚大，大量白银由西方流入中国。全球白银是因为茶叶贸易而流入中国，1700年到鸦片战争前，从欧洲、美洲运往中国的白银达到惊人的一亿七千万两。为了扭转这种逆差，西方殖民者找到了一种商品——鸦片，他们强迫中国接受鸦片。英国东印度公司将鸦片的销售收入用于支付购买茶叶的款项。经过近50年的时间，每年销往中国的鸦片从2000箱递增到40000箱。截止到林则徐禁烟时为止，输入中国的鸦片价值约两亿四千万两白银。¹

很快中国禁烟运动给他们以借口。鸦片战争爆发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列强的炮舰，轰开了清廷的大门，五口通商，仅仅福建就有厦门、福州两港。福建、台湾茶叶（通过厦门港出去）被英国、荷兰等竞相掠夺，客观上促进了茶叶在世界各地的普及，并成为世界最富盛名的三大饮料之一。

鸦片战争就经济意义来看是场茶叶战争！

（2）闽台茶叶与北美独立战争

另一场战争则是北美独立战争，这场战争的导火线也是中国茶（主体武夷茶）。

西欧人在饮用中国武夷茶的同时，也把饮茶习惯传播到美洲。1660年，欧洲移民将茶叶引进北美殖民地，1767年已达将近90万磅（合400多吨）。

1765年以来，英国在北美的殖民统治相继受到的在地人们的反抗，英国对北美的出口下跌了38%。英当局除了加强控制，1773年制造波士顿惨案，同时为增加财源，实行茶叶法，对每磅茶叶征收3便士的茶叶税，导致了当地人民的新一轮的反英浪潮。1773年12月16日，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一群反英的波士顿茶党，化装成印第安人，爬上停泊在波士顿港的东印度公司商船，将342箱茶叶倒入大海，船上的茶叶正是武夷茶。故历史上有“波士顿大茶会”之说。波士顿的斗争赢得美国各地的响应，各地纷纷成立抗茶会，从而揭开了美国独立战争的序幕，1776年美国独立。1785年，美国“中国皇后号”商船第一次从中国广州运载茶叶回国并获得巨利。从此，美国商人纷纷投入从事茶叶的贸易，往来于中国的船舶络绎不绝。²

显然，“波士顿倾茶”被列为美国独立革命的导火索，也是从茶叶这个代表大英帝国主要贸易的

¹ 庄国土. 茶叶、白银和鸦片：1750—1840年中西贸易结构[J]. 中国经济史研究. 1995(3); 周重林、太俊林. 茶叶战争与天朝的兴衰[M].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2. 08

² 苏文青、兰芳. 以福建茶为载体的中外文明交流[J]. 福州: 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8年第4期: P68-72; 周重林、太俊林. 茶叶战争与天朝的兴衰[M].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2. 08

显著符号作为出发点，从“我反对”到“我销毁”，其实虎门硝烟也有类似之处。¹

五、依托海上丝绸之路，两岸品茗，一味同心

台湾位于适合茶树生长的照叶树林带，也有原住民以原生茶制茶饮茶的记录。“但是 200 年来的台湾茶叶史是两岸交流与世界贸易体系交织的故事。”²福建茶叶正是其中光辉的使者。

1. 台湾百年产业的根基

台湾海峡两岸自然生态相似，环境相仿，茶叶更是同根同源，特别是乌龙茶。台湾茶叶不是原生种，来自闽南和闽北（红茶间接传入除外）。

清朝嘉庆 15 年（1810 年），台湾商人柯朝在建宁府采购茶叶时，带去了小籽乌龙茶茶籽，在台湾繁殖，制成成品取名“清心乌龙”，后来成为著名的台北文山包种茶。清咸丰五年（1855 年），台中鹿谷乡林凤池引种矮脚乌龙 36 株于冻顶山，林凤池进京面君将斯茶进献给光绪皇帝，赐名“冻顶茶”，由此冻顶乌龙饮誉海内外。1990 年台湾茶叶泰斗吴振铎教授亲临建瓯桂林村百年乌龙园，证明园中矮脚乌龙难台湾当家品种清心乌龙的亲缘茶树。两百多年前，安溪张姓人家，迁到木栅樟湖山（今指南里猫空一带）种茶。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茶师张乃妙、张乃干两人前往祖先原乡福建安溪引进纯种铁观音茶种，带回 12 丛³，而有木栅铁观音茶的开始。木栅茶叶公司（1919 年成立），这是木栅自制优良茶的开始。因此地土质与气候环境均与安溪原产地相近，所以生育良好制茶品质亦十分优异。

正因如此，成就台湾百年多来唯一古老的传统产业——茶，闽台乌龙茶区成为中国最活跃、文化最浓郁的区域。

2. “观音”过台湾到“番边”

明万历年间，安溪乡民开始入垦台湾。清末，海峡两岸已有通商活动，安溪人大量迁入台北地区。安溪是著名的茶乡，安溪人移民到哪里，就把种茶和制茶工艺传播到哪里。清嘉庆年间，有安溪茶人带茶叶到台北贩卖，称“安溪茶贩”。但往来台海实在不易，就引进茶苗，试种鱼坑山附近。根据《噶马兰厅志》记载，现在北宜公路的前身，就是 160 年前，由安溪茶贩走出来的一条茶路，⁴台湾茶叶圣地——坪林就在这条茶路的中心位置。

安溪人循着茶路，找到生路，在台湾落地生根。安溪人首先带到台湾茶苗是“大叶乌龙”。根据史料记载，1798 年，安溪人王义程创制包种茶，并在台北县传授。1882 年，安溪籍茶商王安定和张占魁设立茶厂，掀起台湾茶叶一个蓬勃发展的时代。1885 年，安溪人王水锦、魏静到台湾，在南港从事包种茶栽制和改进，把包种茶扩大到文山各区。同年，张乃妙引进铁观音于木栅。1916 年参加台湾劝业共进会初制包种茶品评，荣获日总督特等金牌赏。包种茶渐与乌龙茶并驾齐驱，成为外销的大宗商品。

随着台湾茶产业的发展，“茶饭好吃”，茶种来自安溪，茶人也得来自安溪。安溪茶人进一步蜂

¹ 周重林、太俊林. 茶叶战争与天朝的兴衰[M].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2. 08

² [台湾]陈焕堂, 林世熠. 台湾茶第一堂课[M]. 台北: 如果大雁文化出版社, 2008 年 11 月

³ 张乃妙茶师纪念馆 <http://www.tiekuanyintea.com.tw/> 2013. 7. 16

⁴ 薛化元等坪林乡志 <http://county.nioerar.edu.tw/image/f0043327/00041.pdf>

拥而至，有记载每年有一两万安溪人从厦门到台湾经营茶叶。他们在茶叶精制中心和茶叶集散地大稻埕定居下来，从事茶叶的生产和贸易。安溪人以茶维生，他们的脚步陆续来到了泰国、越南、马来亚等地，建立铁观音王国，把家乡的产业推向全球。

根据安溪县志记载，民国九年到三十六年（1920-1947年）安溪人在东南亚地区的茶号有一百多家。其中新加坡30多家、印尼十多家、泰国20多家、越南10多家、香港10多家，台湾20多家。当时，安溪茶叶在原籍已经面临困境，唯有靠这些海外尖兵才得以维持茶叶运营。

如今，两岸安溪人后裔更是掀起了“乌龙热潮”。

作者简介：

蔡清毅，男，经济（管理）学学士，传播学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品牌管理、企业管理、会展经济、孙子兵法研究、市场调研。

海上丝绸之路与福州的陶瓷贸易

张振玉

内容摘要：“海上丝绸之路”是沟通东西方文化交通的重要桥梁和纽带，福州作为中国海洋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陶瓷外销的重要始发港和转运港。各种精美的陶瓷制品，通过福州港的“海上丝绸之路”航线，跨越海洋，走向世界，从宋元到明清从不间断。本文拟从福州地区及国外出土，沉船遗址出水的福州窑口瓷器，结合文献记载，进行对比分析综合研究，论证福州港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陶瓷贸易的港，承载着中国古代陶瓷贸易史，中外海洋交通史等领域众多的信息和资料，见证了福州港在中国“海上丝绸之路”陶瓷外销繁荣的盛况。

关键词：海上丝绸之路 福州 陶瓷贸易

众所周知，陶瓷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是华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物质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陶瓷起源之国，名闻遐迩。精美的陶瓷自古以来深受世人青睐，众多的国外有识之士，倾其毕生的精力收集、珍藏、探索和研究不乏有之。而陶瓷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大宗商品，千余年来，源源不断地输往国外，在中外商贸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桥梁和媒介，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重要的贡献。地处东南沿海的福州，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海洋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得天独厚的海洋优势，蕴育出天然的福州古港，据文献记载并对照近年考古资料显示：福州港不仅承担着来自福州本地区窑场生产的陶瓷出口商贸任务，而且也承担着来自江西景德镇窑，浙江龙泉窑，以及福建省内德化窑，建窑等地生产的陶瓷外销的转运任务，因此，福州港不仅是“海上丝绸之路”直接的对外贸易港，同时也是“海上丝绸之路”主要的转运港。被誉为“华夏文明缩影”的陶瓷，通过福州港的“海上丝绸之路”航线，跨越海洋，走向世界。

一、丰富的陶瓷资源，为福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日本学者三上次男在研究陶瓷外销时，认为“海上丝绸之路”应该被称为“海上陶瓷之路”。他在自己所著的《陶瓷之路》一书中，对中国海上贸易的商品出口进行深入研究后，认为中国所开辟的海上贸易航线，应称之为“陶瓷之路”更为恰当。¹陶瓷不仅是中国古代主要的出口商品，是古代商人谋取巨额利润的一种商品，而且还是远洋航船的理想压舱物，所以根据目前水下沉船考古所出水的器物看，只要发现来往于中国航线的沉船，一般都会发现大量的中国古代瓷器。有着7000多年人类文明史和2200多年建城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福州，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埋藏在地下的文物丰富，散落在榕城大地上的古窑址可谓是星罗棋布：有闽清的义窑，连江的浦口窑，福清的东张窑，

¹三上次男著 李锡经等译：《陶瓷之路》，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福州郊区的怀安窑，北峰的宦溪窑等等，这些窑场所烧造的陶瓷，远销海外，使之成为福州“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陶瓷生产基地和陶瓷供货地。

福州怀安窑。位于福州市晋安区洪塘乡淮安村。烧制年代为南朝至五代时期。因为在该窑址中，从南朝窑址出土刻有“大同三年……”（南朝梁，537年）字样的垫柱残片，唐代窑址出土一块刻有“大……贞元……”。（唐德宗，785~805年）字样的垫柱片，为该窑址的分期和断代提供实物见证。1953年修建防洪堤时发现。1982年7月考古发掘。窑址占地面积80000多平方米，共出土遗物15784件，主要的器物品种有青釉双系盘口壶、双系罐、四系罐、卷唇盒、双系带螭短流柱子、敛口钵、高足盘、高足杯、碗、盘、盅、缸、茶盏、茶托等。还有一部分饰釉下褐彩、酱釉器。该窑址出土的器物与日本著名的博多遗址出土的青瓷器，进行对比研究，“确定其中大部分为唐、五代福州的怀安窑产品。”¹

闽清义窑。位于闽清县东桥镇西南。烧制年代为宋、元时期。1958年11月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闽清进行考古调查时发现。窑址范围自义由村至安仁村一带，绵延十几个山头，面积达53300多平方米。主要烧制瓷器有青白釉瓷碗、洗碟盅、盒、罐、炉、壶等瓷器皿，也有少量黑釉瓷器，还有少量捏制的黑釉或青白釉的小狮、小狗、猪头等动物造型器物。器物的装饰有碗内有各种不同的刻花或篦梳纹，碗外有划莲花；有洗内印莲花，有的炉外划牡丹花等，这些花卉的线条都十分流畅，显得典雅而风韵。根据窑址暴露的面积，以及其散落在山坡上的瓷片和堆积层厚度，可想而知该窑当时烧制之兴旺，是宋、元时期福州地区烧制青白瓷的大窑址。该窑场烧制的瓷器在福建连江定海白礁一号沉船遗址及西沙群岛华光礁、北礁沉船遗址的水下考古调查与发掘中均有出水。

福清东张窑。位于福清市东张镇石坑村厝后山。烧制的年代为宋、元时期，1956年1月因修建东张水库而发现。窑址范围约20000平方米左右。主要烧制青瓷和乌金瓷为主。主要器物品种有各式的碗、盏、碟、盘等，“黑釉盏和建窑产品有相似之处，青釉瓷器则为仿龙泉窑。它们的形式、装饰、制作工艺都具有福建宋、元时期同类型的特征。”²该窑址为南宋福建四大瓷窑之一（同安、泉州、福清、连江），³该窑场烧制的瓷器在福建连江定海白礁一号沉船遗址的水下考古调查与发掘中有出水。

连江浦口窑。位于连江县浦口镇周围的山丘上。烧制的年代为南宋至元末时期。1954年发现。窑址范围约10000平方米。主要烧制的器物以青瓷为最多，还有青瓷及少量黑釉器，器形有碗、盘、碟、钵、洗、罐、瓶、炉、执壶、香薰、器盖等。黑釉器基本上都是茶碗。装饰方法常见在碗内刻篦纹、卷云纹，碗外刻划莲瓣纹或宽篦，碗心模印莲花图案，瓶身堆贴缠枝莲花等。该窑场烧制的器物目前已在福建沿海连江定海白礁一号沉船遗址、莆田湄洲湾沉船遗址，以及日本冲绳等地均有发现。

以上所列举的这四处窑址，只是代表福建地区从南朝至元代时期最为代表性的窑址，而与这四处窑场同时烧制的窑场仍不乏有之，如位于福州晋安区北峰宦溪乡的宦溪窑址（宋、元）；位于福州

¹福建省博物院 日本博多研究会：《福州怀安窑贸易陶瓷研究》、《福建文博》1999年第2期。

²福州市博物馆、福州市考古队：《福清东张窑两处窑址调查》、《福建文博》1998年第2期。

³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福州市志》第七册，方志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P495、P494。

南台岛的洪塘陶窑（宋）；位于福州市马尾区亭江镇长柄村的长柄窑址（宋代）；位于闽侯县南屿镇窗夏村的碗窑山窑址（宋代）；位于闽侯县鸿尾乡桥头村横历自然村的横历窑址（宋）；位于连江县敖江镇魁岐村的魁岐窑址（宋）；位于连江县长龙乡真茹村的真茹窑址（宋、元）；位于罗源县松山镇八井村的碗窑里村窑址（宋）；位于闽清县东桥镇的青窑、湖里窑、安仁溪窑（宋、元）等等，不胜枚举。从这些调查和考古发掘的资料显示，宋、元时期福州地区能出现如此兴旺的窑业，这与唐、五代时王审知轻徭薄赋，开辟甘棠港，发展对外贸易打下良好基础有关，同时由于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给福州带来了一次难得的发展机会。与此同时，南宋时由于泉州港的兴起，也带动了福州对外贸易的发展，而陶瓷在当时对外贸易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海内外需求量很大，刺激了福州地区瓷业的兴盛。为福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备受海外青睐的福州陶瓷，为福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提供保障

大家都知道，在英语单词中，陶瓷与中国都是拼成“china”，可想而知，外国人对中国陶瓷钟情的程度。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贵族阶层，无论是日常用品还是把玩收藏，他们都把拥有陶瓷当成一种荣幸。如十八世纪在欧洲市场上：“由于中国陶瓷以其独特的材质和装饰艺术，风靡欧洲各个阶层，尤其是优质的陶瓷已经成为夸耀地位的象征。”¹“普鲁士皇帝为了使其婚礼添色，竟然用数百名骑兵换取一批中国陶瓷。”²更有法国路易十四“在广东订烧的带有甲冑、军徽和纹章图案的瓷器，这类瓷器往往用于军团贵族和各种授勋和喜庆典礼，十七世纪曾经风靡整个欧洲。”³因此，1575年，托斯卡纳大公弗兰西斯科·马丽西·德·美第奇出资，在佛任萨的鲍勃利公园建窑，仿制中国瓷器。直至1709年德国人伯特格尔制造出欧洲第一个瓷器，欧洲人试制瓷器足足花了100多年，足见瓷器在他们心目中的魅力和地位。而地处东南沿海的福州，陶土资源丰富，历史上虽然没有出现过赫赫有名的御窑厂，但福州地区窑厂所烧制出来的各种精美瓷器，与中国其他地方窑厂所烧造瓷器一起远销海外各国，同样受世界各国陶瓷友人的喜爱和青睐，以福州怀安窑为例：根据考古发掘资料，福州怀安窑的烧制时间为南朝绵延至唐五代，前后持续五百多年，且日用品瓷中仪器盖的形制就多达174种，足见其规模之大，产量之高，销售量之大。该窑陶瓷器，在福州的北大路的五代夹道遗址，省农业厅工地的汉——晋古墓群，省机关政务管理局工地的唐代球场和大型建筑墓址，省社会主义学院的唐、五代——宋的河道遗址等均有出土。“这表明这一时期的福州城，是怀安窑陶瓷器的主要集散地和消费地，也就是说，唐、五代时期的福州城，是怀安窑陶瓷的主要市场。同时，作为这一时期中国东南沿海重要的对外贸易港来说，福州城也为怀安窑陶瓷器的外销开辟了海外市场。从怀安窑，福州城市遗址以及日本九州地区古遗址这三地的考古调查与发掘，揭示出唐、五代时期怀安窑陶瓷业的生产、贸易和消费的完整过程。”⁴这从一个侧面反映怀安窑陶瓷在国外受青睐的景况。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提出，怀安窑是“中国古瓷分相釉时代最早的一种，而且其胎质也是上乘的。”⁵可见怀安窑生产的陶瓷，还是以质取胜。而产自福州洪塘窑，在日本国传世品中，

¹朱顺龙 李建军编著：《陶瓷与中国文化》、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3年5月第1版，P251、P252。

²朱顺龙 李建军编著：《陶瓷与中国文化》、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3年5月第1版，P251、P252。

³朱顺龙 李建军编著：《陶瓷与中国文化》、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3年5月第1版，P251、P252。

⁴福建省博物院 日本博多研究会：《福州怀安窑贸易陶瓷研究》、《福建文博》1999年第2期。

⁵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福州市志》第七册，方志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P495、P494。

有一种被称为“茶入”的薄胎酱釉茶叶罐，在日本茶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堪称为茶道的鼻祖器物，这就更直接证实了福州作为对外贸易港口与日本之间的密切联系。而在“斗茶”历史上享有盛誉的福建建窑生产的黑釉盏，在日本被称为“天目”瓷碗，福清东张窑在宋代一直在烧制着仿建窑黑釉盏。根据日本陶瓷专家小山富士统计，日本国博物馆、美术馆、寺院及民间所拥有的天目茶碗，数量之繁多，器物之精美是世界上任何国家所无法比拟的，因此他自豪的宣称：日本是世界上收藏天目茶碗的宝库。在这众多的天目茶碗中，建窑及其窑系的作品占据了显著的地位，除了佛教僧人的携带以外，批量的输入日本，是通过福州海上贸易输出的。¹而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博多地区有一件黑釉茶碗，底部墨书有“张纲”，这件茶碗灰胎薄釉，造型作捺腰式束口碗，应属于福清东张窑特征。系东张窑仿建窑的黑釉盏烧制的。”²说明当时东张窑的黑釉盏已与建窑的黑釉盏一起远销日本，在日本陶瓷市场一同销售。有市场需求，才有货源的供应。在市场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各地仿制品也就自然应运而生，故当时地处于沿海的福州海上交通便利，瓷器烧制者利用这一便利的交通条件，烧制质量好的仿建窑黑釉盏，销售到日本等海外市场，一是补充陶瓷市场的资源不足，满足收藏爱好者需要，另一方面也能使陶瓷烧制商获取相应的利润，这是符合当时国际陶瓷市场规律的。根据近些年的考古发掘资料看，与东张窑同时期的闽侯、连江、宦溪等窑厂，也在烧制仿建窑的黑釉盏。这些分布在福州地区的各窑厂，所生产出来的瓷器，无论是仿龙泉窑的青瓷，还是仿建窑的黑釉盏，或者是自己设计烧制的日常用品，在国外陶瓷市场上也同样备受消费者和收藏者的青睐，为福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提供了保障。

三、从陆上出土、沉船出水的福州窑口瓷器看，见证了福州“海上丝绸之路”之辉煌

考古作为佐证历史的第一手实物资料，是最有说服力的，福州“海上丝绸之路”的陶瓷贸易，可从近年来国外出土和沉船中出水的福州窑口瓷器，来窥探福州陶瓷对外贸易的辉煌。

（一）从国外出土的福州窑口瓷器看

1977年2月，由福建省博物院和日本博多研究会联合开展的《福州怀安窑贸易陶瓷研究》课题，对福州怀安窑出土的唐代瓷器与日本九州、博多地区古遗址中出土的部分疑似福州怀安窑瓷器进行深入，比较研究，发现：“日本著名的博多遗址出土一批被日本学术界称为，“越窑系粗制品”的中国外销青瓷器，长期以来不明其窑口与场地。经综合研究，确定其中的大部分为唐、五代福州怀安窑的产品，并分别在两国以中、日文发表题为《福州怀安窑贸易陶瓷研究》的报告，将福州怀安窑址、福州城市遗址以及日本博多遗址发掘出土的怀安窑陶瓷器集中作了分析和比较，对怀安窑陶瓷器的生产、外销、消费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和研究。”³

近年来，为配合福州城市建设，开展着一系列抢救性考古发掘中，在遗址的宋元时期地层，出土有一类薄胎酱釉陶器，胎色灰，灰褐，胎质致密，器表施酱釉或黑釉，常见留釉痕，底面无釉露胎，多数底面有线切痕。这些薄胎酱釉陶器与日本茶道中称为“唐物茶入”的大部分器物相同，原是存放茶末用的小罐。“唐物茶入”传入日本后，在日本茶道具中有很高的地位，其中大部分可以证

¹叶文程 林忠干著：《建窑瓷鉴定与鉴赏》江西美术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P81，P83，P74。

²叶文程 林忠干著：《建窑瓷鉴定与鉴赏》江西美术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P81，P83，P74。

³福建省博物院 日本博多研究会：《福州怀安窑贸易陶瓷研究》、《福建文博》1999年第2期。

实是福州洪塘窑的产品。¹

而产自连江浦口窑的陶瓷器，以青釉最多，同时还烧制青白瓷和少量黑釉器，所烧制的碗、盘、碟、钵、洗、罐、炉、执壶、香薰等器物造型规整，釉面均匀光润，装饰图案清晰，是一处规模大，品种较多的一处主要古窑址，所生产的陶瓷器远销海外，目前已在日本的博多遗址，冲绳等地的遗址都发现有连江浦口窑的器物。²

仿建窑烧制黑釉盏的福清东张窑，所烧制的黑釉盏，在福建莆田林泉院，福清少林院，泉州清静寺等宋元时期的文化堆积层中有发现，在台湾澎湖列岛及广东深圳也发现此类器物。而日本的南西旧卧列岛、博多遗址、镰仓市等古遗址也发现有仿建盏的东张窑的黑釉瓷器。据此可知，东张窑的仿建盏产品从中国大陆东南沿海地区的寺院、码头、岛屿以及日本列岛、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等地都有发现，说明它有广泛的市场。³

林仁川《大陆与台湾的历史渊源》说：“福州同澎湖、台湾早有贸易往来。近年在台湾，澎湖出土了许多宋元时期的瓷器，其中有连江浦口窑的宋代印花青瓷和闽侯县油窑的印花青瓷残片，说明当时福州商人从福州港贩运瓷器到澎湖、台湾。”⁴

（二）从沉船遗址出水的福州窑口瓷器看

1. 连江定海白礁一号沉船遗址

1989年以来，中外水下考古学者先后三次在连江定海湾海域开展了一系列水下考古调查勘测与发掘工作，发现了白礁一号、二号、大埕渣、龙翁屿、金沙等沉船遗址，出水宋、元、明、清等不同历史时期的瓷器、铁器、铜器等沉船文物标本4000多件。

经过上述调查与发掘，从白礁一号沉船遗址出水了一批陶瓷器，大多数是黑釉盏。这批黑釉盏的形制相似，规格、尺寸相近，应是仿建窑兔毫盏的产品。宋元时期，福州地区烧造黑釉盏的窑较多，重要的如福清东张窑、连江浦口窑、闽清义窑、福州亭江长柄窑以及闽侯南屿、鸿尾等窑址。⁵从胎质、釉色、器形等方面分析、比较，初步认为这批黑釉盏更接近于福州地区窑址的产品，尤其与亭江长柄窑及闽侯南屿、鸿尾等窑址的黑釉盏比较相似。⁶

白礁一号沉船遗址的水下考古调查与发掘同时出水有一批青白瓷碗，可能也是周边地区窑口如闽清义窑、亭江长柄窑、福州宦溪窑等的产品。⁷

2. 西沙群岛华光礁1号沉船遗址

1988年初至1999年初，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与海南省文物保护管理办公室，

¹ 栗建安：《福建古代外销瓷窑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国古陶瓷研究》第14辑。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版。

² 栗建安：《福建古代外销瓷窑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国古陶瓷研究》第14辑。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版。

³ 叶文程 林忠干著：《建窑瓷鉴定与鉴赏》江西美术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P81，P83，P74。

⁴ 郑剑顺著：《福州港》，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 P29。

⁵ 栗建安：《福建古窑址考古概述》，《福建历史文化与博物馆学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

⁶ 栗建安：《定海水下文物的发现及其相关问题》，《福建文博·纪念中国水下考古十年专辑》1997年第2期。

⁷ 闽清县文化局、厦门大学人类学系考古专业：《闽清县义窑和青窑调查报告》，《福建文博》1993年1、2期合刊；栗建安、楼建龙：《福州宦溪窑址调查》，《东南文化·中国古陶瓷研究会1995年会专辑》1995年第3期；福州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福州长柄窑遗址考古收获和认识》，《福建文博》2005年增刊。

组织在西沙群岛的华光礁进行水下考古调查，出水陶瓷器有青瓷，青白瓷，酱黑釉等，均为来自福建各地不同窑口的器物。其中青白瓷占大多数的是一类白或灰胎，釉色灰白或白里泛青，器物的口沿内外常见流釉或厚釉。多素面，装饰纹样多为刻划的卷草、花卉、篦点等，有的白釉出筋。器形有碗、盘、瓶、执壶等。此类器物多为福建闽清义窑产品。¹

3. 南海一号沉船遗址

1998年开始至2004年，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组织专业人员，对南海一号沉船进行水下考古调查，南海一号是一艘宋代木质尖底船，它的全部装载的文物约有60000件，现已出水2000多件完整瓷器，品种超过30种。采集出水一批沉船文物，大部分仍是陶瓷器，其他遗物有铜钱、漆器、铜器、金器等。其中，一类为闽清义窑和青窑产品。胎色白、灰白、里外施青白釉，足部、底面无釉露胎。器形有碗、盏、执壶等。装饰多为刻划花。纹样有莲瓣、荷花、卷草等。²

从以上考古出土，沉船遗址出水的福州窑口瓷器看，这些出土、出水的福州窑口的陶瓷器，基本上覆盖了福州地区绝大部分的窑厂生产的瓷器品种，充分说明福州窑厂生产的多种陶瓷器，在台湾，澎湖，日本及东南亚各国的陶瓷销售市场上占有主要的地位。日本博多、九州等地遗址出土的连江浦口窑、福清东张窑烧制的“茶入”和黑釉盏，说明福州源远流长的茶文化对日本茶道的影响，日本茶道文化的根源来自福州。而从“华光礁一号”、“南海一号”出水的福州闽清义窑的青白瓷器看，印证了早在八百多年前，中国商船满载着陶瓷、香料沿“海上丝绸之路”南下，不慎在西沙永乐群岛南部和南海海域触礁沉没，这证明了早在宋代我国就有这样的航行能力，也证明了中国人此时已经营西沙群岛和南海海域，可喜的是，这两艘沉船上也满载着福州先民用辛劳的汗水和智慧的双手生产出来的精美瓷器，虽然触礁沉没，没能达到目的地，但这并没有破灭福州先民要把福州陶瓷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至世界各地的目标和梦想。

四、优越的地理位置，成就了福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陶瓷贸易港

福州地处东南沿海，与台湾隔海相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沿海的重要港口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门户。早在西汉时，闽越王无诸就开辟东冶港，开展海外贸易。《后汉书·郑弘传》云：“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海而至。”（旧交趾七郡即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位于广东、广西南郡和越南北部，是汉武帝年间设置的。）三国时，吴国曾在福州设典船校尉，负责造船，福州开元寺东直港，当时是船坞，并与夷洲（即台湾）、亶洲（菲律宾）有了海上交通。王审知治闽时，开辟甘棠港，此时北与渤海、新罗（今朝鲜）、南与越南、印度、东南亚各国已有贸易往来，已有“船到城添外国人”的贸易盛况，此时的福州港已与广州港、扬州港并列，成为唐及五代十国的三大贸易港。宋代，福州海外贸易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已成为“百货随潮船入市，万家沽酒户垂帘”的繁荣的港口城市。蔡襄《荔枝谱》云：“舟行新罗、日本、琉球、大食之属。”说明这时福州已与日本、阿拉伯诸国有贸易往来。明代，郑和七次下西洋，均在福州长乐太平港停泊候风，补充给养，招添水手，后扬帆出海。近代福州成为五口通商口岸被迫对外开放。

¹赵嘉斌：《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中国古代外销瓷——中国水下考古工作与发现》，《中国古陶瓷研究》第14辑，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版。

²赵嘉斌：《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中国古代外销瓷——中国水下考古工作与发现》，《中国古陶瓷研究》第14辑，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版。

陶瓷作为古代福州港口主要对外贸易的商品，自古以来，一直是福州港对外贸易中占有主要的地位。据南宋赵彦卫的《云麓漫钞》记载，当时福州市舶司常到诸国泊船有 31 个国家：大食、嘉令、麻辣、新条、甘秬、三佛齐、真腊、三泊、绿洋、登流眉、西棚、罗斛、蒲甘、渤泥、闾婆、占城、目丽、木力千、胡麻巴洞、宾达浓、新洲、佛罗安、朋丰、达逻啼、达磨、波斯兰、麻逸、三屿、蒲哩噜、白蒲迹、高丽。¹这些泊船，把福州以及福建省内各窑口生产的瓷器、茶叶、丝绸及土特产运往世界各国，换回香料、宝石等商品，连江定海白礁一号宋沉船遗址出水的陶瓷器中，经确认当时运往海外的瓷器绝大部分是来自福州地区的窑口（如闽清义窑，福清东张窑，连江浦口窑等）的研究鉴定中得到印证。

根据宋代研究海外贸易重要文献，赵汝适所著的《诸蕃志》记载，当时福建陶瓷器外销情况列表如下：

陶瓷器种类	输往国家或地区	陶瓷器种类	输往国家或地区
瓷器	占城国	瓷器	麻逸
瓷器	真腊国	青白瓷器	渤泥
瓷器	凌牙斯加	瓷器	三屿
瓷器	佛罗安	粗重盆钵	单马令
瓷器	细兰	瓷器	三佛齐国
青白瓷器	闾婆	瓷器	层拔
瓷器	南毗		

可知陶瓷器种类多、销售范围广。²

元代陶瓷器外销比宋代更盛，种类也更多，兹将汪大渊所著的《岛夷志略》所载陶瓷器外销情况列表如下：

陶瓷器种类	输往国家或地区	陶瓷器种类	输往国家或地区
青白花碗	三岛	瓷器	彭坑
处器	苏禄	鸟瓶、青瓷器	文涎
青瓷花碗	占城	粗碗	千里马
青白处州瓷器、瓦壘	无枝拔	大小水罐	须文那
青瓷器、粗碗	日丽	青器、粗碗	遐来勿
磁器、盘、处州磁、水坛、大瓮	麻里鲁	青白花碗	龙牙犀角
青白花磁器	丁家卢	大小水埕	苏门傍
青白花碗、磁壶、瓶	戎	瓷器	班卒

¹赵彦卫：《云麓漫钞》卷5《福州市舶司常到诸国泊船》。

²唐文基主编：《福建古代经济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4月第17版，P373、P374。

青白碗	罗卫	青瓷器、粗碗、大小埕 瓮	蒲奔
青器	罗斛	处磁、大小水埕、瓮	旧港
青白花碗、大小水埕	东冲古刺	青瓷器、埕器	文老古
青白花器、水埕、小 罐	苏洛隔	处磁器	龙牙门
大小埕	针路	粗碗	灵山
粗碗、青器	淡邈	粗碗、青磁器	花面
青碗、大小埕瓮	尖山	青器	勾栏山
青器、埕瓮	八节那间	青白瓷器	朋加刺
磁、瓦瓮，粗碗	啸喷	瓦瓶	万年港
青白花碗	爪哇	青白花器	天堂
粗碗	淡洋	青白花器	天竺
青白瓷	班达里	青白花碗	丹马令
青器	曼陀郎	青盘、花碗	吉兰丹
青白花碗	喃诬哩	青白器、瓷瓶	甘埋里
青白花碗	加里那	青白花器	小咀喃

从表中可以看出，元代福建外销陶瓷有青瓷器、青花瓷器和陶器，以青瓷器为主。器型有碗、罐、瓶、壶、埕、瓮、甕、坛等，陶质的坛、瓮、罐、壶、埕等也大量外销，销售的国家地区已达四五十个。这些陶瓷器主要是福建本地的产品，也有一些名窑的产品，如浙江处州龙泉窑、江西景德镇窑、吉州窑等地瓷器也经福建大量外销。

在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以至非洲的很多地方，都发现有宋元代时期福建的陶瓷器。¹

而元代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经过福州，这样描述福州当时贸易的盛况：

有一条大江(即闽江)穿城而过。江面宽一点六公里，两岸簇立着庞大、漂亮的建筑物。在这些建筑物前面停泊着大批的船只，满载着商品，特别是糖。因为这里也制造大量的食糖。许多商船从印度驶达这个港口。印度商人带着各色品种的珍珠宝石，运来这里出售，获得巨大的利润。……这里各种物资供应充足，还有许多爽心悦目的园林，出产优质美味的瓜果。²而这些商船在福州港卸完运来的贸易货物后，在从福州港载回陶瓷、丝绸、茶叶、福州土特产等商品回国交易。

可以看到，元代的福州城市美丽、物质丰富、经济繁荣，尤其是海外贸易事业兴盛，外国船舶多，外商的交易活动很活跃。而到了明代，福州港一跃成为海外贸易的中心，郑和七下西洋，驻泊长乐港，后扬帆出海，使福州港实现了从走向海洋向跨越海洋飞跃，拉近了福州与世界的距离。与此同时，福州作为对琉球贸易的直航港口，实际上承担着受朝廷委托的中国对琉球贸易的任务。当

¹唐文基主编：《福建古代经济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4月第17版，P373、P374。

²《马可波罗游记》(陈开俊等译)第2卷第8章。

时琉球来榕贸易的船只可直接通过闽江口，直接开到城内的柔远驿（即专门负责对琉球贸易的接待机构）。如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八月十七日琉球国发往佛太泥的航行执照生就明确写着：“琉球国中山王见为进贡等事。切照本国物产稀少，缺乏贡物，深为未便。为此。今遣正使马勃度，通事郑昊，坐驾字字号海船壹只，装载瓷器等货，前往佛太泥出产地面，两平收买苏木、胡椒等物回国，预备下年进贡大明天朝……”¹而琉球从中国携往海外诸国贸易的物品，其中绝大部分是福州生产的各种纺织工艺品，各种瓷器（大小青盘，大小青碗）。各种漆器（漆盘、漆栈）等。由于这种特定的历史环境和贸易关系，使福州港的历史地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五、东南福地的控海咽喉，奠定了福州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陶瓷贸易转运港地位

福州地处中国东南沿海，海洋线长，海洋资源丰富，在南北海上交通中处于控喉地带。在中国“海上丝绸之路”贸易航线中，北有宁波、南京、扬州、蓬莱等港口，南有泉州、厦门、漳州、广州、北海等港口，港口地理位置重要，是联系南北各港口的枢纽港，承担着重要陶瓷外销转运任务。同时福州港港区范围大，腹地阔，包括汉代的东冶港，唐、五代甘棠港，宋代的乌猪港，明代的太平港等。形成了福州港区的港口链体系。如宋代怀安古码头除承担怀安窑陶瓷器外运外，大多闽北，其他窑口烧造的陶瓷器通过怀安窑古码头，转运出港。因为宋代，随着福州逐渐成为闽境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雄据江中、紧临福州城的怀安村成了沟通闽江流域、远达海外的重要货物集散枢纽，村头的芋原驿“舟航云集”，南下入海、北溯诸县的船只络绎不绝。²宋朱熹的《石岳江行》诗：“停驂石岳馆，解缆清江滨，中流棹歌发，天风水生鳞；……”以及“挂帆望烟渚，整棹别津亭，风水云已便，我行安得停”的《晚发怀安》。³这些诗句，反映“怀安”在古代闽江交通的重要地位，是当时进出福州城的重要中转站。迄今，当年的石码头犹存。日本出土的怀安窑生产的越窑系粗制品，即由此上船扬帆远航。而1965年在福州北郊新店莲花峰南坡斗顶山出土的王审知次子王延钧之妻刘华墓，出土陶制俑38件，《唐故燕国明惠夫人彭城刘氏墓志》一方、铜钱等随葬品，其中出土的3只孔雀蓝釉瓶，经专家考证无论从造型、风格、使用孔雀蓝釉来看，确认为古波斯器物。对比在日本九州的大宰府鸿胪馆遗址SK160等出土的孔雀蓝釉陶器碎片，可推测其器形当与福州五代刘华墓出土的孔雀蓝釉陶瓶相似，应是由福州港转口运到日本九州的产自波斯的舶来品。关于福建拥有“外夷波斯、安息之货”，转销各地，这在唐代沈亚之的《沈下贤文集》中就已有记载。⁴

从近年福州地区沿海的沉船遗址调查情况来看，平潭、福清、长江、连江、罗源，这些靠海所辖的县海域均有发现沉船遗址，这些海域都是属于福州港管辖的港区周边范围，而从已出水的沉船陶瓷器看，每艘船上都转载着不同窑口的陶瓷器，有福州地区，福建省内（如德化窑，建窑等），还有周边邻省（如：浙江龙泉窑和江西景德镇窑的陶瓷器等）。中外水下考古学者从1989年以来，先后对福建连江定海白礁一号沉船遗址进行水下考古调查，出水有青花碗，黑釉盏，陶罐等器物，窑口为福州地区的福清东张窑，闽清义窑，连江浦口窑等，年代为南宋。2007年，在平潭大练岛的沉船遗址进行抢救性水下考古发掘，出水有龙泉窑青瓷大盘，碗，罐等……窑口为浙江龙泉窑，年

¹琉球：《历代宝案》第1集，卷42。

²福建省博物院 日本博多研究会：《福州怀安窑贸易陶瓷研究》、《福建文博》1999年第2期。

³清林枫：《榕城考古略》，福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1980年6月铅印本，P74。

⁴福建省博物院 日本博多研究会：《福州怀安窑贸易陶瓷研究》、《福建文博》1999年第2期。

代为元末。2008年,对平潭海域的白礁二号沉船遗址进行抢救性水下考古发掘,出水有青花瓷,青花釉黑红,蓝釉器等,窑口为景德镇民窑产品,年代为明代末期。2005年7~10月,在福建省平潭海域发现碗礁1号沉船遗址,经抢救性水下考古发掘,出水瓷器1.7万多件,有青花瓷器,青花釉里红,青花色釉器等,系清朝康熙早、中期景德镇窑的产品。

从以上这些沉船出水的瓷器,证明了在福州港所辖的海域范围内的外运陶瓷船舶,在经历宋、元、明、清各朝代,时间跨度长达700多年里,福州港从不间断地承担着福州本地窑口和来自江西景德镇窑,浙江龙泉窑等窑口烧制陶瓷器外销转运任务。当时转运的主要线路:闽北的青瓷窑业(如浦城—松溪等)由于多受龙泉窑的影响,“处于闽江上游,其窑业产品顺流而下至福州,出闽江口再转往泉州港外销是完全可能的。龙泉窑近在毗邻,因此不排除一部分龙泉窑瓷器也走这条便捷的运输路线的可能性”。¹而景德镇的陶瓷产品主要经“赣江入鄱阳湖,由长江干流往下经明州外销出海;由铅山河口镇,穿越福建武夷山过崇安,进入闽江的上游建溪,或者由王虎打关经过光泽、邵武,进入闽江上游的富屯溪。这两条路线都是从赣东南进入闽江上游,再用船下运至福州出海(碗礁一号瓷器外销所走路线)。”²而“碗礁一号、碗礁二号、大练一号沉船遗址都在闽江口以南的海路航道上,沉船上满载龙泉窑,景德镇民窑的瓷器。古代陶瓷器的运输,往往以水路为经济、便捷。福建东北部与浙江,江西接壤,龙泉窑主要产区的大窑窑区,经过很短的陆路,即可进入闽江水系的上游。景德镇属信江水系,与闽江水系的上游邻近,可经过一段较短的陆入转路闽江,顺江而下出闽江口入海,是通往华南沿海进而前往海外距离最近的通道;绕道其他的路线(如长江口和经宁波港)则显路途遥远。因此,闽江水路有可能是一条传统的联系景德镇窑、龙泉窑和闽江流域窑址的非常重要的贸易陶瓷外销路线。”³由闽江水路转运景德镇,龙泉窑陶瓷,正是他们当时首选的捷径,也是一条历史悠久的传统线路。自宋元开始,经历明清而从不间断。从青白瓷到青花瓷,依托闽江水道,大量景德镇,龙泉窑的陶瓷器销往世界多国。碗礁一号等沉船应是当时繁荣的福州港转运陶瓷外销盛况的重要历史见证。

概而论之,福州“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航线之一,福州港的陶瓷外销承载着我国东南沿海古代海洋社会经济史,中外海洋交通史等研究领域众多的信息和资料。而福州海域沉船遗址出水的瓷器,为福州“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提供更多的实物资料。《海捞瓷收藏与鉴赏》一书写道:“对于海捞瓷的研究者和探索者来说,面对着成千上万的出水瓷器,他们的着眼点并不在于海捞瓷本身的真伪,而在于海捞瓷所带出水的文明信息,在于海捞瓷所携带的中国陶瓷史之谜,在于海捞瓷所显示的中外商贸史,在于海捞瓷所反映的海上丝绸之路的盛况,在于古代沉船所揭示的中古文明的海上航线,在于海捞瓷所要告诉我们的中外文明交流和古代中国和世界各国交流的历史,在于我们不知道的古代中国甚至古代世界史。”⁴因此,我们从福州古代窑址分布,烧

¹周春水:《从碗礁一号沉船看闽江水路的陶瓷器外销》、《中国古陶瓷研究》第14辑,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版。

²梁建安:《西沙群岛水下考古调查发现陶瓷器的相关问题》,《西沙水下考古1998~1999》,科学出版社,2006年。

³赵嘉斌:《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中国古代外销瓷——中国水下考古工作与发现》,《中国古陶瓷研究》第14辑,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版。

⁴陈逸民 陈莺著:《海捞瓷收藏与鉴赏》上海大学出版社2013年3月第1版,P4。

制陶瓷的情况，结合福州沿海沉船遗址出水陶瓷情况，并对照有关文献记载，以及沉船所要到达的海外目的地的方向和航线进行综合对比研究，为福州古代陶瓷生产、转运、外销的过程，为福州“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提供更多的新信息、新资料、新探索、新课题。

作者简介：

张振玉，福州市博物馆研究员。

海丝寻梦：全球本土化中的闽南地方戏曲

——“海上丝路”与闽南戏曲“走出去”战略研究系列论文之一

王 伟

内容摘要：本文基于文化间性交往的分析框架，从共时性水平传播与历时性纵向传播两个维度，重述学术史叙事中闽南戏曲的流变图谱及其与闽南意象之海外传播的辩证关系，进而在“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与建设“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中，多角度、深层次探索闽南戏曲产业化路径，以服务于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国家战略需求。本文藉由寻绎区域政治力量与产业资本逻辑对民间社会的渗透轨迹以及后者对前者的抵抗话语，考辨闽南戏曲传播“场域”中的商业话语、政治话语、学术话语、民间话语的运作机制与博弈规律，进而解析各种力量对文化记忆之书写“场域”的激烈争夺与跨界想象，揭橥潜藏在海内外闽南人的社会心理密码与历史文化地层，重新图绘闽南戏曲之公共观演进程与时代精神嬗变的互文本关系。

关键词：情感经济 闽南文化 戏曲产业 原乡情结

一、问题的缘起

“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故事的年代。”若对“丝绸之路”的概念界定进行学术史探勘，可知这一说法似可起源于1877年德国地质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男爵的《中国亲程旅行记》；之后，曾被誉为“欧洲汉学泰斗”的法国汉学家埃玛纽埃尔·爱德华·沙畹（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在《西突厥史料》（*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 occidentaux*, 1903）中提出“丝路有陆海两道”¹的说法；1967年，日本学者三杉隆敏在《探索海上丝绸之路》一书中对“海上丝绸之路”这个概念做了正面的专门论述。时至今日，汉语学术界普遍将“海上丝绸之路”诠释为，“1840年之前中国通向世界其他地区的海上通道，它由两大干线组成：一是由中国通往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的东海航线；二是中国通往东南亚及印度洋地区的南海航线”²。显而易见，“海上丝绸之路”这一概念，内涵丰富、外延广阔，“涉及港口、造船、航海术、航线、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民间的商品贸易、外贸管理体制、货物流通、人员往来、文化传播、民俗信仰等众多方面”³，需要运用多学科知识进行整合研究。

2013年10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先生出访东南亚，在印尼国会发表重要演讲

¹ 陈燕玲. 闽南文化概要[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3: 141.

² 龚缨晏. 20世纪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集萃[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1.

³ 龚缨晏. 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百年回顾[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2.

称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明确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2014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先生在向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要抓紧规划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由是观之，这一战略是我们国家在新的形势下，审时度势而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具体到我们省而言，正如省委书记尤权同志所指出的那样，“福建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发祥地和我国最早对外开放的省份，要抓住机遇、主动融入，发挥优势、积极作为，为建设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美好世界做出积极贡献”¹。不言而喻，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新一轮改革开放，在为海峡文创产业的迅速成长提供千载难逢之良好的政策生态的同时，也意味着闽省学术界特别是“闽南海丝文化圈”中的学者，必须充分领会这一“大手笔、大战略、大布局”，针对闽南文化如何更好、更快地走出去，从而在“众声喧哗、多元共生”的世界舞台上发出自己独特的响亮声音，进行更加全面、更加深入的整合研究。

二、闽南锣鼓：作为方法的海上丝路

“过去之所以被激活，不仅因为对过去的事情和过去是什么意见不一，而且因为不能确定过去是否真的已成过去，它是否真的完结、有了终结或它还在继续”。这句出自美籍巴勒斯坦裔学者爱德华·沃第尔·萨义德（Edward Wadie Said）之口且在汉语学界被广为征引的名言提醒着我们，已然缺席或曰价值坍塌的历史事件，必须经由跨时空、跨语际的主体间性对话，重新建构其作为未完成进行时的出场语境，而将“不在场”的抽象存在进行“在场化”的具象陈述。具体到本文论题，当下主流的戏曲史论大抵秉承“放射论”的论说传统，在其所规训之闽南戏曲传播史的叙述逻辑与修辞策略之下，据信闽南戏曲作为流淌在海内外闽南人血脉当中的民族DNA，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地方化、民间性的一般戏剧，其依循海上丝绸之路向域外传播，并且深深嵌入华裔族群甚至当地土著的休闲活动甚或日常生存，最终形成闽南——“东洋”——“西洋”（这一概念约等于郑和下西洋的“西洋”，实质是以“南洋”为主体进而延伸到中东、北非等广大地区的地缘政治学名词）之间繁复驳杂的戏剧关系网络。由此而来，闽南戏曲的所谓艺术本体价值，绝非一般论者所津津乐道的，其在不经意间联系着“多元、开放、跨界、混杂”这些极具后现代症候意味的关键词，其当之无愧地作为国际移民艺术的图腾符号，直指广义全球化中的认同政治问题。显然，具有学术敏感度与想象力的学者们对此洞若观火、了然于心，“以关系主义、建构主义为内核的思维进路”，²有意识地在“双向互动、同步逆反”的分析框架下，多渠道、多层次地展开探讨“闽南戏曲在海外的传播”与“海外戏剧在闽南的传播”，初步构建海上丝路所形成之文化格局中的闽南戏剧地形图。

例如，国内知名戏曲学者、福建师范大学王汉民先生在其扛鼎之作《福建戏曲海外传播研究》一书中就以明代莆田人姚旅在《露书·风篇中》、清人汪楫《使琉球杂录》（1683年）关于琉球等地的演戏记录等厚重翔实之史料，令人信服地指陈，“福建戏曲海外传播的历史比较悠久，从现存的记载来看，明万历年间已有福建戏班到琉球及东南亚等地演出”。无独有偶，著名比较戏剧学专家、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周宁教授主编的煌煌三卷本的《东南亚华语戏剧史》亦意味深长地指出，“在爪

¹ 尤权. 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枢纽[J]. 求是, 2014(17).

² 王伟. 表征闽南: 歌仔戏研究的现代性寻绎[J]. 戏剧文学, 2014(6): 80—85.

哇从1603年至1783年华商酬神作戏的活动从未间断过,而且当地的华人富豪或赌场大亨还延聘漳、泉两州乐工、优人,教导自己蓄养的婢女(爪哇人)歌舞,日日演戏以娱嘉宾”¹。在笔者看来,厦大中文系戏剧戏曲学研究团队的学术努力,主要着眼于移民族群之身份认同的理论视域,以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象的共同体”作为运思路径,独具匠心地将闽南族群的“海丝记忆”与戏曲观演活动的勾连起来,敞开了闽南戏曲不仅是东南亚华人华侨认同自身民族文化和表达主体心灵的重要媒介,亦随着当地华人移民艺术与在地文化的互动交流而与时俱进,开枝散叶、落地生根,进而在“戏剧闽南”的审美层面跨越现代民族国家界限,建立了一个以闽南方言文化为厚实基础的“想象疆域”。

平心而论,海上丝路与闽南戏曲的域外传播这一课题,绝非当代闽地学者之自娱自乐的自说自话,其宛如巨大的磁石吸附着西方汉学家的关注目光。值得引起注意并且深思的是,若从在第三世界学界方兴未艾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上,掌握话语权之不无自恋的西方学界及其学术代理人,尽管在表面上大都标榜价值中立的学术立场,但其内里大都存有西方中心主义(实质为充满着傲慢与偏见的欧洲中心主义)的预先判断,实体性本质主义为方法论坚核的历史诠释学,以及轻视民俗曲艺的精英主义审美趣味。职是之故,其关于闽南庶民戏剧的知识生产,似乎只是著述主体基于自我确证的需求想象,在视而不见或曰选择性遗忘之过滤机制的宰制之下,与研究对象(作为主体的他者存在)的真实状况关系不大甚至毫无关系,当中充满着将闽南戏曲神秘化、浪漫化、他者化的美学修辞与知识考古。令人不安的是,若以当下的“后见之明”来追根溯源,西方人关于流播海外之闽南戏曲的刻板印象由来已久,典型如东南亚华人史专家、英国学者布赛尔(V. Purcell)在《东南亚的中国人》卷三《在暹罗的中国人》,就以外来者的他者视域详细描述了清代康熙年间闽南戏曲在泰国等地的演出情形,其作为颇具参考价值的戏文史料,折射出彼时欧洲人对于闽南戏曲的整体无知与歪曲偏见,令人啼笑皆非、扼腕叹息。

然而话说回来,还是有不少海外学者出于对闽南古老戏曲发自内心的真挚热爱,因而能够以严谨清明的学术公心,综合运用“文献、文物、田野”之三重证据法,尽其可能、客观到位地研究闽南戏曲的传播图谱。当中翘楚中就有,现任教于福州大学的当代著名法籍汉学家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先生在《海上丝绸之路与南音》一文,就耐人寻味地强调南音(即“弦管”、“南管”)这一让泉州(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之一)引以自豪的古老音乐,在诸多维度受到波斯文化的遥远影响,可以将之认定为中外音乐传统的交流结晶。具体来说,其基于比较文学法国学派之实证主义影响研究的学术范式,细致刻画南音所受外来影响之“痕迹”,特别是以《陈三五娘》这一梨园经典为典型个案,立体论述“南音不是作为一种中国职业音乐家演奏的音乐而产生的,而是由包含很多阿拉伯商人在内的泉州商业阶层精英发展起来的这一事实。在南音曲目中占主导地位的陈三、五娘故事中有许多非中国式特征”²。至于施舟人的已故旧友,曾任英国牛津大学荣誉中文讲座教授的龙彼得(Pier van der Loon)先生,数十年如一日仔细爬梳风尘于历史深处的信札、日记等文献资料,让“被遗忘的文献”浮出历史地平线而重见天日。他在《古代闽南戏曲与弦管》一文中辟有一

¹ 周宁. 东南亚华语戏剧史[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7: 804.

² 施舟人. 海上丝绸之路与南音[A]. 闽南文化研究——第二届闽南文化研讨会论文集(下)[C], 2003: 1319—1320.

节《1589——1791在海外的演出》，就是通过“东南亚和台湾的福建移民的记述”¹，运用较大篇幅专门阐述大航海时代中闽南戏曲的演出状况及西方殖民者对闽南戏曲的早期认知与纠结态度，其观照的地点跨度极大，涉及印尼、泰国、中国台湾等地区，构成今日学者从事这一领域研究难以绕开的学术起点。

三、想象南洋：闽南戏曲的光影镜照

现代戏剧大家田汉先生有言，“银色的光给戏曲以新的生命”。斯言不谬，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是京剧，而中国台湾的第一部闽南语电影《六才子西厢记》（1955年）是歌仔戏，据说中国台湾最后一部的闽南语电影《陈三五娘》（1981年）也是歌仔戏。正是在“影”与“戏”难以截然分开的学术意义上，笔者认为，闽南戏曲电影作为闽南语电影的开端以及主要类型，指涉了以闽南戏曲表演艺术为主要拍摄对象，旨在通过优秀剧目的光影演绎以呈现闽南曲艺的独有魅力、体现闽南艺师之艺术成就、映现闽南族群审美理想与生活方式的戏曲电影类型。进而言之，闽南地方戏曲在后舞台时代，藉由电影这一“声、光、电、色”俱全又佳的新兴电子媒介技术，不仅精心营构出炫人耳目、新奇多变的视听盛宴，而且改变戏曲搬演之朝生夕殁的传统宿命与无尽遗憾，达到“化瞬间入永恒、抚四海于一瞬”的传播效果。具体联系到闽南戏曲以电影为载体广泛播撒于海外华人社区的历史事实，笔者不得不提到在2014年10月25日于厦门召开的第五届闽南语电影研讨会（这个会议是第七届海峡两岸文博会的配套活动）中的一段讨论。在会议期间，曾留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郭崇江博士以新加坡发行的《南洋商报》为轴心，从东南亚移民史的问题域出发，勾勒了上个世纪50年代“厦语片”在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的传播概况。他的发言引起笔者兴趣的地方，在于其立足于传播五要素的分析模式，从厦语片的传播环境（重心从祖国大陆的闽南地区转向中国台湾以及东南亚的华人聚居区）、受众对象（以东南亚华人社群为主）、诉诸“乡情、乡音、乡思”的营销策略、较为丰厚的投入产出比等维度，全方位阐述厦语片在东南亚盛行一时的繁荣原因。事实上正如与会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作为以中国香港为主要生产基地，在中国台湾、东南亚等地（特别是新马地区）风靡一时的厦语片，其主要呈现形式就是脍炙人口、耳熟能详的闽南戏曲故事。换言之，郭博士的以上归纳的真知灼见，似乎略作改造便可以迁移或曰对接到闽南戏曲于更加宽泛的特定时段在东南亚广泛流行的原因探勘。考虑到以史为镜，可以折射出未来的趋势走向，下文就是顺着其所启发的致思通路而展开分析，以期在今天闽南戏曲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走出去”和闽南语电影衰落之后的全面复兴提供些许思路。

第一，飘洋过海、为数众多的闽南籍华侨，构成闽南戏曲在东南亚地区的主要观众群，前者为后者的海外传播提供强有力的市场支撑，悄然构造并不断完善闽南戏曲及其影像作品的公共观/演的生态系统。在当代媒体的主流叙事当中，富有雄强进取之开拓冲动与冒险精神的闽南族群，以“下南洋”过番谋生的勇敢之举，而与境内浩浩荡荡的“闯关东”、源远流长的“走西口”并称中华移民史的三大壮举。根据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出版的《福建省志·华侨志》的记载，“到鸦片战争爆发前夕，整个东南亚地区华侨总数已达100万人以上，除暹罗、真腊、安南外，以祖籍福建的华侨

¹ 龙彼得. 明代戏曲弦管选集[M].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3: 21.

占多数。”¹另据厦门大学历史系戴一峰教授在《近代福建华侨出入国规模及其发展变化》的大体估算，“自1845—1949的百余年间，经厦门移居海外的闽南华侨总数高达120万，而95%的闽南华侨分布在东南亚的新马、印尼和菲律宾等地。”²时至今日，在海外生存与发展的闽南籍华人已达2000万人之巨，毫无疑问，遍布五洲、数量庞大的这一群体，一方面构成了“新世纪我国联系海外、重塑‘海上丝路’的一支重要力量”³；另一方面也为“世界拥抱闽南戏曲”与“闽南戏曲走向世界”，奠定坚实而又牢靠的人口基础。

第二点作为第一条原因的合理延展，即闽南戏曲的主创人员与营销团队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之下，刻意激发原乡情结所潜藏的巨大心理能量，以现代性的乡愁作为最大卖点的广告行销，定位精准、效果显著。识者只须检视这一时段东南亚主流报刊媒体所刊登的演戏评论与映演广告，不难发现充斥其间的故土情思，其用意不言自明、毋庸置疑。仅以《南洋商报》所刊登的戏班广告与闽南戏曲电影广告为例，其间弥漫着铺天盖地却又直截了当的情感攻势。诸如“闽南侨胞喜讯”、“听自己的方言，看故乡的风趣”、“听家乡话，看家乡戏，倍感亲切有味”、“福建侨胞不可错过”、“福建侨胞看过来”⁴此类等等不一而足。不惟如此，情感经济学背后关涉更为深广也更为根本的美学动因，即千千万万海外游子念兹在兹的“情本体”。全球化语境所带来的身份迷茫与现代性焦虑，使得漂泊海外的闽南族群殷切期盼经由公共空间的观/演仪式，纵情言说内心深处的怀乡之情。众所周知，舞台上或者光影间的闽南戏曲，大都以“重乡崇组的思维观、爱拼敢赢的气质观、重义求利的价值观、山海交融的行为观”⁵的来追溯历史，以“凝重深沉的时代悲怆和强烈浓郁的言志旨趣”⁶切入审美时空，在去国怀乡的现代性乡愁氛围中建构闽南族群的精神家园，满足当地华人对公平正义的焦灼呼号和国族身份的认同想象。包裹着闽南风味外壳的闽南戏曲及其影像文本，以“绵如雨、深如海、痛如天，波澜四涌、无法弥消”的爱情传奇，将日渐淡出现代生活却又挥之不去的乡土情怀，投射在舞台上、显影在银幕中，从而使历史缺席的传统情愫，变成现世在场的审美意象。这种将观/演主体的审美体验有机嵌入返本开新的道德神话，于纵横交错、零乱裂解的现实情感缝隙之中，模塑或曰重建华人社群所分有、所共享的公共记忆。有鉴于闽南戏曲之现实与历史桴鼓相应的文化品性，及其与海外民众之审美期待视域的间性融合，使观众能够在物我齐一、情理交融的接受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将似已沉沦、想象之中的闽南文化的本体苦恋，悄然固化为一种“物恋”的美学形式。是以，无论是沉湎于前现代儒家文化之目不识丁的草根阶层，抑或是浸润启蒙现代性之欧风美雨的后起精英群落，果不其然地被戏文的编码者纳入重返故土的造梦工程之中而难以自拔。君不见，曾几何时，在《因哥送嫂》、《岭路斜崎》之动人心弦、百转千回的音乐声中，不少人的眼睛都红润潮湿以至模糊不清。

第三，“打铁还的自身硬”，闽南戏曲“走出去”的关键在于其自身过硬、引人入胜的剧艺品质。

¹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福建省志·华侨志[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2: 13.

² 戴一峰. 近代福建华侨出入国规模及其发展变化 [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1988 (3).

³ 林华东. “海上丝路”的影响与启示[N]. 人民日报, 2014-10-19.

⁴ 郭崇江. 试论20世纪50年代厦语片在新马地区的发展——以《南洋商报》(1953—1959)为中心[J]. 当代电影, 2012 (3): 60—63.

⁵ 林华东. 闽南文化: 闽南族群的精神家园[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3: 1.

⁶ 王伟. 台湾电影的现代性书写[J]. 集美大学学报, 2011 (3): 6—11.

这就意味着闽南戏曲的维系不坠，并不在于老一辈华侨华人的文化缅怀与思古幽情，亦不能苟延于地方主义的自我保护，也不能单纯依赖于地方富商巨贾以及文化主管部门杯水车薪式的输血供给，其生命力在于其在跨文化交往语境中创新发展，吸引华人以外的新一代观众群。应该说在这方面，海峡东岸的宝岛台湾在这方面的运作经验与推广思路，值得急于打开境内外市场的福建方面反思与借鉴。台湾歌仔戏一向因时因地而动，求新求变、锐意进取，具有及早谋划、抢占先机的市场开拓意识和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艺术创新精神。其并不画地为牢地因循旧有的中规中矩的表演程式，也无意困守“才子佳人之家庭悲欢，帝王将相之庙堂风云”的题材内容，而是鼓励具有全球观瞻与在地情怀的跨地域团队进行探索、多方尝试，在知识精英/民间草根、传统性/现代化、全球性/在地化、主体自我/他者存在之间获取最大公约数。经过凤凰涅槃、化蛹成蝶的痛苦转型，其在本岛以外的全球市场上开疆拓土、成绩瞩目。例如在精致化的大制作浪潮之中，“‘秀琴歌剧团’的庄金梅，根据古希腊索福克勒斯悲剧经典《伊底帕斯王》(Oedipus Rex)改编《罪》，追索人类宿命的现实抗争；‘洪秀玉歌剧团’的黄英雄，根据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再造《圣剑平冤》，直面生存意义的两难抉择；‘一心歌剧团’的游源铿，根据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而创《漳泉风云》，反思宗法制下的恋爱自由。”¹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随着大陆文化市场改革的加速推进，海峡东岸的戏曲同行也逐步发力，依托政府、学界、业界协同创新所形成的合力，大有后来居上之势。比如，在海内外名闻遐迩的泉州木偶剧团便尝试改编果戈理的经典名作《钦差大臣》，将之汇入当下现实与世界历史的脉动之中，力图在“交互思辨中透视永恒人性”²，获得包括俄罗斯本土观众在内全球观众的一致好评。与之相应成趣的是，木偶剧团有识之士还将《赵氏孤儿》这一影响西方一代启蒙思想家的经典剧目，拍成数字电影并尝试用汉语普通话配音，使得这一古老剧目跨越“语际分殊”与时空隔阂，在全媒体多屏时代绽放光彩。

四、结语

“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闽南戏曲在群体狂欢、渲泄情绪的原型层面，恢复个体化、处身性的民间素朴记忆，不仅高度契合海内外闽南族群在日常伦理道德的价值评判标准，也与其原乡情结、家国情怀的生命归宿融合为一。闽南戏曲在日新月异、离散飘荡的社会现代性层面，折射了闽南族群关乎主体自我想象与现实身份认同的深刻焦虑，以及后者试图在整体社会版图边缘解构主流叙事，进而进驻中心以参与建构公共论述空间的诉求渴望。闽南戏曲在体验自由之形而上的现代性超越层面，以审美批判性的戏剧话语拯救历史、抵抗遗忘，超克日渐膨胀之商业逻辑的消费欲求与如影随形之观念形态的言语迷思。质而言之，海上丝路所形成的跨文化交往格局，不仅让闽南戏曲及其影像文本成为海内外闽南人之公共历史记忆的重要媒介，也让后者构成闽南文化的记忆所在。闽南戏曲的产业化与“走出去”的成功之路，不仅在于其能否有效激活戏曲符码所贮存之非比寻常的审美心理能量，更在于其能否抓住时代所赋予的发展机遇，藉由“乡情邀演、政府组织、艺术交流、学术互动”等诸多管道，在构筑闽南人之共同心灵家园发挥应有作用。

¹ 王伟. 从前现代性到后现代性——“公共观演场域”中的闽南戏曲[J]. 戏剧文学, 2012(3): 80—85.

² 董健. 中国当代戏剧史稿[M].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8: 604.

致谢语

本文研究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陈三五娘”故事的传播及其当代意义研究》(11BZW107)、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一般项目《生态美学视野下闽台文化圈建构与产业开发研究》(2014B043)、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青年项目《以“海丝文化”促进闽台地区民间艺术的融合与创新》(2014C048)资助,依托平台为中国社科院文化研究中心闽南文化研究基地。

作者简介:

王伟(1981—),男,汉,福建泉州人,泉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讲师,厦门大学中文系博士后,研究方向为文化创意产业。

德化陶瓷贸易在新海上丝绸之路 发展趋势分析

李变花

内容摘要：德化作为中国三大瓷都之一，在古代中国对外贸易中就占有重要的位置。德化陶瓷有着悠久的贸易历史，一直以来是海上丝绸之路主要贸易商品之一。德化陶瓷用自身的特色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在中国陶瓷贸易中独树一帜。从历史到现代，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新海上丝绸之路成为中国对外贸易新的窗口，为中国对外贸易开辟了一个新的市场。在今天，作为陶瓷产区的佼佼者，德化陶瓷在新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尤为重要。不管是传统瓷雕艺术，精致西洋工艺品还是倍受欢迎的日用陶瓷系类等等，德化陶瓷在中国陶瓷产区已名类前茅。分析德化陶瓷在新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为中国陶瓷的对外贸易发展有着深刻的作用。

关键词：德化陶瓷 对外贸易 新海上丝绸之路

在远古的海上丝绸之路上，中国的商品顺着汪洋的大海漂洋过海，走向世界。从汉代开始，著名的“丝绸之路”沟通了中外文化间的交流，中国被誉为“丝国”。就是这条狭长的丝绸之路贸易不仅使中国传统的丝绸成为风靡全球的奢侈品，还带动了海上陶瓷贸易之路。进入中世纪后，伴随着中国瓷器的外销，中国又开始以“瓷国”享誉于世。陶瓷贸易就是沿着这条海上丝绸之路愈走愈远。立足于新时代的前沿与市场需求，新海上丝绸之路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前提下被提出来的。

德化作为中国三大瓷都之一，自古就有悠久的陶瓷贸易历史。古窑与沉船的考古证明了德化陶瓷是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重要商品。德化陶瓷从历史走来，锐意创新，渐渐跻身中国陶瓷出口市场前列，越来越体现它的重要性。作为中国陶瓷产业发展的佼佼者，德化陶瓷在新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与未来发展趋势不容小觑。

一、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概况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海上通道，是通过太平洋与印度洋为媒介连接各个沿海港口网点组成的国际贸易网。古代中国，借着海上经济带与陆上经济带和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着商贸联系。

（一）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轨迹

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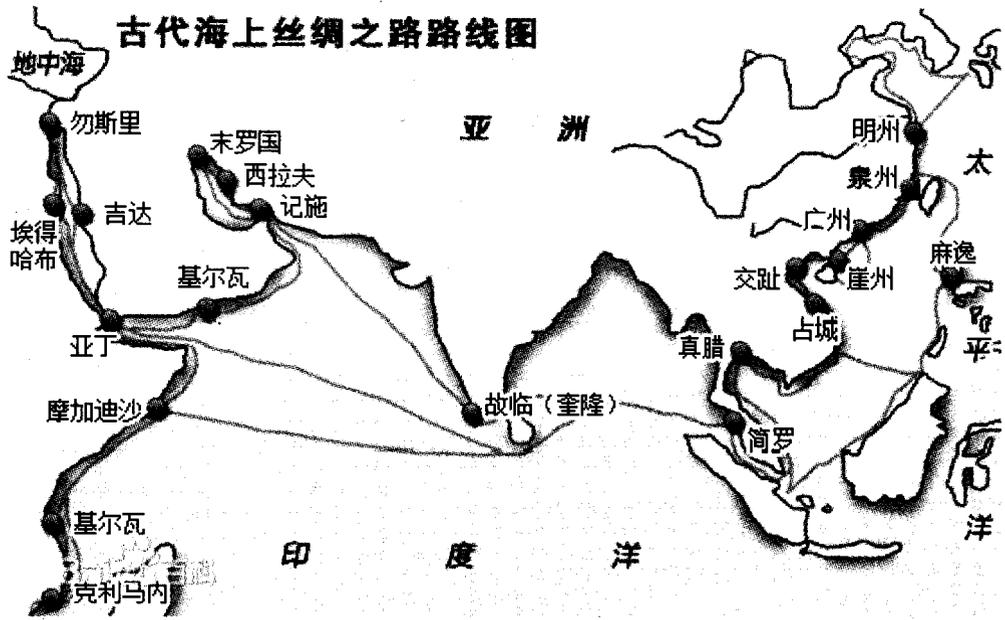


图1 海上丝绸之路路线图

1. 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时期

唐代以前随着丝绸的外传，海上丝绸之路萌芽。此后，海上贸易主要从东海起航，主要航行到朝鲜和日本。到了隋朝，统治者已将开始重视海外贸易，也标志着海上丝绸之路处于发展时期的前夕。这时期的路线和海港：东海航线至朝鲜、日本，距离近，航线短，早期以山东半岛的渤海湾内海海港为起航线，后来自山东半岛成山角沿海岸线南下至扬州，贸易港还未固定。东航日本主要以掠朝鲜半岛沿海岸航行的北线为主，还未发展到横渡东海的南线。南海航线，最远只能航行到印度半岛的东海岸，从今斯里兰卡回航，航行日程要“数年来还”。早期自我我国起航的海港，主要为雷州半岛的徐闻、合浦。外舶来我国贸易早期以日南、交趾(今越南北部)，特别是以番禺(今广州)为主要的贸易港。东南沿海的对外贸易港尚未形成。

2. 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时期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统一的强大封建王朝。它和朝鲜日本的海上贸易更加频繁。两宋朝时期，对外友好交往频繁。不仅出了官方的海上贸易，还出现了民间的海上贸易。这时期的航线和海港：(1) 东海航线，除贾耽所记“登州人高丽渤海道”的北线外，自唐代起又开辟了越海东渡日本的南线。北线海港以登州、莱州为主，南线海港有：扬州、楚州、苏州和明州。两宋时，北方为辽、金所占，政治、经济重心南移，北方海港也随之转移到东南沿海，特别是明州，离日本最近、航线最短，从明州航行至日本只需3—6昼夜，较以前绕朝鲜半岛的北线，大大缩短了航程。(2) 南海航线，据贾耽所记，唐代我国商船已能从广州远航到波斯湾。唐宋时的航线已发展到亚丁乃至东非沿岸。从唐代起，随着造船技术等的发展，我国和海外贸易交往的国家就不断增加。贸易种类也不断增多。瓷器就是从唐末时期随之外传的。

3. 海上丝绸之路的极盛时期

元、明、清时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鼎盛时期。元朝继续对外贸易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继续。明朝，郑和下西洋的船队开拓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疆域，标志着海上丝绸之路达到极盛时期。这时期的航线和海港，无论是东海还是南海航线，也都胜过前期。特别是新派生出通过马尼拉至拉丁美洲的航线最为突出。海港除原有的各贸易港外，又有新的发展，尤其是介于东海和南海航线之间的泉州已发展成为世界著名的贸易港。从漳州起航经马尼拉到美洲的新航线的开辟，意味着中国丝绸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的外传，几乎遍及全世界。中国贸易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是所向无敌的。即使象西班牙这样强大的欧洲殖民者，虽然可以征服拉丁美洲和菲律宾而称霸一时，但对中国商品垄断马尼拉市场也束手无策。可见中国贸易的商品的外传，不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且还赢得了对马尼拉贸易出超的胜利。

海上丝绸之路虽以丝绸贸易为开端，但其意义却远远超过丝绸贸易的范围。它把世界各地的古代文明经过海上大动脉的互相交流而放出了异彩，给世界各族人民的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二）新海上丝绸之路的提出

2013年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东盟时指出，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是“21世纪新海上丝绸之路”的首次提出。

1. 新海上丝绸之路的路线规划



图2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图

虽然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尚处于前期研究阶段，但目前正与相关省区进行研究，未来将出台相关规划。可以知道的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合作伙伴并不局限与东盟，而是以点带线，以线带面，增进同沿边国家和地区间的交往，将串起连通东盟、南亚、西亚、北非、欧洲等各大经济板块的市场链，发展面向南海、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战略合作经济带，以亚欧非经济贸易一体化为发展的长期目标。由于东盟地处海上丝绸之路的十字路口和必经之地，将是新海丝战

略的首要发展目标，而中国和东盟有着广泛的政治基础，坚实的经济基础，21 世纪海丝战略符合双方共同利益和共同要求¹。

2. 德化陶瓷与新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

福建省是新海上丝绸之路规划路线的重要城市。优越的地理位置给商品贸易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泉州作为福建省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在新海上丝绸之路的作用不容小觑。德化作为泉州的一大重要出口区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密切，闽籍华人华侨多数分布在东盟国家。可以说，德化在在“新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由于中国——东盟陶瓷产业合作及陶瓷产品交易平台正在泉州加紧推进建设，而且近年来德化积极推进陶瓷产业创新，不断壮大陶瓷工业，严格保障陶瓷产品质量安全，大力提升陶瓷品牌效益，为促进陶瓷品出口打下了良好基础，陶瓷产品出口持续增加。在巩固日本、美国等市场的基础上，东盟和欧盟市场得到拓展。同时，积极推动陶瓷产品交易电子商务平台建设。通过以新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实现中国—东盟双方对陶瓷产业的合作，为德化陶瓷的发展创造一个更加神奇的神话。



图3 丝绸之路起点泉州

二、德化陶瓷贸易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状况

德化县位于“闽中屋脊”戴云山麓，总面积 2232 平方公里，五代后唐长兴四年（933 年）置县，是中国陶瓷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历史上与景德镇、醴陵并称中国三大瓷都。早在新石器时代，先民已烧制出釉陶器和印纹陶器；魏晋时代有青釉陶器；唐代始制青瓷。宋代以来，质地优良的瓷器一直是对外贸易的重要输出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德化陶瓷产品畅销世界五大洲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全国最大的西洋工艺瓷出口生产基地。

（一）新中国成立之前德化陶瓷贸易的轨迹

唐代，是德化窑的始烧年代。从美湖墓林窑地址的发现可以考证。生产的陶瓷产以供自用。在

¹ 陈武. 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关于共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J]. 当代海西, 2014, 4: 16-17

唐末五代，从大量的出土古物可以知道这个时期是德化陶瓷形成成熟的时期。此时，大量的陶瓷还是以自给自足为主，但是自隋唐以来，海上运输事业的不断发展与成熟，丝绸和瓷器并列为中国两大输出商品。可见，陶瓷对外贸易已经出现萌芽。

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为德化陶瓷的贸易提供了重要的贸易通道。德化以日用品为主的瓷器已外销到伊斯兰教、阿拉伯等地。当时德化的瓷器主要靠水路运输到泉州，即由3县境东南大学的大溪经永春运输到泉州港，由泉州港运输到海外。当时泉州的海外贸易航线，一是向东北方向，泉州—明州（宁波）—高丽（朝鲜）。二是向东南方向，泉州—澎湖—菲律宾的麻逸（民多洛岛）—印尼的渤泥（加里曼丹）。三是向西南方向，从泉州途径南海—印度洋—波斯湾等沿海诸国。四是南端至东非莫桑比克。当时泉州与净白个国家有商贸往来。明代时期，是德化瓷器发展的鼎盛时期，海外贸易事业继续繁荣。兴起的“建白瓷”成为风行欧洲和世界的“中国白”特色瓷。从海外考古发掘和收藏情况来看，19世纪80年代以来，在菲律宾出土的数万件瓷器中，就有南宋德化的青白瓷，如马尼拉的圣安娜等地出土的德化军持、壶、罐、瓶、盖、盒、碗、碟、高足杯等，1957年在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发现的德化瓷盒。在马来西亚圣徒般，宋及布亚、及加昂等考古发掘中有德化青白瓷的壶、瓶、盒、碗。斯里兰卡出土宋元时期德化窑的莲瓣碗和吨姿式碗¹。在世界亚欧非地区都曾陆续考古发现德化的古外销瓷器。在这中世纪时期，东西方海上贸易之路实际上就是一条繁忙的“陶瓷之路”。在这条航路沿途地区，有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可以寻觅到德化陶瓷的遗留。

清朝时期，德化窑的分布地点和生产范围更是惊人。后起之秀青花瓷更是海外亲睐的瓷器。民国时期，由于战祸连年，民不聊生，德化瓷的生产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陶瓷市场日趋萧条，瓷业每况愈下，已无明清时期的盛景。

民国时期 德化陶瓷尽管发展滞缓，也不乏精致的作品。瓷雕老艺人苏学金、瓷雕艺人许友义三兄弟、彩画艺人郑少陶等即是当时的佼佼者，1930年许友义为仙游龙纪寺精心雕制的“五百罗汉”系列瓷雕，形态逼真，开创了古今系列瓷雕的新纪录。

（二）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德化陶瓷的情况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各地也相继解放。随着德化的解放，德化陶瓷业掀开了崭新的一页。奄奄一息的德化瓷业获得了新生，被扼杀的传统工艺得到了抢救，瓷业生产逐步恢复和发展，呈现出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景象。解放后，着手医治战争的创伤，开始了艰巨的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积极组织、恢复瓷业生产，使长满蒿草的荒窑重新冒烟，失业的瓷工逐步归队。在抓好手工业生产的同时，积极发展国营经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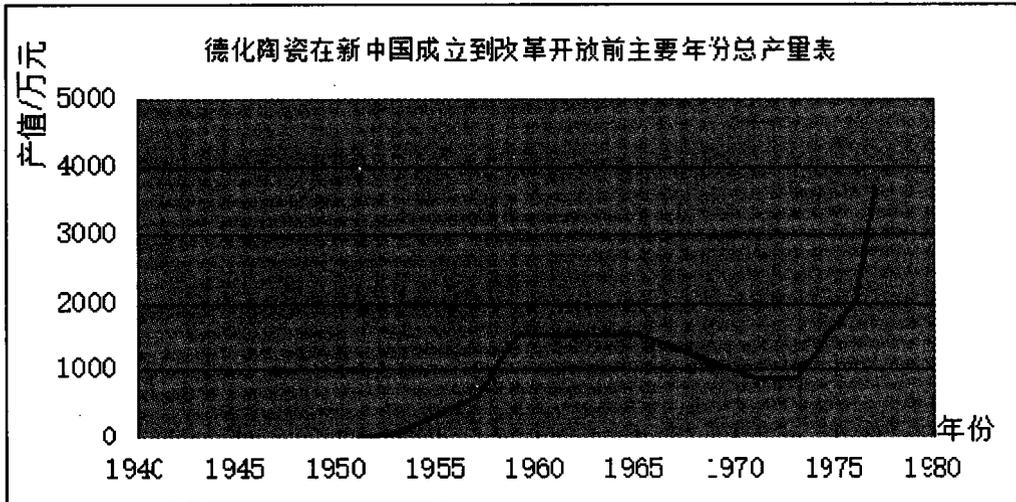
从表1和图4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的这段时期，德化陶瓷总产量是波动上升的。刚解放时，制瓷水平还很低，总产量还是也很低。在恢复国民经济的1951和1952年晋江专署派出干部，吸收工人，改良瓷厂旧址办起国营利民瓷厂。同时，由政府投资办起了国营德化劳改工厂。在多方共同努力与协作下到1953年，陶瓷总产量依然增长微量。

¹ 德化陶瓷研究论文集编委会编. 德化陶瓷研究论文集[C]. 德化: 德化陶瓷研究论文集编委会编, 2009. 253-304.

表 1. 德化陶瓷在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主要年份总产量表¹

年份	1949	1951	1953	1957	1959	1965	1971	1973	1976	1977
总产量 (万件)	3.24	33.248	133.54	1123.1	1877.6	1154.1	586.72	1195.7	2911.2	4486.4

图 4 德化陶瓷在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主要年份总产量



1953 年我国进入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其间德化各地相继办起了瓷业社农业社也办起了一起小瓷厂。这一年，全县总产量达到 1335450 件。较 1951 年来看，全县瓷业生产有了较快的发展。到 1957 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全县瓷业总产达到了 12314000 件。到 1959 年建国 10 周年的时候，仅 13 个社办瓷厂产量 18776500 件，产量相当惊人。以后又根据在“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瓷业生产得到持续的恢复和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 1965 年，全县瓷业总产量达到 11541500 件。仅仅十年的时间，全县瓷器产量比 1956 年增长一倍。文化大革命，德化瓷业生产遭到严重的损失，从 1966 年至 1972 年这段期间里，历年的总产量都比 1965 年下降。特别是 1970 年，损失更是惨重。造成 1971 年全县瓷业总产量下降到只剩下 5867200 件。1973 年贯彻了周总理提出的发展传统工艺的重要指示和国务院的有关文件，瓷业生产才恢复到 1965 年的总产水平，达到 11957500 件，此后陶瓷产量不断发展。到 1977 年，全县瓷业总产量由 1976 年的 29112800 件迅速跃上 44864900 件，超过历史的最高水平。

(三) 改革开放后至今德化陶瓷贸易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德化陶瓷更是在继承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大放异彩。包含科技成分的高新陶瓷生产工艺技术不断创新。名师巨匠人才辈出，陶瓷精品层出不穷。瓷雕巨作巧夺天工。德化已形成了

¹根据林合龙主编《德化陶瓷志德化县地方志》第 93-94 页数据整理。

传统瓷雕、西洋工艺瓷、日用陶瓷等产业结构。产品远销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发展部等单位命名为“中国陶瓷之乡”。在1978年，德化仅有数十家陶瓷企业，陶瓷产值才1268万元。30年间，德化陶瓷产业经济总量增长500多倍，如此增幅，居全国重点陶瓷产区之首，被业界称为“德化速度”。江西景德镇、湖南醴陵曾与德化并称“中国三大古瓷都”，在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的“中国瓷都”大角逐中，德化陶瓷业的产量、规模、外向度、可持续发展等11个指标都力拔头筹，以无可争议的优势获得“中国瓷都”称号。

1. 改革开放到新世界时期

改革开放后，德化加快陶瓷销售网络建设，组织参加广交会、国外交易会，举办大型展销会，扩展国外市场，广辟国内市场。陶瓷产业年增幅超过20%迅速成长为全国最强，最有竞争力的陶瓷产区之一。1993年10月5日，举办首届中国陶瓷节，组织近千家陶瓷企业到国内外大中城市参加或举办交易会，展销会。使之成为重要的途径提升德化在海内外的知名度，德化瓷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1986年前，全县有全民瓷厂2家，部门创办的陶瓷厂9家，乡镇及村办陶瓷厂59家，合作和个体瓷厂30家，加工兼销售企业19家，销售企业71家，配套服务企业11家，直接从业人员9216人。1986年下半年开始，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化，德化掀起了创办陶瓷热，自1987年3月至1991年，先后创办的陶瓷厂有集体191家，合作的85家、个体的75家，计新办陶瓷厂351家。此外在龙浔、浔中、三班3个镇，尤其是城关一带还涌现出大量陶瓷生产加工户。

近年来，城关还建成东大路、土楼洋、西墩、马丘洋等陶瓷加工区。乡镇陶瓷企业形成浔中，宝美，南斗3个陶瓷工业村，各村陶瓷年产值分别达到1500万元至3000万元以上，在乡镇企业的陶瓷群体中，年销售额上千万元的有东方公司、宝美瓷厂、福美瓷厂、国宝瓷厂4家龙头群体，据不完全统计，1992年，陶瓷行业在册从业人员达到2.63万人。此外，尚有一批家庭陶瓷加工作坊的人员。从1993年开始，德化陶瓷奋起直追，根据地方特色不断向前发展，取得了累累硕果。

2. 新世纪德化陶瓷新发展

进入20世纪，德化更是抓住了时代机遇，积极入世。改革陶瓷技艺，引领着中国陶瓷面向世界这个大市场。顺应市场需求，在中国陶瓷产业开辟一片新的天地。

表 2. 2001 年-2006 年德化陶瓷与景德镇陶瓷产业产值表

年份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景德镇	12 亿	15.8 亿	18.5 亿	20.5 亿	24.6 亿	32 亿
德化	38 亿	45 亿	53.1 亿	46.8 亿	51.26 亿	47 亿

从表2可见，我国入世以来，景德镇陶瓷产业产值从2001年开始到2006年每年的产值都有上升趋势，而德化陶瓷的产值却大体上先上升后下降又上升的较稳定的波动。从与景德镇陶瓷产业发展比较来看，德化陶瓷的产值却每年大幅度高于景德镇的产值，至少每年德化产值高出20亿左右。可见，从新世纪，德化陶瓷产业产值早已远远高于远负盛名的景德镇陶瓷，成为全国陶瓷产业的佼佼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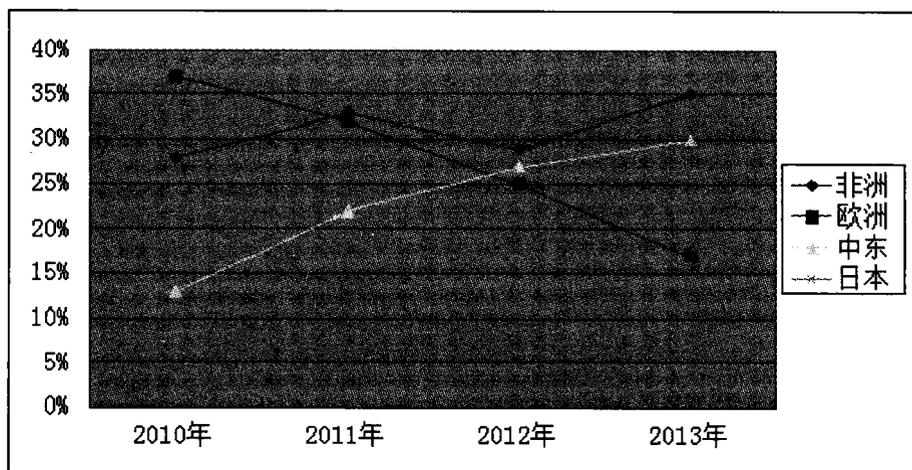
2007年到2011年，德化县陶瓷产品的产量即使遇到金融危机的重创，但还是迎难而上。这几年间，虽然产量比不上景德镇和醴陵的总量，产值也比他们低。但是德化陶瓷在危急中却是受损失

最小的。每年的产量和产值增值幅度都比景德镇和醴陵的高，在困境中发展最好的，受到打击最小的陶瓷产区。

2010-2013 年间，德化陶瓷产品出口区域发生了较大变化，出口到非洲市场最多，出口到欧洲市场的数量表现为下降趋势，而出口到中东市场的数量趋于上升趋势，出口到日本市场的基本处于平稳状态（见图 5）。

图 5 德化陶瓷产品 2010-2013 年出口路线图

三、德化陶瓷贸易在新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地位与发展趋势



德化陶瓷其独特之处之一在于著名的德化瓷雕，代表了中国陶瓷艺术史上美学新境界。未来的发展应该既有传统的瓷雕产品，又有德化西洋工艺品以及德化陶瓷日用品等系列产品，并相应地形成现代陶瓷产品的艺术中心。

（一）德化传统瓷雕品—新海上丝绸之路的艺术展现中心

德化瓷雕制作工艺极其讲究釉面细腻滋润，特别是对于人物塑造方面把握的十分到位，神态相貌雕刻的栩栩如生。

1. 传统瓷雕技艺巧夺天工

德化传统瓷雕一般是指具有独立性的立体陶瓷雕塑制品。德化瓷雕中又以瓷塑人物最负盛名。传统的瓷雕按制作方式，可分为浮雕、镂雕、捏雕、凸雕等数种。瓷塑人物最负盛名，它代表了德化窑的高超技术水平。德化技艺精湛的匠人们尤其以明朝何朝宗、林朝景、张寿山等瓷雕艺术大师通过巧夺天工的造型式样，选取各种不同的题材，塑造了一大批陶瓷艺术珍品，把德化窑瓷塑艺术推到了一个前无古人的境界，成为中国瓷雕艺术殿堂的佼佼者。这些瓷雕作品各种各样，传神写意，栩栩如生。通常一件瓷雕精品要历时数月甚至一两年的时间来完成各种精雕细琢。可以说瓷雕艺术作品是每个艺术大师的纯手工作品，每一笔印记都是独一无二的。而德化传统瓷雕又以纯熟的雕刻艺术历代相承，从未间断。合着时代的发展技术更加精炼。英国古陶瓷研究专家约翰·盖尔曾评价说：“明朝何朝宗的瓷雕观音可与意大利米兰的断臂维纳斯相媲美。”

2. 瓷雕作品收藏价值高

德化传统瓷雕的每一件作品都富含着高价值。不管是瓷土的选择到题材的抉择还是每一笔的雕

刻都凝聚着瓷雕艺术大师最专业的判断与创作。德化瓷雕在艺术价值取向上首先必须在雕像中见性格。每件作品所要表达的性格必须被充分展示出来。其次，在创作过程中同时充分运用对比等手法，装饰性强。利用一小个支点也要将人物特性展现出来。

最能体现价值的证据就是价格，如德化窑白瓷观音立像，它在1998年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以48.76万港元成交。福建省2004年春季艺术品拍卖会上，一件绿釉描金半跏观音像以全场最高价715万元成交；2006年6月2日德化白瓷雕艺术作品拍出550万元高价；2010年5月19日下午，随着拍卖师的最后落槌，许兴泰生前代表作之一瓷雕作品《渡海观音》以260万元拍卖成交。2010年5月19日我县三件瓷雕作品入围奥运征集项目福建版博会；2010年在首届中国“海丝”工艺品博览会上，德化县燕丹瓷研所创作的立体书法瓷雕《中国第一龙》荣获此次博览会银奖；2008年8月9日6套德化瓷雕将亮相“2008奥林匹克美术大会”；2006年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古玩业商会主办的“中艺杯”礼艺作品评比大赛在大连举行，德化瓷雕以1金6银5铜的好成绩，取得了大丰收。

因此，未来在新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上，德化陶瓷定能继承趋势。继续引领瓷雕艺术在新是海上丝绸之路越走越远。

（二）德化西洋工艺品—新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打产品中心

德化西洋工艺瓷主要指以观赏性、实用性为划分标准的较低价工艺品。是全国最大西洋工艺瓷出口基地，出口量居全国之首。德化拥有西洋工艺的广阔市场与历史经验。配合市场的需求将能新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大中坚力量。

1. 西洋工艺最大产区

德化西洋工艺品不像传统瓷雕那样传神写意，因为不像日用陶瓷那样普遍使用。而是居于两者之间。但近几年更向西洋工艺日用化方向发展。每年西方圣诞节，万圣节，感恩节等传统节日前夕往往成为销售高峰。德化西洋工艺的一直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现在已是全国最大的出口地区。每年的销量占比重很大占德化陶瓷出口首位，福建80%更是全国的40%左右。即使遇上经济不景气，德化西洋工艺陶瓷总能在困境中寻找契机，不断创新发展。

2. 关注海内外市场

德化西洋工艺的开发很重视市场的需求。各方各尽其能，探寻更好的发展。

政府方面，积极支持，出台优惠政策，给予补贴。充分发挥政府的经济职能、行政职能与法律职能。为德化西洋工艺陶瓷开拓市场搭起保护伞。

企业方面，求贤若渴，积极创新，诚信经营。以独有的企业家精神赢得海外广阔市场。为西洋工艺陶瓷的市场开拓提供良好的背景。

各金融机构，提供优惠贷款，支持陶瓷产业发展。为西洋工艺的海外市场调研提供经济支持。德化西洋工艺的生产不是盲目跟风以及无理揣测。而是准确的市场定位，注意流行趋势。正因为重视市场的需求，才能在广阔的海外占有德化陶瓷的一席之地。

（三）德化陶瓷日用品—新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兴市场中心

德化日用陶瓷日用品越来越受国内外青睐。杯、盘、碗、罐、碟、瓶等日用陶瓷是近几年发

展最快的陶瓷种类，各种精致的日用瓷成为了人们生活的必需品。而日用陶瓷工艺化、高端化更是顺应了市场的新海上丝绸之路的需要。虽然醴陵的日用陶瓷曾是国内最发达的产区，但是，近几年德化日用陶瓷的发展却是有目共睹的。

1. 日用陶瓷是不断崛起的新市场

德化日用陶瓷现在占福建日用陶瓷的 95%。在全国更是占据了大的出口市场份额。这几年，日用陶瓷已在许多星级酒店，高档会所，或是普通家庭等频频出现。甚至多家企业如德化的冠幅家用日用陶瓷，顺美集团都相继上市。为日用陶瓷的市场开辟了新的道路。只要德化的日用陶瓷在新海上丝绸之路继续探索，挖掘新的产品，也定会有一片新的市场。

2. 日用陶瓷的强大生长力量

德化的日用陶瓷生长力量是不容小觑的。据统计，2011 年、2012 年德化分别出口日用陶瓷 1.08 亿美元、1.24 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 5.89%、13.59%，不合格率也是越来越低。现在日用陶瓷发展势头很猛，提倡高科技含量和工艺化的道路是德化陶瓷在新海上丝绸之路与全国其他陶瓷产区齐头并进的共同力量。

此外，德化其他系类陶瓷，如建筑陶瓷、卫生陶瓷、工业陶瓷、特种陶瓷等等。这些不仅可以作为建筑材料，工业辅助材料等还具有观赏价值。虽然这些系列陶瓷在德化陶瓷产业中所占比例较小，但是，德化人民还是很注重市场的新兴需求，时刻抓住机遇的。这系类陶瓷产品在新海上丝绸之路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相信德化人民孜孜不倦的创新精神与丰富实践能力，将会为在新海上丝绸之路上发挥“中国瓷都”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徐俊东. 刍议陶瓷文化与德化经济[J]. 中国陶瓷工业, 2007, 14(1): 50-52.
- [2]陈玉霞, 高芬.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交流[J]. 兰台世界, 2011, 3:78-80
- [3]陈万灵, 何传添. 海上丝绸之路的各方博弈及其经贸定位[J]. 区域经济, 2014, 3(241)
- [4]司徒尚纪. 海上丝绸之路与我国在南海传统疆域的形成[J]. 云南社会科学, 2001, 6:72-76
- [5]赵春晨. 关于“海上丝绸之路”概念及其历史下限的思考[J]. ACADEMICRESEARCH, 2010, 7:88-91
- [6]陈武. 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关于共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J]. 当代海西, 2014, 4: 16-17
- [7]谢立新. 传统技术型产业集群成长与地区竞争力提升——德化与景德镇陶瓷产业创新模式比较研究[J]. 2006, 9:82-85.
- [8]赖荣伟. 德化瓷雕创作的传承与艺术创新[J]. 中国陶瓷工业, 2010, 17(6): 51-54.
- [9] 陆芸. 近 30 年来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述评[J]. 丝绸之路文化与中华民族
- [10]许剑雄, 余慧. 景德镇陶瓷产业的发展现状[J]. 佛山陶瓷. 2014, 5(214).
- [11]吕余生. 深化中国—东盟合作, 共同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J]. 学术论坛, 2013, 12:29-35.

- [12]林合龙.德化陶瓷志[M].德化:中国方志出版社,2004:93-97.
- [13]陈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1-472.
- [14]夏秀瑞,孙玉琴.中国对外贸易史(第一册)[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45-345
- [15]德化陶瓷研究论文集编委会编.德化陶瓷研究论文集[C].德化:德化陶瓷研究论文集编委会编,2009.253-304.
- [16]陈惠平.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特质及其当代意义[N].中国福建省党委学报,2005-02-10.
- [17]郭仙仙,黄鹏辉.德化速度[N].中国特产报,2008-08-22,(B02).
- [17]杜静.出口退税率调高6个百分点,为陶瓷出口企业做强做大赢得时间[N].海峡财经导报 2008-10-31.(006).
- [18]杨羽.德化瓷雕以精制胜[N].中国商报,2004-08-26.
- [19]庄则平,林圳勇.德化工艺陶瓷上半年出口跃居全国第二位[N].中国建材报,2007-07-19
- [20]鹏辉.福建德化陶瓷出口额首次突破1亿美元[N].中国建材报.2011-01-31(B01).
- [21]孟昭丽 郭亚强 刘姝君.福建泉州打造“海丝”先行区[N].新华每日电讯,2014-05-12(007).
- [22]陈婧.中国现代陶艺发展现状研究[D].江西:陶瓷美术学院设计艺术学,2014
- [23]支华.景德镇陶瓷产业集群优化研究——与德化陶瓷产业比较[D].江西:南昌大学产业经济学,2007.
- [24]吴任平.福建省陶瓷行业发展报告[R].福州:福州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2011.
- [25]宋波,刘倩,孙娟.福建省德化县陶瓷行业能值分析[R].北京:北京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院环境工程系,2010.

Abstract: Dehua, one of the Three Capitals of Porcelain in China,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in the foreign trade of ancient China. Dehua porcelain is a main traded goods which has a long history in trading. It is unique in the Chinese trading of porcelain for it temporizing the tide with its self feature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oreign trade in ancient China, New Marine Silk Road really opens a new market for China, which became a new window of the foreign trade of China from the history to the modern times. Today, as a outstanding one in the Chinese ceramic industry, Dehua porcelain is particular significant. It is top-class in the Chinese porcelain industry for its traditional porcelain carving art, delicate western artwares or increasingly popular ceramic daily use, etc. Hence, it has a profound effec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porcelain foreign trade to analyse the influence of Dehua ceramic in the New Marine Silk Road.

Key Words: Dehua porcelain, foreign trade, New Marine Silk Road, impact analysis

作者简介:

李变花,女,副教授、闽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与金融。

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结构及地理空间分布研究

李蕊蕊 赵伟 陈静

内容摘要：本研究运用定量统计及空间分析方法，对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级别结构、类型结构、宏观区域分布、行政市域分布以及流域分布等特征，进行了地理环境分析和基于市域尺度的空间特征分析。研究发现，福建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特征为：1) 等级结构呈现出“金字塔”形；2) 类型结构以传统手工技艺和民俗项目为主；3) 空间结构特征在数量上，以闽南地区为主，闽中地区次之，闽东、闽北、闽西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数量较少。传统医药和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福州的区位熵比较高，曲艺则是高度集中于厦门，民间文学集中分布于泉州，传统舞蹈与传统音乐则分别集中于三明和龙岩；在密度上表现为厦门、莆田、泉州三地市较高；此外福建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布具有流域指向性。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经济因素、人文环境等多种因素对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产生影响。完善分级保护制度和保护名录体系，强化文化空间的保护，适度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等创新途径，将是未来福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核心议题。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区位熵 空间分布 福建省

引言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上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明确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界定，从而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式进入人们的视野，让越来越多国家的专家、学者们投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中^[1]。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对传承和发展民族精神，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身份，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提升了国家的软实力，以及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2]。我国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许多专家及学者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旅游的开发和资源产业化等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3-7]。有学者研究从全国尺度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的分析^[8]，就省域尺度非物质文化遗产结构特征及地理空间分布特征的研究而言，主要集中于广东省、安徽省和广西省^[9-11]。

福建省素有“海滨邹鲁”之称，因其历史和地缘的关系，许多已经在中原上消失的非物质文化在福建得以保存。福建省公布的《福建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与2005年正式施行。这一条例的施行也开启了福建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12]。截止到2012年底，福建省已成功申报共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成功开展共四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申报、审核工作以及各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本研究通过搜集福建省现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记录，通过分析其结构和地理空间分布特征，以期能为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

开发利用提供参考。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 数据来源

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建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评价体系,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国际级、国家级、省级、市级和县级五个级别^[13],其中国家级和省级有正式名录和扩展名录。由于各个县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采取的保护措施力度不同、标准不一等因素,导致县级数据信息搜集困难、不完整,故本研究中采用国际级、国家级、省级和市级四级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信息进行分析,同一名称出现于不同级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只按最高等级来计算。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据信息主要来源于世界非遗网、中国网、中国政府网、福建省人民政府政务门户网站和福建省9个地级市的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以及文化类相关网站。

(二) 研究方法

本研究利用区位熵^[14]对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量化分析,以测度不同类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集中程度。具体计算公式为:

$$Q_{ij} = (G_{ij}/G_j) / (G_i/G) \quad (1)$$

式中: i 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 ($i=1, 2, \dots, 10$)

j 为地区样本 ($j=1, 2, \dots, 9$)

Q_{ij} 为 j 地区 i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区位熵,

G_{ij} 为 j 地区 i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得分值,

G_j 为 j 地区的各种类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得分值,

G_i 为全省 i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得分值,

G 为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得分值。

二、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结构

(一) 非物质文化遗产级别结构特征

截止至2012年底,共收集到福建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共1179项。从级别来看,福建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级分布呈现“金字塔”结构,以市级代表作名录为主比重为61.58%,其次是省级30.62%,国家级7.46%,国际级的最少(表1)。从表1统计的数据来看,级别与数量呈负相关,即随着级别的提高其数量减少。这种趋势有利于低一级的项目成功申报为高一级的项目,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福建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级别结构将保持着随级别的提高其数量减少的趋势。

表1 福建省不同级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统计

Tab. 1 Quantity characteristics at different level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Fujian

按级别划分	数量/项	比例/%
国际级	4	0.34
国家级	88	7.46

省级	361	30.62
市级	726	61.58
合计	1179	100

资料来源：世界非遗网、中国网、中国政府网、福建省人民政府政务门户网站和福建省9个地级市的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以及文化类相关网站上公布的数据，时间截止至2012年12月。

(二) 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结构特征

我国在《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普查工作手册》中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表”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按学科领域分成16个基本类别（一级类）。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出《关于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中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划分为10大类：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杂技与竞技、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和民俗^[15]。随后2008年公布的《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的通知（国发〔2008〕19号）》中，还是将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划分为10大类，但在名称的命名上做了调整：将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美术三者中的“民间”一词调整为“传统”；而将“杂技与竞技”一词更改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剩下的保留原来的命名^[15]。鉴于国家公布的非遗名录带有一定的示范性，现有的国家级、市级乃至部分县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大部分都是按照该十大类划分方法进行划分，并且在一定时间内将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本研究中所采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划分体系和对各类命名是依据国发〔2008〕19号文件，福建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进行统计（表2）。

表2 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各类型数量统计

Tab. 2 Quantity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type structure feature for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Fujian

类型	国际级	国家级	省级	市级	合计/项	比例/%
民间文学		2	13	38	53	4.50
传统音乐	1	6	36	61	103	8.74
传统舞蹈		6	28	35	69	5.85
传统戏剧	1	16	38	52	106	8.99
曲艺		7	14	24	45	3.82
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		4	26	41	71	6.02
传统美术		10	21	27	58	4.92
传统手工技艺	1	18	110	226	355	30.11
传统医药		4	11	23	38	3.22
民俗	1	15	65	200	281	23.83
合计/项	4	88	361	726	1179	
比例/%	0.34	7.46	30.62	61.58		100

福建省目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结构以传统手工技艺和民俗项目为主，传统戏剧、传统音乐

项目为次，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舞蹈、传统医药、传统美术、民间文学和曲艺项目少的结构特点。具体类型数量结构特征如下：①福建省传统手工技艺项目的数量最多，共 355 项，约占总数量的 30.11%；其次为民俗，共 281 项，约占总数量的 23.83%。传统手工技艺是一种装饰美化生活用品、生活环境、生产工具的艺术，它在人们衣食住行和劳动生产活动中，对人们的精神和审美情趣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具有其他艺术无可比拟的经常性、广泛性和深入性。福建省地处偏僻，三国后，随着战乱南移的中原人民将中原文化带入福建，在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下手工技艺得到发展。而在明清两代，对外贸易发达，手工艺品大量外销的同时也引进了一些阿拉伯和欧洲等地区的手工技艺，促进福建的手工技艺的创新发展。历史社会和地理环境双重因素致使福建省的传统手工技艺项目数量最多。②传统戏剧、传统音乐项目的数量也比较多，约占总量的 17.73%。福建省早期居民以闽越人为主，汉晋以后，随着中原汉族的不断南迁以及闽越人的消失和融合，汉族逐渐成为主要居民。此后通过不断的发展，畲族、回族、满族、高山族等少数民族在福建居住以及吸收国外文化和异域风俗，使得福建省的民俗得到多元化发展^[16]。③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舞蹈、传统医药、传统美术、民间文学和曲艺项目的数量较少，六项相加约占总量的 28.33%。传统戏剧、传统音乐项目是重要的娱乐项目，在传播方面相对于技术强的项目更有优势。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舞蹈、传统医药、传统美术、民间文学和曲艺项目，由于存在认识不清、保护不到位和技术难度大、后继乏人等原因，使得这些项目在数量上偏少。

三、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特征

(一) 区域分布特征

根据福建省各地区在社会、经济、文化之间的差异，从空间上将福建省分为：闽东、闽西、闽南、闽北和闽中五个区域。其中闽东指宁德地区；闽西包括三明和龙岩地区；闽南包括泉州、厦门和漳州地区；闽北为南平地区；闽中为福州和莆田地区。

表 3 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域分布

Tab. 3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Fujian

区域	数量/ 项	比例/%	面积/万 km ²	密度/项·万 km ²
闽东	143	12.13	1.5649	91.38
闽西	142	12.04	4.1950	33.85
闽南	467	39.61	2.5480	183.28
闽北	108	9.16	2.6300	41.06
闽中	319	27.06	1.3919	229.18
合计	1179	100	12.3298	115.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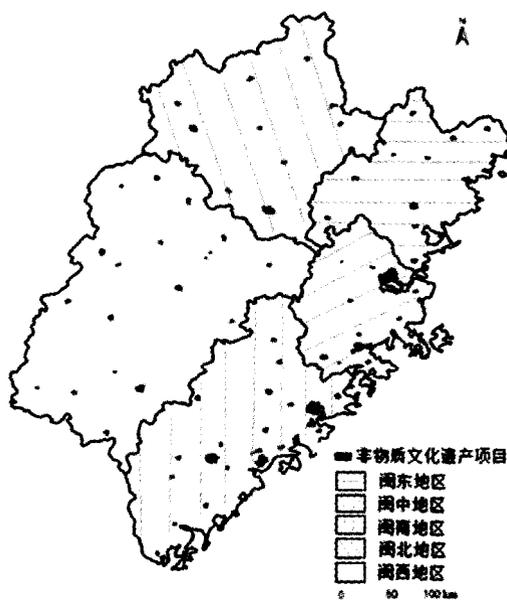
表 3 表明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区域上的分布不均衡。从数量上与比重来看，闽南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在五个区域内达首位，有 467 项，占总量的 39.61%；闽中地区一共有 319 项，占

总量的 27.06%；闽东地区共 143 项，占 12.13%；闽西地区共 142 项，占 12.04%；而闽北地区最少，共 108 项，占 9.16%。从区域密度分布来看，可以相应的分为 3 个层次，区域的平均密度为 115.75 项/万 km²，闽中地区以 229.18 项/万 km² 居首位，闽南地区以 183.28 项/万 km² 位居第二，闽东、闽北、闽西地区低于平均密度。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差异的因素主要包括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经济因素、人文环境等。福建素有“东南山海”之称，境内的山岭、丘陵、河谷、盆地交错分布，由于这种地理环境的影响，使得几次南下的中原人民在此扎根，各个地区在早先时期内大多封闭，这使得各个地区间的文化保留着地方的独特性。唐初开漳圣王陈元光以及开闽三王将中原的社会文化以及民间宗教信仰传入福建，使得传统戏剧、传统音乐、传统舞蹈、曲艺等得到相应的发展和繁荣。闽南地区以闽南人民系为主，闽南人的人文特征中具有浓厚的海洋文化特征，富有探索进取的精神，有重商的传统。闽南人的这种人文特征随着宋元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明清时期对外贸易的发展越发明显。这一时期，国外文化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而传入，让闽南地区在继承发扬原有文化的基础上，融合了国外文化，使得闽南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得到保留和发展。因此闽南地区拥有丰厚的文化基础，在这一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最多。闽中地区以福州人和兴化人为主，福州地处省会中心，是福建政治、经济、文化交流聚集地，并且莆田历来人文昌盛，人才辈出。两种不同民系给闽中地区带来了丰富的文化，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数量上排在了全省第二。闽东地区主要是福州人民系，闽北主要是闽北人民系，闽西主要是客家人民系，这三个地区不像闽南和闽中地区，闽西、闽中大山带阻隔了文化对外传播的同时，也阻止了外来文化的进入，因此这三个地区保留了鲜明的地方特色文化但对于外来文化，即国外文化吸收融合少，也有可能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不够深入的原因，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数量规模不及闽南地区和闽中地区。

总而言之，福建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宏观地域分布的特征是以闽南地区为主，闽中地区次之，闽东、闽北、闽西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数量较少（图 1）。

图 1 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域分布图

Fig. 1 Region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Fujian



(二) 市域尺度特征及量化分析

1. 区位熵分析。以福建省9个地级市作为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中观研究对象。通过对不同等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赋值：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赋值为1，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0.5，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赋值为2，国际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赋值为4，得到福建省9地市十种不同类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分表。根据区位熵公式，得到表4。

表4 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区位熵

Tab.4 location entropy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Fujian

类型	福州	厦门	泉州	漳州	莆田	宁德	南平	三明	龙岩
民间文学	0.79	0.99	2.24	0.45	0.86	1.31	0.24	0	0.72
传统音乐	1.05	0.58	1.31	0.75	0.98	0.56	0.95	1.05	2.03
传统舞蹈	0.93	0.65	0.76	1.1	1.17	0.39	1.62	2.14	0.75
传统戏剧	0.63	0.97	0.99	1.06	0.31	1.52	1.1	1.79	1.01
曲艺	1.42	3.14	0.2	1.62	0.16	0.17	1.94	1.14	0
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	2.84	0.93	1.14	0.56	0.37	1	0.77	0	1.15
传统美术	1.02	0.37	1.45	1.56	1.41	0.69	0.62	0.23	0.27
传统手工技艺	0.51	0.89	0.75	1.12	1.04	1.34	1.33	1.04	1.28
传统医药	3.16	1.33	0.96	1.44	0.37	0.2	0.26	0	0.77
民俗	0.81	1.28	0.93	0.77	1.45	1.12	0.75	1.12	0.82

经分析发现：传统戏剧、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和民俗类型区位熵值各个城市间差异不显著，即上述四种类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空间上的分布呈现出相对均衡的布局，反映出福建各地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差异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传统戏剧、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和民俗类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统医药、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民间文学、传统舞蹈和传统音乐类型的区位熵差异显著，在空间上的分布呈现出集中的态势（图2），传统医药类与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非物质文化遗产高度集中于福州，作为福建省省会的福州是拥有优越的文化条件，中医文化资源丰富、拳术类型多样，区位熵领先于全省；曲艺类文化遗产高度则集中在厦门，厦门是闽南文化的核心区；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高度集中于泉州，泉州中原文化、海洋文化和外来文化的交融之地，为民间文学的诞生创造了肥沃的土壤；传统舞蹈和传统音乐则分别集中于内陆的三明和龙岩，三明与龙岩是福建客家人的集中居住地，中原文化与当地的土著文化的融合，形成不同于沿海的舞蹈与音乐的表达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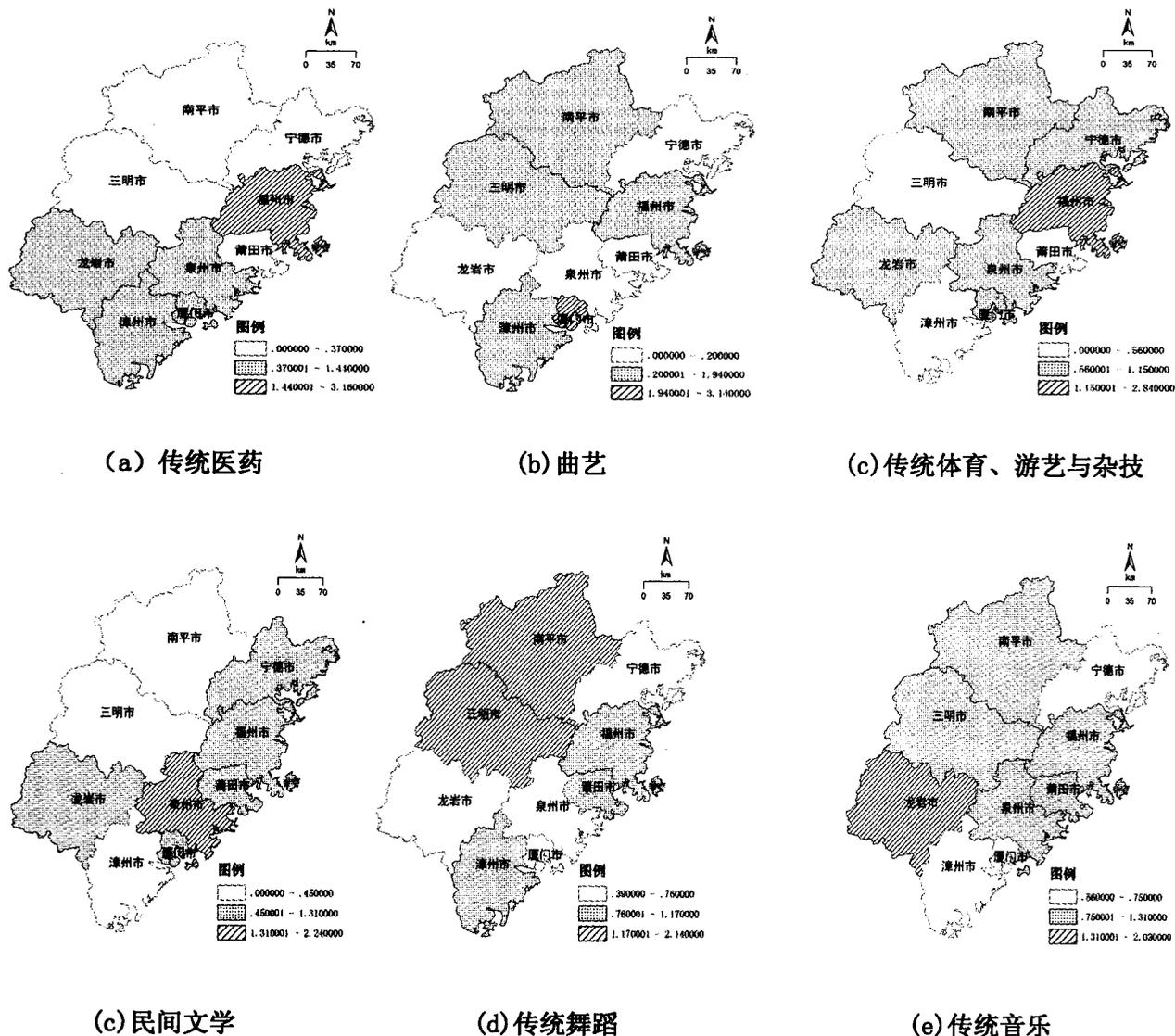


图 2 六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集聚化差异格局

Fig. 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Agglomeration in Fujian

2. 密度特征分析。前文从区域的角度分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密度，表明不同区域的密度存在一定的差异。那在同一个区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密度是相近？基于这个问题，本研究进一步从市域尺度深入分析。从行政市域角度来看，福建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量在空间分布上存在差异性，分布不平衡（表 4）。泉州市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共 227 项，接着是莆田市拥有 193 项，其次才是福州拥有 147 项，而漳州市、宁德市、南平市、厦门市、三明市、龙岩市分别拥有 143、122、108、97、90、52 项。从行政市域密度分布角度分析，9 个地级市的平均密度为 180.08 项/万 km^2 ，在平均值以上的达 3 个，其中以厦门的平均密度 520.11 项/万 km^2 最高，而福州、漳州、宁德、南平、三明和龙岩 6 个市均位于平均值以下。虽然有个别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有限，并在密度指标上呈现出截然相反的情况。但是总体而言行政市域分布的数量和密度基本上是一致的。

表 4 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市域分布

Fig.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Fujian

	数量/项	比例/%	面积/万 km ²	密度/项·万 km ²
宁德	122	10.35	1.3400	91.04
福州	147	12.47	1.1968	122.83
莆田	193	16.37	0.4200	459.52
泉州	227	19.25	1.1015	206.08
厦门	97	8.23	0.1865	520.11
漳州	143	12.13	1.2600	113.49
南平	108	9.16	2.6300	41.06
三明	90	7.63	2.2900	39.30
龙岩	52	4.41	1.9050	27.30
合计	1179	100	12.3298	180.08

泉州、漳州、厦门市的闽南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点密度最高，集中性强（图 3）。其原因之一是厦漳泉三地在历史上开发较早，接受外来的文化能力强。改革开放以后，厦漳泉地区是福建经济发展的领头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也相应得到跟进。其次是莆田、福州的闽中地区，这两个地区在历史上人才辈出、社会昌明，省府在此建立，其文化氛围浓厚，非物质文化遗产点密度较高。而宁德市、南平市、三明市、龙岩市虽然有较高的点密度分布，但没有闽南地区和闽中地区集中。此外，从点密度空间的密集分布方面来看，福建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集中分布在沿海地区，这可能是源于沿海地区在接受本地文化的同时也易于接受海外文化，相较于内陆地区而言，其文化的延展性更广，兼具陆地性及海洋性特征。



图 3 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市域密度分布

Fig.3 Density analysi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laces in Fujian

由此可知，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市域分布不均衡，以沿海地区的泉州、莆田、福州、漳州、厦门市为中心集中分布，而宁德、南平、三明、龙岩市呈分散分布态势。

通过对区域密度与市域密度的分析，福建沿海的城市，密度是远远高于内陆地区的密度，虽然有的城市数量不是最多，但密度遥遥领先，主要是跟所在区域的面积有较大的关系。

3.3 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的流域分布特征

通过对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福建省水系^[18]进行相关分析，发现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布与其主要河流水系分布一致。居民点往往会选择靠近水源的地区，这些地区地形平坦，提供充足水源。而不同的人群可以带来不同的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分布基本上都在水源旁。闽南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主要分布在晋江流域和九龙江流域内；闽中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主要分布在木兰溪流域和闽江中下游流域；闽东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主要分布在敖江流域和交溪流域；闽西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主要分布在汀江流域、闽江沙溪流域以及闽江富屯溪流域的部分地区；闽北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主要分布在闽江建溪流域和闽江富屯溪流域内(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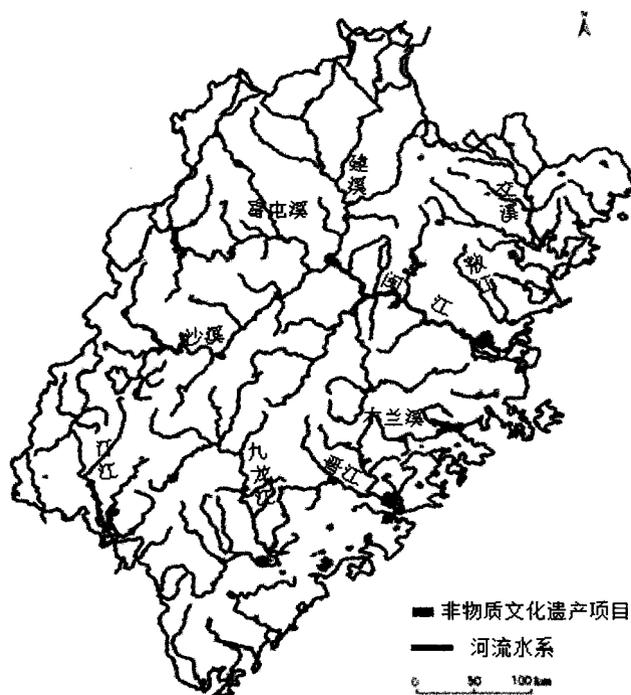


图4 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流域分布特征

Fig. 4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basin in Fujian

四、结论与讨论

(一) 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得出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总体分布特征为：

(1) 数量与级别结构方面，其一，随非物质文化遗产级别的提高数量呈现递减的趋势；其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结构以传统手工技艺和民俗项目为主，传统戏剧、传统音乐项目为次，传统体

育游艺与杂技、传统舞蹈、传统医药、传统美术、民间文学和曲艺项目少的结构特点;

(2) 从空间分布来看,福建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集中在沿海的闽南地区的泉州市、漳州市、厦门市以及闽中地区的莆田市、福州市,而闽东地区的宁德市、闽西地区的三明市和龙岩市、闽北地区的南平市零散分布的特点;

(3) 环境影响方面,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布与其主要河流水系分布呈正相关耦合关系。

(二) 讨论

基于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总体分布特征可知,福建省未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升级可从以下方面入手:(1) 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运用,继承发展;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方针。保护为主,抢救第一是保护工作的立足点,是抢救和保护在现实政策反映的需要。合理运用,继承发展反映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和现状,非物质文化遗产都面临着后继乏人、市场流失的现状,因此适当的利用和开发,有利于扩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和吸引力。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两种保护方式。通过法律进行强制性的规定,激发人民对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动性。(2) 建立并完善分级保护制度和保护名录体系。根据福建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结构特征,应该继续保持这种级别结构特征,这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申报工作。同时保护现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各类型项目的同时,也要进一步挖掘其他类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一步丰富福建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各类型的项目数量。(3) 加强地区文化空间的保护工作,适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旅游开发。福建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布具有相对的集中性,因此可以加强对文化空间的保护。文化空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的土壤,保护文化空间,有利于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和整体性。并且福建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集中的地区,可以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及旅游景点设计旅游线路,扩大地区文化影响的同时提升地区人民的精神文化素养。

参考文献:

- [1] 李心峰.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探讨[C]//王文章.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论坛论文集[C].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91-107.
- [2] 王鹤云,高绍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机制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70-75.
- [3] 黄跃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以桂林为例[J].社会科学家,2011.(2):159-161.
- [4] 徐贲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式保护框架[J].广西民族研究,2005,(4):173-180.
- [5] 秦艳培.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商品性的开发[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59-62.
- [6] 吴康.戏曲文化空间扩散及其文化区演变——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淮剧为例[J].地理研究,2009,28(5):1427-1438.
- [7] 吴媛媛,颜节礼.苏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旅游开发潜力研究[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3,32(5):157-162.

- [8] 程乾,凌素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J].地理科学,2013,33(10):1166-1172.
- [9] 袁少雄,陈波.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结构及地理空间分布[J].热带地理,2012,32(1):94-97.
- [10] 彭伟,甘萌雨,张永贺.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结构及空间分布形成机制研究[J].池州学院学报,2012,26(6):69-71.
- [11] 戴其文,刘俊杰,吴玉鸣,等.基于区域视角探讨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J].资源科学,2013,35(5):1104-1112.
- [12] 福建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 [EB/OL] (2004-09-24) [2013-11-18]
<http://baike.baidu.com/view/6706236.htm?fr=aladdin>
- [13] 苑利,顾军.非物质文化遗产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51.
- [14] 鲁艳,徐建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实证研究与R/S分析[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2,21(3):60-66.
- [15] 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 [EB/OL] (2006-06-02) [2006-06-02].http://www.gov.cn/zw/gk/2006-06/02/content_297946.htm
- [16] 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的通知 [EB/OL](2008-06-07)[2008-06-14].http://www.gov.cn/zw/gk/2008-06/14/content_1016331.htm
- [17] 福建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福建民族民间传统文化[M].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202-204.
- [18] 福建省水系分区图 [EB/OL] (2007-03-18) [2008-10-30].
<http://www.fjagri.gov.cn/html/2008/10/30/11447.html>

Abstract: This paper using methods of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spatial analysis analy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erarchical structure, formation structure, macroscopic regional distribution, administrative distribution on municipal scale, and drainage distribution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Fujian Province.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there are mainly three characteristics with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 in Fujian: 1)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is a pyramid-like one; 2) with the formation structure, the traditional handicrafts and folk activities dominate; 3) concerning the spatial structure, Southern Fujian leads on the number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with Middle Area behind it, and dwarfs East, North and West part of Fujian. Fuzhou has the highest location entropies on traditional, sports, entertainments, and acrobatics; traditional folk art forms are highly concentrated in Xiamen; Quanzhou is the concentration place of folk literature; Sanming and Longyan leads on traditional dancing and traditional music respectively. On the density of distribution, Xiamen, Putian and Quanzhou are the three highest places. Besides,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Fujian is for some certain drainage-indicative. The distribu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 in Fujian is multifactorially affected by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socio-economic factors, cultural environment, et al.. It is suggested that perfection of the hierarchical protection institution and the protection list system, strengthening of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spaces, and proper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 as tourism sites will be key topics of the futur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 in Fujian.

Key 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location entropy, distribution, Fujian

作者简介:

李蕊蕊 (1980-), 女, 山东鱼台县人, 泉州师范学院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讲师, 硕士, 中山大学 2013-2014 学年访问学者, 主要从事城市发展与区域规划;

赵伟, 泉州师范学院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讲师;

陈静, 泉州师范学院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助教。

承办单位

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

福建社会科学院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心

“东亚文化之都·泉州”建设发展委员会办公室

中国社科院文化研究中心闽南文化研究基地（泉州师院）

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